



刘华清回忆录

刘华清 著

解放军出版社

刘华清回忆录

LIUHUAQINGHUIYILU

ISBN7 - 5065 - 4721 - X/K · 493

定价：66.00 元

刘华清回忆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华清回忆录/刘华清著.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

ISBN 7-5065-4721-X

I. 刘… II. 刘… III. 刘华清—回忆录 IV. 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89704 号

书 名 刘华清回忆录

著 者 刘华清

出 版 解放军出版社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 100035)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解放军出版社发行部

开 本 160×230 1/16

印 张 46

字 数 520 千字 图片 68 幅

版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9000

定 价 66.00 元

少小離家鬧革命
老來回首述生平
戎馬征戰七十載
喜看中華民族興

刘华清

2004年2月自题

目 录

第一章 投身革命

儿童团长	1
少共书记	7
“肃反”与“围剿”	14
第一次负伤	20
游击岁月	30
中央来人	36

第二章 孤军长征

秘密出发	40
独树镇负伤	45
《战士报》	51
“过河卒”	58
王母宫塬	64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诞生	72
火线和谈代表	77

第三章 太行岁月

东渡黄河	84
七亘村战斗	89

护送邓小平政委	94
太行党校	101
在师供给部	104
第四章 转战冀南	
“马褡子档案馆”	109
反合围与反“扫荡”	114
“抢救运动”	121
战略反攻	126
第五章 保卫胜利果实	
“赶快去前线”	134
鄆城回马枪	140
浴血郑庄寨	147
攻克“十三太保”	153
第六章 挺进大别山	
打过黄河去	158
鏖战羊山集	164
中心任务：走	170
“今天开会不拉手”	175
立足生根大别山	182
第七章 饮马长江	
中原“十字架”	191
走马中原	195
“三层亮”	204
“瘦狗拉硬屎”	209
军乐声中过长江	219

第八章 走进军校

- “招兵买马” 226
- 改造旧军官 238
- 创办正规军校 246

第九章 结缘大海

- 大连海校 252
- 用好“外脑” 257
- 第一次出海 261
- 赴苏学习 265
- 旅顺基地演习 274
- 核心战斗部队 278

第十章 创建第七研究院

- “尚方宝剑” 283
- “脱帽加冕” 290
- 仿制人手 294
- 自行设计 299
- “部院合并” 301

第十一章 当聂帅助手

- “文革”受冲击 307
- 驱逐舰与核潜艇 312
- 还叫“东方红”卫星 317
- 军事接管小组 322
- 给聂帅“帮倒忙” 326

第十二章 重回海军

- “船办” 330

西沙设防	338
赴朝考察	343
援越扫雷	345
憋不住的“汇报”	348
第十三章 整顿中科院	
《汇报提纲》	360
“五子登科”	365
出访墨西哥	370
唐山大地震	372
第十四章 主持军委科装办	
回到国防科委	376
军委科装办	381
军队与科研	388
第十五章 在总参谋部	
对越自卫还击作战	394
“明天的装备”	396
军队“消肿”	401
后备力量	405
第十六章 就任海军司令	
再回海军	413
慈不掌兵	417
整顿与改革	423
提出“海军战略”	432
第十七章 战略军种	

海军军官摇篮	440
科研基地	449
军港驻泊	455
不能当“光杆司令”	461
海军现代装备体系	467
核潜艇出航	474
中国“航母”	477
第十八章 走向近海	
海上阅兵式	482
正规化训练	487
远航合成编队	491
从近岸伸向大洋	497
出访六国	507
中美舰队相遇太平洋	520
第十九章 到军委工作	
七十受命	526
南沙自古属中华	534
调研军队改革	545
论证装备体制	555
再次授衔	560
发展装备	563
第二十章 动荡的世界	
新的任命	575
军队“八五”计划	580
中苏军事技术合作	590

面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	599
海湾警钟	606
兵不可一日不练	614
第二十一章 为了和平	
新的工作思路	629
深入基层	646
科技强军战略	666
载人航天工程与核威慑	679
进驻香港	687
友好往来	696
难忘小平	713
一生无悔	723

第一章 投身革命

1916年10月20日,我出生在湖北大悟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

那个时代,人类社会动荡不安。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打得激烈。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在母腹中躁动。在中国大地上,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王朝终于土崩瓦解。南京成立了临时政府,改国号“中华民国”,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随后袁世凯夺取了辛亥革命果实,上演称帝丑剧。军阀混战,民不聊生。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诞生了。革命的星星之火,很快成了燎原之势,也波及到处在中国腹地的我的家乡。这使我有机会较早地参加了革命,从而影响和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儿童团长

13岁,我当上了儿童团长。

我们村叫刘家院子,当年是黄安和黄陂县交界处,后划归到礼山县。解放后,礼山改名大悟,所以今天说来,我算大悟

县人。大悟位于大别山区,处在湖北、河南和安徽三省交汇点。这里山深林密,地势险要,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土地革命时期,这里成了著名的鄂豫皖苏区。

刘家院子是一个小山村,村边有条土公路,从河南罗山过来,通向山外,车辆一过,卷起一条土龙,常常把我的视线牵向远方。村东有条清澈的小溪,夏天我常和小伙伴们跳进去打水仗。村的周围环绕着仙居顶、天台山、老君山等一些海拔800米左右的山峰,树木茂密,鸟语花香,时有野兽出没。我的家乡是非常美丽的。

我家很穷,没有水田,只有几块贫瘠的山地,便租种了一家地主的水田。我父亲叫刘顺山,共有兄弟七人。由于贫穷,七兄弟中只有我父亲和三叔成了家。三婶很快去世了。我母亲刘黄氏,是一位勤劳善良的妇女,不识字,但善持家。在我记忆里,她总在忙,很少休息。她活得很苦、很累,却从没怨言,最后因劳累过度,49岁就去世了。母亲去世时,我在外革命,没能见上一面,留下了永久的遗憾。我有一个姐姐、两个哥哥和弟妹各一个。哥哥们稍大一点后,经常随伯伯、叔叔们出外打工。农民的日子是一天天熬过来的。

有压迫就会有反抗。十来岁时我就参加革命活动了。1926年底和1927年初,家乡一带已经建立了共产党的秘密组织,我们村也有,负责人叫刘汉卿,是武汉铁路工人,也是我的叔伯哥哥。还有一个叫黄昭庆,是我表兄,是武汉的码头工人。他们俩受党组织派遣回乡搞农民运动。另外,村北五六里路外聂家榜村有个叫聂凤彩的党员,也在搞地下活动。他们三个好像谁也不领导谁,但经常联系,我就成了他们的交通员。一些不用写信的事,就让我口头转告,这使我多懂了一些事情。当然,涉及到党的秘密,他们就让我送信。我从未出过

错,他们很相信我。

1927年4月和7月,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在上海、武汉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镇压农民运动。形势严峻,农村的革命活动变得更隐蔽了。我有时还为刘汉卿和黄昭庆送信,不过,脑子里却有了一连串的问题:为什么农民运动不能搞了?为什么国民党到处抓革命者、杀革命者?

大革命的失败,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1927年8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决定以湖南、湖北、广东、江西等省为中心,发动秋收起义,建立革命政权和革命军队。中共湖北省委也拟定了《秋收暴动计划》。1927年底,黄麻起义爆发,许多乡亲参加赤卫军,拿起大刀、梭镖和锄头拥向县城。我的伯伯、叔叔和兄弟都参加了起义。农民自卫军占领了黄安县城,成立了黄安县农民政府,黄麻两县的农民自卫军合编,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那几天,县城敲锣打鼓,热闹非凡。可是好景不长,国民党很快调集重兵,向黄安反扑,黄安失守了。

鄂东军突围后,党组织决定只留少数人枪就地坚持斗争,其他人则转向黄陂北部的木兰山,开展游击战争。不久,鄂东军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并将队伍中的党团员骨干分子分批派回黄麻地区,加强地下党团活动,开展武装斗争。乡亲们见到共产党人又回来了,高兴地编出歌谣:

党员游击转回还,黄陂到黄安。

先打“清乡团”,捉土豪、杀劣绅,一致要共产。

倘若谁反抗,叫他狗命完。

民团把枪缴,士兵来哗变,

土豪气、劣绅急,两眼朝上翻。

刘汉卿也受党的委派回到本乡。这次他的活动范围不是一两个村子了,而是本地区好多个村子,要联系的人多,开会也多。我也更忙了,不仅送信、传递情况,开会时还给他们站岗。我年纪小,到外村不容易引起注意。有时也会遇到麻烦。一次到黄畈村送信,刚进村,几个背枪的民团就把我拦住了,其中一个大声问:“干什么的?”我说:“走亲戚。”“哪个村的?”“王店的。”他们见我回答流利,又是小孩子,就让我走了。这样的事还遇到过几次,但都想办法应付过去了。

在参加秘密农民运动中,我也逐渐成长起来,懂得了一些穷人要革命、要翻身求解放的道理,明白了穷人穷不是命里注定,而是地主老财剥削压迫的结果,应该起来斗倒地主豪绅,穷人才能当家作主。我年纪虽小,倒是自认为懂得不少,那些年纪相仿的小伙伴们,也都愿意听我讲。

我在伙伴们中能有一定号召力,和我读过一点书有很大关系。我的六个弟兄弟姐妹中,我是最幸运的。七岁那年,家里尽管穷,父母还是咬牙送我上学。为了将来能生金发财,给我起了学名叫刘金发。

我读的是私塾,地点就在村里的祠堂,课本是《三字经》、《百家姓》等。我的第一位老师,是本村的假秀才刘厚卿。刘先生60多岁,经常用戒尺打学生,大家极怕他。教书方法也很陈旧,先由先生领读,然后学生高声背诵。能背诵下来,就算通过,背不下来,就挨戒尺。三年多的私塾,我先后读完了《论语》、《孟子》、《大学》等,当时都能背,但意思不大懂,因为刘先生从不讲解内容。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写毛笔字,练的是楷书。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10月份打到了武汉,湖北的工农运动风起云涌,我们村和附近几个小村联合办起了新学堂,

县里也派来了老师,叫徐月波。新学堂用新教材,学的是语文、算术、地理、历史等。后来才知道徐老师是共产党员。他除了给我们上课,还经常讲孙中山的国民革命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等等。我很爱学习,无论上什么课,都认真听。徐老师很喜欢我,还特意给我改了名字,叫刘华青。我很高兴,但当时并不理解新名字的意义。这个名字,一直用到抗日战争时期,有人说,“华青没水不好”,就加了三点水,沿用至今。

新学堂开始时还有一些学生,渐渐就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一个老师教一个学生,我的待遇比现在的研究生还好。冬天到了,徐老师除了教我读书外,还要自己弄劈柴,烤火、做饭。有时忙不过来,我就帮他,慢慢我也学会了做饭炒菜。天气冷,一闲下来,我就坐在火炉旁,听徐老师讲故事。他给我讲过《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还教我读《左传》、《史记》。我学得很认真。他告诉我,光听老师讲不行,还要靠自己多学习,养成自学的习惯。我很感谢徐老师,许多知识都是他传授给我的。这使我能较早地懂得一些革命道理,后来在红军队伍里,也成了能多识几个字的“知识分子”。

1928年7月,鄂豫边地区革命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七军根据上级指示,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吴光浩任军长兼师长,戴克敏任党代表,全师120人左右,分为四个大队。由于有了主力红军,鄂豫边区的革命斗争开始蓬勃发展。1929年5月,中共中央为了加强鄂豫边区红军的领导,派来徐向前担任红三十一师领导。这时,红三十一师已发展到400多人,改编为五个大队。在徐向前的指挥下,红三十一师在黄安、黄陂、孝感、麻城、罗山、光山等地,接连粉碎了敌人三次“会剿”。当年秋天,鄂豫边区地方苏维埃政权纷

纷建立起来。我们乡也建立了苏维埃政府,成立了农会、党团组织、少先队和儿童团。

我参加了儿童团,被选为团长,算是第一次当“领导”。对于一辈子受命运摆布的农民来讲,土地革命是一件从没有过的大事,人人感到新鲜,群众的革命热情非常高。为了宣传革命道理,壮大革命声势,村里乡里经常召开群众大会。每逢开会,少先队和儿童团都要参加,而且我都带头喊口号。当时我嗓子都喊哑了,直到现在还是哑嗓子。

当年,我加入了共青团,被选为村团小组组长;不久,团小组改为团支部,我成了团支部书记。随后,又到乡苏维埃政府当了青年委员,兼任乡共青团支部工作。乡党支部、乡政府的各种会议、各种活动我都要参加,研究讨论的内容很多,如传达上级指示精神、有关决议、乡内的各种事务工作等,忙得很。这些工作,虽然占用我很大精力,但对我分管的工作、特别是共青团工作,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对我个人也是个很好的锻炼机会。

尤其让我兴奋的是,1929年12月,经党支部通过,我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当时叫“跨团兼党”的党员。我是党的人了。尽管年少,但心里涌起一种神圣的使命感。

可是,在后来的“肃反”中,我被当成“反革命”抓了起来,党籍也受到影响。直到1935年10月长征到达陕北后,让我又一次转党。在此后我的各种履历报表填写和报刊发表的简历中,均写为1935年10月转党。

少共书记

1930年春,区苏维埃政府通知调我到二程区工作。

二程区当时又称黄安县六区,位于黄安西部,因宋代理学家程灏、程颐兄弟俩出生于此而得名。乡政府主席姓聂,名字不记得了,他不同意我调走。区里催促,他只好服从,并鼓励我说,青年人参加革命,就要以革命为家,不要贪家恋旧,要勇敢地走出去,为革命干大事业。

当时革命形势比较好。以大别山区为中心的武装割据的斗争局面基本形成。继黄麻起义之后,鄂豫皖边区相继爆发了商南起义、六霍起义,创建了鄂豫边、豫东南、皖西革命根据地。继红三十一师之后,又成立了红三十二师、三十三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鄂豫皖边区利用蒋、冯、阎军阀大战这一有利时机,大力发展根据地,发展红军,相继成立了中共鄂豫皖边区特委,红军三个师也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成立了鄂豫皖边特别区苏维埃政府。这样,鄂豫皖边区根据地形成了统一领导,红军形成了统一指挥,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我到二程区报到时,党的区委书记袁克服找我谈话。他说:“区委决定把你调来,主要是你做过共青团的工作,做得很有成绩。到新岗位后,要一如既往努力工作。”我担任了少共区委组织部部长兼区少先队总队长。

那时的少先队是革命根据地境内地方军事性质的少年群众性组织。凡出身于雇农、贫农、中农家庭,年满15至20岁,经本人申请,都可以入队。组织系统是:县设指挥部,区设大队,乡设中队,村设小队。少先队的主要任务是站岗放哨,配

合红军行动,参加后方戒严等。配备的武器主要是大刀、长矛。后来缴获的枪支多了,也给少先队发些枪。我刚到时,全队只有几支枪,但没有一粒子弹。

这年冬,原少共团委书记郑遵席调走,由我接任。老实讲,虽然作过共青团工作,但是区这一层怎么做,心里没数。既没人教,也没有一套现成的方法,全靠自己去摸索。二程区下辖13个乡,我先是和其他人一块到各乡各村去跑,了解情况,熟悉工作,后来就自己去调查,开展乡、村共青团和少先队的具体建设工作。不久,我又接到通知,到中共黄安县委举办的党务干部训练班学习。同去学习的还有袁克服。

中共鄂东北特委为了培养各县党的基层干部,从1929年初就开始举办训练班,每期人数不等,学员多数是党员干部。训练班由县委书记甘济时负责组织。说是训练班,实际只有六七个人,除我和袁克服外,还有县委宣传部部长和另外几个人,名字记不住了。上课时,甘济时亲自当教员,讲马列主义理论、社会进化史、共产主义ABC、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共产党党章、游击战争、土地问题、苏维埃问题,还有中央发的各种通告和鄂东北特委的文件、决议等。甘济时讲得简明扼要,没有深奥的理论,我能听懂。学习方法,主要是听教员讲授,学员座谈讨论。除甘济时直接讲授外,宣传部长也给我们做一些解释,引导大家对疑难问题进行辩论,提高认识。

当时学习条件比较艰苦,没有课本,没有学习材料,也没有本子和笔,不能作笔记,全靠认真听,脑子记。好在那时年轻,记忆力好。这次学习虽然只有一个多月,但对共产主义常识、马列主义基本观点、建立苏维埃、实行土地革命运动、反对封建军阀斗争等等,在大概概念上有所了解,懂得了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本任务,初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和穷苦人

民获得彻底解放的思想武器,是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认真学习和掌握的真理。受训中,我也认识了县委书记甘济时。他是我们党的优秀人才,是文武双全的干部。他的言行表率,给我印象很好。此后不久,听说他到红四方面军当了师政委,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牺牲了。

训练班结束后,我回到二程区,仍任少共区委书记。当时,区里有一个赤卫队,直接由县赤卫大队领导。区委还准备成立一个区游击中队,让我兼中队长。1930年冬,游击中队正式成立。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武装队伍。我从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中挑选了十多个人,从区里搞到两支破枪,子弹没搞到。我那时不懂军事,如何训练都不会,但胆子大,敢想敢干,还是组织起来了。不过,接下来就有些为难了,我这个游击队长才14岁,其他人也都差不多年纪,也没懂军事的教官。因此,搞了两个月,区委决定不搞了,就留几个人,用这两支枪,给区委、区政府站岗放哨。我还是去做青年团工作。

1931年6月,我调到了陂安南县。

当时,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决定组建中共陂安南县委员会,并成立县苏维埃政府,李先念任县委书记兼苏维埃政府主席。同时成立县军事指挥部、总工会、共青团等组织。由于是新组建的单位,需要抽调一批干部。接到通知后,我赶到少共黄安县委接受任务。县委当时住在黄安城北部的柳林村,一个操广东口音的人和我谈话。他代表中共鄂豫边特委,讲了调我到陂安南工作的重要性,并介绍那里的负责人是李先念。没有征求意见,只要求我服从组织安排,好好工作。我也没讲二话,背起背包就出发了。当时,一起调去的还有其他人,我都不认识,说是李先念带队,可是却没见到他。

我们从柳林出发,经桃花区过倒水河直去庙嘴湾报到。

在庙嘴湾的戴氏祠堂,中共陂安南县委的一位领导人向我简单介绍了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和县军事指挥部的情况后,便直截了当询问我对工作的想法。我说听从组织安排。他很高兴,说:“你是做共青团工作的,这次还想让你干共青团工作。县的最南边与白区交界地区刚成立一个长堰区,你到那里去当共青团区委书记。”

长堰区原属黄陂县,陂安南县成立时划过来的。由于刚组建,区里只有区委书记兼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刘裕金一名领导,区委和政府机关人员正在选调,有一个十几人的游击队,还有几个做饭的炊事员,抓少共工作的就我一个人。区委书记对我很热情,希望能快一些把共青团工作抓起来。我在家乡时就是干共青团工作的,调来调去,还是老本行,我对工作充满信心。不过,由于斗争环境恶劣,长堰区的工作一时很难开展起来。县委便决定把长堰区和塔耳区合并。塔耳区是个老区,领导机构健全,工作搞得不错。由于原负责少共区委工作的朱贵康调走,我便担任了少共塔耳区的区委书记。

塔耳区所在地叫塔耳岗,位于长堰北面,西靠木兰山,东临黄安县。自古以来,这里就有花木兰替父从军的传说,至今还保存着木兰将军庙、木兰将军墓。黄麻起义失败后,起义军就转战在木兰山一带。我来时,区委书记是吴国清,后为程坦;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是李瑞三,后为张广才。这里开辟苏区较早,少共组织工作组组建较快,所以,我把主要精力用在开展长堰一带与白区交界的地方。

那时,由于政策比较“左”,在赤白交界的地方,打土豪、分田地的工作很不好做。我们白天给农民分了田地,晚上地主民团就打击群众。我们的人在时,地主豪绅不敢动;干部、游击队一离开,地主豪绅就反攻倒算。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采取

隐蔽斗争方式,秘密建立党团骨干组织,对带头反攻倒算的地主豪绅坚决实行打击,反复向群众作宣传教育,特别是教育青年,工作慢慢有了起色。塔耳岗地区的工作,搞得很红火,加之敌人没有大的“围剿”,形势较稳定。

8月,我害了场大病。当时,组织上决定把我调到八里区任少共区委书记,刚到就病倒了。先是风寒感冒,后来越发加重,一连高烧半个多月。更危险的是,当时没有医生,也没有药品,只能干挺在床上与疾病抗争。多亏区里做饭的老炊事员,每天坚持给我熬点米汤。我不能喝,他就一勺一勺地喂。在那些日子里,我经常想念父母。可是离家太远,没法通知他们来见一面。好在终于挺过来了。记得能坐起来吃饭时,老炊事员高兴地说:“你小伙子命大着呢,阎王爷叫不去你!”他看我能吃东西了,也不知从哪里弄来几个小梨让我吃。他真是个好心人。让我愧疚的是,我没能记住他的名字。

9月初,我又调到陂安南县军事指挥部任少共团委书记,并第一次见到了李先念。

那是刚到指挥部没几天,在一次研究县军事指挥部工作的会议上。李先念20多岁,显得精明强干。他认真看了我一眼,说:“你是新来的吧,面孔生疏嘛!”接着问我是哪里人,都干过什么工作,然后笑了:“呵,还是我们黄安老乡呢,现在要一起干好陂安南的工作呀!”他的亲切随和让我感到温暖。

不久,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整个中国沸腾起来。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作出决议,号召苏区人民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努力扩大红军和支援红军作战。在县召开的群众大会上,李先念讲了话,号召全县军民立即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响应中央分局的决议。他的讲话很有鼓动性。会后举行游行示威。我在指挥部共青团大会上,也作了动员。我

说：日本人欺负到我们家里来了，蒋介石不去打日本鬼子，却忙着“围剿”红军，忙着打中国人，这是卖国主义！大家情绪激昂。

这时，鄂豫皖苏区已经粉碎了国民党军的两次大规模“围剿”，正进行第三次反“围剿”的准备。为了号召更多的人参加红军，作为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李先念带头报了名。他的行动很有感召力，全县有 800 多名青年纷纷报名参加红军。我也想报名，但新来的县委书记郭述申不同意，因为县军事指挥部少共团委书记李庆谱也报名参军了。郭述申对我说：“你得留下来，接替李庆谱的工作。”当即宣布我担任县军事指挥部少共团委书记。就这样，虽然没去主力红军，我却算是第二次入伍当兵了。其实，那时武装斗争很难分地方和军队，许多干部都是调来调去，在地方和军队中互相兼职。不久我又兼代了少共县委书记。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与先念同志一起工作只有短短的这段时间，不久就天各一方，直到建国后才再次见面。在我担任中央军委领导工作后，先念同志曾多次和我谈话，嘱咐我忠于事业，把军队建设好。先念同志为中国革命做出过伟大贡献，是我革命路上的一位好老师、好兄长。

1931 年 11 月 7 日，红四方面军在黄安七里坪宣告成立。红四方面军下辖第四军和第二十五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红四方面军的成立，是鄂豫皖苏区红军进一步发展壮大的标志，也是党领导鄂豫皖苏区人民进行四年革命战争的胜利成果。当时，由于民族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发生严重危机，鄂豫皖苏区周围的敌军也因此处子守势。而江西中央苏区和湘鄂西、湘鄂赣等苏区红军却不断取得胜利。这种形势下，总指挥徐向前决定集

中优势兵力,夺取黄安县城。

黄安战役发起不久,我第一次见到了张国焘。当时,他是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鄂豫皖军委主席。陈昌浩和他一起来到了庙嘴湾。这里是陂安南县县委机关驻地,张国焘和县委书记郭述申并肩往县委机关走,边走边交谈。我随在他们身后,只听到张国焘大声说:“红军包围了黄安县城,要攻克它!”

县委机关和县军事指挥部在一个大院,进进出出的人很多。陈昌浩突然来到军事指挥部,见到我,劈头就问:“干什么的?”我回答:“团委书记。”“会不会写字?”“会。”他从包里拿出一叠纸说:“这是一份文件和几份传单,你想办法刻印一下。文件给我,传单留下来向群众散发。”陈昌浩走后,我仔细看了一下,那份文件是油印的《连政治指导员工作守则》(建国后,听总政副主任傅钟说,这个《守则》是他编写的)。我是第一次看到“指导员”这个词,印象很深。那几份传单的内容,是动员群众支前、夺取黄安战役胜利和对白军的宣传口号。当时,我还不会刻钢板,也不会搞油印,就拿到县委机关去找人办了这件事情。

黄安是敌人整师兵力设防的坚固据点。12月下旬,经过43天的战斗,黄安被攻克了。这是红四方面军成立后的第一次重大胜利。黄安、麻城、黄陂、孝感等县革命区域连成了一片,苏区中心区域更加巩固并向南发展。这次战役中,红军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巨大支援。男子运粮草、送弹药、抬担架;妇女为红军烧水煮饭,救护伤员;赤卫军则直接参加战斗。整个黄安地区,为了前线的胜利,男女老少一齐动员起来。我还记得那时流行的一首歌谣:

小小黄安,人人好汉;

铜锣一响，四十八万；

男将打仗，女将送饭。

为了纪念黄安战役的胜利，表彰黄安人民的革命斗争精神，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决定将“黄安县”改名为“红安县”，并决定撤销陂安南县，设置陂南县、河口县，成立红安中心县。红安中心县下辖红安、黄冈县、陂南县。陂孝北县和河口县归省委直管。徐宝珊任红安中心县委书记，闵丹桂任中心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与此同时，还成立了红安独立第一师，由原黄安和陂安南两县独立团合编，师长曾中生。红安县新成立军区指挥部，指挥长是康永生（原红十师政委）。

我调任红安县军区指挥部少共团委书记，党委书记是桂永松。军区指挥部下设司令部、政治部、经理处。不过，由于仓促组建，虽然下属机关有单位和人员编制，但暂时还没调来人，只有我和党委书记两个“光杆司令”。我们的办公地点是和当时的红安、陂南两县县委机关一起，合住在红安城一个很大的四合院里。这里曾是旧县府的科举考场。我们住进来后，开始热闹起来。

1998年4月，我回老区看望，又一次来到这里。60多年过去，红安城面貌全非，新建了许多房屋，当年我们住的地方只有残留的几间旧房子，还能依稀辨认。站在房前，有种时光倒流的感觉，当年热闹的县委机关，人来人往的红火场面，仿佛又回到眼前。再一看，又没有了。

“肃反”与“围剿”

1932年4月的一天，我莫名其妙地成了反革命，被抓起来了。

4月初,我刻印了一批《广大青年团员行动起来配合主力红军作战》的通知,忙着下发。因当时正患疥疮,我找别人去发通知,自己到黄家楼医院看病。两天后,突然来了两个县保卫局的人,二话不说,扭着我胳膊就走。我问为什么抓我,他们不说。到了县保卫局,我大声质问:“为什么抓我?”他们说:“你是反革命、改组派!”根本不容我争辩,就把我关进了禁闭室。那时叫“局子”。

当时,鄂豫皖苏区的斗争形势发展很快。红四方面军取得黄安战役胜利后,接着取得了商(城)潢(川)战役的胜利。3月下旬,又发起了苏家埠战役,对敌斗争形势很好。可是张国焘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贯彻错误的“肃反”政策,混淆了敌我矛盾和是非界限,并且利用大家对叛徒内奸的仇恨心理,大规模搞“肃反”运动,革命队伍内人心惶惶。

我被关进局子后,见满屋子都是人。光线暗,开始看不清是谁,过了一会儿,慢慢看清了。地上铺满稻草,屋里人有坐的,有躺的;有不认识的,也有认识的,甚至还有比较熟悉的。没人讲话,只是彼此看看。我发现有个头发很长的人认真盯我一眼,往一边挪挪身子,腾出块地方,我就走了过去。刚坐下,我惊住了,这个头发乱蓬蓬的人竟然是我的人党介绍人潘思约!刚想询问,潘思约突然眼睛一亮,似乎暗示我不要出声,然后,他的眼睛又回到呆滞状态。我只好赶紧闭嘴,心里难过极了,想哭,又不敢。

4月天气,晚上很冷,可是谁都没有被盖,就躺在稻草上互相挤着取暖。我在局子里整整关了三天,没有人和我说话,也没有提审我。可是,屋子里的人,每天都有被提审的,有的回来了,有的没回来。大家都清楚,没回来的,肯定凶多吉少。

第四天,抓我的那两个保卫局的人来了,叫我跟他们走。

我那时不满 16 岁,从没见过这阵势,很害怕。又想,我革命几年了,是干部,是党员,应该表现得坚强才对。不过,我现在面对的,不是国民党反动派,而是战友,是同志,我不知道该怎么表现坚强。心里乱得很,只好默默地跟他们走。

审讯室里,意外地见到了坐在主审席上的徐宝珊。我在县军区指挥部时,经常给他送文件。我年龄小,人也长得精神,又有点儿文化,在机关里很有人缘,徐宝珊也很喜欢我。徐宝珊似乎也吃惊,问:“你也是反革命?”我说:“不是!”他对保卫局的人说:“这个人先别审了,送回去吧。”就这样,我算是完完整整又回到局子里。

提心吊胆又熬了几天,徐宝珊让人把我叫去,说:“你还年轻,不懂事,不是反革命。”然后话题一转,“你就留在县委工作吧,当秘书科长,把县委机关的日常工作管起来。”随即吩咐保卫局的人:“把他放了吧。”

我不是反革命了。没有被杀头,也没有遭受严刑拷打,我暗暗庆幸,长吁了口气。

没几天,程坦也放了出来,据说也是徐宝珊让放的。程坦是永河区委书记,放出来后,也到县委秘书科工作。过去,我和他在塔耳区一起工作过,他当时是党的区委书记,我是少共区委书记,处得不错。这次大难不死,两人重新见面,我既高兴又难受。我有许多话想和他谈谈,但是不敢,怕别人说是搞反革命活动。程坦的心情大概也和我差不多。不久,他调到光山县给县委书记高敬亭当秘书去了。

县委机关里最忙的就是秘书科和油印科。秘书科主要是传达上级精神,发通知、指示和各种布告、宣传品。这些东西都要手写,或刻印出来,靠人去送,油印科也就格外忙。我刚去的时候,两个科配合还行,但很快就出了问题:油印科没人

干了。油印科的人,有的被当成反革命抓了,没抓的,害怕了,逃跑了。油印科的事情也只好由秘书科干。

油印最关键的是刻钢板,刻不好就印不出来,或者印不了几张蜡纸就坏。当时,我起草通知文稿、编写传单之类的事情,笔头来得还算快,但刻钢板就不行了。由于没人刻,我不会干也得干。开始刻得很慢,渐渐熟练了,刻得又快又好。后来,县里下发要我起草的材料时,我就干脆直接在钢板上刻写。为了便于领导,县领导又让我兼任了油印科科长。刻钢板、搞油印的这点本事,就是从那时练出来的,后来,在长征中也发挥了不小作用。

这段时间,“肃反”仍然没停,有时达到骇人听闻的地步。大批忠于革命的干部和优秀的领导同志,一个个被加上“改组派”、“AB团”、“第三党”、“取消派”等等罪名,惨遭杀害。“肃反”运动大大削弱了党和红军的战斗力,损害了党的威信,也严重挫伤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回想起来,只能说,这是一种恐怖而愚蠢的自杀行为。

1932年5月22日,国民党政府宣布,由蒋介石亲自出马,担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6月12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会议,确定了第四次“围剿”的整个战略步骤,重点是“围剿”鄂豫皖苏区。他们集中了24个师零六个旅,共30多万人的兵力,采取“纵深配备,并列推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的方针。

遗憾的是,张国焘没有认识到全局形势的严重性。

事情的另一而是,如果仅从鄂豫皖苏区局部情况看,形势确实不错。从1931年11月到1932年6月中旬,红四方面军接连取得了黄安、商潢、潢光、苏家埠等四次战役的重大胜利,不仅使敌人的第三次“围剿”计划破产,而且促进了苏区武装

力量的壮大。方面军主力发展到两个军六个师(准备成立第九军,尚未组成),还组建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独立师和一个少共国际团,主力兵力达到4.5万余人。各县的独立团、游击队也有很大发展,赤卫军等群众武装发展到20万人以上。苏区向外猛烈扩大,面积达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达350万,建立了26个县的革命政权。这是鄂豫皖苏区的鼎盛时期。也许正因为如此,张国焘对这次空前规模的“围剿”,不仅毫无戒备,麻痹轻敌,相反却认为“目前已根本消灭‘围剿’”,甚至提出,现在不是动员反“围剿”,而是继续向敌人进攻。

7月上旬,国民党军队向鄂豫皖苏区发起了大举进攻,在重兵压境的严峻形势面前,张国焘拒绝了徐向前等人的建议,命令红军主力迎击敌人主力,“御敌于国门之外”。这一决策,使红军在反“围剿”作战中陷入了被动。

对于当时的严重局面,我们县委机关的人员并不清楚。8月上旬的一天傍晚,在红安县街上听老百姓讲,敌人已进了河口镇,我还以为是谣言。到了晚上,红十二师就由城东门进来,向西跑去,说是去阻击敌人。到8月11日下午,接上了火,一直到傍晚枪炮声都很激烈。前方在打仗,我们县委机关没接到参战或撤退的通知。独立师、独立团早就参战了,机关没有任何武装力量,敌人来了一点办法都没有。我当时很着急,但也不能擅自发通知,怕被人说是造谣,又被当成反革命。我只好通知自己直接管的单位,让他们准备好,随时准备撤退。后来来了红十二师的一个参谋人员,在街上高叫:“城内的党政机关人员、群众,都向城北方向撤退。”县领导人都没露面,党政机关撤退时,没人组织指挥,一片混乱,十分狼狈。

第二天早上,路上全是北撤的人群。机关人员和群众混在一起,拥挤不堪。我们一路撤到潭涣河,后又转到长冲村。

我把秘书科、油印科、管理科的人员和炊事员集中起来,清点了一下,还好,所有文件资料都带出来了,特别是油印机没丢,还带出了部分纸张。

后来才知道,这次仓促撤离,主要是张国焘在战略指导上的错误:首先,6月中旬潢(川)光(山)战役结束后,张国焘没有及时让部队转入反“围剿”准备,反而继续向京汉路出击;其次,当敌人“围剿”部署完成,中央也通知敌人的大举进攻即将开始时,张国焘还不肯收缩兵力,竟两次命令红军主力围攻麻城;第三,当敌人逼近苏区中心,张国焘又不愿实行诱敌深入、待机破敌的方针,反而命令红军仓促应战。这样一来,不仅使苏区军民丧失了反“围剿”的准备时间,而且大大疲惫和消耗了红军战斗力,使整个反“围剿”作战一开始就处在极被动的局面。

战役指导上也一再失误。张国焘主张不停顿的进攻:一战冯寿二不成,再战七里坪又不成,三战光山的扶山寨、团山寨还是不成。初战时机选择不当,又没有采取避强击弱原则,形不成优势兵力和采取迂回包围战术,形成与敌对峙局面,表面上似乎在力争主动,实际十分被动。

敌军压境,前堵后追,局而严峻。张国焘一改狂妄自大,变得惊慌失措了,竟认为“今天打出一个厉害的敌人来了!”“红军只可打一仗,没有打第二仗的力气!”结果是红四方面军一撤再撤。9月9日,鄂豫皖苏区首府新集失陷;9月14日,豫东南重镇商城被敌占领。敌人步步进逼,红四方面军继续向西转移,直至撤离鄂豫皖苏区。

应该说,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苏区的斗争,造成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使这一苏区成为当时全国六大苏区之一,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我那时年轻,不懂军事,政

治上也懂得不多,但是,毕竟是在下层、中层工作过四年多的干部了,对许多事情也有一定认识和看法。凭自己的感觉,认为有许多事情不对:党的领导较差;极端缺乏思想政治工作;干部工作更是有许多错误,特别是反复搞“肃反”运动,搞得干部人人惶恐。具体道理我也讲不出,只是总感到闷闷的,很不舒畅。今天回想起来,当时要粉碎敌人“围剿”虽有不少困难,但如果中央分局领导人尤其是张国焘不犯那些根本性的错误,而是扎扎实实的准备反“围剿”,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是有希望的。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越过平汉铁路,向西撤走。鄂豫皖苏区大部分丧失,原有的县城全部失守,重要的中心城镇全部沦陷。留下的部分红军,不仅数量很少,而且很分散,地方武装也所剩无几,革命遭到了巨大损失。

第四次反“围剿”彻底失败了,革命斗争进入艰苦时期。

第一次负伤

1932年8月12日清晨,我和红安县党政军机关一起,带着群众仓促撤离县城。

撤离是现在词儿,那时叫“跑反”。由于走得仓促,缺乏组织,路上车辆人马互相拥挤,乱糟糟的。身后的敌兵追得不算紧,可头上经常有敌机出现,有时侦察一圈就飞走了,有时则扔下几颗炸弹,搞得人们很慌乱。我来回看了一下,发现“跑反”人群里,除我带的一批人员外,县委机关没见什么人。县委书记徐宝珊是随省委机关和中央分局一起转移的,早走了;县委委员没见一个,县政府机关也只见到县长和一个秘书。大家就这么慌慌张张往山里跑。目的地倒是很明确,就是翻

过鼓风岭,越过潭涣河,向县东北山区一带转移。

快到潭涣河时,又来了几架敌机,其中两架俯冲下来,肚皮皮下掉出小黑点。我赶忙叫大家分散隐蔽。炸弹响了,离我不远。我还没来得及趴下,就觉得右小腿被东西划了一下。当时也不痛,等敌机飞走我才发现,腿上被弹片划了很深一道口子,鲜血顺着小腿往下流。好在没伤着骨头,我没当回事,随着队伍,一瘸一拐转移到了长冲村。没想到的是,本来不重的伤,因为没有及时消毒包扎,也没药物治疗,结果伤口感染溃烂,很长时间不能痊愈。

我们在长冲村安顿下来。敌人主力尾追红四方面军去了,余部占据主要城镇后,并没向乡村“搜剿”,在近一个月里,形势暂时平静。这是一个难得的喘息之机,应该及时恢复组织,领导群众展开斗争。可是很遗憾,省委、县委却没见一个人,区乡的党政领导也不知哪里去了。我们感到群龙无首,常一起议论:为什么分局和省委领导不做反“围剿”准备?为什么不向大家介绍真实情况,反而天天传红军打胜仗的消息?由于情况不明,这种议论使人们思想更不稳。秘书科只剩了我一个。清点人数,几名负责保护油印机的搬运工还在,还有管理科的一名管理员和两名炊事员,加上我,这就是当时红安县党政机关的全部人马。

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不知道。这时听到传闻,说要设立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成立中共鄂东北道委。总司令兼道委书记的人选,开始说是吴焕先,不久又说是徐宝珊,后来换成了郑位三。没多久,郑位三果然来了。郑位三是黄安七里坪人,对本地情况熟悉,是黄麻起义的领导人之一,群众威信很高。他没带部队,只身一人和两个警卫员。他到处找红安县委机关的人员,找不到,只找到了我带的这几个人。

他就决定把我们收编为道委和游击总司令部下属机构的人员。郑位三对我说：“你当过秘书科长，这次你就作道委和游击总司令部的秘书科长，协助我作具体工作。你带的人仍由你管，其他的干部和人员我再找。”我很高兴，说：“服从领导，叫我干什么工作都行。”

郑位三临危受命。当时红四方面军主力已经撤离苏区，蒋介石除以部分兵力追击红军主力外，仍以 15 个师零两个旅的兵力加上民团、保安队等约 20 万人，继续对鄂豫皖苏区实行“清剿”。他们提出“民尽匪尽”的方针，对苏区实行“铲除干净，绝尽根苗”和“烧光、抢光、杀光”的政策，手段非常残酷。敌军所至，火光烛天，庐舍成墟，田园荒芜，许多地方成了无人区。一些地主豪绅纷纷随军还乡，实行反攻倒算，逼迫群众插白旗“反水”，苏区各地的党政组织、游击队、赤卫军等受到了严重破坏，群众的思想情绪也波动很大。面对严峻局面，我们没有退缩，在郑位三领导下，立即行动起来了。

郑位三交给我的第一件事，就是以道委和游击总司令部的名义，向各县、区的党和苏维埃组织发出指示信，要求他们立即组织群众开展反“清剿”斗争。这封信是郑位三亲自起草，我刻的钢板。我还根据郑位三的指示，写了一些宣传材料和标语、传单，组织人散发张贴。没过几天，又陆续找到一些人。其中有一个叫朱赫，广东人，懂军事。郑位三就让他担任司令部参谋主任。司令部还有个叫石健民的，当时因为保密，我并不知道他干什么的。后来才知道，他是中央分局、省委与中共中央之间的交通员。随着工作进展，总司令部直属部队也有了发展，先后成立了交通队、警卫营。交通队有一个队长，我兼任政治指导员。警卫营是游击总司令部的直属战斗部队，主要掩护道委和游击总司令部的活动。营长是从四川

军阀部队俘虏过来的，名字记不得了。他军人素质好，懂军事，很负责任。道委当时还有哪些委员，郑位三没讲，我也没再看见其他人。当时的道委实际是个空架子。过了大半年，有个叫胡明正的人来了，当宣传部长，是道委委员。据说他曾在莫斯科留学，是红四方面军原后方总医院政委。

一天，郑位三召集朱赫、石健民和我开会研究工作。郑位三让大家提意见和建议。我先发的言。“跑反”时我就想过一些问题，乘这个机会，我提出了三点想法：第一，应该召集各县党政干部开个会，说明当前斗争形势，布置任务，抓好县、区两级党团组织建设，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巩固和扩大现有的局面。第二，抓紧把各县、区的独立师、独立团和游击队建立起来，整顿好，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积极打击敌人。至于第三点想法，我是鼓起勇气提出的：应该给“肃反”中错抓后放出来的干部分配工作，大胆使用；一些“肃反”被抓的干部，遭杀害时，还高喊“共产党万岁”，在反“围剿”最残酷、敌情最严重时期，很少有人叛变投敌，他们带着群众和老婆子女跟着红军“跑反”，对这样的干部和党团员，组织上应该信任。

大家都赞成我的想法。郑位三也同意。他说，现在主要是抓军事斗争，抓武装群众，扩大游击战争；同时应赶紧抓好各县、区的党政机构整顿，恢复各方面的工作。至于对涉及“肃反”等方面的政策问题，由他考虑提出。第二天，郑位三、朱赫和我，采取分头传达的办法，分别到各县、区做工作。

鄂东北地区的游击武装很快组织起来了。先后合编和扩编为七个独立师和游击师，即以红安独立团为基础，扩编组建了独立第七师；以罗山独立团及光山西部地区的游击队合编为独立第六师；以麻城独立团为基础，扩编为第一路游击师；以陂孝北独立团为基础，扩编为第二路游击师；以陂安南（包

括黄冈部分地区)游击武装为基础,组建为第四路游击师;以河口独立团为基础,扩编为第八路游击师;以光山独立团为基础,扩编为第九路游击师。这些独立师或游击师兵力不等,有的千余人,有的几百人,合起来有7000人左右。这样,各县基本都有了武装骨干力量,同时,各区、乡、村也都建立起游击队或游击小组。

我们司令部几个人很忙。光经我手起草、刻印的文件、通知就有十几份。我们还要负责收集各种情况,分析敌情,发出通报,并根据敌情变化,及时组织游击总司令部直属机关转移。还要向郑位三提出司令部的工作建议。后来,参谋主任朱赫不见了,听说是被当反革命抓起来杀了,就由石健民来接任。但是,石健民还担负着省委与中央之间的交通工作,经常不在,这样,司令部工作就落到了我肩上。

这段时间郑位三主要是分别找各县、区的领导干部个别谈话,讲解当前斗争形势和斗争策略。有关“肃反”问题,看来他认真考虑了我的意见,谈话中,也强调不能打倒一切,要承认群众“反水”、倒向敌人是被反动派、还乡团镇压威胁的结果;要采取团结、教育的办法,争取广大群众支持,不能乱打乱杀。我是秘书科长,每次谈话都让我参加。有时,我也插上三言两语。

在道委和各县、区的努力工作下,鄂东北地区的局面很快打开了。这时,省委书记沈泽民、省委宣传部长成仿吾也来到鄂东北,随道委活动了。当时的省委,也就是沈泽民和成仿吾两个人,还有一个徐宝珊,一直随红二十五军行动。这一阶段,敌人没有向鄂东北地区进行大的“围剿”,省委利用这个机会,总结了前一时期鄂豫皖苏区的斗争情况,向中央写了报告。此外,还抓紧时间恢复各地区的工作,开展宣传教育,拟

定了许多文件、宣传品,准备刻印下发。

刻印的事自然交给我办。可是,我被敌机炸伤的小腿化脓了,老好不了,严重到不能走路,就住进医院。那天我刚换了药,痛得厉害,突然道委派来一副担架,把我抬走了。回到道委,郑位三当面交代,让我赶紧刻印省委文件。没有二话,我带病开始工作。

鄂东北地区工作的开展,特别是广泛开展游击战争,袭击小股敌人、夜摸敌人据点、伏击敌人军用物资、破坏公路、炸毁桥梁等,有效地牵制了敌人兵力,掩护了主力红军转移,为后来红二十五军坚持苏区斗争奠定了基础。

这时红四方面军还有七个主力团留在鄂豫皖苏区,主要是新建的红九军第二十七师和红二十五军的一个师(该师只有两个团),共计六七千人,分布在鄂东、皖西。鄂东北、皖西北各县的地方游击武装合起来也有近万人。还有大批红军伤病员。全部加起来,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及红军伤病员总共约有两万人。这些武装由于分散各地,缺乏统一领导,不能有力打击敌人。这种形势,很需要重新组建主力红军,以便统一领导和集中指挥。

1932年11月29日,鄂豫皖省委在黄安檀树岗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将苏区各红军主力团统一组织起来,重新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11月30日,红二十五军正式组成:军长吴焕先,政治委员王平章;下辖第七十四师、七十五师;军直属机关有司令部、政治部、经理处,军部直属特务营、警通连等,全军约7000人。红二十五军的重建,结束了鄂豫皖苏区武装力量分散和混乱的局面。

重建红二十五军过程中,鄂东北道委和游击总司令部作了大量工作。我们都深感重建主力红军的必要,配合得非常

自觉主动,要人给人,要枪给枪,调哪个地方的游击部队就给哪个,本地区就是有天大困难,也自己承担。道委和游击总司令部机关还组织人员分头到各县、区去做工作,贯彻这一精神。鄂东北地区数以千计的地方武装补入红二十五军。

红二十五军组建后,连续取得郭家河、潘家河、杨泗寨等战斗的重大胜利。主力红军作战时,鄂东北游击武装积极配合。郭家河战斗中,光山独立团和罗山警卫营等地方武装都参加了战斗,上千名群众在山头上呐喊助威,许多溃散之敌被地方武装和手持锄头、扁担的群众俘获。潘家河战斗时,罗山独立第六师为了牵制鸡公寨敌人,积极发动猛攻,造成对方错觉,配合主力取得战斗的胜利。其他各独立师、游击师等地方武装,有的深入敌占区,截敌军火、给养;有的对敌人驻地进行骚扰、袭击,迫使敌人缩短防线,加强守备。我们游击武装的这些行动,不仅牵制了敌人,配合了主力红军的作战,而且扩大了活动区域,自身得到了发展。道委和各县、区组织还抓紧苏区建设,整顿各级党的组织和队伍,恢复苏维埃政权,开展苏区边缘区的工作,注重做白区群众的工作。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鄂东北苏区连成了一片。到1933年4月底,鄂豫皖苏区对敌斗争形势出现了可喜的新局面。

可惜的是,“左”倾冒险主义又露头了,不仅断送了这一局面,还使苏区陷入新的劫难。

当时,鄂豫皖省委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战略的影响,机械地执行中共中央指示,极错误地估计形势。他们要求红二十五军展开积极反攻,“肃清敌人一切地方的和常备的军队”,“夺取七里坪、河口、红安等中心城镇”。这一要求,无视敌强我弱的基本事实,完全是瞎指挥。

斗争的基本情况是,进犯鄂豫皖苏区的敌人总兵力为15

个师又四个旅,加上民团等反动武装,超过红军 20 倍,且装备优良,供应充足。红军则装备很差,苏区的人力、物力已经枯竭,根本不具备强攻敌人重镇的条件。

省委主要领导人沈泽民无视这一情况,要求红二十五军围攻七里坪。对这一决定,红军主要领导人反对,鄂东北道委和游击总司令部许多人也不赞成。沈泽民不听大家意见,命令红军发起七里坪战役。

七里坪位于红安县城以北 20 公里处,是鄂东北地区重镇。其南面大小雾仙山(又称大小雾嘴山)是突出的制高点,西面有倒水河为自然屏障。敌第十三师三个团 6000 多人驻守这里,工事坚固。七里坪西南面的红安、河口、华家河三个城镇分别驻着敌第十三师的另外三个团和第八十九师的四个团,可随时增援。1933 年 5 月 2 日,红军开始行动。由于兵力不足,只从三面包围了七里坪,敌人仍可以从西南面调动部队、补给军需,来去自由。红军进行了多次攻击,都没成功,打成了消耗仗。红军不得不派部队到红安南部筹粮。

鄂东北地区的群众已经家贫如洗,比敌人“扫荡”时还惨。尤其又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群众哪还有多余的粮食。尽管如此,道委顾全大局,还是动员群众,宁可自己吃野草,也拿出仅有的粮食,一碗一升地送给红军。

道委和游击总司令部的人也在饿肚皮。我带特务营一个连到桃花、永河地区打粮,看到老百姓日子过得那么惨,心里很难过。我无法理解,这种现状谁都看得到,省委领导怎么就能视而不见呢?知道了为什么还这么干?想归想,粮食还得打,搞到一点,我就让大家先饱吃一顿,然后尽可能多带一点回来。道委机关有时能熬一点稀饭汤勉强度日。

饥饿在困扰红军,疾病也趁火打劫,红军部队战斗减员日

增,战斗力大大削弱。省委主要领导人这才明白,拿下七里坪没希望了。6月13日,经过43天战斗的红军,不得不撤围七里坪。红二十五军主力被迫转移到光麻商边界地区,边筹粮边休整。敌人立即调动兵力尾追堵截。红二十五军接连又打了几个消耗仗,全军减员过半,剩下5000多人,只好缩编。鄂豫皖边区的形势变得十分严峻。没想到,更大的灾难还在后头。

七里坪战役失败后,省委主要领导不但不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反而主张继续搞“肃反”。

围攻七里坪时,红军干部中有过不同意见的议论,这时都被说成是“反革命言论”,是在部队困难时“反革命又猖獗起来了”。风云突变,革命队伍内刮起了一阵邪风,部队和地方干部被逮捕了許多人。红军中,大批中、高级领导被撤职,有些甚至被处决,并解散了几个师的党团组织。

红军没有被敌人消灭,反而被自己所摧残,让人欲哭无泪!

在游击总司令部,我和许多人对红军的“肃反”提出了不同意见。道理朴素也很简单,如果红军中真有那么多种反革命,我们的游击总司令部、省委、红二十五军早就被消灭了。这些话是犯忌的。好在郑位三和鄂东北道委头脑清醒,也反对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肃反”,没让我们因此受罪。事情的另一面是,也许正因为了解郑位三和道委的求实作风,才敢于说那些意见。不过,这种实话实说的性子,我一直改不掉,以致此后数十年的工作中,常因此而受冷遇。

1933年7月中旬,敌人向鄂豫皖苏区发起了第五次“围剿”。敌人调动了14个师又四个独立旅的兵力,共十余万人,以鄂东北苏区为重点,在四周部署了八个师又四个旅。鄂豫

皖省委又一次错误估计形势,认为敌人只是为了破坏苏区秋收。提出,“保障秋收是鄂豫皖党和苏维埃与红军唯一的任务”。命令红二十五军采取内线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抗击敌人的一切进攻”。结果,导致鄂东北、皖西北中心区保卫战的接连失败,红军只剩3000多人。10月2日,红二十五军由皖西北转向鄂东北,在过潢(川)麻(城)公路时,又遭敌人截击。省委书记沈泽民和军长吴焕先等率2000余人过路西去,进入红安县紫云寨地区;副军长徐海东及后续部队近千人被敌阻截,只好返回皖西北地区。自此,红二十五军一分为二,被分割于鄂东北、皖西北两个地区。

道委和游击总司令部主要活动在紫云寨地区,与敌周旋。10月7日上午,我正要去检查交通队的布哨情况,哨兵跑来报告,说省委和红二十五军过来了。我赶紧报告郑位三同志,随他一起迎接沈泽民、徐宝珊、吴焕先、戴季英等领导人。他们四人疲惫不堪,情绪不高。沈泽民已经重病缠身,不能正常工作了。他是浙江人,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与张国焘一起来到鄂豫皖苏区。他是1921年入党的老党员,可是,由于他坚持围攻七里坪,主张残酷的“肃反”,给红军造成了巨大损失。

敌人见红二十五军主力被分割为两部,便集中兵力向鄂东北发动进攻。当我们得到消息时,敌人已近在咫尺。为掩护省委和道委机关突围转移,红军和游击总司令部的武装与敌人展开了激战,直到省委、道委安全转移后才撤退,部队伤亡惨重。

红二十五军剩下的部队由吴焕先军长率领,向天台山转移。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所属也大多被打散了。战前曾临时宣布,如果被打散,可到天台山地区集合。突围中,我带的人

也跑散了,只剩我一个人,只好奔向天台山。至此,鄂东北苏区各县党政组织全被摧垮,县委、区委的干部只有十来人,各地党员总共也只有200余人。大批群众惨遭敌人屠杀。紫云区原有万余人的三个乡,只剩下老少百余人。

敌人实行“三光”政策,连续数日,山上火光冲天。我们整天东躲西藏。红二十五军只有一团人,每天作战;白天打散了,晚间集合起来,第二天再打。一连十多天,天天如此。已经到了生死存亡关头。

惨重的失败,终于使鄂豫皖省委猛醒。11月10日,省委书记沈泽民代表省委向中央写报告,承认当前的困难局面,“完全是过去错误所造成的”,是“党的路线一贯脱离群众所造成的”,省委决心改正过去的错误,“洗心革面,重新做起”。提出了以游击战争为主和密切联系群众的新的斗争方针。沈泽民把报告写好后即病逝了,遗职由徐宝珊代理。

我从紫云区突围出来后,几经周折,终于在天台山地区找到了道委和游击总司令部的部分人员。郑位三这时仍是道委书记,他把我留下了。我们辗转于天台山、老君山、仰天窝一带打游击,度过了一段永远难忘的艰难日子。

游 击 岁 月

在我的革命生涯中,这是一段难以忘怀的日子。

天台山、老君山位于红安北部,在大别山西端,是最早创建的苏区中心区之一。这里山深林密,人口稀少,加上敌人多次“清剿”,实际已成无人区。敌人大部队“清剿”,也只是一扫而过,无法长驻;敌人小部队则不敢轻易进入。所以“清剿”、“扫荡”后,我们照样能控制这里。省委部分人员和部队医院

等都分散在这个地区。我们也活动在这一带。

这里当然也不便于红军部队集中行动,吃住都很困难,特别是吃的问题。道委、红二十五军领导决定分兵活动。红二十五军还剩一个团兵力,由吴焕先率领,在本地区外围活动,省委书记徐宝珊随其行动;鄂东北道委和游击总司令部,则活动在本地区,不向边缘区扩大,重点是掌握罗山西路军的几百人,并设法联系其他地区武装。

道委和游击总司令部实际只有郑位三和我,再加上少数警卫人员,后又来了程坦。这是一段异常艰苦的岁月,斗争环境十分恶劣。敌人常来搜山“清剿”,我们随时都有被一网打尽的危险。敌人找不见人,便放火烧山。时已进入冬季,不时有雪花飘落,山上很冷,而我们所有人都还穿着破烂的单衣。白天躲避敌人,夜晚则要抵御寒冷。晚上大家在山坡上紧紧挤在一起,互相用体温取暖。敌情如果缓和一点,能找个山洞,再燃起一堆篝火,躺在火堆周围睡个觉,就是奢侈享受。一人只有一身衣服,长期穿在身上,长满虱子。

饥饿更可怕。粮食奇缺,冬天山上有时连野菜都找不到,只好剥树皮、挖葛藤根充饥。要保持体力,不能天天吃生冷东西,可白天不敢烧火,只有等到晚上敌人回去了,我们才能生火煮东西。没有锅,就用小茶缸子煮;缸子也少,要煮好多次,才能每人都吃到一小缸子热乎点的东西。

自然条件艰苦,我们还可以发挥主动性来克服。可是,敌人经常出其不意的“清剿”、“扫荡”,却让我们无法预料。我们没有一个固定住地,三天两头就要转移;有时一天多次,在几个山头之间来回捉迷藏。12月间,敌人组织大“清剿”,有几次紧紧尾追着我们。好在我们地形熟,藏进悬崖绝壁或山洞里,才逃过了劫难。在山洞里,我们能看见附近敌人的活动,

听到他们说话和叫喊声。我们清楚,这些山洞既是避难所,也可能是我们的坟墓,只要洞口被发现,肯定无法跑掉。在洞里,我们都把枪口对准外面,一旦被发现,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粮食越来越成问题。我找程坦商量,得到远处打点粮回来,否则,再这么挺下去,都会饿死。程坦同意我的意见。我们就把附近分散活动的警卫人员集中起来,作了分工,有警戒的,有外出打粮的。尽管打的粮食不多,但毕竟能吃到点饭了。

一天,红安仙居区区委书记罗厚福来了,还带着老婆和另外三个人,向郑位三汇报了他们那里的情况。他们的主要问题也是缺粮。郑位三听后,让我去五区帮助罗厚福他们开展工作,边弄粮边了解敌情。我在随罗厚福的活动中,联络上了罗山西路军,又在光山南区、七里坪等地找到了一些失散的党的干部,建立了联系。

又一次,遇到了黄冈的一位区委书记,他要找郑位三汇报情况,我就把他带到老君山的卡房。见到我们的生活状况,他很吃惊。知道我们很久没有吃到食盐了,郑位三的身体也不好。这位书记很认真,当他再次到道委汇报工作时,带来一只鸭子,还有一些食盐。我们真高兴,在当时,这是比金子还珍贵的东西。遗憾的是这位书记的名字我忘了。我在五区活动的时候,到了边界许多地方,联系了不少人,为后来恢复工作打下了有力的基础。

物质条件的艰苦,让我们遭了不少罪,精神上的苦痛,则更折磨人。许多同志失去亲人,有的有家难归,有的无家可归。往前看,看不清前景,精神非常苦闷。我家不算远,但不能回去,很想念亲人。参加革命后我回家很少。有时悄悄回

家看一趟,离开的时候,母亲不让我走,父亲也不让走。我说不行,不回去就是逃兵。母亲只好哭。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我就和家里断了音讯。家乡有国民党的“清乡团”,跑掉的地主也回来了,见到我们的人就杀,回去难免一死。现在,整天躲在荒凉的大山里,亲人见不上面,有家不能回,心里很不好受。后来听姐姐讲,这段时间,家里人都猜想我可能死了,母亲天天哭一场。家门前有棵大树,母亲常在树下烧香:儿子没死,就保佑平安;如果人不在了,就算是祭奠。

郑位三是名优秀的革命家,他经常给大家鼓舞斗志。他说:“大别山的革命烈火是扑灭不了的,即使剩下几个人,我们还要继续战斗下去,坚持到最后胜利!”他要求我们都做乐天派,充满豪气地说,“打死了面朝天,打不死革命万万年”。在他的鼓舞教育下,大家的斗争情绪不断高涨。我们铺的盖的都是稻草,同志们就风趣地说:“我们比大地主豪绅还要阔气,盖的是金丝被,睡的是金丝床,胜似活神仙。”我们还唱起了《大别山上红旗飘》的歌谣,现在我还记得几句歌词:

大别山上红旗飘,
穷人革命在山坳,
青石野草当床睡,
密密山林比楼高……

我们经常与红二十五军相遇。在军长吴焕先指挥下,红二十五军一直在天台山、老君山周围开展游击战,部队打散了又集中,集中了又被打散。由于转变了斗争方针,先后取得了大小十几次歼敌的胜利,部队的粮食、弹药和冬衣也得到部分解决,并恢复了以老君山、天台山和东高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省委也从斗争方式的转变中提高了认识,并在1934年1月2日发布了《鄂豫皖省委通告第一一〇号》,对红军和地方

武装开展斗争作了明确指示,要求加强对白区的工作,提出“为恢复和巩固鄂豫皖苏区而斗争”。与此同时,副军长徐海东率领的没能通过潢麻公路的后卫部队,返回后与皖西北道委书记郭述申领导的游击武装合编为红二十八军,坚持了皖西北斗争。

敌人又坐不住了。1934年2月底,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并将东北军从华北调到鄂豫皖地区。

这时我们住在天台山附近的高山岗。根据省委指示,我们乘敌人调整部署之机,抓紧时机,开展恢复苏区的工作。主要干了三件事:一是派人到附近各县,联系各游击队和罗山的西路军。这一过程中,我们联系上了在平汉路活动的特务四大队。他们过去属省委领导,主要负责搜集情报,筹集物资经费,接送来往于中央和鄂豫皖苏区之间的领导干部和交通联络人员。以后,他们便归属我们道委指挥。二是抓了便衣队的建设。头年10月,罗厚福来道委汇报时谈到,仙居区几个乡分别成立了小型游击队,他们以老君山为依托,白天隐蔽,夜晚下山做群众工作。郑位三认为这种斗争形式很好,以后改称便衣队,并在各地区很快发展起来。郑位三开办了便衣队训练班,亲自上课,总结出“游击战争、昼伏夜动、两面政权、统一战线”的斗争策略,使便衣队由原来只是袭扰敌人、捕杀反动分子、串联群众等活动,发展成为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武装工作队。便衣队的工作很有成效,尤其是让群众感到有了靠山,增强了斗争信心。以后,这便成为鄂东北地区群众斗争的主要形式。三是加强了白区工作。主要是争取苏区边缘区和敌占区的保、甲长,使其成为两面派,明里应付敌人“搜剿”,暗中给我们递送情报、筹集物资和掩护伤病员等。这些工作

对当时坚持斗争起了很好的作用。

4月中旬,东北军九个师陆续开抵鄂豫皖地区,加上原来的兵力,共有16个师又四个独立旅,进攻的重点仍是鄂东北地区。

这时,吴焕先率领红二十五军一部转战到皖西北,与徐海东、郭述申领导的红二十八军会合,红二十八军编入红二十五军。为了粉碎敌人新的“围剿”,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将红二十五军调往鄂东北地区。省委还先后两次召开会议,讨论反“围剿”的问题,作出了《鄂豫皖省委关于粉碎五次“围剿”中鄂豫皖苏区党的紧急任务决议案》。省委向鄂东北道委发出指示,提出两项基本任务:一是要求打通陂孝北游击根据地与天台山根据地的联系;二是开展光山罗山边区的工作,把南向店一带地区建立为根据地。

根据省委指示精神,鄂东北道委和游击总司令部,重点抓了四项工作:一是积极开展扩军运动,坚持武装斗争;二是大力发展边界地区与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三是严格执行党的各项政策,团结各方面群众参加反“围剿”斗争,反对侵犯群众利益;四是认真做好对东北军的宣传争取工作。郑位三亲自拟定了一些宣传口号,由我组织刻写、油印,交给部队散发。至今我还记得几条,如:“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的弟兄不要上老蒋的当”、“枪口对外,北上抗日”等等。我们还制订了《哗变士兵招待条例》,对哗变的白军士兵,按不同情况给予奖励。这些工作在东北军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这一段斗争形势逐渐好转,敌人很少“扫荡”、“清剿”,鄂东北中心各区、县的党组织部分恢复起来。红二十五军先转战罗山、黄陂和孝感地区,后转至皖西北,再转回鄂东北,并在信阳地区长岭岗消灭东北军一个师部和两个团的大部。这一

仗,使红二十五军和鄂豫皖苏区的斗争相对地取得了一点主动,有些老区得到恢复,还开辟一些小块的新苏区或游击区,如信阳、罗山边的朱堂店,英山、太湖交界的陶家河等。

回顾这段游击岁月,感触很深。我那时才十六七岁,面对异常艰苦和残酷的环境,没有退缩,坚持斗争,经受了挫折和失败的考验,锻炼了革命意志和斗争精神。这段岁月,在我的人生道路上写下了难忘的一页。

中央来人

1934年8月28日,程子华来了。

当时,卡房地区形势比较稳定,有两个多月敌人没来“扫荡”。鄂东北道委驻地仍在卡房。我收集零散人员成立了游击总司令部警卫连。那天,我正在组织警卫连训练,老远就看见几个游击队员押着两个人。走近后,被押的一个人喊我名字,这才看清,他是省委交通员石健民;旁边那位穿着长衫,我不认识。

石健民拉住我的手,哈哈一笑:“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然后指着游击队员说:“他们干的不错,不然,我还得到处找你们。”明白了真相,几个游击队员都不好意思笑了。穿长衫的人究竟是谁,石健民没作介绍,就让我快点带他们去见郑位三。

我有些纳闷的是,这个穿长衫的人来了以后,只同郑位三谈话,不和其他人交谈,碰了面,也只点个头或者问个好就完了。

很快就知道他叫程子华,是中央派来的,我很高兴。在坚持鄂东北游击战的两年中,我们最大的问题是缺少干部,省委

多次向中央写报告要干部,特别是高级军事干部。后来知道,中央派程子华来,除省委曾向中央写报告要人外,1933年10月份,省委派宣传部长成仿吾去中央汇报工作时,还代表省委直接要求过,希望派军事指挥干部来。

十多天后,郑位三告诉程坦和我,程子华带来了中央精神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的口头指示,要求红二十五军转移。当时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在皖西北活动,没有过来。为了让省委尽快知道中央精神,郑位三给徐宝珊、吴焕先、徐海东写了信。大意是:党中央派人来了,请省委率红二十五军速回鄂东北,商定红二十五军行动的大事。郑位三让陈锦秀负责送信。陈锦秀是红二十五军的一个营政治委员,在鄂东北养伤,已经好了。接到任务,他便带几个交通员,打扮成小商贩,匆匆离去。

程子华在卡房住了近一个月,常同我聊天。他是1934年6月离开中央苏区的,先到上海,与鄂豫皖交通员接上头,才由石健民带进鄂豫皖苏区。程子华很有才干,经常给警卫连上军事课,还教我们唱中央苏区流行的革命歌曲。他把歌词和谱曲写出来,要我到部队教唱。他常向我讲外面的情况,从国民党军阀之间的斗争,到中央苏区的几次反“围剿”。这些我过去闻所未闻,很长见识。

一次,程子华、郑位三向程坦和我两人,谈到了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的问题。程子华问:“过去中央就指示过红二十五军实行转移,你们为什么不走出去?”郑位三说:“中央有过几次指示,要求红二十五军走出去建立新的苏区,省委也有过酝酿,但不敢走远,不愿离开鄂豫皖,因此,只在苏区周围搞了几次,都没成功。慢慢地,省委也认识到在原地区坚持斗争是不行了,但走出去,又没把握。外面的情况一点儿也不了

解,往哪儿走呢?”说到转移的方向,我们觉得向南、向东、向北都不行。程子华说:“可以到伏牛山去。蒋介石与那里的军阀矛盾很深,地理条件也比较好。我在山西老家中学读书时,就听说土匪头子樊钟秀拉队伍在那里盘踞多年。土匪能站住脚,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为什么不能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到远处去,到有山的地方去。”

多次交谈中,程子华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一次,我忍不住问郑位三:“程子华来二十五军当什么?”郑位三回答很干脆:“军事强当军长,政治强当政委。”

郑位三的信,省委和红二十五军是11月4日收到的。他们都十分高兴,因为下一步到底怎么办,省委正处在犹豫难决的十字路口。省委和红二十五军转入开创边沿新区斗争后,取得了一些胜利,恢复和开辟了两小块苏区,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形势。许多同志意识到目前的方针行不通,觉得只有跳出和远离敌人包围圈才有出路。那么,走出去行不行呢?有的担心红二十五军势力单薄,冲不出敌人的围追堵截,搞不好还会被消灭;有的感到外面情况太陌生,担心到了新的地区站不住脚;还有的故土难离,感到在大别山里习惯了,到了新的地区不能适应等等。就在这种想走又难下决心的矛盾中,省委收到了郑位三的来信,得到了中央新的精神。这对省委坚定战略转移的决心,无疑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

不过,红二十五军要立即赶到鄂东北,不是容易的事。这时,敌人的五个“追剿”支队在紧紧尾追;东北军第一〇七师、一〇九师、一一七师和后调来的第一二九师等部,在商城、麻城、光山、潢川等县交界地区构成了四道封锁线。

红二十五军决定出其不意快速行动。经过一天紧张准备,11月6日晚,全军从葛藤山出发,迅速向西挺进。7日,红

二十五军全歼驻守商城以南之敌一个营,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当天,又在商城西北的大柳树,击退敌两个团进攻,穿过了第二道封锁线。是夜,又从白雀园以北,穿过第三道封锁线。接着,在白雀园与仁和集之间,强行越过潢麻公路,通过了第四道封锁线。8日拂晓,到达光山县东南25公里处的扶山寨。

两夜一天,红二十五军急行军100多公里,部队疲劳已极,只好稍作休整。谁知休息不到两小时,敌人十多个团的兵力,分别从东面、南面尾追而来,突然发起攻击。红二十五军仓促应战,形势十分险恶。

红二十五军面临着一场生死存亡的决战。

军长徐海东和政委吴焕先指挥调度非常有力,他们以三个营扼守扶山寨高地,牵制敌人正面进攻;以一个团兵力隐蔽迂回,在东北军第一〇七师两个团背后突然发起猛攻,敌人措手不及,被迫向东撤退;同时,又集中两个团猛攻东北军第一一七师的两个团,将其打退。红二十五军集中力量向敌侧后猛攻,固守高地的三个营也发起反冲击,将敌人压进一片低洼地带。在红二十五军两面夹击下,敌人溃不成军。

战斗在黄昏前结束,红军打死打伤和俘虏敌人4000多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其它军用物资。这一仗打得相当出色。红军以“打”赢得了“走”,变被动为主动。

在鄂东北道委,我们正在焦急等待,也为省委和红二十五军的处境担心。突然捷报传来,大家无不欢欣鼓舞。很遗憾,我没有机会参加这次战斗,之所以在这里重点强调,是因为这次战斗十分重要。可以说,扶山寨战斗为此后花山寨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也为红二十五军即将开始的长征奏响了前奏。

第二章 孤军长征

秘密出发

红二十五军的长征是秘密出发的。

1934年11月16日,在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3000余名红二十五军将士,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踏上了长征之路。和有些苏区红军部队不同的是,我们的出发,没有父老乡亲十里相送。

红二十五军终于决定进行战略转移,是花山寨会议的结果。花山寨位于光山县西部,1934年11月11日,省委在此召开了常委会,讨论战略转移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半年前就酝酿过。3月中旬,省委就接到河南省委转来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文件,提出了红军主力向桐柏山区实行战略转移的建议。省委经过讨论,给中央写了报告,建议红二十五军暂不离开鄂豫皖,改向老苏区的边沿恢复、开辟新的苏区。7月1日,省委同时收到中央2月12日的指示信和中革军委6月13日的军事训令。中央在信中明确提出:“省委当前的任务,

在于保全我们的活力,保全我们的队伍,去创造新的苏区、新的根据地,整理、锻炼和强固我们的力量,创造新的主力红军。”并强调,“再固执‘死守’的方针,是只有牺牲我们的干部,牺牲我们的活力,必至完全葬送我们的事业”。信中,中央对为什么转移、转移的目的、新区的选择条件等都说得非常清楚。遗憾的是,信收到太迟,而同时收到的军委军事训令中,却“原则上同意省委提议,红军主力仍留在原来苏区继续活动”。这一训令发出时间在后,应视为新指示。红二十五军的战略转移就被搁置了。

花山寨会议整整开了一夜。会议从战略高度审时度势,正确解决了红二十五军迫切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第一,下定了战略转移的决心,解决了走不走的问题;第二,以平汉铁路以西鄂豫边界的桐柏山为初步转移目标,解决了转移的方向问题;第三,红二十五军在行动中,对外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解决了举什么旗帜的问题;第四,留下一部分武装再组建红二十八军,解决了苏区继续坚持斗争的问题。

会议还决定增补程子华为省委委员、省委常委;任命程子华为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为军政治委员,徐海东为副军长,戴季英为军政治部主任;留下省委常委、中共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领导鄂豫皖苏区的斗争(高敬亭没能参加会议,会后由省委给高敬亭写了一封指示信,说明花山寨会议的情况和决定);省委书记徐宝珊、省委常委郑位三率省委机关随同红二十五军一道实行转移。

程子华不是省委委员,没有参加会议。会议结束后,郑位三把会议决定向程子华作了传达。程子华提出,中央派他来是当军参谋长的,请郑位三报告省委,他不能当军长。徐宝珊

表示：“省委已经作了决定，就不要再变了。”程子华没再坚持，成为红二十五军军长。

花山寨会议第二天，红二十五军便西移到罗山县殷家冲、何家冲一带，加紧出发前的准备。郑位三、戴季英把鄂东北道委和游击总司令部机关人员集合起来，传达了省委指示：鄂东北地方武装西路军补入红二十五军，两个机关人员作一些精简，除年老体弱的留在地方坚持斗争外，其余人员编入红二十五军，随红二十五军一起行动。郑位三还专门把我和程坦叫到一起，说，道委机关留下的人员全部编入红二十五军政治部，省委办事机关与军部机关合为一体。他让我们做好留下人员的工作，到何家冲后抓紧时间准备，并特别嘱咐我，一定要把刻字、油印等物品带上。

到何家冲后，红二十五军立即整编部队，撤销了师一级建制，军直辖第二二三团、二二四团、二二五团和手枪团；军部机关设司令部、政治部、经理处、军医院及直属分队等，全军共3000余人。准备工作的另一项内容，是进行政治动员，讲解斗争形势，让大家做好“打远游击”和“创建新苏区”的心理准备。同时做好行军物资的筹备，减少不必要的辎重挑担，实行轻装，每人准备三天干粮、两双草鞋。

各项工作进行得很匆忙。特别是一些伤病员，他们都不愿留下，到处找各级领导，争着吵着要随部队走。我和一些老同志都还记得，红二十五军出发时，统计是2980人。实际许多伤病员都跟着走了，而且还有一些女同志，更是闹着要跟部队走，最后有七名女护士参加了转移。所以说，实际人数应该是3000挂零。

我和程坦等人被编入红二十五军政治部机关。政治部主任戴季英找我和郭述申分别谈了话，他对我说：“你是鄂东北

道委和游击总司令部来的,你就担任组织科长吧。郭述申当宣传科长,他是皖西北道委书记、红二十八军政委,在反右倾中受到批判,被下放到团里当政治处主任去了,过几天才能回来。”谈话后我们就立即行动。我不理解的是,对我的这次任命,戴季英后来一直没有公开宣布过。数十年后,编写红二十五军战史,郭述申回忆起了这一情况,说:“戴季英同志和我谈过当宣传科长的事,也谈了让华清同志当组织科长。”戴季英对采访的编写人员也回忆起了这件事,并说当时是这样定的。

军政治部人不多,但有一个宣传队,队长是程启文。程启文性格开朗,爱说爱唱。1992年,他从湖南来北京,饭桌上,我们回忆起红二十五军经历,他开玩笑说:“那时你是组织科长,我是小宣传员,现在你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了,我还是个老兵,难为你还没忘记我,没忘记我们的战斗友谊。”他还讲了长征时差一点被当反革命抓起来的事情,说:“真要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否则我就被抓到保卫局去了。”说着,还拿出一份材料让我看,上面写了当时的经过。那是长征刚过铁路时发生的事情。出发前,军政治部机关的思想动员很简单,只讲要“打远游击”,不提、也不敢提要离开苏区去创建新的根据地,怕有些年轻战士不愿离开家乡,闹思想情绪。但大家还是若明若暗地知道了,都是青年人,到了一起难免发议论。当时以为说完就完了,谁知过了平汉铁路,戴季英把我叫去,说政治部管发文件的袁克福向他报告,陈鹤桥、程启文几个人在一起说怪话,要逃跑投敌,让我带人去把他们抓起来送保卫局。我当即说,不能抓,这几个人我了解,我常和他们在一起,我相信他们是不会逃跑的。我又讲,现在就要转移了,抓人会影响大家情绪。戴季英想了想,说,那你要负责帮助他们。就这样,避免了一次错误抓人。对戴季英,红二十五军的老同志都了

解,这个人思想比较“左”,办什么事爱搞点神秘性,鄂豫皖“肃反”时就错抓过人。

长征出发前一天,郑位三把省委决定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原稿交给我,要求快速刻印,多印一些,发给部队;出发前来不及发,就边走边发。原件落款时间是1934年10月10号。这是农历,公历应为1934年11月16日。我连夜把《宣言》刻印出来了。有趣的是,时隔50多年后,这份文件在陕南庾家河镇一家农民的老房子里发现了。编写红二十五军战史的人让我辨认。我认真看了看,没错,真是我当年刻印的。《宣言》的主要内容是,强调当时中华民族危机深重,揭露蒋介石的卖国罪行,宣布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红军北上抗日的宗旨,号召全国同胞,不分政治倾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号召国民党军队与红军订立协定,共同抗日。开头一段是这样写的:

“本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奉了我中央苏维埃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出发抗日。现当出发之时,特向全中国群众发表这个宣言……”

刻印完《宣言》的当天晚上,我躺在稻草铺上,好久没有睡着。要“打远游击”,远到哪里呢?这不是要离开生我养我的大别山吗?就要与鄂豫皖边区的父老乡亲告别了!我想起了家乡,想到了亲人。好几年没回家了,不知母亲现在怎样?家人怎样?这次远离,能不能回来?能不能和亲人重见……想了很多,但我知道,大军必定西行。我决心抛去一切留恋,革命到底。

在一个阴冷的夜晚,我们踏着坚定的步伐,秘密出发了……

岁月如梭。60多年后,有人写过一首《惜别》诗,我看很

符合我们当时的心情：

壮士征战去，依依别柴门。
乡关一捧土，牵牵思故心。
远谷正落日，寒风催征人。
回首遥相望，惜别又一村。
夜空惊飞鸟，铁马疾行军。
举目平汉月，军中泪无音。
男儿亦多情，远足重千斤。
前行生死路，谁人说与君？

独树镇负伤

独树镇之战，是关系到红二十五军生死存亡的一仗。

我们行军速度很快，第二天，在罗古寨击退了敌“追剿纵队”第五支队的进攻，当晚在信阳城以南穿过了平汉铁路。我们把过铁路当做一大难关。通过铁路后，都松了口气。在距铁路几百米远的地方，我们躺在山坡边，等待后面部队过来。省委书记徐宝珊和我们同时过了铁路，也躺在山坡上。看来他对过铁路也曾很担心，这时见我们都不说话，就大声说：“同志们，我们取得了大胜利，过了一大关。”

后卫部队过来后，我们迅速向西挺进，进入桐柏山区。按原计划，我们准备在桐柏山区创建新根据地，但经过实地考察和地下党组织介绍，这里靠平汉铁路和汉水太近，回旋余地小，加之敌人大军迫近，我军难以立足发展。于是决定放弃原计划，向伏牛山挺进。

为迷惑敌人，我们派出小部队佯攻枣阳。敌人果然上当，纷纷向枣阳一带靠拢。没想到我们突然掉头东返，冲破敌“追

剿纵队”第二支队的拦阻,击退了敌第五支队的进攻。晚上,准备在桐柏县一个村子宿营,部队突然紧急集合。军政委吴焕先做简短动员:行军走路不能总走直路,要走弯路,革命也要走曲折的路,走艰难的路。现在情况紧急,我们必须离开这个危险区,要准备多走路。接着,部队连夜出发,脱离了险境。

过泌阳后,沿途地势平坦,地主豪绅盘踞的村落围寨很多,一般都有武装,多的有数百条枪,我们经常遭到袭扰。吴焕先政委决定开展政治攻势,每到一地,都由郑位三亲自写信,派手枪团先行一步,将信送给沿途村庄寨主手里,或请围寨之间互相传递。信中除了宣传抗日救国,还说明我们是借道抗日,决不伤害地方,请勿阻拦。路过每座围寨,宣传队的同志也都扯着嗓子大喊一阵顺口溜:“老乡老乡,不要惊慌。我军所向,抗日北上。借路通过,不进村庄。奉劝乡亲,勿加阻挡……”

这么一来,形势大为改观。当时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各阶层的人们对沦为亡国奴的忧虑和恐惧与日俱增。我们的宣传工作,对沿途地主豪绅阶层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他们纷纷表示保持中立,有的甚至很友好。我军通过时,有些围寨的团丁就把枪架起来,徒手站在顶台上;不少围寨还在路旁摆了开水和饭食。有一次,我们政治部甚至就在围寨跟前露营。

经过两天急行军,我们顺利通过围寨地区,来到驻马店西北象河关一带。这里离许南公路不到30公里,过了公路,就是伏牛山东麓。

麻烦的是敌“追剿纵队”第二支队一直摆脱不掉。11月25日,我们打退了他们的进攻,第二天天刚亮,他们又追上来了。军领导决定,第二二四团、二二五团和军直属机关分队为前梯队先行出发;第二二三团为后梯队阻击敌人,掩护全军通

过公路。

这天正好来了寒流,气温陡降。天空阴沉,朔风吼,雨雪飘,一片混沌迷茫。我们衣着单薄,很快就被雨雪湿透,大家饥寒交迫,行进十分艰难。许多同志的鞋子都被烂泥粘掉,只能赤脚。我脚上的鞋子也成了“逃兵”,只好光脚板走路。我们必须抢在敌人前面穿过公路,当时什么也顾不得了,只有一个念头:走,走,快点走!

没想到的是,更大的危险还在前面。事后才知道,敌第四十军一一五旅南下桐柏山合围扑空后,立即掉头北返,抢先占领方城县独树镇附近的七里岗、砚山铺一带,构筑工事,并与保安寨的骑兵团组成了堵击线。而我们还蒙在鼓里。

我随军直属队走在二二四团的后面,见军政委吴焕先一会儿到队伍前面,一会儿又到后面。行军速度太快,不少同志掉了队。我们走进独树镇时,忽听枪声大作。不一会儿,就见前面队伍潮水般地退下来。在他们身后,是敌人和雨点般的子弹。

千钧一发之际,军政委吴焕先握着大刀,像尊战神,大吼一声“站住”,堵住了退下来的部队。他高喊:“不准撤!坚决顶住敌人,决不后退!共产党员跟我来!”边喊,边冒着弹雨,带领二二五团反扑过去,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

吴政委的举动让我热血沸腾,我也举枪高喊:“冲啊!”跟着冲上去。这是平原地带,没什么隐蔽物,只有一些麦秸垛。向敌人反冲锋时,跑着跑着,我觉得左腿被重重敲了一下,身子一歪就倒了。我赶紧爬起来,一着,左腿踝骨上边被子弹穿了个洞,鲜血直流。当时也不觉得痛,还要冲。但刚一站起,又摔倒了,被后面的人抬了下来。

好险哪!二二四团是前卫部队,由于天气太坏,能见度

低,没有及时发现敌情;等敌人开火后,前卫部队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更不利的是,由于寒流袭击,许多人的手冻得拉不开枪栓,零星打响的火力,无法实行有效的反击,慌乱中只得后撤。幸亏吴政委及时赶来,顶住进攻,赢得了短暂时间,使后续部队投入了战斗。激战中,徐海东带领的后卫队二二三团跑步赶到,立即投入战斗。一番血战,终于将敌人打退,敌我转为僵持状态。

天黑后,风雪大作。我军乘机后撤到五公里外的村子稍事休整。腹背受敌,如不能迅速离开,我们这支孤军就会被迫与数万敌军决战,后果可想而知。

军领导决定连夜突围。部队紧急集合,而这时绝大多数人还没吃上饭,大家感到极度疲劳和饥饿。战士中很大一部分人还只是十六七岁的孩子,有的更小,听说又要出发,就不乐意,呆在群众家里,不出来。干部们只好挨家挨户叫,总算把部队拉了出来。最不好办的是伤员。风大、雨大,道路泥泞,要迅速摆脱敌人,就不能带伤员走。军领导决定把伤员就地安置,多留一些钱,动员群众保护伤员安全。

这次战斗负伤的不少人,都住在一个小村子里。在地下党组织帮助下,伤员分散安置在群众家里,留下了大洋。我的伤口经过处理,血已止住,也不那么疼了,但不能走路。听说要把我就地安置,我立即表示,坚决不留下,一定要随军行动。我很清楚,留下必死无疑。当然,拖着伤腿走,可能也是死,我想,死也要死在红军队伍里。

人生中有一些命运转折的关口。对于我,这次负伤算是一回。我的情况反映上去后,政治部主任戴季英说:“那就带上他吧。”这一句话,让我成了最幸运的伤员。当时政治部机关按人员情况配备牲口,我和程坦俩人合用一匹小马驮东西,

因为有伤,这匹小马就让我骑了。后来听说,留下来的伤员大多被敌人杀害了。靠了那匹可爱的小马,我跟上了部队的转移。我一直很感激戴季英和那匹小马。事过60多年后的1996年6月,我到河南考察工作,在郑州看望了戴季英,他91岁了,但头脑还很清楚,还记得独树镇战斗。遗憾的是那匹小马再也见不到了。

独树镇之战,关系到红二十五军的生死存亡。情势之险恶,战斗之惊心动魄,至今历历在目。当地政府后来在这里建了“红二十五军血战独树镇纪念碑”,1997年11月26日举行了揭碑仪式,我为纪念碑题写了碑名。

我们终于进入伏牛山。习惯于山地作战的指战员,见到大山,一片欢腾。伏牛山盘结于豫西南境内,自古以来就被称作“盗匪的渊藪”。国民党军的将领人物刘镇华、樊钟秀、张钫等人,都是从伏牛山拉杆子起家的。此时,被称为“内乡王”的别廷芳,已将其势力范围扩展到伏牛山以北的南召、嵩县、卢氏境内,这个土皇帝后来也显赫一时,被蒋介石封为南阳13县联防司令。当初程子华就曾建议把部队拉到这里。

我们很快发现伏牛山不适宜创建根据地。这一带人烟稀少,地域狭窄,粮食和其他物质条件都很缺乏;别廷芳在此经营多年,反动统治十分严密,不利于我们开展群众工作。敌第四十军和“追剿纵队”主力仍追得很紧,一时难以立足。省委和军领导研究后,决定马上转移,到陕西南部开辟根据地。我们再次改变计划,兼程西进。

12月4日,我们来到河南卢氏县的叫河。我的腿伤已经有了好转。前面就是一条人陕大道。从叫河经朱阳关到商南地界,不过七八十里山路,一天就可以走到。进入陕南后,就完全可以摆脱尾追之敌,并在商南县境内站住脚跟,开创新局

面。了解到这一情况,我们都很高兴。

手枪团报告,地处豫陕交界的朱阳关、黄沙镇、五里川等地,三天前就被敌军占领了,堵住了我军人陕之路。这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原来,蒋介石为防止我们入陕,早在半个月前就命令驻守开封的原十九路军第六十师乘火车到灵宝,然后步行到朱阳关一带,控制了入陕通道。后面,敌“追剿纵队”第二支队也跟踪到了栾川、庙子一线,我军又处于被敌前后夹击的险境。这时碰巧遇到一个叫陈廷贤的货郎小贩,在他带领下,我们沿着一条很少有人知道的人陕小道,绕过朱阳关,直插卢氏县城。

12月5日晚,我们从卢氏城南与洛河之间的隘路插了过去。卢氏城里的民团十分惊慌,紧闭城门,在城墙上打着灯笼火把壮胆。我军迅速西进。12月8日,我们从豫陕交界的铁锁关进入了陕西境内。铁锁关,又名箭杆岭。据说明末李自成兵败商洛山后,在此设关,并以铁锁锁闭关门,留下了“铁锁关”之名。关上有民团把守,被我军一举攻占。当天下午,我们又急行军近20公里,经大石河到了三要司,接连攻占九泉山高地,歼灭陕军一个营。9日,又翻越蟒岭,到达了庾家河镇。

在翻越蟒岭时,我的处境很狼狈。我们走的是放羊人带羊群爬行的山路,十分崎岖。部队虽已轻装,但军供给部还有骡马、挑夫,走起来更困难。我负伤已十几天,虽可以走路了,但这样的山路,走起来还是很不方便。我忍着痛,一步步蹭着往前走。上山很费力气,左腿又使不上力,有时只好爬行。后来,见前面有匹马,我就紧紧抓住马尾巴。我一下子增加了一匹“马力”,轻松多了,算是闯过了这一关。

晚上我们宿营庾家河。这是一个高山峡谷中的小镇,几

十户人家,南北两条小河。镇里有条狭窄小街,分上街下街,在中间拐弯,就像姆指食指分了叉。街面上有几家店铺,拐弯处有一所中药铺子,军部就住在这里。当晚郑位三交给我一份材料,让连夜刻印,第二天早上要张贴出去,说是吴焕先政委决定的。这是一篇很短的传单,标题是《什么是红军》,把红军的性质、宗旨、任务以及有关政策写得一目了然。记得末尾还有句十分令人自豪的话:“中国有红军已经八年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把刻印好的传单交给宣传队。早饭后,宣传员就把一张张散发着油墨气味的告示贴上了街头,传单上“什么是红军”五个铜板大的字特别显眼。夜里没有休息,我抓紧时间想睡一会儿,突然听到激烈枪声,即赶紧起来。原来敌人从东山坳口摸上来,军领导已带部队上去了。

战斗胜利结束,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却负了重伤。部队伤亡不小,三个团调整为两个团;军的领导也作了调整,戴季英改任军参谋长,郑位二为军政治部主任。

庾家河战斗结束了红二十五军历时 20 多天、长驱两三千里的长征第一个阶段。这一仗,有效地打击了尾追的敌人,摆脱了困境,为打开陕南局面奠定了基础。

《战士报》

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分两个阶段进行。中途有一次停顿,由此创建了鄂豫陕新苏区。

鄂豫陕边界地区,包括陕西省东南部、湖北省西北部和河南省西部的部分地区;它北靠秦岭,南濒汉江,地势险要,人民困苦,敌人统治薄弱。我们到来前,这一带就受过党和红军的影响,较适合我军立足发展。因此,在庾家河战斗前,省委会

议就决定在鄂豫陕边创建新苏区,并作出了《关于创建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

新苏区的创建,离不开政治工作。重视思想建设,是红二十五军的好传统。创建新苏区的日子里,军政治部创办了《战士报》。我是宣传科长,《战士报》自然由我负责。

在一次夜行军中,郑位三对我说:“经军领导研究,由你担任宣传科长,仍兼秘书油印科长。原宣传科长郭述申担任军政治部副主任,带小部队去地方开展群众工作,创造根据地。”老实讲,这个调动我并不高兴。我一直在干组织科长的工作,但也一直只是挂名,没有正式宣布。现在仍然不让我当组织科长,我猜想可能是前段时间让我抓人,抓“反革命”,我没同意,因此受了影响。

郑位三见我没说话,接着说:“吴焕先政委认为你在独树镇战斗中表现很勇敢,可以到团级领导岗位上去锻炼一下。我看现在部队也没有位置,你的身体又不太好,还是和我们一起搞政治工作吧。”

我对郑位三一直很尊敬,他这样说了,我没有二话。我们议论政治工作如何开展,便谈到了干脆办份报纸,由宣传科负责,不定期,几天一期;当然,也要根据部队作战的实际情况,多一期少一期都可以。几个人对这个想法都很有兴趣。

没多久,《战士报》创刊了。

作为宣传科长,我的工作很多。首先要办好《战士报》,从筹稿、编辑到刻印,都要我管;我还要负责起草文件、拟定标语口号、组织布置群众大会等等事情;还让我管政治部的宣传队,管部队的宣传教育工作。工作虽然忙累,但是干得很起劲。

当时,红二十五军刚刚进入新苏区,给养不济,生活异常

艰苦,部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情绪。我们及时把部队的好人好事收集起来,在报纸上刊登。为了配合群众反抗捐税斗争的要求,我们又在报上提出“抗捐、抗债、抗粮、抗夫、抗丁”的“五抗”斗争口号。总之,我们总是围绕部队的工作实际,积极配合宣传。

《战士报》在当时起了很大作用。许多平时没有时间讲的事,通过报纸做了宣传,而且效果不错。军领导也很关心这张报纸,吴政委多次给我们指示。一天,我正在编稿,吴政委来了,对我说,报纸的稿子要短一些,稿子要到连队去约,要动员部队的干部多写稿子,反映部队的情况。有时候,吴政委还亲自写稿子。记得有一篇叫《骑马大王》的稿子,就是吴政委写的。这是一篇批评稿。当时,二二三团团团长常玉清喜欢骑马抖威风,一些干部战士对他意见很大,但谁也不敢批评他。吴政委在稿子中对他进行了批评。文章在报纸上刊发后,不仅批评帮助了常团长,而且教育了全军干部战士,密切了官兵关系,“骑马大王”的名字也在全军传开了。红二十五军批评和自我批评风气很好,党内、部队内的斗争精神很强,对不良倾向敢于批评和斗争。当时的做法是,对团以上干部的批评稿件,要请示政治部主任同意后才能刊发。郑位三、郭述申等领导也经常亲自写稿。报纸还经常刊登一些政治工作经验、群众工作经验等,短短几句话,就是一条消息,对部队很有指导意义。《战士报》很快成了全军上下都很关心的报纸。它虽然有些简单粗糙,但很及时、也很实际,富有战斗力,对部队创建鄂豫陕新苏区起了积极作用。

有趣的是,我还被赶鸭子上架,当过一回“画家”。事后自己也暗暗称奇。

早在鄂豫皖时,红军各连队就建立了列宁室(俱乐部),作

为文化学习和教育活动的中心。列宁室都挂有列宁像。长征时轻装,许多东西都没能带上。到陕南新苏区后,郑位三要求我们搞好连队俱乐部建设,还让我画列宁像。红军完成长征,算是一大奇迹;我这次当“画家”,也算得上一个小“奇迹”。我从没画过画,甚至丁点儿基础知识也没有。郑位三递给我一本书,书里有一张列宁像,要我照着画,并且要放大,能挂在连队列宁室里。

他走后,我拿着书,对着列宁像愣了好半天。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好在我一向胆大,心想,画就画。我找来一块打仗缴获的白布,那时叫洋布,铺在地上。没铅笔,也不知道可以用“九宫格”放大的方法,就用火炭先在上面轻轻打稿。画上几笔,就站起来瞅两眼,看像不像。等觉得差不多了,就用毛笔在炭稿上慢慢描。那架势,仿佛一个正在创造杰作的绘画大师。就这样一笔一画,终于完成了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幅绘画作品。

我知道自己这次任务完成得不好,拿给郑位三检查的时候,心里很不踏实。出乎意料,郑位三很满意,说:“你还真不简单,叫你画你就画出来了,画得还很像呢!”我如释重负。

就此一发不可收拾。列宁室本来就该有列宁像。如果都没有,那没办法;现在有个连队已经挂出列宁像,而且知道军政治部藏龙卧虎,有个“画家”,其他连队自然不甘落后,纷纷找来。

刚会游泳的,往往瘾头格外大。我刚刚体会了当“画家”的滋味,而且得到了政治部首长的表扬和大家认可,自信心一下子变得很足。我非常乐意地满足了各个连队的要求。

龙驹寨整训期间,程子华军长由于有伤,就在病床上找人了解情况,也找我谈过话。他对我说,部队整训期间,要开展

文娱体育活动,要做游戏,教唱歌曲,并让我把他刚到鄂豫皖时教我们唱的一些歌曲教给部队。按照他的意见,我们宣传科采取办班培训的办法,先培训一批连队干部,再由他们去教部队。这样,很快在全军掀起了教唱革命歌曲的热潮。我们还抓了部队的文化学习。

成员年轻,是红二十五军的一个鲜明特点。

《共产国际》刊物 1936 年登过一篇文章,名为《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底远征》,其中一段这样写道:“最堪注意的,就是这支队伍差不多没有年过 18 岁以上的战斗员。从前的鄂豫皖苏区里,遭受异常残酷的白色恐怖,那些在战斗中牺牲者的孤儿,那些在 1932 年随红四方面军远征到四川的红军战斗员的子弟,便在这种恐怖条件下建立起游击队,从游击队变为现在以‘儿童军’著名的红二十五军……”

从年龄结构上看,说红二十五军是“儿童军”的提法是有道理的。长征开始时,包括几位军领导在内,都十分年轻:军长程子华 29 岁,军政委吴焕先 27 岁,年龄稍大的是副军长徐海东,也才 34 岁;营团干部,多是 20 出头;一大批连排干部,大多是不到 20 岁的小伙子;军部机关的工作人员和警卫人员,也和我差不多,只有十七八岁。

尤其令人感慨的是,队伍中甚至还有一批十二三岁的少年儿童,有时候,他们也不得不成为战斗人员。《共产国际》上述文章对此也有过描述:“在鄂豫皖边界人迹罕见的崇山峻岭上……十一二岁的儿童上山寻找自己的父亲。他们还是幼弱儿童就如大人一样懂事。他们亲眼见过白色恐怖的一切惨状,他们在幼年童稚时代就领略了一切政治常识。这样就产生了新的红二十五军,产生了儿童军。这一部队大多数战斗员的年龄,只是从 13 到 18 岁。”

这支神奇的“儿童军”，在艰苦的长征路上，在开创新区的战斗岁月里，一个个雄姿英发，朝气蓬勃，具有战胜一切敌人和艰难困苦的英雄气概，他们每向前跨进一步，都经受着血与火的洗礼。这些年轻的战士，不要做动员，不要讲大道理，他们最朴素的信念是，为了革命，向前，向前！部队最爱唱的是《红色青年战士之歌》，我们这些年轻人，只要唱起这首歌，浑身是劲：

红色的青年战士志气昂，
好比那东方升起的太阳；
不怕牺牲，英勇杀敌如猛虎，
冲锋陷阵，无坚不摧谁敢挡！

紧张的战争环境中，我们摸索形成了一套很有效的政治思想工作方法。我当宣传科长之后，经常思考如何加强部队思想教育。部队经常打仗，总在转移运动，我们就随时随地，用敌人压迫残害人民的血淋淋事实，对部队进行教育，激发指战员对敌人的仇恨，提高阶级觉悟。面临复杂情况和艰巨任务，军领导都会亲自出面动员，讲话简短，但生动有力。特别是吴焕先政委，讲话很有鼓动性，部队一听到他讲话，劲头就来了。

军政治部宣传队的工作也十分活跃，利用各种简单易行的方式，宣传时事政策和胜利消息，表彰英雄模范事迹。宣传队又分为粉笔队、粘糊队。粉笔队主要负责刷写大字标语、宣传口号，有时用白灰，有时用墨汁，反正是找到什么能写大字的就用什么；粘糊队则主要负责张贴布告、传单、标语等。还有些宣传员，对群众讲演。宣传队还根据部队执行任务的情况，及时排练一些反映部队生活的小节目，有快板书、活报剧、小话剧等，形式多样，很受战士欢迎。有时开联欢晚会，军领

导也积极参加。我们宣传科经常编一些宣传材料和教育大纲,组织部队学习讨论。《战士报》在这方面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红二十五军的官兵关系很密切,尊干爱兵蔚然成风。各级干部都能以身作则,凡是要求下级做到的,领导干部首先做到。每次外出打粮回来,背得最多的是干部。战斗中,干部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哪里情况紧急,哪里就有领导干部。军领导和各级干部都很爱护部属,行军中,他们经常把马让给伤病员和体弱的同志,主动帮助战士背枪、背背包。到了宿营地,干部争着为战士烧水洗脚,督促和帮助战士泡脚、打草鞋,为战士理发,关心照顾伤病员。我亲眼看到过徐海东抬担架运伤员。我自己也有过两次切身感受。独树镇负伤是一次,创建新苏区中还有一次。那是在山阳县,由于饮水不对,不知得了什么病,高烧一直不退。军医院院长钱信忠亲自给我做了治疗,后来我高烧昏迷,他就报告了军参谋长戴季英。戴季英立即找来担架,让人抬着我走。干部关心战士,战士也尊敬热爱干部。全军上下同甘共苦,情同手足。

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边不到半年时间,在作战上取得了一连串胜利,歼灭陕军第一二六旅三个多营,警备第二旅、警备第三旅大部,全歼警备第一旅,歼东北军一部,先后攻占镇安、柞水、宁陕、佛坪、雒南五座县城,部队发展到近4000人,地方游击师、抗捐军发展到2000人,成立了中共鄂陕、豫陕两个特委和五星(柞水红岩寺地区)、山阳、镇(安)柞(水)、鄂西、雒南五个县工委,成立了鄂豫陕边区苏维埃政府和两个县、13个区、40多个乡、300多个村的苏维埃政权,逐步建成了鄂豫陕苏区。

“过河卒”

1935年7月16日,红二十五军离开了新开辟的鄂豫陕苏区,继续长征。

对于这次新的战略行动,军政委吴焕先说:“现在我们就像一枚攻过河的卒子,只能朝前进攻,不能往后退了!”

我们处境很特殊。因为自撤离鄂豫皖苏区开始长征后,就一直和党中央失去联系,成了一支独立作战的孤军。消息闭塞,无法了解全国斗争形势,甚至连中共中央举行了遵义会议这样的大事也一无所知。后来在进逼西安的行动中,我们从报纸上得悉: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动向;蒋介石正调集几十万大军向川陕甘边境集结,企图将我主力红军围堵歼灭于川西地区。

面对这一消息,红二十五军领导觉得必须从全局着眼,作出新的战略选择。

7月15日,我突然见到石健民。当时,军部驻在长安县子午镇。这是个拥有百十户商号的镇子,位于终南山下的子午峪北口,是进出终南山必经之地。红二十五军下一步究竟如何抉择,军领导举棋难定。石健民的到来解决了大问题。他简直神出鬼没,突然在子午镇出现,带来了中共中央数月前发出的几份文件,还带来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行动的可靠消息。他是红安县人,早在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时我们就熟悉。这一次,由于时间紧,只打了一个照面。应该说,他虽然没有参加红二十五军长征,但在红二十五军长征的历史上,却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省委当晚召开紧急会议,形成了统一认识:配合主力红军

北上行动,是当前最为紧迫的战斗任务。最后决定:红二十五军立即北上,与陕北红军汇集成一个力量,创建新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会议还决定,将中共鄂陕、豫陕两个特委合并成一个特委,将苏区的游击武装力量合编成一支战斗部队,由新的特委统一领导,继续坚持斗争。郑位三被留在鄂豫陕边区,担任领导工作。

后来事实证明,这一战略决策非常及时而且正确,完全符合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符合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当年《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在《塞上行》中,曾引用毛泽东讲过的一句话,对此有过恰当的评价:“徐海东部之由陕南经陇东入陕北,乃偶然作成中央红军之向导……”

我们这枚“过河卒”立即行动,继续长征。

7月27日,经十余天连续行军作战,红二十五军抵达留坝之江口镇。我们在此休整两天,进行了西征北上的思想动员和物质准备,部队也重新作了整编。军下辖第二二三团、二二五团和手枪团,还有机关和直属队,全军共4000多人。这次与长征出发时不一样了,军政委吴焕先亲自对全军做动员,提出了“配合两大红军主力行动”和“迎接主力红军北上”的非常明确的战斗口号。我们宣传科也制定下发了教育提纲、宣传口号。

全军指战员情绪饱满,上下都拧成一股劲儿,决心不顾一切,奋勇前进!军直机关的气氛我感受得更为直接。当时,从交通队(即警卫连)、政治保卫队、少年宣传队、补充学兵连、随军野战医院,以及后勤供给部的挑夫队、担架队、骡马大队、军械修理所、被服工厂,到手枪团和两个步兵团的每个连队,到处都是一派奋发激昂的口号声:

“祝贺两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

“配合两大主力红军北上行动！”

我们从江口镇出发，先南下佯攻汉中，然后转向西北挺进。一路上都是深山峡谷，山陡路窄，河水湍急，部队一会儿翻山，一会儿过河，草鞋湿了又干，干了又湿。人不停步，马不卸鞍，日夜兼程。正是7月天气，十分炎热，尤其正午，太阳像在喷火，每个人衣服上，都显露出一圈圈作战地图般的白色汗渍。

8月1日，我们占领了川陕公路要地双石铺，还俘虏了敌人一名少将参议。根据敌人口供和情报资料，证实了我主力红军正在北上，而敌人正在集结重兵实行堵截。军领导因此决定，趁敌人后方空虚，兵力薄弱，立即出其不意插入甘肃境内，以积极的作战行动吸引敌人，减轻其对主力红军的压力，从战略上配合主力红军行动。

8月8日，我们攻占甘肃两当县城。9日晚，又攻下天水县城北关，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这时，敌第三军十二师一部已经掉头回援；东北军第五十一军一一四师，也赶往天水方向增防。我军随时可能处在敌人的夹击之中。

我们神速西进，敌人大为震惊。7月26日至8月10日，蒋介石接连从成都行辕发出五道电令，初时要求加强西安、宝鸡、汉中之线的碉堡封锁，防止红二十五军入甘与主力红军“合股”；继则督饬陕军各部“不分省界，跟踪追击”；并要求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向天水方向“轻装堵截”，以围歼我军于两当一带。蒋介石看出了我军的意图，在8月10日的电报中指令所属：“查徐海东匪西窜原因在策应朱毛。我军应采用内线作战要领，先以优势兵力迅速解决徐匪，再以全力回击朱毛。兹将解决该匪办法列下……”蒋介石还在电报中要求将我军“于天水、成县以东，渭水以南地区，聚而歼之”。

可惜这一作战命令为时已晚。蒋介石大概没想到,他最后这份电传命令发出的第二天,我军已全部渡过渭河。

我们是8月11日到达渭河的。渭河是陇山峡谷中由西向东的一条混浊的河,水流很急。当时的过河工具,只有一条刚找到的小木船,每次只能上去二三十人,显然,全军数千人是不可能完全指望它的。好在没有暴雨,没有山洪下来,河水还算暖和。于是,派人试探水情,发现最深处只淹到人的肩头。这么一来,那条小船就可以主要照顾伤病员和女护士,其余人员都可以涉水而过。过河时,有的骑着牲口,有的拽着牲口尾巴,有的手牵手,从河中漂淌而过。另外,还在河面上拉了几条绳索,战士们把枪支弹药顶在头上,攀绳面过。一些年长体弱者,也是攀着绳子过去的。就这样,全军4000多人马,只用了半天时间,就顺利地过了渭河。当时的情景,还留下一幅历史照片,如今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我去看过这张照片,由于年代久远,层次简单,像一幅黑白版画,但上面的山塬、河流、木船、滩头等都依稀可辨。只是木船上的人影又多又小,很难辨个明白。这是一幅极为珍贵的历史图片,我很感谢那位不知名的摄影者。

过了渭河,我军完全把握了主动权。既可以乘机转入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师,又可以扼住西兰公路,策应主力红军的北上行动,可说是一箭双雕。吴焕先政委关于“过河卒”的说法,就是在过渭河后讲的。

1935年8月15日,我们进驻了兴隆镇、单家集等地。这一带是回族聚居区,进驻前,军政委吴焕先作了大量调查,结合回族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为部队制定了“三大禁令、四项注意”。三大禁令为: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毁坏回族的经典文字,禁止在回民地区吃大荤。四项注意是:注意遵守回族的

风俗习惯,注意使用回民的水桶在井里打水,注意回避青年妇女,注意不要在回民地区打土豪。吴政委还专门找郭述申副主任和我们几个科长,共同研究如何教育部队和做好检查落实工作。为了便于开展群众工作,我们还派回民战士随宣传队去打前站。宣传科和油印科则准备了大量传单、布告,在大部队进入前,派手枪团先行进镇,张贴布告,安定民心。

这是一个有百户人家的小镇,一条狭斜小街,两旁有不少小铺。名叫“兴隆镇”,却没想像中的兴隆。街面上冷冷清清,商店也大都没开张。南街有座很大的清真寺。进镇后,我们写的传单、标语已贴得到处都是,如:“保护清真寺,不毁古兰经!”“尊重伊斯兰教的信仰习惯!”“红军和回民是一家人!”“回汉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卖国贼蒋介石!”等等。

在兴隆镇,我们休整了三天,一面开展群众工作,一面做好继续行动准备。这几天里,有两件事在我记忆中印象很深。

一件是吴政委召开的座谈会。进驻当天下午,吴政委就把政治部几名干部派出去,把清真寺的教主、阿訇和当地有名望的绅士请到军部作客。座谈会上,吴政委向他们讲明了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红军的政策纪律,告诉他们,红军进驻兴隆镇,只是稍作休整,一不催粮草,二不派捐款,三不拉民夫壮丁,不必担心;并向他们讲了红军规定的“三大禁令、四项注意”。座谈会打消了客人们的顾虑。会后,整个镇于热闹起来了。我还用毛笔写了几张大布告,上面是“三大禁令、四项注意”,第二天贴上街头,群众看后非常高兴。在布告的感召下,当时就有十几名回族青年报名参军。其中,有一个叫马青年,分到了我们政治部宣传队。

第二件事是军领导拜访清真寺。这是第二天上午,政治部作了些准备,军领导便带着相关人员前去拜访。队伍前面

是吴焕先、程子华、徐海东等军的领导；他们身后，跟着很气派的军号队，几十把军号亮闪闪的，一路吹得嗒嗒响；军号队后面则是一块红光耀眼的锦缎匾额，由两个红军战士高高地挑在空中，匾上有四个金黄灿灿的大字：“德高望重”；接着，便是用十几张桌子抬的礼品：六颗银光闪闪的大元宝，六头色彩鲜美的大肥羊。这种阵势，在兴隆镇大概是头一回，队伍后面跟着好大一群看热闹的群众。一位老阿訇主持了拜访仪式。吴政委向老教主赠送了匾额和礼品，并向回民群众讲话，再次阐明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红军的政策纪律。老教主也讲了一番表示感谢的话，并按照民族礼节，宴请了军的领导人。事后，老教主又领着清真寺的阿訇、地方绅士和回民群众，到军部驻地做了回拜，献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四个大字：“仁义之师”。

部队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普遍开展群众工作，进行助民劳动。街头巷尾，到处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军医院还为群众治病。我军以实际行动，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礼尚往来，回民群众也为部队做好事。比如，有两位回族妇女看到我军山顶上哨兵没吃饭，她们就提着一篮馒头送去。

第三天，我们离开兴隆镇。镇上男女老幼齐集街头，在马路两旁摆设香案，放上点心油果，敲锣打鼓，鸣放鞭炮，为红军送行。十几名回族新战士，也与父老乡亲告别。与我们刚进镇时的冷清相比，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场面。尤其让我们高兴的是，我们的言行让回族群众概括成了三个字：“红军好”，而且这三个字不胫而走，很快在陇东回民地区传开。以后，我军所过的回民地区，群众都结队相迎；许多回民老乡还自觉为我军报告敌情，充当向导，使我军得以迅速北上。

后来，中央红军长征经过这里，也受到回民群众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同志就住在单家集，离兴隆镇很近，他也切身感受

到了红二十五军民族政策的影响。到达陕北以后，毛泽东在接见徐海东和程了华时，夸奖了这件事，说红二十五军政策水平很高，民族政策执行得很好！

可以说，在中国革命这盘棋上，将红二十五军称之为“过河卒”，恰如其分。她确实是红军长征北上的“当头卒”。

王 母 宫 塬

1935年7月到9月初那段日子，我们的部队很像匹野马，在陇东高原走东闯西，来回奔驰。敌人一直搞不清我们的行动企图。

其实，我们自己也是无可奈何。我们是因为得知中央红军准备北上而离开鄂豫陕苏区的，但我们没电台，无法与中央联系，眼下中央红军到了什么地方，一点也不知道，只能来回闯荡，一则可以牵制吸引敌人，二则找机会打探主力红军的消息。

8月21日，我们冒着大雨强行军，来到泾川县附近的王村。

局面极为严重：后面有紧紧咬住的追兵；前面，敌第三十五师骑兵团和第一〇四旅二〇八团已经到达泾川县城；北面是泾河，因连续大雨而变得波涛汹涌；南面则是屏障般高耸的黄土高塬。我们的回旋余地非常狭窄，如摆脱不掉敌人，可能会有灭顶之灾！危急时刻，军领导果断决定：离开公路，翻越南面高塬，甩掉敌人。

我们爬上了地势突兀的黄土高塬。

这道高塬位于泾河与汭河之间，由西向东，蜿蜒面来，到了两条河流的交汇处，身躯一挺，耸起一座高峻山塬。山嘴

上,有座建于北魏永平三年(公元510年)的石窟,有许多栩栩如生的石像,而王母娘娘地位最尊,石像格外高大,石窟因此叫王母宫石窟。当地人称此塬为王母宫塬。王母宫塬南端,断崖陡峭,崖底就是我们即将徒涉的汭河。这条河平时流速缓慢,但眼下大雨滂沱,河面加宽,水流变急,给过河造成很大困难。

军政委吴焕先亲自指挥渡河,在河岸边奔前跑后,大声呐喊。雨像鞭子在抽打,又急又猛。最先过河的是手枪团和二二五团,他们占领了河南岸高地,并向泾川方向警戒。接着便是军部直属机关分队。从吴政委面前走过时,我见他衣服湿透,满脸滚着水珠,面孔铁青。他挥挥手,大声喊:“你们政治部快过去!”从长征以来,吴政委总是哪里有危险就出现在哪里。

军部直属机关正在过河,这时,突然传来雷鸣般吼声。山洪来了。河水突发野性,竖起一堵浑浊水墙,劈头盖脑横压过来。我眼看着几个战士被洪峰无情地卷走了,大家惊叫起来。吴政委马上命令停止渡河,抢救落水战士。可是,哪里还能见到人的踪影。

大雨不停。全军的辎重行李、骡马担架、缝纫机、药品和医疗器材,以及随军行动的伤病人员,这时全都集结在河北岸,拥挤不堪。我们过不了河,身后高塬上担任掩护任务的二二三团指战员也就不能撤下来。敌人越来越近,时间紧迫。人家的目光都集中到吴政委身上。

必须抢渡。吴政委想出了点子,命令部队将供给部带的布匹扭成绳索,选几个水性好的战士试渡。他们每人骑一匹大骡子,各牵一条布索,等山洪前峰过去,便跳入激流。不多一会,他们顺利过河,将白布牢牢拴在对岸两棵大树上。接

着,就有几个战士抓着浮在水面的白布索,扑腾扑腾地泅了过去。试渡成功,我们欢呼起来,继续渡河。

塬顶上突然响起枪声,敌人追上来了。军供给部正在过河,而先头部队已经过去,一时难以回援,塬上担任后卫掩护的二二三团只能背水一战。枪声、爆炸声不时传到河岸,我们焦急万分。谁都看得清楚,如果不能阻住敌人,后果不堪设想。这时,只见徐海东副军长带领身边人员奔向二二三团阵地;吴政委则带领交通队和学兵连 100 多人,从右翼向敌后插过去。其他人抓紧渡河。

后来知道,吴政委带领部队从一条隐蔽的小路,奔上塬顶,正好插到敌人尾部,切断了敌人后路。吴政委指挥部队迅速抢占了几个高地,从侧后向敌人发起攻击。吴政委大喊:“同志们,压住敌人就是胜利,决不能让敌人逼近河边!一定要坚决地打,狠狠地打!”二二三团也趁机向敌人发起猛烈反击。敌人没想到从背后杀出一支奇兵,顿时乱了阵脚,夺路逃窜。不幸的是,激战中吴政委负了重伤。

吴政委威信极高,许多人心目中,他几乎就是红二十五军之魂。听到他负了伤,指战员一个个怒火万丈,奋不顾身冲向敌群,拼刺肉搏。敌人乱套了,奔逃的奔逃,跳崖的跳崖,人马互相践踏,最后被压到一条烂泥沟里,1000 多人全部被我歼灭。敌团长马开基也被击毙。

枪声停了。王母宫塬上,一场恶战以我们的胜利而结束;但是,谁都没有心情去感受胜利喜悦——就在战斗将结束时,传出噩耗:全军敬爱的政委吴焕先同志停止了呼吸!

听到噩耗,全军哀痛!

王母宫塬上空阴云低垂,风雨如泣。烈士鲜血染红的几簇小草,滚动着一滴滴带血的水珠,渗进了黄土。我们敬爱的

中共鄂豫陕省委书记、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吴焕先同志，就这样英勇地战死在王母宫塬，年仅28岁。

他倒下了。他就像照亮夜空的一颗流星，过早地坠落在长征路上。

当晚，万籁俱寂。在河南岸一个叫郑家沟的小村庄里，我们为吴政委送行。医护人员为吴政委的遗体作了卫生处理，穿上两件内衣，又用了几丈洁白的棉布，紧紧裹住他的身子。徐海东副军长满含热泪，亲手把吴政委生前最喜爱的一件青呢大氅盖在遗体上。安葬之前，举行了告别仪式，军直机关全体人员向吴政委遗体垂首致哀，几十双眼睛哭得又红又肿。

我们找来了一口柏木棺材，装殓了吴政委的遗体，葬在郑家沟一个山根底下。为了保密，只去了少数几个同志进行安葬。一切都是在安静中进行的。

“出师未捷身先死”。吴焕先政委的牺牲，使鄂豫陕省委失去了一位才能卓越的领导，红二十五军也失去了一位优秀的指挥员。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永存。

半个世纪之后的1985年8月，为纪念吴焕先政委牺牲50周年，我和程子华、郭述申、韩先楚、刘震、陈先瑞等老同志，联名写信给中央，建议为吴政委建立纪念碑。经中共中央批准，在吴政委的家乡河南郑州烈士陵园和他牺牲的甘肃兰州烈士陵园，分别建立了纪念碑和纪念亭。邓小平同志题写了“吴焕先烈士纪念碑”碑名；李先念同志为纪念碑题词：“功勋卓著”；徐向前同志题词：“赤胆忠心，英勇善战”。碑文则是我们几个老同志共同撰写，落款为“红二十五军先烈纪念委员会”。

王母宫塬战斗后，我们这支没有后方依托的队伍，就在灵台县一带打圈子。主力红军正在过草地，我们并不知道。每

到一地,军领导都要派手枪团到处收集报纸,访问客商,打探主力红军消息。

主力红军的消息不知道,却把敌人的情况摸到了。陇县、清水、马鹿镇等地的敌第五十一军一一三师,时刻在窥测我们,伺机而动;敌第三军十二师也从武山、甘谷一带向我军移来;由兰州乘汽车驰援的敌第六师十七旅已经到达泾川县城;敌第三十五师仍继续向泾川方向集结,该师的骑兵团则像条尾巴一直追着我们。

敌情严重,很快就会对我形成夹击之势。军领导认为:我军连日在大雨泥泞中行军作战,十分疲劳,伤病员也难以安置,再继续作无后方依托的行动非常不利;既然一时得不到主力红军的确实消息,此地不宜久留。决定立即北上,与陕甘红军会师。

1935年9月初,在合水县板桥镇,我们打了一次败仗。

当时,敌第三十五师骑兵团让我们很头疼。人的两条腿自然跑不过马的四条腿,他们仗着这一点,一路老跟着我们,时不时就交上火。在过西峰镇和翻越赤城塬时,我们曾两次打退过他们。长征开始后我们经历过大小许多次战斗,不管战斗再残酷,结果都能转危为安。可是板桥镇这一仗,我们吃了大亏。

9月3日,我们渡过马莲河后,在板桥镇宿营。这是陇塬上一个不大的小镇,不到百户人家。由于疲劳,很快就休息了。机关也没有派人部队去作行军情况检查,都想抓紧时间休息。

黑暗中,响起敌人的马蹄声,越来越近。遗憾的是,我们听不见。

天刚亮,部队集合。二二三团是前卫部队,已经出发了;

二二五团一营、二营也出发了。军部机关和二二五团三营集合后,军参谋长讲话,延迟了出发时间。这时,响起急促的马蹄声,敌骑兵团突然出现。马群扬起尘土,铺天盖地地压过来。

军机关的队伍里,前面的刚刚开动,后面的还没挪窝。我们一时无法组织有效抵抗。走在前面的拼命往前跑;后面的军医院则被敌人冲散了;后卫三营也被敌人包围起来。枪声、喊声、马嘶声乱成一片。为掩护三营突围,徐海东指挥二二五团二营投入战斗。但是,敌众我寡,他们也陷入敌人包围之中。情况十分危急。二二五团一营迅速抢占了一座山头,以猛烈火力阻止敌人进攻,掩护徐海东等突出重围。战后,军医院和一些被冲散的人员陆续归了队,情况狼狈,有的被搜去了东西,空手回来;有的甚至被剥了衣服,回来时只穿了一条短裤。这一仗,二二五团损失 200 多人,团长方炳仁同志也壮烈牺牲。

打了败仗,士气低落。我们边行军边鼓动,振作士气。在东华池附近渡过葫芦河后,沿陕甘边界的崇山峻岭继续向北挺进。

没想到,我们几乎走进绝境。

越往北走越荒凉。先是峻岭中的崎岖山路,再接着走是荒草野地,不时还有小面积的沙漠。人烟稀少。饥饿和疲劳像阴影一样笼罩全军。体力弱的,走着走着就昏倒了。伤病员更艰难,药品奇缺,加之饥饿,生命力耗尽了,永远长眠在这荒野之中。

困难面前,方显红军本色。我们政治部人员采取互助形式,体力强的帮助体力弱的,年龄长的帮助年龄小的,团结一致,以顽强的意志战胜困难。全军指战员也都采取了这种形

式,党员干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出现许多让水、让粮的感人事迹。配了马匹的干部基本都把马杀了,让大家果腹。

尽管如此,部队仍处在严重的饥饿之中。想想觉得窝囊:敌人数万之众,一直打不垮我们;饥饿却成了敌人最好的同盟军,将把我们这支队伍消灭!

好在老天爷主持公道了:如有神助,恰好来了一伙赶羊的商贩。军领导如获至宝,当即让供给部把羊全部买下。部队饱餐一顿,重获生机。数天艰难跋涉后,我们终于走出了这片可怕的荒漠区。

1935年9月7日,我们到达了合水东北的豹子川(今属华池县),这已经是陕甘苏区的边缘。在这里,省委开了一次会,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调整军的领导班子。由徐海东任军长,程子华任军政委,戴季英任参谋长,郭述申任政治部主任。二是决定对全军进行与陕甘红军会师的动员教育。

9月的陕北,秋高气爽。就要会师了,我们怀着兴奋的心情继续北进。9月9日,到达保安县(今志丹县)永宁山。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得到我们到来的消息后,印发了《为迎接红二十五军北上给各级党部的紧急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立即动员起来,用各种方式欢迎和慰问远征的红二十五军。

我们在向永坪镇开进的路上,人民群众夹道迎送。到处都能看到欢迎红二十五军的标语,听到欢迎的口号,还有这样动人的歌声:

一杆杆红旗空中飘,
红二十五军上来了。
来到陕甘洛河川,
劳动百姓好喜欢。

西征北上以来,我们一直在饥寒交迫中跋涉,在生死存亡

中拼杀；现在突然看到这种充满亲情的场面，心里格外温暖，有种终于回到亲人怀抱的感觉，直想流泪。

9月15日，我们到达延川县永坪镇。

永坪镇是当时陕北较大的一个镇子。进镇前，为了展现红二十五军的风采，我们认真进行了一番准备。队伍最前面是军里几位领导；紧跟着机关和直属队；再后面就是手枪团。手枪团都是青黑色着装，腰里扎着皮带，每人背一把盒子枪和几颗手榴弹，背后还斜插一把大刀。队伍排着四路纵队前进，很威风。手枪团后面是几十名号手组成的司号队，军号擦得锃亮，拴着长长的红穗子，走起路来一甩一飘的很好看；吹号时，号手憋足了劲，不仅吹得整齐，而且极响亮，非常提精神。再后面是步兵团队。我们武器装备不错，每个营有六挺重机枪，连有九挺轻机枪。步兵排着三路纵队行进，清一色马步枪，上着明晃晃的刺刀，步伐整齐，不时喊几声响亮的口号，显得精神抖擞。伤病员和大小行李则放在队伍的最后面。

我们从镇子西面进去，山沟和大路两旁贴满了花花绿绿的标语，写着“欢迎红二十五军老大哥部队”之类的口号，还架起了三四道大彩门。道路两旁排列着欢迎的人群。

永坪镇南面，紧靠一条干涸河道。9月16日，刘志丹等同志率领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赶来和我们会师，会师大会就是在这个宽敞的河道里举行。场面十分热烈动人，两支部队指战员热烈握手，热情拥抱。几十年过去了，那个场面如在眼前。我就是在这次会师中第一次见到刘志丹的。

9月18日，永坪镇又举行了盛大的联欢会，庆祝两支红军队伍胜利会师，同时纪念“九一八事变”四周年。会场仍在河滩上，北边搭了个席棚台子，会场当中用石灰划了一条粗粗的白线。线的左边，坐我们红二十五军部队；右边坐陕甘苏区

的红军。周围几十里的赤卫军和人民群众纷纷赶来。河滩上歌声嘹亮,人人兴高采烈,会场洋溢着两支红军部队的手足情谊和苏区人民对子弟兵的炽烈感情。

到此为止,我们红二十五军历时10个月,转战万余里,胜利结束长征。这时,全军总共3400多人。

在红军长征历史上,红二十五军是单独一路,与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相比,有其独自特点。红二十五军的远征路上,虽然没有雪山草地大渡河,但同样艰难和漫长,经历了多次激战,打破了敌人重重围追堵截,不仅在途中创建了鄂豫陕苏区,自身得以发展壮大,而且在陕甘边转战,牵制大量国民党军,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并先期到达陕北,成为主力红军北上的向导。

红二十五军长征彪炳史册,是中国革命史上辉煌的一页。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诞生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唱了几十年,但当初,它的出现很偶然。

1935年9月,我们与陕甘红军会师后,为了统一指挥,进行了合编。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和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副主任郭述申。下辖第七十五师(红二十五军改编)、七十八师(红二十六军改编)、八十一师(红二十七军改编)。军团机关和直属队编有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手枪团、补充团、交通队等,全军团共7000多人。军团政治部机关,是原红二十五军政治部改编的。政治部下面设科,我仍当宣传科长。

敌人正在发动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调动了十几万兵力。红二十五军的到达，大大加强了陕甘苏区红军力量。合编成红十五军团后不久，就在劳山、榆林桥打了两个大胜仗，稳定了局势。战斗中有大量缴获，使我们的武器装备得到改善，服装给养得到补充，为中共中央和主力红军的到来创造了有利条件。

劳山、榆林桥战斗后，陕甘苏区掀起了参军热潮，部队补充了大批新兵，两次战斗中的大批解放战士也补入部队。为了加强对他们的政治纪律教育，军团政治部要求我们宣传科编写了教育提纲，派出有带兵经验的政工干部下连队讲课，同时组织了一些典型人物，现身说法，搞两种军队的对比教育。

程坦是政治部秘书长，他和我们宣传科重点负责新兵教育。

在对新兵进行纪律教育时，程坦秘书长找我，建议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编为歌曲，让大家天天唱。我完全赞同。程子华同志到鄂东北时，曾教我学过中央苏区很多歌曲，并讲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条文，具体内容与鄂豫皖红军的条文有些差别。按他的意思作了修正后，他让我印发各部队，要求指导员天天给战士讲，并在行军宿营检查执行。我们长征到陕南创造新苏区时，程子华、郑位三要我天天去部队教唱歌，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事项，我觉得太麻烦，也曾有过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编成歌曲的想法。但是，天天走路，很疲劳，没有精力，另外我没有音乐知识，也就作罢。现在程坦已把鄂豫皖原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条文与中央苏区的条文修正好了，要变成歌曲，找我商量，真是不谋而合。程坦和我一样，也不懂音乐。我们就借用了鄂豫皖苏区流行的《土地革命完成了》的歌谱，咏过来咏过去，一唱一哼，认为歌词和曲子很合

拍。唱了许多遍后,觉得可行。我们把结果向军团政治部主任郭述申报告,他也完全赞同,并让我在《红色战士报》上刊出,印发各部队。

《红色战士报》刊出了这首歌。记得开头一句是“红色军人个个要牢记”,以后改成了“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当时,我们结合新兵的纪律教育,在部队组织教唱,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因为歌词容易领会,曲调也简单,这首歌很快就传唱开来。

这支歌很快又在更大范围引起了注意。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结束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吴起(今吴旗)镇。我们打下张村驿等据点后,于11月上旬在酃县(今富县)以北地区与中央红军会师了。中央决定,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番号,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兼),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下辖第一军团和十五军团。也就在庆祝两军会师的大会上,红十五军团的官兵高声唱起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立即引起全场注意,出了点风头。会后不久,许多部队都学会了这支歌。

这首红军歌曲,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军队任务和纪律要求的变化,歌词做过相应修改。1950年,总政治部组织文艺专家对歌词又进行了修改;1957年再次修改,便成了现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数十年来,这支歌曲深受广大官兵和人民群众喜爱,对于加强纪律性,增强军队内部和外部团结,促进部队作风建设,起了积极作用。

可以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是由红二十五军先唱起来,然后在红军各部队中传唱开的。当时并没想到这首歌会流传得那样快,那样广,影响这么久远。如果这算得上是一份成绩,主要是程坦同志倡议干的,是他的历史功绩,我只是协

助,作了个“媒人”,把苏区现成的曲调往歌词上嫁接了一下。

中共中央和主力红军的到来,加强了陕甘苏区的领导,壮大了红军力量;蒋介石也因此调整部署。1935年11月下旬,红一方面军抓住战机,发起了直罗镇战役,打了个大胜仗。事后,中共中央在郿县东村召开了营以上干部大会,毛泽东同志到会作报告,对直罗镇战役作了总结。也就是在这次大会上,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同志。

会后,红十五军团转移到洛川东北旧县一带休整。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给红十五军团派来了一批中高级干部。这次干部调整量很大,军团司令部、政治部的部长、科长及各师团的政治委员、主任,大部分由中央派来的干部担任。徐海东同志党性很强,对中央的安排没说二话;原红二十五军中一些老同志不满意,因为他们大多没有得到提拔使用,有些还高职低配。但这些同志都顾全大局,没有一个人向上提意见。红二十五军干部的这种高尚品格,促进了部队团结,加强了红十五军团的建设。

到1935年冬,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益猖狂,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的危险。国民党政府却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和《秦上协定》,同时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调集重兵进行反共内战。

1935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制定了新时期的战略方针,提出:红一方面军应该把“打通抗日路线”作为目前中心任务。据此,红一方面军决定东渡黄河,开辟山西抗日根据地。

1936年1月19日,中央军委下达了《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红军开始进行东征的准备。红十五军

团进行了补充,机关人员也作了调整。军团政治部主任仍是郭述申,副主任冯文彬,宣传部长黄镇,敌工部长唐天际;组织部长和保卫局长都是中央派来的。

我还是宣传科长。和过去不同的是,以往部队每有大的行动,都是政治部起草各种政工文件和宣传教育材料,多由宣传科承办。编人红一方面军后比较省事了,这些文件材料基本都由上级下发。依据这些材料,我们对指战员进行了深入的动员和教育。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出了一次洋相。

为了做好东渡黄河的思想准备,军团政治部还利用文艺形式,宣传东征作战的意义,几位军团领导干部也都带头登台表演节目。我不擅长文艺,可是,哪壶不开偏提哪壶。政治部编了个节目,内容是表现学生参加抗日运动,其中应该有男女学生数人,男学生好办,随便抓个人就能上;女学生麻烦了,因为那时我们没有女宣传员;为了节目生动,就决定找几个人男扮女装。黄镇是宣传部长,在政治部人员集中时,拿目光到处搜寻。我那时年轻,黄镇的目光盯过来了。黄镇说:“你算一个。”我一听头就大了,连说“不行,不行,我不会演戏”。老实讲,让我上台讲几句话没问题,但是一想到要穿女人衣服,没准还得涂脂抹粉,我就觉得比杀头还受罪。我坚持不干。但是黄镇也很坚决,他说:“一定要参加。”

下级服从上级,我只好硬着头皮参加排练。排练时是穿平常衣服,虽然别扭,倒也将就过来了。正式演出了,我一个劲给自己壮胆:没什么了不起,枪林弹雨都不怕,还怕演戏!我还想起了上次画列宁像,开始也心里没底,后来不是干得挺棒吗!锣鼓声中,我出场了。也许是要演的角色离我的真实面貌差得太远,我自己也没想到,在台上刚一亮相,勇气就全没了,紧张得两腿直抖。我想坚持就是胜利。该我念台词了,

但怎么也念不出来,干脆转身就跑,逃进后台。

我把戏演砸了,台下哄堂大笑。由此我也发现,搞假肯定不是我的擅长。

火线和谈代表

1936年5月,红军西征。军团干部作了部分调整,我调到军团政治部敌工部当宣传科长,部长仍为唐天际。

前两个月,我们东征山西作战,虽然最初目标没有完全实现,但在军事政治上取得了重大成功。后为了避免与优势敌人决战,保存抗日力量,中央军委决定东征红军暂时撤出山西。蒋介石不顾严重的民族危机,无视我党提出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倡议,坚持继续“围剿”红军,还成立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共”总指挥部。中央军委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十五军团和第八十一师、骑兵团共1.3万余人,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进行西征战役。

5月14日,红一方面军在陕北延长县大相国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总结了东征作战经验,并进行了西征战役动员。我参加了会议,清楚了这次西征的战略意图。

这次西征,一是为了巩固发展陕甘抗日根据地,扩大红军队伍,而且争取和东北军、西北军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同时,也能策应红二军团、红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北上,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

5月18日,中央军委下达了西征战役命令。19日,红十五军团开始行动,经安塞、靖边,越过长城,进抵了绥远边境的重镇宁条梁镇(今梁镇)。

在宁条梁镇战斗中,我担任了一次“和谈代表”的角色。

宁条梁镇附近有个小镇子,叫小桥畔,是一个处在沙漠包围中的围寨。它成为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一颗钉子,必须拔掉。5月27日晚,我第七十三师采取奇袭办法进攻,但由于围寨墙高,又有护城河阻拦,工事也坚固,没有攻克,我军便改为围攻。小桥畔围寨内主要是当地的土顽武装,约几百人。他们在外国教堂神父唆使下,抵抗得很顽强。我军准备强行攻城,并修了掩体,挖了战壕,准备了登城云梯,还调来东征时缴获的山炮,向寨内轰了几炮。围墙很坚固,炮轰也没吓倒他们。彭德怀司令员指示,围寨一定要打开,以使我军无后顾之忧;但又不同意强攻,避免造成大的伤亡。鉴于此,军团领导决定采取政治攻势瓦解敌人。

敌工部的主要工作就是瓦解敌军,这下我们责无旁贷了。我们先安排围城部队喊话,说准备派代表到城下,要和他们协商和谈的事情。可是他们不理睬,还在放枪。

唐天际部长对我说:“你骑上马,到城下去讲,不打了,讲和,我们主要是路过,不会占这个地方。”

我骑着马直奔城下。唐天际一再叮嘱我,既要大胆,又要谨慎,要晓以民族大义,多讲团结抗日的道理。当时,夏云飞是七十三师二一七团政委,负责率部包围着围寨。事后他对我讲,看你骑马过去,很为你担心。两军交战又没停火的情况下,人家要是不相信,一枪就把你打下马来。我一心想着完成任务,根本没有考虑个人安危,胆于很大。来到城下,我就向寨墙上的人喊话,讲明双方不要打枪,不要打炮,我方先做到;然后说明我军想派人与围寨内领导人谈判,双方不必死人,争取和平解决,只要贵方愿意谈判,我们马上派领导人与贵方商谈。

过了一会儿,寨墙上出现了一个当头的人,表示愿意谈判,要我们派人到寨内具体商谈。

回来后,我把情况向唐天际作了汇报。按照军团领导指示,我又陪着唐天际一道进了寨子。他们大概想弄出点气势,人人荷枪实弹,面孔严肃。我稍稍有点担心,怕被他们抓了人质,一不高兴就砍了脑袋。没想到,见到天主教堂神父和民团武装的头头后,他们很客气。我们本来就是充满诚意,他们也并不想拼个你死我活。沟通想法后,误会解除了,谈判很成功。

随后,民团打开寨门,迎接我军进寨,还送给我们一些粮食、布匹等物资。

小桥畔的和平解决,彭德怀司令员很高兴,表扬我敢在两军阵前冒着生死危险进行谈判,还说要奖励我。我也很兴奋,暗想,不知会给什么样的奖励。遗憾的是,大概当时军务太紧张,奖励的事情没有下文,让我空喜欢一场。

1936年7月下旬,西征战役胜利结束,西方野战军转人休整备战。我们红十五军团集中在豫旺地区进行整训,军团部驻在豫旺县城的钟鼓楼。

豫旺县城是一个古老的回族民众居住的城市,有几百户居民,城墙用砖石砌成,颇为雄伟。城外有个清真寺,寺四周有围墙,围攻县城时,我们注意了保护清真寺,该寺围墙丝毫无损。从8月初到8月底,我们在这里几乎整训了一个月时间。

这时得到消息,长征中的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经过艰苦转战,冲破围追堵截,已经胜利进入甘南地区。为阻止红军会师,蒋介石也在调集兵力向甘南集结。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开展,争取尽快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贯彻“逼

蒋抗日”的方针,中共中央提出了夺取宁夏的战役计划。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我红十五军团8月31日从豫旺地区出动,迅速南下。9月中旬,进至海原以北地区,与北上的红二、红四方面军形成夹西(安)兰(州)大道南北呼应的态势。敌人也向西兰大道中、西段进军。中央军委调整部署,仍以夺取宁夏为目的。我红十五军团继续南进。10月2日,我骑兵团攻占会宁县城。10月7日,红十五军团和红一军团的部队,在会宁县城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第四军会师。10月9日,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也到达了静宁以北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领导人及第二师会师。至此,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结束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

红二十五军经历特殊:最初是红四方面军所属;尔后又自己单独一路进行了长征;到陕北后又辖于红一方面军。由于有这样一段经历,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不久,中央军委指示红十五军团组织慰问团,到红四方面军的第四军和三十一军去慰问。军团在组织慰问团时,也多派原红二十五军的干部参加。慰问团团长是唐天际,成员有五六个人,我也参加了。

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和三十一军驻兴仁堡、同心城地区。我们先到红三十一军军部,见到了军长萧克。萧克原是红二方面军的,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他调任红三十一军军长。我们分别在两个军的军、师、团领导机关慰问,看望了部分团以上领导干部。这些师团干部大多是鄂豫皖出来的老人,见了面都十分亲热。他们谈到,由于张国焘的错误,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四过雪山,吃尽苦头。在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二七九团,我还见到了同乡聂凤智,他已当了团政委。我俩的家很近,就两三公里,他比我大两岁。我曾介绍他人团,后来又动

员他参加红军。因此后来每次见面,他总开玩笑说“老上级来了”。他人很聪明,善于钻研问题,也很能打仗,我们之间的关系一直很好,只是战争年代很少见面。

出乎意料的是,军长萧克动员我们慰问团全留下来。萧克和唐天际是湖南老乡,都是黄埔军校出来的,在中央苏区两人就很熟悉,关系很好。唐天际同意留,我们也就都留下来了。唐天际当了红三十一军参谋长,其他人则分到了机关或部队。我被任命为司令部作战科副科长,科长周希汉生病,就由我代理科长。周希汉病愈归队后,我就到机要科当了科长。

这时敌军已打通了增援宁夏的通路,并将红一、红二方面军等部与西渡黄河的红四方面军主力隔断,中共中央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1936年11月中下旬,我们在山城堡地区和胡宗南打了一大仗,挫败了蒋介石的进攻计划,大振了红军军威。此后,红军主力集结在环县、定边、盐池之间地区,以战备姿态进行整训,准备执行新的战略任务。

整训期间,我曾完成过两件有点特别的任务,都是萧克军长交办的。

第一件是给红一军团送经费物资。萧军长要送一些物资和经费给红一方面军的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物资经费由军供给部准备,具体数量我不清楚。萧军长亲自写了密件,交我带上。我便率了一个骑兵班,押着五六匹驮马出发了。红一军团当时驻在陕甘交界的环县、定边地区。我们从盐池出发,一直往南走,小心谨慎,边走边防。这是陕甘交界地区,虽没有敌人大部队,但土匪不少,要防止他们截击。路上荒凉,都是山地,几十里路也难见到一个村庄。我们很少休息,兼程赶路。走了好几天,总算安全进入红一军团驻防地区,找到了军团供给部的赵尔陆。我把带来的信和钱物交给他,请他写了

收条。回来后,我向萧军长作了汇报,他很满意。

另一件事情是保护孙铭九。孙铭九是张学良卫队的营长。“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把东北军的领导权交给了王以哲。没料想一到南京,蒋介石马上翻脸,监禁了张学良,还要军法处置,东北军内部因此发生分裂,部分少壮派军官闹起事来,枪杀了王以哲。少壮派领头的便是孙铭九。打死王以哲后,又有人要杀孙铭九,东北军内部搞得很乱。周恩来副主席做了很多工作,并派人把孙铭九等人秘密送到红三十一军,让我们保护好他们。萧军长就把保护孙铭九的任务交给了我,并要求一定做好工作,保证吃好、住好,防止出事故。我不敢大意,亲自组织警卫,安排哨位,检查孙铭九的住处和周围环境。我还多次找执行警卫任务的干部战士直接交代,要求不仅要照顾好孙铭九等人的吃、住和休息,而且要防止暗杀和自戕。孙铭九他们在我们这里安全地待了些日子,时间不长,就被送到红军总部去了。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央军委根据国内和平基本实现的形势,对红军的部署作了调整,红三十一军和红四军仍在淳化、三原地区,就地转人休整。西渡黄河的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处境艰难,他们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转战,虽给青海军阀马步芳、马步青部队重大打击,但自身也受到严重损失,全军由两万多人锐减到一万来人,弹药缺乏,衣食困难,伤病员多,被困在了甘州以西和临泽以南的倪家营子地区。“西安事变”前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曾通过与国民党谈判等各种办法,以求解决西路军的困境,都没能达到目的。在西安方面局势稳定后,中央军委决定组织援西军,增援西路军。令人痛惜的是,1937年3月13日,当我们部队到达甘肃镇原地区时,得到消息,西路军已经失败了。部队奉命停止前进,就地待命整

训,收容西路军失散人员。

听说西路军失败,大家十分难过,特别是原红四方面军的老同志,更为老战友的安危担心。部队多次派人分赴西兰公路沿线直至黄河岸边,寻找西路军零散人员。大家都争着去,希望能有更多的战友归队。

援西军出发前,我从作战科调到机要科当科长。萧克军长对我说:“机要科很重要,你一定要管好,特别是电报的密码本,一定要自己背着。”我说:“我没有干过机要工作,没有经验。”萧军长说:“没什么难的,也简单也复杂。主要是机密性大,管好文件,管好人,别丢失,别泄密,收发报时别出差错就行了。”

机要科工作紧张繁忙,责任也大。后来萧军长又找我,交代了一件新任务:把几万元法币管起来,保证不丢失。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有点紧张。我让人做了两个大铁皮箱子,行动时由一名挑夫挑着;驻扎下来就放在我的办公室,与机要文件同等保管。一直没出差错。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开始正式谈判,中国也开始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历史转变。我们也作好了充分准备:一旦国共两党达成协议,我们就将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实行改编,抗日救国!

第三章 太行岁月

东渡黄河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蒋介石被迫同意国共合作，并就红军改编达成协议。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三个师，共约4.2万人。共产党领导的在南方各省坚持斗争的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

8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宣布，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等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军前敌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下辖第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

我所在的部队红军第三十一军，也和第四军、陕北红军第二十九军（另一个团兵力）、第三十军、独立第一、二、三、四团和第十五军团的骑兵团等部队一起，改编为第一二九师。师

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主任张浩、副主任宋任穷;下辖第三八五、三八六两个旅。三八五旅旅长王宏坤、副旅长王维舟,三八六旅旅长陈赓、副旅长陈再道,还编有师的教导团和五个直属营,全师共1.3万余人。一二九师的这批人马实际是刘伯承当时率领的援西军。

三十一军改编为第三八六旅。军辖的第九十一师改编为第七七一团,九十三师改编为第七七二团。军部自然就成了旅机关。旅部人员名额定得很紧,司令部只配了作战、通信、侦察、管理共四个参谋。

我的机要科长职务也作了调整。由于编制缩减,原红三十一军的司、政、后部门编余不少干部,便将这些干部组成了一个干部大队,准备送延安军政大学学习。陈赓旅长点名,让我当了干部大队大队长兼政治委员;原军直政治处主任宋普南为大队政治处主任。干部大队有400多名连排以上干部,编成三个队,每队相当于一个连的人数。各部队都在进行抗战出征前的各种准备,我作为大队长兼政委,工作很忙。

1937年9月6日,一二九师召开了全师政编和抗日出征誓师大会。

陕西三原县石桥镇附近,有片100多亩的荒地,会场就设在这里。主席台正面挂了块布,其他三面都是敞开的,围坐着一万多人的队伍。会场周围,贴了许多长条标语,红红绿绿,很有气氛。

突然下起了雨。黄土高原,秋风秋雨,这些即将和敌人展开血战的军人安然不动,神情凛然;这是抗日誓师大会,每个人都知道它的含义,会场显得格外肃穆庄严。

刘伯承师长走到主席台中央,脸色严峻,第一个带头换上了有国民党“青天白日”徽的帽子。他带领全场人员,大声宣

誓：

“日本帝国主义，它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害我们父母兄弟，奸淫我们母妻姐妹，烧我们的庄稼房屋，毁我们的耕具牲口。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

“为了抗日救国，我们已经奋斗了六年，现在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成功。我们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上前线去杀敌。我们拥护国民政府及蒋委员长领导全国抗日，服从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严守纪律，勇敢作战，不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不把汉奸完全肃清，誓不回家！

“我们是工农出身，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替民众谋利益，对友军要友爱，对革命要忠实，如果违犯民族利益，愿受革命的纪律制裁、同志的指责。谨此宣誓。”

刘伯承师长每念一句，我们都跟着大声呼喊。黄土高原上空回荡着愤怒的吼声。

在此之前，许多人对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想不通。十年内战，国共两党军队生死相搏，一下子要改编，思想上很难转过弯子。不少人怨气很大，有的动了感情，要离队回家。思想教育成了紧迫问题。我们干部大队通过党支部的工作，发挥党员骨干的积极作用，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保持了部队稳定，没有出现逃跑、开小差的。

对于部队思想上转弯子的问题，刘伯承师长和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刘师长多次深入到指战员中，反复宣讲形势任务和红军改编的意义。他说：“红军改编了，我们就可以高举抗日旗帜，可以不打内战而达到一致对外、集中力量打败侵略者。打不打日本帝国主义，是个原则，又是个试金石，中华民族每一个人都要接受它的考验。这是顺民心、达民意的

大道理,思想上应该通,不通也得通。”

有些同志担心,红军改编成国民军,会被人家架空,并借机整垮红军。刘师长说:“这种担心是正常的,但不要紧,我们名义上叫八路军,实际上还是红军,仍然是共产党领导。上有毛主席、朱老总,师里还有我。全国人民支持我们,国民党要搞阴谋,那是指挥不动我军的。”

有些人对戴上“青天白日”徽的帽子非常不痛快,说,我们从鄂豫皖打到川陕甘边区,千难万险,九死一生,就是为了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来打去,自己也成了国民军了,感情上过不去。我们进行了说服教育,大家眼睛亮了,气也顺了。

军事训练方面,干部大队进行了投弹、射击、土工作业和夜间战术技术的演练。部队中大多数人来自南方,不熟悉华北情况,我们就设法搞些华北兵要地志资料印发给大家,并请人介绍华北地区老百姓的风俗习惯,便子指战员平时生活和行军作战需要。

9月上旬,我接到通知,到一二九师师部去任职。

我赶到一二九师。司令部参谋处长李达接待了我。李达曾到过三十一军,早就认识我。我也因为过去曾到援西军司令部开会,接触过李达等领导。他们还通过萧克军长了解过我的情况。这次调动,实际上就是李达要我去的。

我的新职务是秘书处主任。

9月中旬,华北局势十分危急。日军占领北平和天津后分三路大举进攻,一路沿平绥铁路向西进犯,一路沿平汉铁路向南进犯,一路沿津浦铁路南下。国民党在华北有70余万军队,节节败退。中共中央对局势的分析是,未来华北抗战局面,只能依靠我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来赢得胜利。遂决定:八路军的三个师分别进驻恒山、五台山、吕梁山和管涔山地区,

形成向敌占交通线和中心城市四面包围的态势,有利于相互协同,扩大回旋余地,保持战略主动,迅速实现战略展开,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

1937年9月16日,一二九师移驻富平县里庄镇。10月6日,全师经韩城芝川镇赶到风陵渡,准备从这里渡黄河。风陵渡黄河河面宽约2000米,水流湍急,老远就能听到咆哮声,极有气势,让人想起“黄河之水天上来”的诗句。我们赶到时,先遣部队已经备好一些船只、木筏和羊皮筏子,请了一批船工和水手驾舟,协助我们摆渡。师首长分开渡河,张浩主任断后,我跟着他最后一批渡河。

周恩来副主席当时正在太原,与国民党协调八路军在山西的作战任务。刘伯承师长和徐向前副师长赶到太原与周副主席会合。我们则由张浩主任带领,在侯马站登上敞篷列车,沿同蒲路北上,到达太原。在太原停了一天,我陪着张浩主任,见到不少在山西的国民党达官要员。

不久,徐向前要去五台山,需要参谋人员。我便带了司令部的参谋和警卫排的人员跟随去了。

五台山是我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过去我曾听说过杨五郎出家上五台山当和尚的传说,这次却有了机缘,能看上一眼。五台山的五个峰顶都是平台,因此得名。和尚给我们介绍,五台山建于东汉永平年间,鼎盛时有寺院200多座,现在仅存40余座;每座寺院各有名号,建筑十分精美。时间太紧,我们只能走马观花。印象深的是一尊叫文殊菩萨的佛像,文殊菩萨骑在狮背上,有八九米高;还有“开花观佛”,用人工徐徐打开荷花莲瓣,就出现四个方井,颇有风趣。

这些年来,一直忙于战斗,很少有闲情逸致。想到这些美仑美奂的古代文明,将笼罩在战争炮火的威胁下,不由得更增

加对侵略者的愤慨,激起誓死保家卫国的斗志。

七亘村战斗

我师东渡黄河后,刘伯承师长率先头部队第七六九团,于1937年10月10日进抵五台县东冶村。

这时,日军经雁门关南犯,攻陷了代县、原平,继续向忻口进攻;经保定南犯的日军,已攻陷石家庄,继而向娘子关进攻,太原已处在日军包围之中。不过,日军的交通线已被我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〇师切断。我师的任务是在娘子关地区配合友军,阻止日军向太原攻击。

10月18日,我师三八六旅和三八五旅第七六九团进抵平定县东南地区。沿正太线西犯的日军正猛攻娘子关;旧关已落入敌手。守卫娘子关的是川军和阎锡山的部队,有数万兵力。我师部署在娘子关东南,于日军侧后寻机歼敌。我们一边侧击、阻击日军,一边收容溃散的友军。

七亘村战斗之前,我师已打了两仗。一仗是10月19日徐向前副师长指挥七六九团夜袭日军阳明堡机场。团长陈锡联以第三营为突击队,偷渡滹沱河,隐蔽进入机场,距机群约30米时发起猛烈攻击。经一小时激烈战斗,将24架敌机全部炸毁,歼日军警卫部队100多人。这是一二九师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10月20日,又打了长生口战斗。这两仗震撼了山西友军,也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

七亘村位于太行山中部,在山西、河北两省交界处,是井陉、平定、昔阳三县交汇点。太行有“八陉”,井陉就是“八陉”之一。井陉有两个大门可穿过太行山:北门为娘子关,南门就是七亘村。七亘村四面环山,峡谷陡峭,沟梁纵横,道路险峻,

是屯兵设卡要地。七亘村边有一条不足两米宽的村道，道南是一溜大坡，高有十多米，道北则是几十米深的深沟。远远看去，这条道路好像悬在半山腰上。

10月25日，吃过午饭，刘伯承师长带参谋人员去七亘村观察地形。这是刘师长的老规矩，战斗前只要有可能，都要亲临实地，掌握第一手情况。我带上20多名警卫人员跟去了。没想到这次很危险。

到了七亘村附近，忽然对面传来枪声，越来越近，山谷口冲出一股日军，向我们猛烈射击。刘师长当即命令还击，打退了敌人。过了一会，又来了一架日军飞机，在我们头顶上盘旋。大家劝刘师长早点离开，刘师长却像没事一样，仍然镇定地继续察看地形。这次出发前，参谋处长李达曾指示我，要寸步不离刘师长，一定要保证安全。我暗自捏着一把汗，死死盯住敌机动静，一旦需要，我就准备用身体挡住敌机的扫射。

好在有惊无险。七亘村是日军第二十师团进犯平定、太原的必经之路，地形利于设伏。刘师长决定在这里伏击日军。

当天下午，日军第二十师团开始向平定方向进犯；其后续是辎重部队，1000多人，在距七亘村10公里的测鱼镇宿营。刘师长命令七七二团副团长王近山带领第三营设伏在路南的土坎上，任务是切断日军第二十师团的交通，夺其辎重，歼灭敌人。

26日拂晓，七七二团三营进入伏击地区。第十一连的阵地设在村南通向平定大道的南侧，第十二连及团特务连一个排在道北坡上占领阵地，第九连、第十连为预备队，控制七亘村南侧高地。各伏击部队的位置，距大道最近的只有一二十米，远的也不过四五十米。

9时左右，日军掩护部队200余人，先通过了我军伏击

区；辎重部队见没动静，便跟进到了我军伏击区；其后尾掩护部队 100 余人，则还在东石门地区姗姗而来。刘师长命部队突然发起攻击。在一阵机枪、手榴弹的猛烈袭击下，敌人大乱，仓皇向东石门回逃，又遭我军截击。不到两个小时，战斗结束，共计毙敌 300 余人，缴获骡马 300 余匹和大批军用物资。我军仅伤亡 30 余人。这一仗，干净利落，打得非常痛快。

仅过两天，我们又在七亘村打了一次伏击。

师首长分析，日军西犯，急需补给，其后方辎重部队肯定需要继续西进；而一旦西进，就别无选择，只有走七亘村这唯一的道路。这就为我军再次设伏提供了机会。

果然，28 日晨，测鱼镇日军辎重部队，在 100 余名骑兵和 300 多名步兵掩护下，再次出动西进。我们提前已经探知情报，又设了埋伏。日军虽有警惕，但没想到仅过两天我们会再次设伏。上午 11 时，敌先头部队通过我伏击区时，并没发现我们。等辎重部队进了伏击圈后，我们突然展开猛烈火力攻击。敌人这次比上次准备得充分些，掩护火力很强，一时未能将敌打乱。天不作美，战斗到黄昏，下起大雨，支援部队也没赶上参战。敌一部向平定窜去，后续部分逃回了测鱼镇。这次战斗毙敌 100 余人，缴获骡马数十匹，我军伤亡 20 余人。又是一个胜仗。

10 月 26 日，娘子关失陷。10 月底，日军先后占领了阳泉、平定，沿正太铁路及南侧几条主要平行的大路向榆次、太原逼进。

八路军总部率部从五台山地区进至寿阳以南地区，我一二九师奉命率第三八六旅转至昔阳附近。11 月初，在刘师长指挥下，又在昔阳以东的南、北界都和黄崖底，打了一场伏击日军的战斗。

刘师长判断：日军第一〇九师团第一三五联队的一个大队，由九龙关进犯昔阳，必然要经过南、北界都和黄崖底。这一带是河谷山间地形，便于设伏。决定命三八六旅的七七一团埋伏在黄崖底以南凤居村，七七二团埋伏在黄崖底以东巩家庄，师指挥所设在黄崖底附近。

11月2日，日军的一个大队进入我伏击区，我军集中机枪、迫击炮猛烈杀伤敌人，三次打退敌人向我阵地的冲击。此役共击毙日军300余人，射杀及缴获战马200余匹，我伤亡30余人。11月4日，七六九团先后两次配合第三四三旅在昔阳的广阳以西伏击日军，毙、伤日军300余人，射杀及缴获战马60余匹。11月7日，我师三个团与一一五师主力又一次在广阳、户封地区设伏，毙、伤日军250余人。刘伯承师长把这三次成功的伏击战称作“重叠的待伏”。

一二九师抗日初征时的这些战斗，我一直在刘伯承师长身边，耳濡目染，受益良多。刘师长的大将风度，统帅之才，让人肃然起敬。刘师长用兵足智多谋，机动灵活，富于创造性。他非常重视战前准备，把“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称作“五行”，常对我们说：“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只有“五行”做好了，才能下决心，定计划。他还非常重视通信联络，说：“没有通信联络，就没有指挥”。连日本军事家及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刘伯承“确实厉害”，是“神机军师”。但刘师长从不居功自傲。他常讲，你虽然是个大指挥官，有很大的权威，一个口令可以使成千上万人稍息立正，但这些都是党的指挥，党的权威，人民群众的信任，个人没有什么可骄傲的，你头脑一发胀，那就危险了。几年后的1942年，刘师长50寿辰，陈毅曾写诗祝寿，其中有两句评价，“论兵新孙吴，守土古范韩”，我觉得恰如其分。

八路军初征的几次胜仗意义很大。它使日军西犯行动受到阻滞,打乱了日军的迂回部署;解救和掩护了国民党军队行动;还使太行山区的人民群众感到共产党八路军才是抗战的依靠,对于鼓舞群众的抗日热情,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

在国民党一些将领眼里,我军是“土八路”,没什么战斗力。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曾说游击战在抗日战场无济于事。可我军运用游击战取得了一个个胜利,给他以响亮的回答。刘伯承师长集中了一批日军的战马、军刀和大衣、军毯,送给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卫亲自过目收下。卫对刘伯承指挥的七亘村连续伏击战,叹为奇迹。

与此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民党在山西的数十万大军却在日军进攻中,稀里哗啦向南撤退,一直退到晋南中条山、黄河以南地区,山西、河北等地已见不到国民党的部队了。

1937年11月上中旬,太原、上海相继失守,华北形势进一步恶化。

11月11日,中共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在晋西南洪洞县马牧村召开北方局地下党和八路军高干会议,各师的主要领导出席。一二九师由刘伯承师长出席会议。我带警卫排负责保卫刘师长去会议地点。

这次会议是传达毛主席关于太原失守后,我党我军坚持华北敌后抗战问题的指示,要求各部队尽量分散到各地,组织群众,创建根据地,发展武装,打击汉奸,坚持独立自主,准备力量对付日军的进攻。

会议结束,刘伯承师长告诉我,蒋介石要在洛阳召见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还有三个师的师长林彪、贺龙、刘伯承,随员和警卫不用跟去了,警卫工作统一由总部负

责安排,叫我留在原地待命。

1937年底,一二九师在晋东南实施战略展开。

全师派出十几个小分队,每个分队十几个人,由干部和老兵组成,深入到正太路南侧的太谷、榆次、寿阳、昔阳、和顺等地。他们像种子一样撒在那里,生根开花,很快组成了600多人的游击队。徐向前副师长将他们合编成一二九师的第一个游击支队,叫独立支队。师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穷、组织部长王新亭、宣传部长刘志坚等,也都亲率工作团和步兵分队,分别到沁县、长治、陵川、晋城、武乡、平顺、安泽、屯留等十多个地区开展工作。张贤约、桂干生各带师教导团的学员干部,到平定公路以东、正太路以南、平汉路石家庄至内丘以西的晋冀地区。七七一团和教导团各一个连到辽县以南、邢台至磁县以西、漳河以北的冀豫地区。太行南部地区、黎城榆社地区,也分别派去了干部及小批部队。

这些部队一到那里,就广泛发动群众,成立了各种群众抗日团体,如“战地动员委员会”、“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等。在县、区、乡建立了抗日政权,组织了城市工人和乡村农民的游击队,进行地方武装建设。同时,扩大我军,由原来的一个班、一个排、一个连的兵力,逐步发展壮大成为几十人、上百人甚至上千人的队伍,后来变成战斗旅和军分区的主力部队。

护送邓小平政委

一二九师司令部秘书处实际上就我一个秘书主任,底下没有一个秘书都没有。那个年代,首长不配秘书,刘师长也没有秘书。

秘书主任主要干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管机要科,兼任机

要科长；二是管队务科；三是负责司令部来往客人的接待，包括接待地方上党政领导人，还有国民党来联络的军政要员、地方官员。队务工作主要管人、马、武器装备的统计和队列编制。人马统计是重要机密，列入秘书主任工作范畴理所当然；但我最主要、大量的工作还是机要。

机要工作非常繁重。八路军到华北敌后抗战之初，是大发展时期。部队除作战外，就是分散到各地开展群众工作，创建抗日根据地。上至总部、中央和军委，下至各旅、团，特别是派遣到各地开展工作的部队，相距往往百里千里之遥，靠徒步、骑马送信都不行，基本依靠无线电台。战事频繁，主要靠电台指挥部队。

我有时还要代首长草拟电文。工作量很大，晚睡早起。我有沙眼，因为睡眠少，沙眼病更重了，刘伯承师长戏称我是“沙皇”。

秘书主任还有一项任务，就是跟随师首长外出开会或下部队。既当秘书又当参谋，同时负责首长安全。

这段时间，机关不少同志下到旅、团担任领导去了。我也想到部队去带兵打仗，但一想到机要工作的特殊性，又难以开口。首长不提，我也不说，同时要求自己尽职尽责，干好工作。

这时，我第一次见到了邓小平同志。

1938年1月5日，中央军委任命邓小平为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张浩主任调回延安。我在洪洞县马牧村八路军总部接受了警卫邓小平政委到辽县一二九师上任的任务。和邓小平政委同行的还有彭真同志，彭真同志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

从马牧村出发时，总部搞了两台汽车，全部人员都坐车出发。这是两台烧本炭的卡车，日本造，质量很差，走着走着就

抛锚。幸好几个司机都是老“把式”，总能对付着开动。

离开总部时，我问总部管理人员，我身上没带一文钱，路上吃住怎么办？管理人员说他也不知道。我一时想不出办法，就匆匆忙忙上路了。

我们一路要经曲沃、冀城、阳城、晋城、高平等地，才能到达长治。山西的路窄窄的，坑坑洼洼，走了三天，才好不容易到了长治。这几天吃饭住房都由彭真安排，他是山西人，地方政府人员比较熟，走到哪个县，都有人招待吃住，而且吃得好，住得好，我们警卫人员省事省心。到了长治，彭真就到了目的地，不跟我们走了。这下我抓瞎了。

我们继续坐汽车到了武乡县。武乡县没人接待，我紧张极了，邓政委的行动要保密，不能找县长。我在武乡东村找了一家地主的房子，先请邓政委住下来。吃饭问题却无法解决，我真后悔，出发时要是从师部领点钱就好了。我只好硬着头皮报告邓政委，说身上一文钱都没有，首长吃饭的事不好解决。

邓小平政委瞅我一眼，说：“我身上有钱，你同我一起去吃，其他人你找村干部商量。”

没有解决首长吃饭的事，哪能还用他的钱吃饭。我说：“邓政委，你带你的警卫员去吃饭，我和其他人员找村长安排。”邓政委同意了。

晚上，我们挤在一间房子里。大家路途辛苦，很快睡着了，我却难以成眠，想着明天怎么搞，尤其是汽车千万别出事。天还没亮，我就提前起来，看司机发动汽车。果然汽车发动不着，捣腾好多遍，司机垂头丧气地告诉我，汽车坐不成了。

请示邓政委后，我去县政府找马。县政府一个负责人说：“马不好搞，只能解决四五匹。”我带回四匹马，请邓政委和警

卫员骑马先行,其余的徒步行军。剩下的都是山路,不算太远,只一天时间便赶到辽县西河头一二九师师部。

邓小平政委受到刘伯承师长的热烈欢迎。刘伯承、邓小平从此便战斗在一起,统率着一二九师这支无敌的钢铁大军。

1938年2月,第一二九师在刘、邓、徐首长部署下打了长生口、神头岭和响堂铺三次伏击战。

2月22日攻击长生口敌旧关据点。井陘日军闻讯,出动200余人,乘八辆汽车来援。进入我设伏地区后,我伏击部队即突然发起攻击,激战五小时,歼敌130余人,击毁汽车五辆,缴获迫击炮三门、机枪和步枪50余支。

3月16日,七六九团和第三八六旅的三个团在潞城东北设伏,打了神头岭之战,全歼潞城援敌1500余人,击毙与缴获骡马600余匹,缴获长短枪550余支。

神头岭伏击战是刘伯承师长亲自勘察地形,与邓小平、徐向前共同制定作战方案,并经朱德、彭德怀批准,由刘师长亲自指挥的。刘师长以七六九团袭击黎城,吸引潞城敌人来援,主攻部队在神头岭三面埋伏。他知道潞城的敌人有3000多人,如果全部来援,我方尚不能形成优势。令七七二团派一个连在潞城背后袭击,使敌不敢全部出动;而出援的一半人,恰使我集中三个团形成了优势兵力。这一仗是“吸打敌援”的最好战例之一,日军也把它称为八路军的“典型的游击战”。

3月31日夜,在邯长公路上打了响堂铺战斗。邯长公路是日军的一条重要的交通运输线。刘、邓、徐首长认为,在东阳关和涉县之间的响堂铺一带是比较理想的打伏击的地方。26日,邓小平和徐向前率部从下良出发,31日凌晨部队进入伏击地区。日军第十四师团辎重部队于9时完全进入伏击区。激战两个多小时,摧毁敌运输车队,焚毁的大卡车就有

180多辆,击毙日军400多人,还缴获了很多武器弹药和物资给养;师部机关组织了400多民夫、驮驴去打扫战场。4月2日,刘、邓、徐签署了《响堂铺战斗详报》,我用电台发给中央军委和朱、彭总副司令。

八路军打的这几仗很漂亮,日军便调整计划,准备集中力量对付八路军。4月初,日军3万余兵力,对一二九师和太行根据地发动九路围攻,从东南西北四面进犯,企图围歼一二九师主力。

获悉这一情报后,一二九师进行了积极准备。4月2日,刘师长率主力移师辽县以南的西井和南北委泉、源泉一带;邓小平政委则暂留辽县师后指,组织群众,整顿游击队和地方武装。我跟随邓政委留在后指。

邓政委从师政治部抽调了一批干部,协同地方县政府组成反围攻总动员实施委员会,召开各抗日救亡团体联席会议、村民大会等。动员群众“空舍清野”和“抗日戒严”,要求老百姓把牲口、家畜赶进山,把粮食和生活用具运走或埋藏起来,连水井都掩埋伪装,让敌人无法立足。破坏道路,改造地形,增加敌人行动困难。还解决了一批敌特、汉奸。

邓政委非常忙碌,出席各种会议,深入到群众中去做工作。有时派我去检查一些地方的工作落实情况,有的人没有到会,便让我代表他传达任务、部署工作。邓政委于4月11日赶到桐峪镇师部,与刘伯承、徐向前共同指挥反围攻作战。

历时26天的反敌九路围攻作战,在刘师长、邓政委及徐副师长的亲自指挥下,运用阻击敌人、打乱敌之部署、寻机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等战略战术,粉碎了敌人的围攻,且收复了19座县城。国民党部队也有几个师参战,但大都不战而退,

向豫北和中条山转移了。我们便进一步在晋东南、晋冀豫、太北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为以后向平原地区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1938年7月,我调师政治部担任宣传科长,代理部长。

那时,不断有新部队组建,老部队也扩大了很多,司令部的科长们基本上都到部队去了。我心里又开始活动,想去带个大队、支队,到第一线打仗。我向组织汇报了这个想法。回答说:不行,现在还不能离开机关。也给我说明了原因:当秘书主任和机要科长的,知道许多高级机密,不能马上离开领导机关;师政治部急需人,那里的很多人也派出去了,还要我去管政治部的行政工作。我愉快地服从了。

政治部编了一个刊物,刘伯承师长定名叫《抗日战场》,是油印件,就我们部里几个人负责编辑、刻印和分发。我们几个都算是红军中有文化的人,但也只是中小学的底子,较费力。后来地下党送来了几个大学生,对编杂志、写新闻电讯等起了大作用。

刘师长和邓政委对《抗日战场》很重视,他们还常在上面发表文章,谈游击战略战术问题,谈抗战形势和部队政治思想工作。我也在这个刊物上发过几篇文章,多是检查部队工作的总结和经验教训。我还有一项任务,就是每半月至一个月左右要写一份供连队指导员早晚点名的讲话材料,讲形势、任务、政策和各方面的注意事项等;而这个材料要经邓政委审查签发。我写的这些东西,有的邓政委看一遍后就签发了;有的要修改;有的不行,邓政委就亲自重写。

每期《抗日战场》上,我们都要转发毛主席、党中央的有关指示、文件,登一些宣传提纲和讲话材料,既供各级领导干部学习,又供他们宣传、讲话参考。部队战士要了解国内外大

事,主要靠听指导员讲话。指导员天天要讲话,天天要有新内容。可指导员的政治理论水平普遍不高,肚子里没货,又要天天讲,讲讲就“空”了。《抗日战场》给他们解决了大问题。我体会到,文章不可太长,太长了大家没工夫看;文章要抓重点、要点,观点要明确,事件写清楚,文风要正;另外,文章不怕改,甚至重写,改一次进一步,重新写就是进一大步。

除《抗日战场》这个定期刊物外,我们还根据部队任务需要,编印一些专题专用的材料,下发连队。如《临时紧急教材》、《抗战宣传手册》、《日军厌战材料》等等。《临时紧急教材》主要是为准备某一战斗、某项政治运动而编写,把这次战斗的敌我情况、战场地形、注意事项等要点编印下发,为参战部队提供资料。《抗战宣传手册》通常是为某项政治运动而编写,提示宣传要点是什么,口号是什么,如何贯彻执行,碰到疑难问题怎么办等。《日军厌战材料》则是对缴获日军士兵的信件加以翻译,摘录选登,如日军士兵告诉家人,说“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很厉害”,“中国的普通村民都反对我们”,“在中国,我们随时都可能阵亡”。信中,日本士兵还哀叹“交通给养困难,在村庄里找不到粮食,常常饿着肚子行军打仗,连过日本陆军节也只能吃到小米饭和豆酱汤。”日本士兵的家属来信,也是一些反战、厌战的内容,说家中也是饥饿困苦,政府统治很厉害,没有自由。这些材料,从另一侧面教育了我军指战员。

我们工作条件也很艰苦。膝盖、背包、石碾盘就是桌子,晚上有盏马灯就相当不错了。煤油金贵,发放都有明确规定,常不够用;我们就自己想办法,用灯草加上棉子油点灯,灯火如豆,伴到天明。抽的是土烟,谁要有根卷烟,就你一口我一口地分享;谁要是支钢笔,就是奢侈品,完全有理由在同事

面前骄傲一下。艰苦环境中,大家团结友爱,日子过得相当愉快。

一二九师实施第二次战略展开后,刘师长、邓政委常到鲁西、冀南地区去指导部队工作,我也经常跟随他们活动。一次,我随邓政委到邢台地区检查工作,地方党送来了一布袋现洋。邓政委叫我清点一下。我很少摸过银元,更不用说一下子这么大一堆,眼都看花了。我很认真地一块一块数起来,数得很慢。邓政委笑了,说:“看来你真是穷人的孩子,没见过银元。”他教我先用10元擦成一柱,其余的比着堆就行。我如法炮制,很快就数完了,正好400元。

太行党校

太行党校是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办的,朱德总司令兼任校长。1938年春,党校开办了第一期,我曾要求去学习,组织没同意。到了冬天,开办第二期,组织上让我去了。没想到去了之后,我却连续参加了两期。第一期当学员,第二期留校当总支书记。

国内形势又有新变化。武汉、广州在同年10月相继失守;日军由于战线过长,兵力分散,速战速决已成泡影,就改变策略,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进攻;中国抗战进入了毛泽东主席所预言的战略相持阶段。国共两党的合作也出现新问题。国民党在五届五中全会上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9月下旬至11月上旬,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的战略方针与任务。会后,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

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立场。

正在学习我党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时候，我接到通知，去太行党校住学。

我报到时，第一批学员已毕业了，第二批学员正陆续报到。第二期学员有100多人，多为八路军的旅、团级干部；这些人在前线都是很能打仗的战将，有很高声誉。能和这些人一起学习，我很高兴。

党校每期学习时间为四至五个月。课程主要是政治理论和联共党史；也讲授一点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哲学等。除了政治理论学习，党校还安排了军事课，主要内容是八路军的军事原则、战略方针、游击战的战术原则等。教授方式大都为上大课：选一块村头空地，学员席地坐，教员站着讲，人家一边听，一边记笔记。大课后，组织讨论，集体复习。有时，为了某个问题，大家会争得脸红脖子粗，最后请教员出来当“裁判”。这种学习方法气氛热烈，讨论深入，效果不错。

1939年春暖花开时，学员们结业了。

太行山环境比较稳定，有大片根据地，敌人“扫荡”也少了。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决定继续开办党校第三期，并扩大学员人数。

我被留下来当党校总支书记。党校工作人员和机构极少，没配政委，也没政治部，连校务部也没有，只有个管理科。作为总支书记，我要负责党校的全面领导工作。

党校第三期学员有200多人。学员中地方上有县、专署子部，军队有晋东南、太岳、冀南、山东等地的八路军旅、军分区级干部。都是相当一级子部，每个学员都带有警卫员、马和马夫，加在一起近千人。整个学校的学习和生活管理相当繁重。上级要求做到学习好、思想好、管理好，要理论、思想双丰

收。我感到压力不小,很认真地动了一番脑筋。

我先抓党组织建设。从党员抓起,建立党小组、党支部;从学员中选任小组长和各支部书记。每周开小组生活会,每月开支部大会;有事就召开党的会议来讨论解决。

其次抓生活管理。有一批在地方干游击队领导的干部,穿得好,马也好;他们的警卫员、马夫都很活跃,要求高。我们就尽量把生活搞得好一些,让他们满意。同时还强调勤俭朴素的作风。我们常到附近襄垣、武乡等县、乡背粮担菜,来回一趟要一整天。我和管理科的人都去背粮担菜,主要是小米和白菜、萝卜。有一次,为了进行劳动锻炼,全校学员都去背粮,每人15公斤,走几十里路。这些学员已经较长时间没干过这种重活了,回去就累坏了。以后背粮担菜,只好让他们带上马匹,实在走不动,就以马代步。

在行政管理上,我们采取学员自我管理的办法。由学员来当队长、班排长,学员管理学员。这样我省了不少力。

负责授课的教员有陆定一、李大章和杨献珍等同志。陆定一讲联共党史的哲学部分,主要讲唯物辩证法。杨献珍讲联共党史其余各章,他的课有课本,就一章一章地讲。李大章是北方周的宣传部长,讲授中国革命史。还有一个讲社会发展史的教员叫张衡宇,是山西地方党组织的工作人员。周桓同志是八路军前方总政治部组织部长,负责讲党的建设,有时工作忙,不能按时上课,我也偶尔代他讲课。

这一期学员里有陈再道、文建武、王新亭、王近山、谢富治等,他们当时都是省、军区、旅一级干部;还有张经武等地方区党委、专署干部。他们资历老,职务高,可文化程度不行,有些课听不懂。特别是陆定一同志讲哲学,本来就难懂,加上他口音重,更不好懂。比如他讲托洛茨基,听到大家耳朵里就变成

了“兔子吃鸡”，经常弄得哄堂大笑。当然也有些特殊情况，如陈再道司令员在延安学习过好几年，有些东西已经学过，课堂上很难坐得住，我就让这些同志多搞些自学，请教员给他们上小课，给他们创造机会，掌握更多理论知识。只要有机会，我也跟着听课，这是再次听讲，好多了，许多基本理论进一步加深了理解。

我还注意把课堂学习和社会调查联系起来，组织学员到长治、襄垣、武乡农村去，自己带行李，到老百姓那里宣传抗日道理，了解当地社情。

在党校第三期工作中，我很努力，学员对我很满意，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也对我工作充分肯定。1939年9月中旬，这期学员结业了，我写了一份总结报告，在北方局党的刊物上登载了。

北方局领导认为第三期办得不错：工作人员很少，学员多，而且是军队、地方的同志在一起，圆满地完成了学习任务，不容易，应该很好总结一下。同时，北方局希望我能留下来，在党校继续工作，或者到八路军前方政治部组织部工作。

经过交涉，一二九师要我回原部；征求个人意见时，我也愿意回原单位。这样，我便结束了党校的工作，返回了一二九师师部。

在师供给部

从党校回师部后没几天便接到任命，调我到师供给部当政治部主任。供给部没有政委，主任就相当政委的角色。

离开师里的这段时间，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日军重点打击华北八路军，对晋东南地区加紧了“围攻”、“扫荡”。我一

二九师部队和根据地人民进行了大小战斗百余次。国民党也不断搞“磨擦”。我党我军针锋相对,进行了反“磨擦”斗争,对反共顽军朱怀冰等部给以打击。

坦率讲,我不愿留在北方局党校或总部机关工作,还是希望在战斗部队从事军事工作。没想到事与愿违,回来却要干后勤工作。但组织意见已定,我只好走马上任。

一二九师供给部是个大摊子。红军改编以后,我们能从国民党政府那里领到一些军饷和军需物资。到太行山以后,我们陆续收到一些物资,主要是弹药、服装、医药和工兵器材等。部队携带不了的,就藏在群众家或深山密林中。战斗频繁,消耗很大,靠国民党政府的供应显然不够,且很不及时;我军的补给很大一部分要靠自己筹措。后勤供应工作显得相当重要。

我提前已经了解到,师供给部的兵站、仓库、医院和物资散在各地,经管保存得不好,损失不少,加之敌人“扫荡”破坏很大,需要整顿。供给部机关驻在师部附近的涉县束堡镇,部长施作林是位红军干部。政治部机关人不多,有组织科长邓易非、宣传科副科长黄自强、政治部秘书魏民思,还有保卫科长、民运科长,名字记不住了,各科还有几个干部。

我先熟悉情况,到各单位走走。供给部分布在方圆数百里,我选择了一些重点单位。

我骑着马,由一名干部陪同,看了被服厂、军械修理所和一些仓库。仓库储存的物资多为粮食、棉花、土布,也有不少枪械、弹药、生产机器、油料和用子照明的煤油,还有核桃、花生、柿饼、山枣、药材等各种山货。我还看了些生产作坊,如粮坊、油坊、染织坊等和小店铺,接触了干部、战士和工人、民工。

跑了一些地方后,发现不少问题。有些干部事业心差,不

关心工作,贪图安逸,部队管理松懈,存的枪支全都生锈了。跑的地方越多,越发现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跑了一个多月后,路过师部,我顺便坦率地向刘师长和邓政委汇报了情况和看法。

师供给部长施作林对我有意见,怪我没和他商量;财务处长同施作林思想一致,帮施说话,反对我的意见。刚到一个新单位,主官之间就发生矛盾,这是我不愿看到的,可我也很固执,不想为了表面团结而损害工作。师里调查了解情况后支持了我的意见,施作林被调走了。不多久,他叛变投敌。

在刘、邓首长支持下,我着手对供给部进行整顿。

我首先把所有基层单位党支部建立起来,原有的支部加紧健全,使支部生活正常化。为解决基层单位党员少的问题,半年时间内新发展党员 70 多名,特别在被服厂、修械所这些地方人员较多的单位,注意壮大党员队伍;清除了 20 多名贪污腐化分子,作为反面教材教育大家;同时,表扬了一批优秀共产党员。

我又抓了干部战士的思想教育。后勤干部实行九天工作一天学习的制度。我们采取自修和上课的方式组织学习。学习材料主要有《联共党史》、《中国革命现代史》、《新民主主义论》、《大革命》等。上课主要是讲《连队政治工作暂行条例》、《国际形势报告提纲》等。坚持每天给战士上一次政治课,一次文化学习课,建立点名、讲话制度。后勤战线青年较多,约占人数三分之一。有青年团组织,分成了 24 个青年队,每队分三个小队。当时就有了发挥青年队“第二堡垒作用”的提法,青年队成为党支部有力的助手。

再就是建立健全工会组织。后勤单位工人多,用工会组织把他们团结起来。

我还认真抓了俱乐部和救亡室工作。我认为这个工作很重要,是鼓舞士气、活跃部队的有效方法。有的俱乐部可以演出多幕剧,经常开展墙报、歌咏等活动,部队和地方人员都很欢迎。连队也建立了开晚会、搞会演、歌咏比赛等制度。不到半年时间,供给部工作有了改观。

1940年6月,一二九师根据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指示进行了整编,把边区纵队供给部和师供给部合并,统一归师。虽然组织上有些紧缩,大小单位还相当多,计有供给部、监护连、供给学校、师直供给处、修械所、师直被服厂、军用经济处等33个,全部人数2055人。

8月20日,八路军对华北日军发动“百团大战”。由彭德怀副总司令指挥。一二九师部队在刘、邓首长率领下奋战于正太铁路之阳泉至榆次段,平汉铁路之元氏至安阳段,同蒲铁路之榆次至临汾段,白晋铁路之平遥至壶关段,以及邯(郸)长(治)公路等。战役后勤由供给部保障,一般物资由各部队自己解决。部队在前线打仗,供给部夜以继日生产和调运军需物资。在战争环境十分艰苦的情况下,1940年秋收,我们产的谷子、麦子、玉米及大豆共51.7万斤,各种菜蔬如南瓜、萝卜、山药、辣椒等4.8万余斤。

9月10日,“百团大战”取得了第一阶段重大胜利,给日本侵略者以极大打击,也给国民党投降派当头一棒。甚至连国民党也说自己是“不游不击”,而八路军是“大游大击”。

“百团大战”第二阶段,八路军继续袭击交通线两侧的日军,摧毁深入根据地的日军据点。由于日军已有准备,八路军在连续作战中过于疲劳,又缺乏攻坚手段,只攻下一座县城又得而复失,其余县城据点均未攻克。

10月上旬,日军调集华北境内所有能调遣的兵力,加上

大批伪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我们做了大量迁移保存物资财产的工作,后勤战线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如财务处的干部想方设法保存现金,转移时,专挑险路绝路走;在日军进攻存放两万余顶毡帽的窑洞时,毡帽厂的工人冒死将毡帽转移,避免了损失;埋藏资材,多数要挖新洞库,劳动很重很累,干部们都亲自参加;有的因为要严格保密,很多事干部都要亲自动手,而且越是黑夜、雷雨天,越是转移资材的好时机,越要行动。

11月中旬,一二九师取得反“扫荡”作战的胜利,各路“扫荡”之敌分别回巢。部队集中休整并进行总结。我写了一份报告,总结了供给部半年来的党政工作成绩、不足和经验教训。这份总结报告呈送了刘、邓首长。

令我意外和高兴的是,1998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存档资料中竟然查到了这份总结报告。由于年代久远,字迹不很清楚了,但它能流传至今,也成了珍贵资料。

第四章 转战冀南

“马褡子档案馆”

1940年11月29日,我调到冀南军区部队工作。原打算让我到新八旅任政治部主任,正好赶上新八旅和第三军分区合并,没位置了,就改到冀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当副部长。

我曾跟随刘、邓首长去过冀南,对那里的情况有一定了解。冀南面积有2800平方公里,交通发达,水路、陆路畅通,西连太行,东邻山东,南接豫北,北通冀中,战略地位很重要。这里是大片的平原地区,物产丰富,手工业也很发达。冀南人民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中国共产党很早就在这里创建了组织,多次领导过反帝、反封建、反苛捐杂税、反侵略反压迫的斗争。这里土匪和游杂武装也多,特别是“七七事变”以后,日军占领这个地区,一些人就乘机“拉杆子”,形成混乱局面。有些武装虽带有自卫性质,愿意进行抗日,但互有戒心,争抢地盘。至于“铁磨头”、邱庆福、王泽民等团伙,打家劫舍,祸国殃民,是地道的土匪。

冀南军区于1938年4月成立。经过开创时期的工作,特别是“百团大战”之后,这块根据地初具规模。军区部队发展很快,下辖五个军分区,有14个主力团,很多红军干部担任领导,不少人称得上是战将。军区主要领导有:司令员陈再道,政治委员宋任穷,副司令员王宏坤,参谋长范朝利,政治部主任刘志坚。

1941年1月下旬,一二九师召开所属部队组织工作会议。代表冀南军区参加这次会议,成了我上任后干的第一件事。

邓小平政委首先作了抗日形势报告,提出了建立党军的问题。师政治部主任蔡树藩作了组织工作的总结与任务的报告。各大单位的组织部长都作了发言。

我也发了言。我认为,这次会议是抗战以来的第一次组织工作大会,对加强党军建设有重要意义。谈到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时,我说,一切工作要经过党支部来保证完成,各级党委要加强对党支部的领导;模范支部的条件要根据具体情况掌握运用,避免公式化,时间不可跨得太长,两三个月到半年评一次也可以。我还建议,评比时要看综合情况,有个别缺点,不应影响模范支部的评定;巩固党的领导,主要是加强党的教育,提高党员党性、思想觉悟和政治质量;审查干部中,不要搞神秘化,重点开展好批评与自我批评;要注意搞好青年工作,多开展一些适合青年特点的活动等等。我向大会表示,有信心、有决心把会议精神在冀南军区部队贯彻落实好。

会议结束,我立即回冀南军区向刘志坚主任作了汇报。2月上旬,冀南军区召开了组织工作会议。我传达了师组织工作会议的内容,将有关政策和具体规定、条件等材料印发给到会人员,组织讨论。会议开了三天,决定了几项具体工作:一

是各旅和军分区成立政治部干部科,考查、了解干部,建立干部档案,配备干部专门完成这项工作;二是团的部队都建立党的监察委员会;三是立即着手开展创建模范党支部活动。

关于考查、了解、审查干部,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干部的优缺点,以便培养、提拔和调动。发现有隐藏的坏人混入干部队伍,要纯洁队伍。方法是每个干部填履历表,写清楚入党前后的全部历史情况;然后召开党的会议,在本人出席的情况下对其作出结论;对家庭背景不好或有过严重错误的干部,重在本人表现;规定团以下干部每半年鉴定一次;对于失去过党的关系的干部,要设法澄清原因,在被捕、被扣以及在狱中的表现,是决定能否恢复关系的主要依据;对土地革命时期的干部及知识分子新干部,要分别不同时期的特点,既弄清历史,又看本人的思想觉悟和现实表现,多看他们的长处,使审干工作变成鼓舞干部的动力。

建立干部档案是个新事物,大家都十分重视。由于战斗频繁,流动性大,干部档案只能装在布袋子里,用马驮着,大家都叫它“马褡子档案馆”。都知道这个“马褡子”重要,不能丢,有时拼了性命也要保住它。

党的监察委员会的成立也是加强军队党的建设的措施。党的监察委员会由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其职能主要是进行党的纪律检查(相当于现在的纪检委员会)、党员的教育和学习,执行党内处分以及撤销处分的决定,接受下级党员申诉,保障党员权利,加强党内思想斗争,严格党的纪律,克服自由主义、贪污腐化等不良倾向。我担任了冀南军区机关党务工作委员会书记。

在创建模范党支部的标准上,战斗连队和机关支部有所不同,但都是六条。

战斗部队的条件是：一、保证一切大小战斗的完成；二、消灭党员叛变逃亡及非战斗减员；三、党员要成为学习的模范，造成部队学习热潮；四、党员要成为遵守纪律、执行命令的模范；五、保证没有一个人违犯纪律的；六、干部关心战士，战士爱护干部，全体爱护党军。

机关党支部的条件是：一、完成一切工作任务，每个党员有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工作热情；二、党员成为遵守纪律制度、实行节约的模范；三、干部关心战士，战士爱护干部，全体爱护党军；四、党员成为政治学习、思想意识锻炼的模范；五、消灭党员逃亡、叛变及非战斗减员；六、保证与居民建立良好的关系，保证不犯群众纪律。

冀南军区党的工作很有基础，但部队分散，斗争环境恶劣，党的工作必须进一步加强。团以上党委会一般由同级领导和部分下级主官组成；设常委，主要成员是司令员、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常委会便于研究和及时处理问题。营或相当于营的单位，设总支委员会，营的教导员任总支书记。连队等基层单位，建立党支部委员会，指导员任党支部书记。各个排建立党小组，排长担任党小组长。

战争时期特别强调各级党委和支部的工作。看一个单位主要看这个单位的党委、支部领导班子是否坚强、团结、得力，看对党员的教育管理是否有效、经常。党内生活大事讲原则，小事讲友谊；讲民主更讲集中。

党的组织生活很严格。尽管物质生活艰苦，每月津贴费很少，有时甚至没有，但大家都能自觉缴纳党费。党员调动，必须转好组织关系，有出有进，否则就认为是脱党。干部不管职位多高，都要参加党小组会。党小组会经常开展批评和自

我批评,要能虚心听取别人的批评。党内一律称同志。要求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打仗时,干部、党员冲锋在前,不怕流血牺牲;平时行军,积极帮助别人;学习带头,抢着做好人好事。

吸收发展党员很严格,都是经过战斗、工作的考验,有的是在火线入党。入党手续也很认真:贫农出身的,一个介绍人;其他出身的,要有两个介绍人。确定培养对象后,实行一段培养考察,经过小组会讨论同意发展后,交支部大会表决通过。新党员一定要举行人党宣誓。誓词和现在的内容有所不同:

“我宣誓: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党的利益高于一切;遵守党的纪律;不怕牺牲,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要做群众的模范;保守党的机密;对党有信心;百折不挠,永不叛党。谨誓。”

抗战时期,部队干部工作的基本方针是培养和提拔大批干部,加强思想教育,提高质量,纯洁队伍。在干部中提出的口号是,“反对落后,力求进步,提高党性,增加知识”。

战争年代干部队伍变化快,特别是营以下干部。一次战斗下来,干部多有伤亡,干部的提升、调动因此很频繁。战争最能考验人,许多干部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对党、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战斗中冲锋陷阵;枪炮一响,就能看出人的智慧、沉着和勇敢。那些经过战争考验的人,通常都会被及时提拔到领导岗位。提拔干部的频率虽然快,但手续是健全的:凡属于政治干部,由组织部门提出意见,交保纪部门再度审查,后经主任、政委批准公布;军事干部,则先由司令部首长提出,交由组织部门会同保纪部门进行政治鉴定,政治部主任签字,再经军政首长命令公布;连排班干部由本支部提出意见,由旅的

组织科审查,经旅团首长任命;营团干部的任命则由旅、军区党委会讨论,经师首长任命;旅一级干部,由八路军总部任命。

组织部工作很忙碌,政策性很强。我经验不多,但注意学习,舍得花力气,工作还算顺手。在1941年8月之前,我们给一二九师政治部报去了冀南军区模范党支部的名单和事迹。经审核,军区有13个基层党支部受到师政治部的通报表彰。8月1日,一二九师政治部作了模范支部工作总结,表扬冀南军区政治机关将模范支部的条件发挥得更具体化,对团和连队有具体的指导作用。总结还介绍了三个较优良、全师赞扬的模范支部,首先就是冀南军区三八六旅的电台174分队。

反合围与反“扫荡”

1941年2月底至3月初,我去第二军分区考察工作。

冀南军区第二军分区在滏阳河两岸,辖隆平、尧山、任县、巨鹿、新河、平乡、南和、宁南等九县。我到达这里时,分区部队只有新九旅调来的第二十五团,已缩编成两个营。和指战员交谈中,大家意见很一致,都认为现在的对敌斗争方式和组织指挥体制要改变,应该把部队分成小分队,白天隐蔽,夜间活动。敌伪正在修公路,筑碉堡,抗日根据地分割成了许多小块;一些村子设了伪政权、保甲长。大家认为,应该针对实际尽快转入游击战。分区政治部主任贺亦然和第二十五团政委陈佰禄也建议,部队要开辟向前,不能坐等形势好转,不能往后缩;应该把部队分散开,用麻雀战、骚扰战来打击敌人。我同意这些意见。他们也注意做好敌占区的群众工作,一些伪政权是“两个牌子,一套人马”;明里身份是保甲长,暗里却是抗日群众和抗日政权。可以说这里白天是敌人的“地盘”,夜晚

则是抗日军民的“天下”。

回到军区,我将考察情况写了一份材料,中心思想是,要审时度势,调整斗争方法,“分散游击,敌进我进”。指出,部队有相当一部分领导和基层干部害怕分散,这种想法不对。分散不是解散,是分而不散,是更好地隐蔽和保存自己,打击敌人。我又向军区写了一份报告,建议将第二军分区的做法加以推广,尽快让部队分散作战;现在不分散,以后会更加困难。我还提到了挖地道的问题。冀中军区首创了地道战形式。冀南军区没搞起来,但家家有个藏粮食的洞子。我建议加以改进,家家相通,村村相连,白天在地道隐蔽,晚上出来活动。

刘志坚主任看了报告,觉得内容很实际、很重要,批报给了军区领导。很可惜没见到下文。

1941年5月至10月,针对敌人的“囚笼政策”,冀南军区发动了多次较大规模的破击战斗。5月上旬,开展了五昼夜破击战,摧毁了郑家口至边家庄等敌人伸入根据地的公路和封锁沟墙,时称“郑口之战”。新编第四旅、第七旅的主力团和第二、第三军分区的部队和7万多群众参加了战斗。五个昼夜,破路几千公里,摧毁封锁沟墙60多公里,攻克敌堡八个,毙、伤敌250多人。8月至10月,连续进行了三次秋季破击战役,大小战斗200多次,破坏了南清、临高、临王等公路,摧毁敌据点150多个。

破击战打得艰苦,我军伤亡很大。敌人的“扫荡”并未因此停止,反而更加频繁。我们的处境很被动,军区机关常常一夜间数次转移住地。根据地也在迅速缩小,平原与山区的交通联系也更困难了。

日本野心很大。1941年12月上旬,又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妄图把中国作为它的战略后方,将华北变成“大东亚战争

兵站基地”。此后几个月，日伪军大举“扫荡”，骄横地命其为“纵横扫荡”、“捕捉奇袭”、“铁壁合围”等等，手段极为疯狂残酷。冀南军民经受了极为艰险的斗争考验，也遭到重大损失。

部队经常遭到敌人合围。像七七一团、十团、十一团、二十二团、二十五团以及一、二、四军分区都曾被围，伤亡很大，一些旅、团干部如刘诗松、郝光等牺牲。

根据地被分割，大大缩小了。日伪军每占领一地，就设据点，修碉堡；平均每三至五个村子就有一个碉堡。敌人还增建和修复了大量公路和封锁沟墙，挖县界沟；架上电线，电线杆上挂马灯，强迫民众站岗放哨。部队曾流传一首顺口溜：“日住炮楼下，夜观路上灯，行军必过沟，天天有敌情。”

斗争形势十分严峻。有些人怀疑，根据地还能不能坚持？抗日战争能不能胜利？有的人甚至因此逃跑、叛变。

更多的人仍在坚持斗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大西洋战争的宣言》，表明了我党我军抗战到底的坚强决心，同时号召，要“坚持抗战，积蓄力量，巩固内部，战胜困难”。面对日军的大“扫荡”，冀中军区的斗争搞得不错。1942年春末，遵照刘伯承师长指示，在陈再道司令员、宋任穷政治委员的安排下，冀南军区组织了一个学习参观团去冀中军区。代表团成员是各旅、军分区、支队、地方县大队政治委员，记得有王新、吕林、刘昌、胡永昌等共100多人。我是参观团团长。

冀南和冀中隔着一条德石铁路，我们在路南，他们在路北。冀中军区属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领导，司令员吕正操，政治委员程子华，政治部主任孙志远。在敌人的合围、“扫荡”下，冀中军区打得很艰苦，很多地方和敌人展开反复争夺。他们的群众性游击战开展得好，著名的地道战就是这里首创的。

我带领参观团从枣强出发,过德石铁路,到了冀中。程子华政委不在家,我们受到吕正操司令员的迎接。吕司令员向我们介绍了冀中对敌斗争的经验、地方党政群工作,安排我们到部队参观。到了定县东北地区后,看到了不少新建部队;尤其让我们感兴趣的是参观了地道。我们参观的那个村子,地道已经形成网络,户户相通,村村相连,入口和出口都进行了巧妙的隐蔽和伪装。地道里四通八达,有的地方还比较宽敞,可以集会,或屯集大量粮食。我觉得冀南也有条件这么搞,回去就可以着手开挖,因此看得很认真。

接着我们到了定县南北,参观了冀中的模范区第七军分区。我们主要了解村政权的建设、部队如何开展反“蚕食”斗争和保卫中心根据地的情况。到了几个团。这些部队青年知识分子较多,都是从北平、天津、保定这几个大城市来的,很多是大学生和教师,都有一定特长,部队搞得比较扎实,有朝气。要挑毛病的话,这些地区的敌伪工作和“两面工作”做得少了点,打击的多,争取的少,算是个不足之处。

1942年4月底,我们参观学习结束。日军对冀中的“五一一大扫荡”开始。

由于日军的“四二九”大合围,冀南军区机关转移到了武官寨地区。在反合围作战中,冀南军区机关和第四军分区、四地委、专署机关损失惨重。陈元龙、陈子斌、桂承志、杨宏明、孙毅民等团以上干部牺牲;许多住在老乡家里的伤病员、地方干部及学生、群众遭到杀害。军区和行署为此召开了声讨控诉大会,做了大量善后工作。对第四军分区的军政领导也进行了充实调整,王任重担任四地委书记兼第四军分区政治委员,范朝利担任第四军分区司令员,王蕴瑞接任冀南军区参谋长,雷绍康任第四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季铁中任政治部

主任。

“四二九”反合围结束后,军区机关又回到枣强西南纸房头。我回到军区政治部后,刘志坚主任向我传达了上级命令:原组织部长吴建初调第一军分区工作,我接任冀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为悼念在反“扫荡”中捐躯的烈士,军区举行了追悼大会,同时表扬在突围中英勇奋战的英雄模范。我还和敌工部长张茂林到枣强县南部十二里庄慰问负伤的裴奎荣等同志。裴奎荣时任冀南军区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在与敌肉搏战中失去了左臂。我鼓励他:左臂没有了还有右臂,人还健在,只要坚强起来继续努力,为党为人民杀敌立功的机会还很多。50多年后的1998年2月,裴奎荣给我写信,信中回忆了我们的这次会面和次年我选送他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情景。

1942年6月11日,日军又发动了一次大规模“扫荡”,时称“六一一大扫荡”。日军四十一师团和独立混成第八旅团以及伪军近万人,从四面八方向我军区机关合围面来。那天,陈再道司令员下部队,宋任穷政委去太行山向师里汇报工作,军区机关只有王蕴瑞参谋长及政治部的几个领导。当下决定以军区特务团一部就地阻击敌人汽车部队,其余人员趁敌未合拢之机,迅速向北转移。团以上干部骑马突围,一部分同志就地隐蔽。

我们选择向东南方向突围,那里是一片沙地和枣林。我和刘明辉等同志策马扬鞭,刚穿越枣林,前面就出现了敌军,只好转向再跑。这次很悬,好像哪里都能碰到敌人。我们东奔西走,整整绕了一个圈子,才找到机会,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这次突围成功,真要感谢我的战马。它驮着我跑得飞快,

小沟小坎一跃而过,枣林也挡不住它。跑到第六军分区后,我下马一摸,它全身都淌着汗水,真是累得不行了。

这次反合围,我们的部队发现情况即先机转移,没有被围住。跳出去的部队如第十九团、二十一团和骑兵团的一个连,对合围之敌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打击,有力地配合了其他人的突围。不过,王蕴瑞参谋长在突围中负了伤,一部分同志跑到了第四军分区,机关分散了,一时造成了领导指挥的困难。不久,军区机关重新收拢,转移到威县边界地区,在那里驻扎了一段时间。6月底至7月初,在敌“蚕食”进攻下,第一军分区活动的元城地区被“蚕食”掉三分之二。为打开第一军分区严重局面,8月初,我随陈再道司令员及骑兵团到魏漳地区,打了“元城战役”,夺回被敌“蚕食”的地区。二十二团、二十六团也趁虚袭击了成安县城,把该县的伪组织、伪政权统统摧垮。

“六一一大扫荡”之后,又有一次“九一二”合围。日伪军共万余人,汽车200余辆,采取秘密集结、突然合围的战法,企图一举歼灭冀南军区领导机关。由于事先得到情报,我们做了周密准备,使敌扑空。但刘志坚主任在这次突围中负了伤,军区首长让我管一下政治部的工作。

政治部各部长分散隐蔽在农民家里,各科的干部也隐蔽了。农家房子里有地洞和夹层墙,我们白天隐蔽在里边,晚上才能出来活动,有时转移到野外的庄稼地里,生活很苦,只能喝点小米粥或野菜汤。碰上敌情,甚至几天吃喝不上东西。老百姓也很苦,但非常爱护我们,常有为保护八路军面舍儿舍夫、壮烈牺牲的事情发生,感人肺腑。

为准备迎接更艰苦的斗争,准确掌握部队的思想情绪,对各旅及各军分区实施具体的领导与帮助,军区组织了四个政

治工作团。第一团由我带队,随同宋任穷政委到第一军分区检查工作。反合围时,这个军分区的政治委员兼地委书记吴建初被敌人捕去了,只有桂干生司令员一个人。

第一军分区辖大名、成安、临漳、肥乡。这里土匪和散兵游勇活动猖獗,群众生活困难,情绪低落。宋政委和我认为,应该赶紧组织现有部队和游击队,打它几仗,收复一些地区,既振奋群众,也考验一下部队。我们立即组织部队攻打了回隆。这一仗打得坚决,一连攻克了三个碉堡,消灭了150多名日伪军,部队和群众的情绪有所好转,也震慑了土匪、汉奸。对我来讲,还有一点特殊收获。一次,攻进了敌碉堡,在伪军队长家里“缴获”了一些食物。我看见一盆黑呼呼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宋政委说,这东西就叫海参,海里长的,很有营养。这个“缴获”不必上交,我们抓住机会开了次“洋荤”,我也第一次尝到了海参的滋味。

过了段时间,宋任穷政委回军区机关,让我留下来继续工作,重点是第二十六团的整顿和恢复。

二十六团损失很大,只剩下三个连队,团的干部也没有。我从军区出来时没带干部,决定采取就地解决的办法。我亲自给连、排干部讲抗日斗争形势;讲上级指示和当前斗争任务、方针;讲连队党支部的工作,激发党员干部的斗争情绪。由于没有团、营干部,只能按小团整编。我找到了原二十六团参谋长赵北原,他是冀南本地人,工作认真负责,对同志热情关心,在团里声望不错,就让他当了团长。找到了“领头”的人,部队就动起来了,打了些小仗,队伍也不断扩大,对恢复第一军分区的工作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由于斗争环境日益严酷,部队分散活动的问题终于提上日程,军区决定采取分遣小分队的方法展开对敌斗争。要求

各军分区拿出三分之二的兵力分散活动,小分队以连、排、班为单位,必要时可以穿便衣,三至五个人活动。起初有人对此认识不足,行动迟缓,不愿意分散;就是分散了也钻不进去;钻进去了也站不住脚。我们通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反复讲清道理。桂干生司令员还亲自组织了若干小分队进入魏县、成安、大名等地,效果很好。

武工队(也叫便衣队)也是分遣小分队作战的一种形式。武工队比游击队更机动灵活,人员配备更精悍。这是专门深入敌占区的小分队,一般由部队的连排干部组成,也有一些地方干部参加。武工队负责人大多为团营级干部。一支支小分队如同一把把尖刀,直插敌人心脏。

这段时间,我们还大力开展对敌政治宣传攻势。发动学生写标语、传单,张贴在大街小巷,指名警告敌伪人员、汉奸、特务,要他们弃恶从善,并开展记“红、黑点”活动,警告他们不要做坏事,要做有利抗日的好事,否则,抗战胜利后一定清算。我们还组织人员到敌人炮楼附近喊话,上夜课,向他们讲国际形势、抗日道理和八路军优待俘虏政策。这些做法很有效果,对我军民坚持抗日斗争,起到了很大帮助作用。

“抢救运动”

1943年,抗日战争进入第六个年头。国际形势有了很大变化:意大利宣布投降;美军对日转入战略反攻。中国战场,日军收缩战区,重点巩固占领区,控制中心城市和交通干线。中共中央号召抗日军民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恢复和扩大根据地,为将来的大反攻做好准备。

这年春末,我从第一军分区回到冀南军区机关。9月初,

奉调参加了北方局党校的整风学习。

整风运动是我党从 1940 年就开始进行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目的在于通过普遍学习研究,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从根本上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到 1943 年,整风运动更加深入,成为全党全军的中心任务之一。

这次整风主要内容是整顿“三风”,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风的重点是地委、专署、县级和军队旅、团以上领导干部。整风分两种形式:一种是在职学习,一种是集中学习。我参加了集中学习。

冀南军区参加集中整风学习的有 60 多人。从冀南到位于太行山的北方局党校,路很难走,还要通过一段敌占区。我们基本上是日蔽夜行,由交通站的同志一站站护送,一路上有惊无险,终于在马头镇越过了平汉铁路,进入了太行山区。这时,我们才有了安全感,觉得天那么明朗,山那么青秀。大家有说有笑,似乎连呼吸都轻松多了。

北方局党校驻地是辽县麻田附近的一个村子,负责人是杨献珍和张际春,杨献珍是党支部书记。学习内容主要是马列著作和毛泽东主席的几篇文章,如《论党八股》、《改造我们的学习》等。开始一个多月里,学员们都很愉快。学员都是刚从战场上下来的领导干部,过去天天忙行军打仗,现在吃了饭没其他事,整天就是上课听报告,是一种难得的调节。另一方面,大家也愿意学习。对于整顿“三风”,大家认为很有必要,因此学习认真,收获不小。

11 月,整风学习进入检查审干阶段,问题来了。

本来审干是整风计划定好了的,大家自觉地检查自己的

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有的同志对自己的历史问题认真向组织作了交代说明。但这种状态没有保持下去。从延安传来一个新名词:“抢救运动”。这个新词所代表的极“左”思潮来得很猛,整风运动脱离了原来轨道。

我不明白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此时,我们这一期里,除了几个老红军干部以外,绝大部分同志都有了特务嫌疑,要整成反革命分子。那些过去在白区工作过、在白区入党、在根据地搞过地下工作的,都要说出通敌的事儿。我很幸运,我是红军,没整到我头上,就让我当工作人员,协助杨献珍做管理工作。整风整成这个样子,我不由得想起了红军时期的“肃反”。说起来也怪,一个错误思潮下来,就像来了海潮,谁也挡不住。

当时没有抓人捕人,但搞“逼、供、信”,逼得大家硬说自己是特务,而基本上都是假的。冀南五地委书记李尔重和冀南区行署主任刘建章,都成了“大特务”。杨献珍让我整理刘建章的档案材料,把刘关进“小房子”。我不知该怎么处理。有一天,刘建章突然跑了。周围都是大山,很难跑出去。我带警卫班四处寻找,在山顶一个破庙里找着他了。他说,哪里想跑,只是想一个人静静地想一想。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

还有些干部被整日整夜罚站在木凳子上,不给吃喝。这很不对,可有的领导坚持要这么干。我想,这么多干部不可能都是“特务”,要不他们早投敌了。想归想,不敢轻易讲出来。我每天和一大堆交代材料打交道,都是不同人写的检查和坦白,有的是反复多份,成了厚厚一大本。咋一看,很惊人,大帽子往自己头上扣。

我实在忍不住了,一天,壮着胆子对杨献珍说:“我看了很多人的材料,这一堆一堆的不可信啊。不是日本特务就是汉

奸,这么个搞下去,有问题!”这几句话是不能乱说的,是立场问题,搞不好就会给自己招来麻烦。但我和杨献珍在太行党校一起工作过,很熟悉,关系也不错,所以才敢讲。

杨献珍也有同感。一天,他交代给我一个任务,到冀南整风队李菁玉书记那里去,了解一下他们的干部情况。我见到了李菁玉书记,发现那里也都是“特务”、“汉奸”,回来后对杨献珍说,没了解到什么新东西,和我们这里一样。

1944年6月,整风学习还没有结束,突然接到通知,让我提前毕业,回去工作。

我大松了一口气。通知告诉我,邓小平政委要找我谈话,我立即赶到总部,见了邓政委。邓政委问我整风学习中的情况。我本想和盘托出我的想法,最后还是打了折扣。邓政委只是听,也没多说什么。他最后说:这几年你的学习工作表现不错,进步很大;冀南、冀鲁豫两军区合并为新的冀鲁豫军区,现在部队很需要你回去工作,要把工作抓好。我向邓政委表示了决心,便急返冀南。

参加整风学习的其他同志年底才分配到部队。果然不多久就开始平反。毛主席说,整风中搞的特务、反革命等,好多都不能算数,必须进行甄别平反。冀南后梯队同志的平反工作由宋任穷政委亲自抓;他没有参加太行整风,比较超脱。他郑重地为整错的同志平了反,还不点名地批评有些人在整风中很“左”,整错了人,这个教训很深刻。

如果说极“左”思潮给整风带来的是场“人祸”,那么,1943年整个华北地区、特别是晋东南、冀南大地遭受的罕见灾害却是“天灾”。

整风期间,我们的伙食非常差,吃不饱肚子。口粮要自筹,经常到地方上联系,弄到一点粮食,就组织人去背,最后只

能熬点谷子稀糊充饥。有一天,我们杀了只羊,做了顿羊肉稀糊,可以管饱。好久没有享受过一顿饱饭了,大家非常高兴,一个个狼吞虎咽,只顾嘴巴痛快,不在乎胃的大小。记得有一位山东来的县委书记,年纪比较大,他也猛吃,最后吃得不能坐也不能躺,只能站着。

我们苦,老百姓和部队指战员更苦。连续八个月干旱,别说庄稼,连人畜饮水都成问题。雪上加霜的是,干旱未缓,虫灾又起。从太行山到冀南平原,蝗虫满天飞,所到之处,树叶、地草一啃而光。入秋后,冀南地区连降七天特大暴雨,河水暴涨,一片泽国。人们不甘心,洪水退后,又抢种晚秋作物。日军却毫无人性地利用洪水,使成千上万的人畜淹死,房屋倒塌。水灾之后,又遭到冰雹袭击,瘟疫流行,夺走许多生命。部队因病减员的情况也相当严重。

这是极为艰苦的一年。但共产党、八路军没有在日伪军的残酷进攻而前退缩,也不会被自然灾害所吓倒。部队积极参加救灾工作。一二九师下达了《生产节食,度过灾荒,迎接胜利》的命令。各部队先后出动,参加当地兴修水利的工程。老百姓说,“日本鬼子、国民党挖口子放水淹我们,共产党、八路军堵口子搞水利帮我们,谁好谁坏我们心里有数。”部队搞生产自给,上级明文规定,部队每人要开一亩荒地种粮食。开荒缺少牲口,就用人力拉犁,从领导干部到指战员人人参加。我们以人代畜拉犁,五到六个人一副犁杖,用背包带或绳子拉着走。起初不觉什么,但越来越重,尤其是肚子还饿着,天黑收工下来,累得浑身酸软。部队通过大生产达到了自行解决两个月的口粮、六个月的蔬菜,种棉花织布,解决一套过冬棉衣。这样既改善了部队生活,又减轻了人民负担。

战略反攻

1944年6月,我调到新组建的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任组织部长。

新组建的冀鲁豫军区是1944年5月由冀南和冀鲁豫两个军区合并成立的,仍保留冀鲁豫军区名称,驻地在冀鲁豫根据地的范县。司令员宋任穷,政治委员黄敬,副司令员王宏坤、杨勇,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苏振华,参谋长阎揆要。冀鲁豫军区下辖11个军分区:原冀南部队编为第二至第七军分区;其余为原冀鲁豫军区的各军分区。

1944年夏天,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形势很好。在苏德战场上,苏联红军已取得决定性胜利;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打败希特勒已指日可待;在太平洋战场,日军开始节节败退;中国战场上,日军兵力大量消耗,占领区日益缩小,华北日军兵力相对集中,逐步撤收了一些据点。同年底毛泽东主席在延安发表了《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讲话,明确提出:全国唯一的任务是,“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解放区的首要任务是,“消灭敌伪,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并号召抗日军民,“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在我现存条件下能够攻克的沦陷区,全部化为解放区,迫使敌人处于极端狭窄的城市与交通要道之中,被我包围得紧紧的,等到各方面的条件成熟了,就将敌人完全驱逐出去。”

在根据地,人们的情绪也发生了变化,不仅指战员,甚至老百姓也觉得,抗战胜利的航船已经驶出地平线,看得见了。抗战中最困难的战略相持阶段即将过去。各部队积极主动向敌发起进攻。6月19日,第六军分区第十九团向盘踞在临清

马厂的伪军赵挺柱团发起进攻,将敌歼灭,俘敌400余人,开辟了清平地区;7月,第三军分区向盘踞在莘县五年之久的伪军刘仙舟部发起进攻,全歼县府警备部队,活捉伪县长刘仙舟;8月初,第十一团、十九团等,攻克清平、博平地区十多个敌据点;11月,十九团攻克枣强西人金村据点。

军区政治部印发了许多材料,重点是宣传国际、国内形势,传达党中央及军区有关指示和任务。有的是原文照转,有的则用宣传提纲形式,印发给部队基层和人民群众。同时,狠抓了部队的思想教育,包括攻势作战的政治思想工作。

1944年12月5日,冀鲁豫军区在范县召开了全军区的练兵大会,部署部队的练兵工作。抗战已转入战略反攻阶段,我军将有一个大的发展,比现在要扩大数倍,而且要去完成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任务,这样的局面下,没有一批军政素质好的干部不行,没有一批能攻善战的部队也不行。因此,冬季练兵和开展部队民主运动成为当前任务的重点。

冬季练兵和开展民主运动是分两期进行的。

先是政治整训,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精神,广泛开展尊干爱兵和拥政爱民运动,总结连队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印发一批组织工作方面的小册子给基层单位。指战员对照传统,检查自己,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气氛很热烈。尔后进行军事整训,以技术为主,战术为辅,主要开展射击、投弹、刺杀、爆破、土工作业等技术训练和近战、夜战、攻坚战等战术训练。

这次冬季练兵和民主运动,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部队也由分散开始转入集中,实现我军在新形势下又一次战略转变。

军区在濮阳召开了英模大会。各级组织部门为大会做了会前工作。大会给战斗英雄、各种技术能手,包括大生产中的劳动模范等600多名干部战士立功、命名和授奖。英模是逐

级评比,报到我们组织部审核,由军区首长批准而产生。英模们登台,披红戴花,搞得隆重热烈;老百姓也杀猪宰羊,敲锣打鼓放鞭炮,围住会场向部队祝贺。英模大会对部队教育鼓舞很大,会后,全区开展了向英模学习的活动。

有段时间,我还兼管了军区办的原冀南地区部队干部随营学校。随营学校由陈再道司令员兼任校长,具体工作由我来做。

军区随营学校负责分期分批教育和训练干部。所谓随营,是指学校随部队行动。学员主要是编余的连排级干部,也有部分从地方招来的知识青年。随营学校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发扬“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优良作风和“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光荣传统。除学习时事政策,进行军事训练外,重点学习基层的党政工作。随营学校基本上和部队保持一致,随时准备参加战斗。每个学员随时都要做好去部队任职的准备,命令一到,打起背包就出发。

1945年元旦之后,我接到命令,到第六军分区任政治委员。

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已处在最后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的方针。会议向全国解放区的党政军民发出号召,立即向被敌人占领的地方发动广泛进攻,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我早就希望离开机关,去部队工作,现在又是这么好的斗争形势,这次调动就更让我高兴了。

第六军分区是在原冀南军区新编第七旅部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原十九团政委周发田任司令员,参谋长刘明铿,政

治部副主任曹中南。分区位于冀南地区东部,北面是德石路、冀中军区,东面以津浦铁路为界,与山东之渤海军区相接。该区辖有高唐、平原、恩县、夏津、武城、故城、清河、枣南等县。

第六军分区成立之初,曾下辖第十九团、二十团、二十一团和军区骑兵团,后来二十团和骑兵团调到其他军分区。1945年秋,二十一团从冀鲁豫军区调到东北军区,我区负责补充了1000多名新兵,还从我分区抽调了一个团的干部架于送往东北军区。我到六军分区时,就剩下十九团及六分区的地方部队。十九团已恢复大团的建制。

报到后,根据军区指示,我们立即进行了反攻作战。攻克了武官寨、十二里庄、董洪屯、南半壁等六个敌据点碉堡。打武官寨碉堡很费劲,强攻几次都不下,后调了三个连的民兵进行土工作业,把坑道挖到敌碉堡底部,堆上炸药,才一举摧毁。十九团又连续战斗,先后攻克刘王庄、五官庄、东辛庄、夏庄、郑口集等十多个敌据点,收复了清河县城。

这段时间我主要抓了几件事:一是抓部队整训和宣传教育。前方一系列的胜利,使分区的形势发展很快。我及时利用胜利捷报,对机关人员和地方群众进行宣传鼓动。二是抓部队发展和扩编。将枣强、武城、故城三个县大队编为辖三个营2000余人的运河支队;新建了三个县大队;将恩县、夏津等县大队各发展到1000多人,分别编成恩县独立团、夏津独立团。三是抓机会攻打周围的敌据点和地方反动势力,同时作了教育改编投诚人员的工作。

1945年6月20日,冀鲁豫军区报经中央军委同意,成立冀南指挥部,负责指挥冀南地区部队作战。冀南指挥部下辖原冀南地区的第二、三、四、五、六、七军分区。冀南指挥部的成立,预示着抗日战争即将由局部反攻转入全面大反攻;冀南

地区的军民,即将投入向日本侵略者的最后一战。

1945年5月,德国法西斯灭亡,欧洲战争结束。8月初,同盟国发表了《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的日军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开始日本不予理睬。8月6日和8月9日,美国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了两颗原子弹。8月9日,苏军100多万人向侵略我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同日,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8月10日,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但日军大本营仍命令各地日军继续作战。10日、11日,朱德总司令连下七道命令,指示部队对日伪军作战,迫使敌人无条件投降;对已收复的城镇地区实行军事管制,维持秩序,保护人民。

冀鲁豫军区组成中、南、北三路大军,向敌发起进攻。北路大军由冀南地区部队组成。冀南指挥部向各军分区下达任务,要求各部队及地方武装力量,立即向当面之敌发起进攻。决定临时组成八个梯(支)队,分别向敌作战。第二十八团和我们六分区地方武装,为第七梯(支)队(我区十九团编入其他支队),由我担任政治委员,赵彩银担任副司令员。我梯(支)队的任务是进攻夏津、平原、高唐、禹城等。

冀南指挥部决定首先夺取临清县城,继面收复夏津、高唐等县城。

临清位于运河、卫河交汇处,东临津浦线,水陆交通便利,是鲁西北的重镇。在我军大反攻打击下,附近伪军纷纷窜入城内,计有王来贤、萧子玉、张敬斋、熊纪明、萧键九、吴连杰等部近7000兵力;城防坚固,易守难攻。参加攻打临清的为第四、六、七分区部队;我第十九团为此役主攻部队;由冀南指挥部统一指挥。8月26日下达作战命令,十九团进攻目标是西关。

8月30日夜间,战斗打响,各友邻梯(支)队同时发起进攻。我十九团当面守敌是萧子玉部。双方激战到次日近午,萧部排成四路纵队出城突围。我军立即组织火力射击,发起冲锋,顿时杀声四起,刺刀闪亮。血战一个小时,突围之敌全部被歼,活捉了伪旅长萧子玉。其他部队也在激战后攻入城内,临清县城宣告解放。

我率分区部队乘胜东进,连克临清东萧键九部老巢由集、麻佛寺、亢庙、什坊院等据点,并于9月4日攻克夏津县城,毙、伤敌100余人,俘700余人,缴获汽车4辆、迫击炮2门、枪600余支。部队进行短暂休整,接着向高唐地区进攻作战。

高唐是鲁西北的一座县城,城内盘踞的多为惯匪,是一伙亡命之徒。在我军节节胜利的形势逼迫下,他们纷纷构筑“土围子”,保存自己,伺机反扑。有的“土围子”屯兵千人,四周有坚固围墙、深沟、铁丝网和工事,形成多层防护。在朱庄,对“土围子”组织了两次攻击,都未奏效,最后还是采用挖坑道爆破的办法,才攻进去。战斗结束,我到“土围子”里看个究竟,只见一片狼藉,秽物满地,找不到粮食,也没其他果腹之物。这帮土匪陷入绝境还这么嚣张,我暗暗吃惊。

高唐战斗是与顽匪较量,部队打得艰苦激烈,但指战员们斗志很高,一个个端掉匪窝,一块块收复失地。我军连克邱庄、黄圈、蒋家铺等据点,俘伪军300余人,缴获各种枪炮350余支(门)。

每到一地,我们都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那时的慰问品,就是杀猪宰羊,包饺子,吃红烧肉;还有土特产枣子、鸭梨、花生、苹果;用品就是军鞋,都是“识字班”一针一线纳的。和鞋配套的鞋垫子,真有绣得巧的,上边绣有“抗战到底”、“祝你立功”、“军民一家”等字。部队路过各村,都有老百姓在路

边迎送,端茶水,送熟鸡蛋,还有送黄烟叶子的。要是在村子里驻扎,那可热闹了,男女老少像过年一样,拿出最好吃的东西招待我们,有的把结婚娶媳妇的新被褥都拿出来给战士盖。

部队宣传队很活跃,写标语口号,教唱抗日歌曲,搭台演戏,演《血泪仇》、《白毛女》、《兄妹开荒》等。许多军民鱼水之情的场面至今难以忘怀。记得攻克高唐后,城里正好有一个京戏班子,班主叫李和曾。地方政府慰劳部队,就让戏班子唱了几台戏。我看过李和曾唱的《捉放曹》,唱得真好。后来听说李和曾是京剧界大名角,很快将他招入了冀南军区文工团。

战略反攻作战的胜利,鼓舞了全国各族人民,但是,蒋介石却在美国帮助下调兵遣将,大举进攻解放区。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候,出现了美蒋日伪勾结的严重形势。为适应这一新情况,加强华北地区统一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晋冀鲁豫中央局,同时成立以刘伯承为司令员的晋冀鲁豫军区,下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军区,并号召立即行动起来,加强全区武装部队建设,迎接更大斗争。

冀南军区也要求各部队充实加强基干兵团,并以整编或升级地方武装等办法,组织新兵团;原来的大团充实到2000人,小团也达到1500人。我们军分区的第十九团、二十八团均为大团,还新组建了一个分区基干团和一个独立团,使军分区的正规部队达到了四个团。各地方武装也重新建立或恢复,县的基干队发展到200至300人。

解放区掀起了踊跃参加八路军的热潮。那时兵源非常充足,其原因一是严酷斗争教育了人民,体会到了武装自卫,壮大自己部队力量的重要性;再者是经过日伪军多年破坏,农村很穷,说去当八路军打天下,翻身过好日子,都争先恐后报名。

地方政府工作做得也好，一人当兵，全家光荣，全村光荣，报名处总挤得满满的。我们领导干部在各个报名点亲自做接收新兵的工作，亲眼看到许多母送子、妻送郎、兄弟几个争着当兵的动人场面。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政府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的八年抗战，终于以日本侵略者的彻底失败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胜利而宣告结束！消息传来，群情振奋，人人奔走相告，部队和地方群众联合召开了庆祝大会。

我内心充满喜悦。从八年前东渡黄河开始，我参加了抗日战争全过程，度过了许多艰辛日子，多次在枪林弹雨中逃生，现在终于熬过来了，活着看到了胜利。欣慰之中，我眼前不禁又浮现出那些在战火中倒下的战友。胜利不容易，胜利的道路是他们用身躯和热血铺出来的。

枪炮声并没完全停下来，内战的阴影也越来越浓。看到身边欢呼的人群，我没有太多的和平感受。我想，现在的欢呼大概不能算是最后的欢呼。

第五章 保卫胜利果实

“赶快去前线”

1945年10月下旬,邯郸战役还在进行,二纵政委宋任穷找我谈话:“打完这一仗,部队要整编,第二纵队下辖三个旅,你到第六旅任政治委员。赶快去前线。”

二纵于10月17日在邯郸成立,纵队司令员陈再道,政治委员宋任穷,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范朝利,政治部主任钟汉华。纵队下属的三个旅还没组成,就受命奔赴平汉线投入邯郸战役。

这时,距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已有两个多月。和平的曙光并未降临,而形势发展却越发严峻。龟缩于西南一隅的蒋介石玩弄两面派手法,一方面与共产党搞“和谈”,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原地“驻防待命”,不得接受日伪武装的投降;另一方面,要日伪军“切实维持地方治安”,等待国民党接收,并加紧把远在云、贵、川大后方的国民党军源源不断地调往华北、华东和东北各地,妄图抢夺抗战胜利果实。据此形势,党中央

决定“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积极向负隅顽抗的日伪军进攻，抓紧做好粉碎国民党军队进攻的准备。抗战的硝烟还未散尽，一场更为尖锐复杂的斗争已迫在眉睫。此时受命，我已做好了应对复杂情况的思想准备。

在第六军分区任职半年多时间里，我们彻底肃清了运河以西枣南、故城、清河等县残留的敌伪据点，扩大了根据地，恢复各县、区政权，将枣南、故城、武城三个县大队合编为运河支队（辖三个营 2000 余人），并重建了这些县的游击大队。在运河以东地区，积极发展壮大游击武装，加强党政建设，开展争取敌伪起义、反正工作，先后攻占了武城、夏津、高唐、平原等县城及广大地区。

国共两党还在“和谈”，国民党突然动手了。1945年8月16日，阎锡山根据蒋介石密令，调集数万兵力，突然袭击占领了我八路军根据地的腹地上党地区。晋冀鲁豫军区坚决奋起反击，并集中太行、太岳、冀南的主力，于9月10日发起上党战役，粉碎了阎锡山部队的进攻，歼灭其11个师及一个挺进纵队，共3.5万余人。接着，刘、邓首长命令太行、冀南部队攻占平汉铁路沿线，先后占领高邑至磁县段的城镇，破坏了沿线铁路桥梁，为在邯郸地区歼灭北犯之敌创造有利条件。9月下旬，军区命令我六分区主力集中到平汉铁路沿线作战，协同兄弟部队攻打邯郸城。攻城后，我奉命离开前线，回到第六军分区抓新建和起义部队的整顿，同时进行战争动员和支前准备工作。

宋任穷和我谈话后，我立即赶往前线。

11月2日，邯郸战役胜利结束。战役打了13天，歼敌两个军，其中毙、伤敌3000余人，俘敌马法五以下官兵1.7万余人，争取一个军起义。这次是继上党战役后给国民党军的又

一次沉重打击,对阻滞国民党军沿平汉路北进,为我军争取时间调整战略部署起到很大作用。二纵下辖的三个旅于11月4日在邯郸地区正式组建。

11月上旬,六旅在邯郸东南河沙镇召开了庆祝成立大会,正式宣布了旅所属各团及其番号。二纵下辖第四、第五、第六旅,均以参加邯郸战役的10个团为基础,有些团的归属重新作了调整。六旅下辖十六、十七、十八团。我任旅政治委员,旅长王天祥,副旅长周发田,副政治委员彭学桂,参谋长王明坤,政治部主任曹中南。旅直机关和直属部队共250余人。十六团团团长张继怀,政治委员宋东旭;十七团团团长刘正柱,政治委员范朝福;十八团团团长李开道,政治委员王新。原直属纵队的独立团划归六旅建制。

十六团的基础是抗日战争初期冀南地区的第四、第三两支抗日游击队。1938年编入东进纵队第三团,全团大部分营级干部和部分连级干部是红军,甚至有的战士也是红军。1939年改为东进纵队第一团。1940年7月编为冀南第七旅第十九团。1942年6月,第七旅与第六军分区合并,该团划归第六军分区建制,为适应斗争形势需要,大团改为小团。1945年春,形势好转,十九团恢复大团建制,曾荣获十八集团军总部授予的“冀南战斗模范团”称号。该团战斗作风英勇顽强,机智灵活,能攻善守,富有突击精神。

十七团的基础是抗日战争初期冀南军区第一军分区(滏河北)第一支队。1940年7月,与第五军分区青年营合编为第九旅第二十五团。同年12月,该团归第二军分区建制。1942年由大团缩编为五个连的小团。1943年5月团部取消,各连直接归军分区指挥,部队分散在各小块根据地,坚持对敌斗争。有两个连调往太行,一个连调宁晋地区。1944年10

月恢复小团,1945年由小团扩编为大团。该团有红军骨干作基础,政治工作坚强,先后转战于冀南根据地,坚持敌后游击战,在保卫冀南根据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曾受到十八集团军总部通令嘉奖。1945年9月参加上党战役。该团能攻善守,富有连续作战的精神。

第十八团由冀南第六军分区运河支队改建。其最早是故城、枣南、武城的三个县大队,于1939年至1940年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中相继组建,1945年7月合编为运河支队。该部队始终坚持本县及运河两岸的对敌斗争,参加过多次反“扫荡”、反合围、反“清剿”和破击交通等战斗。在武城北齐庄战斗中,获军区通令嘉奖。该部队善于分散活动,野外作战,战术灵活,富于突击精神。

独立团原是冀鲁豫军区抗日游击纵队第一师第一团,是1945年春在豫北大名由伪军“东亚同盟自治军”军长王天祥率领“反正”的突击团(该团的两个营整编为两个连),与冀南军区第九军分区两支游击大队合编而成。1946年1月,该团又与临清独立团合编为第三十七团。随后,部队整编,该团人员分别编入第十六、十七、十八团。

邯郸战役我们俘虏了大批国民党军士兵,全部补入各部队。这些国民党士兵开始有点傲气,对我军情况不理解,不服气。他们觉得,国民党部队武器好,军事训练好,部队供应不错,还每月发饷;我军不正规,训练差,伙食不好,还不发一文钱。我们考虑,这些士兵也都是贫苦出身,有的是被迫抽壮丁,本质是好的,由于受国民党军教育的影响,他们对我军的宗旨、性质认识不够,如何把他们教育改造过来,是我们政治工作的一项任务。我组织旅、团政工人员研究做好这件事。先从思想上进行教育,提高阶级觉悟,分清在我军当兵和在国

国民党军当兵的本质区别。我们组成互助组,当时叫“三合组”,即一个老战士、一个解放过来的战士、一个新补充来的农村新兵。老战士教我军的性质和优良传统作风,新来的农村战士讲解放区土改后人民生活的变化,“三合组”在生活上互相照顾,政治上团结一致,共同进步。后来证明效果很好,许多解放过来的战士成了战斗骨干,当了班长。

1945年12月26日,我旅从邯郸东南河沙镇出发,准备投入晋冀鲁豫军区发起的聊城、博平战役。

聊城、博平是鲁西北腹地重镇,有“欲控制鲁西北,必先据聊博”之说。盘踞在聊城的是国民党山东省特务第一旅赵振华、郭培德部,共1800余人。盘踞在博平地区的则是国民党山东省保安第四十二旅罗兆龙部,共7000余人,占据大小据点43处。还有高唐和徐官屯为中心的国民党山东省保安部队3000人。敌人总兵力有一万多人,多是当地惯匪、恶棍,在日军占领时期充当皇协军,日本投降后又追随蒋介石。

我旅的作战任务是,由王天祥和我率六旅主力奔袭博平,并派一部兵力配合冀南第一军分区第三十五团围攻城南瓜园和城西侯家庄等据点;任务完成后再向西北扫荡杨官屯、老范庄、郭庄等据点。定于1946年1月2日晚向敌发起攻击。

行军途中,旅长王天祥骑在马上边看《孙子兵法》边对我说:“弱兵攻坚城不利。”他对这次行动有看法,但大概因为是“反正”过来的,在纵队和旅的作战会上没发表意见。会上我倒提过意见:纵队兵力部署太分散,不能到处打,应该集中兵力先打一点,再及其他。但意见未被采纳。

1946年1月2日,我旅接近博平城,当晚10点向城外据点发起攻击。敌外围工事坚固,打了两天,虽然扫清了周围的据点,但城墙没有攻破。1月5日,陈再道、宋任穷来我旅阵

地视察,命令各参战部队在6日黄昏开始攻城。正要展开攻击,城内守敌罗兆龙弃城向徐官屯方向逃跑,我旅随即追击敌人,十七团截获敌600余人。由于敌情复杂,部队进至徐官屯东北地区机动,防敌逃窜。

1月8日,我旅奉命调往聊城协同第五旅作战。9日傍晚,我旅迅速赶到聊城东北的王口、传庄、双庙一带,第十八团当夜进到聊城北关,接替第五旅十四团的阵地。此前,五旅曾对聊城发起过两次强攻,均未奏效。我旅参加了对聊城的第三次攻击。

1月10日上午9点,我旅从东北角攻城。先炮轰城东北角角楼和前沿堡垒,摧垮敌投放滚木的设施,随之以轻、重机枪封锁敌垛口。敌正面工事被我炮火打开一个三米多宽的缺口,但由于受敌外壕障碍,攻击部队没能及时越过。十八团和十四、十五团的攻击部队也没通过外壕。有的虽过了外壕,但受敌火力阻击,没能架上梯子。只有十三团主攻连的一个排登上了城头,但由于没带重武器,无法摧毁敌城墙上的堡垒,后续部队也没跟上,被敌人反扑下来。上午11点,战斗停止。

纵队首长决定休整三天,14日继续攻城。

情况有了新变化。1月12日,刘、邓首长指示:“停战令已公布,务于元旦(注:13日)24点钟以前全部停止战斗,不得因小失大,给国方以借口,致使我在全国人民面前丧失政治信义。至于日伪军据点至元旦24点钟仍不能攻克者,必须撤出战斗。”

原计划的第四次强攻不得不提前开始。

13日晚发起了第四次强攻。我旅十六团由南门登城,十八团由西门至西北角登城,由十七团和独立团助攻。十六团因南门障碍没排除,桥没搭好,没能通过,也没有将敌人火力

压住,部队过沟时伤亡很大。十七团用火箭筒射城墙,打了几个坑,未能奏效。十八团曾一度从西门攻上城墙,但遭敌人反扑撤回。五旅由东南角以北施行连续外部爆破,进行攻击。就这样一直打到夜里24点,部队停止攻击。

十多天的聊博地区作战中,二纵攻克和收复博平城等大小据点69处,和友邻部队一起共歼敌2000多人,其中二纵歼敌1500多人,并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我军伤亡近1800人。我们六旅作战14次,歼敌700多人,部队伤亡440多人。

聊城最终未能攻克。我们需要检讨的地方,如主观上有轻敌思想,未能集中三个旅攻打一点,结果口子开得大,兵力分散,吃不了;对敌情缺乏足够了解;战前准备不充分;攻城方法不当。当然停战令的限制也是个重要因素。

鄄城回马枪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撕毁停战协定,向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内战全面爆发。

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国民党兵力有30余万人。晋冀鲁豫军区决定集中野战纵队,机动歼灭敌人,作战重点放在豫东方向。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等率领第三、第六、第七纵队共4万余人,执行豫东方向作战任务。陈赓、谢富治等率领第四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一部共两万余人,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执行晋南方向作战。滕代远、王宏坤、薄一波等负责军区工作,并指挥第二纵队和冀南太行军区主力,对付豫北方向之敌,保证野战军主力冀侧安全。

7月初,二纵奉命与冀南军区合并,陈再道任军区司令员,王从吾任冀南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中旬,为牵制

国民党军对中原解放区的进攻,刘、邓首长采取了出敌不意的战术,突然发起了陇海战役,令二纵牵制安阳地区之敌。二纵令六旅、五旅与冀南第三军分区部队在安阳地区佯动,迷惑、牵制敌整编第四十师,掩护我主力向南出击。

8月10日,野战军主力越过陇海路,连克兰封、汤山、杞县、通许、虞城等县,控制铁路线150余公里。17日敌东、西两路军增援时,我旅奉纵队之命进至东明地区作战,掩护我野战军主力侧背的安全。

陇海战役于8月22日结束,歼敌1.6万人,打乱了国民党军的南线进攻计划。

此后,我旅随纵队开赴冀鲁豫前线,先后参加了定陶、巨野战役。

定陶战役开始,我旅强攻大黄集未果,继而攻打小杨湖,以便配合六纵打大杨湖。歼小杨湖之敌一部后,又奉二纵之命,向天爷庙方向追歼逃敌。我当即率部猛追至白茅集、纸房村,歼敌700余人,缴获大批枪弹,使我旅人员、物资得到较大补充。

定陶战役于9月8日结束,历时五天,是个大胜仗,歼敌整编第三师全部及整编第四十七、四十一、六十八师各一部,共1.7万人,俘敌中将师长赵锡田,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其中我旅也毙敌一部,俘敌1400余人,缴获坦克一辆、火炮八门、轻重机枪55挺、长短枪516支、汽车两辆。

定陶战役意义重大。《解放日报》9月12日社论指出:“这是继中原我军突围胜利与苏中大捷之后又一次大胜利。这三个胜利,对于整个解放区南方战线,起了扭转局面的重要作用。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局面是定下来了。”国民党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因此被撤职,由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兼任该

署主任。

巨野战役中,我旅的任务是与第五旅一起,在以龙堙集为中心的的地区进行阻击,钳制敌“王牌军”第五军。龙堙集是菏泽通向巨野济宁公路上的重镇,是第五军进攻重点,也是我们的主要防御方向,守住龙堙集对保障野战军主力在张凤集歼敌至关重要。战前,刘伯承司令员和滕代远副司令员亲临前线视察,作战斗动员,对整个部队鼓舞很大。大家纷纷表示:“人在阵地在!与阵地共存亡!”

战斗十分惨烈。经过11个昼夜的激战,所谓精锐之师的敌第五军前进不到五公里。我旅和五旅胜利地完成了阻击任务。这次战役,歼敌整编第十一师一个建制团,重创第五军,毙、伤敌5000余人,有效地打击了敌精锐嫡系部队的疯狂气焰,取得了**对强敌作战的经验**。战斗中,我旅歼敌800人,自己伤亡331人。

战后晋冀鲁豫军区发出嘉奖令:“我二纵五旅及六旅一部,此次在沙土集至龙堙集的移动防御,尤其是龙堙集之线,抗击蒋军第五军,从九月二十九日至十月九日共计11天,蒋军以强大炮火及飞机轰炸,掩护步兵反复冲锋,而我完成移动防御后,固守龙堙集,始终保持在我军手里,并给进犯蒋军将近2000人之伤亡,且有若干缴获,钳制第五军全部于自己方向,使我左翼从容反击整十一师,充分达到了阻击敌人的任务,并取得了张凤集等作战胜利,这是本次作战的模范防御战例。主要原因是他们十分认真对待上级给予的光荣的作战任务,全旅上下团结一致,听命令,守纪律,无论在政治动员或军事准备上,都十分认真和充分。此种对任务认真负责的态度和模范战例,值得全军学习,特通令全军嘉奖。”

不久,我们在鄆城地区杀了个很痛快的“回马枪”。

10月中旬,敌整编第二十七军军长王敬久统一指挥第五军和整编第十一、七十五、八十八师,由红沙窝至金乡一线北犯巨野、嘉祥、郓城;郑州绥靖公署第四绥靖区司令刘汝明所辖的整编第五十五师、整编第六十八师一部由菏泽北犯鄆城;郑州绥靖公署第五绥靖区司令孙震所辖的整编第四十一师、整编第四十七师残部由滑县地区进犯濮阳。敌人想乘我军主力久战疲惫之机,将我主力压缩在黄河南岸予以歼灭。王敬久一路向北进犯时,行动谨慎,六七个旅集群猬集移动,以防被我各个歼灭。

刘、邓首长鉴于巨野、郓城以西地区不易分割歼敌,遂采用大踏步后退、调动敌人、声东击西、避强击弱之战术,撇开王敬久部,率领第二、第三、第六纵队向濮阳地区机动,寻机歼灭孙震的部队。同时令第七纵队和冀鲁豫军区部队伪装主力在郓城西南地区拆寨墙,平寨沟,准备战场,扬言要与敌第五军决战,迷惑和牵制王敬久部。

这时我旅正在沙土集、黄镇集一带集结休整。接到命令后,10月27日晚,我全旅随纵队由驻地出发,秘密向濮阳地区转移。

时值初冬,寒风袭人。一夜行军,28日下午四五时,部队到达鄆城西南地区,准备就地休息做饭,夜间再走。突然接到通知:部队原地待命,各旅领导到纵队受领作战任务。

原来,上级得到情报:刘汝明整编第六十八师的一一九旅和二十九旅八十六团及师炮兵营、国防部炮兵第十团一个榴弹炮营等近万人,正由菏泽向鄆城冒进。有趣的是,敌人敢于突进,是开封的美国“救济总署”提供的情报:共军主力在巨野地区,其根据地濮阳、范县、观城等地空虚。

刘、邓首长当机立断,决定捕歼这路孤立的冒进之敌。

刘、邓首长令部队将鄆城的辎重星夜北撤，沿途制造弃粮翻车仓皇撤退的假象。美国“救济总署”又及时向国民党军提供情报：鄆城共军辎重星夜撤退，该城十分空虚。刘汝明令一一九旅旅长刘广信放胆前进。10月29日上午10时，刘广信率部来到鄆城以南五公里处。

我们只知道敌人是在鄆城以南这个大方向，不清楚具体地点，边侦察边搜索前进。我二、三、六纵队在鄆城以南对敌实施了大范围包围。29日黄昏，二纵队终于摸到了敌人，包围了敌二十九旅八十六团驻地高魁庄、西富春、东富春等村落。陈再道司令员决心乘敌立足未稳，先歼灭这个团，然后配合友邻部队全歼第一一九旅。

我旅受领任务：以主力攻击南面的东富春和西富春之敌；五旅十五团配属我六旅。我们马上安排了具体作战部署：十八团、十六团攻击西富春，十七团攻击东富春，十五团为二梯队。

29日21时30分，我军发起总攻：三纵从东北面，六纵从东面，二纵从西面同时进行治疗。

我命令十六团从西富春西南面进攻，该团突入村内与敌展开激战。我则率领十八团由南面突击，迅速突入村内。敌人连续四次反冲击均被击退。该团三连与敌展开白刃格斗，共产党员王立举奋不顾身，一连刺死五个敌人。我军与敌展开巷战，逐屋争夺，战斗十分激烈。30日拂晓前，十八、十六团将敌压缩在村中心的几间房屋内。10时左右，敌反扑三次，均被击退；从东富春增援之敌也被击退。战至12时左右，敌一个营大部被歼，残敌向东富春方向溃退。29日晚上，四旅两个团主力也向高魁庄敌八十六团一个营阵地发起了攻击；我旅一部从南边配合。经半小时激战，解决了战斗，除敌

营长率少数人逃窜到东富春外,全部被歼。

30日晚,我旅和四旅主力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东富春之敌八十六团团部和一个营。我旅于20时从南面发起攻击,十六团由西南突破敌前沿,十八团从南面突入,两团与敌展开激烈争夺。十七团在巷战中歼敌一个连。四旅主力于21时从北面发起攻击,由于敌人有了准备,故在接敌运动中增加了伤亡。十二团在进攻敌团部驻地时,敌依托院落,拼命抵抗,形成僵持状态。我又重新组织火力,增加攻击兵力。敌人惊慌了,向北突围,被我杀伤200余人,其余部放下武器投降。

战斗持续到31日凌晨1时,守敌八十六团被我六旅、四旅全部歼灭。敌团长张润珊被击毙,副团长杜兴远被俘。五旅十五团也攻占了南富春、赵庄。敌八十一旅北援时,被十五团阻击在霍庄、李常庄一带。

与此同时,友邻三纵攻占苏屯,六纵攻占同任庄、蜂窝。刘广信率残敌龟缩在刘庄、妙庄、石庄、崔庄等地。31日17时,刘广信向菏泽方向突围。陈再道司令员令我旅和四旅向敌纵深猛插,令五旅在大堤上堵击。

我率十八团和十六团一部追击敌人。十八团六连最先赶到大堤与敌人接火。敌人边打边跑。六连连长李金星带着队伍向南猛插,截住敌人去路。他和副排长林如相、班长王树海用机枪、手榴弹把第一辆车上的敌人击毙,汽车堵塞了道路。接着连续截获了六辆汽车。敌人有的被击毙,有的被俘。我后续部队赶来,又截获敌九辆汽车和牵引的五门美制105毫米榴弹炮。

105火炮是我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自卫作战以来第一次缴获的重武器。国民党炮十团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曾参加过远征缅甸,日本投降后,由美国军官亲自训练,全部美式装

备,是“头等炮团”。其第一营配属刘广信部 400 多名炮兵,大部被歼。残敌逃至崔楼以南野外地区,被我旅十六、十八团和四旅包围,经两小时战斗,将其歼灭。刘广信率少数人马南逃,在白集被冀南独立第四旅俘虏。

被我截获的火炮、汽车,许多陷进了黄河故道。31 日夜,我旅十八团参谋长孙济云和十六团副团长张履亭率部队将这些火炮、汽车一辆辆往上拉。战士们脱掉衣服,跳进冰凉的水里,整整干了一夜,共拉上五门榴弹炮、两门山炮和 15 辆汽车。第二天早晨,太阳出来,全村男女老少都赶来看大炮,大炮周围围成了厚厚的人墙。一个手持拐杖的老太太挤进人群,兴奋地嚷着:“同志们!闪开,让我老婆子开开眼,看老蒋到底有多厉害!”一个男青年说:“好人的炮口,装进一个人头也行!”还伸开胳膊去量炮身,说:“真有一丈多呀!”大家热热闹闹笑个不休。战士们兴高采烈地朗诵着自编的打油诗:

反动头子蒋介石,联合美帝打内战。
依仗飞机和大炮,疯狂进攻解放区。
残酷迫害老百姓,罪恶深重诉不尽。
送来美制榴弹炮,告其主子美国佬,
收下“礼炮”得还礼,狠狠打击狗豺狼。
军民团结一条心,必将战胜蒋匪军。

缴获了重武器,部队情绪很高。我们几个旅领导也是第一次看到美式榴弹炮。炮很重,牵引炮的十轮卡车也坏了,又没有司机,怎么办?只好一个营拉一门榴弹炮,各营分别往北拉,拉了一两天,野战军司令部派人来把牵引车修好,才把榴弹炮拉走。

鄆城战役,全歼进犯之敌 9000 余人,缴获榴弹炮八门、山炮七门、其他炮 132 门、汽车 22 辆。其中,我六旅歼敌 1421

人,缴获榴弹炮五门、山炮两门、其他炮 13 门、汽车 15 辆。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祝郟城大捷》,指出:“这是冀鲁豫前线主力军继巨野战役后第四次大捷”,“我主力摆脱了对某些城市和交通线的负担,可机动自如,大踏步进退,给敌人以歼灭打击,是奠定了大反攻基础”。

浴血郑庄寨

郑庄寨之战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战斗。

在此之前的三个多月,我旅参加了滑县、巨金鱼战役和再克定陶城战斗,均是胜仗。1947 年春节是在战火中度过的。到 3 月份,进攻山东的敌军,准备从徐州、济南两个方向实施南北对进,企图在鲁南地区寻歼我主力。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决定在莱芜地区首先歼灭北路进犯之敌。为保障华东野战军莱芜战役的胜利,中央军委指示,刘邓野战军要拖住国民党军第五军,使其不得投入山东战场。

为了贯彻中央军委意图,刘、邓首长决定,待第五军进到民权后再向商丘运动时,歼其先头部队四十五师。

听到这个消息,我们特别振奋。第五军是蒋介石的王牌主力,也是我们的老对头。在龙垌集地区进行运动防御作战时,我旅和它较量过,后来在南乐、大名地区也遭遇过,当时想打,由于敌军以密集队形稳步推进,加上地形条件不理想,没打成。这次第五军又来了,真是冤家路窄。

我们冒着严寒向民权以东地区挺进。还没到待机点,上级突然命令停止前进。原来情况发生变化:第五军已进抵商丘,先头部队也到达砀山。这样一来,打敌四十五师的计划无法实施了。

部队原地待命。这时,沿陇海路继续东进的敌整编第八十五师、整编第七十二师和第二快速纵队(四十九旅)已进驻民权、兰封地区,整编第八十五师师部驻在民权以西的郑庄寨。

为了把进抵商丘的第五军拉回来,刘、邓首长决定采用“打敌所必救”的战法,南、北集团同时向陇海线整编第八十五师等部发起攻击。刘伯承司令员亲自到二纵指挥部作了部署,要求部队打得猛,打得狠,打得快。只有把整编第八十五师打痛了,才能把第五军拉回来;不疼不痒,不仅第五军拉不回来,整编第八十五师也会投入山东战场。明确指出,只要把第五军拉回来就是胜利。

陈再道司令员命令:四旅、六旅攻打郑庄寨的整编第八十五师师部,由四旅旅长孔庆德统一指挥,2月11日24时发起战斗;四旅从郑庄寨的东北面、北面攻击;六旅从西面和西南面攻击。

郑庄寨位于民权车站西约五公里的铁路线南侧,其寨墙高约五米,外壕有水,宽约四米,周围地形开阔,防御工事较强。寨内驻有整编第八十五师师部及直属的炮兵营、工兵营、通讯营和一个步兵团;东面的朱庄寨、陈庄,西南面的杨庄和西边的野鸡岗都有敌人驻守,火力可与郑庄寨互相支援。

我和王天祥旅长研究后,决定十六团从西南角突击,十八团从西门助攻,十七团为预备队。

纵队要求我们于当日19时出发。考虑到时间太紧,还要行走30公里,我们提前到18时即从曹县西南陈庄地区出发了。部队在黄河故道沙滩上行进,吃力、难走。十六团是前卫团,在铁路北面的刘庄与敌整编第七十二师一个营遭遇。团长宋东旭当即令二营留下牵制该敌,自己率一、三两营向南插

去。

四旅于12日零时30分向郑庄寨之敌发起猛攻。强攻两次,均未奏效。我旅十六团于12日2时赶到,从西南角向敌发起攻击。战斗激烈,因梯子短,够不上城头,未能突破。十八团从西面攻击,也未突破。十七团的主力同十六团的二营围歼刘庄之敌。任务完成后,二营向郑庄寨进击时,在铁路上又与敌铁甲车巡逻部队遭遇,未能越过铁路,继续在路边监视敌人。

12日凌晨4时,四旅与我旅再次向郑庄寨发起攻击。四旅组织工兵爆破,将北门炸开了一个缺口,但敌人火力严密封锁,攻击部队多次冲击,没能突入。这时,我旅指挥所已从扈庄移到铁路北侧的一道封锁沟里,枪炮声震耳欲聋,通向各团的电话线多被炸断,同十六团的联系始终没有接通。

实际上,十六团团长沙东旭率领的一、三营已突入寨内,与敌人展开了激烈巷战,打乱了敌人的指挥体系。敌为援救整编第八十五师,第五军已经离开碭山向西回援。

我们的意图已经实现。凌晨5时左右,王天祥旅长接到前线指挥所命令:撤出战斗。王旅长向部队下达撤退命令后,才突然得知,十六团团长沙东旭率领的两个营及团指挥所已经从西南角突进了郑庄寨。他当即向前线指挥所报告了这一情况,命令十七团从十六团的突破口继续向郑庄寨突入,协助第十六团撤退。可是由于敌人火力封锁严密,没能攻进。前线指挥所又来急令,要求我们撤退。我们赶紧派人通知十六团立即外撤。

天亮了。友邻部队已撤出战斗。郑庄寨东、西两面的援敌开始反扑,正向我们逼近。

情况很危急。可是还不清楚十六团撤出的情况,我们焦

急等待,不肯走。反扑的敌人越来越近了,警卫员提醒,必须马上撤离,我们几个人最后才撤出了阵地,并向前线指挥所报告我十六团没撤出来。

黄河故道的沙滩上,我们每向北迈进一步,心情都格外沉重。飞机在头上嘶叫轰炸,榴弹炮弹在周围爆炸,我们都忘了躲避。撤到黄河故道北岸已是下午,远处郑庄寨方向的枪炮声仍在响着,显然,十六团还没有撤出来!

我和王旅长商量,决心不走了,要组织部队向郑庄寨反击,接应十六团北撤。开始,陈再道司令员同意我们的计划,两个旅各组织一个突击队准备反击,但随后又否定了,说我们已经完成了任务,再强攻只会造成更大伤亡。敌第五军等正向郑庄寨驰援。上级决定部队继续北撤,以便进一步拖住五军。

12日下午,敌人派出大批飞机,在毕集附近一些村庄轮番进行轰炸和扫射。郑庄寨方向枪炮声仍在不间断地响着。

攻进郑庄寨的有十六团的指挥所和两个营兵力,最后只有少数人突围出来。从他们嘴里知道了事情的大致经过:

当时,十六团团团长宋东旭带领部队冲进寨内,直捣敌整编第八十五师师部。先后占领了西街和敌榴弹炮阵地,俘虏了许多敌人,活捉了敌师参谋长,缴获了榴弹炮和92式山炮各八门。敌人非常惊恐,四处告急求救。十六团与旅指挥所的电话接通了,但又被炸断。通信员出来联络,途中也全部牺牲。8时左右,敌援兵以两个团的兵力向十六团反扑。十六团处境十分不利。10时左右,宋东旭率部向西突围,连续三次都没成功。他们依托十几间民房和一个炮楼顽强战斗。12时左右,敌人集中炮火及轻重武器、燃烧弹等向十六团轰击,双方展开逐房争夺。伤亡越来越大,但十六团的干部战士毫

无畏惧,浴血奋战,视死如归。一连有个长得较黑的战士,外号“黑鬼子”,一人坚守一个院子,一连刺死十几个敌人。部队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拼;刺刀拼弯了,就用枪托砸;给敌人以大量杀伤。战斗到16时左右,十六团只剩下200多人了。他们组织了突围。在敌人密集火力下,40余人幸生还,其余全部壮烈牺牲。

司令部参谋郭树春肠子被打断,坚持爬了几十里路找回部队。这次战斗,十六团牺牲重大,共计损失七个步兵连、两个重机枪连和一个迫击炮连。团长宋东旭、团政治处主任于哲英勇牺牲。

北去路上,全旅一片悲痛。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此刻大家见面,都是两眼含泪,相对无言。

纵队领导讲,这次我旅虽然遭到严重损失,但受到了刘、邓首长表扬,说“二纵打得好,特别是十六团的英雄们打得好,打得英勇顽强,终于把五军拉回来了,配合了华东野战军莱芜战役的胜利”。又说,“要看全局,整个豫皖边战役共歼敌1.6万余人。你们部分牺牲,换来了全局的胜利,是值得的”。

可我怎么也无法平静,心里像压着千斤巨石。抗战时期,我在冀南军区任组织部长时经常到十六团检查工作。在冀南第六分区任政委时,和这个团指战员更熟悉了。万万没有想到,这次他们会有这么大的损失。宋东旭团长和其他指战员们的熟悉面孔时时在我眼前重现:

宋东旭,时年29岁,河北省巨鹿县人,1938年2月入伍,同年4月入党。精明强干,文武双全。曾任团总支书记、团政治处主任和团政治委员,后改任团长。每次作战都身先士卒,这次又亲率部队攻入郑庄寨,直捣敌师部,奋勇杀敌,壮烈牺牲,堪称指挥员的楷模。

政治处主任于哲,时年 27 岁,河北省青县人,1938 年入伍,1939 年入党。参军后一直做政治工作,任干事、科长等职。作风正派,待人诚恳,工作细致,严于律己,和蔼可亲,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工作干部。

此外,还有老红军战上一营营长胡学廉,一贯作战勇敢,多次负伤;优秀的一营教导员王清廷,是位模范的政工干部;三营营长耿明辉,英勇善战,机智多谋……他们都光荣牺牲了。越想这些,心里越不平静。

我们深刻总结了这次战斗的经验教训:一、攻前准备不足。郑庄寨地形地物没有侦察清楚,结果登城的梯子做得太短,影响顺利突破。部队从 30 公里之外向郑庄寨奔袭,途中受壕沟、封锁沟的障碍,铁路上与敌人遭遇,延误了攻击时间。二、组织指挥不严密,协同配合不好。我们和四旅的协同没搞好,两个旅的前线统一指挥协调基本没形成,有的打响了,有的还没有进入攻击点。三、通讯联络不好。十六团越过铁路不久,就和旅指挥所失去联系。因为通讯中断,以至该团攻入寨内很久,旅指挥所还不知道。由于组织指挥不严密,协同动作不好,致使十六团未能同时撤出战斗,遭到重大伤亡。

战后,从冀南第六军分区调出基于一团,补充到了十六团。基于一团的团、营、连部分骨干,原来就是十六团的前身七旅十九团调去的。新到十六团任职的团长张继怀、政治委员胡永昌都是原十九团的干部,他们和副团长张履亭、参谋长贺格非、政治处主任于肇彭一起领导全团,很快恢复了元气,在以后的战斗中,继承和发扬了“冀南战斗模范团”的光荣传统。

宋东旭等烈士,不仅永远活在我们这些老战士心中,也同样活在民权县人民的心里。民权县烈士陵园里,铭刻着他们

的英名。我永远怀念他们。

攻克“十三太保”

1947年3月,国民党军调整战略,由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蒋介石调集94个旅,占其进攻解放区总兵力的43%,分别向陕北和山东进攻。3月15日,又将黄河在花园口合拢,回归故道,构成从风陵渡到济南约1000公里正面的所谓“黄河防线”,派兵防守,以阻止晋冀鲁豫野战军向南支援山东战场。

为粉碎敌人对我陕北、山东的重点进攻,刘、邓首长遵照军委指示,决定在晋南发起反攻作战的同时,发起豫北战役。

3月23日,我旅奉命由驻地出发,28日进至滑县以南集结。4月5日,纵队给我旅下达了作战任务:围歼太保之敌。其目的是破坏淇县和安阳段铁路,扫清卫河西的土顽,创造有利战场。

这一仗对我旅十分重要,不仅因为这个仗将由我旅单独去打,更重要的是,这是继郑庄寨战斗失利和大批新兵补充部队后的第一仗。我暗下决心,一定要用胜仗来提高和鼓舞部队士气。

在此之前一个多月,我旅在鲁西冠县和朝城地区进行休整。部队连续作战几个月,指战员十分疲乏。这一年过春节,又正赶上打定陶城,战士们洗的衣服还没干就收起来,这次休整,先来了一个彻底大扫除。

我们的休整地区属冀南一分区管辖,地委、行署领导对部队十分关心,冀南各界派来慰问团进行慰问。冀南艺术学校等文艺团体给部队演出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还送来了大批猪

肉、白面、鸡蛋等。战士们自己动手包饺子、做菜，高高兴兴地过了一个晚年。行署领导到连队看望战士，看到大家吃饺子，高兴地说：“同志们辛苦了，给你们拜个晚年，冀南是你们的老家，回家过好年，新春多打胜仗！”

部队指战员多数是冀南人，现在驻在冀南地区，感到特别亲切。有的虽不是冀南人，也是在冀南抗日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与冀南人民结下了深厚情谊。1946年9月，冀南区党委曾号召冀南全党，动员一切力量，支援前线部队作战。冀南行政公署提出三项任务：动员青年群众参军，保证前线部队满员；每人每天节约一两米支援战争；做好拥军优属和战勤工作，支援前线。我们在前方打仗，他们在后方全力支援，给部队送粮食，送棉衣，抢救安置伤员。特别是动员大批分得土地的翻身青年农民参军，当年就有1.9万余名冀南青年补充到二纵。为了使战士在前方安心打仗，他们还给军属给予种种优待，帮助耕种土地，帮助翻修房屋，帮助无劳力的军属担水、扫院、照顾病人等等，解除了战士们的后顾之忧。

4月5日下午4时，我和旅长王天祥率领部队直奔太保地区，先将敌包围。

太保位子安阳以东30余公里，是敌安阳外围的重要据点之一。所谓太保，是以程太保为核心，四周有王太保、袁大保、秦太保、刘太保、吴太保、郭太保等12个太保，总称“十三太保”，为敌河南省“人民自卫军”第二总队总队长程道生部盘踞。程道生是漳河两岸著名匪首，其总部和特务营、手枪队、第七团两个营、第五团一个营驻守在程太保。敌县政府、专员公署和若干区队分别驻守在其他几个太保内。敌人总兵力达2000多人。程道生在此经营已久，防御工事强，寨门两侧及外壕内都筑有明暗地堡群。他们经常四处抢掠、奸淫，无所不

为,人民恨之人骨,称程道生为“活阎王”。我部队到达时,程道生下令连夜加修工事,企图坚守顽抗。

以往打仗,旅长王天祥由于背景有点特殊,主动性受影响,多由副旅长周发田直接指挥;周发田调学后,王天祥变得积极主动,打郑庄寨时亲临第一线指挥,没想到结果却不妙,十六团遭到了重大损失。他心情沉痛,情绪很不好。这次打太保基本上由我来组织指挥。

包围圈完成后,我和旅的几个领导到阵地前沿观察地形,发现各据点之间有交通沟相连,相距都不过500米,便决心集中主力,首先攻击敌核心据点程太保,再扫清外围各据点之敌。作战部署是:十七团由东门强攻;十八团由南门强攻;十六团包围监视吴太保、张台上两据点之敌,如敌人突围则消灭之;由派来打援的五旅派出一个营,占领蔡、王太保,防敌向西逃窜。战术上,针对敌人特点也作了比较充分的研究。敌人有地道网,互相通联。为防止其从地道逃跑,我们就挖工事,破坏地道,堵住敌人的地道逃路。还研究了攻城的炮火准备、工兵爆破与突击队行动的密切配合等问题。

经过两昼夜土工作业,十七团和十八团将交通壕挖到了距敌人50米处;十六团挖工事破坏了敌吴太保、张台上至程太保、李太保之间的交通沟,切断了敌人联系;炮兵也抵近敌据点外围50米至150米构筑了工事。主攻团各级指挥员详细地观察了地形,选择了突破口,组织了突击队、爆破组,研究了攻坚战术。我和王天祥旅长写信给程道生,劝他认清形势,放下武器,向人民投降,可保证他的生命安全。程道生不听劝告。我们下令发起总攻。

8日14时开始,我旅的山炮、迫击炮进行了火力准备,将程太保南门、东门及其外围地堡和东北角村外独立炮楼摧毁。

外围据点之敌纷纷向程太保逃窜,十六团当即收复吴太保、张台上,十八团收复了郭太保。18时30分,工兵实施爆破。18时50分,各部队开始突击,仅10分钟,十七团、十八团便打开突破口。十七团两个爆破组将寨门炸开后,突击队与敌激战四分钟,即由东门突入寨内。该团两个营向程道生住宅攻击前进,另一个营向东南角发展。十八团一个营向敌营房阵地攻击,两个营向北、西北发展,与十七团主力夹击程道生住宅。十六团除在北门布防防敌突围外,有一个营突入寨内。

程道生垂死挣扎,组织部队四次反扑,均被击退。21时,残敌200余人(大部为程道生部的手枪队)向北门突围,突出之敌被十六团歼灭,余敌又缩回寨内。第十六团机智灵活,乘机由北门突破口冲入寨内,协同十七、十八团向守敌猛攻。程道生率残部在公馆大院依仗坚固工事继续顽抗。攻击部队连克敌地堡,经过20分钟战斗,除守敌第七团团长率亲信十余人从东南角逃窜外,其余全部被歼。

战斗中,十八团七连排长赵步贞第一个登上敌寨墙,挥舞大刀,一气砍死七个敌人,并与九连连长曲洪发一起将敌总队长程道生、参谋长程碧植生俘。战后,赵步贞、曲洪发分别被纵队授予“战斗英雄”、“孤胆英雄”称号,各记大功一次。

程道生这个恶贯满盈的匪首提出要见旅首长。我和王天祥见了。程反复求饶,不要杀他。我说:“我们写信劝你放下武器,你不听;现在已经晚了,人民有权处置你。”我们原准备将程道生上送,可当地人民不干,坚决请求交给当地政府处理。地方政府在程太保召开了公审大会,附近几十里的人民群众几乎都来了。他们把程道生捆在两棵树的中间,男女老少纷纷控诉他的滔天罪行。一位老大娘哭诉程匪如何抓走她的儿子,强奸她的女儿,霸占她的土地,逼死她的丈夫。控诉

完了,她拿出剪刀向程匪身上扎去。最后这个恶贯满盈的“活阎王”得到了应有下场。

这次胜利,一条最重的原因是高涨的政治情绪和战术技术的有机结合。郑庄寨失利后,部队受到很大刺激,为烈士们报仇的情绪高涨。豫北反攻作战意义重大,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粉碎敌人重点进攻而战的决心,在广大指战员心中深深扎根。接受攻打太保任务后,部队纷纷要求担任主攻。打土顽有时比打正规军还难,必须针对其特点,稳扎稳打。我们在战前作了充分准备,开展军事民主,研究战术、技术。这次炮火准备、工兵爆破、突击队三者密切配合得好。大家讨论时,一致认为挖交通沟是接近和封锁敌人的好办法,干部战士都干得很自觉,很起劲,各部队仅用60小时,就完成了15公里交通沟的土工作业。

第六章 挺进大别山

打过黄河去

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在中国解放战争历史上很有名。但当时对挺进大别山这一战略意图是严格保密的。开始只传达到军区和纵队领导,后来传达到旅的主官,渡过黄河一段时间后,才向部队动员交底。

1947年6月,全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解放区军民已经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国民党凭借其军队数量和装备优势,加强了对山东和陕北两个战场的重点进攻:用于陕北战场兵力有31个旅20多万人,山东战场的兵力达到56个旅40多万人。敌人准备在消灭山东和陕北的我军后,再转兵其他战场,以实现最后摧毁解放区、消灭解放军的目的。

党中央根据形势发展作出了新的战略决策:“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

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

中央军委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首先突破国民党军的中央防线，打到中原去，揭开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

于是，有了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

6月中旬，二纵与冀南军区分建。二纵司令员为陈再道，政治委员王维纲，副司令员范朝利，副政治委员钟汉华，参谋长王蕴瑞，政治部主任许梦侠。我仍为六旅政治委员，旅长周发田，副旅长牟海秀，副政治委员彭学桂，参谋长王树棠，政治部主任于笑虹。冀南军区抽调 1700 多名排以上干部，动员了数千名青年参军，全部补充到二纵。

我旅兵员充实，干部满员。解放战争一年以来，我旅经过了大小战斗 40 多次，歼敌 8600 余人，缴获各种火炮 49 门、各种枪 5400 余支；人数也从当初的 4100 多人，发展到 6700 多人。

在安阳以东申村地区，我们认真进行了战前整训。纵队召开了庆功大会。我和周发田带领英模功臣代表共 300 多人，出席了纵队在樊营召开的第一届人民功臣大会。会上选出陈再道、王从吾、范朝利、刘志坚、王蕴瑞、钟汉华和著名战斗英雄周茂祥、任笑祥、赵步贞、任来保等 17 位同志为大会主席团。出席大会的有 1000 多人。

刘伯承司令员亲临大会并讲话。他说：“现在我们处于大反攻的前夜。人民希望我们在反攻中，从消灭蒋军 90 个旅发展到 180 个旅，一直把蒋军进攻解放区的 223 个旅全部消灭，解除蒋介石对中国人民的压迫。现在敌人的主要兵力用在陕北、山东两个战场。我们要给他来个中央突破，从中间打出去。”他希望大家在反攻中要很好地完成打仗、土改和执行财经制度三大任务，认真总结和交流经验，不骄不躁，争取为人

民立下更大的功劳。他的讲话振奋人心,不时被掌声和口号声打断,庆功大会仿佛成了战前动员大会。

会后,我旅也召开了英模功臣大会和南征誓师大会。

由于战略意图高度保密,指战员只知道要渡过黄河,反攻作战。我旅已两出陇海过黄河作战,大家习以为常了,谁也没有料到过河后会长驱直入,挺进大别山。

6月25日,我旅离开申村向清丰地区开进。27日下午,我参加了纵队在清丰县召开的会议,会上传达了野战军首长命令:以第一、二、三、六纵队,从张秋镇至临濮集150公里地段上强渡黄河,首先歼灭黄河南岸守敌刘汝明的两个整编师,再歼援敌于运动之中,而后跃进大别山。

蒋介石为了搞黄河战略,3月份就下令将黄河花园口合拢,使河水全部流入黄河故道,企图以黄河天险阻挡我军南下,并扬言黄河能抵40万大军。

6月30日夜,我旅尾随四旅从范县南边的林楼渡口渡河。

这是一个月白风清之夜,也正是中国共产党26周年生日前夜。在“打过黄河去,向党的生日献礼”的口号声中,我旅指战员有秩序地登船。

渡船从隐蔽的河滩芦苇中驶出来。船工们胸前戴着大红花,跨上舵位。指战员把机枪架在船头,指定专人掩护船工。一声令下,船只迅速向黄河南岸冲去。刚到河心,被南岸守敌整编第五十五师七十四旅部队发觉,开始射击。我炮兵营开炮还击。第四旅突击队船只冲在最前面,不到一刻钟抵达南岸,抢占了河滩阵地,控制了仲固集到李楼一线河堤阵地,保障后续部队继续渡河。我旅胜利地登上南岸,立即向水堡集推进。

是日夜,我12万大军从八个渡口同时强渡,第二天全部过了黄河。这是鲁西南战役开局的第一仗,它不仅意味着我们胜利迈出了挺进大别山的第一步,也由此揭开了我军战略进攻的真正序幕。

“可抵40万大军”的黄河天险一夜之间就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突破了。资料记载,当时蒋介石正在为欢迎司徒雷登举行宴会,听到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郭汝瑰报告这一消息,脸色苍白,说不出话来。司徒雷登也惊呼:这简直是惊人的事件,不亚于当年法国的“马其诺防线”被攻破。

为堵住黄河防线被我军突破后的缺口,拱卫徐州、郑州,蒋介石急令整编第五十五师主力守郟城,整编第六十八师主力及第五十五师一八一旅守菏泽;调第一五三旅守定陶,交警总队及地方部队守曹县等城,以牵制我野战军主力。又从豫皖苏区抽调整编第五十八师、从豫北抽调整编第三十二、六十六师和嘉祥地区的整编第七十师,统归王敬久指挥,攻击我刘邓大军侧背,迫使我军背水作战,逼我回到黄河以北。

刘、邓首长决心采用“攻敌一点,吸敌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的战法,趁敌援军未到之际,首先攻歼郟城、定陶、曹县诸敌,然后集中兵力在运动中歼灭来援之敌。

我旅渡过黄河后,经过三天强行军,于7月4日进抵郟城皇姑庵一带。上午9时,接到纵队电话通知,要我们去领受新任务。我和周发田立即骑马赶到纵队司令部。作战室里,气氛异常紧张。进屋后,我很快扫一眼最近的敌情标图,便把注意力转向墙上的5万分之一地图。

陈再道司令员详细介绍了敌我态势,对我和周发田说:“我军一纵已把郟城之敌包围起来了,城关外围的争夺战已顺利完成,正准备攻城;六纵和我纵四旅协同前进,袭击、包围了

定陶。你们六旅当前的任务是，奔袭夺取曹县并歼灭该城之敌，打开南进的通道。你们是整个反攻大军的最先头部队。这个任务要在5日24时前完成。”

我用手在地图上量了一下，路程约90公里。只有30多小时了，时间相当紧张。如果出发太早，部队准备来不及。经过斟酌，我和周发田决定下午5时出发。我们利用纵队司令部的电话命令部队做好准备，要求各团干部到旅部接受任务。

回到旅部，我们即向各团领导作了部署。下午5时，各部队集合在村外。部队情绪活跃，有的唱歌，有的呼口号。这里每块土地我们都很熟悉。去年9月曾在这一带进行过龙堙集运动防御战，今年春天，也曾路过此地去打西台集和定陶城。

队伍出发，向西南方向奔去。刚走了十多公里，突然雷声滚动，下起倾盆大雨，道路变得泥泞。除了闪电和地上积水的反光，什么也看不见了。部队照样快速前进，后面的人紧跟前面的人，用声音保持着联络。不时有人跌倒在泥水里，爬起来又走。天亮一看，大部分人都没鞋了，是赤着脚走过来的，我也一样。雨还在下，路又难走，侦察员一时也没有摸清情况，真是急人。直到天黑，找到一个向导，才弄清楚，离曹县还有15公里。

我和周发田立即发出命令：急行军。约两小时后，我们到达了曹县东北的杜庄、马庄。询问老乡得知，城内守敌地方部队保安旅已在白天逃跑了。我旅立即进占曹县城，这时看表，正好是5日夜24时。

部队进城后严格遵守群众纪律，秩序井然，商店照常营业。老百姓自动将国民党军修筑的工事拆掉了，把被抢去修筑工事的铺板、门板、桌椅、板凳搬回家。他们不停地咒骂国民党军，不少老乡走到我们跟前说：“俺们前几天就听说刘司

令员、邓政委带十几万大军过黄河了,没想到你们来得这么快;再不来,俺们可真活不下去了!”

刘邓大军攻占曹县、定陶、郓城后,敌人也摆开了架势。敌整编第七十、三十二、六十六师分别在巨野东南至金乡西北的六营集、独山集、羊山集地区摆了一条长蛇阵。刘、邓首长命各纵队对敌人实施分割、包围,各个歼灭。

7月11日,我旅从曹县迅速北返,到南鲁集时接到命令:随纵队进至六营集东北地区,截击向东退却的敌整编第七十师、三十二师。12日晚,我旅赶到谢家集附近,发现了敌人。我十六团前卫营同敌人放哨的一个班遭遇,很快把敌歼灭。从俘虏口供中得知:敌整编第六十六师十三旅三十八团全部驻谢家集,担任驻羊山集整编第六十六师主力左翼的警戒。该敌依托旧有围寨,正在加紧伐木锯树,构筑防御工事。他们白天在谢家集以西地区抢粮,因天黑前赶不到羊山集,便在谢家集宿营。

我和周发田、王树棠定下决心:从南、西、北三面包围敌人,并在其东面通往羊山集的道路上留了一个口子,埋伏一支部队,截击逃敌。纵队司令部告知,第五旅在谢家集东北与羊山集之间驻有部队。我们随即与五旅联系,他们同意协同我部歼灭逃敌。各部队迅速进入指定位置。13日拂晓,大雾弥漫,加上有青纱帐,几丈远很难看清人。我们提前了总攻时间。

上午10时左右,两个主攻方向和其他佯攻方向上的所有火炮、机枪一齐开火,各攻击部队向谢家集之敌展开猛烈攻击。

十六团首先抄至谢家集南门外围,由一营和三营先行攻击;十七、十八团也从西门、北门展开了攻击。各突击部队很

快夺取了敌人前沿阵地,并迅速攻入街道。敌人开始还负隅顽抗,后来发生动摇,向东面突围,企图靠拢羊山集。十六团一营和三营顽强阻击。埋伏在村外的部队和第五旅也突然开火,与主攻部队前后夹击。经两小时激战,敌第三十八团终于被我全歼,敲掉了敌整编第六十六师的一颗犬牙。

16日,我旅奉命转移到羊山集西面待命,作攻击羊山集的准备。

鏖战羊山集

羊山集坐落微山湖以西,是金乡县西北的一个大镇,有千余户人家,东西长1.5公里,镇上有条自西向东的大街,镇的东、南、西三面,敌人挖有一道两米深、三米多宽的壕沟。羊山集北面有一溜大大小小的山头,长约2.5公里,远远望去,犹如卧着一只绵羊,故名羊山。羊山东面的山头称为羊头,中间一列较高的山头称为羊身,制高点可瞰制羊山和羊山集全镇。西面几个小山称为羊尾。羊山在古代就是屯兵据守之地,山周围还完好地保留着明代末期的寨墙。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也在此修筑了一个大据点。羊山集地势低洼,此时适逢雨季,周围一片泥泞,很不便于部队运动。

敌整编第六十六师正是依托羊山制高点,在羊山集内的十字大街筑起较坚固的核心阵地坚守。该师师长宋瑞珂,山东青岛人,中将,黄埔军官学校第三期毕业生,在国民党陆军大学将官班受过训,是国民党将领中出类拔萃的人物。该师是国民党的嫡系部队,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曾在这个部队任职。其营、连长大都是军官学校毕业生,有一定的作战经验。去年6月,国民党军在大别山围攻李先念的部队时,也是

这个宋瑞珂，打响了全国内战的第一枪。豫北战役中，其一九九旅一部在白塔寺被我军歼灭 2000 余人，在谢家集又被我军歼灭一个团，但主力没有受到大的损失。这次被我军围困在羊山集，他一面依托有利地形顽抗，一面呼吁国民党军尽快增援。

7月17日黄昏，我军对羊山集发起了第一次攻击。

羊山集比预计的难打得多。由于有轻敌思想，战前准备并不充分。攻击开始不久，五旅报告说已攻下羊尾，正在向羊身前进。四旅就由西面放手向羊山集攻击，并拥进大量部队。可情况并非如此，五旅也没弄明白，他们实际上只攻下了羊尾的一些小山包。纵队领导对五旅的报告信以为真，很高兴，夜里12时左右，还命令攻入羊山集的部队多投入兵力，多抓俘虏，多缴获枪支弹药。但后来又不见动静了。我旅刚打完谢家集，正在待命，等到凌晨5时多，还没来任务，我便告诉参谋，我先睡会儿觉。

羊山集的真实战况直到18日拂晓才弄清楚：羊尾的主要山包和羊山制高点仍在敌人手中，敌人反扑很凶，我部队暴露在敌火力网下，队形密集，地面的土房、草房根本挡不住敌人火力扫射。部队遭到重大伤亡，大部分撤出战斗。五旅只留有一个营在羊尾的小山包上坚守。四旅也有一个营在西关外坚守。

这时已经到了18日凌晨6时，我刚躺下不久，突然接到陈再道司令员电话：“前面情况不好，你带全旅部队，立即赶到四旅、五旅的阵地，把丢掉的阵地给我全部夺回来；对前面混乱部队立即收集整理，跟你部队一起战斗！”

我告诉周发田：“情况紧急，我带部队先走，后面你向纵队请示作进一步安排部署。”

我迅速赶到西门外阵地。先到了第五旅指挥所,见到旅参谋长陈中明。他介绍说,有两个连守在小山头(羊尾),其他部队不知旅长带到了哪里,没有联系上。我令十七团接替了他的阵地,便顺着战壕向第四旅原阵地走去,没走多远,遇到第五旅政治部组织科长。他已负重伤,我让人将他抬下去救治。再到十八团部队,他们也完成了对第四旅的阵地接替。我命令他们:“如果敌人反扑,坚决反击回去,坚守阵地。”

看完阵地,我感到事态严峻:敌人已经把我第四旅、五旅的部队都挤出来了,夺去了全部羊山集西街阵地。我让部队赶紧筑好阵地工事,准备晚上夺回西关阵地。

陈再道司令员很着急,再次来电话:“你要部队把所有阵地守住,稳住战场局势,加强攻击兵力,赶紧把西关夺回来!”

我说:“我看了部队,看了地形,马上攻西关,会受到敌人羊山主峰强大火力的阻击,要进行攻击准备后才能干。西关阵地,在黄昏前全部夺回来没有问题。”

陈再道突然发火了:“你怕死呀!”

我左右为难。老实讲,我觉得眼下情况肯定不能硬攻,否则两个团的部队只会白白送死。可是我又不能违抗军令。情急之中,我想缓冲一下,就说再把情况摸一下,准备晚上夺回西关阵地。

陈再道不同意,大吼起来:“你们不敢冲击,我来带突击队!”

我赶紧说:“使不得,我带突击队就可以。”

我还是觉得现在不能硬攻。没有办法,我马上给纵队王维纲政委打电话:“请你到前面来看一下,我跟你讲讲我的意见。”

王维纲来了,观察毕,他再跟陈再道通话,同意了我的意

见。

黄昏前,山炮连把山炮拉来了。晚上进攻西关时,有了炮火支援,部队通过激战,夺回了西关。可是,再往里攻就困难了。羊山集与羊山头中间有一条狭窄地带,敌人把这个地方的房屋拆光,成了30米宽的开阔地带。东街向西筑有三层地堡,山头有重武器掩护,羊山主峰火力可以直接控制西街。夺回西关后,我让部队连夜修筑工事,防止敌人反扑。第二天,敌人开始反击,都被我击退。我们部队守得很稳,伤亡不大。

19日19时,陈再道司令员命令部队发起第二次总攻击,亦未奏效。后连续两天攻击均未成功,我军与敌人形成了对峙。我在羊山集西大街和部队住在一起,边了解部队思想情况边观察敌情,思考对策。

一连数日,大雨连绵,战壕里积了很深的水,战士们用各种办法排水。天稍稍放晴,蒋介石为了给整编第六十六师“助战”,派来了飞机,给宋瑞珂的部队空投物资。空投很不准,降落伞大部分落在我军阵地上。战士们喜气洋洋地接受了天上掉下来的“馅饼”,风趣地说:“解放军虽然不缺粮食、弹药,但有人白送也不反对。”敌人空投下来的多是一些发黑发臭的大米,连牲口都不肯吃。后来天上再送来这样的东西,战士们不要了。

几天的思考,我想这仗不能这么打下去了,就向纵队领导建议,请他们派人到现场考察一下,调整部署。

7月23日,刘、邓首长决定趁蒋介石调动的援兵尚未到达之际,坚决把宋瑞珂的第六十六师歼灭,命令陈再道、陈锡联亲自到前沿看地形,研究打法。

纵队领导范朝利、王蕴瑞和三纵的陈锡联、曾绍山等到我旅阵地察看地形。我向他们建议:“敌人的主峰不打掉,下面

不好攻,从南面、西面、东面攻都不是办法。只有下决心把敌人主峰打下来,山上山下一起攻,才能攻下来。”

新的作战方案采纳了我的建议。刘、邓首长调来六纵十六旅的一个团和山炮、榴弹炮炮团,先打羊山主峰。我旅担任主攻羊山集东大街;三纵八旅由东面攻击;六纵十六旅一个团和三纵七旅从北面向羊山制高点攻击;二纵四旅及三纵九旅、冀鲁豫独立旅在南面堵截和打援。原定26日傍晚发起总攻,因下大雨而推迟。

27日晨,天空晴朗,指战员们一片欢腾。似乎天从人愿,预示着我们胜利即将来临。下午6时30分,总攻开始。

各种火炮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声,硝烟弥漫了整个战场。各路突击队一齐冲击,我十六、十七团由羊山集西北侧实施突击,十八团由羊山集南侧向羊山集东街突击。三个团领导都亲临一线指挥。

十六团突击营的勇士搭起人梯抢上屋顶,扫清了屋顶的敌人,与街面突击队配合作战。三个团连续攻占敌人的地堡、房屋等工事,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很快占领了敌人的核心工事,割断了敌南北联系。

十八团在向东发展中,敌人一座大地堡用四挺机关枪封锁住了通道。团长李开道命令一连连长刘茂胜,要迅速把敌人地堡攻下。该连几次攻击后,攻占了地堡,打开了通道。

十八团九连副连长秦志带着突击排穿过被炸塌的核心工事,见前面一座小院内敌人很混乱,秦志高喊一声:“投弹!”战士们把几十颗手榴弹投进院内,乘着浓烟,从被炸塌的院墙缺口冲进去,与敌人拼刺刀。秦志从敌人手中夺过一挺机枪,向围上来的敌人哗哗猛扫,打死十儿人。战士们对着不肯投降的顽敌用刺刀捅、枪托砸,实施逐院、逐屋、逐堡的攻击,战斗

持续几个小时。

十七团开展火线喊话,敌人成排成连地向我投降。

战至 22 时,友邻部队攻占了羊山主峰。

28 日拂晓,守敌大部被我军歼灭。敌师长宋瑞珂和警卫连 400 余人被压缩在羊山集东南角的一所高楼和两所平房内垂死挣扎。

我命令十八团攻克敌整编第六十六师师部。

十八团二营、三营围歼敌警卫部队,敌纷纷缴械投降。该团一营围歼敌师部,二连指导员葛玉霞、排长白振东带领 30 余人猛攻宋瑞珂退守的高楼,高喊:“缴枪不杀,解放军优待俘虏!”话音刚落,院内慌慌张张跑出来一个军官,举起双手连喊:“不要打了!不要打了!”并恭恭敬敬地向葛玉霞说:“我们投降,请弟兄们饶命。”这位军官还自我介绍:“我姓郭名雨林,是本师参谋长,请你们进去,里面还有长官。”葛玉霞走进院子,一位身着便服的矮个子军官从高楼走出来。郭雨林介绍说:“这就是我们的师长宋瑞珂。”宋瑞珂只颤抖着说了一句:“里头伤亡太大了!”就低下头不作声。宋瑞珂等投降后,葛玉霞向屋内喊道:“你们的师长、参谋长都出来了,旅长、团长也出来吧!”又走出来五个军官,他们是师副参谋长王开石,一八五旅旅长涂焕陶,该旅参谋长马权之,五五三团团团长罗玉滕,五五四团团团长李识生等。

经过十几个昼夜的鏖战,羊山集战斗终于胜利结束。歼敌 1.4 万余人。我旅俘敌师长宋瑞珂,参谋长郭雨林,一八五旅旅长、参谋长,十三旅副旅长和参谋长等以下官兵 2000 余人,毙、伤敌 495 人;缴获各种火炮 54 门,轻重机枪 208 挺,长短枪 1200 余支,各种炮弹、子弹 10 万余发,骡马 300 余匹,以及大批军用物资。我旅伤 1283 人,亡 174 人。

7月29日,党中央发布通令,嘉奖刘邓大军取得的伟大胜利,电文称:“自卫战争第二年第一个月作战,我军在山东郛城、巨野、定陶、羊山地区,以连续不停作战,歼灭敌人正规军九个半旅及四个师部,毙、俘敌6万余人,战绩甚大,特此通令嘉奖。”

我旅在羊山集战斗中战绩显著,晋冀鲁豫野战军给我旅记大功一次。

二纵给我旅十七、十八团各记大功一次,葛玉霞、白振东各记大功一次。

7月30日下午,我旅随纵队出发,转移到了巨野以南的大义集地区。

中心任务:走

1947年8月6日,我知道了这次渡过黄河的真正目的:挺进大别山。

8月6日,纵队召集各旅领导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央军委指示和刘、邓首长关于向大别山挺进的命令。陈再道司令员介绍了敌人的企图和行动部署。蒋介石对我军挺进大别山的战略意图毫无觉察,误认为刘邓野战军经连续作战,疲惫不堪,短时间内难以再战,因此重新调整兵力,以鲁西南战场的八个整编师18个旅约14万人,分别从菏泽、袁口、嘉祥等地出发,实行分进合击,企图围歼我野战军主力于郛城、鄆城之间狭小地区内。刘、邓首长决定乘敌合击部署尚未完成、且后方兵力薄弱空虚的有利时机,突然南进大别山,先敌在大别山展开。中央军委复电指出:“决心完全正确”,“情况紧急不及请示时,一切由你们机断处理”。要求刘邓大军“用全副精神

注意于运动中大批歼灭敌人，一切依靠打胜仗”，实现挺进大别山的任务。

为了保持行动的隐蔽突然，造成敌人的错觉，刘、邓首长决定将主力分三路南进：一纵并指挥中原独立旅为西路；三纵为东路；二纵、六纵掩护中原局与野战军直属队为中路，二纵为中路的左路军，并列向大别山挺进。另以十一纵队和冀鲁豫军区部队在黄河渡口佯动，造成北渡的声势；并以暂由刘、邓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五个纵队钳制敌人，掩护刘邓野战军主力南进。定于8月7日挥师挺进大别山。陈司令员强调：沿途遇敌不可恋战。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一个字：走！

8月7日傍晚，我旅随纵队出发，向南疾进。四旅、五旅在前面，我旅跟进。纵队要求坚决响应野战军号召：“勇往直前，决不向后看，坚决勇敢地完成这一光荣的战略任务！”

出发时碰上了倾盆大雨。部队踏着泥泞前进。11日，我旅受领任务：夺取陇海铁路商丘以东张阁车站，为大部队开辟通道，同时占领和庄至何楼段铁路线，并破坏铁路和桥梁。当天19时30分，我旅十八团首先进抵陇海铁路线，该团三连向张阁车站之敌发起了攻击，全歼张阁车站守敌。我旅主力随即占领了和庄至何楼铁路线，破坏了沈牌坊、前后何楼段铁路和桥梁。

12日18时，二纵从朱集至前后何楼10公里宽大正面全部越过陇海路，向敌人辽阔空虚的战略纵深疾进。

14日晚，我旅随纵队冒雨渡过涡河。15日，我旅以日行40公里的速度到达鹿邑以西，进入了满目疮痍的黄泛区。

黄泛区是蒋介石的“杰作”。1938年6月，为阻挡日军从东面进攻郑州后南进，蒋介石下令炸毁了郑州以北花园口的黄河大堤。滚滚黄河水改道东南方向，灌入颍河、涡河等河流

及两河之间广大地区,注入淮河,淹没了豫东、皖北及苏北地区的44个县,受灾群众达1250余万人,淹死89万人。这片地区被称之为“黄泛区”。花园口决堤,没能挡住日军攻势。内战爆发后,蒋介石又企图重施故伎,让黄河归了故道,可没能挡住我军强渡黄河。从炸花园口算起,快10年了,黄泛区仍然是遍地积水,淤泥无际,浅处至膝,深处及脐,没有人烟,没有道路。在这一宽达20公里左右的地带只能隐约看到一些被淹的民房屋脊和掠空而过的野鸟,真是悲惨凄凉。

黄泛区不能硬闯,我们派人探路设标,并在当地群众帮助下选择了前进道路。15日傍晚,部队出发,又赶上阴雨连绵。踏进黄泛区时,指战员们手牵手,臂挽臂,踩进没膝深的淤泥坑里,一步一拔,非常费力气。部队开展了体力互助活动,人与人、班与班,互相帮助。

走了一夜,仍没走出20公里宽的黄泛区。

16日,太阳出来了,是个难遇的晴天。晴天有晴天的麻烦。时逢盛夏,太阳发威,黄泛区成了大蒸笼。水蒸气从黄水污泥中往上冒,弥漫着腐烂腥臭气味。阳光灼热,无遮无拦射下来,许多人中暑晕倒。行军极为艰难。

车辆、马匹的通过困难更多。有时骡马陷入泥坑,奋力挣扎,越挣扎越下沉,需要数人才能从泥里拽出来。我虽配有坐骑,但没法骑,也和战士一样赤脚行军。我旅有50多辆豫东的木轮车,用来拉载伤员、粮食和弹药。有的车轮一轧进泥坑就滚不出来。战士们把木板、干草、甚至棉被垫在泥浆上,一起使劲,才能把车拉出来。伤员们看到这种情况,硬从车上跳进水里,和大家一起干。火炮也陷进淤泥,拉不动了,炮手们只好把火炮拆开,背着炮架,扛着炮身,抱着炮弹,互相推拉着前进。

8月16日,我旅全部通过了黄泛区。

刘邓野战军越过黄泛区,使国民党企图利用黄泛区围歼我野战军主力的计划落空。蒋介石十分恼怒,动用了近30个旅的兵力跟踪追击,并令空军轰炸我野战军南下必经河流的渡口。

16日傍晚,为了尽快渡过沙河,纵队决定由郭集地区分两路向南疾进。我旅和纵队直属机关部队为西路,经郸城集、钱店集到槐店(今沈丘县城)过沙河;四旅、五旅为东路,经石槽、宜路店到新安集过沙河;并令我旅和五旅各派先遣部队到渡口架桥。

17日12时左右,我旅先头部队到达了槐店渡口。沙河水深三米多,宽90多米。先头部队找到几只小船,架起浮桥。我旅部队过河后,进至槐店以南曲集地区。纵直机关部队因辎重部队和教导团没到齐,暂时在槐店东北大于庄地区集结。至19日,二纵除了辎重部队外,全部渡过了沙河。

我们南进行动极为保密,不断改变番号,有的伪装成地方部队,敌人始终没有觉察我军的战略意图。刘邓野战军渡过沙河后,矛头直指大别山。蒋介石觉察到了,急令整编第八十五师和整编第十五师一个旅沿平汉路南下,企图抢先到汝河南岸布防,南北夹击刘邓野战军。

渡过沙河后,我旅休整一天,向部队进行动员教育,提出了“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的响亮口号。部队情绪很高。为了摆脱敌人追赶,部队进行了轻装,将笨重的武器如缴获的榴弹炮等就地埋藏,准备向汝河、洪河挺进。

纵队决定由范朝利副司令员率前卫在前面开路,大车辎重及后勤机关由钟汉华副政委指挥随后跟进。20日晚,纵队指挥机关进至沈丘以南魏营地区。我旅进至新蔡县以北龙

口地区。四旅进至新蔡东北野里集地区。五旅仍在沈丘地区,准备阻击尾追之敌。

8月21日下午,我旅由孙召集渡过洪河,进抵新蔡以西地区。十六团包围新蔡,监视该城守敌。纵队主力进至蒋店集地区,准备南渡洪河。23日,纵队主力从洪河与汝河汇合处的大杜湾村三汊渡口渡过洪河。24日,我旅奉命向淮河疾进,抢占渡口,当晚进至夏庄地区。25日,纵队大部分到达淮河北岸,准备从潢川以北的华店至长陵集段南渡淮河。26日和27日,第五旅在淮河以北包信集地区阻击敌整编第七、四十八师,掩护主力渡河。26日深夜,我旅与第四旅、纵直顺利渡过淮河。

在我们渡河同时,六纵和刘、邓首长的指挥机关在新蔡西南的汝南埠渡口被先期到达汝河南岸的敌整编第八十五师挡住了去路。刘司令员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六纵指战员们动作快,打得猛,硬是杀出一条血路,掩护首脑机关渡过汝河。西路、东路比较顺利,未与敌主力遭遇。

8月27日,刘邓大军全部渡过淮河,胜利进入了大别山。我旅整整奔走21个昼夜,行程1000多公里,战胜了种种困难,终于完成了这一战略任务。

大别山雄峙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东至淮南路,西至平汉路,南临长江,北至淮河,突出于武汉、南京之间,山脉横亘于西北,走向东南,海拔1000米左右,为淮河与长江的分水岭。大别山北部为山岳、丛林,南部为丘陵、平原和水网,物产丰富,人口1200余万。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里就是革命根据地,1946年我军中原主力转出后,党领导当地群众一直继续坚持斗争。这一地区位置极为重要,以其为依托,可瞰制中原,威胁南京、武汉,是人民解放军实行战略机动、夺取中原

和进军江南的战略要地。

8月28日,我旅直捣商城。商城保安团闻风而逃,该城被我旅占领。

进入大别山后,指战员都很兴奋。大多数指战员生长在北方,现在看到的是南方景色,感到新鲜好奇。对我们这些原来就生长在大别山地区的同志,则是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青山、稻田、茅屋、鱼塘,还有浓浓的乡音,久违的风俗习惯等等,无不倍感亲切。

我又回来了,大别山。

“今天开会不拉手”

进入大别山后,我们一连打了好几仗,很可惜,这几仗打得都不理想。

9月27日,刘、邓首长在光山王大湾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刘、邓首长神情严肃,紧绷着脸,端坐不动。有两句话,我至今记忆很深。

一句是邓小平政委说的。“今天开会不拉手,原因大家应该明白!”

一句是刘伯承司令员说的。“我们有的干部打起仗来缺乏勇气,没卵子,不像男子汉,这是不允许的!”

在此之前一个月里,蒋介石调集了23个旅的兵力跟过淮河,企图乘刘邓大军立足未稳,争夺这一战略要地。刘、邓首长决定先打战斗力弱、孤立的滇军整编第五十八师,牵制桂系,掩护我军展开。8月29日,刘、邓首长令一纵和二纵在商北地区阻击钳制尾追我军之敌整编第五十八师,三纵和六纵占领南线诸城,打开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局面。我旅主力集

结在商城东北附近待机,以一个团进至商城北河风桥地区构筑工事。

受领任务后,我们当即往河风桥地区察看地形。河风桥、观音山和 515.7 高地,位于商(城)固(始)、商(城)潢(川)公路之间,为敌进犯商城必经之地。观音山地势较高,可瞰制商固、商潢两条公路。河风桥以西有条小河,水深一米,不便徒涉,利于防守。9月1日,我旅占领了这些阵地。旅的决心和部署是:十六团守卫河风桥及其以东地区,十七团位于观音山、515.7 高地之线构筑防御阵地,十八团集结于 512.6 高地、余小铺地区为第二梯队。

9月3日7时左右,敌整编第五十八师约一个团兵力向十七团观音山、515.7 高地攻击,并以两个连向十六团河风桥阵地佯攻,均被击退。11时,敌炮火向观音山阵地袭击后,步兵两个营向 515.7 高地、观音山阵地攻击,两个连向河风桥阵地攻击,经我顽强阻击,敌未得逞。13时,我乘敌集结准备冲击之机,十七团五连向敌右侧实施反冲击,歼敌一个连的大部。十六团也实施反冲击,敌遗尸 20 余具,停止攻击。

3日晚,旅决定调整部署:除以三个连坚守原阵地阻击敌人外,主力转移至大鹰咀山、峡口(商城东北十余公里)一线占领阵地。

4日8时,敌两个团分三路向我河风桥、515.7 高地、观音山阵地猛烈攻击,我予敌大量杀伤后撤出阵地。14时,敌两个营向我十七团大鹰咀山阵地攻击,当敌接近我阵地前 100 米左右处,我各种火器突然开火,予敌以大量杀伤。二连向敌右翼反冲击,将敌击退。敌又以两个连的兵力向我十六团峡口阵地运动,未待其接近,我即组织火力将其击溃。16时左右,敌施放烟幕并以火力配合抢运伤员。

9月7日,二纵向敌整编第五十八师发起连续攻击。我旅由大鹰咀山、峡口之线向敌攻击。战斗打响后,部队向敌猛攻。十七团攻占史家、东庄后,十六团、十八团继续向施家砦之敌展开攻击。因为友邻部队未迂回到北面包围敌人,战至8日,施家砦之敌北撤。战斗中,由于敌机轰炸扫射,我旅副政委彭学桂光荣牺牲。彭学桂是江西吉安县人,时年34岁,1930年5月参加工农红军,同年6月入党。抗日战争时期,他和我一起冀南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工作者,我们也相处融洽。他的牺牲,使我旅失去了一位好领导,全旅指战员心情都很沉重。

由于敌整编第四十八、十师向商城增援,商城第一仗遂告结束。

这一仗调动了敌人两个师从新县、宣化店地区回援,掩护了六纵主力在鄂东地区展开。但由于没有形成对敌分割包围,加上部队不习惯山地作战,也没有达到大量歼灭敌人的目的。

河风桥战斗之后,我旅奉命向固始东北地区转移,吸引牵制敌人。

9月11日,部队转移至郭陆滩附近时,突然与东进之敌整编第四十八师一七六旅遭遇。我们令十六团掩护主力向东转移。我和旅长周发田都认为,打完商城战斗当晚就向固始转移是不对的。那时敌整编第四十八师正从潢川过来,如果敌人早赶到几小时,我旅就要吃大亏。因为我们根本走不动,部队打羊山集缴获的重机枪、迫击炮那么多,还带了山炮营,没有进行轻装,硬着头皮沿公路往北走。白天不敢走,看守着大批武器弹药。晚上走小路,路又窄,不好走。骡马过小桥,不注意就掉下去了。有时还迷路,一个晚上才走了三四公里。

搞不清敌情,怕敌整编第五十八师出来追击,也不知道我们后面还有整编第七、四十八师在往六安赶去。为摆脱困境,我和周发田商量,赶快让部队和山炮营离开固始东部平原地带,向南边靠近山区走,向大别山麓靠。这样部队才摆脱了敌人。

第二天,部队轻装,山炮 12 门只留了四门,机枪、迫击炮、骡马都减少了,以便利于山地、水网地带作战。中午,十七团在史河边对尾随之敌第一七六旅进行了顽强阻击。

9月13日上午,我旅到了泉河集地区。部队刚吃完饭,突然枪声大作,敌一七六旅部队又蜂拥而来。十六团二营和三营首先与敌接火。一股敌人窜到团指挥所,被十六团干部集训队歼灭。此时敌对我旅已形成包围之势,十六团二连攻占小王庄,掩护主力撤退。二连指战员连续攻占了三个村庄,战斗至18时,主力转移后才撤出战斗。

9月16日晚,我旅由武庙集地区西进。当部队进至方集以东地区时,敌整编第五十八师一八三旅部队已占据路口和附近无名高地。我即令担任前卫的十七团迅速夺取无名高地,掩护部队通过方集西进。十七团九连夺取无名高地后,与反扑之敌激战了三个多小时,歼敌400余人,连长张振清等70多名指战员光荣牺牲。当晚,我和周发田到九连慰问,并报请纵队首长同意给第九连记集体大功一次,给连长张振清等三人追记大功一次。

也有让人生气的事情。转移途中,十七团派四连去侦察敌情,结果这个连执行任务后,离开团主力自己行动。指导员王殿亨贪生怕死,竟将部队解散,枪支埋掉,大部分人员也跑回北方去了。后来,部分人员在固始附近归队,王殿亨也回来了。为了严肃军纪,将王殿亨判了死刑。

敌整编第四十八师经固始东进皖西,整编第七、四十、六

十五师仍在红安、麻城地区。为了把进入大别山区的敌人吸引过来,17日,刘、邓首长命令一纵、二纵、三纵和六纵十六旅,在商北地区再次打击敌整编第五十八师。

该师占领商城后,其部队一部进入商城以南的余子店地区,一部进入商城以东苏仙石地区,并准备向商北地区进行“扫荡”。我二纵四旅和三纵向商城东北的双柳树地区疾进,五旅部队分别在商城东南的黄土岭、挥旗山地区佯动,牵制敌人,协同友邻歼敌。我们六旅向商城东北之丰家集疾进,与四旅一起对敌实施分割包围。

我旅部队不顾疲劳,爬山越岭,按时到达指定地区。可是包围割裂敌人的计划却落空了。敌整编第五十八师发现我军行动后迅速向商城收缩,只有向西“扫荡”之敌新十旅二十九团没能缩回,在钟铺地区被一纵全歼。这一仗也没打好。

9月24日,敌整编第八十五师从光山、潢川东援,刘、邓首长决定在运动中歼其一部或大部。25日,我旅进至双柳树西南至胡老湾一带,协同友邻夹击敌人,并相机占领徐山口。26日,我旅由胡老湾向徐山口攻击。敌整编第八十五师像受惊的兔子,迅速缩回了潢川,没能追上。

商北阻击战第三仗宣告结束。

商北打了三仗都不理想。成功的一面是,将追击我们的敌机动部队大都调动到大别山北麓,掩护了我野战军向皖西、鄂东顺利展开;不成功的是,没有实现在运动中歼灭整师整旅敌人的初衷。

这种结局的出现,除了由于当时周围敌人主力多,增援较快的原因之外,我们自身也有许多问题需要总结。一、我们部队习惯北方平原地区作战,刚到大别山,不熟悉山地、水网地区作战,有时看军用地图到某个村庄只有十余公里,结果爬山

越岭走了半天才到达目的地。不善于组织战斗队形、构筑山地工事和有效地运用重武器。相反,敌人习惯于山地作战,又熟悉地形,行动快,分割包围敌人计划往往落空。正如刘伯承司令员所批评的“包,包不住敌人;堵,堵不住敌人;围,围不住敌人。”二、我们处于无后方作战,物资供应不上,衣食住行不习惯,伤员无处安置,影响战斗情绪。部队经常没粮食吃,油、盐更缺,时间长了,不少战士得了夜盲症,走路经常跌倒。时值9月,夜晚天冷,被服供应不上,指战员们还穿着单衣,夜里睡觉只好盖稻草御寒。南方雨水多,部队行军作战,布鞋很快穿烂,只好穿草鞋,而北方人不习惯草鞋,脚上磨得又是泡又是血,粘在一起,脱不下来。北方人初到南方吃不惯大米,水土不服。发疟疾的人很多。这些都影响指战员情绪,部队非战斗减员迅速增加,过去在北方内线作战没有遇到的困难都出现了。三、有的指挥员怕部队伤亡大,伤员无法安置,指挥作战缩手缩脚,失去了一些战机。四、部队进入大别山后,重炮丢了,榴弹炮埋了,我旅只留下几门山炮,对作战也有影响。

总起来看,刘邓野战军进入大别山后,经过一个月的作战,至9月底,攻克了大别山地区的23座县城,建立了17个县人民政府,歼敌正规军6000余人、土顽800余人,调动和牵制了大量敌军,依托山区设立了后方,初步打开了局面。我旅指战员也战胜许多困难,坚决执行了作战、发动群众、筹粮筹款三大任务。正如刘伯承司令员所说,“这次捉迷藏,我们又胜利了。在敌人拼死命追击中,我们战略初步展开了,开始站住了脚,但这才是第一个回合。”为了总结经验教训,争取下一步的胜利,9月27日,刘、邓首长在光山王大湾召开了旅以上领导干部会议,也就有了刘、邓首长那番“今天开会不拉手”和“没卵子不像男子汉”的讲话。

这次会议上,邓小平政委严肃指出:我们已经到达大别山,下一步就是坚定不移义无反顾地创建大别山根据地,对此不能有丝毫动摇、怀疑。越是在困难的时候高级干部越要以身作则,鼓励部队坚决勇敢地歼灭敌人。我们既反对在条件不可能的时候轻率地去作战,更要反对在条件可能的时候不勇敢地去作战。能不能创建大别山根据地,能不能立足生根,主要看我们能否歼灭敌人,能否发动群众。他强调部队必须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关系到我们在大别山能否站得住脚。他要求全体指战员一定要牢固树立以大别山为家的思想,坚决克服怕打硬仗、纪律松弛等错误思想情绪。他特别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带好头。

刘伯承司令员紧接着讲话。他说,创立大别山根据地是我党我军正确的战略方针和坚定不移的政治任务。要创立根据地,必须打胜仗歼灭敌人,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他把打胜仗消灭敌人和发动群众实行土改比喻为“两个轮子”,说,这“两个轮子”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而推动这“两个轮子”转动的原动力,则是提高信心,增强斗志。全党全军愈认识自己的政治任务是光明前途,信心就愈高,斗志就愈强,这两个轮子的转动就愈快、愈顺畅,而创立根据地的进程就愈是突飞猛进。他特别强调作战要勇敢,说,勇敢的勇字,就是男子头上有一顶光荣的花冠。我们有的干部打起仗来缺乏勇气,“没卵子”,不像男子汉,这是不允许的。今后一定要坚决克服。否则,就完不成党中央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我们进到大别山,处于无后方作战,困难重重,但要有勇气战胜困难,特别是要打好仗。

这次会议对所有与会人员震动很大。是一次反对右倾、鼓舞斗志、夺取大别山斗争胜利的总动员,对部队继续坚持大

别山斗争,迅速实施战略进攻,起到了重大作用。

立足生根大别山

1947年10月10日,党中央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响亮地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两天之后,中原局也发出指示:《放手发动群众,创建大别山根据地》。中国革命战争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但我刘邓大军由于处于无后方作战,处境依然非常艰险。

进入10月,我野战军主力不仅要和进人大别山的敌人七个整编师周旋,还要干一件古今中外军史上少有的事情:自己动手做棉衣。冬天快到了,我们远离大后方,棉衣还没着落。

10月初,我旅向南机动,开辟根据地,筹做棉衣。10月20日,周发田率领十七、十八团解放英山县城。24日,我率领十六团解放宿松。27日,我旅随纵队向广济跟进,参加高山铺战役,后又返回宿松。

开辟根据地的工作遇到了许多困难。国民党桂系曾长期盘踞这里,反动势力盘根错节。他们手段残酷,胁迫群众实行空舍清野,使我军吃不上饭,找不到向导。部队夜间行军,山高路窄,地形不熟,加上极度疲劳,稍不注意就会被敌人追上或追不上敌人。部队因饥饿、劳累过度、迷路而牺牲的屡有发生。当地乡保反动武装“小保队”,也经常在我部队行军和宿营时袭扰,在老百姓家里搜捕我伤员,残害支援我军的群众。从部队内部看,我旅经历了由北方到南方,由平原到山地,由有后方到无后方作战这些变化,部分人员情绪大受影响,对坚持大别山斗争变得信心不足,因此还出现了一些违犯纪律的现象。

大别山虽说曾是老根据地,但由于我军曾先后三次退出该区,群众受到反动派残酷镇压。这次我军刚进大别山,反动统治还没完全摧垮,土顽、保甲势力也仍在暗中威胁群众。群众不敢接近我军,对我们这次能否站得住脚也有怀疑。因此,我们在大别山的任务就是“发动群众”和“多打胜仗”。刘、邓首长把这比作是“两个轮子”,要求我们通过推动这“两个轮子”,把革命推向前进。我军一方面迅速实施战略展开,寻机歼灭敌人,清剿上顽势力,建立地方政权;另一方面大力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向群众讲明,我们就是当年的红军,打回老家来了,而这次要在大别山立足生根,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并以此为基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我旅抽调了大量排以上干部,还有随军南下的冀南地方干部两个队及旅直警卫连一个排,总共近400人,组成五个武装工作大队,主要活动在蕲春、黄梅、广济等地区,发动群众,打土豪,分浮财,肃清敌顽乡保武装,摧毁伪政权,建立革命武装。部队也在所驻地区发动群众,肃清敌伪乡保武装。到11月20日,基本上摧毁了宿松地区的反动政权,建立了宿松县、区政府及部分乡、村政权,初步奠定了开辟该地区革命根据地的基础。

工作进展顺利,其中一条最重要的经验是,我军严格执行政策纪律,坚决维护群众利益。刘、邓首长对纪律问题非常重视。在王大湾会议上,邓政委曾严肃指出:“严守纪律,关心群众,这是关系到我们能否在大别山生根的大事。破坏纪律、脱离群众,是自掘坟墓!”

刘、邓首长还身体力行,带头维护纪律,为部队作表率。10月下旬的一天,邓政委和刘司令员在蕲春县胡凉亭研究作战方案,房东孙志先进来给首长倒茶,不小心溅湿了桌上的军用地图,他忙用衣袖去擦拭,结果忙中出错,又摔破了茶壶。

刘、邓首长连忙安慰他，还掏出了两块银元作为赔偿。孙志先收下银元后，很难为情，便趁给刘、邓首长缝制冬衣的机会，让老伴把两块银元缝在衣领里了。部队转移，刘、邓首长发现了衣领内的银元，当即让警卫员连夜赶回，把钱送还主人。孙志先夫妇捧着那两块银元，激动得热泪盈眶，逢人就讲：“中国有刘将军、邓政委这样的大能人，老百姓有指望了！”

对违犯纪律、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刘、邓首长决不姑息迁就。野司直属部队有个副连长，在黄冈县总路咀拿了商贩的粉条、花布，许多人吓得跑到山里去了。刘、邓首长立即派纪律检查组核实了情况，按军纪从严惩处了那个副连长。老百姓为之震动，纷纷下山返回家园。

为了加强部队纪律，我们旅党委还专门作出具体规定：不准到老百姓水塘里放水抓鱼；不准砍群众田里的甘蔗吃；不准用群众的柴火烤火做饭；不准进群众的内房住宿；不准上群众的厕所等等。从旅、团到各连均设有纪律检查组，每次转移后都要检查：借的东西还了没有，睡的稻草放回原处没有，院子打扫了没有，有没有损害群众利益的现象。对违犯纪律的，不论是谁，一经发现，从严处理。十八团直属机枪连副指导员在水塘边抓了些鱼，捡了几个鸭蛋，团党委发现后，命令他把东西送还老乡，给他撤职处分。部队驻在麻城商石桥，有个小孩爱和团直通信班长小赵逗着玩。一次两人玩枪，不慎走火，打死了小孩。军法无情，部队召开了公判大会。会场上，孩子的亲属抱住赵班长失声痛哭，请求上级别处决他。但是，团领导为了严肃军纪，仍然进行了严厉惩处。

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艰苦岁月里，我旅也出了许多好故事。1947年9月9日，旅部组织干事王书波带领参谋、干事、侦察员、通信员等24人，抬了七副担架，护送一批伤员转移。

因事出意外,他们脱离了部队领导一个月零三天,经常要饿着肚子赶路,没有一个人违犯纪律。七名伤员中,有一名胸部负了重伤,是羊山战役解放过来的新同志。当他知道抬担架的人是机关干部、参谋、干事时,哭了起来,说:“我在国民党那边当兵时,当官的不把我们当人着,不是挨打就是受骂,如果生了病、受了伤,就算上了去鬼门关的路。在羊山集,我就亲眼看着到我们连长把一个受伤的兄弟打死了。解放了,老同志对我像兄弟,负了伤,还要首长抬我。不行,我可以走,不能再坐担架了!”大家安慰他说:“咱们解放军,不论新老同志,不论干部战士,都是阶级兄弟。你光荣负伤,流血过多,不能走路,我们抬你是应该的。”就这样,24个同志抬着七副担架,翻山越岭,经历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后方医院。回来找部队时,正好找到纵队副政委钟汉华,在他带领下回到旅部。我和周发田接见了他们,表扬他们的模范行动。

由于军纪严明,深得群众拥护,我旅先后有700多名伤员安置在大别山群众家里养护。一位60多岁的老人为了保护伤员,被敌人打得死去活来,总是一句话:“打死我也没着到。”我军留在群众家的伤员,绝大部分都得到康复,重新走上战斗岗位。

为了在大别山立足生根,我旅还先后派出三批干部到麻城、宿松、黄梅、广济、蕲春等七个县担任地方政权机构负责人。仅留在广济参加县、区政权建设、建立地方革命武装的就有360多人。他们为创建大别山根据地作出了积极贡献。

1947年的冬天快来了。这时大家身上都还只有单衣。解决过冬棉衣成为当务之急。纵队领导决定,采取以旅、团为单位筹措,尽快让指战员穿上棉衣。

我们格外注意政策纪律。11月,我旅再次攻占麻城宋埠镇。为解决棉衣,旅机关组织了城镇工作队,负责筹集钱款、

棉花和布匹。野司正好住在宋埠附近,他们派人来传达了邓政委给我们的指示,进城后一定要严格纪律,一定要注意政策,要考虑到根据地长远建设,不要只顾眼前的困难。

我们贴出布告,要工人照常上班,商店照常营业,学生照常上课,安定人心。城镇工作队带着部队进镇后,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对待国民党军队来不及运走的几十车棉花布匹,一概没收;对待恶霸商人,公开派款,但不准到他们开的店铺里拿东西;对待开明人上和商人,我们采取合理协商的办法,打条子借款借布,不过高要求。

有天夜里,我带旅政治部主任于笑虹找到宋埠商会会长和各工商号经理老板,说明了我们的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提出了筹集钱款和购买棉花布匹的问题,请他们帮助我军解决困难。他们见我军纪律严明,政策合理,纷纷表示愿意出钱出物。第二天,大部分工商资本家都按照自报的数送来了,有的还拿出了银元、金条。于笑虹笑道,我党我军的政策纪律威力真大,连这些资本家也被感动了。

1947年10月下旬,我派旅教导队队长王书波带一个工作组到广济县去筹集棉花、棉布,解决旅直属队的冬衣问题。临行前我一再叮嘱:“大别山根据地还没建立,这里也不是产棉区,要为大部队解决冬衣,任务艰巨。你们一方面要争取群众的帮助,另一方面还要想到人民的疾苦,尽可能用党的政策去打通当地布商的关系,想办法征集棉花、棉布。”

到了城边周家湾后,他们召开了商民大会,说:“我们解放军不仅要在大别山立足扎根,还要从这里杀向江南,解放全中国。国民党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我们此次来这里征集棉花、棉布,请你们积极支持。现在谁帮助了我们,将来全国解放了,人民政府是不会忘记他的。”接着说明了我党的工商政

策和棉花、棉布筹措办法。最关心解放军困难的是广大人民群众。他们送来了一块块土布、一包包棉花。有个叫李秀玉的老大娘,把做寿衣的一块黑土布也送来了,说:“你们打老蒋全是为我们穷人好,这我明白。我反正活不了几天了,没有别的东西答谢你们,送上这块布,说啥你也得收下。”工作组同志总是婉言谢绝群众的好意。大多数小布商听到工作组的宣传教育,也打消了顾虑,拿出棉花、布匹,借的借,卖的卖,还有的让家里女人装作走亲戚,穿过敌人封锁线,从江南买回棉布卖给我们。工作组还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没收了一批被恶霸地主转移窝藏在乡下的棉布。工作组很快筹齐了棉布、棉花,满载而归。

棉布、棉花到手了,下面的问题是怎么做?谁来做?

刘、邓首长很干脆,要求干部战士自己动手。刘司令员还亲自给战士示范,用瓷碗扣在布上,教战士如何裁领口。于是,上上下下都行动起来,一支野战军变成了临时被服工厂。

筹集到的东西,既有土布,也有花布,甚至还有纱布。棉花有籽棉、絮棉等。指战员们敢想敢干,土法上马,用竹鞭、柳条自制弹弓,像模像样地弹起棉花;用稻草灰当染料,将各种颜色的布染成灰布,有的甚至用黑锅烟和黄泥水来染布。

布染好了,大家又成了裁缝师傅,学剪裁,上袖口,缝口袋,絮棉花。毕竟手太生,但又想搞好点,因此缝了又拆,拆了又缝。好在大家对“手艺”都不保守,教的耐心,学的细心,互帮互学,一针一线缝棉衣。

那几天,部队驻地的屋檐下、树荫里,到处都见七尺男儿缝棉衣。太阳西下,油灯亮了,许多人还在飞针走线。有时,正缝着棉衣,来了敌情,大家把布和棉花一卷就投入战斗,战斗一停又接着缝起来。下雪之前,我旅指战员都穿上了自己

缝制的棉衣。部队集合,瞅着战士们的队列,我心里直乐,大家都是“二把刀”,缝制的棉衣各式各样,大小不合身,色彩也不统一,就像瞅着一个特殊的服装博览会。但又不能不让人由衷而生敬意。穿着这样的棉衣,大家觉得格外暖和。战士们自豪地说:“我们懂得了什么是延安精神。”

1947年冬,刘邓野战军在大别山和鄂豫、皖西两区完成了战略展开,这是第二个回合的胜利。与此同时,挺进豫皖苏的华东野战军主力和挺进豫陕鄂地区的陈谢集团也都胜利展开。三支野战大军呈“品”字阵形,鼎立中原。我军把战场推进到了江、淮、河、汉之间。

1947年11月初,蒋介石在南京国防部召开大别山作战会议,同月下旬成立“国防部九江指挥部”,国防部长白崇禧兼任主任,统一掌管豫、皖、赣、湘、鄂五省军政大权,企图以所谓“总力战”夺取中原。调集了15个整编师又三个旅(共33个旅)的兵力,向大别山重点围攻。

敌人的“总力战”来势凶猛。一方面采取分进合击,企图寻歼我军主力;另一方面又利用地主、恶霸、特务,加强其保甲统治,发展其谍报网、碉堡网,配合其正规军作战。他们还到处抓壮丁、搜民财、抢粮食,制造无人区,企图彻底摧毁我根据地。

为粉碎敌人围攻,刘、邓首长决定,以部分主力结合地方武装,利用大别山的复杂地形,以小的战斗和游击战,打击牵制敌人;以一部兵力乘虚向桐柏、江汉、淮西实施战略再展开,创造新根据地。野战军主力采取了“敌向内,我向外;敌向外,我亦向外”的方针,灵活机动,打击、拖住和分散敌人,配合陈粟大军和陈谢兵团大量歼敌。

从11月中旬开始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我旅主要随纵队在

大别山内线作战,在固始、霍丘、金寨、商城、光山等地牵着敌人转,不停歇地打了一些小仗。

1948年1月2日,邓小平政委总结了前段野战军的作战经验,对坚持内线作战部队进一步强调:“敌向内,我向外。敌向外,我亦向外。主要应在外线拉敌。”我部队应适时分遣与集结,“以小对大,以大小”,粉碎敌人的重点合击。此后,为了拖散敌人,我旅受命单独行动。

当时,我和周发田率领部队跟敌人兜圈子。打不了大仗,就打能打的小仗;不能被敌人合围,也不能让敌人撵得站不住脚。要会走,不能走到敌人的圈子里去;又要会脱离,粘着敌人不离开这个地区。总之,要牢牢牵制敌人。

每天晚上,我们都要掌握明天敌人的活动变化情况。一到驻地,我们就赶快把电台架起来,侦听敌人的活动,收听野司和纵队的情况通报,掌握敌人动态。国民党军报话机经常讲明语,给我们掌握敌情提供了很大方便。敌人电台提供的情况有限,但还有野司电台和纵队电台的情况通报。纵队参谋长王蕴瑞亲自组织情报工作,抽调了一些专家侦听和综合分析敌情。我们把几家情况一凑,就能比较清楚地掌握敌人。

有一次,敌人大大咧咧地从山上往西进。我们从山下迅速向东出。前面有条大河,水很深,又很冷,大家下水跑步走,越过大河,脱离了敌人。就这样,敌人往东我往西,敌人进山我出山,来回牵着转了一两个月。虽然多次遇险,打了一些遭遇战,甚至也被包围过,但一次次化险为夷。

2月24日,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刘、邓首长决定将主力转出大别山,令三纵、六纵向淮河以北集结,令二纵北渡淮河、洪河进行休整。3月1日,我旅全部过了淮河。3月8日,到了临泉县东南的老集地区。

至此,我旅在挺进大别山后的七个多月中,参加大小战斗30余次,歼敌2400余人。同时派出三批下部,建立了一批地方政权。我旅有287名同志英勇牺牲,789人光荣负伤,部队基本上保持了战斗编制并在战争中得到了锻炼提高。

刘邓野战军跃进大别山之前,毛泽东主席对前途曾作了三种估计: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准备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在周围坚持斗争;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结果,经过七个多月三个大回合的斗争,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密切配合,粉碎了敌人对大别山的围攻,歼敌19.5万人,解放县城近百座,创建了新的中原解放区,调动和吸引了南线敌人全部兵力160多个旅中的90个旅到中原战场。人民解放军不仅在中原站稳了脚根,而且把战场推进到了江、淮、河、汉之间的广阔地区,打到了蒋介石的卧榻之旁,胜利实现了毛泽东主席预计的最好前途!

第七章 饮马长江

中原“十字架”

1948年春,我旅在临泉县东南老集进行初步整党和新式整军运动。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对扭转全国战局起了重大作用。外线的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击破了敌人在中原的全面防御体系,完成了战略展开,把主要战场推进到了江、淮、河、汉之间,南可进逼长江,瞰制南京、武汉,威慑国民党的统治中心,西可直出汉水、大巴山,叩击川东门户。全国各战场举行反攻作战,扩大了解放区,迫使敌人进一步向点线收缩,国民党军在战略上已经失去了主动。

毛泽东主席在1947年底对局势作了清晰的判断:“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

局势的变化,迫使国民党军不得不由重点进攻、全面防御改为分区防御。蒋介石调集 37 个整编师连同非正规军共 86 个旅 66 万人,布设于中原战场。重点把持津浦铁路,以平汉、陇海两铁路作为分割中原解放军的“十字架”,伺机攻击我中原解放军。

刘伯承司令员对国民党军这种“十字架”战略态势,用生动的比喻作了预言,说:“蒋介石是基督教徒,是要死在‘十字架’上的!”

我们休整时,宋时轮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十纵和王秉璋率领的十一纵队也先后到达豫皖苏地区,这两个纵队带来大批新兵。二纵补充了 3000 多新战士。我旅补充了 1448 人。这是我旅南下作战以来第一次得到较大补充。这批新战士多是冀南地区和磁县、武安的翻身农民和民兵,政治素质好。这批新战士的到来,不仅使我旅人数增加到 6000 余人,而且使部队充满了活力。新战士向老战士畅谈家乡土改后的大好形势,老战士向新战士谈论在大别山与敌人斗争的艰难历程。我带着机关人员到各团队看望了新战士,鼓励他们在部队好好干革命,争取早立功,把喜报寄回家乡,并让部队买了些鸡鸭鱼肉,改善生活,搞好卫生,使大家尽快地恢复体力。

在此之前,毛泽东主席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提出要“整顿党的队伍”。中央军委要求各战区部队利用作战间隙开展以诉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作风)为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以适应新的攻势作战的需要。中原局指示各部队:1月至4月为初步整党和新式整军阶段,营以下部队及中下级干部为重点,普遍进行查整。纵队党委决定,在休整期间整党整军,在部队中开展三查、三整和三大民主(军事民主、政治民主、经济

民主)活动。

我旅党委认真分析了部队情况,认为,部队在执行挺进大别山的任务中经受了严峻考验,但也出现大量减员和战斗力削弱的状况。有的对挺进大别山的重大意义还不理解,只看到局部损失,看不到全局的胜利;有的有畏难情绪,有怕死、逃亡现象;违法乱纪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干部队伍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官僚主义、军阀主义、个人主义等等。这些问题在过去虽然利用战斗间隙进行过教育,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次集中时间整党整军,对提高部队阶级觉悟,克服不良倾向,提高战斗力,非常必要和及时。这项工作主要由我和于笑虹同志负责来抓。

3月11日,刘伯承司令员亲自到纵队驻地老集镇东北的柳砦村,向纵队连以上干部作了《关于整党和新式整军的动员报告》。

刘司令员的讲话一向生动,大家都爱听。他频频招手,让大家坐下,自己却站着讲。

他说:“我们进军大别山是胜利了。去年,我们中央突破,砸断了敌人的哑铃把子,千里跃进大别山,美国人和蒋介石惊叫处于危险关头。他们认为是失败了。现在是战线南移,战场是在四千五百万人口的中原地区。这个胜利是个伟大的胜利,你们南征的同志有一份功劳,历史会记载的。”在大家热烈掌声过后,他接着说:“不要只看到部队进人大别山后人员减少很多,榴弹炮、山炮、野炮等重武器丢了不少,这点损失与我们取得的战略性的胜利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要看大局、全局。”他说:“不要以为你们连里伤亡几十人,就认为革命失败了,那是目光短浅。我们跃进大别山是釜底抽薪,能不烫手吗?无后方作战,能不减员吗?你们二纵五旅留在大别山,现在全纵

队人数更少了。”

刘伯承司令员问身边的纵队领导：“现在全纵队有多少人？”

参谋长王蕴瑞回答：“据3月1日的实力统计，是9000人，前几天补充了3000多新兵，现在是1.2万多人。”

刘伯承说：“一万多人，并不少。人少不可怕，以后会多起来的。可怕的是部队思想作风问题多，什么悲观失望、右倾情绪、纪律松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似乎也不灵了，真是要不得。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进行整党整军、三查三整，首先把思想搞通。今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和华东陈粟大军一起在中原消灭敌人主力。中原逐鹿，这里就是逐鹿场！”

刘司令员站着讲了三个小时。他表扬部队在大别山斗争中不畏艰险，牵着敌人团团转，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同时指名道姓地批评个别团的领导干部指挥不力，贻误战机，要大家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刘司令员的讲话条理清晰，既有说服力，又有鼓动性，大家听得豁然开朗。有的说：“我们脑子里的事，刘司令员都猜到了，这一下我的思想通了，一定要把整党整军搞好，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部队自下而上地展开了以诉苦为中心的三查、三整活动。我们组织部队学习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国土地法大纲》等文件，接着便展开群众性诉苦活动，控诉剥削阶级和反动派残害劳动人民的罪恶，从中发现诉苦典型，召开诉苦大会，掀起诉苦启发阶级觉悟的高潮。

在此基础上，开展了群众性的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的三查运动。战士们进行了自我检查，并帮助连排干部和党支部检查缺点错误。发动群众评议党员。对个别错误严重的干

部,在军人大会上进行批评教育。营团领导干部也对群众提的意见在党的会议上进行自查。在诉苦、三查的基础上,又进一步进行三整: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作风。思想作风方面,针对三查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制订了改进领导作风、面向连队、深入实际的措施。处分了少数错误严重的干部,清洗了个别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纯洁了部队和党的组织。组织方面,整顿了党支部,调整了领导班子,较普遍地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学习委员会、经济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协助连队干部和党支部抓学习,搞宣传,管伙食,连队搞得生气勃勃。如士兵委员会成员大多数是连里有威信的战斗、班长、英模人物和好党员。这个战士自己管理自己的高度民主的组织,不仅起到监督干部的作用,更主要的是用说服教育、启发诱导与表扬、竞赛等方法,调动积极因素,反对不良倾向,成为连队领导的得力助手。

各部队还掀起了群众性的学技术战术的练兵热潮。练兵场上,展开了“三合一”活动:老战士、新战士和解放战士互教互学,练与战结合,打起仗来,就是一个战斗小组。大家练瞄准、练投弹、练刺杀、练越障及各种战术动作,练兵场上龙腾虎跃,热气腾腾。

中国解放战争史上极为壮观的“中原逐鹿”已经展开。

走马中原

1948年4月下旬开始,近三个月时间里,我旅参加大兵团作战,在中原地区进行了一系列战斗。

我们首先参加了宛西战役。4月下旬,为了调动平汉线以东之敌向平汉线以西,以利于粟裕兵团行动,中央军委指

示：“首先夺取宛西之邓县、镇平、内乡、淅川四县，然后出汉水。”刘、邓首长发起了宛西战役。

宛西四县是豫陕鄂三省的要冲，西北通武关，南与汉水相接，有湍河、赵河、潦河、白河等纵贯境内，为河南省重要产粮区之一。这里曾是国民党的“模范区”，驻有28个保安团，封建势力很强。南阳则驻有国民党第十三绥靖区司令部及整编第九师主力，对我向汉水流域发展和巩固豫陕鄂根据地是一大障碍。

宛西战役由陈赓统一指挥，以四纵等部围歼西平、西峡口、内乡和镇平之敌；以陕南军区第十二旅等部围歼淅川、荆紫关之敌；以桐柏军区主力围歼邓县之敌；以二纵队和华野十纵在邓县东北之穰东、青华镇打击来援之敌。计划于5月3日发起攻击。我旅受领的任务是奔袭禹王店。

禹王店位于南阳东南，由河南省唐河县保安第三团600余人驻守。旅长周发田带一个营和一部电台去侦察情况。5月2日晨，我率领十六团和十七团分别从禹王店北面和西南面包围了禹王店。12时左右，敌地方团队1000多人和正规军一个连从三十里屯方向增援解围。当援敌进至李桥时，我旅以三个营兵力出击打援，可惜，部队动作有些迟缓，援兵逃窜了。16时，我十七团主攻禹王店，很快占领小南关，敌人退入围砦内。20时，我旅对围砦之敌发起攻击。十七团一举突入围砦。敌人分两路向北面突围。由于截击部队未到位，仅歼敌78人，缴枪110支、掷弹筒一具。我部伤亡28人，弹药消耗较大。

随后，我旅投入了老河口战斗。战斗中，担任主攻的我旅第十八团与敌后尾部队展开逐巷、逐屋的激烈争夺，毙、伤敌23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200余支。该团伤亡80余人。三营

教导员袁武云同志光荣牺牲。

1948年5月下旬,我旅参加了中原野战军发起的宛东战役。

战役部署:以一纵、三纵、六纵组成东集团,由陈锡联指挥,一部佯攻确山,主力集结确山以西,吸引临颍地区敌整编第十八军南移,并准备迎歼可能由南阳地区东援的张轸兵团;以二纵、四纵、华野十纵和桐柏军区部队主力、豫西第七军分区部队组成西集团,由陈赓指挥,配合东集团合击歼灭东援的张轸兵团。

5月25日,宛东战役正式发起。东集团向平汉线守敌展开攻击,占领驻马店,包围确山。敌整编第十八军果然南下增援,张轸也率领整编第十、二十、五十八师,采取密集队形由南阳东援。5月26日,刘、邓首长命令二纵和华野十纵向东急进,围歼张轸兵团。

我旅随纵队离开浙川,昼夜疾速东进,于30日进到桐河、观邱地区集结。

5月28日夜,西集团四纵在赊旗镇以南埠口扭住了张轸兵团,并连续九次击退张轸兵团的攻击。张轸觉察到我军意图是“围点打援”,决心西退南阳,并于29日夜以一部兵力向东发起佯攻迷惑我军。31日晨,张轸亲自率领三个整编师掉头向南阳退缩。

纵队即令我旅向官寺以北参加围歼逃敌。我旅疾进至官寺以北地区时,敌已向西逃窜。我旅又奉命向戴营、杨庄方向开进。以十六团和十七团为先头部队,十八团随后跟进,追歼敌人。6月1日晨,我旅赶到戴营,敌人又逃跑了。这时,路南为华野第十纵队部队,路北为第四纵队部队,我们无法插足。10时,我旅奉命向西追击。旅长周发田带领十六团出

发,我带领十七团跟进,当晚进至下里。当日15时左右,华野十纵和桐柏军区二十八旅,将敌整编第五十八师师部和一八三旅包围在南阳以东白河东岸的马刘营、连庄等几个村落。华野十纵当夜发起进攻,但没有奏效。

6月2日,陈赓司令员命令:歼灭被围于马刘营之敌整编第五十八师。以宋时轮集团全力攻击;以桐柏部队向大、小盆窑侧击;以四纵打援。宋时轮命令:以华野十纵攻马刘营,以二纵四旅和桐柏军区二十八旅等部分别在北面和南面两个方向进入包围圈,防敌突围。令我旅进至明皇地区,以一部攻小马庄,另一部为打援预备队,防敌西逃。

当日围住了敌整编第五十八师。敌人急了,张轸令整编第十、二十师,分别由北路、南路增援,但均被我四纵阻击于刘高庄南北一线。战至黄昏,敌退回白河西岸。敌又派出七架战斗机、三架“空中堡垒”轰炸机,对马刘营周围村庄进行轮番轰炸扫射。天黑了,敌机先投下照明弹,再投重磅炸弹轰炸。

我旅在敌机疯狂轰炸扫射下,在背包上、帽子上插上树枝,沿麦田小道,迅速隐蔽向前运动,在天黑前作好了一切攻击准备。

原定于6月2日21时总攻马刘营之敌。遵照刘、邓首长指示,为吸敌来援,再歼其一部,故又决定当晚只打外围的连庄等村庄,留下马刘营之敌成为鱼饵,吸引敌整编第十、二十师再次增援。

6月2日晚,我旅和华野十纵向马刘营外围连庄、小马庄发起攻击。连庄之敌逃入马刘营后,我旅占领了连庄、小马庄。6月3日拂晓,马刘营之敌见待援无望,企图向西突围。我旅与十纵主力趁机发起攻击。我旅从西面、西南面进攻马

刘营之敌。

我和牟海秀副旅长在一线指挥战斗。十六团担任主攻，一营、三营为突击队，二营为第二梯队。团长向茂森指挥一营、政治委员胡永昌指挥三营实施突击。

十六团三营迅速向敌实施勇猛冲击。八连班长王禹云带领全班战士突破敌人鹿砦，摧毁敌人地堡，突入村内，歼敌一个重机枪排和一个步兵班。另一班长带领全班冲进敌人碉堡群。敌轻、重机枪猛烈扫射，封锁通道。副班长王开虎一气投了19枚手榴弹，终于把敌人碉堡群的机枪打哑了。随即后续部队迅速从突破口冲入村里。

一营从西南面突入，向纵深发展，代理营长马辛春在战斗中负重伤。友邻十纵部队也从东面、南面攻入村内。经过一个多小时激战，敌人缴械投降。

我旅十六团七连和八连首先突入敌整编第五十八师一八三旅指挥所。七连九班班长谭玉水带领战斗小组以勇猛动作冲到一个大院门口，消灭了地堡守敌五六人。他们发现这里有许多电话线向四处伸延，判定是敌人的指挥机关，当即向院里投手榴弹，大喊：“缴枪不杀，优待俘虏！”

一个长满黑胡子的军官从屋里出来，不住地喊：“别打枪，我们投降了！你们哪一位是长官？”

谭玉水说：“有什么话向我说吧，我是班长。你是什么人，是师长还是旅长？”

黑胡子军官说：“我是一八三旅旅长魏沛苍。师长要我守机要室，又下令要坚决抵抗，他不知哪里去了。你们的炮火太厉害，打得工事里待不住了，就躲在屋里，一颗炮弹炸了，差点要了命。”

谭玉水让他命令部下缴枪，向他讲明了解放军优待俘虏

的政策。

魏沛苍说：“都知道！都知道！你们是刘伯承将军的队伍，在大别山我们是较量过的。向你们缴枪我们是甘心的！”又说：“我快50岁的人了。这种仗谁也不愿打……”接着，魏沛苍把金壳手表、金怀表、金戒指、金条等财物收拾好一包，紧紧抓住，又拿出一支派克笔，递过来，要给谭玉水。

谭玉水拒绝了，把笔放回魏沛苍的包里，把他押送到了旅部。

我让政治部敌工科派人将魏沛苍送到纵队政治部敌工部。他们又派人将魏沛苍送到中原军区政治部。

魏沛苍又拿出那支派克笔，对护送的人说：“你们解放军我服了，这支笔你一定带回去，我要在你们部队里留下个小纪念品。”

纵队政治部决定把这支笔交给活捉魏沛苍的七连处理。于是这支笔又送到我旅，由旅部转交到团、营、连。七连通过全连民主讨论，决定将笔奖给谭玉水。战后，谭玉水战斗小组被评为“功臣战斗组”，谭玉水晋升为三排排长。纵队政治部发通令号召全纵队指战员向谭玉水同志学习，争取在秋季作战中取得军政双胜利。

马刘营战斗，我旅与华野十纵一起歼敌整编第五十八师师部及一八三旅大部，共6000余人。我旅俘敌一八三旅少将旅长魏沛苍、五四七团上校团长杨工斋、整编第五十八师军法处上校处长李屏苍、新闻处中校处长熊世开等以下749人，毙敌160人，共计歼敌909人；缴获六〇炮三门、迫击炮四门、掷弹筒两具、重机枪10挺、轻机枪43挺、其他枪支441支及大量弹药、军用物资等。我旅伤亡48人。

在大别山时，我旅与整编第五十八师有过多次交战，都没

有将其歼灭,这次算是报了大别山一箭之仇。

宛东战役结束,我旅在宛东地区进行了短暂休整。

6月27日,纵队向我们传达中原野战军司令部的命令:为配合华东野战军发起的睢杞战役,围歼敌区寿年兵团,二纵队与一纵、三纵向平汉线遂平地区前进,阻击吴绍周兵团,使其不得北援。

当晚,我旅由保安镇地区向平汉线仪封镇地区开进。经过两天行军,于29日20时进至合水镇、仪封镇地区。按纵队部署,我旅负责在仪封镇一线阻击敌人;以贵腊寨、韩庄、后庄为主阵地。

30日8时许,敌整编第二十八师八十旅从正面向仪封镇反复攻击,均被我十七团击退。10时左右,敌又以第五十二旅的两个团兵力向仪封镇西面后庄阵地实施多路攻击,企图向仪封镇迂回。由于十七团二营警戒不够,敌人利用高苗地和路沟等隐蔽地形突至二营的果庄等阵地侧后,将十七团防守的果庄、戚楼等阵地占领。敌人又从戚楼、王文楼向高槐树、安庄进犯,遭到十六团的顽强抗击。十六团予敌以大量杀伤后,撤出高槐树,进至河西。十八团进到合水、史庄、杨罗庄地区防御。敌人占高槐树后,向石庄攻击前进,十八团奋勇反击后,撤至河北岸。12时左右,我旅实施运动防御,调整部署,将防守仪封镇的十七团撤至北寨。

与此同时,四旅抗击敌整编第八十五师的进攻,予敌人大量杀伤后撤至郟埠口、杨庄一线。

敌人在30日攻击了一天,只前进了几里。7月1日凌晨1时,纵队奉命将主力向西转移,坚守合水镇,并监视仪封镇敌人的动向。我旅三个团分别转至仪封镇以西贵腊寨、瓦岗寨、赵庄一线布防。1日12时,敌整编第二十八师八十旅向

我旅十八团阵地丁堂庄、铁钹庄进攻，十八团击退敌人数次进攻，战至傍晚，向敌进行反击，歼敌一部。敌即撤回。为诱敌西进而歼之，当晚我旅向西转移到舞阳以西待机。

从6月30日至7月1日，中原野战军主力在西平以西地区与敌吴绍周兵团展开激战，用诱敌前进、从翼侧反击的战法，使敌人暴露在原野上，予敌以重大杀伤。张轸恐吴绍周兵团被歼，急调胡璉兵团折回遂平，与吴绍周兵团靠拢，停止北援。7月2日，北线之敌区寿年兵团被华东野战军基本歼灭。中原野战军主力胜利完成了阻击作战的任务。我旅在仪封镇、合水镇阻击战斗中毙敌290人。

仗一个接一个。7月初，中原野战军主力在西平阻击敌人时，敌主力大部分在平汉路沿线，汉水流域之敌便陷入了孤立状态。据此，刘、邓首长乘机发起襄樊战役。

7月13日，二纵开赴方城附近，并派两个加强营伪装主力，进击南阳，吸引南阳之敌，配合襄樊作战。14日拂晓，我旅副旅长牟海秀率领十七团一营、三营，由驻地草厂寨出发，于16日进至新店以东地区，向南阳之敌佯动。我旅主力14日上午由草厂寨出发，于15日到达方城地区。

16日上午，中原野战军司令部获悉：南阳守敌十三绥靖区司令官王凌云趁中原野战军主力在平汉线阻击之机，派部队袭击了陈赓部队的后方基地。其整编第九师七十六旅副旅长张桐森率领二二八团和山炮连、特务连、运输连及方城保安第三团等3000余人，13日由南阳出发，于15日15时袭占了拐河镇，当天凌晨向柳河方向回窜。

野战军首长命令二纵：坚决截击歼灭该敌。

我旅和四旅主力一起直插广店、袁店一线。部队全部轻装前进。时值盛夏，骄阳似火，中午气温高达三十八九度。太

阳下急行军,不少战士中暑晕倒。

18日6时30分,在刘村镇西北,我旅警戒部队与敌先头部队接火。

敌首先抢占了刘村镇西北的一个山头723高地,企图将我旅部队逐出刘村镇,而后渡过白河,向南阳逃窜。纵队首长即令我旅和四旅发起攻击。我旅主力由刘村镇向西北攻击,一部由刘村镇向北攻击。旅指挥所设在瓦房店,由周发田指挥;前线指挥所设在刘村镇,由我指挥。

9时左右,各部队开始对敌进行包围。敌向刘村镇发起攻击,遭我旅十六团猛烈反击,便想避开我旅主力,从刘村镇以西越过白河、窰河店返南阳。

纵队指挥所令我旅以一部监视723高地之敌,主力迅速向西迂回,控制刘村镇以西之高地,防敌西窜,而后迅速沿西湾、前湾、桃园沟向北攻击,并令我旅副旅长牟海秀率十七团两个营由石桥以东移至曹店南的九家坊,沿白河一线布防,构筑工事,阻止南阳之敌北援。

各部队在运动中和敌人展开激战。十八团团长李开道率部在西湾、桃园沟歼敌两个连后,继续向北攻击,于16时在蛮子坑与四旅取得联系,完成了对敌的包围。至此,敌人已全部被包围在723高地及其以北一线的山岭上。至16时,经过10个小时战斗,敌人气焰被打掉,但仍在顽抗,固守待援。

我旅十六团团长向茂森率突击队一营攻打723高地时,两次冲击均未成功,部队有些伤亡。我在指挥所给向茂森打电话,准备将一营替换下来。一营指战员斗志高昂,一致请求:坚决攻下高地,为牺牲的烈士报仇。营长黄庆昌还代表全营向团首长保证:“拿下高地,为人民杀敌立功。”

我们同意了他们的请求。该营调整部署,组织了两支突

击队和一支预备队。我将旅的山炮也调到该营,作好了攻击准备。陈再道和范朝利正在前线指挥,突然来了指示:各部队暂停攻击,一定要协同动作,组织好火力掩护。18时发起总攻。

我旅重新调整作战部署:由我指挥十六团向723高地攻击;周发田指挥十八团向西北方向攻击;十七团二营为旅预备队,位于刘村镇以东地区,并担任南面警戒;其一营、三营仍部署在沿白河一线,阻击南阳之敌北援。

18时,纵队下令全线攻击。炮火向敌阵地打击之后,我十六团一营向723高地发起攻击。部队迅速攻占了山头,连续打退敌人五次反冲击;守敌一个营被全歼,营长被击毙。二营也攻上去了。七连指导员张立梅和一排副排长焦凤岗活捉敌二二八团团长王英冠,完全占领了723高地。十八团攻下了小曹山。各部队战至19时30分,将守敌二二八团全部歼灭。我十六团一营由于出色地完成任务,立大功一次。

刘村镇战斗共歼敌2145人,缴获山炮两门、六〇炮18门、迫击炮五门、重机枪14挺、轻机枪77挺、其他枪支1032支,以及大批弹药和军用物资。我旅毙敌180人,俘敌二二八团团长以下660人,缴获六〇炮七门、重机枪两挺、轻机枪15挺、其他枪支380支、炮弹和各种子弹及手榴弹共3万余发。我旅伤亡345人。

这是一次成功的歼灭战。对突袭之敌以狠狠打击,震慑了敌人,半年内他们再没敢深入中原野战军腹地一步。

“三层亮”

1948年7月31日至8月1日,中原军区在宝丰召开了

团以上干部会议。会议决定再用两个月时间继续进行整党和新式整军运动。与春天的整党整军不同的是,那次的对象是营连以下干部,这次重点则是纵队和旅团领导干部。

为了使运动有好的效果,这次采用了“三层亮”的方法。“三层亮”是一个新鲜和通俗的提法。所谓“三层”,是指上级、同级和下级三个层次;“亮”,则是这三个层次都要互相亮出思想,亮出问题,亮出建议,亮出批评和自我批评。目的是加强党的领导和开展军事民主,通过对各种不良倾向开展斗争,提高认识,端正思想作风,增强部队战斗力,夺取军政双胜利。

7月下旬,我旅随纵队进抵方城地区休整。此间,晋冀鲁豫老区送来一批新战士,加上刘村镇战斗中的解放战士,共1500余人补充到各部队。

8月16日,刘伯承和陈毅来到二纵驻地竹园村作整党整军动员报告。到会的同志除了二纵外,还有六纵和桐柏、江汉、陕南军区的团以上干部。

陈毅说:“好多话宝丰会议上都讲了,再说还是老调重谈。前一段,你们二纵和宋时轮纵队一起打得不错,我们表扬了。襄樊战役你们六纵和桐柏、陕南部队打得相当出色,中央表扬了。但不能骄傲。”接着,他谈到了毛主席制定的将战争引向蒋管区的战略方针,问:“你们思想上弄通了没有?”

有人答:“现在基本上通了。”

陈毅斩钉截铁地说:“不能基本上通,必须从思想上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我在宝丰会议上讲过,中原打完仗,还要过长江。谁不想过江,就是不想彻底打倒蒋介石,是想叫蒋介石多盘踞几年!”接着,他介绍了全国战局的演变和各战场情况,讲了敌我军事力量的消长,特别赞扬了刘邓大军带头中央突破,起了扭转战局的决定性作用。

陈毅说：“有的同志不了解进军大别山的战略意义，只看到自己力量削弱了，有的干部讲怪话，很不对头。去年如果不打出来，陕北、山东、晋冀鲁豫能有现在这样好？华北的胜利，如记功中原应得一半。这不是我说的，是5月初毛主席对我说的。当时毛主席说，要充分估计中原战场的胜利意义。我们有的人向后看，只看到眼前的困难，看不到战略胜利，一心想恢复内线作战，回家与老婆娃娃见面。挺进大别山，进军大中原，部队受到削弱，没有后方，物资困难，人拖瘦了，脚板跑大了。这个代价必须支付，因为这个代价是伟大的。我在中央开会时，朱德总司令说，自古谁得中原，谁就可以得天下。中原指战士们要了解自己最光荣的岗位。”

他拿起一份报纸，说：“这是毛主席写的评论（指《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其中有一段话，‘我刘邓、陈粟、陈谢三路野战大军，从去年夏秋起渡河南进，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歼灭大量敌人，调动和吸引蒋军南线全部兵力160多个旅中约90个旅左右于自己的周围，迫使蒋军处于被动地位，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获得全国人民的称赞。’”念到这里，陈毅话头一转，提高了四川嗓门，瞅着台下问：

“这些话是说谁的？说的是你们！我们！光荣啊，同志们！”

刘伯承司令员这时也乐了，大声叫：“好噢！”

会场全都跟着呼应“好噢——”，掌声、笑声不断。

刘伯承插话：“我上次给他们讲过，这里是逐鹿场。看看自己是不是男子汉，有没有勇气。”

陈毅说：“对头！又想光荣，又不想再干，没有胆量，没有智谋，你逐鬼的鹿。记得有两句唐诗，‘中原还逐鹿，投笔事戎轩。’好像是魏徵的诗，是不是？”他问刘伯承。

刘伯承说：“你是文武双全的将才，不会记错，是魏徵的。传说魏徵是冀南人，巨鹿的，王蕴瑞的老乡。”

大家早就钦佩两位司令员的文采武略，这几句对话，更赢得满场哈哈大笑。

陈毅说：“整顿思想，是为了总结提高，为了今后搞得更好，不是和哪个过不去。批评的同志要与人为善，被批评的同志要心胸开阔。我们是光明磊落的党，是人民的军队，上下在政治上是一致的，没有特权。对谁有意见都可以提，对刘邓、对陈毅，都可以提！”

陈毅前后讲了五个半天，大家听的兴趣一直很浓，我也感到极有收益。

第六天，刘伯承司令员讲话了，主要讲了整党整军、总结作战经验和提高干部水平等几个问题。

刘伯承还特别强调了学习问题，说：“现在要继续整党，特别是你们领导干部，一定要把整党搞好。陈毅同志希望大家认真学习。当个指挥员不学习不得了。不学习、不提高，打起仗来只会喊‘冲啊！’往哪里冲？怎么冲法？敌情都没摸清，乱冲一气是要吃亏的。我们过去有这个教训。有的指挥员勇敢有余，智谋不足。现在是大兵团作战，敌人是一坨一坨的行动，你们哪个纵队想吃掉敌人一个集团都难做到。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搞通了，战役组织指挥，战术协同动作，都要跟上去。要适应新的情况，就要不断学习。陈毅同志要大家带几本书，我看我们有的干部一本也不带。算命先生还带一本万年历，给人算八字一翻就知道。你不学习，你教下边什么？”

陈毅插话说：“不仅教不了下边，互相之间也谈不拢。”

刘伯承说：“对！俗话说：‘两个秀才谈书，两个屠夫谈猪’，双方都有学问，不然啥子也谈不成。你们一定要认真学

习,可不能马虎。”

听了两位首长的讲话,我对全国形势和战局的发展,对挺进大别山、中原逐鹿、整党整军的意义,从思想上、理论上认识得更加清楚了。

半个世纪过去了,现在回忆刘、陈两位老师的讲话情景,依然记忆犹新。

1948年8月24日,我参加了纵队召开的党委会。刘伯承和陈毅讲了话,对纵队主要领导存在的毛病,如同志间关系不够融洽等,进行了坦率严肃的批评,要求领导成员必须以身作则,做部队的表率。每个党委成员,也都自觉地检讨了自己思想作风上存在的毛病,相互展开批评,增强了党委内部的团结。刘、陈两位首长直到27日才离开。

8月29日,纵队召开党委扩大会,吸收团以上主要领导干部参加,共99人。与会人员经民主选举,产生了九人组成的纵队整党委员会,主持整党会议。先由党委主要成员作检讨报告;然后各小组酝酿,大会发言。会议开得严肃认真,气氛热烈。与会人员对党委成员提意见畅所欲言,批评开门见山,指名道姓,很坦率,很尖锐,毫无顾忌,把埋藏在心里的话都讲出来了,而且态度诚恳。

我是直肠子,自然不会藏藏掖掖。我坦率提了四条意见:

一、纵队首长在作战指挥上简单生硬,不讲战术,不深入了解战场实情。如羊山战役,第一次总攻时,下面部队报告的情况不确实,纵队就下命令将两个旅的部队突进羊山西街,结果高峰上敌人未打掉,白天敌人居高临下的强大火力反击,使我们的部队站不住脚,撤出时伤亡很大,而且战后总结经验教训不够。

二、党委内部团结差,思想斗争不开展,集体领导不够,民

主作风差,工作不协调。

三、思想作风上简单生硬,存在着官僚主义、狭隘经验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的毛病。

四、将五旅全部留作地方部队极为不妥,使二纵主力部队受到削弱,为尔后二纵遂行战斗任务带来了困难。在大别山斗争中,二纵不应该减员那么大,损失 1.7 万多人,是纵队领导决策的错误。

纵队几个主要领导同志都虚心听取意见,诚恳接受批评,也认真检讨了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会议开了 10 天。

通过这次“三层亮”的整党整军,部队在政治上、军事上和领导作风上,都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为大兵团联合作战,解放中原,夺取全国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瘦狗拉硬屎”

1948 年 9 月,中原军区颁发了《秋季作战的政治命令》,号召所属部队与全国各战场呼应,发动秋季攻势,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夺取军政双胜利。

我旅作了动员,号召部队在秋季作战中立新功,掀起了完成作战任务的挑战比赛。9 月 17 日,我旅离开方城,向泌阳进发,寻机歼敌。此后一个多月时间里,我旅随纵队一起,挥师南下,参加了黄港、应城、花园市等战斗。

到 11 月初,全国秋季攻势取得了胜利。济南战役歼敌 10 万人,辽沈战役歼敌 47.2 万人,并解放了东北全境。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占有优势,在数量上也占有了优势。毛主席高兴地预言:“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中共中央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人组成总前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为常委，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统一领导与指挥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确定在原拟的淮海战役计划基础上，扩大为以徐州为中心，进行一场与蒋介石最大战略集团的大规模决战，用三至五个月时间，歼灭敌人于淮河以北地区。并责成中原、华东、华北三大解放区，集中一切力量，克服一切困难，全力以赴，组织支援。指出：“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解决。”中原野战军首长决心集中一切力量，克服一切困难，完成中央赋予的光荣任务。

二纵这时驻在花园地区。为牵制黄维兵团东调徐蚌战场，11月2日刘伯承司令员电令二纵向北急进，限11月6日黄昏前赶到淮河北岸息县地区，侧击黄维兵团。命令严肃指出：“此次配合徐州方面作战，不仅关系中原战局之转变，即对推动全国战略形势之发展，争取早日打倒国民党亦属重要之关键。因此，需动员全体指战员服从整体利益，不怕任何疲劳，不怕任何困难，不怕消耗与牺牲，采取一切有效办法来截击、阻击东进之黄维兵团，迟滞其运动时间，以保证徐州作战之胜利。”11月3日晨，我旅从大别山夏店出发。在刚过去的秋季攻势中，我旅指战员由于连续行军作战，极为疲劳，但大家斗志高昂地奔向淮海战场。

11月6日，淮海战役正式揭开序幕。这天下午，我旅越过淮河，18时左右，按上级命令赶到息县以北地区。

进入淮北，天气寒冷，病号增多。刘司令员命令：“二纵以急行军最快速度，超越黄维兵团，进至沙河北岸槐店（今沈丘）、鲁台集地区，领取棉衣，尔后东进。”7日，部队向鲁台集疾进。这段路程比前几天更加难行，不但要渡过汝河、洪河、

沙河等水系,而且道路泥泞,加上风寒雨淋,对身穿单衣的指战员来说是严峻考验。我旅是吃过大苦、打过恶仗的战斗集体,大家士气很高,满怀豪情地说:“挺进大别山时,吃的苦比这大多了,这点困难算啥!”

这时传来华东野战军开始围攻黄百韬兵团的消息,更加鼓舞了士气。十七团团团长陈金龙是老红军,看见战士病了,就把自己的战马让给病号骑。我的马也让给病号骑,与战士们一起步行,带领部队勇往直前。13日下午,我们赶到鲁台集,领取了棉衣。为了给二纵解决棉衣、鞋子,豫皖苏分局书记宋任穷想尽了一切办法。棉衣中还装有慰问信,给指战员们极大鼓励,穿在身上感到分外温暖。

11月18日,我旅越过涡河,按期赶到蒙城西北的西阳集、小涧镇地区布防,与一纵共同阻击黄维兵团。我们终于比黄维兵团提前赶到了。

黄维兵团在东进途中,12万人的队伍遭到我军不断袭扰,行动缓慢,18日黄昏才到达涡河南岸蒙城地区,比我们晚了几个小时。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却迟迟不前,仅以第六十八军在固镇地区作试探性进攻。

刘、邓首长决定乘李延年兵团尚未集结与黄维兵团靠拢时,先歼黄维兵团。

19日,敌进攻涡河北岸小涧镇地区我六旅阵地,遭到十六团顽强阻击。当晚,我旅移至曹市镇地区,继续阻击敌人。21日,刘、邓首长指示:“因敌人进攻正而很宽,我防御纵深薄弱,且我军主力尚未赶到,更兼涡河、淝河间地区狭窄,不便大军作战,故我决定在淝河、淝河之间歼灭敌人。”令一纵、二纵和六纵当夜转移至淝河与淝河之间曹市镇、孙町集一线布防。二纵移到白沙集及以北地区布防;我旅到达袁店集西北地区。

歼灭黄维兵团并非易事。11月22日,纵队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范朝利副司令员传达总前委关于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部署。刘伯承司令员为了说明这个仗的难度,打了个生动比喻,说这一仗是“瘦狗拉硬屎”。

刘司令员讲,围歼黄维兵团是淮海战役第二个阶段。中原野战军的任务就是设法将黄维兵团包围起来,分割歼灭。从双方兵力来讲,中原野战军七个纵队,与黄维兵团大体相当,而我们的武器装备却明显处于劣势。他强调指出,一定要充分认识围歼黄维兵团的艰巨性。

邓小平政委也强调了这一仗的艰巨和残酷性,要求大家拿出“倾家荡产”的气魄,坚决打好这一仗。他说:“只要歼灭了南线敌人的主力,中原野战军就是打光了,全国各路解放军可以取得全国胜利,这代价是值得的!”

听了纵队领导的传达和讲话,我深感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刘、邓首长的气魄和决心也让大家很受震动和鼓舞,我旅各团领导纷纷表示,希望在围歼黄维兵团战斗中挑重担,打头阵,完成最艰巨的任务。

11月24日,敌人渡过浍河北进,钻入我预设阵地,遭我东、西、北三面阻击。黄维觉察其处于不利态势,即令各部撤至浍河南岸。总前委乘敌转移之机,下令全线出击,向敌合围。从黄昏战至25日晨,黄维兵团已经被我野战军主力包围,压缩在宿县西南双堆集为中心的纵横7.5公里地区内,成了瓮中之鳖。我旅也攻占了双堆集以西地区的周庄、李围子、马家楼、茂集、潘家庄等地,参与了对敌人的包围。

26日起,敌人开始突围。敌八十五军先头部队在坦克掩护下向二纵阵地发起连续多批次攻击。我旅在张庄阵地与敌展开激战,打退了敌多次冲击。我部队采取挖防坦克沟和交

通壕的办法打敌坦克。敌坦克陷进沟里时,十七团二营马教导员率领战士用集束手榴弹炸毁敌坦克三辆。有些坦克越过了壕沟,十八团指战员用炸药包等迎头痛击。四旅在坦克经过的道路两旁,点燃事先堆起的高粱秆,敌坦克开道经过时,阵地上浓烟滚滚,遮住了敌坦克视线,爆破手便乘机带上成捆手榴弹和炸药包冲过去,炸它的履带,连续炸瘫了前头三辆坦克。敌队形大乱,我趁势攻击,歼灭跟随其后的步兵。我们还采用在阵地前把土刨松,用白灰画上圈,用秫秸做上标记,伪装成地雷场,吓跑敌坦克。纵队首长把炸坦克的土办法向刘伯承司令员汇报时,刘司令员称赞说:“你们打得好!要充分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灵活机动歼灭敌人!”这一天敌人不仅突围没有成功,我军反而向前推进了1.5公里。

27日,黄维集中第十八军十一师、一一八师、十军十八师、八十五军一一〇师等四个主力师,在大量飞机、坦克和炮火支援下,向双堆集东南方向突围。

敌第一一〇师师长廖运周是我党地下党员,在这关键时刻,他遵照党的指示率部起义,一下子打乱了敌人的部署。乘此机会,我旅发起猛烈冲击,一直攻到了双堆集附近,占领了前马庄、马庄,歼敌100余人。各团即抓紧构筑阵地工事,向双堆集进行近迫作业,构筑纵横战壕。

28日,蒋介石令黄维兵团就地固守。这一天,我旅十六团在纵队王维纲政委率领下,前往起义部队第一一〇师执行护送任务。六七天以后,十团接替了任务,十六团又返回前线。

此时,敌人的粮弹供应已被我切断,十分恐慌。他们意识到与其死守,不如杀出一条生路,于是连续几天向我纵阵地发起凶猛攻击。30日中午,敌攻占了我旅小周庄阵地。当晚,

我旅组织反击,夺回了小周庄。12月1日战斗最激烈。早上8时许,敌人在20架飞机和20余门火炮、14辆坦克掩护下,以一个团兵力,采用“滚肉球”战术,向四旅宋庄、顿庄阵地发动猛攻。四旅击退了敌人连续突击,毙、伤敌600余人,但自己伤亡较大,弹药消耗也很多。纵队连夜调整部署:除十二团坚守马家楼、东西王庄,十团一个营守马围子外,其余阵地由我旅接替,重点坚守杨庄、大王庄阵地。

12月2日14时,我旅接替四旅防地,我旅原防地则交由华野七纵十七师接替。四旅转移至赵集地区进行整顿。3日,我旅向宋庄挖交通壕,准备协同友邻第一纵队攻取宋庄、顿庄。

黄维兵团被围后,蒋介石急令刘峙指挥徐州的杜聿明集团及蚌埠的李延年兵团,南北对援,解救黄维兵团。11月30日,杜聿明指挥三个兵团约30万人,放弃徐州,向西南转移,以增援黄维兵团。12月4日,华野主力将杜聿明集团包围于永城东北之陈官庄、青龙集、李石林等狭小地区内。总前委决定,先歼黄维兵团,尔后再集中全力歼灭杜聿明集团,并调整部署,增强了攻歼黄维兵团的兵力。根据蚌埠方向李延年兵团再次来援的情况,令二纵转向蚌埠方向,和华野第六纵队一起,共同阻击李延年兵团。

我旅将阵地移交给友邻部队,12月4日20时南移大营集地区。

在即将歼灭黄维兵团的时刻突然改变作战任务,我旅许多指战员思想不通。有的说:“我们把水淘干了,又叫别人来捉鱼。”还有的不愿打阻击,怕消耗大。我们及时对部队进行教育,强调战役的整体性,树立全局观念,局部服从整体。淮海战役是大局,无论是围歼黄维兵团,还是阻击李延年兵团,

都是为了战役的胜利。

李延年兵团第五十四、三十九、九十九军,于12月4日越过淝河,向双堆集攻击前进。5日,蒋介石之子蒋纬国率战车二团支援李延年兵团向西北攻击,其五十四、五十五军由曹老集地区向何集、包家集地区进攻。

5日凌晨1时,我旅到达淝河以北大营集地区。当日,纵队领导召集各旅领导干部开会,部署了防御任务。我旅任务是,在位于淝河以北大杨庄地区防御,并派部队控制铁路桥。6日18时,我旅移至淝河以南,接替了四旅的防地。我旅集中主要兵力于潘庄、刘庄、何集地区。十八团位于宋大桥、代庙、潘庄地区,以潘庄为主要防御阵地;十七团位于三门戴、安庄、大刘庄、苏庄地区,以大刘庄、三门戴为主要防御阵地;十六团位于何集、余店子、西庄地区,为第二梯队。

7日6时,敌第五十四军八师二十二、二十三两个团由宋庄向我旅阵地宋大桥、戴门、三门戴、大刘庄等地全面进攻。我和旅长周发田、参谋长王树棠等亲临一线,指挥部队进行顽强阻击。

敌主要攻击方向是我十八团阵地宋大桥、代庙。十八团在团长李开道、政委王新带领下,对敌实施反击。敌被迫停在阵地前沿200余米处。十八团二营以猛烈火力将敌战斗队形打乱,并乘机以一个排实施反冲击,毙、伤敌80余人。9时左右,敌二十三团以一个半营兵力向十八团四连的宋大桥阵地再次攻击。敌约一个连兵力突入了四连阵地。四连只有67人,与敌展开肉搏,将突入之敌大部歼灭,坚守住了阵地。10时左右,敌约两个连兵力再次攻击宋大桥阵地,正面以小股部队佯攻,主力向两侧迂回。十八团二营即以一个连加强阵地两翼,以猛烈火力将敌击退。我坚守宋大桥、代庙的部队伤亡

较大,工事也大部被毁,随即撤出阵地。

12时左右,敌占领了宋大桥、代庙阵地,会同占领二门戴之敌,开始向十七团阵地攻击。十七团在团长陈金龙、政委范朝福指挥下向敌反击。敌人首先向十七团一营防守的三门戴、大刘庄阵地攻击,被我击退。13时,敌人又集中两个营兵力继续向三门戴阵地两翼迂回。十七团一连向敌实施连续两次反冲击,将敌击退。14时左右,敌从二门戴占领有利地形,威胁三门戴及大刘庄阵地,使十七团一营三面受敌。经激烈战斗,一营营连干部大部伤亡。战至16时,撤出阵地。

当日夜,我旅奉命调整部署:以十七团坚守张家、罗庄、陈家湾、苏庄阵地,保障十八团潘庄阵地右翼安全;十八团继续坚守潘庄、严圩、陶庄阵地;十六团按原部署未动。

8日8时30分,敌第八师二十三团一个连由宋大桥、代庙间向我十八团一营潘庄阵地作试探性进攻。9时左右,敌以两个营兵力继续攻击,又被我击退。十八团以七连加强潘庄阵地,并以一个连占领潘庄村北200米处有利地形,侧击敌人。11时左右,敌在飞机和炮火配合下对潘庄阵地猛烈轰击,我前沿工事大部被摧毁。12时30分,敌约出动五个连兵力再次向潘庄猛攻,均被我击退。14时,敌以一个营兵力再次攻击,其步兵进至距我阵地前沿100米处不敢前进。战至15时左右,敌抢运伤员,开始撤退。十八团当即组织火力杀伤敌人。

当晚,我旅奉命转移至何集一线防守。我与纵队钟汉华副政委一起到十六团驻地部署任务。他要求十六团在何集方向阻击李延年部队,不使敌人越过濰河,以保障主力全歼黄维兵团。我们决定由团长向茂森率一营、三营前出何集及苏庄,阻击敌人前进;政委胡永昌率二营,在何集与西庄一线构筑工

事。

9日7时,敌正面攻击受挫,改由侧翼迂回。约一个团向十七团陈圩、罗庄阵地攻击,企图迂回潘庄、何集阵地。为掩护我旅主力转移,十七团以两个连兵力在陈圩、罗庄阻击敌人达6小时,任务完成后,转移至三门崔、余店子地区。十八团亦由潘庄转移至崔圩、瓦房、前后乔家地区。

9日9时,敌以一个团兵力分三路向十六团阵地何集、苏庄进攻。十六团一营、二营经一个多小时战斗,予敌以重大杀伤后,撤至二营阵地西庄侧后的崔庄、张家圩一线防御。12时,敌以一个团的兵力在炮火掩护下,向二营西庄一线阵地猛烈攻击。二营指战员放敌人进入阵地前100米、50米处,然后集中火力予以杀伤,并组织班、排小分队反击。战至17时左右,击退了敌人进攻。

10日,二纵奉命调整部署,但我旅仍防守灞河南岸:十六团防守新集、张家圩、崔庄、张庄、严家等地;十八团防守谷堆沿、崔圩、瓦房、荒地等地;十七团防守萧庄、邱庄、前后乔家、大崔营、李家庄等地。当日,敌五十四军第八师以一个团兵力向我旅阵地严家、张庄、荒地、李家庄一线进攻。我旅各团进行顽强阻击,予敌以大量杀伤后,撤至小张庄、崔庄、崔圩、后松林、前乔家一线。

11日,敌五十四军第八师又以一个团兵力先攻占后松林、崔楼子,然后集中两个团的兵力,分两路,一路由小张庄向北进攻张家圩,另一路由崔楼子向崔庄、韩庄进攻。我旅各团奋勇阻击。各部队在战斗中打得很艰苦、很顽强。十六团七连副排长筱瑞章带领三名战士在小庙东与敌两个排战斗了整整一天,毙敌数十名。敌因遭受打击,改变攻击方向。

12日9时,敌以两个团的兵力,在飞机、火炮支援下,向

十六团阵地张家圩、崔庄、新集一线猛攻。激战两小时，十六团予敌以大量杀伤后向西转移。

13日，敌以一个团兵力向我旅阵地崔家庄进攻，十六团在参谋长申文俊指挥下英勇反击，击退了敌人进攻；可惜的是，申文俊同志在战斗中光荣牺牲。

14日，敌以一个营兵力向崔家庄、崔庄等地作试探性进攻，均被我旅部队击退，双方形成对峙状态。

我旅与兄弟部队一起经过10天的运动防御作战，敌李延年兵团只前进了10公里，这时距黄维兵团的双堆集阵地还有35公里。15日晚上，黄维兵团被中原野战军主力和华东野战军一部全歼，兵团司令官黄维、副司令官吴绍周等被活捉，淮海战役第二阶段胜利结束。

喜讯传到部队，大家都沉醉在欢乐之中。我旅圆满完成了阻击任务，于12月17日奉命开赴涡阳待机。

被我阻击的李延年兵团仅迎救了从双堆集乘坦克出逃的副司令官胡璉，然后便向蚌埠方向狼狈逃窜了。

淮海战役转入华野主力围歼杜聿明的第三阶段。中原野战军主力为战役预备队，集结在宿县、蒙城、涡阳地区。

1949年1月10日，华东野战军在永城陈官庄地区全歼杜聿明集团，淮海战役宣告胜利结束。

回想参加淮海战役的过程，我深为我旅部队自豪。

我旅从11月18日到12月15日参加战斗28次，歼敌1100余人，击毁坦克三辆，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特别是围歼黄维兵团即将全胜的关键时刻，我旅奉命打援，部队坚决服从命令。这种从整体利益出发，不计较局部得失的全局观念和敢于“啃硬骨头”的战斗作风是值得永远发扬的。这也是刘、邓首长培育和锻炼出来的我野战军老传统的特色之一。

当然,在完成作战任务中,我旅也付出了较大代价:伤亡 621 人,许多优秀指战员在战斗中光荣牺牲。如十六团参谋长申文俊同志,牺牲时年仅 29 岁。他是河北邱县人,1938 年 3 月入伍,同年 8 月入党。他作战勇敢,身先士卒,指挥作战机动灵活,有勇有谋,是一位优秀指挥员。

胜利是烈士们用鲜血换来的。

军乐声中过长江

1949 年初,我调到新成立的十一军任政治部主任。

淮海战役结束后,为适应新的战争形势,根据中央军委“统一全军组织和部队番号”的指示,1949 年 2 月,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下辖第三、四、五兵团。十一军与十军、十二军一起,隶属第三兵团;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政治委员谢富治。

番号的统一调整中,原来的纵队都变成了军。十一军则是原三纵改编的。三纵长期没有政治部主任,一直由副政委阎红彦兼任。我去当十一军政治部主任,是原纵队领导点名要的。到三纵报到时,部队正在作渡江准备工作。陈锡联司令员还在三纵,未去三兵团上任。

第十一军是 1949 年 3 月 1 日在安徽阜阳召开的改编典礼南征誓师大会上正式宣布成立的。十一军下属机关有: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军直属队有警卫、侦察、通信、工兵、炮兵五个营,以及汽车队、辎重队、随营学校、野战医院等。原三纵所辖第七、八、九旅,分别改番号为第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

作为一名军人,职务的提升,总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

但离开六旅,却有依依惜别之情。我在六旅的三年多是战斗最频繁的一段时间,和指战员一起在疾风暴雨中行军,在枪林弹雨中冲锋,共同承受过失败痛苦,也共同分享过胜利的喜悦。我们在残酷的生存环境中幸存下来,也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

六旅的领导班子很团结,上下级关系也融洽。六旅也有优良的战斗作风,如果要概括一下,可以说有三个特点。第一是“狠”:打起仗来有股狠劲,有敌无我,有我无敌,不消灭敌人,决不罢休,这是一种强大的力量。第二是“硬”:部队能打硬仗、打恶仗,在战斗最激烈、最危急的时刻能挺得住,这种硬劲常常化险为夷。第三是“猛”:部队进攻,猛打猛冲,犹如排山倒海;防御则以一当十,众志成城。六旅是一支能打仗的好部队,在以往战斗中,除了郑庄寨战斗遭到较大损失外,其他都是胜仗。数十年后,我已经到军委工作了,还到西北看望过这支部队。

到第十一军政治部上任后,我立即开始抓政治整训。根据野战军要求和部队思想实际,我们确定以渡江作战的政治动员为核心,组织干部战士学习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决议》等文件,为渡江作战进行政治教育和思想准备。集中营、连干部,分别由军、师政治部负责分批轮训。营以下分队在组织战士学习文件的同时,还根据解放战士多的情况,进行了诉苦教育。运用典型,开诉苦大会;开展挖苦根、算血账、复仇祭灵等活动。全军明确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目标,树立了“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的决心,为进军江南,迎接全国解放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各部队根据江南地形特点进行了河川、稻田、村落战斗的演练。

进逼长江,开辟渡江阵地时,我军奉命担任先遣军。1949年3月6日,部队从阜阳地区出发,按三十二师、军直、三十三师、三十一师的序列,经固始、叶家集,于10日到达六安地区。军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由原纵队政委彭涛传达了党中央城市政策,军长曾绍山作关于渡江作战的战斗动员。

部队情绪很高,尤其是南方战士,家越来越近了,都希望很快过江,解放家乡,实行土改,就能够分到土地。部队沿途受到群众热情欢迎,对部队鼓励很大。有的说:“这次到六安与前年完全不同,真像个欢迎胜利之师的样子!”也有少数人思想沉闷,特别是有些北方战士,觉得越走离家越远,还有的过不惯南方生活。每天行军三四十公里,连日下雨,没有雨具,道路泥泞,有的情绪不高,有的还怕过长江:“六安的河这样宽,不知道长江要比它大多少倍?”有的说:“长江、长江,又长又宽,风浪又大,不好过呀!”

军政治部针对“怕过长江,怕艰苦,怕走路,怕离家远,怕过不惯南方生活”的“五怕”思想,要求各部队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15日,我军开始向桐城地区集结。18日,到达桐城以南地区。22日,军政治部发出《江北作战中的政治工作指示》,强调要不间断地进行政治动员,普遍开展火线立功、火线入党运动;坚决执行筹粮政策和遵守大三纪律八项注意,做好群众工作;建立战时政治工作指挥所,由各级政治部(处)主任负责,组织短小精干的班子,各部队进一步进行战斗动员和行军总结。

我军当面之敌四十六军一个师已撤向黄梅、九江,敌一七四师附七〇七团及皖北突击纵队共万余人则据守在安庆及其周围要点。23日晚,我三十一师经过激烈争夺占领了安庆外围之牛形山、凤凰山、马山和大湖闸至五里庙一线江堤。30

日和31日,又对安庆城守敌发起数次攻击,但均未奏效。鉴于我军是渡江先遣军,不宜在此僵持,兵团首长决定:以第十军二十九师接替我军继续围困安庆,我军从4月1日开始,全力进行渡江准备。

根据总前委指示,渡江地段的选择是:第二野战军在马当至贵池间;第三野战军在贵池至江阴间。我十一军的渡江地段则选择在枞阳镇至前江口之间。如果从空中俯瞰,数百里长江北岸,我军百万雄师压境,场面是极为壮观的。

4月8日,野战军下达了渡江作战基本命令。军领导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研究作战部署,确定:以三十三师依托玉板州登船启渡,向黄土墩至陈家坟间实施主要突击;以三十一师依托鸭儿沟登船启渡,向新河坝至大坝间遂行强渡,并在前江口作佯动;以三十二师为渡江第二梯队。

任务下达后,全军指战员立即投入准备工作,进行战前思想动员,树立渡江作战信心,动员船工和筹集船只,部队还临阵磨枪,进行水上训练,组织实施疏河、挖堤、翻坝引船入江的工程等。各师还分别举行了渡江南征誓师大会,部队士气高昂。

这段时间,国共两党正在进行和平谈判。结果,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谈判宣告破裂。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渡江战役随即发起。

我十一军出发渡江的时间,是21日17时。在渡江出发地还别有一番风景,我们不仅给敌人准备了炮火,也给我们的部队准备了军乐。出发时间到了,我十一军两个出发阵地上,90门火炮一齐猛轰,炮弹铺天盖地,倾泻到敌军阵地。我军军乐队在炮火声中吹奏起雄壮的《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炮声

和军乐声中,三十三师和三十一师突击队迅速登船。

17时30分,突击部队起锚出发,船帆鼓满东北风,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向敌岸。18时18分,突击队全部登陆,除一部巩固滩头阵地外,主力向敌纵深攻击。后续部队随即登船起渡,对敌实施连续突击,扩大登陆场,并向敌纵深发展。当晚,两个师6个团全部渡过长江。

我和三十一师一起过的长江。至22日晚,我军后续第二梯队及十军二十九师(过江后该师归十一军指挥)全部渡过长江天堑。

守敌向南总退却,我军乘胜追击。安庆守敌一七四师于22日晚弃城南逃,企图在皖浙山区顽抗,迟滞我军,掩护其主力在浙赣线上构成新的防线。23日,我十一军奉兵团命令以主力围歼安庆逃敌一七四师。

军长曾绍山和我组成了军前指。敌一七四师猬集在贵池县西南30公里的吴田铺、牌楼街地区,企图向西南逃跑。我三十二师向吴田铺东北、西北方向追击。我带领三十一师迅速进至十字路一线,令二十九师沿吴田铺、八角亭敌之右翼平行追击。24日,敌一七四师被围歼于吴田铺以南白屋、八角亭和吴田铺至鸡公岗、牌楼街一线。共俘敌副师长以下5200余人。其中十军二十九师毙、伤、俘敌2400余人。二十九师师长周发田和政治委员于笑虹指挥的这一仗打得好。

我和曾绍山军长在山头上看各部队运动,曾绍山称赞二十九师追击快,动作猛,歼灭敌人多。这个部队战斗作风好,我也很高兴。

在围歼敌一七四师的同时,我三十三师则经殷家汇、大洪岭向祁门挺进,尾追撤退之敌第九十六军二一二师。26日下午进抵祁门,抓住了敌二一二师主力,但因未及时分遣、先期

断敌退路,结果让敌人跑了,仅歼敌一个营。部队继续向休宁挺进。

5月2日,我军相继进至休宁、屯溪一线。敌沿着淳(安)屯(溪)公路向浙赣线溃退。为了不给敌人喘息之机,切断敌汤恩伯、白崇禧两集团之间的联系,我十一军决定兼程向浙赣线的龙游、汤溪地区出击,协同十二军合击金华。

敌人已处于混乱状态,难以构成新防线,军党委要求部队吸取前阶段追歼逃敌的经验教训,采取“猛打、猛冲、猛追”的战术,大胆插向敌纵深,截敌退路而兜击之;不怕部队疲劳,不为小股掩护之敌所阻,不为成群逃散之敌所迷惑,不为缴获所拖累,不为城镇所扣留,适时分遣,轻装追击;号召全体指战员树立追击战思想,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敢于以少胜多,独立歼敌,迅速、坚决、彻底地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要求每个指战员都明白,敌军已兵败如山倒,必须善于展开政治攻势,瓦解敌军。

左路前梯队三十三师以日行60公里的速度,直出大连岭。5月4日解放遂安。5日进至金华地区,并抢占了金华桥。右路三十二师冒雨追击65公里,越过武夷岭,解放了龙游。我在左路与三十三师和三十一师截击浙赣线逃敌。

我十一军军部和三兵团进驻了金华市,我被任命为金华市军管会主任。

没想到,正在学着做城市工作的时候,我接到了新的调令:去第二野战军军事政治大学(简称二野军大)工作。

坦率讲,过去我曾长期在高层机关工作,这时很想继续在野战部队干。来十一军后,虽然任职时间不长,但曾绍山军长、鲍先志政委等军领导对我印象很好,尤其是做渡江作战的一套政治工作很满意,不希望我走。机关和部队同志对我反

映也不错。我向三兵团领导提出希望留下来。陈锡联司令员也不想让我走,便和兵团政治部主任阎红彦商量后,分别给野战军参谋长李达打电话,要求把我留下。李达不同意。

我只好服从组织决定,走马上任。

第八章 走进军校

“招兵买马”

1949年5月下旬,我赶到南京,见到了刘伯承司令员和李达参谋长。他们宣布了我的新岗位:二野军大校党委书记兼政治部副主任。

当时,新解放了大片地区,解放军本身也扩大了很多,建军和建政都需要大量干部。解放全国的战争任务还没全部完成,中央军委已经把解放、开辟和建设大西南的任务交给了我们二野。所以,解决干部问题成了二野当前最迫切的任务。云、贵、川、藏地盘很大,需要的干部自然少不了,二野正在组建和扩大军政大学机构,准备在南京地区招收大量知识青年,将他们培养训练成优秀干部。

刘伯承司令员对我讲了这一工作的重要性,最后说:“总之,要你去招兵买马,扩大队伍,越多越好。”

李达参谋长说:“现在,二野军大的学生陆续报到了,人很多,可是没房住,没饭吃,缺教员,少干部。你去,先抓好住房、

吃饭问题,把教育训练工作准备好。”

我立即意识到了这项工作的重要和艰巨性,没敢耽误,很快就到二野军大报到了。

二野军大的前身是中原军区军事政治大学。渡江战役后,于1949年5月4日由许昌迁到南京,扩充编制,改称第二野战军军事政治大学。校址就设在南京孝陵卫原国民党中央训练团旧址。刘伯承司令员兼任校长和政委,徐立行同志为教育长,我为校党委书记兼政治部副主任。由我和徐立行主持学校日常工作。

为加强学校各大部的领导,我们选调了一批能力较强、有办学校经验的干部。校领导班子很团结,工作很协调。

二野军大校部设有教育训练部、政治部、校务部、供给部、卫生部等部门。政治部又下设组织部、宣传部、保卫部。有四个学员总队、22个大队,其中,女生大队和文艺新闻大队为直属大队。总队领导按师级干部配备,大队领导为团级。各级班子中,除留有原中原军大的全部人员外,又从华北补训兵团抽调了三个旅建制部队的干部,并从二野各兵团、各军及二野直属单位抽调了大批干部,加强和充实了学校的各级领导与教学力量。班子和组织机构健全了,学校各项工作很快开展起来。

建校初期,困难很多,招生、住房、伙食、教材、教具等大量具体问题千头万绪。为了让学校尽快走上正轨,我和徐立行、宣传部长张衍、校务部长武承先、供给部长张友亮、卫生部长江光权等同志分工负责,各司其职。既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又注意协同配合,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

学校具备了接受学员的基本条件后,立即开始“招兵买马”。5月13日,学校在《新华日报》上刊登了招生简章,预定

招收 3000 人。没有想到,报名的头四天就来了 4000 多人,且日趋踊跃。报名工作从 5 月 18 日开始延续到 6 月 18 日结束,累计报名人数达 21237 人。经考试,录取了 11867 人,加上部队选送的,实招收 13000 多人,远远超过了中原军大前两期的总和。

这些学员大部分是宁、沪、杭一带的城市知识青年,80% 为高、初中的学生,10% 以上为大学和专科学校的学生,文化基础较高,政治上也比较敏感。他们有的冲破家庭的重重阻拦,有的抛弃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有的甚至是告别爱侣来参军的。他们痛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追求真理,渴望为建立新中国奉献青春。总之,这是一批热血青年,像我们校歌中所唱的“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我们也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这些学员在国民党统治区成长,接受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思想文化教育,绝大多数出身于有产者家庭,思想观念基本还是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他们对新旧社会缺乏本质认识,对我党我军的性质、宗旨、任务不太了解,对革命的长期性、艰巨性缺乏思想准备,不少人崇拜西方文化,有亲美、恐美思想,对美帝国主义抱有幻想。他们长期生活在城市,轻视体力劳动,脱离实际,感情脆弱,思想方法偏激,政治上摇摆不定。南京又曾是国民党经营多年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刚刚解放,社会形势一时难以稳定下来。残余的国民党军、警、宪、特也在进行破坏捣乱,国民党经常派飞机飞临南京、上海进行扰乱,美帝国主义也扬言要出兵干涉。这种复杂的社会背景,对学员的思想也带来不小影响。

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对二野军大十分重视,都曾亲自来军大讲课作报告。刘伯承不仅是中外著名的军事家,

也是军事教育家,有着丰富的军事教育思想。在兼任中原军大校长和政委时,他的许多教育思想就给人留下过深刻印象,如:“治军先治校”,“学校是军队的缩影”,“军校应该成为军队的模范,因此治校必严”等等。对于学员,他强调自觉的意识:“来者欢迎,去者欢送”。所有这些,对我们具体抓军校工作的同志来说,是一套完整的办学指导思想。

1949年6月23日,二野军大正式开学。开学前的16日下午,刘伯承司令员来军大作过一次精彩的报告。会场设在军大操场,集合了全校22个大队的全体学员。刘司令员的讲话极有鼓动性,走上讲台,他大声说出的第一句话是:

“我以千百倍的热情欢迎大家来到军大!”

操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刘司令员首先阐明了人民军队的本质,然后说:“按照一般的理解,有军队和无军队,军队多和军队少,武器好和武器坏,在一起打仗,一定是前者胜,后者败;然而,我军这22年的战斗中违反了常理,后者却打败了前者。这是什么道理?这不是一个谜!很清楚,因为前者仅代表少数的剥削者的利益,而后者则代表90%以上的人民大众的利益”。“在中国这样半封建、半殖民地、军阀统治的国家,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地位”。

刘司令员接着谈了军大的性质、任务和学习方法。最后,他特别强调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和必须在实际中锻炼的问题,号召同学们自己动手,改变学校条件,准备克服困难,甚至准备牺牲。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刘司令员讲过的两句话: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要流血牺牲的,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啊!大家来到军大,也就是来参加革命的,大家怕不怕?”

学员们的回答很响亮：“不怕！”

但操场上接着出现了交头接耳。刘司令员心里有数，紧接着重申了他一贯主张的原则，对学员说：“我们是来者欢迎，去者欢送。如果你走了又想回来，我们还欢迎。”

多年后一起回忆，一些当年的学员对这两句话也记忆犹新。两句话，一句是单刀直入，触及到生死观，坦率告诉大家，革命就要艰苦奋斗、准备流血牺牲。另一句话，则表现了刘司令员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和坦荡胸怀。话不多，分量极重。

后来的办学过程中，我们也正是从解决革命生死观这一根本问题入手，使学员们在理想的追求上产生了新的飞跃，激发出了无私无畏的革命斗志。

二野军大坚持把刘校长的讲话贯穿始终，成为各项工作的基本依据和推动力，使教学工作起点高、要求严、效果好。校党委认真总结和借鉴了中原军大办学经验，经研究讨论，决定将教育目标确定为：“培养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工作干部”，“使他们为人民服务，与工农结合，能够从事各种艰巨的建设工作”。

我们制定了分步骤、分阶段实施的教育计划。确定以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和人民解放军军史为主要课程，辅以基础军事训练的教学内容。整个教育工作，紧密围绕一个中心，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改造旧思想，树立革命世界观，把青年知识分子培养成为德才兼备的合格军人，自觉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为了保证教育方针的真正落实，我们校党委注重抓了几个环节：

一是以“两史”教育为中心，抓世界观的转变。

我们着重抓好社会发展史和中国近代革命史的“两史”教育。通过学习社会发展史,使学员初步懂得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认清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以及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光明前景。通过学习革命史,了解中国近代和现代革命运动的进程及基本经验教训,认清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武装斗争才能夺取政权,坚定革命意志,跟共产党走,革命到底。

通过学习“两史”,学员们收获很大,说:“‘两史’定乾坤,改造世界观。”有些学员主动要求改写入学登记表中的家庭出身和本人成份,有的主动交代自己参加过反动党团组织的经历,个别出身于国民党军、警、宪的学员还主动交出了私自隐藏的枪支,还有个别潜伏的特务也主动坦白了身份。广大学员积极靠拢组织,表现出思想上的飞跃和进步。

二是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及时解决学生的现实思想问题,端正学习目的,提高学习热情。

我们首先拿出两周时间进行形势教育,进行校史、校风、教育方针、军史教育和思想整顿,稳定学员的情绪,端正学习动机,建立良好的学习秩序。号召学员虚心学习,热爱劳动,热爱集体,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建立俱乐部,教唱校歌,组织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活动。

刘司令员的那次报告,极大地鼓舞和振奋了学员的学习热情,但也有相反的情形。刘司令员报告中讲过一句“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有的学员似乎被这句话给吓坏了,当夜就跑了一些人。结合这种现象,校党委在全体学员中围绕学习立场、动机和现实表现的问题,开展“三查三评”活动,进行思想整顿。让大家懂得,我们既然选择了为人类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而奋斗的崇高事业,就应该具有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直至

献出生命的革命精神。在中国,革命是必胜的,但是反动势力还很强大,还要进行英勇的斗争,而要斗争,就要有同敌人拼刺刀搏斗的革命精神,就要有流血牺牲的思想准备。

我们在全校开展了建团活动,20天时间里,全校第一批就发展了1556名团员,还吸收了部分优秀学员入党。我们还在干部和学员中广泛进行创模竞赛活动。学员与学员之间、班与班之间、队与队之间互相挑战、应战,掀起争当模范的热潮。

三是改革教育,实行教学民主,提高教育质量。

二野军大的专职教员很少,而学员文化素质又较高,思想很活跃。根据这一实际情况,我们实行了民主教学。基本教育形式确定为上课、自学、讨论相结合。要求各级任课干部和教员端正对学员的态度,特别注意纠正了一些工农出身的干部轻视知识分子的倾向,要求他们放下架子,与学员平等相处,互相学习。课堂上允许学员发表自己见解;课下讨论提倡畅所欲言,不泼冷水,不揪辫子,创造生动活泼的教学气氛。学员们辩论了一系列重大政治理论问题,如:“是劳动创造了世界,还是英雄创造了世界?”“人类最高理想是什么?”“是三民主义好,还是社会主义好?”等等。

四是从严治校,全面提高学员军政素质。

从严治校是刘伯承司令员的一贯主张。我们从始至终坚持严格管理,严格要求,严格训练,努力培养学员自觉树立组织纪律观念,成长为合格军人。

学校实行了严格的军事化管理,一日生活制度化。在作风纪律方面,严格贯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倾向性的问题,采取集合时不指名的批评教育。对违纪者严格执行纪律,绝不允许视而不见、见而不管的现象存在。

我们狠抓了各级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要求他们要有崇高的革命理想、坚定的革命信念、高尚的道德情操、积极热情的工作态度、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要言行一致,平等待人,遵守纪律,大公无私,用良好的形象为学员作榜样。不少学员反映:“我们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身上看到了党的形象,看到了人民军队的形象,看到了党和军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这段时间邓小平在上海主持华东局工作,一直没在军大露面。军大正式开学三个月后,他来了,在9月12日作了一次重要报告。我起草了一份校党委关于前阶段教学情况及学员思想动态的报告。邓小平在讲话之前仔细看了这份报告,又认真听我介绍学员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最后确定了讲话的重点内容。

会上,邓小平政委开宗明义:“我今天给大家讲一个问题,题目叫‘过关’。”

邓小平政委讲,古代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今天的革命青年要过的“关”无数,但大关只有三个:一是帝国主义的“关”,二是封建主义的“关”,三是社会主义的“关”。这三个大关,每个参加到革命营垒的人必须要过,问题是有的过得去,有的过不去。邓政委深入浅出,讲了如何过好这三关,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革命者。

他最后讲:“过关过得好不好,在于立场问题。立场站稳了,就过得去;立场没有站稳,关就不好过。如果是脚踏实地,站得稳稳的,就可以克服一切难关。要站在牺牲自己一切,为人民谋解放,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立场上,这就叫做无产阶级立场,也就是革命者的品质。为人民服务,自己就要抛弃一切个人利益、名誉地位,这才符合人民大众的利益。”

邓小平政委的报告从下午5时开始,一直讲到晚上10时多。刘、邓首长战功赫赫,已经是带传奇色彩的人物,虽然讲话时间不短,但大家听得非常认真、兴奋。天黑了,操场挂满电灯,一万多干部和学员洗耳恭听,紧张地记笔记,会场不时爆发出热烈掌声。那种特殊的气氛令人难忘。

邓政委讲话后,二野军大接到了向西南进军的命令。此前,刘、邓首长于8月19日就下达了《川黔作战基本命令》。

9月27日,第二野战军副政委张际春来到孝陵卫总校大操场,作了《关于进军西南的动员报告》。他说:“我们进军西南,一是为了完成解放全中国的历史使命,二是把蒋管区受苦受难的同胞解放出来,使他们得到彻底翻身。”他还强调说:“消灭那里的国民党残余匪帮是我们的军事任务,解放那里的老百姓是我们的政治任务。”他说,10月间第一批进军西南的同学,基本上是做地方工作,首先要把城市、乡村很快接管过来,其中就有武装斗争和政治、思想、组织工作,然后开展城乡建设。他说:“开发西南,前途无量。”

10月份,学员即将结束学业。校政治部向全体学员发出公开信,号召大家服从分配,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学员们纷纷写了申请书、决心书,有的还写了血书,表示要以“过关精神”和“做一个好的革命者”的标准要求自己,“准备克服困难,甚至准备牺牲”。学员们争先恐后要求参加首批进军。

10月10日,学校隆重举行了贺模暨毕业典礼。我在大会上作了贺模学习竞赛运动的总结,表彰了2360名学习和工作模范、101个班、11个中队,号召全体学员,“继续努力进步,争取新的胜利和新的成功”。

在学校即将迁往四川的转折关口,校党委决定召开党代表会议。

11月21日,在党委扩大会议上,我代表校党委向党代表会议提出了党委工作报告草稿。报告讲了三个问题:对上期教学工作的回顾总结;对执行知识分子政策情况的检查;今后的努力方向。

11月22日,党委扩大会议对报告展开讨论。发言者一致认为:学校在严重缺乏干部、经验不足、条件很差的困难条件下,大量招收学员,开展教学,胜利地完成了预科阶段军政训练的艰巨任务;目前又一面开展专业培训,一面组织向西南进军,一切工作都在按总前委的指示紧张而有秩序地进行,充分说明校党委执行上级指示是坚决的,对方针、政策的掌握是正确的,工作成绩是巨大的,是谁都能看到的事实。但也认为,“对成绩不能估计过高,不能产生自满情绪,不能忽视对经验、教训的研究”。

会议从一般地揭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逐步集中到对学校执行知识分子政策是否存在左右摇摆问题的讨论上来。分析了基层干部由于对知识分子政策缺乏正确认识,工作中时面对学员迁就、时面又对学员简单粗暴的现象,并且从基层干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追溯到党委领导思想上存在的问题,还研究了应该从中吸取的经验教训。我作了小结发言,肯定了与会同志的正确批评意见,对有争论的问题明确了是与非。

党代表会议于11月25日开幕,到会224名党员代表,分为26个小组,对党委工作报告展开了讨论。

11月28日,我作了大会总结,着重检查、分析了官僚主义作风的表现和根源,对狭隘的经验主义也进行了分析批判,提出了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加强干部工作的措施,并对进军西南、接受新任务进行了原则安排。我对这次会议评价说,这次党代表会议开得很好,充分发扬了民主,表现

在政治思想和政策上都团结一致,把各级干部的思想统一到党的方针、政策上,明确了努力方向,因而代表们普遍感到心情舒畅,情绪高涨,为迎接新任务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最后我要求总队、大队党委作出贯彻党代表会议精神的决议案,要求代表们回去广泛宣传党代表会议的成果,保证会议精神在实际工作中得到贯彻落实。

为了顺利完成向西南行进的任务,校党委组织了以徐立行为首的行军指挥班子,制订了周密的行军计划。人员分成三个梯队,沿不同路线,分期分批开往各自目的地。一梯队由一、二、三总队和四总队十六大队学员组成,共5000余人,分别编为四个团,直属野战军司令部指挥,于10月中旬就出发了,紧跟作战部队,开往西南四省,接管地方政权。二梯队由一、二、三总队的工作人员组成,12月初出发,开往四川省,收编国民党起义、投诚部队。三梯队由四总队的特科支队、电讯支队、十三大队和校直属机关组成,1950年1月出发,开往四川省重庆市。

进军西南是教育的实践和继续,也是对在校学习教育成果的一次检验。当时,新中国已经建立,人民群众刚刚过上和平的新生活,学员们大多自幼生活在鱼米之乡,还没有经受过艰难困苦的磨练,现在却要告别家乡,到尚未解放的边远偏僻的艰苦环境中去战斗,无疑是一种考验。但学员们意气风发地踏上了征程。

“走!向着大西南走!西南同胞不能再等待,他们处在水火中,他们现在是渴望着解放,好像大旱望甘露。打到西南去,解放全中国!”激昂的歌声中,学员们分批离开南京。

进军大西南,从南京起步,走过云、贵、川、藏,全程三四千公里,要历经江苏、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广西等省,斜穿半

个中国,恰如一次“小长征”。沿途气候恶劣,道路崎岖,还有反动武装和国民党军残部的袭扰,有个学员作了一首打油诗:“风雨川湘路,冰雪白马山,两头摸黑走,一路摔跟斗。”这是对当时行军生活的真实写照。

学员们一路行军,一路高歌。漫漫征途上,学员们锻炼了意志,磨练了作风,学到了我军的优良传统,巩固和提高了在校学习的成果。正像有的学员所说:“这回才像一个革命军人了”,“开始工农化、无产阶级化了”。

1949年底到1950年初,各梯队的学员全部按指定地域到达,很快被分配到各地,投入到接管政权、剿匪征粮和实行土地改革等各项工作中去了。这些学员绝大多数同志到了基层,他们发扬艰苦奋斗、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在艰苦的工作环境中建功立业,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工作分配时,他们不挑拣地点、部门,不计较个人生活待遇,绝对服从组织安排。有的是一两个人在区、乡独立开展工作,担子很重,也能出色地完成任务。特别是在1949年底至1950年这段时间,西南不少地区发生大规模的土匪暴乱,有些边远山区县城一度被土匪攻占。在同土匪的生死搏斗中,二野军大学员英勇地投入战斗,不怕流血牺牲,不少学员献出了生命。如独山县上司区兴方乡副乡长荣先治同学,在土匪攻打乡政府时,孤身与敌人奋战三天三夜,不幸落人敌手,受尽了火烧、刀刺等各种酷刑,最后被土匪用铁丝戳穿锁骨,反吊在树上,但他至死也没屈服。宜宾县喜捷征粮剿匪工作队队长扬飞同学,在天星乡与100余名匪徒英勇搏斗,被砍十余刀,光荣就义。高县玉皇乡征粮剿匪中,雍永怀同学英勇负伤,子弹打完后,视死如归地站在敌人的枪口下高呼:“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当地人民为

纪念他和其他三位烈士,将玉皇乡命名为“四烈乡”。

二野军大本部和各分校(属各兵团领导)的学员,总共有两万多人留在了大西南。在以后的长期工作中,二野军大的学员扎根边疆,扎根基层,扎根于群众之中,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为党的事业奋斗,不少同志在基层一干就是几十年,有的同志至今职务很低。但他们不计较个人得失,以党和人民事业为第一生命,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出不平凡的事迹。

“当年满怀凌云志,今天无人不白头。”一晃就过去了50多年,二野军大的教育效果,经受住了长期革命斗争和建设的考验。可以说,二野军大办学时间不长,但她培养青年知识分子的成功实践,在我军的军校史上,在我国的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改造旧军官

1950年3月初,二野军大从南京迁抵重庆。

4月,二野军大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军事政治大学,简称“西南军大”。随第二野战军第三、四、五兵团抵达四川、贵州、云南的二野军大三个分校和各军随营学校、军政干校,也改名为西南军大川东、川南、川西、川北、云南、贵州、西康分校和第八分校。

学校的任务是参加教育、改造90万国民党起义、投诚、被俘部队中的各级军官。总校主要负责教育和改造起义军官;其次是投诚、被俘军官。在总校学习改造的国民党军官中,校级以上军官占绝大多数,也有一些中、下级军官。我们还派干部到川东、川南、川西,参加了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一个兵团又一个军的工作。又招收了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学员,进行短

期军政训练,输送到急需干部的工作岗位上去。

学校校长和政治委员仍由刘伯承司令员兼任;教育长为徐立行;我仍担任校党委书记兼政治部副主任。

其他人员构成作了一些调整,根据教学对象的变化,也重新明确了教学分工。

政治部主管教育和改造原国民党军官的任务,将原来的宣教部分为教育与宣传两个部。以教于大队、干训大队为基础,成立了西南军区高级研究班,负责教育改造起义和投诚的高级军官。以四总队的干部为基础,成立两个团,负责教育改造起义、投诚的中校以下军官。原西南军区直属军官教导总队拨归军政大学领导,负责接收、改造被俘的国民党军官。高级研究班和教导总队各设一个妇女大队,集中管理教育国民党军官家属。一总队派往川西,执行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十五兵团的任务;二总队派往川东,执行改造起义的国民党十八兵团一个军和 2400 名起义、投诚和被俘军官的任务;三总队派往川南,执行改造两万名起义、投诚和被俘国民党军官的任务。

西北野战军军政大学 400 多名干部,与西南军大合并,加强了学校机构和团、队的领导力量。

在西南地区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军官既不同于纯洁的青年知识分子,也与解放战争初中期起义、投诚的国民党部队的军官不同。他们基本上都是在解放大陆的最后战斗中起义、投诚的,尽管他们中间也有左、中、右的区别,但总的看,反动立场和观点根深蒂固,态度比较顽固。要使他们的思想真正得到改造,教育工作必须深入他们的思想实际,引发他们内心的思想斗争,才能帮助他们抛弃错误反动的思想,心悦诚服地放弃旧的一套,达到“脱胎换骨”的改造,否则,教育工作会流

于形式。

我们贯彻了民主教学原则,提倡“自由思想”,组织他们自由地研讨问题,欢迎讲心里话,暴露真实思想;也允许他们对教员和领导讲的话提出不同的看法,甚至反驳。学习过程中,我们还注意发现进步较快的人,展开对立意见的争论,引导他们自我教育和互相教育,这比我们正面灌输更有效果。我们坚信真理在握,只要采取耐心的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在真理面前,任何错误的看法都是可以驳倒的,旧军官中的多数人是能够改变看法、转变态度的。

我们确定了对不同来源的国民党军官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

起义军官,从宣布起义之日起,就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入学后均有军政大学的学籍。在教学中,他们享有充分的教学民主,强调自我教育,自觉改造。学习主要采取自由研讨、辅导报告和讨论总结的方式。在军纪、校规的范围内,与我军官兵一样,行动自由,周末一样可以与家人团聚。上校以上军官吃中灶伙食。

被俘军官,在学习结业之前没有军政大学学籍,也没有人民解放军的军籍。对他们的教育改造带有一定强制性,但在教学过程中,仍采取民主方式,提倡“自由思想”,强调自觉解决思想问题,自觉转变立场。行动有一定的范围,离开营区必须请假,会客必须得到允许。

明确了大政方针,我们起草了《改造国民党军官的教育计划》、《改造国民党军官的政治工作大纲》和《改造国民党军官的行政工作纲要》。

在《改造国民党军官的教育计划》中,我们提出:对国民党军官的政策是争取、团结、教育、改造,然后量材录用,分别处

理。政治教育与劳动教育并重,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批判他们的反动思想,使之初步分清大是大非,认识过去犯下的罪过和明确今后人生的方向。全部教育时间为6个月(26周)。教育内容以历史唯物主义为重点,主要课程是《中国近代革命史》和《社会发展史》,辅以形势、政策教育。周末为劳动日。

教育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预备教育,传达教育计划,宣讲党的政策,制订个人初步学习计划,研究学习方法,并介绍军政大学历史和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达到消除顾虑、安定情绪的目的。第二阶段以学习《中国近代革命史》为主,辅以政治形势教育,目的在于正确了解中国近百年来、尤其是近30年来中国历史真相,揭露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给中国造成的灾难,让学员了解中国人民为什么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性质,清除历史成见和糊涂观念,检查、批判旧思想,提高觉悟。第三阶段以学习《社会发展史》为主,辅以土地政策学习,目的是较系统地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教育,帮助学员认识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从思想上同蒋介石反革命集团划清界限,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第四阶段是全期教育的总结阶段,通过反省、鉴定,量材录用,分别处理。

《改造国民党军官的政治工作大纲》中,要求全校政治工作必须围绕改造学员思想的总任务,组织群众性学习,开展思想互助;要求各级政治机关和所有政治工作干部,认真贯彻党对旧军官的政策;要求各级干部和全校工作人员,保持、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学员;要求共产党员一言一行都要体现党的优良作风。

《改造国民党军官的行政工作纲要》则从行政管理、供给、

卫生等方面,提出了保证教育计划顺利实施的具体任务和要求。主要针对国民党军官缺乏革命性、民主性、自觉性的弱点和某些恶习,建立了作息、请假、会客制度和正规的学习生活秩序。要求发动群众进行民主管理,实行经济民主,开展劳动锻炼,厉行节约,保证物资供应,建立卫生防病制度,加强安全警卫,严防意外事故等等。

总校接收的国民党各级军官有 7000 多名,其中上校至中将级的军官 1500 多名。高级研究班 4 月 29 日开学,学员是 1000 多名上校以上国民党军官。头天下午,西南军区副司令员李达亲临学校,给高级研究班学员讲话。

李达专门讲了学习问题。

一是为什么要学?他说:“现在的情况不同于过去任何时代,我们把过去几千年旧社会全部推翻,一切都要来新的一套”,“不管什么人,必须重新学习,才能适应新的情况,不然就要在工作中碰钉子”,“为了减少工作中的麻烦,建立新观点,必须学习”。二是学什么?“基本上是一本书,就是《社会发展史》。大家把《社会发展史》学好了,再参考一些其他必要的书,就可以基本解决问题。希望大家端正学习态度,不要好高骛远。”他强调学习中要着重解决思想认识问题,遇到问题,必须联系思想实际。三是怎么学?“主要是依靠自己,以自己研究为主,提出问题,进行漫谈讨论。领导干部只负责一般的指导。”四是学了以后怎么办?“只要大家好好学习,思想搞通了,前途是无限光明的。”他说,我们共产党是负责争取、改造一切人的,并且负责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建设中国,需要人才。凡有一技之长的人,都要争取到人民这方面来。我们的方针是治病救人,与人为善。”

当晚,高级研究班学员分组讨论了李达的讲话。

4月29日,在高级研究班的开学典礼上,我向学员们讲了教学方针、教学计划、教学方法和对教学的要求;徐立行教育长作了《为谁学习》的报告;教导总队领导致词;学员代表致答词。

教导总队的学员开学时间,有的比高级研究班早,有的晚一点。

经过预备教育,学员的认识有不同程度提高,对共产党的怀疑、抵触态度有所转变。我们也注意到,真心实意地改造自己、安心学习的是少数;多数人学习缺乏自觉性和主动性;还有少数人基本立场态度没变,学习完全是被迫的。

接着我们进行了《中国近代革命史》和《社会发展史》教育。对国民党军官学员来说,《中国近代革命史》是一门触及灵魂的课程。我们向学员摆出中国近百年来、特别是近30年来中国革命的历史真相,系统地揭露他们崇拜的曾国藩、蒋介石等卖国、残民、镇压革命、背叛民族利益的真面目,打破反动的“正统”观念,引发学员展开激烈的思想斗争。

如何认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抗日战争时期谁破坏抗战,危害国家?蒋介石集团为什么会失败?等等重要问题,在高级研究班学员中展开了千人大讨论。

持不同意见的两种认识展开激烈的辩论。经过摆事实讲道理,真理越辩越明,糊涂认识逐步得到澄清。这种真正的民主讨论、自由争辩的气氛,学员不但感觉不到压抑,而且原来怀有的某些顾虑也消失了。认识大体趋于一致时,政治部教育部副部长张文峰做了大讨论总结报告,进一步明确是非,指出错误认识的要害,使正确认识更加条理和深刻。

在此基础上,开展了群众性的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祸国殃民罪行的运动。一是控诉国民党反动派对内压迫剥削劳苦大

众、对外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罪行；二是控诉国民党军队残害人民的罪行和打骂士兵、虐待俘虏、克扣军饷、派系倾轧等行为。我们采取典型引路的办法，从小组控诉，到中会、大会控诉，一步步把控诉推向高潮。

控诉中，有的学员悲愤交加，泣不成声；有的交出在国民党机关和间谍组织任职的证件；有的交出私藏的武器和收发报机；有的交出了不义之财。

这次群众性的控诉，产生了巨大的自我教育、互相教育的效果，不仅使学员加深了对蒋介石反动集团本质的认识，而且从感情上开始同蒋介石反动集团拉开距离。高级研究班70%以上的学员，申请同国民党反动派脱离一切关系。

7月17日，西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子意到校给高级研究班学员作报告。他针对控诉运动中揭露出来的大量事实，帮助学员把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他的报告既是对控诉运动的总结，也是《中国近代革命史》学习的总结。

7月31日，高级研究班进入学习《社会发展史》阶段。基本学习方法是理论联系实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射自己旧思想观点之的，打通思想，改造世界观。高级研究班学员绝大多数出身地主阶级，封建剥削思想根深蒂固。学习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时，他们联系实际，要过好“封建关”，一是讲清自己的阶级成份、家庭经济成份和经济状况；二是揭露、清算自己头脑中有哪些封建剥削思想；三是清理自己与封建党派、封建会道门的关系。在普遍进行反省的基础上，选出典型，让学员做反省报告，以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讲述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压榨和农民在剥削压迫下的悲惨生活，从而揭露和批判头脑里的封建思想，斩断与地主阶级在思想感情上的联系，用所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武器，对自己的历史与政治面目进

行全面的反省和检查。

学习进入到最后总结阶段。9月28日下午,军区副司令员李达再次给高级研究班学员作动员报告。他要求学员,“把过去各阶段所学的内容好好回忆一下,来一个总反省”。“最重要的是站到人民立场上来,抱着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实事求是地检查思想,把不适合为人民服务的东西都讲出来,加以分析认识,进一步提高觉悟。希望同志们为了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前进,为了个人前途,作好反省。人人的前途都是光明的。”

总反省采用示范报告的办法,掀起了彻底反省的高潮。学员王克俊上台作了示范报告。他是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军长,1930年当团长时,一次屠杀共产党员和赤卫队员38人;1949年当军长时,在上海作战“有功”,受到蒋介石和汤恩伯的嘉奖;后来率部转战到四川,企图作最后顽抗。蒋介石逃离大陆后,他眼看大势已去,才被迫起义。这段历史,他在以往多次反省中都没交代,这次经过激烈思想斗争,才讲出来。

对于所有彻底交代了问题的学员,领导和群众都报以热烈掌声和由衷欢迎。在这种热烈、感人的气氛中,不少态度顽固的人也起了变化,出现了放下包袱、告别旧我、靠拢组织、轻装前进的局面。

经过六周的总反省,11月20日,高级研究班学员开始做结业鉴定;12月10日举行毕业典礼。教导总队和四总队学员也先后进行了结业鉴定和分配工作。

对国民党军官学员政治历史的审查,是与教育工作同步进行的。

学校党委根据学员表现、专长和健康状况,量材录用,分别处理。留用分配工作的有1507名,其中一部分在9月间提

前结业,由中央军委各总部选调到北京工作;刘伯承司令员挑选了近200名学员到南京军事学院从事军事教育;西南军区也选调了一批学员。其余大都留校工作,专门成立了教员队,为下一步创办正规军校准备师资力量。资遣回原籍参加建设的约4400名,他们基本上都是教导总队的学员。许多学员回到家乡,立即给学校写信,感谢护送干部沿途对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汇报家乡人民政府对他们们的热情欢迎和重视。留校继续学习的学员约1000名,其中一部分是后期来校,还没完成学业任务;少数是没有改造好的;还有极少数人,经过审查,是混入学员中的匪首、恶霸、现行反革命分子,学校将他们移交到了政法部门,进一步审查处理。

和二野军大一样,西南军大同样是一座革命大熔炉。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学校广大干部、教员团结奋斗,克服一切困难,教育改造了一批国民党军官,使他们“脱胎换骨”成为新人,努力完成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所赋予的历史使命。

创办正规军校

1951年1月,西南军政大学改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高级步兵学校。

头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了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帝国主义侵略。11月5日,中央军委鉴于形势发展需要,召开了军事学校及部队训练会议,决定创办正规军事学校。成立了军事学院和总高级步兵学校;各大军区办的军政大学及其分校,分别改建为高级步兵学校和步兵学校。第二高级步兵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培养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初、中级军事指挥员和政工干部。

学校由李达任校长兼政委,余秋里任副政委,徐立行任副校长;我任政治部主任,张衍任副主任;训练部部长由徐立行兼任,尚思光、张文峰任副部长;校务部部长初为解长林,后为袁血卒,武承先任副部长;干部管理处处长由余秋里兼任,曾焜任副处长。校党委由余秋里、曾焜、尚思光、解长林和我组成,余秋里担任党委书记。

学校设五个正规大队和一个训练团,附设有参训、俄文、干部轮训、妇女四个大队和一个继续改造教育国民党起义、投诚和被俘军官的高级研究班。

1951年1月,正规大队的学员开始入学,总数2000余名。这批学员多数是从部队抽调的优秀团、营、连指挥员和师、团单位的股长、科长、参谋、干事等军政干部,其中团、营干部占47%,抗日战争时期入伍的占71%,功臣、模范占51%。他们都经过多年革命战争的锻炼,有较高政治素质和军事经验。但这批学员由于大都是贫苦农民出身和长期处于战争环境,没有机会系统学习军事、政治理论,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多数在初小以下,更缺乏自然科学知识。由于革命战争胜利,学员中一些人也滋长了居功骄傲、和平享乐的思想。在长期分散作战的环境中,有较多游击习气。多数学员在解放西南后,接着又进行了将近一年的剿匪斗争,没有休整,就调来学习,思想准备不足,有的还有抵触情绪。特别是部队来的指挥员,在本单位有警卫员、通信员照顾生活,现在要过正规的紧张的连队学员生活,一时不能适应,有的还放不下架子。

我们制定了分阶段实施的教育计划。确定学制为一年半,半年进行预科教育,一年进行本科教育。预科教育主要端正学习态度和突击补习文化,严格进行制式教练和正规军事生活的养成教育,克服游击习气,抓好校风建设;本科教育实

施计划,是依据军委“要求在现有基础上,掌握技术,学会联合兵种作战,使其在对帝国主义的作战中,有组织与指挥近代作战能力”的方针,和“必须以战术教育为中心”的指导原则而制定的。军事大队,以排、连、营、团战术为主要课目,政治大队以系统的政治理论教育和苏联军队及志愿军的政治工作经验为主,穿插进行形势教育和政策教育。

1951年1月初,召开了校党委扩大会议。会议深入讨论了军委的教育计划和指示,研究了学校执行新任务的情况,通过了《关于执行军委教育计划和军区指示几个主要问题的决议》。

《决议》分析了创办正规化军校的有利因素和存在的困难,着重指出:必须坚决执行军委明确规定的教育方针和教育计划,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和苏联的军事科学为学习目标,认真总结我军成功的作战经验;教学指导上,必须掌握少而精的原则;提倡群众路线的民主教学方法,开展互教、互学、互助;要加强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加强组织性、纪律性教育;要树立党的领导观念,健全党委制等,要求学校一切工作必须围绕教育计划进行。

2月,为传达军区组织工作会议精神 and 贯彻校党委扩大会议决议,校政治部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会上,我针对当时干部中存在的有碍新任务和教育计划执行的各种思想倾向,如对学校工作的临时观点,不愿深入钻研业务、工作疲沓、害怕正规军事训练等不正确思想,进行了分析批判,强调必须以原则性去对待个人主义,指出,没有原则性就分辨不清是非,就不能克服个人主义,就不会有坚强的领导工作。

这两次会议,使各级领导提高了对办正规军校战略意义的认识,统一了思想,为办好正规军事学校做了极重要的思想

准备。会后,出现了全校人员上下一致,为迎接新的繁重教学任务而紧张工作的可喜局面。

1月30日,学校开始了预科教育。

首先进行了抗美援朝形势教育,使学员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和两大阵营斗争形势有所了解。请来了“中美合作所”大屠杀中幸存的地下党员,作“烈火中永生”的报告;组织学员参观反面典型刘介梅翻身忘本、丧失革命意志的展览等,增强学员的战争观念,树立永远是战斗队的思想。

学员们联系实际进行了讨论,检查了居功骄傲、和平麻痹思想,不少学员惭愧得掉泪。经过这段学习,学员认清了形势,提高了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必要性的认识,增强了学习信心和克服困难的决心,为下一步文化学习和军政学习打下了较好的思想基础。

根据刘伯承司令员一贯倡导的“治军先治校,治校必严”的思想,我们“严”字当头,狠抓了校风建设。对全体人员特别是团以上领导干部和学员提出了严格要求,树立正气,狠批错误思想。校党委一班人,坚持原则,刚正不阿,雷厉风行,以身作则,为全校同志作出表率。校领导对各种违背原则的言行和不良思想倾向严肃进行批评教育,对几件典型的错误事件果断处理。这些做法,使学校的歪风邪气很快被刹住,大大提高了整个学校的原则空气,保证了教学计划的顺利实施。

文化教育是从2月中旬开始的。学员按文化程度不同,划分了初中、高小、初小甲、初小乙四个年级,主要学习语文、数学、化学、自然常识四门课程,由训练部文教系组织实施。学员的学习积极性非常高。但是,毕竟文化底子薄,年龄相对偏大,没有按部就班学习习惯,加上教学计划安排较紧,学员们尽管废寝忘食地学习,还是困难重重,大家普遍反映,“要求

高,进度快,习题多,吃不消”。

根据这一情况,我们一方面要求学员认清文化学习的艰巨性,要当作“堡垒”来攻克;另一方面深入教学第一线,帮助总结经验,研究改进教学方法,组织教员试讲,加强辅导,开展包教包学、互助互学活动。由于校党委的正确领导,教学方法的改进和教员的辛勤努力,特别是全体学员的拼搏精神,学习成绩很快得到提高,三个月就完成了教学任务,多数学员各种考试成绩在80分以上。学员文化程度的迅速提高,为进入本科学习创造了必要条件。

我们提前进行了本科教育的准备工作。担任本科教育的教员,准备了教案、教具,并经过了集体讨论和试讲。校领导检查后,认为已具备了实施本科教育条件,便在5月5日举行了开学典礼,学员转入本科教育。

开学典礼时,军区首长贺龙司令员、邓小平政委、李达副司令员和王新亭、张子意副主任等都参加了典礼。贺龙司令员代表中央军委,向各军事、政治大队授了军旗。授旗仪式后举行了庄严的阅兵式,接受军区首长检阅。

本科军事教育的中心内容是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和诸兵种联合作战战术训练。以毛泽东军事著作、刘伯承译著的《合同战术》为基本教材。教育分两个学期进行,第一学期主要学习连、排战术和兵种知识,第二学期主要学习营、团战术和必要的参谋业务知识。此外,还有队列教练、射击、兵器、刺杀、地形学、筑城、共同条令、后方勤务等课目。

在教学方式上,除教员系统讲授军事理论知识外,还有课堂讨论、沙盘作业和练习团配合下举行的战术演习等。

军事大队的政治教育,主要是形势任务和《社会发展史》的理论教育。政治大队除形势任务教育外,以《社会发展史》

和《军队政治工作》为主课。

本科教育的内容多,时间短,但教员和学员都很努力,发扬了我军英勇顽强的作风,刻苦钻研军事理论和改革教学方法,教学计划执行得比较顺利。

9月,我离开了学校,调第十军工作。

令人欣慰的是,后来学校的同志们告诉我,1952年5月,这批学员都顺利通过了国家考试,成绩优良率占57.5%;179名学员被评为优等生,208名学员被评为学习模范。毕业典礼上,贺龙司令员代表中央军委和西南军区对学校取得的成绩表示热烈祝贺。贺龙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还亲自给学员颁发了毕业证书和奖状、奖品。

从1949年5月到二野军大开始,两年多的学校工作经历中,我深深体会到,军校工作,不论战时还是和平年代,都是军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建设一支现代化、正规化的军队,办好军事院校,培养治军人才,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是一项战略性任务。

第九章 结缘大海

大连海校

我是山区长大的,以前从未见过大海。没想到,30多岁后竟与大海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2年2月,我接到中央军委通知,让我立即赴北京,海军司令员萧劲光找我谈话。在简要介绍了海军建设情况后,萧司令员问我:“刘华清同志,组织安排你到大连海校担任副政委,你有什么意见?”

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对于海军除感到有些高深莫测之外,更多的是觉得陌生,心里没底,担心干不好。萧司令员见我有些踌躇,没等我把话说完,便接过话茬:“海军建设对我们大家都是新课题,需要边干边学习。你在西南军政大学办过学,打过仗,又年轻,这都是很好的条件。相信你一定能够胜任。”一席话,我调大连海校的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大连海校是海军第一所培训水面舰艇初级干部的正规学校,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学校”,其前身为安东海军学

校。

早在海军建军之初,中央军委就把创办海军学校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1949年2月25日,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巡洋舰起义,后又有“灵甫”号起义。同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安东海军学校,主要任务是对起义人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人民解放军优良传统教育,张学思任副校长。同时,中央军委还授命张学思负责另行筹建一所正规的海军学校。

1949年8月,张学思赴苏联考察,与苏方洽谈帮助中国创办海军学校事宜,并达成有关协议。11月,张学思向中央军委呈送了《关于学校教育的初步意见》的报告。聂荣臻代总长据此向毛泽东主席提交了《关于创办海军学校的报告》,提出以安东海军学校为基础创办大连海军学校,并明确了办校方针、教育计划和招生条件等问题,选调部分国民党海军起义人员任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很快签署。11月22日,大连海军学校正式创办。萧劲光司令员任校长兼政治委员,张学思任副校长兼副政治委员,胡绵弟任教育长,李东野任政治部主任,叶伦任训练部长。

海校坐落于大连市老虎滩畔,依山傍海,风景秀丽,加上优良的港口条件,很适合办学和学员出海实习。日本占领时期,这里是一所日本中学的校址;日本投降后,这里又成了苏军的一个炮兵团驻地。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几经交涉,最后斯大林亲自批示,才达成了炮兵团迁出,由大连市政府为其另觅驻地的协议。建校时,东北人民政府、旅大行政专署以及东北人民给予了大力支持。

1950年2月1日,海校正式开学。学校设航海指挥和机电工程系,分别培养大学本科水平的水面舰艇航海、枪炮、鱼水雷、观通和机电等部门的部门长。12月,航海指挥系扩编

为指挥分校,机电工程系扩编为机械分校。

初期教员奇缺。苏联专家亲自授课,加上挑选出的部分起义人员,他们边向专家学习边教学。尽管如此,仍如杯水车薪。后来,萧劲光校长亲自出面做工作,李东野主任先后到中央组织部、教育部多方联系,从留学回国的专家中和清华、北大等单位选调了曹修懋、强明伦、俞懋旦、余潜修、慈云桂、郭日修、郭沂曾等一批教授、讲师,同时,从大连造船厂请来了多名工程师担任兼职教员,才算初步解决了教员短缺问题。这种聘请地方高级知识分子到军校任教的做法,在当时堪称创举。

1952年5月4日,我正式到大连海军学校上任。1953年3月,张学思调任海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后,我兼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主要分管政治工作,兼管教学、管理和学校建设。

初到任,我深入机关、教研室和学员队调查研究,了解情况。虽然建校时间短,但学校在教学计划、教学设备、行政管理等方面已有初步基础。这里头,张学思同志贡献很大,功不可没。然而学校毕竟还处在初创时期,基础薄弱,教学制度不够完善,教学经验不成熟,教学设备也很少。所用教材多是根据苏联专家的讲义翻译的,没有定型,多是油印本;就连对“为什么办学,怎样办学”这些重大问题,一些同志也存在模糊认识。

实际上,早在建校之初,萧司令员就对办学方针作了明确指示:“大连海校是正规的高级海军学校”;要“培养一定数量的能够掌握现代海军技术业务的新型海军干部”;“要树立以教学为中心、为学员服务的思想”。海军党委也明确了海军建军路线:“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以工农为骨干,以解放军为基础,吸收大量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人员,争

取团结和改造原海军人员,建设人民的海军。”

我思之再三,决定紧紧抓住贯彻办学方针和海军建军路线,确保建校办学的正确方向。

学校应该“以教学为中心”,有的同志对此缺乏足够认识。有的认为,“以教学为中心”,就是以训练部门为中心,降低了其他部门的地位和作用。有的政工干部认为,学校提政治“保证教学”不对,会使政治工作变成“从属地位”,“只起间接领导作用”,应该提领导教学才是“起直接领导作用”。有的认为“一切以教学为中心”的提法,应改为“不影响教学”。甚至有的认为,学校是“技术当道”,“党气低头”。

为此,学校召开教学工作会议。我明确重申:“学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具有高度政治觉悟、掌握现代海军技术知识、具有坚强体魄和一定组织指挥能力的舰上初级干部;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着完成这个任务;学校工作的好坏,要以完成教学任务和质量为衡量标准。所以,学校应该一切以教学为中心,离开了教学工作,其他工作就失去了意义。

“学校的政治工作,应以保证教学为基本任务。‘领导’或‘保证’的提法,其精神是一致的,问题在于工作效果。如果配合教学工作取得了成绩,就既起到了‘保证’作用,也起到了‘领导’作用;如果站在教学业务之外,干叫领导,不仅起不到直接领导作用,连间接领导作用也谈不上。

“学校工作以教学为中心,就是要根据教育计划和各阶段教学中心工作,各部门根据本部门的业务性质,提出保证和配合的措施;经学校党委讨论决定后,制定全盘工作计划,使各项工作都围绕教学中心工作统一进行。”

在具体措施上,我们制定了各级领导和机关于部深入现场的工作制度,明确了干部听课、参加试讲、审查教案讲义、检

查教学日志等各项规定；要求分校领导和训练部长每天查看一次教学日志，每周至少听课四至六小时；对海上实习这样的重大教学活动，规定分校、训练部门领导要随船出海，切实搞好对教学工作的组织领导。同时对系、大队、学员队干部以及机关教学参谋人员也作出相应规定。为发挥政治工作的保证作用，我们规定训练部门应将各个时期的教学计划、要求、目的和主要教学活动，向政工干部和其他干部传达；在讨论重要教学工作时，应吸收政治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政治部门讨论有关保证教学工作也应吸收训练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采取这些措施后，各部门抓教学的合力得到明显增强，有力地促进了教学工作，很快形成了课堂讲授、自习辅导、实验和海上实习等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总结出了学员入伍到毕业分配各个环节的政治工作经验。

现代海军是高科技军种，需要吸收大量青年知识分子投身海军建设。可是对是否应该吸收广大工农干部来校学习，学校领导层有不同看法。

有的同志认为，工农干部文化太低，很难学好海军专业；也有的同志认为，海军需要继承和发扬我军优良传统，没有一批经过战争考验的工农干部，就没有战斗骨干。学校党委经过讨论，统一了认识，确立了“向工农干部开门”的方针，并制定了本科四年制甲、乙两种计划。

甲种计划，是培养学员有较高的技术和业务水平，不仅能胜任本职需要，而且在技术上具有研究和创造能力；乙种计划，则不要求学员有很深的理论知识，但要有胜任本职的专业技术和应用知识的能力。乙种计划，是为了向工农干部开门，使他们有可能进入本科学习，为舰队充实工农骨干。

为实行四年制乙种计划，学校决定，适当延长工农干部预

科文化学习的时间,在教材内容上也适当进行调整。1953年10月,第一批预科学员结束文化学习,200余人升入乙种计划学习。乙种计划实施中,最大的障碍是多数工农干部学员文化程度低,学习跟不上。有的学员信心不足,甚至个别干部、教员对工农干部学习能力产生疑问。我们想了种种办法,终于将乙种计划坚持下来。

实践证明,工农干部有丰富的斗争经历和生活知识,接受事物的能力强,只要打下一定文化基础和教学方法得当,学习业务技术也较快。这届工农干部学员经过四年学习,分配到各舰队、支队或留校工作,颇受欢迎。后来,这些学员大都成了部队骨干,有的还担任了舰队、支队和学校部、系领导。乙种计划培养的人才,在海军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用好“外脑”

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除了要坚持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外,还应该学习借鉴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经验。从学校筹建起,海军党委就明确了向苏联学习的方针。

海校创建时,聘请了苏联专家近百人,学校的教学计划、教学制度和行政管理制度等,全都由苏联专家制定;教材也是苏联专家编写,译成中文后,再由我们的教员讲,完全是苏联海军办学的模式。我到学校后,苏联专家大部分已经回国,只有赫涅金、萨沃金科等十多位苏联专家还留在学校作顾问。

聘请苏联专家,是当时最切实可行的一条捷径。但是,我到任不久,就发现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在向苏联专家学习上,认识分歧很大。

一种是崇拜英美,瞧不起苏联科技。在一些地方大学聘

来的教授和教员眼里,苏联是政治第一,英美则技术第一。认为苏联的科技比不上英美,学习不虚心,不主动,苏联专家来了就问,不来就不问,有时与专家谈问题,还嫌麻烦。有些原国民党海军人员,表面上对苏联专家敷衍恭维,内心里却认为自己肚里有货,不向专家学也行。学校的领导、干部和教员大多是从陆军调来的,一些人有明显的经验主义和游击习气,虽然承认自己不懂海军技术,却认为在其他方面有一套,不愿向专家学习。有些学员也对向苏联学习抱怀疑态度。

另一种则认为,向苏联学习就要全面学,“不走样”,不仅学技术知识,也要学习其他的方方面面。

当然,也有同志认为,学苏联不能什么都学,特别是政治工作、行政管理工作和教学方法等方面,应该结合我军情况有选择地学。

由于思想不统一,影响了向专家学习的效果和专家作用的发挥。

我没有急于表态,而是分析了造成这个问题的症结。我觉得,在向苏联专家学习的问题上,学校有点放任自流,缺乏组织计划,要求不够明确具体。正因为如此,大多数人没有组织起来认真向苏联专家学习。少数教员虽然向苏联专家学了一些海军专业知识,但也缺少系统的整理和分析。苏联专家评价说:“学习带着机械性与形式主义,没有进一步学习实质,许多问题只学怎样做,不学为什么这样做。”

找准了问题才好对症下药。我多次在全校会议上强调向苏联学习的意义和必要性,提示大家,苏联海军经受了二次大战的洗礼,打败了德国法西斯海军,有30多年的海军建设经验和系统的军事科学理论。我国海军白手起家,英美等西方国家又对我采取敌视态度,搞封锁,我们不向苏联学又向谁

学？我要求大家，必须端正学习态度，克服经验主义、游击习气，纠正不虚心、不主动等偏向。有组织、有计划、有分工地向苏联专家学习，既要学习苏联的军事科学理论、海军技术，也要学习组织教学工作的经验，学习苏联专家认真负责和敢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以及保守国家军队秘密的优良作风。

学习中，我们注意有所选择，有所甄别。如苏联专家认为，学校的政治学习时间太多。我就向他们说明，我国新政权建立不久，社会情况复杂；特别是海军初建，有来自各方面的人员，不提高海军干部的政治水平是不行的。专家表示理解。同时，在制定和完善学校规章制度时，我也注意结合我军实际情况，防止脱离实际的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

经过教育，两个分校都检讨了过去向苏联学习不够的地方，纠正了缺点，并对苏联专家编写的教材进行整理、校对；成立了专家办公室，拟订了办公室工作条例，排定了与专家商谈问题的日程；拟订实验室建设、教学计划和教学提纲等重要问题，都征求专家的意见，与他们共同研究。学校还举办了俄文速成班，学科组的教员踊跃参加学习。教员找专家研究问题也多了。

苏联专家忙起来了，感到时间不够用，积极性也充分调动起来。应该说，在大连海校初创时期，苏联专家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海校，我也注意充分发挥原国民党海军人员的作用。

大连海校创办时，安东海军学校的大部分人员调到了大连海校。其中主要是原“重庆”舰的起义人员，也有少数原“灵甫”、“长治”等舰的起义人员，他们大多分配到各教研室当教员或到机关工作。

对于他们，我们实行的是团结和改造的政策。他们有的

接受过西方海军教育,有一定的技术业务知识,政治上也要求进步,靠近组织,愿意接受改造,愿意为人民海军事业努力工作,但思想上往往存有不同程度的旧意识。我们一方面加强他们的政治理论学习和解放军优良传统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另一方面,则根据个人优长,安排适当工作。有一些后来担任了系、教研室、机关和学员队的领导工作。

但是,有些工农干部对他们仍抱有一些成见,对他们提出的业务进修、提供参考资料等要求不去注意解决;对他们的家属工作、子女上学和医疗等问题的解决也缺乏主动,尤其在政治上关心不够,思想教育不够及时。有些领导对他们比较冷淡,不敢大胆放手使用;在政治运动中,也是批评多,耐心帮助少。一些原海军人员因此反映,对他们“政治上不够关心”,“感到自己政治上落后了”,“一到党日,精神上苦闷不安,无所事事”,甚至怀疑组织上不信任,担心今后的前途。

针对这个问题,学校党委专门进行了研究,统一思想认识,作出了关于团结和改造原海军人员的决定。要求各级党委在广大干部、党员中,深入进行团结和改造原海军人员的政策教育,消除抵触情绪和各种思想顾虑,用原海军人员的现实表现和对海校建设的重大贡献,说明他们不仅是团结改造的对象,更是学校建设的宝贵财富,必须主动去团结帮助他们。要求两个分校要认真搞好对原海军人员的业务培训工作,订出计划,保障时间,订购资料,组织讲座,尽快提高他们的任教能力。同时,加大思想政治工作力度。组织好经常性的政治学习,要求每月召开一次座谈会,每个领导干部每月要同一至两名原海军人员谈话,两个月组织一次有关政治、思想、工作等方面的问题报告会。注重从政治上培养提高,关注他们的

成长进步;从工作、生活上多关心,及时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必要时可以给予特殊照顾。

此决定一出,各级党委、广大干部党员和原海军人员衷心拥护,问题很快得到了纠正。原海军人员中的先进分子,有的被选拔到领导岗位,有的被吸收入党,有的被评为工作模范;工作和生活条件也得到一定改善。他们切身感受到了组织的关心,工作更加积极努力,思想改造也更加主动自觉,为海校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次出海

未识海上风浪的水兵,算不得真正的海军。

每学年我们都要组织 12 周的海上实习,把学员拉出去,经受风浪的洗礼。实习海区通常在大连、旅顺海区和外长山列岛、渤海湾;远的则从大连出发,环渤海湾经烟台、威海,再从青岛返回;有时也经连云港到长江口返回。

海上实习内容除航海、枪炮、鱼水雷、观通、舰操、船艺、机电等课目外,第一学年,要实习水兵战斗和日常勤务;第二学年,实习班长的战斗和日常勤务;第三学年,实习军士长和部门长的组织指挥,并担任舰值更和舰值日。三年实习,使学员经历水兵、班长到军士长、部门长各个岗位的全过程,毕业后,经过短期见习,便可胜任本职工作。

建校初期,没有实习舰艇。1950年,第一次海上实习,我们是借船出海,租来一艘商船,顺风扯帆。学员戏称:我们是借风借船去出航。1951年,海军为学校配备了实习舰艇大队,有“四明山”号、“桐柏山”号两艘大型坦克登陆舰,一艘消磁舰和一个由六七艘炮艇组成的炮艇中队。舰种不全,装备

陈旧,仍然无法满足实习要求,有些课目还得到舰队去实习,对舰队和学校双方都不方便。

1952年10月,田震环从陆军调来,任实习舰艇大队大队长。田震环是进藏第十八军汽车团团团长,很能干。报到时,我向他介绍了实习舰艇大队的情况和基本任务,特别强调,舰上的干部和水兵要做学员的小教员,为学员树榜样。他上任后,加强军事训练,狠抓部队作风、纪律、军人仪表的养成,舰员的整体素质有了较大提高。1953年朱德总司令、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先后到海校视察,我陪同他们视察了实习舰艇大队,并乘登陆舰驶出三山岛外,观看大连港区。朱总司令和刘院长对海校和实习舰艇大队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1953年,海军潜艇学校成立。他们的学员都要到实习舰艇大队实习。由于舰艇太少,学员多,每次安排实习都很困难。

我向海军首长建议:增拨实习舰艇的舰种和数量,在实习舰艇大队的基础上扩编为练习舰支队。我的意见被采纳了。很快增拨了舰艇,成立了练习舰支队,下辖两个大队。除鱼雷艇实习和毕业班实习需要到舰队进行外,其他实习课目都可以在练习舰支队进行。后来,大连海军学校总校撤销,练习舰支队便归属海军领导,由青岛基地代管,担负海军各院校的实习任务。

1953年夏天,我带领一、二分校学员进行了一次海上实习,两个分校的副校长也随舰出海。这也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出海。

码头上,我检阅了实习舰艇大队和学员队,并作了简短动员,要求大家克服炎热,战胜风浪,不怕困难,努力学习,圆满完成海上实习任务。这次的实习海区,在渤海湾和青岛附近。

上舰后,我和分校、实习舰领导一起,研究检查了学员的实习课日和生活具体安排。

我和学员一起住在登陆舰上。学员打地铺,睡在坦克舱甲板上,每人铺位仅80厘米宽。登陆舰上,除舰长住舱稍宽敞些外,其他舰员舱都很狭小。舰长舱里,有许多仪表,以便舰长随时掌握情况,实施组织指挥。舰长要把住舱让出来给我住,我谢绝了:“舰长室只能你住,这是工作需要。”见我态度坚决,舰长只好安排我住在军官舱。军官舱也是袖珍型的,三平方米多一点,舱内有张一米宽的床铺,还有张小桌子、一个小洗脸池和一个小衣柜,布置得很紧凑。

第二天一早,登陆舰离开大连港,开始了海上实习航行。

开始几天,天气很好,风平浪静;以后遇到一些风浪,也不很大。登陆舰在内长山列岛来回航行,实习天文航海、地文航海等课目。教员讲课,我跟着学员听;学员操作,我也跟着看,学着做,学习如何利用目标测定舰位、用六分仪测天计算舰位。

航行时,我还和学员一起到机舱实习。机舱温度高达40—50℃,通风条件不好,非常闷热,噪音也大,舰员、教员和学员尽管一个个汗流浹背,却都很认真。舰上淡水很少,晚上,学员只能用少量水擦擦身子。然后各班开会,小结一天的实习情况,并组织文娱活动,唱歌、跳水兵舞,消除一天疲劳。

航行到蓬莱、烟台、威海时,我们组织学员到岸上参观,了解地方社情民情。到著名的刘公岛参观时,还请当地驻军介绍当年的甲午海战,对学员进行热爱海洋、保卫海洋的爱国主义教育。

出海实习,学员的体力消耗很大,我要求把伙食搞好。当时,舰灶伙食费标准是每人每天两元多人民币,主副食价格都

较便宜,伙食很好,每周还有两次会餐。由于天气炎热,加上疲劳,学员一般吃得不多。特别是遇到风浪,有些学员晕船呕吐,再好的饭菜也吃不下,不想吃。这时,动员学员吃饭,多吃东西,也成为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因为在晕船时,吃饭不只是为了充饥,而且是为了胃里有东西可吐。晕船呕吐,属于正常生理现象,没有什么可怕。吃了吐,吐了再吃;只要有东西可吐,就不会伤身体。

老水兵、老学员习惯了海上生活,不易晕船,即使晕船,也会对付,不把它当一回事。我虽然是个老兵,但不是老水兵,老天爷不会关照我,也让我很好地体会了一下海上晕船的滋味。

有一天,登陆舰从蓬莱去青岛,途中遇到了七八级大风。大海发怒了,大浪一个接一个,海水从舰首一直打到驾驶台。登陆舰舰底较平,同样的风浪,摇摆起来比其他战斗舰艇要大。这一次算是遇到了大风大浪,舰体一下抬上浪峰,一下又抛进波谷,舰体横向倾斜达30多度,大多数舰员和学员呕吐了。我也吐了,但还是坚持来到广播室,鼓励大家在大风大浪中锻炼自己,以坚强的毅力征服风浪。大海还在咆哮,大家仍然按部署坚守在各自岗位上。

登陆舰迎着风浪,勉强驶过了成山头。这时,风浪越来越大,舰体在格格作响,似乎要断裂。登陆舰是纵向结构为主的舰艇,而这艘登陆舰年龄不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建造的,似乎已经经不起这种折腾。实习舰艇大队领导向我请示:风浪太大,为了安全,是否可返回威海。我同意了,决定返航威海,等大风过后再去青岛。

这次出海,让我初次认识了大海,体会了海上生活的艰苦。我想,这只是近海和内海的实习,一旦要去中远海,需要

有较大的实习舰艇才行。这个愿望 30 多年后才得以实现。我当海军司令员后,没有忘记第一次出海实习的窘况,便下决心建造了 5000 吨级的“郑和”号航海训练舰,后又建造了“世昌”号,专门担任海军院校学员海上实习任务。从此,学员海上实习条件才得到真正改善。

1954 年 4 月,中央军委命令,大连海军学校总校撤销,两个分校则分别组成海军指挥学校和海军机械学校。我也接到海军通知,准备去苏联学习。

赴苏学习

1954 年 6 月,经中央军委批准,海军选调了一批团以上干部,去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学习。在此之前,已有海军副司令员刘道生带 10 人赴苏学习。我们这批算是第二期,有高立忠、陈云中、程庆荣、袁意奋、胡代耕、魏岱峰、柳条、武毅和翻译徐执提,加上我,一共 10 人。

乍听到这个消息,我有些顾虑,毕竟 38 岁了,又不懂俄文,数理基础又差,学习肯定会有许多困难。想到学习机会难得,组织选中了我,我不能辜负这份期望。于是,给自己鼓劲,开始了出国前的学习准备。我主要请刘和同志帮助我补习数学,徐执提同志帮我学俄语,还学了航海知识等。

8 月,留学人员在大连集中,海司学校管理部罗钰如部长赶到大连,为我们送行。留学人员成立了党支部,我任党支部书记。

我们从沈阳登上列车,经满洲里进入苏联。车上,两人一个包厢。路途遥远,大家都带了些俄语和数学书,利用路上时间抓紧学习。出国境后,火车绕贝加尔湖,经伊尔库茨克、克

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鄂木斯克,到了乌拉尔山欧亚分界线上的斯维尔特洛夫斯克。火车一路咣当,所过之处,全是原始森林,几天没看到人烟。离开斯维尔特洛夫斯克,进入东欧平原,人烟多起来。又走了两天,才到了莫斯科。

到了莫斯科,苏方派人来接,我国驻苏武官韩振吉也来了。我们在一家旅馆住了一晚,第二天又坐上火车,六七小时后,到了目的地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学院派车把我们一行接到了外国留学生宿舍。这一路,整整走了11天。

9月初开学。没有开学典礼,外训系主任宣布教育计划后,就算正式开学。

中国第二期留学生九人单独一个班,大家推举我当班长。我们住在院外一幢楼房的二层,离院本部不远,只有十几分钟路程。同楼住的,还有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东德、波兰、朝鲜等国的留学生。军以上干部,一人一间宿舍,其余两人一间。吃饭在学院军官食堂,各人自己买饭。吃的是西餐,比较简单,一菜一汤,再有一道甜食;主食是面包,饮料有咖啡、可可和茶。我们的住所里有一公用厨房,节假日就自己买些菜做中餐打牙祭。我们有国家津贴:军职干部1200卢布,师职干部1000卢布。伙食费每月要花掉约600卢布,其他生活用品还算便宜。

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有百年建院历史,是当时苏联历史最悠久的高等军事学府之一。学院建立以来,培养了大批指挥军官和军事学者,C·T·戈尔什科夫、H·T·库兹涅佐夫、Г·М·叶戈罗夫、H·И·谢尔盖耶夫等海军元帅,都从该院毕业。卫国战争时期,学院有数千名毕业生荣获各种勋章和奖章,其中97人荣获苏联英雄称号。当时,在俄国海军领导岗位上任职的,基本都是该学院的毕业生。在海军学院从事教学和科研

工作的,有多名院士、通信院士和功勋科学家,教官都是海军院校毕业的,在舰艇部队服役过并有作战经验,教学力量很强。学院有各种实验室、研究室和藏书丰富的图书馆。设备完善,学习条件很好。

海军学院所在地列宁格勒,位于涅瓦河三角洲,城区有许多岛屿,岛岛之间有桥梁相连,是当时苏联第二大城市,也是重要的工业、科学和文化中心。这里由于纬度高,每年秋季受北极光影响,白昼很长,有几天甚至是白夜,不开灯也能看书。

1990年6月,我率团访问苏联,苏方很细心,安排参观了我曾学习过的这所海军学院。时隔36年,学院变化很大,过去的宿舍、教室、饭堂等,都拆掉改建了;当时的系领导和教官也都退休,没有找到。学院领导还陪同我去档案馆,查到了我的学习成绩单和学院对我的学习评语,并复印了一份,送我留念。这使我再次回忆起当时紧张的学习生活。

自1945年起,学院建立了外训系,负责培训外国海军军官。开设的课程,包括基本系的所有专业,学制四年。当时,我们的教育计划是:半年预科,三年本科;共学三年半。预科学习阶段,主要是学俄文,约占一半以上时间;其他是海军常识,海军武器装备(枪炮、鱼雷、水雷、扫雷具、深水炸弹等)、舰艇、飞机的性能和构造原理,以及苏共党史等。计划安排得很紧,每周学习六天,每天八节课,晚上自习两小时(实际上都自习三至四小时)。星期日休息。

学校保密制度很严,下课后,要将文件包送保密室,用胶泥封好锁口,盖上印;上课时再取出。所以,到了晚上,我们大都复习俄文,或非保密课程,或回忆专业课程。

星期天,有时学院组织去冬宫、列宁写作《国家与革命》的地方等处参观,有时到附近森林公园散步。但多数时间我们

还是自觉地用来学习。

俄文不好学,让我很伤脑筋。背俄文单词、特别是动词的变格变位,很不好记。学不好俄文,其他课程也没法学好。我只有横下一条心,把自习时间,再搭上星期日,大都用来学俄文。上课时,苏联教官讲一段,翻译就翻一段,我们就囫囵吞枣,拼命记笔记,再回去慢慢消化。

武器装备等课程,从最基础的东西讲起,兵器、舰艇、飞机等的设计构造都讲。当时觉得这些东西对我们中、高级干部用处不大。但后来我到第七研究院和国防科委工作时,这些知识还真派上了用场。学武器装备有实物,比较好理解。有的装备课和工程课,还到海军高级专科学校和克雷洛夫海军工程学院去参观学习。

平时,每隔二至三周有一次小测验;学期结束时进行学期考试。考试很正规,由教员组成考试组,学员抽考题,准备好后,用口答,再通过翻译问答,院长、系主任旁听,像“三堂会审”。我的预科考试成绩还可以,都是四分或五分。

进入本科学习后,主要学习海军专业知识,俄文仍是重要课程。

第一年,我们主要学习武器的战斗使用和兵种战术。武器的战斗使用,有火炮射击、鱼雷射击、布扫雷,由单舰到编队。不仅要学习部门长、舰长的组织指挥,还要学水兵操作。开始不理解,又不是当水兵,学这些有什么用?后来到舰队、海军做领导工作时,才体会到,懂得了最基层的工作,了解情况才会实在、确切,领导工作才能过细,作决策也才能心中有数。

兵种战术,主要学习各种水面舰艇战术、潜艇战术、海军航空兵战术、岸防兵战术。

水面舰艇战术主要有火炮舰艇和鱼雷舰艇的战斗使用；导弹武器和导弹舰艇的战斗使用；水面舰艇布、扫雷；水面舰艇的防潜；水面舰艇与直升机对潜搜索和攻击；航渡和战斗中的对空、对潜、对水雷、对艇防御等。除了讲授理论，还有相应的作业，如：火炮舰艇战斗能力的计算、鱼雷攻击兵力的战斗能力和兵力编成计算等等。

潜艇战术主要有导弹潜艇袭击海上护航队和战斗舰艇编队的战术以及袭击岸上目标的战术；鱼雷潜艇袭击海上护航队和战斗舰艇编队的战术；水雷潜艇的战术使用；潜艇海上航渡、潜艇克服敌防潜兵力兵器的战术、潜艇的战斗侦察、潜艇破坏敌海上交通线的组织实施、潜艇执行特种任务的方法、对海上潜艇的指挥、对潜艇的战斗保障等。潜艇战术的作业，有导弹潜艇对岸突击、潜艇在敌海上交通线和近岸交通线上的战斗行动等。

海军航空兵战术主要有歼击航空兵、水鱼雷航空兵、侦察航空兵、防潜航空兵的战斗使用和海军航空兵在抗登陆战斗中的行动等。作业有：水鱼雷机团昼间对海上舰艇突击、保障潜艇突破敌防潜地区、侦察航空兵团团长对海上舰艇进行空中侦察的决心、鱼水雷航空兵师师长突击敌航空母舰搜索突击群的决心、防潜航空兵团团长搜索和消灭敌潜艇的决心、歼击航空兵师师长保障鱼水雷航空兵师实施突击的决心等。

有两门课程，全由苏联教员用俄文讲课，翻译只作必要辅导。尽管教员讲得较慢，我们还是似懂非懂，课后要靠翻译帮助，花很大力气才能搞懂。比我们早入本科的第一期中国留学生，也因为俄文障碍，学习效果不理想。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中国海军留苏党支部向院方提出了几条建议：一是主要课程用中文听课，次要的几门课用俄文听课；二是为解决课程多

与时间少的矛盾,酌情免去或减少不很必要的课程,如战史、政治课等;三是明确翻译不是学员,免去翻译的作业与考试,以便集中精力帮助大家学习;四是俄文课讲义多属文学性的,不能结合军事术语,要求更换讲义。很遗憾,院方答复,除俄文课讲义可以更换外,其他均不能改变原定的教育计划和规定。

第一个暑假到了,中国留学生全都回国休假。我们乘坐螺旋桨依尔-12飞机,中途几次加油和休息,净飞30多个小时,三天后才到北京。

海政干部部召开留苏人员座谈会。我们汇报了学习收获体会,也对苏联海军学院的教学方法和今后派遣留学生以及学员生活等问题提出建议。建议向苏方提出,主要课程以中文听课,次要课程以俄文听课,突出学习重点,教学方法要理论联系实际等。同时我们也谈到,派留学生到苏联海军学院学习的做法应该坚持,但也应看到,在国外学习困难很多,主要是俄文、数学基础差,海军的感性知识不足,以后派留学生,建议在国内有较长的时间准备,特别是要打好俄文和数学基础。

座谈会后,我回到大连海校,一面休息,一面仍抓紧时间学习俄文。20多天后,到北京集中,然后乘伊尔-12飞机,回到了苏联海军学院。

此后,我们每年暑假都回国休假,与家人团聚。

本科第二学年,主要学习海军合同战术,还学习卫国战争的苏联海军学术史、通信等课程。多数海军专业课已是用俄文讲授了,我们的俄语水平也有较大提高,基本上能听懂教员的讲课。

海军合同战术是主课。主要内容有:海军基地地域的防

御,包括基地防御的组织,对空、对潜、对水雷、对艇防御,对原子、化学、细菌的防护;在远距离防潜地幅内与敌潜艇的战斗;海军诸兵种合成编队对敌护航运输队、登陆输送队的战斗;海军航空兵和远程航空兵对敌海上舰船的合同行动;对潜艇编队突破敌防潜地幅的保障;登陆战斗、抗击敌登陆兵登陆战斗中海军兵力的使用及战斗保障等。结合课程内容,还讲授了卫国战争的苏联海军学术史的合同战术部分。海军合同战术的图上想定作业较多,一个课题共有20个作业。

通信课的主要内容有:雷达、水声、热力测向仪、夜视仪、电视等技术观察器材的战术技术性能和使用;无线电对抗器材的战术使用;海军通信配系;电子计算机的工作原理和在保障舰队战斗活动中的运用;无线电对抗;舰队和基地日常通信组织;海军战斗中的通信;海军战役通信;海军战役中无线电对抗的组织指挥等。

进入本科第三学年,我们开始学习海军战役法、海军地理、司令部工作和海军国际法等课程。

海军战役法也是主课。主要内容有:军事战略的内容和海军的战略使用;海军战役法原则;舰队的日常战役活动;海军战役和舰队兵力在合同战役中的行动等。各种战役都有想定作业,因为战役作业是各种海军专业知识的综合运用,学院和系都很重视,课时也比较多。通过想定作业,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巩固所学的知识,虽然比较紧张,但收效较大。

海军地理课的主要内容,有海洋自然条件对海军战斗活动和武器使用的影响;太平洋战区(包括太平洋概述、白令海、日本海、中国黄海、东海和南海以及台湾地域、菲律宾地域等)、大西洋战区(包括大西洋概述、地中海等)和印度洋战区(包括印度洋概述、波斯湾、阿拉伯海等)的海洋气象、水文条

件、岛屿、港口、交通线、各国海军兵力驻屯情况等。

司令部工作的学习内容,主要有海军的组织;各级司令部日常战斗活动、作战准备、作战实施的一般内容和工作方法;海军战役训练的组织与方法等。在海军国际法课中,主要学习了领土、领海、公海、国际海峡和运河的概念,相关国家的权利;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国际法与海上军事行动等。至于联共党史、《资本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苏联对外政策和当代国际关系等政治课,则是在各个学期穿插学的。

本科学习共六个学期,前五个学期都有学期考试,主要是口试。我的考试成绩大都是五分,少数四分。最后一个学期是国家考试。

学院对留学生的实习很重视。进入本科后,头两年都在苏联学习,实习安排在暑假前,有一个月时间,主要是见学。

第一次实习是到芬兰湾的喀啷施塔得训练基地,内容是参观各种水面舰艇和武器装备。实习的战列舰是沙皇时期造的,建了两艘,每艘排水量为4万吨,二战时曾作为浮动炮台用于对岸上目标射击,多数时间则在列宁格勒隐蔽起来。在“十月革命”号战列舰上,我们还见学了一次火炮射击。打的是203毫米火炮,震动和响声很大,事先叫我们捂住耳朵,以免震破耳膜。巡洋舰我们没上去,但体验了潜艇的水下航行。岸防兵是参观有名的红山炮台等,有130毫米、180毫米、203毫米的海岸炮,见学了火炮阵地的配置和防护工程。

第二次实习,我们乘火车到了波罗的海三国,到了爱沙尼亚的塔林、拉脱维亚的里加和加里宁格勒。主要参观海军基地和航空兵基地,还参观了一次驱逐舰、鱼雷艇的合同攻击和猎潜艇的对潜攻击演习。海上侦察实习,是在加里宁格勒坐

飞机在空中转了几圈,体会空中观察海面的情况。加里宁格勒是原东普鲁士首都,二战时,苏联想占,美国也想占。当美国确认它将落入苏军手中时,便出动几百架飞机,连续轰炸了三四天,地面建筑几乎全部被毁,教堂炸得只剩下一个墙框。我们去时,还没恢复过来,到处是战争残迹。忙里偷闲,我们还参观了康德墓地。在苏联的实习,开阔了眼界,增长了海军知识,收获很大。

第三学年回到国内实习,是在旅顺基地司令部。要求作一篇论文。我的论文题目是《海军的参谋业务》。

实习结束,又回到苏联,开始准备毕业考试。

海军学院的毕业考试是国家考试,很隆重,专门组成了国家考试委员会,主席是海军上将巴依科夫,委员有学院院长海军上将安德列耶夫、主管教学工作的副院长海军中将库尔尼科夫、教育处主任海军上校季明斯基、专业系主任海军少将奥希波夫及主要教员。

考试方式有笔试和口试。口试时,按抽的考题回答。考试委员还要问一些其他问题,学院院长也进行提问。笔试用俄文答题。

我的考试成绩还算不错。共学 21 门课程,其中八门只需通过,不计分;其余 13 门课程,有 10 门为优,三门为良,总评优秀。毕业证书由国家考试委员会主席、海军上将巴依科夫和学院院长、海军上将安德列耶夫共同签署,给我的评语是:

“本毕业证书授给刘华清少将,他于 1954 年进入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学习,1958 年毕业,所学专业为:参谋总部指挥专业、战役战术专业和海军通用专业。1958 年 2 月 15 日国家考试委员会决定,刘华清少将已是受过高等海军军事教育的海军军官。”

学院给我的鉴定是：“在海军学院学习期间，该学员表现了高度的纪律性。作为集训班和中国学员班的班长，极认真地完成了自己的职责。学习成绩优良。”

我没有辜负党和海军领导对我的期望，圆满完成了赴苏学习任务。1958年2月下旬，我们回到了祖国。

旅顺基地演习

1958年3月，我被分配到海军旅顺基地，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刚刚结束在苏联近四年的学习生活，我像刚充满电的电瓶，劲头很足，非常渴望尽快参加实际工作，学以致用。得到通知，我很快就到旅顺基地报到了。

当时的基地领导是：司令员刘昌毅，政委彭林，副政委宋景华，政治部主任邓可运。刘司令员和彭政委是红军干部，也是从陆军调来的，有丰富的作战和工作经验，旅顺基地成立时就担任了基地领导。他们热忱欢迎我的到来，并寄予了厚望。基地党委让我分管司令部，负责训练和基地管理。

旅顺口位于辽东半岛南端，终年不冻，是一个天然良港。它东濒黄海，西临渤海，南与庙岛列岛及山东半岛的威海港共扼渤海海峡，是首都北京和渤海海岸的天然屏障，也是我国重要的军港和海军基地，历来有“京津门户”之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从19世纪末到1945年的50多年里，这里两度被日本和俄国占据。1950年2月，根据《中苏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协定》，由中、苏两国共同使用。1955年4月归还中国，成为新中国的海军基地，直属海军建制。

我到旅顺基地任职时，基地设司令部、政治部、干部部

(1959年9月并入政治部)、后勤部、工程部和舰船修理处;辖有鱼雷艇、潜艇、护卫舰艇、高炮、岸炮等兵力,还有大连、旅顺两个水警区,辅助勤务船队比较齐全配套,是我国当时最完整的基地,可以说是人民海军的雏形。基地的规章制度,基本上是按苏军的一套,比较正规;当时仍有几名苏联专家当顾问,几个月后才全部撤走。基地组建后,参加过1955年11月叶剑英元帅亲自组织的大规模辽东半岛抗登陆战役演习。经过三年建设,基地各方面工作已有相当基础。头几个月,我主要是到机关和部队熟悉情况,边学习、边工作。

1958年6月,基地参加了一次大规模的旅大地区海岸防御战役演习。演习由第三兵团导演部统一领导,是一次集团军、基地及下属一级编队首长参加的携带通信工具的现场实兵演习。演习课题为:新条件下战争初期在方面军抗登陆战役编成内,主要方向上集团军海岸防御战役的准备与实施。导演部对我们基地的要求是,在统一的课题和实施计划下,采取自编自演的方式进行演习。

基地党委决定,由我具体负责这次演习的组织实施工作。学了几年,没想到刚回来就派上了用场,我很兴奋。

基地领导对这次战役演习非常重视,从学习理论、领会上级指示和战役意图、研究演习情况到布置、检查工作,都抓得很紧。我们组成了基地演习导演组,召集参演的各级指挥员搞好理论集训,由我对抗登陆战役的几个主要问题进行讲解。只用半个月时间,就基本完成了演习的一切准备工作。

在实施演习的七个昼夜里,我们演习了转移指挥所、全基地紧急集合和展开、对敌登陆编队的预先突击和主要突击、布雷、扫雷以及对空对潜防御、巡逻与巡逻兵力召唤支援兵力、反击敌舰艇编队等科目。结合战役演习,各单位还进行了许

多战术情节的推演,使战役演习的内容更加丰富。

演习中,我们大胆改进演习方法,所有战斗号令、文书、报告都是根据上级的预先号令和首长决心研究编写的,克服了过去事先写好各种战斗文书,演习时“走过场”的缺点;对补充情况的推演,也要求指挥员在有限的时间内判断情况,定下决心,并组织兵力实施。纠正了过去演习指挥员按预案背诵决心的作法,各级首长和司令部得到了近似实战的实际锻炼。

通过演习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导演组拟定的计划和推演情节考虑不够细致周到,情况设置不够复杂,有的情况计算正确性不够;基地与编队两级司令部之间、各编队之间的密切协同、主动配合较差。

总的来说,这次演习是顺利和成功的,我和各级指挥员都得到了一次实际锻炼;暴露出的问题,也有利于今后工作的改进。

锚地集训是把部队集中在海上,通过各兵种、各舰种战术合练,提高指挥员海上指挥能力和部队战术、技术水平的重要训练课目。一次集训,通常可完成年度训练任务的30—40%,有的可高达60—70%,对战斗力的生成和提高至关重要。

每次锚地集训的参训兵力,包括护卫舰、鱼雷艇、潜艇、登陆舰、布雷舰、扫雷舰艇、巡逻艇和各种辅助船只等五六十艘,有时青岛基地还派来驱逐舰;锚地海区附近的海岸炮兵、高射炮兵、观通站、雷达站等岸上兵力和海军航空兵,也参加训练。

我分管训练,每次锚地集训,从准备工作到组织实施,都自始至终参加。

第一次参加锚地集训,我发现部队存在不少问题。1958年5月底,基地在外长山列岛组织锚地集训,参训舰艇有60

余艘,青岛基地派“太原”号驱逐舰参加。指挥舰设在“太原”舰,刘昌毅司令员、我和苏联专家都在舰上。那天,在外长山列岛训练结束时,天色已晚,进港时是低潮。舰长工作不细,没有注意研究锚地海区特点和潮差变化对水深的影响,满以为同一航道、同一锚位,不会有问题。结果,舰体触上礁石,撞得比较厉害,舰体有破损,还进了水。舰长十分紧张。我和苏联专家商量后,确定首先进行损害管制、堵漏,保证舰体破损不再扩散,待涨潮时再退下来。经过舰员努力,堵住了破损。涨潮时舰艇退出来,返回基地修理。还有“四明山”号登陆舰,也违反锚地勤务规则,在港湾抛锚时,对大风大浪预防措施不当,触了礁。锚地防御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弱点。如演习鱼雷艇袭击锚地时,有的锚地没有灯火管制,观察、瞭望也不严密。潜艇发现鱼雷艇进入锚地后,还不知道是袭击;岸防炮兵虽作了防艇部署,但直到鱼雷艇进入锚地后才觉察,打开探照灯照射,也没照到鱼雷艇,反而照到锚地内舰艇,目标暴露时间达九分钟之久。

这几件事,使我感到了对部队进行锚地防御组织和锚地勤务规则教育的必要性。针对存在问题,1959年6月,基地又组织了一次锚地集训,重点研究、演练现代条件下舰艇编队在无停泊设备和无防御设施的海湾内临时停泊的防御和勤务问题。

锚地集训前,我在全基地舰艇长以上干部会上,作了“在现代条件下锚地防御与锚地勤务组织与实施问题”的报告,讲了锚地防御、锚地勤务和锚地航行规则等问题,为锚地集训做好理论准备。会后,基地司令部和各编队结合任务进行了研究,制订了具体措施。

由于指战员吃透了理论,加强了实际中运用的研究,有针

对性地采取措施,较好地保证了集训效果。以后,我在旅顺基地的几年中,每年都要搞一两次这样的锚地集训。

1959年初,海司赋予基地编写条令、训练大纲和教材的任务。这是事关海军训练走上正规化的大事。基地党委决定让我负责。我一点也不敢马虎,立即组织成立基地条令、教材编写委员会,成立相应的编写组织。经过全体编写人员的努力,圆满完成了任务。编写或修改共计40余种条令、训练大纲和教材,受到海司领导和部队的好评。

核心战斗部队

基地处于国防前哨,加之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形势紧张,各项工作都以战备和训练为中心展开。每年基地都以实战为背景组织各种战备演习,如海岸防御、反突然袭击、对海对空防御演习等,战备训练任务很重。与此同时,进行护渔斗争,确保国家海上渔业生产安全,也是基地日常战斗活动中的主要任务。

基地所在的黄海海区,是我国的重要渔场。每年渔汛,河北、山东、辽宁等省的渔船,都要成群结队来这里捕鱼。可是,我们的渔船经常受到日本、韩国渔轮的侵犯。1958年6月,由于日本岸信介政府的破坏,我国政府宣布:中日渔业协会签订的《在黄海、东海海区捕鱼协定》到期作废。然而,日本对此没当回事,他们的渔轮仍蛮横无理地到我海区捕鱼,甚至有意破坏我渔业生产,还伺机侦察我军事情报。

当时,日本渔轮多则200艘左右,少则60至80艘,经常侵入我渔区捕鱼,并依仗其渔轮速度快、体积大的特点,和我渔船争夺中心渔场。日本渔轮活动方式很狡猾,常集中一批

渔轮,在我渔船作业区横冲直撞,多次发生有意碰撞,毁我渔船渔具,影响我渔业正常生产。同时,我们陆续发现,一些日本渔轮经常在夜间向我沿海接近,有时竟偷入我军事警戒线和领海线以内活动,并使用雷达、照相机进行侦察活动。韩国李承晚政府有时也出动舰艇,骚扰和破坏我渔业生产。黄海海面的护渔斗争,形势紧张。

为打击日、韩的挑衅活动,保障我渔业生产安全,基地决定,以控制黄海以北渔场为主,按照大连、旅顺水警区的海区分界线,划分两个护渔区域,大连水警区指挥护渔任务的首长和机关人员常驻海洋岛,直接指挥驻岛的护渔舰艇。渔汛期间,在主要方向保持一定的巡逻兵力,注意情况通报,加强与地方治安和水产部门的联系。

在护渔的具体方式上,没有严重情况时,采取护渔舰艇在港内值班的方式,发现可疑情况,立即出海处理。或者在作业渔区附近,以巡逻结合训练的方式,一边训练、巡逻,一边护渔,发现情况,则停止训练,及时处理。再就是基地的捕鱼船,随同地方渔船一起作业,一边作业,一边护渔,发现情况,停止作业,及时处理。情况紧张和有其他必要时,派出舰艇随渔船一起进行伴随护渔。同时,加强渔船本身的防御组织。采取夜间渔船集体靠近领海线锚泊,每个作业区派出几艘性能较好、武器装备较强的渔船,担任自卫巡逻,以解决我护渔舰艇少与海区宽大、作业渔船多的矛盾,弥补了我护渔兵力的不足。

根据国家护渔政策和中央军委关于护渔斗争的指示,我们依照有理、有利、有节的指导思想,区分不同情况,研究具体的处理原则。对纯以捕鱼为目的,侵入我军事警戒线、军事禁航区、禁止机动渔轮拖网区不远的日本渔轮,我舰艇发出信

号,令其退出。经我方警告退出者,不应拘捕;不听警告者,则可予以拘捕。对日本不法渔轮侵入我禁区进行侦察活动及破坏我渔业生产,使我方渔民遭受损失者,或经我方警告而不理睬者,可以拘捕。对情节严重,经我方勒令其停航仍拒令逃窜者,在有理有利的情况下予以追捕。拘捕日渔轮后,及时上报拘捕时间、地点及日渔轮船名、船员数目、船长姓名、属何公司、拘捕理由、日渔轮拘捕后的表现,并令船长在承认侵入禁区的证件上签字。对被捕捉的日本不法渔轮,禁止改装和移动、动用船上的设备,但其雷达、通讯器材、照相机应予查封,连同船员一起交地方公安部门处理。拘捕时,对方不先向我射击,我方禁止打枪(炮),以避免伤及日本渔民;不准搜日本渔民的腰包和动用船上或个人的任何东西;态度要好,在生活上予以照顾,并派人做政治工作。

基地还对参加护渔的所有指战员进行考试,使官兵熟悉护渔斗争的方法、政策和原则,并协助水产部门,教育我方渔民严格遵守海上捕鱼的各项规定,使护渔斗争有所遵循,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和海洋权益。

组建基地核心战斗部队的想法,是我任职快两年时产生的。旅顺基地是国防前线战略要地,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形势不稳,时有敌情出现,而基地部队担负着较繁重的护航护渔、巡逻警戒、防险救生及重大节日的战备安全等日常勤务,部队的战备训练存在着时间保障不够和重点不突出等问题,一旦有事将难以应付。

经过反复思索,我逐渐形成了一个想法:要应付突然事变,基地必须保持一定的突击力量;这支部队以战备为主,适当减少日常勤务,有情况时,能很快做好战斗准备,遂行较远距离的机动作战。

1960年2月,在基地军政工作会议上,我正式提出了组建核心战斗部队的意见。3月下旬,基地党委举行全会,讨论作战和安全问题,在研究防敌突袭措施时,进一步研究了组建核心战斗部队问题。全会最后确定:由一个护卫舰大队、一个鱼雷艇大队、三艘潜艇、一个巡逻艇中队、三个岸炮连、三个高炮连、一个工程兵连和训练团一个中队,组成基地核心部队。同时确定了核心战斗部队的战备等级:一级战备,干部全部进入指挥所,舰艇部队接到命令后能立即出航;二级战备,首长值班,处一级干部进入指挥所,舰艇部队接到命令后一小时能出航。三级战备,加强值班,舰艇部队接到命令后三小时能出航。

基地要求核心战斗部队必须加强战斗训练和战斗作风的培养,保证齐装、满员、全训,一般不轻易调动人员和物资备品,以便随时执行战斗任务。同时,还要求核心战斗部队的每个成员,必须树立高度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不仅要始终保持高昂的战斗意志,具有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战斗作风,而且要戒骄戒躁,虚心好学,谦虚谨慎,团结友邻,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在完成各种任务方面,成为基地部队模范。

核心战斗部队的建立,加强了基地战斗力,使基地防敌突袭的措施得到了落实。

我在旅顺基地工作将近四年。这段时间,正值庐山会议错误批判彭德怀,林彪任国防部长,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反教条主义和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运动,大搞突出政治,削弱了军事训练,干部的思想比较迷惘。

我当时的想法是,基地各项规章制度刚建立起来,虽然是在学习苏军基础上搞的,但要马上完全另搞一套,很不现实。旅顺基地有其特殊情况,快艇、潜艇、护卫舰艇、海军航空兵、

海岸炮兵比较配套。海军合同作战有自己的规律,不能完全按陆军的一套去做。马上摒弃已有的一套,必然导致工作混乱。

我向刘昌毅司令员、彭林政委建议,不要轻易宣布现行的一套不行,确实需要改的,经研究论证后再改;希望他们决策时稳重一些,避免大起大落。他们接受了我的建议。尽管当时运动很厉害,基地的工作一直比较稳妥。

这个时期,正值搞“三面红旗”、“大跃进”和“大炼钢铁”,粮食歉收,经济困难。这给部队工作带来了许多实际困难,甚至一度出现部队副食品供应紧张、粮食不够吃的情况。由于基地党委团结一致,开展了坚强的思想政治工作,广大官兵发扬我军光荣传统,克服困难,努力工作,保证了战备训练任务的顺利完成。

1960年7月,刘昌毅调离旅顺基地,奉命筹建北海舰队,军委任命我担任旅顺基地司令员。同年8月1日,海军北海舰队在青岛成立,军委任命我为北海舰队副司令员兼旅顺基地司令员。

第十章 创建第七研究院

“尚方宝剑”

1961年8月14日,周恩来总理签发命令,任命我为第七研究院院长。这是我工作人生的又一次重大转折,从此,我与国防科技发展和武器装备建设也结下了不解之缘。

早在建国初期,尤其是抗美援朝之后,我国加强了武器装备建设。50年代末,在总结第五研究院尖端武器研制经验的基础上,上下达成了共识:在经济和科技实力都很薄弱的情况下,只有集中科技力量,组成国防科技的“主力兵团”,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用在刀刃上,才能迅速突破技术难关。

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国际上,超级大国加紧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苏联单方面撕毁协定、撤退专家、中断了成套设备材料的供应。国际形势的日益恶化,迫使我国加速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国防科技的进程。

1960年底,中共中央决定,组建航空、舰艇、电子技术三

个研究院。1961年6月7日,中央军委正式下达了组建舰艇研究院的命令,番号为“国防部第七研究院”。从此,揭开了我国舰船科学研究发展的新篇章。

坦率讲,来七院之前我顾虑很大。

1961年7月,在大连疗养的总政副主任徐立清告诉我,军委决定成立几个研究院,院长由聂荣臻元帅亲自选调,总部也帮着选。同时问我:“让你去七院工作,行不行?”

我有些意外。当时想,科研工作前景广阔,很有干头;但是掂掂斤两,自己这方面知识太少,很难干好。再说,换一个全新行当,从头干起,肯定困难重重,不如仍在海军干,比较熟悉和顺手。经过慎重考虑,我表示:对科研工作不了解,我去不太合适,请考虑我的实际情况,反映我的意见。

当时,七院的院长人选还有第三兵团司令员曾绍山等人。在征求曾绍山意见时,他态度很明确:文化低,干不了。曾绍山也同我谈起过这件事,认为我干比较合适。我说不行。但过了不久,他大概听到新的情况,对我说:“你还是可以的,看来不去不行了。”果然,1961年12月11日,国防部转发了几个月前周总理签发的任命,接着海军司令员萧劲光、政委苏振华分别找我谈话。

我感到国防科研责任重大,担心水平低,工作受损失,还是提出:“干不了,请上级再考虑。”

最后答复:“非去不可。”

我服从命令。心想,这回豁出去了。

到了七院,发现困难比想像的还要大。一个现代科研机构,必须有一套优秀的管理人员。可七院的院、所领导和机关人员,大部分来自陆军和工业部门,大多不懂海军武器装备;在科研管理方面,我们基本上是一群“新兵”。

聂帅一直很关注七院的工作。当时,聂帅任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和国防科委主任。我第一次向聂帅汇报工作。这之前,还没见过聂帅,他也不认识我。我坦率地谈到:自己和一些干部不懂科研,担心搞不好工作。聂帅口气坚定而恳切:“下了命令你们就得干,就要下决心把工作干好!你们既然能组织指挥部队打仗,只要认真学习,也就能组织全院搞好科研工作。”聂帅又说:“你们这些行政、政工干部,就是要把领导工作、政治工作、组织计划工作和后勤服务工作搞好,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保障他们在第一线攻克技术难关。一切工作要为科研工作服务,为科技人员服务。”

聂帅一席话,使我深受鼓舞,增强了搞好工作的信心和决心,至今回想起来,仍言犹在耳,难以忘怀。

中国近代史上,海军舰艇的研制,几乎是一张白纸。清政府虽然建立了海军北洋舰队,但装备基本上是从西方国家购进的洋船洋炮。国民党时期,海军舰艇也都来自国外,属“万国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保卫海防,从苏联“转让制造”了一批急需的舰艇和武备,奠定了人民海军发展的基础,但舰艇研制仅仅开始着手筹划。

当时,七院建设的当务之急,是选点建立科研基地、选配科技专业和管理人才。

七院当时由以下单位组成:三机部九局船舶产品设计院;三机部与交通部共同领导的船舶科学研究所、五局五〇研究所;一机部八局的三个研究所;海军科学研究部及其第一、第二、第三研究所,造船技术研究室,海司雷达通信研究室;沈阳军区第一文化学校;广州军区守备十师机关等。这些单位,除了上海的第二、第四、第八研究所已落实了地方外,其他的连住处都没有,有的挤在工厂的车间里,有的住招待所和旅馆,

甚至还有有的住在报废的火车车厢里。由于工作缺少条件,生活也很困难,科研人员人心浮动。

针对这种情况,院党委一方面抓“扎根七院,献身科研”和“艰苦奋斗,安心安家”的思想教育,一方面带领全院人员,自己动手,创家立业,建设基本的科研和生活条件。

七院组建时,正逢国家经济困难。当时,三军武器装备的发展,是按陆、空、海的次序,海军排在最后面,短时期内不可能有大的投入。而形势发展又要求必须加速海军装备研制,研究机构也必须加紧建设。

出路何在?反复研究后,我们确定了“以补缺配套为主”的方针。采取利用部队和院校的营房、校舍以及工厂车间,进行必要的改建,因陋就简开展工作。同时积极挖掘院校、工厂和科研单位的潜力,大力开展协作,特别是一些缺门、弱门专业,形成固定的协作网络。对非建不可、条件又已成熟的科研试验设施,有重点地、不失时机地抓紧建设。

中央军委及三总部、海军、国防科委和国家计委等领导机关,对七院的建设给予了大力支持。聂帅也非常体谅我们建院时的困难。一次,他亲自察看我们选择的一处房子后,认为地点不理想,便给总参、总后打招呼,要求给我们调拨一批营房。很快,总参、总后就提出一批清单,让我们同有关单位商量选择。

元帅和总部的支持,如同给了我们一柄“尚方宝剑”。

我同副政委江勇为先去南京。在南京军区找到司令员许世友,表示想要南京汤山一带的营房。许世友很爽快,说话开门见山。他说,汤山一带对外开放,住保密单位不合适,那里也没有多余的房子。他主动推荐了军区在扬州的一处老式花园,有几千平方米房舍,并说,上饶也有空营房,“如果看中了,

可以无偿支援你们”。最后,我们选中了扬州,就是现在的七二三所驻地。

再下武汉。我和政委戴润生、副院长于笑虹、胥治中见到了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他们听了我们的想法后,建议选用军区所属在武汉市南湖的汽车学校和郑州文化学校的营房。这两个地方我们比较满意,便分别安排了两个研究所在那里。

又北上沈阳。找到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将军区通讯干部训练队和机械化师在大连的营房要到了手,也安排了一个研究所。

后来,又找到哈尔滨市委书记任仲夷,要了哈尔滨香坊区的一块地,还通过宋庆龄福利基金会租到了上海青海路105弄的几幢楼,落实了两个研究所。海军把武汉预科学校和南京军士学校给了七院,又安排了两个研究所。

1963年,周总理主持中央专委会议,批准组建十五研究所。我们通过铁道兵司令员吕正操,借到了北京铁道干校的两栋楼,把十五所和十四所安排在那里。

至此,七院的15个研究所总算安顿下来了,但我始终感到有些所的选址不那么理想。后来,在建设的过程中还是留下了诸多遗憾。当年军事设施建设必须遵循“山、散、洞”的方针,七院也不例外。可是从舰艇科研的实际出发,我觉得“山、散、洞”不行,如果研究所、研究室进山挖洞,几年之内,别说搞高科技,就是一般的科研也干不了,时间全都浪费在挖洞、修路上。但在当时,我也只能坚持各研究所在已定地点进行改造配套,边科研、边建设。

1962年,我主持确定了选址定点的几条杠杠:一要在工业和科技比较发达的城市,靠近有关的试验、试制工厂,便于

组织科研协作。二要有适宜发展科研的地理环境。科研设施建设对地质、水源、电源等有基本要求和特殊需要,这是百年大计,马虎不得。三要交通便利,便于组织领导和对外联系。四要根据国防科研的特性,充分考虑未来战争中的稳定性。

开始,七院的研究所大都沿长江向中游部署,定点在上海、南京、武汉一线。在我未到七院前,七院院部的建设则经历了北京——山沟——北京的反复过程。先定点在京西黄庄,都开工了,海军一位领导看后不同意,“打起仗来一个原子弹都打掉了,这里保不住。”只好搬进了密云山沟。

我到职后,进山一看,认为绝对不能在山沟里搞科研。在那里,水、电靠自己,电话不灵,道路难走,一旦下大雨,还有山洪下来,进不去,出不来。我坚持将院部搬出来。为此,专门请国防科委副主任安东、秘书长路扬等人去密云七院住地检查工作。他们看后,同意了我的意见——搬出山沟,在北京市选点过渡。

我们找时任农垦部长的王震,借到了北京双桥农垦部干部学校的房子,将院部搬去过渡。最后才定点北京双泉堡。

后来战备加紧,三线建设更强调贯彻“山、散、洞”方针。七院的柴油机、水声、水雷、指挥仪、导航、舰炮等好几个所,都在四川和川鄂边界定点建设。有的未建成,有的建成后未搬进去,有的搬进去后又迁出来,建造的房子都先后放弃了,造成很大经济损失和时间浪费。

七院二所的研究重点是舰艇流体力学和结构力学,也是我院的重点建设单位,试验研究水池建设更是重中之重。不尽快把这一舰艇研究试验基地建起来,要独立自主地研究设计海军现代化武器装备,是根本不可能的。

七院组建前,试验水池的建设已有过方案和工程准备,但

却一波三折。开始,三机部船舶工业局将其选在无锡,海军却选定北京的黄庄,以后又移址到密云的山沟,且破土动工了。

我到任后,经综合分析,觉得地点还是无锡理想。我去现场考察,觉得地点的确不错,但上级能否批准,心里没底。主要问题是无锡条件“太好”,不符合“山、散、洞”的方针。这样大的工程,选在上海与南京之间的中等城市,如得不到上级支持,根本不可能上马。

回到北京,我请主持这方面工作的副总长张爱萍去考察,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也一同去了。先请流体力学专家方文均等汇报水池方案,我介绍水池建设对发展舰艇、鱼雷、水下发射导弹等水动力学性能研究的必要性和定点无锡的可行性。得到同意和支持。国防科委负责落实计划,把七院排在六院、十院之后,名列第三。

国家经济非常困难。每年下拨给七院五六百万元基建经费,我们优先确保水池工程的实施。

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除建设深水船模拖曳水池这一主要设施外,还包括低速风洞、空泡水筒、旋臂操纵性水池、耐波性水池和爆炸试验水池共六个项目;续建工程则有水面水下舰船结构力学试验室、冲击振动试验室等设施项目。

建设中,技术要求很高,如电控精度、轨道精度、焊接技术、圆顶薄壳结构和各种特种材料,甚至连机械加工精度,几乎都成为科研课题或攻关项目。限于国内科技水平和工艺水平不高,我们组织了全国大协作,积极组织攻关,三四年内都顺利完成了。

科研设施建设是百年大计,一定要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国外有的水池长 1000 米以上,起初,我们也作了 1000 米的方案,经过充分论证,采用新技术,最后设计长度为 474 米。实

践检验,设计是成功的。在西方禁运的情况下,我们完全立足于国内,科学设计,精心施工,建成了当时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的试验水池。

无锡基地的建成,对研究开发新型舰艇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代、第二代水面和水下各型主要舰艇,都在这里进行了大量的系列研究试验,为设计建造提供了科学依据。

后来,这里又增建了出入水试验水池、减压拖曳水池和循环水槽等试验设施,并更新了一些测试设备,开展了新船型的探索 and 水中兵器、水下发射导弹技术的研究试验,保证了潜射导弹、鱼雷以及水下发射飞航式导弹等技术成功。同时,在远洋测量船和海上打捞救生船、海上补给船、海洋工程船、新型民用船舶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试验,为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

现在,七〇二所已成为我国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舰船和水中兵器总体性能的研究试验基地,成为国家级重点试验室,并在国际上享有一定声誉。1991年11月,我去南方时路经无锡,又去看了这个研究试验基地,它的成功和成果使我振奋,它走过的艰难历程,也让我感慨良多。当年参加工程建设的青年,有的已是白发苍苍,有的则英年早逝,他们为了国防科技事业,为了海军建设,贡献了自己的青春,甚至宝贵的生命。

“脱帽加冕”

创建现代国防科技事业,必须有一批优秀人才。建设舰艇研究院,发展现代舰艇科学技术,也需要培养造就一支德才

兼备的科技队伍。

七院的科研人员,多是从有关工业部门和海军所属科研单位调来的。大专以上学历的只有 1000 多人。成份新,力量弱,骨干少,专业缺门多。小部分科技人员仅接触过商船的维修和小民船设计,大部分则是解放后毕业的大专学生和一些留苏的年轻科技人员,缺乏舰船设计的实践。懂科研、会管理的行政和政治领导干部也很缺乏。

对此,我提出采取“边干边学边提高”、“创业育人”的做法,在建设中出成果,在出成果的同时,培养锻炼一支思想、业务、作风都过得硬的科技队伍。

我们以中央《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指示》、聂帅《关于自然科学工作若干问题的请示报告》和国家科委党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为依据,统一思想,明确方针政策,作为法规,认真贯彻执行。结合七院初创的实际情况,院党委制订了 73 条贯彻落实措施和《研究设计工作程序暂行规定》。

在培养使用科技人员上,我们注意排除“左”的干扰和影响。我院不少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老专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曾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戴上了这样那样的“帽子”,贴上了这样那样的“标签”。政治上受歧视,工作上使用不当,生活上待遇偏低,严重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1962 年,院党委对受到错误批判和处分的人员进行甄别复查,“脱帽加冕”,为他们恢复名誉,落实政策。

在科研保密管理上,取消原定的“人员密级”。根据工作需要和专业对口原则,规定承担什么工作就允许接触有关机密课题和借阅有关机密资料。对科研项目的密级和保密规章制度,根据实际情况作了修订,较好地解决了科研保密和工作

需要的矛盾。

我们还批准一批科技人员参军,授予军衔。许多科技人员成了人民解放军的校级军官。对年龄过大,不适合授衔的,就给予技术行政级待遇,担任相应领导职务。如造船专家、一级工程师萨本炘,被任命为院技术顾问;老专家方文均、袁随善、沈岳瑞、蒋承勋、时飞等,也都安排担任了所级技术领导职务;对过去改行的技术人员,安排专业归队,使他们继续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对有组织领导才能的科技人员,打破军衔级别的限制,不拘一格,大胆提拔,将 120 多名技术干部选拔到研究所、室领导岗位上,使之有职、有权、有责,充分发挥他们在科技领导管理方面的聪明才智;对要求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科技人员,经党组织教育培养考察,够条件的,就及时吸收入党。

对一些从国外回来的老专家和有争议的技术骨干,坚持“充分信任、大胆使用、热情帮助、严格要求”。我同戴润生政委等领导,一个个了解情况,同他们促膝谈心,交知心朋友,并做好本人和所在单位的工作,使他们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工作、生活环境宽松了,心情也舒畅了。一些老专家感动地说:“现在是头轻、肩重、腰杆硬,万事俱备,就是一个‘干’字了。”

我们在实践中注重培养锻炼青年知识分子。1962 年七院召开第一次科技会议,对培养青年知识分子,我提出了五条具体要求:一是必须与当前任务和长远发展规划相结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以岗位为阵地、以任务为目标、以本专业的基础知识为重点,边干边学边提高”。二是必须贯彻分级负责、层层抓的原则。三是建立明确的奖励制度和考核档案。四是重点培养,因材施教。五是聘请一些地方高等院校有学术素养的教授来授课、指导或当顾问。

我们还针对各类不同人员,提出了不同的培训和学习要求。如大学毕业工作五年以上的,要亲自参加课题研究,结合业务自学,扩大知识面,能在专业研究和 development 上提出独立见解;刚毕业的大学生、中专生坚持入伍训练,重点练好基本功,扎扎实实打基础,参加短期培训或上夜校,掌握一门外文等等。三年中,有 2000 多人上舰和参观实习,近 1000 名科技人员下厂参加仿制生产。当时还规定,在检查工作和考核干部时,必须检查和考核学习成效。在我们的提倡和引导下,七院掀起了学习高潮,在院直、在各研究所,清晨经常可以看到科技人员认真早读;晚上,办公室和研究室里灯火通明,许多人学到深夜。

七院建院初期,各研究所的技术人员大都是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年轻的二五六岁,稍大一点的也才 30 岁左右,他们生气勃勃,埋头苦干,在实践中摸索、锻炼、成长,思想素质和技术素质提高很快,不久就独立担负起学科专业的研究工作,在研制驱逐舰、核潜艇和远洋测量船工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人成为各方面的技术中坚。

认真抓好科技队伍的专业配套,调整好科研设计人员与辅助人员、试制技术工人的结构和比例,是我们加强科技队伍建设的重要环节。七院组建初期,专业技术人员非常缺乏,我们向海军、高教部、国家计委、国防科委和聂帅都写过报告,请求每年拨给一部分大学毕业生。开头前四年,我们共接收大专以上毕业生 6000 多人,重点充实了缺门专业和力量薄弱的研究所、室。

为加强试制力量,我向聂帅申请调进一些工厂优秀技术工人,得到了聂帅批准。仅 1962 年,就从各工业部门选调四级以上各种技术工人 900 多人;随后又接收上海、天津、无锡、

扬州、郑州等地的九家机电、仪表工厂,共计 1500 多人,形成了七院最初的试制力量。

行政、后勤保障和政治工作队伍,也逐步充实起来。除成建制单位调进的干部外,还从海军基地、院校选调了一批舰(艇)部门长、舰(艇)长、支队长、教研室主任和政委等,组成所、室领导班子。对调进的所以上干部,我和戴润生政委都一一谈话,讲任务、讲工作对象、讲科研单位的特点,要求他们坚持以科研为中心,为科技人员服务,围绕中心,保证中心,服务中心,学会科研管理,为出成果、出人才作贡献。

1965 年“部院合并”。这时,七院已发展到 15 个研究所、187 个专业研究室、12 个试制工厂、1.6 万多人,初步形成了舰艇科研设计体系。各研究所的专业设置也基本配套,分别承担了舰艇总体、舰用动力、特辅机、防化设备、鱼水雷、舰炮及导弹发射装置、作战控制、计算机、雷达、电子对抗、通信、水声、导航、光学精密机械等系统设备,以及舰船水动力学和舰用材料的研究设计工作。

我离开七院后,专业和机构虽有调整,但保持了基本力量,并随着核潜艇、驱逐舰以及远洋测量船队的相继展开研制,又有新的发展。如今,七院已经拥有国内先进的科研试验设施和较强的试制力量,形成一支规模较大、专业配套设施齐全,并具有较高水平的舰艇科技队伍。

仿制人手

关于七院的研究任务和工作方针,1961 年 5 月 5 日军委办公厅正式下文,传达了军委有关批复。

军委批复中,对七院的任务作了明确规定,以核潜艇工程

为重点,实现造船规划所规定的各型舰艇及其配套设备的研究、设计、试制、定型工作,直接为海军建设服务。同时,根据军民兼顾、军民结合的原则,以一定的力量担负民用船舶的研究设计工作。

批复中说:“在目前,舰艇研究院的研究工作方针是:集中一切力量,首先完成‘二四协定’转让产品的仿制任务,并通过仿制,掌握和消化苏联转让的技术资料,培养和锻炼技术力量,逐步形成较完整的造船科学研究体系,为自行研究设计新型舰艇打下基础。”

批复中所说的“二四协定”,是指1959年2月4日中苏两国签订的《关于在中国海军舰艇制造方面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援助的协定》的简称。根据这个协定,苏联政府同意向我国有偿提供五型舰艇(常规动力导弹潜艇、中型鱼雷潜艇、大型导弹快艇、小型导弹快艇和水翼鱼雷快艇)及其设备的技术图纸资料,部分舰艇的设备,导弹样品,以及向中国转让这些项目的制造特许权,并派专家来华指导。

批复明确了七院的任务要求和长远目标,成为我们工作的基本指针。

我到职后,尽快带领大家展开科研,是我工作的重中之重。

可是,在安排新一年科研工作计划时,问题一下子冒了出来。七院的各研究所、室是从各方面调整集中到一起的,都带来了原来承担的任务,包括“二四协定”的几乎全部仿制内容。而这时,苏联已经撕毁协定,撤走了全部专家。我院科技工作面临的形势相当严峻。

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当时,部分科技人员甚至领导干部,在“大跃进”、大搞尖端技术的热潮

下,心劲儿极高,只想干新技术,干高科技武器装备,对当时急需解决的“二四协定”的产品却不热心。因此,计划中,尖端常规一齐上,近的远的一把抓,战术武器与战略武器、仿制产品与新产品研制并驾齐驱,进度过急,指标过高。

我感到这些计划虽然雄心勃勃,但有些脱离实际,也和上级精神不一致。

调查中我了解到,几型舰艇的研制、仿制和一些必要的基本理论研究项目,共计有 9000 多项,而实际落实的仅有 30%;重点项目安排落实的仅为 47%。一些基本理论的研究项目落实得更差:流体力学与结构力学共 14 项,具备开展工作条件的仅有四项;新材料研制有 200 多项,能安排的还不到 50%;同时,还有两个重点仿制型号 10% 的材料没有着落。

科研人员也存在两种偏向:一是不愿意搞仿制,认为仿制主要解决工艺问题,是工厂的事,而研究院只需要搞研究设计;一是局限于搞仿制,忽视仿中有改、仿中有创,甚至连可以创造条件开展的基础研究和新技术的研究探索,也不抓紧去搞。前者是“欲速则不达”,后者是“把手段当目的”。

经过分析,院领导形成了共识,首先从贯彻落实方针抓起,统一思想,调整任务,缩短战线,明确重点,把完成“二四协定”产品的仿制作为当前的中心工作,通过仿制,提高自行研究设计的能力。

1962 年,在七院第一次科技工作会议总结时,我明确提出了需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的几个问题:

首先,“必须搞仿制”。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科学技术水平和工业基础薄弱的国家,要在短时期内赶上世界同等水平,仿制是一个必然经过的历史阶段,是一条应走的捷径。完成仿制任务,一般要经过图纸资料的学习、消化、生产性试制、产品

的性能改进四个步骤。“只有扎扎实实地完成上述四个步骤的工作,才能把仿制产品中国化,为仿制产品中国化改进和自行研究设计打下基础。”

其次,“仿制必须与修改、代用相结合”。材料资源和工业基础以及使用环境不同,在我国进行仿制,必然遇到不少问题。对国内一时不能按技术标准解决的材料设备,要经过试验研究分析,实事求是地进行修改代用,以缩短生产周期,尽快拿出产品,装备部队。

第三,“仿制必须与研究、设计工作相结合”。国防科研工作,必须走独立自主的创造性发展道路。在保证仿制工作正常运转的同时,必须组织一定力量,进行自行设计研究工作。仿制和研究设计不能够机械地分开,应相互借鉴,相互促进。

第四,“仿制必须与基础建设相结合”。要注意搜集设计计算方法,积累研究试验数据和基本研究资料,搞好标准化工作,有计划地补齐和建设试验设施。

第五,必须明确与工业部门的分工协作。中国舰艇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完整地、正确地遵循从仿制到中国化改进、再到自行研究设计的步骤。这是概括了前段实践的经验提出来的。

新的认识很快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迸发出巨大的精神力量。

随后,全院集中 65% 的科技力量,投入了“两艇一雷”和“两艇一弹”的仿制工作。“两艇一雷”,是指鱼雷快艇、鱼雷潜艇和鱼雷;“两艇一弹”则指导弹快艇、导弹潜艇和舰用导弹。仿制中,着力解决原供图纸不全、设计中存在的技术问题;原设计不符合我国生产、材料和使用特定条件的问题,要研究改进。在消化吸收和试验验证的基础上,解决仿制中的技术问

题,同时进行补充配套设计、技术协调、测绘和大量的研究试验工作;并配合工厂加工、装配、总装和总调,解决施工中的技术问题,直到全部国产化和批量生产。

1964年3月,我们终于完成了五种型号战斗舰艇的仿制任务,解决了海军舰艇武器装备从无到有的问题,满足了海防斗争急需,对海军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我们还对仿制的型号作了重大修改。“21”快艇的改进重点是提高了武器系统的功能;“23”快艇改型为钢壳,提高了航速,解决了仰角过大影响导弹及时发射问题,改善了操纵性;“33”潜艇总体装配、机械和电器安装等方面的重要技术改进有近百项,后又加装了飞航式导弹和水面发射装置;“31”潜艇的导弹系统全面修改后,作为发射潜地导弹的试验艇,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阶段,我们对鱼雷、舰炮、指挥仪、导弹发射装置等武器系统,也组织了技术攻关。在仿制生产“53—39”鱼雷时,困难重重。当时国内鱼雷厂还在搞基本建设,短期内很难建成。为满足国防需要,1963年9月,我确定利用第五研究所的技术力量,改造充实简陋的加工厂。没有鱼雷图纸资料,我派人去旅顺基地,将大修鱼雷的图纸拿来参考,对照着苏制“53—39”鱼雷测绘,就这样蚂蚁啃骨头,勾画出了生产工艺图纸。又经上千次的反复试验,1965年终于试制出了样雷,并完成海上试验,宣告了中国第一条鱼雷研仿生产成功。

同年10月,第十三研究所攻关研制的双57舰炮第一代样炮,也在靶场打响;1968年7月装上了猎潜艇;1976年5月批准定型。同时,机电式和数字式两种指挥仪、导弹发射装置,也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攻克了众多技术难关,先后研制成功。

1963年,在院党委全会和第二次科技会议上,对今后两年和“三五”、“四五”任务的安排,结合过去的情况,我提出了必须正确处理的几个关系:一、正确处理近期任务与长远任务的关系,远近结合,以近为主。二、正确处理军用与民用的关系;贯彻“军民结合,以军为主”的方针。三、基础研究与产品设计相结合;在保证仿制和产品设计的同时,重视开展基础研究工作。四、妥善解决先进性与现实性的关系。五、正确处理继承性与创造性的关系。

在实际工作中,我反复强调一个基本观点:“对于不同性质的任务,既要有所区别,又应紧密结合;在研究设计工作的安排上,既要保证重点,又要照顾一般;既要抓住当前,又要照顾长远;既要分阶段、分步骤,又要相互穿插,紧密衔接。”可以说,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是我们完成仿制任务的重要工作思路,是实现由仿制到自行研究设计过渡的一条基本经验。

自行设计

我们在完成仿制任务的同时,组织一部分力量,不失时机地开展了中小型舰艇和万吨轮的自行研究设计,相继研制出港湾扫雷艇、小型登陆艇、“东风”号万吨轮、3000吨油轮、3000吨打捞船以及护卫艇、反潜护卫艇和护卫舰。特别是护卫艇,多次参加海战,屡立战功。在1965年的“八·六”海战和东海“崇武以东”海战中,该艇和鱼雷快艇并肩作战,击沉国民党“章江”、“剑门”号护卫舰和护航炮舰“永昌”号,击伤大型猎潜舰“永泰”号;涌现出了“海上英雄艇”、“猛虎艇”、“先锋艇”这样的英雄集体,一度成为海军护卫兵力的主要舰艇,被赞誉

为“怒海轻骑”。

反潜护卫艇,是在海军没有水面反潜兵力情况下自行研究设计制造的,1962年下水,1964年首艇交部队使用。经训练和实战考验,证明该艇性能良好,深受部队欢迎。以后组织了小批生产和几次改进,性能又有提高。1974年西沙自卫反击作战中,两艘该型艇击沉敌一艘护卫舰、击伤三艘驱逐舰,立下战功。

1962年,南海形势紧张,急需中型水面舰艇。按海军要求,七院立足国内现成的武器设备和材料,在短期内研制了“65”型护卫舰。该舰1966年交付部队。使用证明,该舰设计较成功,质量可靠。通过该舰的研制,七院摸索了自行研究设计的相关技术和组织实施的可行方法,为后来导弹驱逐舰的设计建造,积累了经验,创造了条件。

与此同时,我们抓紧了核潜艇、中型驱逐舰和新型常规潜艇等的预先研究。这种有型号任务作背景面进行的应用技术研究和关键设备的前期技术开发,是上新型号的技术基础。

我到七院后,曾几次提议上驱逐舰工程项目。虽然这一项目1967年才正式批准,但预研工作早已开始。该舰有700多种材料和1000多台(套)设备,全部立足于国内。新研制的设备有100多项,由全国十多个部委、22个省市、数百家厂(所)和院校大协作。许多重大技术装备如三坐标雷达、情报中心、电子战、舰炮系统、声纳等等,均属国内首次研制。

核潜艇的研制设计是从1959年开始的。当时先由海军修造部核潜艇总体组提出了方案的构思。后来由于国家暂时经济困难和科研力量不足,1963年3月,经中央专委批准,决定先集中主要的技术骨干力量,重点对核动力、艇总体等关键项目进行研究,待国民经济有了明显好转时,再全面展开。

我国核潜艇、驱逐舰的研制,直到定型、形成战斗力,始终是我关注和用力的重点,几乎耗掉了我最好的年华。

回顾在七院的四年多时间里,全院上下艰苦奋斗,边组建边开展研究,不仅完成了创建任务,取得了一系列科研成果,而且初步形成了一支专业比较齐全的现代舰艇科研设计队伍,为建立设施配套的现代舰艇科研体系打下了初步基础;完成了“二四协定”特别是“两艇一雷”、“两艇一弹”仿制任务,实现了由仿制向自行设计的过渡,开展了新型常规潜艇、新型护卫舰、驱逐舰和核潜艇的预先研究,摸索了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舰船科研的路子。

作为七院院长,我深深地知道,七院的建成和所取得的科研成果,主要是上级的正确领导和全院人员团结奋斗的结果。作为我个人,是一个重新学习,在实践中探索科研规律,逐步学会干科研、管科研的知识积累过程。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要干好科研工作,必须适应科研工作的特点建章立制,以法管科研;必须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大力协同;必须艰苦奋斗,实事求是,积极发展;必须自力更生,以我为主,掌握发展的主动权;必须以战斗力为标准,成套研制,设备先行;必须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充分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这也是我在领导科研工作中的一点心得体会。

“部院合并”

1964年11月,中央决定国防科研设计部门与国防工业部门合并。1965年1月1日,七院并入了第六机械工业部,我任六机部副部长兼七院院长。5月30日,正式办理了合并移交手续。

坦率讲,对当时的“部院合并”,我认为是一次决策错误。

一般来讲,撤销或合并一个单位,这个单位的主官可能会有感情上的惋惜,从而影响判断力。我当时不同意合并并非由于感情因素的影响,而是反复思考后,觉得弊大于利。

尽管我的发言权有限,但在这一决策还在酝酿的过程中、在中央没有正式形成决议的时候,我还是作了积极努力。我和七院的几位领导,用集体的或个别的、会议上或会议外、书面的或口头的多种形式,多次向有关领导机关反映不同意的意见,陈述理由。

1964年9月11日,国防工办召开会议,讨论贯彻战略方针、加强三线建设的问题,我利用机会,讲述了七院不宜合并的理由:

主要是“当前生产与科研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不是影响生产与科研体制的根本问题”,科研体制调整,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采取千篇一律的办法”,“设计工作与研究工作密切结合,不宜放在工业部门;施工设计与生产联系密切,放在生产部门较为有利”。七院目前除担负基本的科研工作外,还担负着使用部门和工业部门的部分研究任务,既要搞船舶原理、舰体研究设计,又要搞各种武器装备、舰船配套设备的研究设计,与地方多个工业部门对口,不宜合并到一个工业部门。“舰船是一个整体,所有技术研究工作,必须有一个统一机构来组织协调”,七院合并到六机部势必与其他工业部门发生横向交叉,影响工作正常开展。“科研机构的一些重要东西要集中起来,形成拳头,以突出尖端,解决技术问题”等等。

9月18日,国防科委召开各研究院领导人会议,座谈关于“部院合并”问题,我又针对当前体制“科研影响生产”等说法,谈了我的不同看法。有人不同意我的意见,举二机部为

例,说可以合并。我说,“二机部的工厂实际上是试制厂,合起可以,以科研为主”,每次产品只一二个;其他部门就不一样了,要批量生产。“工厂考虑的,是生产和施工工艺问题,它考虑不到新型号的研究设计。科研单位与生产部门合并,既无助于解决工厂的工艺设计问题,又不能解决科研单位的试制加工条件。科研、试制和加工全都放在工厂,也有一定困难,会打乱它的生产线。”我也举例说,“如柴油机厂有一套试验设备(试车台),是为生产服务的,科研单位要挤用,两家肯定有矛盾;而在科研中,单缸试验、单机试验要经常做,工厂无法完全配合,所以,科研单位合并到工业部门,也得各建一套试验设施。”我强烈建议,七院刚开始发展,还未形成拳头,“还是再搞一个阶段好”。

我们的呼吁并未引起广泛关注。但我坚持认为这是一个大的决策,不应该失误,我要尽到自己的责任。

我去找罗瑞卿总长,想当面向他汇报,却始终未能如愿。我不甘心,多次找他。后来,他派金子谷秘书听我讲了情况和意见。罗总长听了秘书汇报后,认为我讲的七院不宜合并有道理。

我又找了六机部部长方强,对他讲:“七院并到六机部,你这个部长不好当,也不好管。舰艇研制工作牵涉到国家这么多工业部门,你下通知,人家不理你,不好办。”

我还和戴润生找海军党委汇报,海军司令员萧劲光、政委苏振华、副司令员刘道生等海军党委常委都出席了。事后,海军党委上报了《关于海军装备研究工作机构问题的建议》,反映了我们的意见。

可是已经晚了,“部院合并”已成定局。

1964年11月18日,在我们提议下,六机部和七院党委

联合向上提交了“建议采用将七院整体与六机部合并,七院要担负的任务,全部由六机部承担的方案”。说明这将有利于完整地保存七院现有力量和今后发展,不会在合并中拆散、分散和削弱现有力量,且变动小,合得较快。存在的一些问题,有些与兄弟部门对口的科研机构 and 工厂,例如火炮、鱼雷、水雷、水声、汽轮机、舰载导弹等,如何更好的解决,“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和调查研究”,“再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最后,这些意见被上级采纳。这是合并工作进展比较顺利的重要原因。

我只有认真执行上级决定。11月19日,七院召开党委全会,传达贯彻中央的决定。我强调,一定要按级负责,做好合并工作。保证人心不涣散,力量不拆散,供应不断线,工作不滑坡。尽管人员思想波动较大,还是顺利完成了合并工作。

12月25日,我们拟制《第六机械工业部第七研究院今后工作方法的初步意见》,提出了“部院合并”后七院的任务,研究设计和试制任务的承接、委托与鉴定,七院与部属工厂的工作关系,七院与部各司局的工作关系,关于情报与标准工作的管理分工办法等一系列建议,基本上都被部里接受。

这次“部院合并”后,为防止削弱科研试验,国防科委不得不重新安排国防科研的分工和工作方法,做了不少补救工作。刚刚稳定下来,又要实行“厂所合并”,再度造成人心浮动和工作上的不利影响。

我很焦急,向国防科委汇报了我的忧虑和意见。聂帅同意我的想法。1966年2月11日,聂帅上送了《关于国防科研单位不宜搞厂所合并的意见》。

主张“厂所合并”的,仍然是“部院合并”的那些理由,是那个思路的继续。聂帅在《意见》中都一一据理力驳。聂帅讲:科研必须面向生产,结合生产,“但结合的途径很多,并不是非

将这些国防研究所合并到工厂不可。合起来究竟对战备、对我军装备的现代化与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是否有利,需要深入调查,慎重考虑”。

聂帅从五个方面阐述了不宜搞“厂所合并”的理由,最后说:“毛主席提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把科学实验作为一项革命运动提出来,是有极其深远的伟大意义的。国防科学技术多年来走过的道路证明,要真正自力更生,实现国防现代化、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必须加强科学实验”。“这两年由于各种干扰,吹冷风,体制一变再变,很不稳定(民用工业部门反而稳定得多),后果如何,我很担忧!”办任何事情,一定要深入调查,听取各方意见,权衡利害得失,经过深入研究后提出意见,不能草率从事!

看到聂帅的《意见》,周恩来总理2月18日指示:“请赵尔陆同志告各部,暂停厂所合并,并将各部主张合并的理由和程序见告,以便处理。”

很遗憾,“文化大革命”来势凶猛,领导机关受严重冲击,指挥不灵了,总理的批示没有落实,合并的势头也没完全控制住。国防科研力量更加分散了。

庆幸的是,七院没有搞“厂所合并”,各配套专业比较完整地保留下来;舰船科研工作,也保持了系统工程的模式进行,组织技术攻关和协调。

后来,又几次有人提出拆散七院,搞“厂所合并”。到了20年后的1986年2月,我又听说七院要解散,赵紫阳还画了圈。当时,赵紫阳是党的总书记、军委副主席,我是海军司令员。我专门找了赵紫阳,汇报我的想法。着重说明,解散七院对海军建设不利,对科学技术发展不利。我讲了一个下午,他也耐心地听了一个下午。最后他说:“你讲的有道理,撤销不

好。让经委主任吕东去调查研究一下,听听各方面意见。”于是,七院又保留下来。

几经波折,七院走过了近40年的发展历程。在七院纪念建院40周年时,我专门致信祝贺。面对七院今天的发展,回想当初创建的艰辛,我深感欣慰和自豪。

时过境迁,实践进一步丰富了我们的认识。用现在的眼光看,如果当时研究院能稳定几年,有些院不实行“厂所合并”,而发展成科研——生产联合体,会更有后劲,更有竞争力,更有利于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增强我国海防乃至国防实力,同时牵动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

第十一章 当聂帅助手

“文革”受冲击

国防科委的前身,是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1956年成立,负责领导导弹和飞机的研制工作。1958年改名为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统一领导国防科技工作。

1966年8月,我调任国防科委副主任。

头一年,因“部院合并”,我到了六机部,任副部长兼七院院长;不久就去了湖北武汉参加“四清”运动。1966年5月,上级通知让我做好到国防科委工作的准备。6月份,我回京汇报“四清”运动情况,抽空看望了聂帅。聂帅说:“你还是到国防科委工作。命令怎么下,我去跟林彪商量,估计林彪那里没什么问题”,并让我抓紧结束“四清”工作。8月初,我回到北京。这时,六机部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已闹得不可开交,大字报铺天盖地,几个部领导正在受批判。我正好赶到点上,也一起挨批。

一天,国防科委副主任钟赤兵给我来电话:“聂总同意;向

林总报告了,林总也同意,你到国防科委任副主任。赶快来吧。”

当时,聂帅兼着国防科委主任,副主任有钟赤兵、罗舜初、唐延杰、路扬、张震寰,我去了后,又来了蔡顺礼副主任;张爱萍副总长也兼副主任,但已被打倒了。

这次算是提升。周围的领导一个个被打倒,我却升了官。能在更高的位置为国防科研做一点事情,同时还能躲开六机部革命群众的批判,我暗自庆幸。

然而,这种想法委实过于简单了。报到后才发现,国防科委也不是避风港,副主任的位置已变成一块烧红了的钢板,用不多久就可能把我烤焦。

国防科委所属 11 所高等院校的师生串联来到国防科委造反,在北京设立了联络站,并在国防部南门和北海附近的三座门安营扎寨,大有荡平国防科委之势。

而这时,国防科研试验任务很重,特别是“两弹”试验任务,更是迫在眉睫。

当时的窘境,从国防科委的一份报告中可略见一斑。报告说:

“根据萧(华)主任指示,国防科委应集中力量、集中精力搞好国防院校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国防科委机关已集中了主要力量,加强了院校文化大革命的接待工作和检查组错误路线的工作。但当前主要的困难是,科委几位领导同志分别陷入院校师生的具体批斗中。钟赤兵同志主要在和西电学生澄清问题和检讨;罗舜初同志已停职反省,答应北航‘红旗战斗队’随叫随到检讨错误;路扬同志除哈工(原军工)学生经常找其辩论问题外,还要主持清理过去院校教育方面的工作及军委办公厅的工作。其他领导,唐延杰、张震寰同志都在外

边抓勘察试验。所以,目前对院校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力量非常薄弱,许多主要问题不能及时通盘研究解决。这对院校接待工作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报告”恳求上级“更多地给予帮助和指导”,请全军文革小组成员“李曼村、谢镗忠直接对我们帮助和指导”,并“请总政督促刘华清迅速到职”。

到任后,我最先接手的工作是接待串联的师生。

凭心而论,对“文化大革命”,我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闹不清到底要革谁的命?先是揪出了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后是打倒“彭、罗、陆、杨”,接踵而来的是“刘、邓、陶”被打倒。发展到后来,只要是领导,几乎没有不挨批受整的,似乎党内没有好人了。

对此不解的并非仅我一人。9月,国防科委召开党委会研究本系统开展“文化大革命”问题,与会的人都没有说出所以然来。

尽管如此,“文化大革命”还得深入进行下去。我分管负责院校工作的八局,虽然两眼一摸黑,也只能硬着头皮仓促上阵了。此时其他常委都受到了冲击。

为了做好接待师生工作,国防科委由政治部、院校局、后勤部和有关部局领导,组成接待组,在景山前街的三座门设立了接待站。

我到国防科委之前,北航师生揪住工作组,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此,“北航红旗战斗队”围在国防部南门,要求见国防科委领导。国防科委领导拒绝接见,学生也不撤退,僵持了28个昼夜。我到国防科委后,马上被“北航红旗”缠住;西安电讯工程学院师生也要找钟赤兵澄清问题,还要把他带到西安去。钟赤兵在长征中负伤,只剩了一条腿,还有心脏

病,身体不好。我担心他经不住折腾,一上班,就赶紧接待西安电讯工程学院师生。先是在国防部南门,后又把我弄到北工附中,轮流围攻,要求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

日子过得战战兢兢。经常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66年底至1967年初,北京航空学院、哈尔滨工程学院等院校几百名师生,又聚集在国防部南门外,架起了高音喇叭,南门交通一度受阻。学生们要聂帅出来对话,还贴出了“炮轰聂荣臻”的大字报。聂帅有心脏病,当时发作得厉害,若弄出去,不是整死他吗。聂帅不能出去,我去出面。他们把我扣在邻近南门的原航空模型俱乐部院内,整天进行批斗审问。叶剑英元帅几次派人给我传话,要我顶住,不能同意聂帅出去。后来,聂帅到西边搞试验,走了。学生也知道我到国防科委不久,解决不了国防科委的问题。但又抓不到其他人,仍对我不撒手,日夜纠缠。晚上很困,就在地上的稻草上和衣而卧;我从不吸烟,这时心里烦闷,就请人捎来了几包“哈德门”,吸起烟来。我向学生们声明:“你们不能打我,我是老红军,叛变自首都没有过。”学生轮流地批斗我,还好没有打我。虽然没受皮肉之苦,但是,精神上遭折磨的痛苦也不亚于肉体。

聂帅回来了。一天,陈伯达陪着聂帅,还有关锋、穆青来到体育馆。不知他们怎么商量的,陈伯达和学生们说了几句话,大意是叫学生不要揪聂帅了。这才放过了聂帅,我也算是解脱了。

我曾反复琢磨,这些师生炮打聂帅为什么这么大劲头?又为何一次次得手?为什么别人的话根本听不进去,而中央文革的人几句话就管用?

后来才弄清,学生背后有中央文革那几个人指使。作为老党员,对党内生活如此不正常,我很震惊。

对今后的工作,管,不行;不管,也不行。聂帅当时不便出面,但经常找我去汇报,谈工作。他对我说过:毛主席搞的运动,我们还得办;理解得办,不理解的也得办。

1967年4月25日,为了推动教育改革,提高教学水平,国防科委下发了《关于从工厂、研究院(所)抽调技术人员与国防工业高等院校教学人员对调的通知》。

当时的考虑是,在科研单位和工厂,一部分有专业基础知识、又有实践经验的科技人员,继续从事原工作没有发展,而院校缺少这样的人才。相反,院校中有部分教员有专业基础知识,但缺乏科研、生产的实践,如果双方对调交流,对教学和科研生产都有利。这项工作展开后,当年8月底,落实了128名人员,占对调总数的33.7%。未完全落实的原因,一是在当时气氛下,许多人不愿当教员,而且教育系统工资待遇又偏低;二是爱人工作调动困难。

1968年初,聂帅让我抓国防科委管的11所院校教学改革工作。这些院校都是全国重点大学,办得好坏,关系到国防科技的发展。

我和院校局一起,组织北航、西工大、西电、南航、上海交大等五所院校的一些专家,召开了“复课闹革命座谈会”,就教育革命的领导、学院领导班子、院校专业调整、教学研究生产三结合等问题提出意见。会议商定,立即成立火箭、航空、无线电、兵器、造船、通用机械等六个专业调研小组,其任务是汇集各院校的调查研究成果,进行综合分析,初步提出本类专业的调整方案,上报批准试行。

可形势的发展使这一方案没能出台。老实讲,当时极“左”思潮当道,很难有真正意义的“革命”或“改革”。我们面临着两难选择:要么迫于压力,把改革方案锁进抽屉;要么拿

出方案,立即成为被批斗的靶子。

在聂帅领导下,我们想尽办法搞好工作。尽管如此,上面
对国防科委的评价却是: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很不理
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我们总是跟不上趟,总是被动受批
判。上面有什么意图,根本不知道。有些事情,经常是报纸登
了我们才知道。因此,军委文革小组改组时,聂帅曾找徐帅商
量,要求让国防科委也参加一个人,以便跟上中央精神。1967
年1月12日,全军文革领导小组改组,徐向前元帅当组长,我
当了组员。

我参加军委文革小组只开过两次会。可以说,我这个军
委文革小组成员有名无实。

驱逐舰与核潜艇

一个国家要想不被欺侮,必须有现代化的国防力量,而要
实现国防现代化,就必须加速科学技术的发展。带着这种认
识,我很希望在国防科委的岗位上有所作为。

很遗憾,到了科委,却赶上“文革”动乱,常常被揪斗,挨批
判;与此同时,科研试验任务又很重,总觉得时间不够用。当
时听到一个说法:机关的“斗批”,要在1967年3月底基本告
一段落。我们常委几个人异常兴奋,心想,这下好了,可以多
用点时间抓科研了。没想到,只是空喜欢一场。“文化大革
命”已经像决堤洪峰,无法控制了。

眼瞅着运动带来的破坏性越来越大,大批专家被迫害,广
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大量仪器设备遭破坏。
我们心急如焚,想了很多办法,力图把工作损失减小到最低限
度。当时,中央军委已经批准了1966年至1970年的“三五”

国防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明确要继续大力突破国防尖端技术,认真解决急需的常规武器装备。国防尖端的重点是突破氢弹技术,同时积极研制战略导弹;“两弹”(原子弹与导弹)结合,发展重点打击武器。常规武器,则由仿制和自行研制并举逐步转到以自行研制为主。陆军以防空和反坦克为重点;飞机以歼击机为重点;舰艇以潜艇为重点;军事电子技术,以保障进一步突破国防尖端技术为重点。同时,积极发展轰炸机、舰艇、雷达、通信装备和电子元器件。

我曾在海军基地、学校、研究院和造船工业部工作多年,对海军比较熟悉,所以对海军的武器研制抓得多些。当时考虑,海军要形成大、中、小舰艇和水面、水下、空中的装备体制系列,搞好武器电子设备配套,抓住海军重点装备,即核潜艇和驱逐舰建设,从技术上以重点带动其他。70年代初,我们先后研制成功攻击型核潜艇、导弹驱逐舰、导弹护卫舰、新型常规动力潜艇、鱼雷和导弹快艇以及布雷、扫雷艇等一批新型舰艇。这些都是60年代中期和后期上的项目,是上下共同奋斗多年打下的基础。

驱逐舰是海军重要的主战水面舰艇。50年代,我们曾向苏联购买四艘二战时期的“7”型驱逐舰,但性能落后。1959年,我们从苏联引进了“56”型驱逐舰的总体设计资料和主动力装置图纸,对其蒸汽轮机、蒸汽锅炉和130毫米舰炮进行了仿制。我在七院时,也主持过对驱逐舰的大量预先研究工作。可以说,早日装备上我们自己生产的导弹驱逐舰,是我和舰艇科技人员多年的愿望,也是海军将士的梦想。1964年,国防工业会议上,鉴于护卫舰已经造出来了,作为驱逐舰主动力的蒸汽轮机和主炮已经定点安排仿制,我觉得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又一次提出要上驱逐舰。

但主持会议的领导同志不同意。我又一次失望。

1965年,远程火箭试验需要驱逐舰护航,国防科委在编制“三五”规划时,再次提出开展导弹驱逐舰等四型舰艇的研制生产项目。1967年4月,军委终于批准了这一规划,导弹驱逐舰、导弹护卫舰、新型常规潜艇等新一代舰艇的研制,正式展开。

当时,与战略导弹研制试验挂钩的项目,都是重要科研项目。远洋靶场测量船等的研制也是重点尖端工程。我们特意把导弹驱逐舰与它捆在一起,开始了海军舰艇科研史上又一次攀登。

1968年5月15日,总参、国防科委、国防工办正式批准1970年建造几艘导弹驱逐舰,作为远洋靶场测量工程的配套使用。当时,有人主张执行远洋靶场测量任务不需要驱逐舰编队护航。以后的试验证明,没有相应的舰艇编队护航、警戒、打捞、救护、补给,在远离国土的太平洋去执行远程导弹、潜地导弹、人造卫星的测量、跟踪、遥测、遥控和回收任务,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在苏联留学期间,认真研究过世界强国的发展史和海战史,也曾登上外舰实习。作为一名中国海军将领,我多次在睡梦中登上自己建造的新式舰艇,游弋祖国海疆,远航世界各大洋。对于发展海军装备,我们这些人真是到了“如醉如痴”的程度。

不幸的是,赶上了“文革”。“文革”酿成动乱,科研需要稳定,两者矛盾尖锐,无法调和。被扣上“保皇”、“复辟”、“逆流”等罪名,成了迟早的事,但我自己仍然“当局者迷”。1970年上半年,国防科委领导班子作了调整。这时我已回海军工作。军委既未宣布撤销我国防科委副主任职务,又没有在海军让

我任什么职务,就这样搁在这里。

为了加快导弹驱逐舰的研制,1970年5月,我曾以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名义主持召开了有关工业部、三院、七院、海军等单位参加的检查导弹驱逐舰研制情况的工作会议。

核潜艇于1963年调整后,中央专委于1965年批准核潜艇工程重新上马。核潜艇要不要搞?如何搞?搞什么样的?有过许多争论。有的针对我国经济基础和技术条件的可能性,存在不同看法;有的从作战指导思想出发,对核潜艇在未来作战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不同认识。后来毛泽东主席重申,国防尖端科学技术“要有,要快,要超”。这之后,核潜艇便一路绿灯,重新上马。

我调到国防科委的时候,恰逢核潜艇工程重新“上马”。

核潜艇的研究,一开始就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在周总理的具体指导下,聂荣臻元帅专门写了《关于开展研制核动力潜艇的报告》。应该说核潜艇的上马是比较顺利的。

但是,这项工程的前期开发工作却几经波折,这期间,我先在七院,后调到了六机部,岗位变化了,但关注核潜艇工程的心却始终放不下。

1962年上半年,由于国家经济遇到暂时困难,大批工程项目下马,核潜艇的研制工作也难以继续进行。对此,七院党委作了多次研究,我和戴润生政委专门向聂帅作了汇报,中心意思是从长远考虑,研制工作不宜全部下马。否则,不仅会造成经济上的损失,而且技术队伍也将散失,以后再上马时,困难会更多。后来,中央专委决定,组成了七院十五所,保留少数核潜艇研究人员,继续从事核动力装置的理论研究和实验,为设计试制核潜艇做技术上的准备。我专门到十五所讲了预

研工作问题,强调要靠自己的力量把技术关键问题搞清楚,做好前期开发研究,为核潜艇工程总体方案的选择和初步设计提供基本理论和试验数据。

1965年3月,周恩来总理指示,核潜艇的研制工作重新上马。当时我任六机部副部长,分管科研工作。于是由我起草,以六机部党组的名义向中央专委会提出研究制造核潜艇的报告。8月,中央专委会正式批准了这个报告。

核潜艇工程终于再度上马。我喜出望外。

核潜艇工程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它兼有“两弹”和“两核”的尖端技术,又有水下操作的重大技术难关,研制生产单位涉及几百个研究所和工厂,组织管理涉及国务院各部委、各省市二十几个部门。

为此,我们提出分两步走:第一步先攻克核动力难关,造出攻击型核潜艇;第二步再突破导弹应用于潜艇水下发射的难关,造出导弹核潜艇。两个技术关键,分开攻关。为抓任务分工和组织协调,我们前前后后召开了十几次会,签发二十几份文电,工作才逐步展开。

核潜艇工程上马后,先是以六机部为主,与二机部共同负责,海军和一、四机部参加,并成立核潜艇工程联合办公室,归属六机部,由我负责。1967年3月,中央军委确定,核潜艇工程改由国防科委领导,会同国防工办负责抓总。此时,我已调到国防科委,这项工程仍由我分管。后来我离开科委到海军工作,核潜艇工程办公室又转属海军。

“文革”中,由于工厂、科研单位陷于混乱,核潜艇的研制工作面临中断的危险。有的厂、所领导就来北京要求工程办公室派人去解难。开始还能派人去,以后多了,也应付不过来。有的同志建议以中央军委名义发一个专门文件,但有的

同志怕这样被误解为“以生产压革命”。我和大家反复研究后,决定向聂帅提出建议,以中央军委名义发一个关于核潜艇工程特别公函,强调核潜艇工程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对国防建设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任何人不准以任何理由冲击生产研究现场,不准以任何借口停工、停产,必须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任任务。1967年8月,中央军委发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特别公函》。当时各有关部、院主管核潜艇工程的同志以《特别公函》为依据,确实排除了不少干扰,保证了科研任务不致中断。但由此又冒犯了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

还叫“东方红”卫星

1967年5月,聂帅指示,陆军和空军武器的研制工作也让我管起来。

当时陆军武器装备的研制,主要结合援越抗美战场上武器使用情况进行调整。空军武器装备的研制,我们着眼未来的需要,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路。

对陆军武器装备研制,明确提出,从我国情况出发,抓新品种,特别是对防空武器、反坦克武器和其他陆军武器,作系统安排。到1967年,研制出“69”式中型坦克、新40毫米火箭筒及弹药、“75”式105毫米无后坐力炮和100毫米滑膛炮等。70年代初,先后研制和改进了37毫米高炮,新14.5毫米高射机枪,57毫米和100毫米高射炮,75毫米和82毫米无后坐力炮;并自行研制了“红旗2号”地空导弹,改善了对付低空、中空和中高空目标的地面防空体系。

对空军武器的研制,提出重点抓歼击机。在成功仿制“歼6”、“歼7”后,根据作战要求,对其进行了改进,如增加航程、

提高升限、速度,改善操纵性能等,并开展了“强5”飞机、“水轰5”型水上飞机和“歼8”型高空高速歼击机的研制。

“歼8”要不要继续研制,当时意见不一致。我主张继续干。当时,上“歼8”困难确实不少。除技术问题外,要命的是没人支持,就连空军领导也不支持。吴法宪的想法愚蠢得让我吃惊,他竟要以“歼6”打遍天下,要搞几千架“歼6”。

飞机发展得有个方针,明确技术发展路线。我认为:先搞仿制,使设计人员积累整个研制经验,再搞自行研制。后来搞了“歼8”飞机的研制设计。1969年7月,“歼8”在沈阳组织首次试飞。试飞场有群众组织,外人随便进入,秩序乱,还有武斗。为了保证试飞安全,我曾专门打电话与沈阳军区领导联系,请他们就近给予支持。“歼8”第一次试飞顺利成功。

当时的“歼8”,是“白天型”,不能夜战,空军领导不满意。这可以理解。当时情况下,只能达到那个水平,毕竟也为全天候型的改进打下了基础。我建议“歼8”到北京来试飞。“歼8”第一次来北京时,没人去看;我已经离开国防科委,不能工作,但我去看了。感到飞机不错,高空高速,就电子设备差些,但毕竟一种新型飞机出来了,可以将来再改进。“歼8”第二次来北京试飞时,我当了副总长,让大家去看一看。徐帅去了,这次比第一次又有了明显提高。

在飞机的仿制和研制上,我的想法是,要根据我国实际条件,逐步改进,稳步提高,不可能一步登天。后来吴法宪也感到“歼6”不行了,在他之后的空军领导甚至觉得“歼7”、“歼8”也不行,想一下子搞出个“歼9”,期望值很高。从当时的技术条件和工业基础看,这不现实,还是要走“歼8”这一步。后来出了“歼8-Ⅱ”,是我定的。“歼8-Ⅱ”又有新的改进。

在尖端武器方面,开始分工很明确,不用我管。“两弹”和卫星由罗舜初管;我负责潜地导弹的研制方案、陆上发射试验场的建设等。虽有基本分工,但时常要互相代替;某个领导外出执行任务时,另一个人就得顶上去。所以到了后来,“两弹”和卫星的事,我也很自然地介入了。

1967年5月,军委决定迅速建立空间技术研究院。6月27日,批准国防科委提交的组建方案,确定钱学森为院长,常勇为政委。研究院没有集中地点开展工作,我便组织人员到处找地点,找房子。了解到“社会主义学院”房子空着,而且开学无日期,以后办不办也不知道。我觉得地方还行,就让四局局长李庄和基建局局长魏垒去跑,终于跑下来了,把几个研究所安在了那里,使空间研究院也有了办公的地方。

70年代第一个春天,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叫“东方红一号”。这是中华民族聪明智慧的体现,但却被说成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正是“文化大革命”,给“东方红一号”带来许多不应有的困扰和麻烦。

我不懂卫星,也不管这项工作。到了1968年,“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研制遇到了问题,各分系统文齐武不齐,不协调不配套。为了保证1970年发射,空间技术研究院领导和设计人员在原方案基础上进行了合理的修改,但这一修改方案却找不到拍板的人。五院总体主任设计师孙家栋在常勇的带领下,拿着方案找到我,孙家栋说话很直率:你懂也得管,不懂也得管。你们定了,拍个板,我们就可以往前走。

听了他们的汇报,问了有关情况,我心想,这事不能拖,总得有人承担责任。便对他说:“技术上你负责,其他问题我负责,我拍板。”

这个时期,七机部也没有什么人管事了。关于“东方红”

卫星的事,后来我又听过一次机关汇报,也到现场看了看。卫星方案的若干修改和简化我就拍板定了。我当时强调,最后总体决策还要向党中央、周总理和聂帅报告。

我把卫星方案修改和简化情况报告了聂帅,聂帅也批准了。卫星计划才得以进行下去。

回想起来,当时这么干,除了有一种强烈责任感外,也有一点儿傻大胆的味道。

这种“傻大胆”,还表现在给卫星定名上。

“东方红,太阳升”,这支歌当时人人会唱,到处都唱。因此,卫星也命名叫“东方红”。按说寓意很好,毛主席像太阳,人人敬仰;同时,从地理看,中华民族也生活在世界东方。这个命名很明显,突出了政治意义。可是,当时的特殊政治环境,带来人们特殊的心理状态。“东方红”用在卫星身上,引起了争论,这里潜藏着一种非常敏感的政治风险。

人们的担心是给卫星起名“东方红”,如果成功了,当然皆大欢喜;但是,一旦失败摔下来,可能就是一场“政治”事件。还有卫星上天后,会奏响“东方红”的旋律,一旦因电池寿命等技术原因,旋律停了或者跑调,可能也会被追究是否故意给社会主义“抹黑”。

在今天看来这可能有点天方夜谭,但在那个年代,这并非胆小或无的放矢,类似的“政治事件”曾经多次发生。

两种意见,怎么办?最后,我支持主张原方案定的名字,卫星还叫“东方红”。

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成功发射,准确入轨。太空里,“东方红一号”向整个宇宙播送出“东方红”的旋律。

不过,这时我已经被“打倒”,在家中闲居。夜间,肉眼就

能看到“东方红”卫星。我默默凝视，泪眼模糊。卫星成功了，我也放心了。

“文化大革命”的确是一场大动乱。但是，为什么还取得了如“两弹”结合、氢弹、人造卫星和第一艘核潜艇下水等等一系列举世瞩目的科研成果？仔细分析一下，我看主要有三个因素在起作用：

首先，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叶剑英等一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领导人，是真抓现代化，真干国防现代化的。他们有许多论述、指示和批示。凡国防科学技术的方针政策、规划计划、重大项目的研制试验，都是他们决策和批准的。其次，国际环境紧张，国家的安危，迫使我们不能放慢国防科学技术发展的步伐。当时，美国侵越战争升级，中苏关系恶化，全国处于战备状态。中央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号召，并决定加强战备和三线建设。大敌当前，谁也不敢公开反对发展国防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第三，有一支专业比较齐全的优秀科技队伍。这支队伍里，有国内生长的，有从国外回来的，有从旧社会走过来的，有在新中国诞生后培养起来的。振兴中华、把落后贫穷的中国改变成现代化强国的使命感，把他们团结在一起，在戈壁沙漠等艰苦环境里，默默奉献着青春和生命。在“文革”动乱中，很多人虽深受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但仍不改对科研的执著追求，戴上“高帽子”挨批斗，摘下“黑帮”牌子搞科研，充分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无私奉献的高尚品格，展现了他们为国家强盛而执著追求的伟大情操。应该说，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军事接管小组

“文化大革命”，口号满天飞。我最感兴趣的口号，是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听到这句口号，就觉得摸到了一张“王牌”，非常兴奋。

“文革”一开始，虽然周总理、聂帅多次强调，既要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抓阶级斗争，又要抓好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但“文革”高潮一来，国防科研单位大都陷入混乱，研究工作停顿，三线建设问题很多，局面完全失控，并向更坏的方向发展。

混乱中，我希望维持正常的科研秩序，使科研工作不间断；但是，这个想法越来越不现实，就转而注意保护人，保护住一批领导干部和科技骨干。如第七研究院的领导胥治中、李荆璞、陈云中等，我向群众反复讲：这是一些经过长期革命战争考验的老红军、老八路，到国防科研单位来又经过挑选，不要随意批斗、打倒。我还说，从旧社会走过来的或国外回来的一批专家，如袁随善、方文均、李国华、沈岳瑞、时飞等人，是中国现代舰船科学研究的先驱和骨干，要全面地发展地看待他们的历史，他们是爱国的，他们用自己的专长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现代化服务，要爱护和保护他们。

开始，我讲话还有点效果。后来保谁也保不住了，甚至相反，你越保谁，谁越遭灾，挨批斗越凶狠。如南京工程学院院长吴继周、七机部二院党委书记董其强、第七研究院副院长于笑虹、七院舰船动力研究所所长田震寰等就是这样。最后，包庇反动分子、“走资派”，倒成了我的一条“罪状”。

实在没办法，有时只好请聂帅和周总理出面保护。如钱

学森,1967年初,群众送来材料,说钱如何如何,要大字报上街,“采取革命措施”。我们迅速报告聂帅,希望立即制止。聂帅马上转报了周总理。

周总理很快下达三条指示:一、不准揪斗,不准抄家,不准大字报上街;二、要保证钱学森同志的正常工作,保护其安全;三、有什么材料送总理办公室。后来,钱学森的女儿在北京也呆不住了。我想,一个小姑娘无处读书,怕在社会上游荡被骗了,便指示军务部门,把她送到了科委基地当兵,实际是保护起来。在当时,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形势越发失去控制。聂帅和国防科委的几位副主任都感到,这样乱下去,不但原定的尖端试验任务很可能被打乱,无法进行,整个国防科研事业也可能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怎么办?

我们在聂帅家里开会,当时提出了几个办法:一是接管;二是支左;三是军管。

我不同意“支左”。“支左”还得听造反派的,局面很难控制。“接管”也不行,难度大太,不好实行。

最后大家都倾向于“军管”。

1967年3月11日,聂荣臻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报送了《关于军事接管和调整改组国防科研机构的请示报告》。

3月18日,周总理批示,同意各研究院交国防科委实行军事接管和调整改组,以便迅速恢复科研工作并进行全面适当的调整和改组。同时提出,对国防工办、各国防工业部也实行军管。

3月20日,毛主席批示:“退总理照办”。

国防科委随即成立了军事接管小组。开始由罗舜初任组长,后由我任组长。派往各研究院所的军管人员,基本上是对

口去的。到1968年6月,先后接管了二机部九院、三机部六院、四机部十院、五机部机械院、六机部七院、特种武器院、装甲兵工程院以及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所属一些研究所(厂)。军管对稳定科研单位局势、防止进一步混乱、恢复科研秩序有一定作用。

形势有点好转,令人大为鼓舞。1967年9月20日,聂帅又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报送《关于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方案的报告》,提出将国防科委军事接管的科研单位调整改组为18个研究(设计)院。10月25日,毛泽东批示:“此件压了很久,今天看过,很好,照办”。12月9日,中共中央批发聂荣臻的请示报告,国防科委随即组成“体制编制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具体组织落实。

实施过程中,聂帅几次找我,听取情况汇报,进行专项研究。他提出:“一、各个研究所都要设理论研究室,专门从事理论研究。如果不搞这个,下一步就没法搞了,科研应有‘三步棋’(型号研制、预先研究、理论探索)。二、解决科研试制力量。国防工业工厂很多设备是双套的,有备份的,可以拿出来搞试制。三、技术上要配套。过去没有人重视这个问题。电子、光学力量太弱了,要下决心解决。四、要大力协同,防止重复建设。五、干部坚持内部提,自己解决。六、行政机构要精简”。他还要求同工业部门商量,发动群众讨论等等。

搞科研生产联合体,每个研究院要搞一个主要试制厂,分别对飞机、舰艇、坦克、火炮、电子等进行试制。向粟裕同志请示汇报时(粟时任国防工办军管会主任),他有些犹豫,当时未表示反对,后来还是同意了。

机关和有的研究院,对试制厂(车间)的归属问题,也都有自己的意见。有的开口过大,什么都想要,贪大求全,甚至未

经研究批准就把方案捅出来,造成有关科研生产单位人心不稳。为此,我强调,要加强组织纪律性,对外不允许擅自发表个人意见;要从大局出发,贯彻大力协同的方针,各院之间、各院同各工业部门之间必须密切协作;新建的科研生产联合体,要短小精干,不能搞得庞大杂乱。可是,有的单位机构偏大、人员偏多、调整偏急的问题,并没很好解决。

最后形成的调整方案,18个研究院共有研究所292个,院属大小工厂(车间)90个。

1968年1月26日,聂帅提出:新建研究院(所,含老所)一律搞正面教育,组建临时党委,统一领导,并给军委写出报告。

正当国防科研机构调整改组全面展开的时候,1968年3月24日,发生了所谓“杨余傅事件”。形势的突变,对我们这些想趁大好时机抓“赶超”的人,不啻当头一棒,弄得不知所措。很快,社会上掀起了“粉碎二月逆流的新反扑”、“揪出杨余傅的黑后台”的浪潮。科委机关和各研究院又混乱起来,矛头对着聂帅,国防科委当然被牵连进去。

此后,国防科研体制的调整被扣上“聂荣臻大科研主义”、“聂氏山头主义”的罪名,从而被否定,被“铲除”,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流产”了。

聂帅后来回忆说:“组建科研机构的整个过程,我认为在当时我国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尤其是像导弹、原子弹、现代高性能飞机和舰艇、复杂的电子设备等,完全处于空白状态的情况下,在机构建设上我们采取集中力量,形成拳头的做法是正确的。实践证明,能够较快地摸清情况,开展工作,组织协作,攻破难关,取得研究成果。有鉴于这方面的经验,1967年10月,我曾建议把国防科研方面的研究力量进一步组织起

来,成立 18 个研究院。我当时想,这样做不但力量可以集中,而且处在‘文化大革命’极其动乱的情况下,还可以使各方面的科研工作和科技人员因此得到必要的保护。但处在当时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动乱时期,在批判我的所谓‘大科研主义’的情况下,筹备工作被迫停顿,以后有些院建成了,有些则不了了之,实在可惜。”

聂帅的看法,我很赞同。

给聂帅“帮倒忙”

1968 年 3 月 13 日开始,国防科委召开了第二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这之前,我们经过党委讨论,下发了会议通知。

没想到,通知中关于“拥护以聂荣臻同志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的提法,惹出了大麻烦,被批为“多中心论”。

1967 年 12 月 26 日,国防科委机关院内毛主席塑像落成典礼会上,我讲过聂帅“高举”、“紧跟”、“好学生”一类的话,目的很简单,也很明确,就是想引导部分群众掌握好“斗争大方向”,不要再把矛头对着聂帅。

“文革”开始一段时间,国防科委机关没有形成明显的两派。当时,对于国防科研战线的情况也有过争论,归结起来有两条:一是建国以来是正确路线占主导地位,成绩是主要的;还是所谓“修正主义”路线占统治地位,方向路线是错误的。二是科技队伍的大多数是好的,是拥护党、为社会主义奋斗的,是可以信赖和依靠的;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是“封、资、修的大杂烩”。经过辩论和教育,广大群众的认识趋于一致,肯定了前者。那些仍然坚持“有一条又粗又黑

的黑线”、“导弹上天,红旗落地”观点的人,只剩极少数,能量不大。

可是,这时江青放出阴风,说国防科委是“一潭死水”,是个“黑洞”,要“砸开”。于是,机关的一部分人与研究院、学校的一部分人串联,要“揭开国防科委阶级斗争的盖子”,掀起了“炮打聂荣臻”的浪潮。

在这种局面下,我不知深浅,急于想引导群众统一思想,结果成了“压”一部分人。特别是“杨余傅事件”出来后,矛头所指非常明确,就是要打倒聂荣臻。

“二届积代会”初期,在代表条件、代表名额、如何看待整个革命路线与科研具体路线的关系等问题上,有分歧,有辩论,但大会还可以进行下去。1968年3月24日,“杨余傅事件”出来,形势急转直下,难以控制。“二届积代会”会场上,贴出了“打倒杨余傅”、“斩断杨成武伸向大会的黑手”等大字报。社会上也掀起“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揪出杨余傅黑后台”的大风浪。“文革”斗争进入新一轮回合,“二届积代会”也开不下去了。

1968年4月6日,周总理召集国防科委各副主任在中南海开会。这次会上,我表现得很固执。别人讲完对聂帅的意见后,周总理让我表态。我对总理说:我不知道聂帅有什么问题,不好批判。周总理批评我们支持一派压一派,给聂帅“帮倒忙”;指示我们补选一部分代表,把会开好。

这次会议有群众代表参加,很快大字报就上街了,很醒目的一条是:“刘华清对抗文化大革命罪该万死!”

4月8日,由罗舜初代表国防科委常委向大会作了公开检讨。但是,增补代表难以进行,群众辩论激烈。11日,罗舜初、我和蔡顺礼一起,联合署名向林彪、周总理写出报告,说代

表们发言主要矛头对准的是聂帅,光我们几个人检查错误不解决问题,促进大联合的目的很难达到。这个时候,我对“二月逆流”的事仍一无所知,直到10月底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后,才知道了所谓的“二月逆流”。

1968年底,按上级指示,罗舜初、蔡顺礼和我三个人去国防科委在昌平办的学习班,同群众一起学习,进行检讨接受批判。这个学习班名字很长,叫“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国防科委、七机部联合班”。

我在学习班呆了个把月时间,我们三人都在大会上作过检讨。后来得到通知:周总理让我们三个人回去,不要再作检讨了。以后再没有让去。

这段时间,我在国防科委的办公室也被人秘密搜查过。不久,我被撤了职。

国防科委到底犯了什么错误?我自己有什么错误和问题?对这两个问题,我始终不明白。

有人明白。江青就非常肯定地对我作过鉴定:“刘华清是坏人。”

我当时并不知道江青的评语。回海军后,苏振华政委找我谈工作安排,我问他:“我到底有什么问题?”苏说:“你的问题没立什么专案,只是找几个人审查了一下。”但是,具体查些什么、查的结果如何,他没讲。后来,据参加审查的人透露,我的主要问题是反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支持群众组织整江青、张春桥的黑材料;有一条北京——上海的黑线,我是黑后台之一。我哭笑不得。我从没参与过上海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任何事情,完全是无中生有。又一次,我向另一位海军主要领导人问我的工作情况。他说:“据观察,你还是老老实实干工作,没有什么背后活动。但江青说过,‘刘华清是坏人,不能用’;

根据是什么,海军不清楚,也没办法。”

就这样,我莫名其妙地当了十来年“坏人”。直到“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我的“坏人”问题才彻底一风吹。

第十二章 重回海军

“船 办”

1969年上半年,我又回到海军。不过,回来得有点灰溜溜。

在国防科委,由于对抗“文革”,造反派一直把我揪斗不放。出于对我的爱护,叶帅和聂帅提出,让我回海军工作,我很感激。但老帅们当时已被架空,是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掌权,根本不听老帅的。在海军,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也反对我回去工作。

我一时没地方可去,最终,关系还得勉强挂靠在海军。

国际形势很紧张。苏联和美国在继续争夺世界霸权。苏联人侵我国黑龙江珍宝岛,挑起边境武装冲突;美国和越南打得很凶。我国的南海,由于探明拥有丰富油气资源,便成了周边某些国家眼里的蛋糕,都想乘机切一块。1969年4月,基于对国际形势判断,中国共产党“九大”政治报告中提出了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论断,我国进入全面备战状态。

国内形势动荡不安。林彪和“四人帮”互相勾结,通过“九大”攫取了更多权力。他们又把手伸向各地区各部门。海军也被林彪死党所控制。萧劲光司令员只保留第二书记,起不了领导作用。不少领导干部包括创建海军时从陆军调来的和经苏联留学培养的人大都被打倒或“靠边站”。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四人帮”乘机把手进一步伸向海军。又有人跟着他们跑,海军的日子仍然很难过。

海军并不想要我这个多余的人。重回海军好长一段日子里,我真的像一件破旧的海魂衫,“挂”在那里没人想收。背后还在审查,散布我是“黑线人物”,精神上相当压抑。

1969年6月9日,国务院宣布,将国防工业各部分交总参、总后、海军、空军及有关兵种管理,并成立有关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是国有经济中的组成部分,本不应该进行这种分割,但形势太乱,才采取了这种不得已的政策。

造船工业这一块分给海军来领导。造船工业科研系统包括第六机械工业部、第三研究院、第七研究院。6月13日,造船工业科研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组长李作鹏,副组长有周希汉等人。下设办公室,简称“船办”。

海军总算给我事干了,让我当了“船办”主任。“船办”隶属海军司令部领导,顶多算一个师级单位。虽然级别不高,但可干的工作却不少。几十年来,我从没闲过,“文革”中休闲了一阵子,现在终于有事情干了,还是挺高兴的,职位高低我不在乎。

造船工业和科研是一个大摊子,并不好管理;海军又新接手,没经验。我向周希汉建议:先理顺领导管理体制。

红军时期,我就和周一块当科长。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陈

赓部任旅参谋长、旅长,我在陈再道部任旅政委。解放战争后期他任第十军军长,我任军的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后来我们又都进了海军,一起工作十几年。“文革”初期,他也挨过斗。现在他主持造船工业科研领导小组日常工作,我也愿意和他配合。他同意我的建议。

“船办”起草了报告,6月29日交海军党委常委讨论,我列席。7月12日,海军党委上报了《关于造船工业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有关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我们按此试行。1971年4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批发了国防工业领导小组《关于国防工业管理体制的报告》。这时,全国全军国防工业科研的管理工作才有所遵循。

造船工业科研领导小组成立后,工作千头万绪,但最主要的是要把工业、科研和使用三方面组织起来,密切结合,并调动广大职工积极性,把生产和科研搞上去。

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1969年10月21日在北京召开了“1020”会议。会议规模很大,到会的有284个单位、600多人,包括六机部、三院、七院和一、二、三、四、五、七机部为造船配套的单位,还有国务院有关部委,各总部、军区和省市主管单位。会议开了一个多月。这次会议对把六机部、三院、七院和一切为造船配套的工业科研力量拧在一起,起到了积极作用。

六机部和三院、七院分别组建于60年代初期,基础薄弱,工业科研配套缺门多,又遇到“文革”冲击,造成混乱。这时都由海军管起来了。我的想法是,首先把交给海军的单位管理好,同时积极调整,抓紧建设,建立和稳定配套网络。例如:把四机部和十院有关水声、雷达、导航专业的厂所,五机部的鱼水雷厂,还有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海军系、西北工业大学水

中兵器系,移交给六机部和七院,做为舰艇配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统一领导管理。核潜艇厂、鱼雷生产科研试验基地,长江中上游的造船、造机、配套仪表基地,先后报请国家批准列入建设计划。将海军的或地方的相关工厂改建扩建,支持造船及其配套。海军黄埔修船厂移交改建为潜艇造修厂;四三〇六军械修理厂改建为修造兼顾的舰炮厂;上海军工动员线承担舰空导弹系统及导弹试制生产;以三机部三二〇厂为骨干,组建海防导弹试制生产线等等。一机部及地方所属的机电工厂,多是军民兼顾、海陆结合的,将其中军用、海用部分产品稳定配套,也由六机部归口管理,形成关键专业生产线或点。

国防工业科研单位的调整交接工作,从1969年到1972年持续了三年多。从国家全局看,有成绩也有问题。从造船工业、科研看,初步形成配套体系也是难得的。

造船工业科研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对重点型号的研制、生产,一直到试验、鉴定定型工作,始终用大力去抓,促其如期完成,早日形成战斗力。

导弹驱逐舰是当时国内自行研制的重点之一。

1969年末,该舰首舰在大连船厂完成船体大合拢。我以“船办”主任身份到大连,现场牵头召开了为首舰现场配套协调会议。对首舰和其后续任务配套设备的技术状况、交付进度、工作措施等,逐项进行了协调安排。将大连船厂、七〇一所、海军驻大连军代表室和首舰接触部队组成首舰现场领导小组,加快首舰研制。当年7月,由造船工业科研领导小组和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联合召开了五型舰艇技术协调和交底会议。导弹驱逐舰作为要落实的重点工程,由周希汉和我、六机部边疆副部长等人参加组织领导。会议确定,导弹驱逐舰

首舰在 1970 年“八一”下水,年内开始试航。会议对首舰和后续舰的任务、步骤和技术问题的解决及进度、生产、配套、产品分配等都做了具体安排。

1970 年 12 月 15 日,我被任命为海军副参谋长,分管造船工业和科研工作、海军装备建设,这无疑对我想干工作是有利的。

1971 年 12 月 31 日,在大连市举行导弹驱逐舰首舰交接仪式。这时,我作为访朝代表团团长刚回国,海军领导忙于“九一三”事件有关事宜,便派我和六机部刘放副部长去现场主持,经反复协调,才完成了交接。西方国家把我国的导弹驱逐舰称之为“旅大级”驱逐舰。导弹驱逐舰首舰 1968 年 12 月开工,1971 年 9 月开始航行试验,前后出海 12 次。按试验大纲要求,对重点项目进行了试验。试验证明,战术技术性能是好的,设计建造也是成功的。当然也暴露了不少问题,有待改进,形成坚强的战斗力还需要做很多工作。

1972 年 5 月,周总理指示,为西哈努克亲王组织参观舰艇海上表演,确定用导弹驱逐舰首舰为乘座及指挥舰。萧司令员和我专门到旅大去反复检查、准备,并于 5 月 24 日向周总理写了报告。报告说:“导弹驱逐舰是我国造船史上最人的一艘驱逐舰,研制设备较多,而且有相当一部分是我们过去工业科学技术上的空白……其基本性能已达到设计要求,可开始小批建造。”

周总理当天批呈。毛主席也圈阅同意。此后,开始了导弹驱逐舰全面试验定型工作。海军确定组织导弹驱逐舰首舰调查组,指定我为组长。我带人对从部队、工厂、研究所各方面反映的问题加以搜集,汇总分析,并分类提出处理意见和解决措施,抓紧研究试验工作。12 月,我和边疆同志主持召开

了导弹驱逐舰技术协调会,根据产品要定型、生产要成线、协作要定点的精神,明确了导弹驱逐舰定型工作的原则、标准、技术依据以及配套设备定型的项目和范围。1973年1月27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文成立海军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周希汉为主任,我是副主任。在定型委员会领导下,专门成立了导弹驱逐舰定型工作组。

1973年9月,叶剑英副主席视察导弹驱逐舰,观看发射舰舰导弹试验。两次单射,一次齐射,四发全部直接命中靶标。1975年2月3日,国务院、中军委批准导弹驱逐舰设计、生产定型。1980年6月,六艘导弹驱逐舰与远洋测量船特混编队在西太平洋预定海域上执行我国洲际火箭发射试验任务,确保了测量、监控、回收任务的圆满完成。

核潜艇工程也倾注了我的极大热情。

1968年11月,鱼雷核潜艇开工建造,1970年12月下水,开始了码头安装设备工作。

1971年5月31日,核潜艇首航,我主持了领导小组会议。会后,我考察了一些地区,为核潜艇的试航、驻泊技术和阵地设施做准备工作。之后以海军首长名义报请周总理批准,在8月23日至9月6日进行了预试,结果表明可以进行试验。1971年12月至1974年,几个阶段的试航试验,我参加了多次。1972年4月,我陪同萧司令员检查正在旅大地区试验的核潜艇、导弹驱逐舰等舰艇,我向萧司令员汇报了这几型新一代舰艇的状况。他完全同意我的建议。回京后,萧司令员签署报告,肯定几型舰艇经过海上试验和试航考核,性能是好的。

1972年7月,海军召开党委常委会,专门讨论鱼雷核潜艇和导弹驱逐舰等新型舰艇的定型与后续投产问题。我列席

会议并发言。

1974年8月1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第一艘鱼雷核潜艇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编入海军战斗序列,并举行了庄严的军旗授予仪式。从此,人民海军进入了拥有核潜艇的新阶段。

核潜艇研制的一步步进展,不仅为我国的“两弹一星”尖端技术增添了新的门类和内涵,也为我国战略武器的打击力量增加了新的手段。

在远洋测量船研制过程中,从批准立项、定设计任务书到展开研制建造、船队基地选点建设等,我都积极参与决策,并认真投入,狠抓落实。

远洋测量船研制立项时,我还在国防科委。1967年7月,我根据聂帅指示,召集了总参、国防工办、海军,二、四、六、七机部,中国科学院和七院,一起听取论证汇报。研究决定,将导弹靶场测量船、卫星跟踪观测船合型为远洋靶场综合测量船,确定南极考察与核试验船暂停研制。我又召集总参、海军等有关单位,研究如何进行洲际导弹海上试验。大家认为,试验前海域要进行海洋物理参数调查,试验时需派护航编队等等。8月,国防科委主持起草了远洋测量船的请示,说明研制远洋测量船同时,还要研制远洋调查船、警戒护航和补给等舰船,即要建立一个远洋综合测量工程编队。9月,中央军委同意了国防科委提出的意见。

我回海军后,远洋主测量船驻泊基地的建设要求海军负责。海军领导指定我组织勘察选点。1973年4月,我沿长江逆流而上,考察了有关地带水域、江岸地质、陆区、交通、水电等各方面条件,提出了选点方案。1975年9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复,同意这一方案,由海军与国防科委共同组织一个基

地筹建指挥部。实际上,1975年3月,基地筹建指挥部已先期着手筹建工作。我多次听汇报,检查落实情况。1979年10月,基地基本建成后,又划归了国防科委建制。

海军舰艇配套、特别是武器系统的立项、研制、攻关,形成系列体制,也一直是关注的重点。

为了自行设计新一代舰舰导弹,我多次召集专家听意见,并去江西调研,主持了新一代导弹技术协调会。还多次找福州军区和江西省军区领导商谈。回北京后,又请周希汉副司令员主持召开海军业务部门和工业部门联席会议。我建议,从当时海军管辖的造船工业系统调拨设备、资金和劳动指标,为导弹配套厂所的产品试生产创造必要条件。10月30日,我和三院梁守槃副院长再次审查三二〇厂提出的新一代导弹设计方案。1971年6月3日,中央军委、国家计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下文,批准安排新一代导弹研制任务。由于技术难度和研制经费不足,进度不得不一再推迟,直至1975年11月才完成陆上试验。后又根据国外发展动态和我国研制能力,提出向固体化、小型化、超低空方向发展。该弹1989年设计定型,达到研制任务的要求。

对舰空导弹的研制,1967年3月,我还在国防科委时,就同总参、国防工办一起开会,确定用红旗61号地空导弹改为舰空导弹。我也知道,相比国外同类导弹,红旗61号性能不够先进,但眼下是为海军解决舰空导弹有无问题,只好选用这个已起步的系统。1970年我回海军后,经海军与上海研制单位充分协调,一起拟定了红旗61号舰空导弹方案论证报告,明确了研制、生产任务。红旗61号导弹从1968年9月开始研制,几经变动,一直到我回海军当司令员时才靶试,取得设计定型试验的成功。1988年11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军工产

品定型委员会批准红旗 61 号甲导弹设计定型。

红旗 61 号导弹的研制经历了复杂的过程,先由地空导弹改为舰空导弹,后又发展成地空导弹,为发展三军通用的基本型防空导弹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西 沙 设 防

1974 年 9 月底,海军领导决定由我组织海军司、政、后机关联合工作组,去西沙现场调研,以解决执行驻防守备任务存在的问题。

我立即和海直各大部协商,工作组由司政后的二级部部长、处长、参谋、干事共 10 人组成。经一周准备,10 月 6 日,我们乘海军运输机直飞榆林,转乘护卫舰到西沙永兴岛。这是西沙自卫反击战后我第一次登上永兴岛。

自古以来西沙群岛就是中国领土,我国政府也一再重申这一立场。但从 1956 年起,南越就出兵侵占了西沙珊瑚岛;1974 年,南越又变本加厉,从 1 月 15 日起,先后派出三艘驱逐舰和一艘护航舰侵入西沙永乐群岛海域,向中国渔轮进行挑衅。我国忍无可忍,进行了自卫反击。参战的有南海舰队、海军航空兵部队、海南军区部队和南沙水产公司渔轮及西沙武装民兵。我们的铁拳给人侵的南越军队狠狠打击。1 月 20 日,自卫反击战胜利结束,先后收复了甘泉、珊瑚、金银等岛,捍卫了永乐群岛的主权。

工作组去西沙前,海军领导并没有把想法和意图向我讲明白。到了广州,我才了解到新的情况。原来,早在两个月前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就批复了《同意西沙设防计划》,广州军区和广东省也在 8 月 22 日有一个《西沙交接会议纪要》。也就

是说,西沙设防和作战指挥,已经明确由广州军区负责。我很纳闷,这么重要的情况,海军领导为什么不事先向我们工作组传达?

实际上,解决西沙设防问题,中央早有指示,海军却一直没有研究处理。现在大概看到不办不行了,才派我们工作组去考查。而我作为工作组领队,对中央意图却一无所知。工作组10月6日至23日在西沙,10月24日在榆林,后经南海航空兵驻地和南海舰队驻地,于11月上旬返回北京,历时一个月。

我们先到永兴岛海南行政区西沙办事处和海军西沙巡防区所在地,听取了巡防区主任刘喜中等的汇报,然后深入到基层、阵地、哨位,听取干部战士意见,与指战员同住同吃,打成一片。当地部队生活艰苦,米饭有霉味,顿顿都是罐头酸辣菜、萝卜干。井水不能饮用,只能洗脸、洗衣服,毛巾一个月就烂掉了;饮用水全靠船从榆林运来。看到基层官兵在艰苦条件下坚守战位,建设西沙,我深为感动。

我对指战员讲:国务院、中央军委、广州军区、海军和广东省政府都对西沙很重视,收复永乐群岛后,立即成立了水警区。我们这次来,就是要为西沙解决设防中的实际问题提出具体方案。我提出,凡是基地、舰队能解决的,不要等;解决不了的,由海军解决。

我们赶上了多台风季节,准备离岛时,台风又来了,返航时间一再后拖。工作组在西沙逗留了17天,能去的岛屿和阵地都去了。一时又走不了,就利用这机会写出了“汇报提纲”。10月23日,正好是两次台风间隙,护卫舰来接我们。航行中,舰艇靠近琛航、珊瑚等岛礁行驶,使我们能从海上观察了解这些岛的礁盘、泻湖和海域情况。第二天凌晨回到榆

林。虽然没遇到台风,但南海海区低气压,有九级风浪,一路上大多数人都晕船。我过去在基地、舰队常出海组织训练,有过一些锻炼,虽然也有点晕船,但比有些年轻人还强点。在榆林基地,我和十几年来坚持西沙巡逻的猎潜艇、扫雷艇部队的指战员进行了座谈。还到南航部队听取了对西沙空中巡逻情况的汇报。

回到北京,我拿出了《关于西沙巡防区需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报告》,11月14日向海军党委常委作了汇报,一口气讲了近两个小时。

《报告》充分肯定了西沙防区的总体形势、国防工程建设取得的成绩,以及全体指战员思想稳定,战斗情绪高昂,有战胜困难和来犯之敌、坚决完成守岛任务的勇气和决心,并针对防卫需要和部队急需解决的问题,提出了具体解决办法和措施。

《报告》提出的建议也有几十条,大到将西沙守卫任务由广州军区移交海军的重要战略考虑和修建机场、码头等国防重点工程建设;小到岛上守卫部队主副食供应、农副业生产和官兵体假等具体事务。既宏观又具体,都是从保卫西沙、建设西沙的角度出发的。《报告》得到了海军党委常委的一致赞同,会议当即决定转发《报告》,要求各单位“认真贯彻落实”。随后,海军党委就西沙的情况向中央军委写了报告

海军依据《报告》制定了具体方案,按照当前急需和长远需要,分两步实施。对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采取抓紧完善措施,以解西沙防卫的燃眉之急。对西沙群岛的长远建设,采取充分调查论证,搞好战略规划,逐步加以解决的办法。先后完成了建设舰船码头、开辟航道、修建机场等重点国防工程的论证施工。如今,这些项目一个个都已变成现实。

在西沙群岛调研期间,我也在思考另一个问题:如何尽快收复南沙被侵占的岛礁。

当时正是收复南沙的极有利时机。

南沙群岛同西沙群岛、东沙群岛、中沙群岛一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不仅有古今中外的大量史料、文献、地图和文物可以证明,而且也为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广泛的国际舆论所承认。这本来是没有任何异议的。1956年,南越西贡政权派兵侵犯我国南沙群岛。当年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雍文谦接见中国驻越大使馆临时代办李志民时,曾郑重表示:“根据越南方面的资料,从历史上看,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应当属于中国领土。”1958年9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并且明确指出:“这项规定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领土,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其他属于中国的岛屿。”同年9月14日,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照会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郑重表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承认和赞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58年9月4日关于领海决定的声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尊重这一决定”。1973年9月,南越又非法宣布将南沙群岛中的11个岛屿划归南越管辖。我国外交部于1974年1月11日提出强烈抗议,而南越却变本加厉,又先后侵占我南沙群岛的南子岛、敦谦沙州、景宏岛、南威岛、安波沙州等,严重侵犯我领土主权。这时北越和美国的巴黎和谈取得明显进展,越南北方军队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人民武装也在协同作战,南越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可以预计,越南南北方终将统一,这将对我解放南沙群岛带来更复杂的形势。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抓住当时这个有利机会,尽早解决南

沙问题,否则后患无穷。

回到北京,我口头向海军首长谈了这个想法和建议,希望向上反映,早下决心!可是,我人微言轻。我的意见没有引起领导重视。

中国政府从军事、政治、外交、经济等各方面大力支援越南北方政府的抗美斗争和统一战争,牺牲了許多人,花去了几百亿美元。但越南统一后,越南政府却出尔反尔,自食其言,背离它原来承认的西沙群岛、南沙群岛是中国领土的立场,声称南沙群岛是越南的领土,并继续扩大侵占南沙群岛的岛屿。与此同时,南沙群岛周边的一些国家,也相继侵占了一些岛屿,直至发展到今天这种复杂的局面。

1982年,我调任海军司令员时,派考察船队到南沙考察测量,查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已经占领南沙许多岛屿,并在海滩岛礁建起了高脚屋。我越发感到问题严重,向中央写出建议报告:应去南沙礁滩,建立高脚屋,立足占领,表明我在南沙的存在。后来,国际海洋法会议上,我国代表也建议在中国南沙建立海洋气象预报台。我抓住机会,用口头和书面方式请示军委领导,建议在永暑礁建立台站,得到批准。我们抓紧办了,取得一批成果。但问题远没有解决。

再回到1974年。实际上,关于西沙、南沙建设问题,1974年6月12日中央军委会议专门研究过。我去西沙调研前后都没听到传达,也不知道此事。直到90年代我到军委工作以后,才对此事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

当时,参加会议的邓小平同志表态非常明确。他是把西沙设防、收复南沙、解放台湾,当做一个大问题和海军建设统一来考虑的。会议确定,统一搞个西沙巡防区。1974年7月,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批复了西沙设防计划。

我在1974年10月登上永兴岛时看到两块纪念碑：一块是1909年清政府水师提督视察西沙纪念碑；一块是1946年中国政府派员接收西沙的“海军收复西沙群岛纪念碑”。我说：“当西沙码头建立后，再建一座纪念碑。”

我任海军司令员后，码头扩建完成，西沙机场也在1992年建起来了，海军便建了一座新碑，矗立在永兴岛码头上。它向世界宣示了中国人民保卫西沙、建设西沙、捍卫西沙主权、维护祖国海洋权益的坚强决心。

1986年元旦，我陪同胡耀邦同志视察西沙群岛，并在永兴岛植树造林，同守备部队辞旧迎新。胡耀邦为海军驻西沙部队题词“为了祖国安全，敢斗狂风恶浪”，以为纪念。后又有总部、海军、广州军区的杨得志、杨勇、迟浩田、李耀文、张连忠、尤太忠等许多登岛的领导人，都相继植树。现在，这些树木郁郁葱葱，人称“将军林”。

赴朝考察

70年代初，国际形势紧张，国内经济情况也不好。1971年9月上旬，叶剑英副主席把我叫去，交给我任务：带一个团去朝鲜考察，以制定援建方案。

我有些意外和为难。意外的是，我这个审查还没有结论，是“不能用”的人，领导却赋予我这样的重任；为难的是，我只是海军副参谋长，职务与任务不太适应。叶帅看出了我的为难。他先交代了情况，又说：这项工作是周总理1970年4月访问朝鲜与金日成、崔庸健会谈后决定的援朝重点项目。1971年8月，周总理再次会见朝鲜人民军吴振宇总参谋长时又同意加快实施这项援外工程。他接着说，周总理要军委考

虑派一个政治上强、能把握外交政策，又懂得装备技术和工业建设的同志，就选上你了。“你是代表国家和军队的”。

叶帅这么说，我很兴奋，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信任。

我抓紧时间到总参谋部、总后勤部、外经部等有关领导机关请示如何执行任务。我翻阅了中朝两国政府于1968年10月签订的“经济技术合作协定”、1971年9月签订的“军援协定”和1971年10月签订的“经济援助议定书”。中央、国务院和军委十分关注中、朝两国两军的友好关系和经济技术合作。由海军、炮兵、六机部有关单位选调了36人，于9月底组成“赴朝学习考察团”。

考察团分为五个专业考察组。全团统一着海军当时的蓝灰色制服。

1971年10月18日，考察团离开北京，19日到达平壤。大部分团员在朝鲜逗留了48天。部分人员因与朝方继续会谈，延长了一个星期，于12月12日回国。代表团的总结汇报工作，到年底才结束。

我团在朝鲜工作期间，受到了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的热情欢迎和盛情接待。金铁万第一副总参谋长举行欢迎和欢送宴会。11月21日和11月28日，两次在民族保卫省大楼正式会谈。吴振宇总参谋长接见我团全体同志，并举行午宴招待。在我驻朝使馆党委的直接领导和全团同志的共同努力下，我们较好地完成了任务。

考察期间，技术人员日夜加班，就工程建设的规划、生产规模等，在内部反复研究后，与朝方进行了充分讨论，并取得一致意见。最后把协调一致的内容写成了会谈纪要。

金铁万第一副总长说：“中国学习考察团的同志，非常珍惜朝、中两国人民和军队之间的友谊，处处支持和帮助朝鲜人

民的建设事业和正义斗争,为进一步发展朝中友谊做出了新的贡献。”

回国后,我们的建议得到上级和主管部门认可,对考察团的考察、谈判等表示满意。1972年1月21日,周总理在外经部、六机部和总后勤部转呈我考察谈判情况的联合报告上批示:“要加快工程进度。”六机部为此成立了“十三号工程办公室”,仅用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于1973年12月完成了援建任务。

自这次援朝后,我又因公到朝鲜访问过,朝鲜国家和军队领导人来华访问时我曾多次接待,我与他们结下了深厚友谊。特别是1989年10月我到朝鲜访问时,朝鲜政府总理李钟玉亲自授予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旗勋章,给予我很高的荣誉。

援越扫雷

1964年开始的美国侵越战争,尽管美国投入的兵力逐步升级,仍不断遭到失败。到1972年5月,美国在大举增调海、空兵力,恢复轰炸越南北方的同时,开始对越南北方沿海航道、港口、河道实施大规模的水雷封锁,使越南北方水上运输受到严重威胁。为此,越南政府要求中国派海军部队帮助扫雷。

此前,我国曾应越方要求派出由海军部队和研究单位组成的考察团,了解美国水雷和越南反水雷斗争情况,并提出过援越扫雷预案。七院有关研究所也开始结合国内的扫雷训练,有针对性地研制了几型新扫雷具(艇)。很遗憾,由于“文化大革命”,这些工作被冲击乃至搁置起来。七院技术人员多

次向我反映,反水雷武器研制应该早有准备。

经海军首长同意,1971年8月,我在北京组织了“反水雷兵器座谈会”,讨论了反水雷斗争的重要意义,并初步选定几种扫雷具列入第一代装备系列。

我要求在1972年左右完成有关反水雷兵器科研生产,以便有能力在近海、港湾、内河扫除一般的锚雷、漂雷、常用的磁感应和音响及其联合引信的沉底雷。

座谈会建议,对现有扫雷舰艇进行全面检查,补缺配套,以便能应急执行扫雷任务;各舰队修理厂设置扫雷具修配车间;一机部承担过反水雷兵器任务的工厂,应继续发挥作用;六机部应尽快筹建反水雷兵器总装厂和配套厂等等。

但由于时逢“文革”,抓路线、搞派性,有些领导难抓实事,有些同志想干实事而管理体制又不顺,所以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972年5月9日和5月中旬,针对美国对越南北方水域实施大规模布雷封锁与越方政府的要求,周总理两次召见海司负责人和分管领导,指示要派人、调艇,去援越扫雷,要加紧训练和试验研究。如需生产某些设备器材,告国防工办和国家计委。

我参加了5月中旬那次周总理召见会。回来后,向萧司令员汇报了周总理、叶副主席关于组织部队入越扫雷指示,谈了自己的想法和建议。萧司令员讲:美帝在越南布雷,总理亲自抓,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促进;我们要借这个东风好好抓一下。入越部队要立即做好摸雷、破雷、避雷和运输准备,抓紧训练,研究方法;北海、东海舰队,要利用这个机会把技术干部集中起来训练,不仅抓部队,还要科研单位动起来,把部队解决不了的问题让他们去研究;要利用这个机会,培养一支扫雷

部队；入越扫雷问题必须做长期准备，这次要狠狠地抓一下，把扫雷部队抓起来，这是海军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

萧司令员的指示用海司通知发出，并让我抓一下这项工作。

当时主管扫雷装备科研和订货的单位是海军后勤部装备部。我和海后张瑞基副部长商量，在5月30日联合召开了援越扫雷装备紧急会议。到会的有六机部、七院、论证部、七〇八所、七一〇所、各舰队和海司作战部、海后装备部、修理部、船办等单位的负责同志和代表30余人。会议传达了毛主席、周总理、叶副主席以及萧司令员对援越扫雷问题的指示，介绍了美国对越南沿海港口进行布雷封锁的有关敌情，研究了援越扫雷的应急措施。到会同志一致表示，援越扫雷是我们海军和国防工业部门义不容辞的任务，一定要全力以赴，通过执行这一任务，促进我海军扫雷部队的建设。

会议主要研究了执行援越扫雷任务中器材准备的应急措施，给工业科研单位提出了任务，要求他们以临战姿态，迅速安排落实，紧密配合海军援越扫雷的技术保障，推动扫雷艇具的研制、试验、修复、配套工作。

1972年7月，我军分两批进入越南的扫雷艇队用的装备，就是这批六七十年代先后安排研制、而在1972年上半年突击完成建造和修理的。12月23日，我们又派出新的扫雷艇入越。

依靠这批扫雷装备，我们的指战员在越南奋战了一年多，清除了美国布放的高、低灵敏度的几种水雷。越南海军检查确认，航道清扫目的已经达到。

1973年8月，扫雷部队全部凯旋。

憋不住的“汇报”

海军建设需要有一个科学的长远规划。

我在海军和国防科研部门呆了20多年，一直关注海军建设，接触了大量国内外相关资料，尤其是重回海军后，看了大量中外海军建设的书籍史料，对我国的海军建设也形成了不少新的认识和想法。我曾多次主持或参与搞过规划、计划，遗憾的是，海军这个时期先后编制了三个规划，开始两个我参加了，后一个不让我参加，有些情况是事后才知道的。

当时，我对后一个“规划”的基本看法是：指导方针混乱，只顾眼前、忽视长远，急于求成，重生产、轻科研。时而大计划、高指标；时而降低要求，不敢采用高新技术，迁就落后。重大问题拿不定主意。因此，势必丧失许多宝贵时机。

1970年9月25日，毛泽东主席接见巴基斯坦海军司令哈桑中将，针对中国海军建设讲了一段话。毛主席说：“讲到海军，我们恐怕是不行……比如造船，听说我们本来还可以多造一些……现在一些大国欺负我们……什么印度洋、太平洋都被他们霸占着。所以我们也得搞一点海军。”

看到毛主席的谈话，我觉得这是好机会，应该抓住这个机会，从长远考虑造船和海军发展。1970年秋天，海军让造船工业科研领导小组编制“四五”规划，指定周希汉和我组织六机部、七院、三院等有关领导和专家研究编制。我们提出了编制方案，经海军党委常委讨论于12月20日上报。

这一方案提出了海军装备建设的方针。可惜由于1971年中央军委以及国防工业、科研系统领导成员有较大变动，这个“规划”没有研究，也没回音，流产了。

1973年7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指示,对当前军队建设急需解决的问题要进行调查研究。海军调研组制订了一个规划,年底基本完成。可一直到1974年2月,海军也没讨论,最后只能以海军调研组名义上报军委研究小组。

1974年5月28日,总参谋部、国防工办又联合布置,要求编报十年装备发展规划,包含“五五”、“六五”,延伸到1985年前的设想。这项工作海军做过什么研究,我不知道。

1975年5月3日,毛主席对海军作了指示:“海军要搞好,使敌人怕。我们海军只有这样大(指小手指头)。”5月23日,毛主席又对苏振华关于海军发展的报告做了批示:“同意。努力奋斗,十年达到目标。”

这个精神传达下去,加快了十年规划的编报步伐。不到一个月,海军党委与六机部党的核心小组,于6月16日,就联合上报了《关于海军舰艇十年发展规划的请示报告》。

这个“规划”编制时,不让我参加,我还有些奇怪。后来才知道,这个阶段不让我参与这些工作,是因为正在对我进行政治审查。

8月末,我看到了这份“规划”,非常失望。

这份“规划”中,前三部分讲规划根据、指导思想、建造方针,引用了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但对这些精神理解不透彻,尤其是结合海军作战实际研究不够。后几部分则与上述精神很不相符。这段时间我还看到了1975年5月13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向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呈报的《关于国防工业和部队装备问题汇报会的情况报告》,《报告》提出了海军装备发展的重点,但在海军的十年规划中,这点没有得到体现。

尤其让我吃惊的是,“规划”只强调产量,提出要达到70万吨以上规模,却不讲装备水平与质量,居然把早就落后的登

陆舰和海上民兵装备,也列为“五五”科研重点。

我好几天睡不着觉。这是海军和国防建设的一件大事,竟处理得这么不切实际。想来想去,我觉得不能沉默。作为一名海军军官,一名共产党员,我有责任表达自己的忧虑。就算我还在被审查,入了另册,我总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公民,也有义务尽自己的责任。

9月初,我用两天时间写出了《关于海军装备问题的汇报》,呈报邓副主席并毛主席。

《汇报》抄了一份送给海军政委苏振华,并附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学习了毛主席最近对海军两次极为重要的指示,联系到我们海军当前的状况和今后海军建设,特别是海军装备建设发展方向问题,有些想法和意见”。“海军贯彻毛主席两次批示和贯彻军委扩大会议的两次常委扩大会议,头一次留我招呼司令部工作,后一次没有参加,都没有机会讲意见。因此有些想法和意见总想讲讲,向上级反映一下”。“我现在不负责这方面工作”,“我觉得,今后十年是海军建设的关键时刻,下一步棋子走得好坏,事关重大。这是如何结束海军的过去,创造海军未来的全新面貌的问题。强大的海军不仅要数量,更要质量”。“我又觉得,这似乎是不应由我过分担忧的事”,但是,“今天还是一个海军的战斗员,不管怎样,还有一分责任感,有责任建议”。

我是9月3日将《汇报》送呈邓小平副主席的。

邓小平副主席很重视,第二天,即9月4日,就把我的《汇报》批给苏振华政委:“请你考虑一下,我看有些意见值得重视。”

这份《汇报》中,我肯定了海军装备建设和造船工业科研方面的成就,如“我国的核潜艇和导弹驱逐舰,均在1960年左

右开始研制,中间一度下马,于1966年左右又上马。其设计指导思想以我国当时的科技水平和工业基础条件为依据,虽考虑到技术的发展,但在制造过程中有些技术要求达不到,又降低技术指标,后来经过努力终于基本试验成功,这是个大的胜利。”

我在《汇报》中的建议,则是针对“十年规划”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来的。主要有八个问题:

第一,十年规划确定,大量生产过时的潜艇。如常规鱼雷潜艇,这是仿制苏联四五十年代的产品,其性能落后,水下航速慢,逗留时间短,一定时间必须浮到水面充电;它的噪声大,易被发现,水声与通信设备很差,不能大编队活动。我们在七八十年代还大量建造四五十年代的装备,到90年代甚至21世纪还得使用它(因一艘潜艇使用寿命在30年以上),虽然潜艇在水下活动比较隐蔽、机动,但在现代条件下,用这种落后的潜艇作战是大有问题的。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即停造这类电机为主要动力的潜艇。苏联近年来亦停造这类潜艇。他们主要建造核动力潜艇。我们因核动力一时还不会很多,一二年内还可以少造点这种潜艇,以维持生产线。即使是还要采用这种电机为主要动力的潜艇,也必须尽快研究设计新型的潜艇,如加大它在水下的航速、增大水下逗留时间和下潜深度,降低噪音,以及改进提高潜艇所用的武器,如鱼雷和水下发射的各种类型导弹、水雷和水下的观通设备等。同时,要研究使用这些新型潜艇的作战使用原则、使用的海区(热带和寒带海区不能一个设计方案)以及与它协同作战的其他兵力、兵器和各种补给辅助工具问题。

第二,十年规划中,确定大量生产落后的“21”型导弹快艇。猛一听导弹艇似乎是尖端,其实它现在已是普通的常规

导弹艇,是苏联 50 年代的产品,技术已很落后,艇和弹的性能都很差。因苏联转给十几个国家,已无秘密,美国人早已掌握,打起仗来一干扰完全无用。我们现有这种导弹艇,因不好使用,已成为部队的包袱。我认为应立即停止生产,将工厂和科研单位的力量集中,重新设计试制吨位大、速度快、加强火炮、增大导弹射程的新艇,把没有解决的技术关都解决。生产厂可以为现用艇制造零配件。不图形式上的数量多,一定要质量好。

第三,十年规划继续生产一种基地扫雷舰。这是我们在 50 年代就仿制生产的一种舰艇,是苏联三四十年代的产品,只能对几种老式水雷还有用。而美国在越南布放的水雷所用引信装置,虽只用了几种(已知美海军有 70 多种水雷引信的装置),这样的扫雷舰用作扫现代水雷是根本无作用的。应研制生产大量各种新型的扫雷舰艇装备部队,以对付敌人的各种水雷。我国沿岸水浅,最便于敌人布雷,必须重视反水雷战。

第四,十年规划生产安排,仍是大量建造各种小型舰艇。仅以鱼雷、导弹、护卫、扫雷、反潜等五型舰艇数量来看,占十年规划的作战舰艇的 78%。这些舰艇除数量比现有的增多一倍外,其他都没有什么变化。这就是说,海军装备现在是怎样,十年之后大体上还是没有大的改变,仍然还是没有多少舰艇能到中、远海去执行主要的战略任务。这些小型舰艇在近海作战还有某些优点,还是需要一部分。但是,小型舰艇多了就带来更复杂的问题,如要建筑更多港湾码头为其停靠,就要数倍的增加维修设备、供应保障设施,在岸上要设置庞大服务保障机构,非战斗人员大增,结果是岸军大于海军。其他的问题还很多。我认为应按我国海区特点、作战需要,重新研究设

计新型艇。应增大排水量,增强各种武器的威力和设备的效能。可以将鱼雷艇、导弹艇、火炮艇三者合一,排水量 400 吨左右,使它能在较复杂的气象条件下使用作战。这样做对海军其他建设与备战更加有利。

第五,十年规划对那些技术还不过关、武器装备还不配套、研制试验工作还未结束的中、大型舰艇和潜艇即进行大量生产。这种做法是极其不妥当的。照一个设计方案大批生产,这是不符合制造尖端的中、大型舰艇特点的。美国已搞了十几代产品,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大大改进提高它,要急于按照技术上还很不先进、很不成熟的头一个设计方案大量生产呢?我们是有能力、有条件、有时间可以大大改进它的。我们一年造不了多少艘,多少年内综合起来也没有多少艘。美、苏两国在几十年内也只各搞了核潜艇 100 余艘、驱逐舰近 200 艘,他们技术很发达,也只是设计一次图纸(方案),技术成熟了才生产四、六艘左右。采取简单硬性的办法,是对国家不负责任的表现。我认为对这类舰艇建造一定要精心设计,精心制造,马虎不得,特别是核潜艇易出重大事故(美、苏的核潜艇已发生多次爆炸沉没)。应在原型(首制舰)基础上(包括其重要设备)认真进行修改设计,纠正重大缺点,重要设备的技术难关一定要解决,经过改进设计,再批产二、四艘,再改进,再生产。这样看起来对生产有点麻烦,但给国家减少了大麻烦,节省了钱,造出真正过硬的作战舰艇,利于作战。只要计划协调搞好,只能促进生产,不会影响生产。

第六,十年规划从生产与科研的安排,都没有解决海军各兵种装备的技术配套问题,更没有解决各兵种战役战术协同作战的问题。现在海军各兵种多是单一的舰型,它要实施各种战斗任务。它要完成鱼雷攻击,就不能进行布雷、战役侦

察、各种遣送和运输等任务。由于现有的潜艇水下观通设备差,一艘潜艇不能指挥多艘艇,都靠岸上电台指挥(没有专用的指挥潜艇)。将来有数百艘潜艇在各洋作战,只靠岸上后方指挥是靠不住的。没有战区临战指挥,必打败仗。我们那么多的潜艇(包括核潜艇),总不能只用于水浅而海区狭窄的黄海、东海和礁多、岛多的南海海区,这些海区还有大量的近海舰艇和航空兵活动。潜艇必须到东北、中部太平洋乃至印度洋去活动。因此,对它的指挥、战斗掩护,对它进行各种物资弹药补给(靠水面运输是困难的)等问题不解决,仅靠潜艇(特别只单一型的潜艇)部队本身去执行这些战斗任务是困难的。二次大战,德国鼓吹一时、不可一世的潜水战失败的教训,可作为我们研究建设潜艇部队的参考。德国潜艇在战争初期,因美、英船队根本无防潜措施,所以击沉大量商船。但在英、美海军从加强远程航空兵、航空母舰、各种水面舰艇大力协同反潜作战后,在1943年1至5月期间德国的潜水战彻底破产了,在四个月内仅被击沉的潜艇87艘。当时在列作战的潜艇约200艘左右。美、英从空中和水而舰艇封锁德国的潜艇基地(如比斯开湾各基地),使港内的潜艇出不去,海外的回不来,德国就基本上没有潜艇在海洋活动了。一个主要原因是德国潜艇部队(也是单种潜艇)得不到自己的水面舰与空军的支援。当前美、苏都在全力发展各种水上飞机,反潜直升机母舰,护航航空母舰,各种反潜水面舰艇,反潜潜艇,在各岸边岛屿上大量设置远距离的水下侦潜艇的固定声呐站,专门设置反潜区与封锁线。今后仍靠单一的潜艇在海上活动就更困难了,必须研究对付的办法。办法也是有的。我认为,从潜艇部队本身要研制各种的型号的作战潜艇,如携带鱼雷、各种导弹、水雷等攻击型的,和在海上指挥潜艇作战的指挥艇,专门

补给和运输、救护的艇。更重要的是,要解决支援潜艇作战的水面舰艇和飞机问题,才可以更好地发挥潜艇部队的作用。我们的水面舰艇(驱逐舰、护卫舰、猎潜舰),也都是单一型号的舰艇,战术不配套,协同作战困难。我认为舰艇研制方针,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多快好省的总路线精神,在技术上要力争先进。舰型应以战术配套为原则,主要是武备和设备搞好标准化、系列化;同时,一般还应采取一舰多用的原则,但又必须是有所侧重,突出重点。由于现代技术复杂,各种武器已经不是单一的火器,而是武器系统。如导弹(火炮、鱼雷亦同),除它本身各种机械的自动化程度很高外,还必须给它配上射击雷达和射击指挥仪,形成庞大的武器系统。正因如此,要使一型舰艇全面完成各种战斗任务,则需在舰上设置各种武器系统。如是使一型舰艇的技术过于庞杂,战斗使用不利,既没有突出重点的攻击武器,分散力量,又给舰艇制造带来困难。

第七,十年规划研制和生产的大、中型驱逐舰、小型护卫舰,它们本身反潜、防空的能力有限,武器装备的技术水平很低,到中、远海执行任务战斗力量还很弱,没有解决空中掩护问题。海军现有一支航空兵,在近海作战,无论现在和将来还有一定作用。但因作战半径离岸仅有 200 海里,它对 200 海里外的海上作战的舰艇和潜艇没有支援能力。

海军作战的方针仍是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在近海歼敌为主,同时也要敌进我进,既要在近海,也一定要到远海敌后去打击歼灭敌人。为了解决水面舰艇和潜艇到中、远海作战的空中掩护、支援配合问题,我认为有必要尽早着手研制攻击型和护航型航空母舰(先搞常规动力的,排水量在 4 万吨左右,不一定搞 8 万、10 万吨的)。我建议不要再搞十年规划中

的8000吨的大型导弹驱逐舰(论证几年,方案多变,尚未建造)。可将现已试制出的中型导弹驱逐舰改进提高,来代替它,将搞大型驱逐舰的人力财力拿出来搞航空母舰。因为海上的战斗规律早就是空中、水面、水下各种兵力的协同战斗。我国要大搞经济建设,有些重要战略物资还需从国外进口,必将大大发展海外贸易,掩护海洋交通和保护海洋资源的任务都是繁重的。但是我们不能到外国去建设任何基地,只有解决机动的飞机场和导弹发射场。执行上述任务离不开去远海。要到远海作战就不能违反这个立体协同作战的客观规律。霸权主义激烈争夺海洋,拼命扩充海军,广泛发展水下、水面、空中乃至所谓轨道武器。将来大战发生,海上战争将比历史上任何一次大战的规模要大,要激烈。把战略导弹和飞机放在大型潜艇、水面舰艇、航空母舰上要机动得多,不易受到摧毁。我们暂时不一定要在这方面同敌人相比,也不一定按敌人的办法干。但是总得要研究对付的办法才行,而且相差的距离不能太远,不能闭眼捉麻雀。我国现有工业和科学技术条件是足以具备解决制造航空母舰的问题的。国家各种机械、造船、航空、电子等工业均较发达,钢铁及其他各种材料亦基本具备。英国1918年开始建造航母,当年产钢969万吨;美国1921年开始建造航母,当年产钢2010万吨;日本1931年开始建造航母,当年产钢188万吨。主席与中央已决心加快海军的建设速度,很振奋人心,若计划实现,海军就比较强大了。但建设强大的海军其重点决不能放在搞小艇上,将它搞得再多,敌人也不怕(因为敌人的观点是护卫舰以上才算海上作战舰艇),必须解决关键性的作战舰艇。十年预计投资在建造舰艇一项的费用为120亿元,国家还要投入大量贵重的稀有材料和各种物资,这些钱财一定要用在刀刃上,次要

的和易造的小艇可以缓办或不办。要抓紧时间,在前七年左右将航母首舰试制出来,十年末形成战斗力。如果这个十年,特别“五五”不上马,那就是要在20年之后我国才有航空母舰。因为它的研制周期起码要七年左右的时间,而且我们又是开头做起,时间更到的多些。我们一定要建设既有数量又有高质量的强大海军。

第八,十年规划安排了几型中、大舰艇的研制,以及对正在生产的产品改进提高,实际上都是十几年前就开始研制而没有完成的项目,基本上没有安排新研制项目。海军要有高质量的技术装备,必须从开展科研工作来解决,应争取在今后十年内多研制几型中、大水面舰艇。研制中、大舰艇的周期一般都要四至六年,甚至更长时间,才出一代产品。因此要根据海军的作战任务和未来作战的特点、作战对象,并根据国民经济情况和工业水平,提出对新型舰艇、武器装备及其系列化的研制要求,使研制工作有计划、不间断地进行。若不从战略全局打算,只抓一些局部、次要的,不下大的决心,要想拿出好的装备是不可能的。战争胜负,人是决定因素,但武器是重要因素。过去我军是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小米加步枪,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这是我军的光荣传统,今后更要发扬光大。但我们现在条件不同了,应该是需要打什么样的仗、执行什么样的任务来准备什么样的武器,而且对各种武器装备要搞得更好些,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而且都要超过它。毛主席说:“我们的陆军、空军和海军都必须要有充分的机械化的装备和设备”。“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我们已具有强大的科技、工业经济基础,只要狠抓,就可解决。科研工作既要争取战争未发生的时间,大上,大干,而且在战时更要大搞,才能跟上战争需要。我国的钢材和物

资还有限,搞了旧的就不能搞更多新的。我们研制新的大型舰艇,也不是一律追求增大舰艇排水量的吨位,但是排水量吨位太小了是不行的。按照我们的战略思想和作战方法、海区特点,一般护卫舰排水量在 2000 吨左右、驱逐舰排水量在 4000 吨左右比较适宜(航空母舰除外)。要做到我们驱逐舰与敌人同等舰相比,比它的排水量吨位要小,速度更快,武器打击威力比它强,不沉性还好。只要抓紧科研工作,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主要是要提高设计的质量,把技术水平提高。对各种战斗舰艇来讲,除舰艇本身的性能外,更主要的是各种武备系统的性能。如火炮的自动化和发射率高,鱼雷、导弹的射程及它们的射击雷达、指挥仪系统完全配套并协调一致,潜艇的惯性导航仪、水下声纳、舰用直升飞机等等,都要解决好。这些都是影响舰艇战斗力的重要因素。

海军装备发展规划之所以存在上述问题,我认为与海军领导机关对未来战争中海军承担的作战任务,对主席的战略思想、作战方法,对未来海战的特点、作战对象、科技发展趋势等,缺乏深入研究、心中无数有关。因此,对装备技术的发展,不论近期或远期的,都缺乏从战略全局出发考虑,而是局部的、单个的、互不联系的处理问题。

海军建设已经 26 年。主席对建设一支强大海军的重要指示有几十次。正由于主席的亲切关怀,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重视,海军建设才取得了很大成绩,已形成一支战斗力量。在沿海对敌斗争中打过很多胜仗,表现英勇顽强,发扬了解放军的光荣传统,这些是主流,应予肯定。但海军建设过程中,确实受到林彪一伙的干扰破坏,加上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使海军建设的速度缓慢,战斗力量还很弱小。面对当前海军这种状态,我是在海军下面工作过多年的干部,感到内心自愧。对

于过去,当然不能怨天尤人,只能总结经验,接受教训,积极改进工作。由陆军到海军不会搞,最初难免。不会不懂,又不善于学习,不注意总结经验。如搞海军装备,最初搞常规(开始时是对的),不久又觉得常规落后,要大搞尖端;尖端上不去,感到困难多没有信心、决心,还是拣容易搞的东西搞,又满足于现状。现代的常规中有尖端,尖端之中有常规,常规也要高水平、高质量的才行。海军这样复杂的军种不重视技术建设,是不堪设想的。我们搞了多年海军还是陆地概念多,对海洋不研究,不学基本知识,又不到实践中去,加上脑子里形而上学的东西多,就不可能把海军的事情办好。我们应很好总结自己的经验,接受教训,今后十年不能再走大弯路,小弯路也不应走,也不应走老路,一定要把工作做得更好些,以实现建设一支强大海军的目的。

以上意见可能很多不对,不管怎样,将自己的想法讲出来。

后来听说,《汇报》在海军常委、海军机关和各大部引起不少议论。有赞同支持的,也有怀疑和否定的。我的想法很简单,只要能引起大家深入研究海军现代化建设问题,《汇报》的目的就基本上达到了。

事情的发展表明,这段时间思考的问题对后来我又到海军任职很有益处。《汇报》中提出的建议思路同以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新时期形势与战略判断所做的决策也大体上是一致的。有些建议在海军的装备建设中逐步得到了实现,有些建议则在实践中又有新的充实和发展。

第十三章 整顿中科院

《汇报提纲》

1975年8月,聂荣臻对我说:“你去科学院,小平也赞成。”

六七十年代,世界科技发展十分迅猛。我们却闭关锁国,忙着搞运动。

中国科学院创建于1949年11月1日,经过艰苦创业,逐步发展壮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全国科学研究中心,在我国科技领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到了“文革”时期,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委、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都归并到中国科学院统管。令人痛惜的是,十年浩劫,中国科学院受到了严重破坏,科学研究工作被迫停顿或延缓,各级领导和大批专家学者受到残酷打击和摧残。除院长郭沫若有幸受到特别的保护外,许多知名专家,包括副院长吴有训和其他高级研究员,无一幸免地受到不同程度批判,让人感觉到像一场民族科技精英的大劫难。显然,这种情况任其发展下去,中华民族别说

“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连继续生存都会成问题。

1975年，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相继病重，病情迅速恶化。小平同志第一次复出，主持中共中央工作。

在我看来，小平同志作为“中国最大的走资派”之一，能够重新复出，是历史对我们民族的一份恩宠。面对“积重难返”的严峻局面，小平同志高瞻远瞩，以极大魄力提出了全面整顿的治国方针。7月，中央决定胡耀邦等人去“整顿科学院”，加强领导。当时，郭沫若院长任院核心领导小组组长，耀邦为第一副组长，主持日常工作。核心领导小组成员中，还有李昌、王光伟、我和王屏；再加上原有的武衡、郁文、胡克实等人（到了1977年1月，改为方毅任核心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副院长，主持日常工作）。

我因身体不适，住院治疗，晚去了两个多月，在国庆节前才正式上班。

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副总理一直关注中科院的“文化大革命”和科研工作进展。“文革”开始不久，刘西尧受周总理委派，作为联络员去了中科院。1973年，又派了周荣鑫去。但在当时的大气候下均于事无补，他们根本不可能扭转日益恶化的局势。到了耀邦和我们去的时候，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早就明里暗里插手，使这里形成了依附“四人帮”的小帮派，斗争更加复杂激烈。

耀邦等同志到中科院后，深入各研究所和工厂，了解情况，同专家座谈，听取意见，调查研究，中心点是如何把秩序恢复起来，把科学研究工作搞上去。同时也考虑要干几件事情：一是准备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汇报；二是着手编制科技工作长远规划；三是酝酿改组中国科学院的党的核心小组。核心小组考虑，经过近十年“动乱”之后，政策混乱，组织混乱，人的

思想也混乱。如何看待科学技术,怎样开展科学研究,必须要统一思想,明确政策,并取得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支持。在这种考虑下,《汇报提纲》(即《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便首先提上了议程。这份《汇报提纲》三易其稿,共 1.3 万字。1975 年 9 月 26 日,在小平主持的国务院会议上讨论并基本通过。

我去中科院晚了两个月,没有参与《汇报提纲》的具体研究讨论,后来我看到了这份材料,完全同意它的观点。

《汇报提纲》共写了六个问题:一、关于充分肯定科技战线上的成绩问题;二、关于科技工作的组织领导问题;三、关于力求弄通毛主席提出科技战线的具体路线问题;四、关于科技战线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五、关于科技十年规划轮廓的初步设想问题;六、关于院部和直属单位的整顿问题。

在 1975 年的特殊政治氛围下,《汇报提纲》提出的问题和阐述的一些观点,表现了一批共产党人对国家和民族的高度责任感。当然,在对问题的表述中,也体现了政治智慧,采取了大量引用毛泽东主席论述的办法,在许多提法上,显得很谨慎和留有余地。正如小平同志后来所说的,“当时是采取勉强能接受的水平写的,真要解决问题就不够了”。

即使这样,《汇报提纲》也和《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一起被江青之流诬蔑为“三株大毒草”。《汇报提纲》也是所谓“邓小平修正主义纲领的产物”,是“在科技界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成为邓小平“右倾翻案风”的重要“罪状”,印发全国,发动批判。

“四人帮”对《汇报提纲》大加讨伐,其主要原因无非因为《汇报提纲》肯定了科研战线的成绩和知识分子队伍的主流。《汇报提纲》中说,“经过三大革命斗争实践锻炼,绝大多数人

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并且为独立自主地解决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的一些重大科学技术问题作出了贡献”；“20多年来，科技战线上的绝大多数领导干部、科技人员和广大职工，辛勤努力，成绩是主要的”。

当然，这种肯定，不可避免地引出了另外一个要害问题：即否定了“文革”借以发动的依据，否定了对我国基本情况的估计和“文革”的现实必要性。

1975年11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打招呼会议”。全国开始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2月份，科学院核心小组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主席批示和中共中央23号文件，即“打招呼会议”精神。会后讨论，需要每个人都谈出自己意见。我说，对《汇报提纲》的思想，我看了后是非常同意的。看不出有什么不好，觉得还非这样不可。这说明我的思想也是这个样子。如果早一点来上班的话，也会犯错误。因为思想基础是“保守”的。

我的发言以“检讨”名义出现，但观点是明确的，谁也听得出来。“四人帮”在科学院的小帮派对我们领导班子成员进行“阶级分析”时，我被列入“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账”一类里。他们的策略很明显，把我们去科学院整顿的五个人和已在那时担任领导工作的武衡、郁文、胡克实等分批打倒，实现全面夺权的图谋。

1975年12月8日，中国科学院造反派头头写了一封诬告信，大意是：科学院胡、李（昌）来后，没有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主流；不讲党的基本路线，不抓阶级斗争；否定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把年轻干部打下去，调60多人来；核心组有些同志带头翻案。

就是这样一封纯属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信，毛泽东主席

却作了有倾向性的批示：“印发政治局（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一份），予以调查研究”。

此后，对我们的批判陡然升级。

作为核心领导小组主持日常工作的副组长，胡耀邦自然首当其冲。我曾劝胡“把住口”，少讲，说多了还要抓住批斗，过不了关。胡耀邦连遭批斗，被逼交代“罪行”，再次被打倒。

广大科技人员渴望发展中国科学事业的积极性，又一次遭到打击。

我们原来整顿的重点是领导班子，因此，领导权的争夺，在科学院也表现得针锋相对。把胡耀邦和李昌打下去后，临时主持工作的人不坚定，软弱迎合，实际是让权。那帮人抓紧时机，自行改组院核心小组，并策划让三个造反派头头当院核心小组副组长。我们进行了抵制。针对当时的具体人和具体作法，我说：“我赞成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但改组需要有中央的指示和意图。没有上级指示，这样做是错误的，不行的”。

清查“反革命罪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愈演愈烈，直到粉粹“四人帮”才使他们改组院核心小组的图谋没能实现。

广大职工同“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76年4月4日，清明节悼念周总理，掀起了反对“四人帮”、拥护邓小平的人民革命运动。科学院的科技人员、包括一〇九厂广大职工的高度觉悟和英勇斗争精神，在首都和全国引起广泛的反响和称赞。

1976年是我国非同寻常的一年。这一年，天灾人祸不断，悲痛忧患交加。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4月5日，天安门广场发生“四五”事件；4月7日，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

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一连串重大事件,使中国人民的心理承受能力受到巨大考验。

10月7日,中国历史拐了个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的“四人帮”终于倒台了!

中国普天同庆。

中国科学院重新走上正轨,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五子登科”

奶牛吃草,挤出来的是奶。用这个比喻中国当年的科技人员,我看很恰当。

科技人员为国家的科技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可他们的生活条件和物质待遇却很差。他们把对生活的期望,用了一个老词来概括,叫做“五子登科”。所谓“五子”,指的是房子、炉子、车子、孩子、妻子。可以看出,他们对生活的要求并不过高,甚至可以说只是一些基本的需求。

我在科研单位工作多年,深知应该尊重和依靠科技人员,也清楚解决他们生活困难的重要和紧迫性。然而在“四人帮”横行时期,科技人员都成了“臭老九”,要想“五子登科”,确实比登天还难。我们经过种种努力,也只能帮他们在某些地方有所改善而已。

邓小平一向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就坚定地认为“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以他一向务实的态度指出:要选党性好、组织能力强的人搞后勤,给科技人员创造好科研工作的条件。后来他甚至讲过:我给你们当科研工作的后勤部长。

我作为院核心小组成员,除了参与全面工作研究决策,还

分工主管后勤、基建和外事工作。我也想从这里入手,了解情况,逐步熟悉业务。

中国科学院的基础设施建设较差,加上“文革”已经折腾了八九年,科研条件和生活保障环境在恶化。我想,要把科学研究工作恢复和开展起来,必须改善保障条件,力求后勤先行。可困难成山:试验仪器设备陈旧老化,图书资料缺乏,试验室和宿舍极度紧张,交通工具难保证,子女入托入学容纳不下,吃饭和取暖困难,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等等,群众反映极为强烈,希望能早日“五子登科”。

实际上,就连郭沫若、周培源、吴有训等这些我国科技界领导和名人,工作和生活条件也都困难。我专门拜访他们,尽力给予保障。

显然,不认真解决这些基本的工作生活条件问题,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把科技工作搞上去,那是一句空话。

面对这些困难,我们同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科技人员一起,顶风逆浪,尽力工作。

当时,我国国民经济、国防建设的发展,对时间同步精度的要求已提高到微秒量级,急需建立我国的授时台。为此,决定建立一个长波授时系统。所谓长波授时系统主要由原子时间频率基准,长波无线电发播、接收系统和无线电波传播时间延迟修正三部分组成。原子时频基准是高精度授时的基础,它由多台原子钟(包括氢原子钟、铯原子钟、铍原子钟等)高精度自动测量比对系统、国际国内比对系统、计算机数据处理系统和一定的计算方法组成。

周总理很关心这项工程,指示由我国自己设计研究、自己建造。这样一项重要工程的基础设施建设,原来已有方案,但

一直没有落实,院里搞基本建设的同志,建议核心小组派领导去抓紧落实。当时核心小组主持工作的王光伟决定亲自去抓,但造反派说“走资派”不能走,最后只好让我去。我去却没人反对。于是我去了陕西,先抓点。在与陕西省地方政府协商后,在临潼要了60亩地,把台部搬了过去。授时发射机则定在蒲城。然后抓协调,同有关军兵种、国防科委和研究单位充分协调,落实分工。又抓材料,这项工程呈报过材料计划,但弄不到钢材水泥。我就找有关部门,打通关系,得到相关部门的理解,这项工程才得以展开。1979年,授时台试播成功,我国终于有了标准授时台。

当时,我国电子技术落后。邓小平同志指示:“建一个好的现代化的研究所,创造一个好的科学研究条件,很快搞上去。”

我便着手半导体研究所新址建设。这个研究所原来有个地方,在北京市内,没有发展余地,需要选址新建。我到中科院不久,就听说这个所要搬迁,但地点没有,经费也无着落。我多次去该所调查了解情况。一方面,在原地建成简易的超净试验线,批给他们180万元人民币、50万美元;另一方面,组织人选点,提出新建方案。当时北京林学院后面有个植物园,约有170亩土地。我们决定在此建半导体所。施工中,林学院有些人给工程设置障碍,发生了矛盾。后来我找国务院办公室金铭同志和林业部杨立功部长出面协调,工程才得以继续下去。到了1985年,这个所总算全部搬进去,条件大为改善。如今,这个半导体研究所已成为包括超晶、集成光、传感技术、“863”高技术光电器等在内的我国半导体科技领域的研究中心。

我们原来没有正负电子对撞机。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所长

张文裕建议搞起来,他说:我们这些人年纪不小了,希望在有生之年把这件事办成。据说小平同志也同意过。

我到中科院后,正好李政道和丁肇中教授来访和讲学。他们是美籍华人,是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就高能物理问题,我们请教了一下。他们也说高能物理很重要,支持上这个项目。经核心小组研究后,报告邓小平同志,很快批了:同意建,给经费。

但搞电子的还是质子的?搞多大?点选在哪里?意见不一。我主张先把所部定下来,便于开展工作。最后定在了北京市玉泉路,就是现在该所所址。当时这里是海军管的“舰船系统工程部”驻地。经我协调,把他们搬出来,向北京市申请选点另建,把高能物理研究所建在了这里。

1984年正负电子对撞机正式开工,小平同志亲自参加了破土典礼。1988年,建成了我国第一台正负电子对撞机。

当时云南有一个宇宙线观察站,发现过“可能的重离子”事例。周总理也曾过问此事。我们向国务院报告,计划将其扩建为宇宙线研究所。1976年4月,我带人前去考察,顺路还去了昆明热带亚热带植物研究所和西双版纳植物园。回京后向院核心小组汇报,我提出了扩建方案,并且建议重视热带、亚热带植物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不能间断,坚持发展,大有可为。

这些科学研究项目,包括其工程建设,都是开创性、探索性的工作,包含了新技术的应用研究,也需要攻关。也许因为经历过战争的磨难,在我看来,只要工作,就免不了有困难;所以要想子工作,就得迎着困难上。即使当时在动乱中,困难重重,我依然坚持这一信念。人要有拼搏精神,有些事情,只要狠抓敢干,就促上去了。

小平还提醒我们,要解决好科学家、教授的住房;还派人找广东的人搞了一些小楼的设计,准备在北京市区建造一批房子。但由于小平同志很快又被打倒,这件事情搁浅了。

“文革”期间,科学院经费大大下降,1967年的经费只相当于1965年的16%。1970年以后,经费略有增加;但直到1976年,经费仍比11年前的1965年少三分之一以上。

科研经费如此窘迫,工作和生活保障条件当然难以维持,更谈不到改善了。1976年,我们以“解决当前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几项科研生产工作”为由,向上写报告说,“北京地区需解决用房30多项、十几万平方米。只将其中最急需的提出来。”这些“最急需的”,包括人气所的电子计算机用房、力学所的航空发动机试验室、科学器材公司的检验室用房,还有中关村宿舍。后来共批了7000平方米,杯水车薪。

科研人员普遍工资太低,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

广大科技人员长期没有评级提职,工资普遍低得可怜。我们考虑,在工资制度和定期评级难以松动的情况下,不如对该提升的科技人员中工资过低的给予一定科研津贴。我为此提出了具体建议,并经核心领导小组研究同意,确定科研津贴为每人每月20元、30元、50元三种。陈景润、杨乐、张广厚三人成绩突出,各给津贴50元。陈景润由助理研究员提升为研究员,原工资加津贴为139元5角;杨乐、张广厚由研究实习员提升为副研究员,各119元。令人苦笑的是,就是这个小小调整,也是在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11月才得以实现。

中国在那个特殊年代,劣等“草料”收获了优等“牛奶”。

我向那个年代的科技人员深深鞠躬!

出访墨西哥

1976年10月14日至29日,我率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了墨西哥。这是我首次出访美洲国家。

墨西哥对我国的一些科学技术很感兴趣。1973年,总统埃切维里亚访华,两国就商谈和开始了科技合作交往,并就1975年至1976年科技合作计划达成协议。1975年11月,墨国家科委主任布埃诺率团来我国访问,中国科学院由我参加接待工作,陪同参观了北京的几个研究所。他们对小麦、水稻和玉米花粉培育,植物病毒研究,半导体器件研究,钎玻璃、激光全息照相等成果感兴趣,希望交流。

在拉丁美洲,墨西哥是唯一同我国签订科技合作协议的国家。我们这次访问,是作为对墨国家科委主任来访的回访。正式以中科院名义访墨,这还是第一次。

代表团由我和五名专家组成。我们在墨西哥受到了热情友好的接待,参观了首都墨西哥城、南方查帕斯州的圣克里斯托尔—德卡萨斯、东部的维拉克鲁斯州首府哈拉巴、北部下加利福尼亚州的恩塞纳达等地的一些科研机构,包括生态研究所、生物资源研究中心、墨西哥科学院等单位。时间短促,但墨西哥能从自己国情出发,试着独立自主发展自己的科学技术,给我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

他们很重视农业科学和生物学的发展。小麦、玉米是墨西哥主要粮食作物。他们注意不断培育出新的良种,小麦单产高的可达到每公顷七吨,生长期最短的100天。玉米在提高品质和矮秆化方面成就也很突出。墨西哥的土地利用,包括沙漠、草原、沼泽,也有很大潜力。他们表示,要学习我国沼

泽开发利用经验,并对我花粉育种有兴趣。

他们也很重视对新技术的开发研究。在电子学、光学、太阳能利用、低温超导等新技术方面,作了许多工作。固体电路的集成度已达到1000门至2000门。激光方面已能制出全息照片。超导方面已在进行氦泵的研究。硅光电池和硫化电池转换效率已分别达到12%和6%。

通过参观访问,我觉得墨西哥的科研工作已有一定规模,由于吸收了美国技术,有些方面有相当水平。然而墨西哥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较落后,要独立自主地建立自己的科研体系,还要走一段路。我们同墨西哥可以发展科技合作,本着互利互惠的原则,学习墨西哥的长处,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

回国后,我们提出了一个开展中、墨两国科技交流的建议。不过,这是个多事之秋,中国科学院又乱了起来。这些建议也就无法具体实施。

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科学院的外事工作被“左”的思想束缚,是保守的、僵化的,不能有效开展工作。怕惹麻烦,怕犯错误,是当时的基本心态。国际上许多国家和科研单位提出同我交流、互访、讲学、研讨、参观考察等,我们能推就推。

这项工作开始是耀邦同志抓。记得有一次,他让我请了一些驻外大使来科学院,座谈如何开展国际科技交流活动。耀邦同志用心良苦,无非是想方设法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可当时这些想法无法实现。

后来我管外事工作。我强调外事为科研服务,引进人才和先进技术,广开信息资源,希望局面能有所改善。可试了几回,也成了竹篮打水。

举个小小例子:为了从国外带回点样品、种子,1975年12月22日,科学院和对外贸易部联合发出函件,请求“我驻外使

馆和驻外机构收集到的小件样品(包括种子),委托外交部信使队或便人带回……”八九天后,外交部倒是回函了,打开一看,我哭笑不得。回函讲:“对此,我们研究,认为,信使的主要职责是传递党和国家的机密文件;目前,国际环境复杂,任务很重。为确保文件安全,除特殊情况,经外交部批准者外,信使不承担携带物品的任务。”

当时我们的处境及做法是世界绝无仅有的:一方面,我们被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制裁”、封锁,民族的生存发展都很艰难;另一方面我们又在作茧自缚,主动排斥外界可能的帮助和交流,拒绝吸收世界先进科技成果。这种不可思议的状况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到根本转变。

民族智慧和伟力的释放,首先要有思想的解放。

唐山大地震

1976年7月28日凌晨,中国唐山大地震。饱受“十年浩劫”的唐山人民,又惨遭天灾的毁灭性打击。

这次地震,震中在唐山、丰南一带,为少见的7.8级强烈地震。地震波及到北京、天津。震后,唐山市成了一片瓦砾。

当时,国家地震局归中国科学院代管。

地震发生后,我立即赶到地震局。这里谁也说不清震中在什么地方。电话不停地响,国务院办公厅、各部委、各军兵种、北京市以及外省市,纷纷询问。地震中,唐山的通信系统全部被毁,外面得不到任何信息。

外界不知道唐山的惨状,人们最关心的是会不会再次发生余震?会有多大余震?

第二天,有人从唐山跑来北京报告发生的情况。我们这才确切知道,震中在唐山。后来情况更清楚:唐山几乎不存在了。

事情这么让人难以置信,我觉得这不像是真的。可是,事情确实发生了。我们一方面抓中科院自身的防震工作,一方面抓国家地震局的预报工作。地震局领导班子已无法开展工作。按照上级指示,科学院从核心小组派出两个人去地震局指导帮助工作。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解决有破坏性余震而又预报不出来的问题。如果不能尽快拿出准确意见和清楚的说法,首都、天津、唐山地区的人民群众会日夜担惊受怕,整个社会秩序也受影响。

国家地震局从最初的震惊中清醒过来,迅速行动,建立了一系列的观测站、观测点,专家也各就各位,保证了后来地震情况的及时观测和预报。

一个多月后的10月8日,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批示:“登奎、孙健同志,唐山地震未能预报出来的原因,是应该查明。”

中国科学院专门成立调查小组,确定由我负责。

唐山损失太惨重。这次地震到底能不能预报?我带调查组来到地震局。当时有两种基本说法:一、按现在的科学技术水平,不是所有地震都能准确预报的,如1966年3月8日河北邢台地区的6.8级地震。二、不是所有地震都预报不出来,如1975年辽宁海城地区的强烈地震的成功预报。

那么唐山地震呢,有过先兆吗?能预报吗?

经过数月调查,在1977年2月25日,调查组和国家地震局联合提出了《关于唐山地震未能预报的原因的报告》。《报告》结论是:“唐山地震未能预报,是‘四人帮’推行反革命路线干扰和破坏所造成的恶果。”

《报告》说,“唐山地震前夕,‘四人帮’及其爪牙在国家地震局疯狂推行抢班夺权活动。他们对抗周总理关于‘要密切注视京津地区地震动向’和华国锋同志关于要做到在24小时之前预报出京津地区5级以上破坏性地震的指示,不听专业测报台站和群众测报网的预报意见。

“1976年7月12日,非法撤销局领导小组组长胡克实同志、副组长苏展同志的职务,强迫一位副局长离职休养,还非法撤销两名领导小组成员的职务。

“在7月份,地震局领导小组没有研究过一次震情。

“7月上中旬,有六个地震专业站和八个群众测报点提出不同程度的震前预兆。

“7月26日,北京市地震队告急,分析预报室的同志会商后,认为震前预兆严重,要求向局领导汇报。

“在7月27日上午,地震局副局长兼京、津、唐、渤、张地区协作组组长,在听汇报时很不耐烦地说:‘目前院里事情多,下星期再开会会商吧!’

“第二天凌晨3点42分唐山地震就发生了。这次地震造成的损失,在历史上是罕见的。”

唐山地震是天灾。显而易见的是,人祸加重了天灾。

唐山大地震死伤数十万同胞,人们无不为之悲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四人帮”却认为,“抹掉个唐山算得了什么!”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很难说这种人还有正常的人性。也许正是这种奇特的心理状态,后来党中央抓抗震救灾,他们居然理直气壮地进行攻击,说是“以救灾压批邓”。甚至干扰抗震救灾,增加了救灾困难,加重了灾区幸存者的苦难。

这场天灾,也使人们看清了人祸的根源。在全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援下,灾区人民奋起抗灾,重建家园。对

那些不幸遇难的死者来说,唯一可以告慰的是,20多年后的今天,新的唐山在原地拔起,他们灵魂的栖身之地,比过去更加美丽和雄伟。

第十四章 主持军委科装办

回到国防科委

1977年下半年,中科院调整领导班子,我面临走与留的问题。

征求意见时,我表示希望回部队工作。中科院主要搞基础理论研究,这两年中我虽然学了不少东西,但比较起来还是对国防科研工作熟悉,也更有热情。聂帅对我的想法表示理解和支持。年底,中央军委任命我为国防科委副主任。

1978年初,我到国防科委上班。这时国防科委的职能已作了调整:以前,国防科委主管国防科研,国防工办主管国防生产;现在,国防科委主管尖端武器,国防工办主管常规武器。

到国防科委两个多月后,即1978年3月21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军委科装委第一次会议纪要》,明确由我兼任中央军委科学技术装备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主持军委科装办日常工作。这虽是一项兼职,但由于当时加强军队整顿和武器装备现代化工作的需要,我必须投入更多精力,以具体贯彻

落实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加速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的决定》。自此,军委科装办的工作就由我担负起来了。

我这是第二次进国防科委,干了一年零两个月时间。回想起来,主要做了以下几件工作:

一、部署新型导弹核潜艇和远洋测量船工程的工作。1977年12月7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决定,新型导弹核潜艇和远洋测量船工程有关研制组织工作交国防科委领导。我过去分管过这两项工程,情况基本熟悉。为了部署好整个工作,1978年10月17日至25日,国防科委召开了新型导弹核潜艇工程规划会议,总结了近20年的经验教训,明确新时期的发展方针。我与李耀文政委分别主持了会议的开幕式和闭幕式。10月21日,受国防科委党委常委委托,我在会上讲了新型导弹核潜艇工程规划纲要设想和“分三步走”的初步意见,供会议讨论修改。

二、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1978年3月15日,中央军委批准国防科委《关于参加全国科学大会的解放军、国防工业代表团领导成员的增补调整问题的报告》,明确张爱萍同志任团长,我任副团长兼秘书长。科学大会期间,我协助爱萍同志率团开好会议,会后继续抓了若干问题的落实工作。

三、陪同王震副总理先后考察了东北、西南和陕西、山西等地国防工业的工厂、研究所和国防科委的试验基地。这次考察,使我具体了解了“文化大革命”后国防工业科研系统的情况。

四、1978年11月6日至17日,陪同王震副总理出访英国。目的在于了解英国工业发展情况,探讨引进英国的民用和军用先进技术,加强两国、两军之间的交流和友谊。派我同行,主要侧重于调研和探讨军用先进技术和装备的引进问题。

访英期间,我除随王副总理一起活动外,还单独参观了一些国防工厂和研究单位,与英有关方面探讨了引进问题,签署了科技合作项目补充议定书。回国后,除参与起草和报送代表团的出访报告外,12月12日,还单独写了《英国军工技术情况和引进其技术的意见》,具体介绍了英国军工技术的一般情况,并就引进国外先进军事装备技术问题的进一步落实提出了7点建议。12月19日,张爱萍同志同意我提出的建议。

这段时间,为了加强国防科技工业和我军装备建设,小平同志听取了一系列汇报。这些汇报我基本上都参加了。

小平同志在1977年7月第二次复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针对当时国防科技工业处于一散二乱三落后的混乱状况,小平同志采取了一系列坚决果断的措施,加强对军队和国防科技工业的领导和整顿。1977年底,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就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方面作出了两项重要决策:

首先,11月14日发出《关于成立军委科装委的通知》,成立了中央军委科学技术装备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简称“军委科装委”、“军委科装办”),统一领导国防科学研究和国防工业生产工作。军委科装委由副总长兼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任主任,国防工办主任洪学智、国防科委政委李耀文任副主任,还有王震副总理和国务院、军队有关部门领导,共13人组成。

第二,1977年12月28日,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了《关于加速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的决定》,对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的主要要求、各个时期的主要任务等作出了明确规定。

这两项重要决策相互关联。总目标是加强对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的集中统一领导,尽快结束徘徊,谋求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

宏观上作出安排后,小平同志于1978年4至8月间先后分6批找国防工业部门与对口军兵种,一个一个行业听取汇报,并与他们一道研究各行业存在的问题,同时有针对性地作了很多重要讲话和指示。我亲耳听了小平同志的几次讲话和有关指示,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一些重要思想:

一、立足国情,量力而行。这是由我国是发展中大国的国情决定的。人口多、底子薄和大国的国防要求之间构成极其尖锐的矛盾,资源不足与防务要求高将是我国较长时期内发展武器装备的基本矛盾。我们基本课题就是如何以较少的投入,搞出总体作战效果比较高的武器装备体系。军队必须照顾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在大局下行动。这要求装备建设量力而行。小平同志说:“军费搞得太高不可能,肯定影响经济建设,搞国防建设要精打细算。”并说:“钱怎么花是个学问,要好好研究,精打细算,方针要对头,办法要对头。”

二、自力更生为主。小平同志指出:“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当然必须依靠我们自己努力,必须发展我们自己的创造,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又指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要学习和适当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学习先进才能赶超先进。

三、科研先行,科学管理。二战以后,科学技术加速发展,小平同志敏锐地观察到,现代国际间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而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竞争。他鲜明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1978年7月1日听取五机部汇报时指出:“现在拖后腿的,一是技术水平,一是管理水平。”“管理两个字很重要,管理好不好大不一样。”

四、缩短战线,突出重点。这是量力而行的必然选择。钱不多,还铺大摊子,只能欲速而不达。这方面已有深刻的教

训。1977年4月,小平同志在讨论科研和装备问题时曾指出:“抓科研也要集中兵力打歼灭仗”。“要提出一个装备战略要求的目标,分清轻重缓急,这样科研和生产就有了方向”。这次听取汇报后,小平同志在一次调整规划会议上再次指出:“总的矛盾是要求太大、太多、太宽,要抓重点,要精选几件事,必须办的先办,一步一步来。按原来的要求不行,国家财力达不到,不能各部门齐头并进,样样都搞。抓多了什么都没做成,结果更慢。”

五、军品质量第一。军品是用于战争对抗的特殊产品,质量不好,既影响战机,还会误伤自己,具有特殊重要性。1975年8月3日,小平同志就曾指出:“一定要坚持质量第一。这个问题很重要,特别是军工产品。在战场上关键时刻有几发炮弹打不响,就可能影响整个战斗。”1978年4月4日,小平同志在听取三机部和空军汇报时,进一步指出:“飞机质量就是要百分之百,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也不行,非百分之百不行……质量是影响战争胜败的问题。”1978年6月,小平同志在听取六机部和海军汇报时又指出:“质量不好是要死人的,要寸步不让。”为确保军品质量,小平同志要求加强岗位责任制,建立和健全有关规章制度。

六、平战结合,军民结合。和平与战争交替发生,为解决战争时期对军品的紧急需要与平时时期军品任务少的矛盾,小平同志提出了“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为主、以民养军”的方针。1978年7月,小平同志在听取五机部汇报时说:“要走的这个道路,在国家统一计划下,以军为主,搞军民结合”。“总的方针至少拿一半的人搞民用,这个道路是对的”。这“不单是五机部的问题,三机部也有这个问题,四机部、六机部本身就是军民结合的”。

小平同志的这些讲话和指示,既明确了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的很多方针政策性问题,又为国防科技工业的整顿工作指明了方向。

军委科装办

1979年2月,我调到总参谋部工作。当时,小平同志是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我的职务是总参谋长助理。

我仍兼任军委科装办主任,而且为了便于工作,经中央军委批准,军委科装办于1979年6月8日从国防科委科技部搬到了总参装备部,并于同年6月13日增补我为军委科装委委员和副主任。

关于军委科装委的性质和任务,在1977年底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发出的《关于成立军委科装委的通知》和1978年初批转的《军委科装委第一次会议纪要》中,对此有明确规定:

军委科装委是“国务院、中央军委统一领导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和国防工业生产的业务办事机构。主要任务是:从战略着眼,提出我军各个时期装备的要求和制定装备体制;统一组织国防科学技术研究的规划和实施;统一组织武器装备的科研、设计、试制、试验、定型、生产等工作,并适时向军委提出建议,经批准后执行。对执行情况,有检查督促的责任。同时,还要协调科研、生产、使用之间的关系;协同国家计委对军队使用部门与承担军工产品的民用工业部门进行协调;并统一管理国防口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购买装备的规划、计划。”

方向已经指明,我们的任务是抓落实。当时的工作头绪很多,从哪里抓起呢?小平同志指出:“成立科装委,任务就是搞总的规划,就是为了统一军队装备方向、规划。”经过研究,

我力主在按军委科装委的职能全面开展工作的同时,先从抓规划入手,通过制定规划来带动其他方面的工作。

首先,军委科装委之所以成立,主要因为国防科研和武器装备的领导管理体制多头分散,有总参谋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总后勤部四家,迫切需要—一个机构对新时期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进行统一规划,以适应当时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通过规划编制工作,统一各方面的思想,具体贯彻落实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关于加速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的决定》及小平同志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其次,小平同志为全国经济发展提出了著名的“分三步走”的宏伟发展蓝图。国防科技工业和武器装备如何发展,并与全国的发展步伐相协调,需要通过编制规划来具体化。第三,军队和国防科技工业系统是“文革”的重灾户之一,我们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已经拉大,原有的发展规划早已过时,急需重新明确发展方向和相关的方针政策,制定新的规划。

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总体部署,军委科装委和科装办组织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文件和规划,有《1979—1985年国防科学技术(常规部分)发展规划纲要》、《1985年前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规划》、《1985年前全军常规武器装备体制》等三个规划。在三个规划中,后两个规划获正式批准下达贯彻执行。

遗憾的是,第一项规划,即《1979—1985年国防科学技术(常规部分)发展规划纲要》编制出来后,由于思想不统一,军委科装委又不掌握经费控制权,加之受到旧体制束缚,被迫不了了之。

在规划编制工作中,特别是从《1979—1985年国防科学技术(常规部分)发展规划纲要》流产的教训中,我和科装办的同志发现了另外一个明显问题,即“领导管理体制改革”问题。

当时的管理体制既分散,又多头,很混乱,仅军内就有“四驾马车”:

——国防科委主管尖端武器装备的科研和生产,相应掌管这方面的科研费、基建技改费、事业费等费用;

——国防工办主管常规武器装备的科研和生产,同样掌管常规武器装备方面的这几笔费用;

——总参主管提出武器装备发展需求、军内科研、武器装备订货的管理,并掌管装备购置费、技术革新费、军内科研费等费用;

——总后主管全军军械及后勤装备、陆军车船的科研、生产和装备修理业务,也相应掌管这几方面的费用。

横的方面是各把一摊:常规和尖端分家,军内科研和军外科研分家;纵的方面,科研、试验、生产、采购、分配、储存、维护、修理到报废,又各管一段:国防科委、国防工办管前段;总参谋部管中段;总后管尾段。

这种分散多头的领导管理体制,既妨碍从横向进行统筹规划,也不能从纵向实行全寿命期管理,非常不利于提高工作效率、缩短研制周期和节省开支。

成立军委科装委后,虽然可以对此进行一些协调,但由于并未改变上述经费渠道,协调作用必然有限。钱掌握在人家手里,你的协调,可以听,也可以不听。在一定意义上说,成立军委科装委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说到底,军委科装委只是一种协调性机构,这一性质决定它只可能是一种过渡性机构。相同的事例是:当时为协调国家科委、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办几家,中央请出了聂荣臻元帅,搞了一个中央科学研究协调小组。聂帅对此也感触很深。1979年12月6日,他在给小平同志的信中谈道:现在科研系

统分散主义实在严重,总想自成体系,万事不求人。这样重复浪费很大,力量分散,结果谁都干不成。“目前几家矛盾,我折冲其间,尽量想法协调。但这样零敲碎打也不行,总该有个原则,从体制上理顺了,大家照章办事,有个正常工作秩序才好。”

对于军委科装委及科装办的工作,我当时的基本态度,一是想方设法折冲于“四驾马车”之间,尽量做好协调工作;二是积极寻求改进之途。

1979年下半年,我开始找军兵种、国防工业部门同志开座谈会。在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起草了对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工作加强集中统一领导的建议。这时候,科装办的工作人员也直接给小平同志写信,提出成立总科技装备部的建议。

1980年5至6月,我陪同军委秘书长耿飚访美。回国后耿飚秘书长向国务院、中央军委上报了《访美工作报告》。我还单独向中央军委、国务院写了一份《对美国军事科技管理工作的考察和改进我国国防科技管理的建议》。

《建议》首先强调的就是改革领导管理体制:

“建立集中统一领导。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对军事技术装备的领导都是高度集中统一的。参观美国以后,更加深了这种印象。‘文化大革命’前,我们的国防科研统一在国防科委,现在是尖端武器的科研、生产归国防科委;常规武器的科研、生产归国防工办;装备工作和军队内部的科研归总参;后勤装备的科研归总后。全军的科研工作四家分管,虽有科技装备委员会协调其间,但只是军委的咨询机构,每年都开100多次会议,解决不了什么问题。随着全国工业体制向专业化公司的过渡,国防科技装备工作的上层领导权力必须集中。”

“我们设想了四个方案：

“第一方案：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国防科委，把国防工办管的常规武器科研、总参装备部管的军队科研、总后司令部管的后勤装备科研，以及分属海军、空军、总后军械部的常规武器靶场，统一由国防科委领导。

“第二方案：国防工办的职能和机构并入国防科委。在当前阶段，既管科研又管生产。随着专业化公司的建立，军队同公司通过合同安排试制、生产，领导的主要精力即可转到国防科研上来。即经过一段过渡，然后实现第一方案。

“第三方案：成立总科技装备部，将总参装备部、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办的职能和机构合并，根据国家拨给的科研费、装备费，统盘考虑科研项目和装备计划。各国防工业部组成若干专业化公司后，总科技装备部通过合同与公司发生联系。

“第四方案：国防科委维持现状，只管尖端武器；把国防工办和总参装备部的一些职能和机构合并，成立常规武器科技装备部或第二国防科委，把常规武器的科研装备计划工作集中统一起来。

“我们认为，第三方案是把尖端、常规的科研、装备计划都统一起来，便于从全军科学技术、武器装备的全局出发，统一管理，比较理想，但牵动面较大。第四方案优点是常规武器的科研得到了集中，但尖端、常规分成两家，倘要协调，靠委员会工作不力，难以解决问题。而且当前战略、战术武器都以制导武器为骨干，两家分管，肯定还有不少重复浪费。第一、第二方案，实质相同，都是恢复老国防科委，只是在步骤上，第一方案是立即恢复，第二方案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恢复。权衡比较，我们认为第二方案比较现实可行。”

上述建议内容集中地反映了我当时在领导管理体制上的

想法。为进一步落实领导管理体制改革这件事,1980年9月,我和科装办的同志再次收集国内外有关资料,召开各方面座谈会,起草了报告稿。1981年10月23日,以军委科装委、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名义向国务院、中央军委上报了《关于调整国防科技、国防工业管理体制的请示》。杨尚昆、张爱萍同志向中央写了信。1982年5月10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批转了上述《请示》,最终促成1982年由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军委科装办合并,成立了“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这一改革,初步实现了对国防科研、生产工作实行集中统一领导管理的目标。

需要说明的是,正如我上述建议中所讲的,我和军委科装办的同志一致认为,第三方案即成立“总科技装备部”,更能实现集中统一领导,比较理想。只是担心当时因牵涉面大反而搞不成,才推荐比较现实的第二方案;想先迈出这一步,将来再待机向总科技装备部发展。

1982年7月1日,我在军委座谈会上发言,也表达了这种心情。当时,我即将离开总参,要去海军工作。发言中,对工作提了几点建议,其中第一点就是加强统一领导问题。我说:“国防科工委成立后,解决了武器装备科研、生产的统一管理。但是还有几个军工生产部门不归科工委统一领导,从管理上需要进一步解决。科研、生产管理部门与使用部门之间,国防工业系统与民用工业之间,还有些重大问题,需要统一领导、组织协调,任务还是繁重的。希望国务院、中央军委经常直接过问这一工作,加强对这一工作的统一领导。”

规范和协调科研、生产和使用部门三方面的关系,也是当时军委科装办认真抓的工作之一。

只有使三者紧密团结,既各司其职,又分工协作,拧成一

股绳,才能确保我军武器装备发展的正常进行。实际上,我国第一代领导人就十分强调这一点,并提出了实行科研、生产、使用三结合的方针。但从“部院合并”开始,到后来“文革”中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对国防科技工业的瓜分,在科研、生产和使用三者之间出现了某些紧张和不正常,对武器装备的发展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

1978年,小平同志抓军队和国防科技工业整顿,也包括要理顺科研、生产和使用三者之间的关系。小平同志指示,军品要改成订货关系。国家也准备将国防工业部门改组成若干专业化公司。根据这些新的情况,军委科装办主要作了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在制订规划、计划,安排科研、生产、引进任务,并确保其顺利进行等方面,就遇到的难题进行协调。这种日常协调工作,是经常的、大量的。

二是为使科研、生产和使用三者关系逐步程序化、制度化,从1978年开始,组织有关军兵种、国防工业部和有关部委,起草了《新型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使用管理条例》、《新型武器装备研制工作程序》等文件,明确了新型武器装备研制工作的正常程序,及科研、生产、使用三方面各自的职权。目的是使三方面关系更加规范,达到各司其职,分工协作,减少矛盾,增进团结,共同推动武器装备发展的目标。

三是对军品改为订货关系,实行合同制,进行探索。西方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供需双方通过签订合同来规范双方的责权关系,这在他们已实行多年,行之有效。凡涉及产品和劳务,都实行合同制。1979年1月18日,小平同志在听取航空部汇报时指出:“同空军实行合同制,保质保量保期限。”“所有各部看来都应该实行合同制。”“订立合同,要有数量,要有质

量,要有进度,要有价格。你们同各部也要订合同。合同就是法律,有法可依啊。不执行或执行得不好,就要赔偿。”实行合同制,对我们来说是个新鲜东西,尤其是科研合同,未知因素多,更为复杂。为此我们选择了两个新上的研制项目进行试点:一个是地空导弹;另一个是反集群坦克导弹。这两个项目没来得及走完一个循环,就交给新成立的国防科工委继续管理。这为后来的研制项目实行合同制,作了有益探索。

军队与科研

军队是武器装备的用户,根据未来战争特点,需要发展什么武器装备,以及评价装备的好坏优劣,最有发言权,理应发挥主导作用。

建国后一段时间里,由于武器装备处于仿制阶段,军方仅仅被动地采购和使用工业部门提供的武器装备,因此,对武器装备的科研工作也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1958年后,国防科研工作由聂帅领导下的国防科委组织管理,对尖端武器从科研抓起,开始发挥军方的主导作用,并组成了第二炮兵部队。但陆、海、空军的常规武器,仍处于国防科技工业部门提出发展意见、军方认可的状态。显然,这种状况对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发展是不利的。由于“文革”的影响,这个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解决。

为解决这一问题,1980年7月15日至26日,总参在北京召开了全军装备规划座谈会。开会前三天,聂帅给我写信,就装备的发展,讲了他的想法。主要有两点:第一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引进少量关键技术为辅;第二是强调军队要抓科研、管科研。

聂帅指出：“明天的装备问题就是抓科研，全军要尽最大的力量来抓。在和平时期，我军除了做好政治工作教育部队外，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一手抓科研，一手抓训练。这都是提高我军战斗力的重要措施。军队要与工业部门密切协作，要抓科研，管科研。”

聂帅还讲：“军队不抓，谁来根据作战要求，提出旧武器装备的改进改型、新武器装备的创造更新？谁来根据规划，组织科技力量有计划地在改进、创新和预研方面去努力，从而加速我军现代化的进程？谁来提出新型号应有的战术技术指标，并进行论证、试验、试制等生产前一系列工作和审定？即使批量生产时，军队也应与生产部门密切联系，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保质保量生产出合格的装备。全军都要关心武器装备的改进和生产。”

聂帅对军队要抓科研、管科研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讲得非常深刻。会上，印发了聂帅的这封信。

根据多年在国防科研战线的工作实践，我认为，军队抓科研、管科研，主要应抓住两头：一头是抓好制订规划，提准武器装备发展项目及其战术技术要求，把开头开好；另一头是当科研和生产部门研制、生产出武器装备后，要抓好试验、鉴定和验收，保证研制、生产出来的武器装备的性能与质量。部队在接收新装备后，首先是抓好技术训练，熟练掌握装备的技术性能；进而抓紧战术训练，尽快形成战斗力。至于中间的工作，主要由科研和生产部门去做。军队的主要任务，是搞好跟踪监控的问题。

依据这个思路，这段时间，我和军委科装办的同志，首先重点抓了武器装备论证机构的建立，推动系统分析工作。

作战中军队需要什么武器装备？这些武器装备应具备什

么样的作战使用性能？这需要通过认真周密的科学论证。武器装备的研制周期一般都比较长，大型武器装备一般五至十年，其全寿命周期有时长达20至30年。同时，研制费用高，大型武器装备要以几亿元、几十亿元来计算。如果项目和要求提得不对，必然造成人力、财力和物力的大量浪费，也会影响发展速度，丧失可贵的赶超时间，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这方面世界各国不乏其例，我们也有深刻的教训。

我军武器装备发展自50年代末起，逐步由仿制进入自行研制阶段。“两弹”研制时，尚无对口军兵种，是国防科委充当中间的参谋，组织论证后，上报中央拍板定案的。60年代以后，常规武器装备先后结束仿制，转入自行研制阶段，军兵种作为武器装备的直接使用者虽然承担了一些论证任务，但是从全局上看，对其重要性认识是不足的，思想没有及时转移，存在军方论证机构不健全、论证力量薄弱、论证条件不齐备等问题，基本上仍然继续沿用科研、生产部门论证，军队认可的做法。

这种做法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我建议军队建立装备论证机构，开展系统分析工作。

1978年7月开始，组织专人进行调研，召集有关方面的同志开座谈会，听取意见。1979年2月6日，以国防科委和军事科学院的名义，向中央军委上报了《关于成立军事系统工程研究机构的请示》。1980年8月22日，中央军委决定，组建总参谋部和军兵种的武器装备系统分析论证机构，对人员进行了定编。

为推动我军武器装备的系统分析工作，1978年12月，军委科装办还直接组织了反坦克武器系统工程的系统分析试点工作，在我军率先运用计算机模拟技术，进行军事、技术、经济

三位一体和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系统分析工作,取得了研究成果。这为我军以后开展军事系统分析工作开了个头,进行了有益探索,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解决全军武器装备论证机构编制后,科装办负责筹建总部武器装备论证机构。经报请总参批准,总部论证机构定名为总参第六十四研究所。

当时,在选调人员方面,首先将反坦克系统工程试点的几名技术骨干留下来,并酝酿再调一批研究人员;在选点工作方面也初步有了一个意见,取得一定的进展。可惜的是,这一工作后来由于某些原因被迫停了下来。这也说明,一个新事物的出现和发展,很难一帆风顺。好在有的军兵种对此比较重视,将论证机构建立起来了。1982年7月1日的军委座谈会上,我再次强调了这方面的问题:

“现在年年订计划、规划,由于没有强有力的论证机构和计划部门,确定项目缺乏准确性,故经常临时订,临时要,随意变动计划,拖延了时间,造成了浪费。这种现象不利于装备的发展,即使有了钱,也无法拿到新装备,必须坚决克服。”

根据这一认识,后来我到海军工作,建立了“海军装备论证中心”。这个“中心”在海军武器装备发展方面发挥着“思想库”作用。

实践证明,加强武器装备论证工作,实行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进行军事、经济、技术三位一体的综合论证,有效地避免了武器装备发展的盲目性和决策的随意性,有利于选准发展项目,缩短研制周期,节省发展经费,从而确保武器装备发展工作的健康进行。

在作好论证工作的同时,我还认真抓了验收手段建设,以提高验收质量。

军队抓科研、抓装备,一定要抓好验收关。既要解决认识问题,树立军品质量第一和质量不合格坚决不接收的思想,又要解决验收机构和验收手段问题。质量好不好,合格不合格,要靠验收机构来组织整个验收工作,要靠检测技术和检测设备来判别鉴定。在这方面,我们做了两件事:

一是加强试验基地及手段建设。

武器装备的试验、检测和定型工作,本身是一门技术科学。现代武器装备是高技术产品,要对其战术技术性能进行准确试验和检测,首先必须加强手段建设。这里既包括要建设门类齐全的试验基地和试验靶场,也包括添置精确的检测仪器和设备,而且要解决相应的试验技术、方法和规范。这一点,别人不能代替,必须由军队自己解决。对此,从1978年制订规划起,我曾多次呼吁,在确定发展项目的同时,要制订相应的靶场建设规划。道理很明显:武器装备的研制和生产需要周期,试验基地、检测手段建设同样需要周期,都不能临渴掘井,必须按照系统工程,组织好这方面的事情。

二是恢复和健全武器装备定型工作。

新型武器装备的定型工作,分“科研定型”和“生产定型”两类。科研定型,是对科研产品进行必要的试验和鉴定,确定其是否符合规定的战术技术要求,是否具备投入试生产条件的一个重要“关口”。科研定型后的产品,要交部队试用,同时改善工艺,使其适于成批生产。生产定型,则是继新型武器装备科研定型后,最终决定这种武器装备是否投入成批生产、正式装备部队的另一个重要“关口”。严格实施武器装备定型制度,对确保新型武器装备的性能和质量,起着很重要的“把关”作用。

“文革”期间,武器装备定型机构被取消,定型工作几乎停

顿,从而造成一批新型武器装备未经必要的试验鉴定,就投入成批生产,严重影响武器装备的质量。

1979年,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先后恢复了“常规”和“战略武器”定型委员会。张爱萍是这两个委员会的主任,我是这两个委员会的副主任之一。1981年5月,我被任命为战略武器定型委员会主任。

1978年至1982年,军委科装办抓紧这方面工作,对“文革”期间未履行定型手续就投入生产的武器装备也补了课。定型机构调整后,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常规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提出了确保新型武器装备质量,加快发展速度的四项原则:一是树立“军工产品,质量第一”的思想,严格掌握设计定型标准;凡存在较大技术问题未能解决的,不能批准设计定型,也不能作为遗留问题放在生产定型过程中去解决。二是制定战术技术指标时,必须严肃认真,实事求是。三是凡属成系统的武器装备,按成套定型的要求试验和定型。四是未经试验没有生产定型的产品,不能转入批量生产。这期间,共定型24项武器装备,其中设计定型14项,生产定型10项。

通过这段时间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武器装备定型工作有了新的起色。

军委科装委和科装办的工作,我前后干了四年多。1982年5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和军委科装办合并,成立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对国防科研和国防生产实现了统一领导。至此,军委科装委和科装办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这四年多的工作,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一是终于摆脱了“十年动乱”的阴影,得以集中精力,定下心来为党多做点实际工作;二是使我开始从全军建设、特别是全军武器装备发展建设的全局思考问题,处理问题。

第十五章 在总参谋部

对越自卫还击作战

调任总长助理,我事先没想到。一天,杨勇副总参谋长给我打电话,让我尽快交接工作,准备去总参。杨勇当时主持总参日常工作,让我接张才千副总长那一摊,主要分管装备、军务和动员工作。

全国正在深入揭批“四人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贯彻党中央关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全军也正在贯彻执行1977年底中央军委全会精神,整顿军队,探索新时期我军现代化建设问题。在总参谋部,小平同志工作抓得很紧。重要文件送他,批得很快,处理问题干脆、利落,决策果断。以前我曾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过,现在又回到他身边工作,很是高兴。

由于当时越南领导集团背信弃义,经常骚扰我国南方边境,我国边境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受到严重威胁。1979年2月17日,我军被迫发起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前方打得很紧,弹药消耗量大,尤其是大口径炮弹消耗很快,而部队携带量不

足,仓库储存也不多。我在对越还击作战的炮声中到总参上班,鉴于这一具体情况,杨勇同志要求我尽快组织生产和补充大口径炮弹。

我查了一下,东北地区有两个大口径炮弹厂。但这两个厂已好久没有正常生产了。平时也没有注意炮弹的储存。我首先抓这两个厂赶紧开工,全力生产,能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生产出来,立即送往前线。其次,想法抓动员厂。1978年,我和王震同志考察国防工业时,知道四川、湖北、河南有几套大口径炮弹生产线,其中,河南这套工厂条件好些。我抓紧去看了这家工厂,发现几种炮弹生产线都在这里,便要求他们立即上马,尽快投产。厂房没盖完的尽快盖完,生产线没搞好的立即加班搞好。认真一抓,上得很快,不久就投产了。

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我们采取了速战速决的战法,有理、有利、有节,打出了国威和军威,只用了28天就取得了胜利。

这次作战虽是局部战争,但通过实战检验,既取得不少经验,也暴露出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这些经验教训,对新时期加强军队建设、民兵建设和边防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我到总参工作,一开始就遇上这场战争,对于如何更有针对性地做好新时期的装备、军务和动员工作,获得了有益的启示。

战后,我军转入和平时期的建设轨道。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也逐渐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中央军委在1977年12月曾召开全体会议,总结全军揭批“四人帮”的经验,提出加强军队建设的方针,明确规定了军队建设的十项任务:一、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二、贯彻毛泽东战略思想,做好作战准备;三、整顿领导班子;四、加强党的建设;五、把教育训练提到战略地位;六、加速装备现代化;七、搞好精简整编;八、加强后勤战备建设;九、加强民兵

建设；十、恢复和发扬优良传统。

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加强部队教育训练的决定》、《关于办好军队院校的决定》、《关于加强军队组织纪律性的决定》、《关于加速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的决定》、《关于军队编制体制的调整方案》、《关于兵役制问题的决定(草案)》等九个文件。

这次会议,是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的继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会议确定的方针、任务和作出的各项决定,是新时期整顿军队、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纲领。中央军委全会决定,从1978年起的三年时间里,军事工作的重点,是进行整顿和探索改革,以便使我军建设从基本处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逐步转移到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搞好和平时期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全面建设的轨道上来。

为完成好这次战略转变,总参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为开创我军建设的新局面,从各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整顿和改革工作。我除参与总参集体领导外,按分工做了一些实际工作。

1980年第一季度,总参领导班子作了调整:小平同志不再兼职,由杨得志同志担任总参谋长,我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

“明天的装备”

军队整顿中,装备的整顿是一项重要内容。

“文革”后,军队装备管理混乱,严重失修,急需整顿。为此,中央军委作出决定:“从1980年起至1982年为止,三年内把装备整顿好”。

我到总参后,正好赶上军委上述决定的贯彻落实。在装

备工作方面,我一是参与装备的科研和发展;二是负责部队装备管理。装备的科研是为“明天的装备”作准备,自我任七院院长开始,一直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而装备的管理则是我面临的新问题。

我觉得,要搞好装备建设,首先要有一个完整的思路。

1980年7月全军装备规划座谈会召开前夕,聂帅给我写信,其中就谈到了这个问题。

聂帅说:“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是中央的方针。何谓中国式的道路?你们还可仔细研究。我粗浅考虑,就是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逐步地解决发展中的矛盾,从而实现现代化。现在,我们是一大二穷,技术比较落后。这就决定我们,既不可能像某些不发达而有钱的国家,买成个现代化,又不可能像某些技术先进国家,大搞他们的武器竞赛。我们的任务是,既要准备好有足够的力量,以应付强敌的侵略,又要节省开支拿出足够的钱来,迅速提高改善我们的装备水平。既要管今天,又要照顾到明天,当然明天的任务是更重些。我常说,我们今天的装备问题,严格讲,有许多并不是什么现代化的问题,还是解决有无的问题。当前,必须抓紧有利时机,力争尽快按编制齐装配套,备份有余。一旦有事要能打仗,即使性能落后一点,总比小米加步枪好。装备部门要努力抓好这件事。明天的装备问题就是抓科研,全军要尽最大的力量来抓。”

装备建设必须从国情实际出发。对于中国国情,小平同志的说法是:“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聂帅讲是:“一大二穷,技术比较落后。”两者基本一致。这一基本国情应该是我们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从军事上看,我国国土面积大,边界线长,海域辽阔,具有

多种地形和气候条件。以往对手,既有军事大国,也有中等国家。我军以往的作战方式,既有正规战,也有运动战和游击战。我国的武装力量,是由常备军、预备役和民兵三部分组成。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没钱同发达国家搞武器竞赛。我们底子薄,技术和工业基础比较落后。这些特点说明我们对武器装备的需求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数量太少了不行。

综合上述考虑,对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有了一个思路:一方面,集中财力(通过减少军队员额和节省其他开支),缩短战线,突出重点,精选少量新型武器装备项目重点发展。发展方式以自行研制为主,同时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提高自主开发的能力,以求缩短与国外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尽快解决“明天的装备”;另一方面,管好现有武器装备,齐装配套,备份有余,作为今天的武器,应付近期可能发生的战事。

对于新装备,由于生产周期和经费问题,换装过程不可能很快。这种情况决定了我军武器装备必然是一种新老并存和梯次更新的局面。新武器换装过程中,开始只能是少量常备军先换装,预备役和民兵依次接收换下来的武器装备。这种不同代武器装备并存的局面,是与常备军、预备役和民兵的不同层次基本适应的。那种消极等待换装,或企图很快换装、全面换装的思想,脱离了实际,对部队的装备建设和装备管理非常有害。

我认为,只有弄清这种规律性的东西,才能通观全局,清醒而有预见地做好装备工作。对我们在总部工作的人来讲,就必须一手抓科研,解决明天的武器装备;一手抓现有装备管理,以现有武器装备打仗。对子部队,则应该集中力量抓好现有装备管理,让手中武器始终处于良好状态,随时准备打仗。“立足现有装备打仗”并不是一种理想状态,这是从国情出发

的一种求实办法,是我们的战略出发点。

首先必须解决“信心”问题。有的部队反映,在评估未来战争作战双方的力量时,有些人往往过多考虑对手武器装备的技术水平,认为我们的装备落后,仗不好打。有的人说,我们现有装备“打狗可以,打熊不行”。有这种思想,必然对立足现有装备打仗缺乏信心,对搞好现有装备管理没有热情。这个问题不解决,立足现有装备打仗就是一句空话。

1981年3月和年底,“全军装备部长座谈会”和“全军装备管理工作会议”分别召开。在这两次会议及其他多种场合,我都反复强调了必须管好现有装备,立足现有装备打仗的问题。

我不否认,在武器装备上我们显然比美、苏落后,这是事实,但也不是样样都落后,如轻武器和战略武器,我们的水平都不低。我们也在发展新型武器,正在努力缩短差距,不应该妄自菲薄。任何一种武器装备都有双重性,先进武器并非完美无缺,往往由于技术要求高,出现使用复杂、保障困难和不易协同等方面的制约,如果训练、管理、操作、使用不好,在战略战术上指挥不当,将发挥不了优势装备的作用,就会失去其优越性,给对方提供制胜之机。使用落后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是我军的光荣传统,古今中外的战史也不乏其例。在新的时期我们应该有这个坚定信念。

建立和健全规章制度是装备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规章制度是装备管理经验的结晶,是管好装备的基本依据。“文革”后,部队装备工作中一些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已经废弛,岗位责任制也没有了,装备无人管理,无章可循,损坏、丢失和失修的现象非常严重。1981年底召开的全军装备管理工作会议,认真强调了这个问题。此后,部队行动起来,

重视抓了现行条令、条例、规章制度的贯彻落实,建立和健全了本部队关于擦拭保养、登记、统计、检查、评比、交接、封存、动用等制度和技术管理规程,不少部队建立了装备管理岗位责任制。

随着规章制度的建立、完善和贯彻执行,部队装备面貌迅速改变,装备完好率很快提高,装备损坏和丢失现象也大为减少。

装备整顿中,还认真抓了装备知识教育和改善保管条件两件事。

科技的发展,增加了新装备的知识含量,同时,部队人员也在不断更新,如不加强装备知识的教育学习,指战员将不熟悉手中装备的战术技术性能,训练和使用中,就会造成不应有的损坏,甚至影响战斗使用。例如,有的部队对技术复杂或国外进口的装备不敢也不会维修保养;有的工程兵分队不会搞车辆封存保养,或不会搞工程机械的一、二级保养;个别单位竟无知地将防毒面具水煮消毒,造成人为损坏等等。因此,我们组织部队加强了装备知识的教育学习。

管好装备,既是加强战备、保家卫国的需要,也是为了保护国家的重要财富。“文革”以来,部队大批贵重装备长期露天存放,风吹、日晒、雨淋,造成很大损失。由于缺少必要设施,小型装备器材乱堆乱放,生霉长锈,损坏丢失。这是典型的“有钱买马,无钱置鞍”的做法。1981年7月28日,总参、总后发出了《关于逐步解决露天存放的大型贵重装备库房的通知》,要求部队解决这个问题。经费是从三个来源解决的:军委、总部拨出一部分;军区、军兵种自筹一部分;各部队从处理废旧装备经费中拿出一些。这样,调动了各方面积极性。通过大家努力,用三年时间逐步解决了这个问题。

为保持和提高装备的完好率,装备修理也是需要认真抓的一个问题。

早在“文革”刚结束的1976年,我们曾对部队装备的技术状况作过一次普查。除轻武器稍好外,其他装备完好率都很低,通信、防化装备技术状况也都存在不少问题。若遇战事,令人担心。装备整顿中,我们动员各部队对现有装备逐项进行普查。对需要维修保养的装备,迅速进行维修保养;缺少零备件的装备立即补充零备件;需要送修理厂的立即送厂修理。

在装备整顿中,还抓了装备齐装配套、装备技术革新、装备储备和战时动员等方面工作。1981年5月,总参、总政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装备整顿和管理的指示》,具体明确了装备整顿验收标准。中央军委要求“花三年时间整顿好我军装备”,通过上下一致努力,按时完成了任务。到1982年,除按要求抓好当年装备整顿任务外,还注意采取实际措施,巩固装备整顿成果,以防止出现“一紧二松三垮台四重来”的局面,促使部队装备管理工作进入科学化、经常化、制度化的良性状态。

军队“消肿”

“军队要整顿”,是1975年初小平同志第一次复出时做出的重大决策。

当时有两个重点:一是整顿军队中由于“文革”带来的派性;二是整顿军队存在的“肿、散、骄、奢、惰”现象。其中“消肿”问题,小平同志曾把它作为当时军队整顿的首要任务。当年6月24日至7月15日,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重点围绕“消肿”问题,确定了压缩军队定额和调整体制编制的原则,并

作了部署。但由于小平同志很快被再次“打倒”，这次整顿半途而废。

1977年7月，小平同志再次复出后，继续抓了1975年夭折的军队整顿工作，其中包括军队“消肿”。

我到总参后，军队正在整顿。军务方面的整顿主要两个重点：一是精简整编，二是加强管理。

精简整编和“消肿”工作牵涉面大，几年中搞了两次。

1977年底，中央军委通过了《关于军队编制体制的调整方案》。这个方案，肯定了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确定的精简整编方针、原则和措施，要求全军继续完成1975年规定的精简整编任务，从1978年开始实施。尽管如此，小平同志仍然指出：“肿”的问题还没解决，“臃肿”的情况还很严重。这次先按确定的编制精简，以后还要精简。

1979年，我到总参后不久，便和张才干一起，上报了《关于我军编制体制情况的汇报材料》。这份材料的上报，使党中央和军委领导同志进一步了解了当时我军编制体制的具体状况，开始酝酿军队再次精简整编问题。

1980年1月22日，徐向前副主席把我和总参军务部领导叫到他那里，专门谈了军队编制问题。徐副主席首先强调，搞编制总的要求是简便、迅速、确实可靠。接着他说，搞编制要从实际出发，既要考虑自己的特点，又要考虑人家的特点，“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还要考虑战区特点，根据不同的地形，不同的作战对象，采取不同的编制，一个模子不行。他还说，“组织编制搞得不好，打起仗来指挥才能灵便”。

1980年3月，中央军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对全军再次进行精简整编，减少部队数量，提高部队质量。小平同志作了《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的重要讲话。他不仅阐明了“消

肿”的必要性、迫切性和精简整编的方针、原则,而且提出了军队体制的全面改革问题。强调“军队要提高战斗力,提高工作效率,不‘消肿’不行”。“减少军队人员,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更新装备,这是我们的方针”。他说,体制问题,实际上同“消肿”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要“消肿”,不改革体制不行。

小平同志的这些指示,以及后来关于按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平战结合原则来编组军队、组建集团军等方面的指示,成为我军新时期精简整编、改革编制体制的基本指导思想。

总参着手拟制精简整编方案,具体工作由军务部的同志负责组织进行。方案经总参党委研究后,上报中央军委。1980年7月19日,中央军委上报了《关于军队精简整编的方案》。1980年8月15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

8月29日,中央军委发出指示,要求各大单位党委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切实解决“肿”的问题,圆满完成精简整编任务。

1982年2月,中央军委成立体制改革、精简整编领导小组,杨得志同志任组长。同年7月召开座谈会,着重研究体制问题。9月16日,中央军委又下达了《关于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这次精简整编工作,从1980年开始至1983年完成。

全军这次精简整编,不但裁减员额幅度大,还进行了三项较大的体制调整变动:一是为加强对国防科研、生产的集中统一领导,将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和军委科装办合并,成立国防科工委,这在前面已经提及;二是为机关“消肿”,1982年9月1日起,将炮兵、装甲兵、工程兵机关改为总参业务部;三是撤销了铁道兵和建设工程兵建制,铁道兵并入铁道部,建设工程兵就地转业为地方建筑企业。

这次精简整编是继1977年裁军后的第二次。1985年我军第三次裁减100万人。后来又裁减50万人。这些精简措施都是为了适应新形势,加强国家经济建设和我军现代化建设采取的重大行动。

部队纪律松弛,也是军务方面的整顿重点。

1978年1月,中央军委下达了《关于加强军队组织纪律性的决定》,针对我军组织纪律性方面存在的问题,要求各部队加强组织纪律教育,提高遵守组织纪律的自觉性,树立人人维护革命纪律的良好风气。

1979年10月2日至11月7日,召开了全军贯彻条令观摩检查会议,总结交流经验,研究和探索新形势下如何加强部队管理教育的问题。10月8日在北京召开的动员大会上,我讲话强调:“这次观摩检查很必要。上面确定的方针、规定落实不落实,一个主要的办法就是检查督促。这次检查的内容为,贯彻执行共同条令情况、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军队组织纪律性的决定》的执行情况和部队管理教育现状。”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各大单位及部分军级单位的军务部(处)长104人。动员大会后,编组分头到沈阳、济南、南京、福州、兰州、成都军区,对16个单位进行了观摩检查。11月7日,汇集杭州继续开会,请广州、昆明军区介绍了战时管理教育工作的经验。

会议总结时,我归纳了观摩检查单位的特点和共同经验,对全军管理教育工作提出了要求:一、要继续抓好条令的贯彻落实;二、要继续大力整顿部队的作风纪律;三、要大力提高干部的管理教育水平;四、要加强武器装备器材的管理;五、要进一步做好预防事故工作。我在会上提出,要力争在三年左右时间内,全军所有的团都基本达到条令规定的标准。

为在全军推广这次会议的精神,12月,总参向全军印发了这次会议情况和加强部队管理教育工作的意见;在此基础上,于1981年2月,三总部向全军颁发了《贯彻共同条令检查标准》。

为了提倡和鼓励全军练兵习武、奋发向上的精神,促进部队全面建设,总参先后下发了《神枪手、神炮手、技术能手基本标准》、《分队干部和班长“四会”(会讲、会做、会教、会做思想工作)标准和评定办法》、《部(分)队装备管理好五条试行标准》、《贯彻共同条令检查标准》、《连队管理教育若干规定》、《关于奖惩问题的暂行补充规定》等文件,并重新颁发了《军人誓词》。

为检查部队整顿情况和了解国防科技工业情况,1981年4月9日至22日,我到陕西、河南等地,检查了部队,看了靶场和基地建设,并对十多个工厂、研究所作了调研。从了解的情况看,经过近三年的工作,整顿已初见成效,大多数单位呈现出奋发向上的可喜景象。

回北京后,我就部队情况和国防科技工业情况,向总参领导和耿飏、张爱萍同志分别写了调研报告,并提出了建议。

后 备 力 量

坚持“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指导思想是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我军历来凭借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加上人民战士的英勇作战,从而赢得一次又一次战争的胜利。

我军的动员工作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再次经受住实战的检验,总体表现不错。在《关于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民兵支前的总结报告》中,列举了广西、云南省军区和所属各边防

军分区及县、市人武部,动员民兵参战支前、配合和支援我军作战等大量先进事迹,用事实再一次证明,民兵不愧为我军的有力助手和强大的后备力量。

“文化大革命”中民兵工作受到很大破坏。粉碎“四人帮”后,徐向前副主席着手对民兵工作进行恢复、整顿、调整和改革。1978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三总部在北京召开粉碎“四人帮”后首次全国民兵工作会议。会议从思想上拨乱反正,恢复和发扬我军民兵工作的光荣传统,坚持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坚持野战军、地方军、民兵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坚持民兵人民民主专政工具的职能;坚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统一领导下的地方党委和军事系统双重领导制度;坚持“劳武结合”原则,并重新修改和颁发了《民兵工作条例》和《民兵武器装备管理规定》。

我在总参分管动员工作。在徐向前副主席和总参党委领导下,我和动员部一起总结了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民兵参战支前的经验,对如何做好新时期动员工作进行了探索和调整。

首先抓了调整民兵组织的工作。包含两个方面内容:一是减少民兵数量;二是实行民兵、预备役相结合的制度。

1979年7至8月间,召集各军区动员部长在北京开了一次座谈会。主题是:总结交流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民兵参战支前和兵员动员工作的经验,同时就新时期民兵组织建设、军事训练方面出现的新问题进行座谈,研究民兵工作如何整顿、调整和进行必要的改革。

这次会议有个背景情况。

3月27日,军委人民武装委员会开了第一次会议,徐向前副主席主持会议。会上,总参动员部曹宇光部长汇报了粉碎“四人帮”后民兵工作和兵员动员工作情况。徐副主席就民

兵在人民战争中的重要地位、搞民兵与搞生产的关系、民兵的发展规模、民兵的军事训练、参战支前和维护社会治安等问题讲了话。徐副主席指出：“最近，各地对民兵工作有些反映。民兵发展的规模多大？总参根据军委的决定，做了个规划，搞3000万武装基干民兵，要真正搞好三落实，我看就不错了。我国人口多，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总要有个限度。”

根据徐副主席指示，4月份动员部汇集了各地关于调整改革民兵组织的意见，形成了一份材料。看到这份材料后，感到反映的情况值得重视。6月16日，我在该材料上批示：“这些意见很值得考虑，要从实际出发，坚决克服形式主义。我赞成里边提的一些意见，请动员部研究向徐副主席作报告。”

于是便决定了召开这次各军区动员部长座谈会。

会议结束时，我就新时期的民兵建设讲了五个问题：一、对民兵工作的认识问题；二、关于民兵组织落实问题；三、关于战时民兵使用问题；四、关于加强民兵工作的领导问题；五、要关心县、市人武部的建设。

这次会议正式提出了民兵组织改革问题。当时民兵组织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年龄太宽，全国民兵总数占总人口的28%，占农村劳动力的70—80%，人数太多。二是组织面太宽，除农村、厂矿外，在党政机关、科研单位、学校、商店等单位都建有民兵组织，实际上并不开展活动。三是编组过于复杂，民兵种类和层次偏多。四是县和公社的民兵师、团是个空架子，空有其名。

我们提出了改革方向：适当缩小组建范围，压缩民兵年龄，简化民兵组织层次，减少民兵数量。目的是把民兵队伍搞得精干些、扎实些，使各项工作更加落实。根据测算，上述改革后仍有一亿民兵，其中有3000万基干民兵。这样不但可以

保证我军有源源不断的兵员补充,作战时也能有大量民兵配合,担负各种战斗勤务。

这次会议主要就民兵建设问题进行酝酿讨论,不定问题。我在会上强调,民兵组织体制的调整改革是件大事,既要解放思想,又要十分慎重。一定要在深入调查研究和做好工作的基础上,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会议结束后,总参动员部提出了《关于调整改革民兵组织体制的意见》。徐副主席阅后,致信张才干和我,指出:“因涉及到和过去中央发文不一致的地方,先简要报告,呈中央原则批示后,再写成详细文件分送各大军区、省军区、少数县的武装部征求意见,明年适当时候再开民兵委员会。”

1980年3月8日,在北京再次召开了军区动员部长会议,座谈讨论民兵组织调整改革、修改兵役法和战时动员等问题。4月下旬,以总参和总政名义正式发出《关于调查研究民兵组织调整改革问题的通知》,要求各军区进行调查研究和试点,向总部作出书面报告。在各军区返回意见的基础上,12月中旬,总参和总政上报了《关于调整民兵组织问题的报告》。

《报告》提出的调整方案是:“缩小民兵组建的范围和参加民兵的年龄,简化民兵组织层次,严格民兵的政治条件和身体条件,把民兵制度与预备役制度结合起来。民兵组织既是我国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又是预备役的基本组织形式。凡是有民兵组织的地方,按兵役法规定应服兵役的人员,除应征服役外,均应编人民兵组织预备役,基于民兵为第一类预备役,普通民兵为第二类预备役。战争初期的兵员动员任务,应逐步落实在基于民兵组织之中。”

1981年3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正式批转了这个《报告》。

根据《报告》的方案,全国范围进行了减少民兵定额的改革。这项工作在 1982 年底圆满完成。1983 年初,总参和总政联合向中央上报了《全国民兵组织调整工作总结报告》。

改革民兵军事训练,也是当时必须尽快解决的一个问题。

军事训练应该是民兵的一项经常性活动。但是,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实行了多种形式生产责任制,这样一来,训练和生产的矛盾便很突出了。民兵军事训练中,出现了人员难抽调、时间难安排、误工补贴难解决的问题。

为此,我们在 1979 年 8 月中旬发出指示,将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的《1977 至 1980 年民兵军事训练纲要》的完成期限,延长到 1982 年底。降低部分训练要求,缓解矛盾。1980 年 9 月,总参又发出《关于调整改革民兵军事训练的试行意见》,从缩小范围、减少人数、缩短周期、精简内容、突出重点、改进方法、提高质量等方面对民兵军事训练作了全面调整。这次调整,大量压缩了训练任务,减轻了群众负担;改进了训练方法,提高了训练质量;突出了专业技术兵的训练,适应了现代化作战的要求。

这些调整和改革,较好地理顺了训练和生产的关 系,更适应新时期对民兵的要求。

在改革民兵军事训练中,重点抓了民兵高炮队伍训练和建设。这是根据未来战争的特点和中央军委以打坦克、打飞机、打空降的方针确定的。为了落实军委的要求,专门在湖南株洲市民兵高炮团抓了试点,并于 1979 年 10 月下旬召开了现场经验交流会,全军各级主管民兵工作的负责同志和有关业务部门共 180 多人到会。我在会议开始和结束时讲了话。会后,以我的讲话为基础,把会议情况以总参名义向国务院、中央军委写了报告。国务院、中央军委于 1980 年 1 月 14 日

向各地批转了这份报告。

此后,民兵的武器装备问题摆上了日程。

首先调整武器装备品种。1981年,全国民兵的武器已达上千万件,从数量上讲可以应对各种事件的需要,但这些武器多数是步枪;其他武器,特别是防空、反坦克、反空降用的武器数量比重小,品种不齐全,装备器材不配套。为改变这一状况,1981年12月,总参、总后召开了民兵装备工作会议。会议根据国家经济形势和民兵武器装备存在的问题,确定了控制数量、提高质量、调整品种、搞好配套的新方针。强调在若干年内压缩一般武器数量,清查现有武器,该淘汰的淘汰。今后的发展重点,放在补充短缺武器装备、解决武器品种少和现有武器器材不配套的问题上来,增强民兵打坦克、打飞机、打空降和游击作战的能力。

其次调整了民兵武器配备的布局。以往,民兵武器配置在基层,分布不合理。本着平战结合、保证重点、合理布局的原则,重新作了调整。

第三,改进了武器装备的保管办法。以往,绝大多数武器由个人或民兵连保管。1982年2月,总参、总后颁发了《关于民兵武器装备管理的规定》。同年12月,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又下达了《关于加强城市民兵武器管理的通知》,要求民兵武器集中统一保管,缩小武器分布面。这样做,减少了事故,也减轻了基层民兵的负担。这些调整改革适应了新形势的需要,收到较好效果。

保证兵员质量,是搞好部队建设的一个基本前提。

我国实行义务兵役制20多年。征兵、退兵、补兵和退伍工作一年一度,积累了丰富经验。但是,由于“文革”的干扰破坏,一些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废弛了,兵员质量严重下降。在

兵员补充管理方面,前几年超编占用比较严重。刚刚结束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也暴露出征兵中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同时,随着武器装备技术日益先进,对兵员的科技文化水平有了新的要求。总之,兵员工作需要整顿改革,要针对新时期的新情况、新问题,采取新的措施。

这段时间,动员部先后开过几次兵员工作会议。其目的,一是总结交流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兵员保障工作的经验,做好一年一度的征补新兵、退伍老兵工作。二是围绕如何提高兵员质量,克服兵员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会议讨论修订了一些规章制度,如《征兵工作办法》、《关于处理义务兵退伍暂行规定》和《志愿兵管理分工规定》等。同时探索了选改志愿兵的工作。1978年,中央下发了《关于兵役制问题的决定》。1979年开始进行选改志愿兵工作,同时摸索如何改好、管好、用好的经验,以便志愿兵安心服役,充分发挥他们在部队建设中的骨干作用。

民兵工作也应开展国际交流。1979年12月,我率民兵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着重考察了他们地方防御部队(相当我们的民兵)的建设情况。这次访问,可以说不虚此行。南斯拉夫重视民兵建设和开展游击战的经验,有许多可供我们学习参考。回国后,我向徐向前副主席和总参谋部作了详细汇报。徐副主席对此很重视,指示总参,要认真研究一下,结合我国民兵建设实际,提出落实措施。他说:“总参要把动员工作抓好”。“我们的游击战争经验也很多,过去没有注意总结。军事科学院、军事学院、步兵学校都要组织人员编写这方面的经验材料,为民兵建设提供参考。”我们按照徐副主席指示,狠抓了落实,对后备力量建设促进很大。

从1979年开始,我在总参工作了三年多。感到总参的任

务很重,工作很忙、很累,但大家在小平同志直接领导下,团结协作,工作扎实,卓有成效,心情舒畅。而且,我有机会接触了全军情况,能在更大视野里观察和学习,思考全军建设。这段经历,为我后来到海军、特别是到军委工作能较快地进入情况,提高工作起点,打下了良好基础。

第十六章 就任海军司令

再回海军

1982年8月28日,我被任命为海军司令员。

坦率讲,对于这次任命,在征求意见时我有些犹豫。我热爱海军事业。我生命中的许多岁月是在海军度过的,也很希望为海军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可这个愿望一波三折。1964年“部院合并”后,军委秘书长罗瑞卿曾亲自和我谈话,说:“已同聂帅商定,让你回海军当副司令。取得海军同意后,军委可下命令。”没几天,罗瑞卿第二次找我谈话:“李作鹏、张秀川不同意,你还是到六机部做副部长兼七院院长。”1969年离开科委时,聂帅对我说:“你回海军去作副司令,已同海军领导同志谈过了。”那次我回到了海军,但当时的海军领导不分给我工作。后来让我当“船办”主任,管理七八个人,1970年12月才任命为海司副参谋长。聂帅为此查问过几次,可“四人帮”的手已伸进海军,苏振华政委没有答复。第二次离开海军时我想过:海军这条路算走到头了。

没想到,现在又让我第三次进海军,而且是当司令员。

要在过去,我会很高兴地接受这一任命。但现在,距第一次准备让我当海军副司令员的时间,已经过去了18个年头,

许多情况今非昔比了。从年龄讲,我66岁了,虽然有了比过去更多的经验,但从精力体力讲,这个年纪并不是人生最好的时候。从工作上看,我在副总参谋长岗位上干了两年多,已经熟悉,干起来相对轻松些。当然,让我犹豫的最重要原因还是海军的现状。

由于“文革”十年动乱,海军各方面工作破坏严重,是一致公认的“重灾区”。等待我的将是一系列难题。譬如派性问题、领导班子团结问题、部队作风纪律问题、干部年龄老化问题以及教育训练、部队管理、战场建设、武器装备现代化等等。

1982年7月4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军委座谈会。这次会议,主要研究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和高层干部调整、实现年轻化问题。会后不久,在人民大会堂见到了小平同志,他对我说:

“你还是要回海军工作。海军的问题不少,要整顿。”

我不再犹豫,接受了这份重托。

1982年8月28日,距党的十二大召开还有三天,中央军委发布了海军领导班子调整配备命令:刘华清为海军司令员,李耀文为海军政治委员,杨国宇、傅继泽、邓兆祥、聂奎聚、李景为副司令员,方正平、吴罡为副政治委员,李君彦为海军顾问,马辛春为参谋长,刘友法为政治部主任,李进为后勤部部长,黄自强为后勤部政治委员。

1982年9月15日,我走进了海军办公楼。

新班子对我表示了欢迎和支持,我很高兴,但心里并不轻松。海军司令员的办公室不算大,但这里有一份重大责任。

我走到窗前，举目眺望，思绪万千。外部世界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尤其对于海洋，人类的认识又有了新的飞跃，对于海洋资源的需求日益增长。海洋开发技术的迅猛发展展示了大规模开发海洋资源的广阔前景。这一切都极大地激发了各国将其沿海自然资源置于本国管理之下的热情。第三次世界海洋会议已经结束，这是数百年来人类对海洋的一次新的划分，濒海国家无不对海军建设表现出格外的重视。很遗憾，作为一个海洋大国，中国不仅没有跟上这一步伐，反而忙着“文革”，进一步拉大了与世界的差距。

为欢迎我，李耀文政委在后勤部礼堂主持召开了海军直属机关团以上干部大会。在这个会上，我一言未发。看起来有点不近人情。事实上我不好讲什么。讲海军问题一大堆，肯定要得罪很多人；若讲海军一切都很好，又不符合实际情况。左思右想，还是不发言为好。

海军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我觉得首先要解决的是领导班子的建设，这是海军的“大脑”。根据以往经验教训，对加强海军领导班子建设，我归纳了五条：一、加强学习，开阔视野，保证政令畅通。二、加强团结，互相支持，不纠缠以往的事。三、遵守民主集中制原则。四、模范执行党章、《准则》，不搞特权谋取私利。五、振奋革命精神，大胆负责，勇于创新。

11月9日，我们研究确定了领导班子的各自分工：

我和李耀文主持海军全面工作。杨国宇、李景分管作战、装备和航空兵部队工作，傅继泽、聂奎聚分管后勤、工程、潜艇部队、军事训练、军务、行政管理和院校工作，方正平分管干部工作、航空兵部队和海直机关政治工作，吴罡分管党的纪律检查和院校政治工作，马辛春主持海军司令部工作，刘友法主持海军政治部工作。海直大院行政管理工作，由各大部各负其

责，海司统管，重大问题报海军领导处理。

这次会上还研究了海军党委常委的组成。在谁当党委书记问题上，耀文同志比较谦让。但我坚持认为，他在海军工作了几年，与大家关系好，也熟悉情况，他当书记为好。大家同意了 my 意见，上报后得到了上级批准。

这个海军领导班子配备比较合理，都是在海军干过多年、对海军工作很熟悉的同志，一直配合默契。可惜的是，1983年4月21日，后勤部长李进同志因工作劳累过度，不幸殉职，时年63岁。大家都很悲痛。李进殉职后，后勤部长由李春明同志接任。

12月14日，中央军委常委会议听取了我和李耀文关于海军当前情况、准备召开海军工作会议及海军党委五届五次全会和近期工作安排的汇报。同意我们的安排，并对海军建设作了明确指示。强调，海军情况比较复杂，经不起再“折腾”了，要向前看，不要翻“老账”，不要再打“内战”了。要安定团结，齐心协力开创海军建设新局面。

根据军委会议精神，1983年1月5日，由我主持召开了海军工作会议，研究了《海军现代化建设规划纲要》。这个《规划纲要》主要讲海军近三年的建设规划。我在讲话中对《规划纲要》的制定提出了五条原则：一是要明确海军建设的奋斗目标和发展步骤；二是要在全面安排的基础上切实保证重点；三是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要同时并举；四是规划要科学合理；五是要加强调查研究。1月17日，召开了海军党委五届五次全会，对《海军现代化建设规划纲要》又进行了认真讨论。我在会议开始时作了题为《深入贯彻十二大精神，振奋精神，加强团结，转变作风，努力开创海军建设的新局面》的讲话。李耀文作了《海军1982年工作的基本情况和1983年的

工作任务》的报告。会议明确了 1983 年工作总的要求和任务,提出迈好头一步。

这两次会议,进一步统一了党委一班人的思想,明确了任务。大家同心同德,共谋大计,为开创海军建设新局面开了个好头,也为海军新的领导班子建设提出了考验。

1983 年 10 月,根据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作出的整党决定和中央军委部署,海军进行了整党。海军党委和机关参加第一期整党。这次整党在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方面,取得了较好效果。1984 年 11 月中旬,全军整党联络小组自下而上验收后,在给中央军委和总政的情况报告中充分肯定了海军党委和机关整党的成绩,认为领导班子建设加强了,海军历史上经过多次折腾,这两年逐步安定下来。现领导班子做了很多工作,巩固发展了海军安定团结的局面。领导班子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是保持一致的,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积极的,坚决的。领导班子自身较好地贯彻了民主集中制,工作勤奋,特别是军政两个一把手起了表率作用。大家心情舒畅,团结协作,已形成了较强的领导核心。

慈不掌兵

上任不久,我就下部队进行调查研究去了。这次调研前后延续了一年半时间。

1982 年 10 月 6 日,我最先到了大连,考察了海军驻旅顺、大连地区的机关、部队和院校,然后看了海洋岛到旅顺这一片的战场建设。

海洋岛地理位置很重要。海洋岛的水警区部队,精神面

貌总的看比较好,但在补给、家属就业、子女就学等方面存在一些困难。他们想把大的港湾分成小港池,我当即不同意。这么大的港湾水面,今后可供大舰驻泊,分成了小港池,大舰就没法用了。

在小长山岛,有个支队基地正在建设,挖了山洞,码头还没建起来,防波堤还没完工。我来看时,正赶上退潮,只剩了很小一点水域,充其量只能进驻一个大队,根本不适合海军今后作战需要。我要求马上停止施工。陪同考察的同志表示,已经花了很多钱,停工会损失太大。我的态度很坚决,告诉他们:不停工,还得花更多的冤枉钱。我让他们很好论证一下,暂时不要上了,可以考虑把工程先封起来,保护好,以后再说。

在庙岛列岛也有类似问题。一个岛上修了个洞库,洞库前面修后面堵,门一开,沙石流就把洞口堵住了;门一闭堵的门也开不开。海上的自然环境是堵不住沙石流的,这个地方打仗时没法用。我命令停建。

让我忧虑的是,以后考察山东半岛、东海、南海时,发现也有这类问题,挖了很多没用的山洞,劳民伤财。这是“山、散、洞”战略思想带来的严重后果。这么干显然不行,我提出要“收摊子”。当时有人不赞成“收摊子”;我不为所动,“到处摆摊子不行。该收就收!”

10月10日,我同副司令员杨国宇等人到第一水面舰艇学校调研。30年前我从陆军到海军,第一个职务就是担任这个学校的领导。

这个学校是海军最早建立的正规化的指挥学校,30多年来,先后毕业了8000多名学员,大部分学员成了海军建设的骨干力量,不少人担任了支队以上指挥员,有的担任了舰队副司令员职务。学校建设也经历过艰难曲折。1958年反教条

主义,受“左”的思想影响,学校挨过批判;1965年院校整风,又把学校说成“教条主义十五年一贯制”,许多正确的东西当作教条主义反掉了;“文革”十年,又给学校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灾难。当时摆在学校面前的任务是恢复整顿。我要求学校各级领导干部团结一致,兢兢业业,力争在短期内把学校恢复到历史的最好水平。

随后,我又到了海军政治学校和旅顺基地。

海军政治学校恢复的时间比较短,工作中困难不少。我在与部、系以上领导会见时,要求他们转变作风,克服困难,艰苦办学,一定把政治学校办好。在旅顺基地时,与基地领导进行了座谈。重点与他们谈了舰艇供应问题。我提出,舰艇供应要进行改革,供应站要多搞些成品、半成品供给舰艇部队,蔬菜要洗干净,不能连根带泥地送上舰,不能沿用老一套供应办法。此后,舰艇供应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

10月下旬,到了东海舰队。

在这里我看到上海基地的一个水警区也挖了洞,但港湾水浅,只能驻泊小型舰艇。这里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方向,从长远看,这里将建成欧亚大陆的桥头堡,要考虑在深水港附近建大码头。基地领导提出想在崇明岛再建一个点。我明确提出,建设方针要调整,崇明岛和吴淞地理位置区别不大,保护长江口与吴淞没多大区别,不能处处搞。

由舟山群岛至温州以北,看了好多地方,也都是挖了洞子,盖了房子,问题不少。有些海防工程,前期准备工作对水文资料没有很好调研,而是边定点、边设计、边施工,结果,有的洞库建成后泥沙回淤严重,完全不能使用,只好报废。有个潜艇支队驻岛的航道和水深还不错,但部队吃水问题没解决,居民与部队杂居,纠纷不少。温州水警区房子很好,但码头淤

泥,航道也淤泥,小艇已难进去,而挖泥改造航道,则要花钱很多。

在东海舰队领导机关,听了舰队司令员谢正浩、政委黄忠学汇报。总的感觉,部队确实发展了,多处设了点,遗憾的是,这些点上都有“尾巴工程”,缺饮用水的单位也较多。我要求他们,一定要从部队实际出发,从作战需要出发,脚踏实地,集中精力把工作做好。

1983年2月1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看望榆林海军部队,还准备同指战员欢度春节。我和副司令员聂奎聚、政治部主任刘友法等提前赶到榆林。11日下午,我们陪同耀邦同志检阅了榆林基地和潜艇支队的部队。第二天上午,耀邦同志在广州军区司令员尤太忠、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郝建秀、团中央第一书记王兆国等陪同下,同榆林地区的党政军和少数民族群众一起欢度春节。

春节之后,耀邦同志离去。我和海军来的几位领导乘坐“南交-81”艇接着考察了南海各部队。

南海各部队在挖洞、码头和营房建设上,同旅大、东海部队存在的问题类似,也是航道和港区水浅,需要解决挖泥等问题,海域航道也需要处理。

出我意料的是另一个问题。

当时,海军的军容风纪整顿已经两个月了,广州基地领导说,这次整顿,川岛水警区搞得最好。可是,到了上川岛,我大失所望。部队早就得到通知,知道我和基地司令员要去,但却看不到部队的相应动作。上了码头,部队来的人不少,却没有我预想中的列队欢迎,官兵们只是零散地站在那里,没有立正,没有敬礼,像一群在看大戏的农村老乡。这不怪战士,是干部的责任。我忍住了,没有当场发火。

下川岛看到的情况则让我不安。这里有个支队,港湾口子冲着南面,南风吹得厉害,很不宜避风。部队吃菜是大问题。一个艇一个灶,每天早上艇上司务长都要乘船到对岸买蔬菜和副食品,也买不到多少东西。过春节时,全支队没有吃到鱼。支队领导也只有四斤肉。我听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后来在南海舰队机关干部会议上,我讲了这件事,我说:“我们后勤部的同志听了,内心应该受到谴责!”

随后考察的码头工程、基地、港湾、水警区等地,都发现许多问题。

榆林港是南海舰队最好的港湾码头,也是建设的重点,但航道也没整治。我让他们好好论证一下炸礁问题,礁石该炸的就炸,码头该建的就建,把榆林港好好整顿一下,解决驻泊舰艇的拥挤问题。

考察中了解到,南海舰队的干部特别是驻海南岛部队的干部,思想问题不少,主要是不安心工作。这些人中普遍的情况是,工作也在干,但心里不踏实,有后顾之忧。一是物价高,特别是副食品,又贵又少;二是天气热,体力消耗大;三是远离家乡,交通不便,探亲往返花钱太多;四是本来有工作的家属,到了这里找不到工作,即使有工作,工资也比原来低,条件也比原来差;五是子女上学难,教育质量低。

凡此种种,都是事实,不能回避。要使这些干部安心工作,就应该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实际困难。要有解决的办法,有具体措施。

在这个前提下,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加强教育,提高干部的思想觉悟。我说:“有人不愿在这里干,我建议同国防科工委驻沙漠基地和驻西藏与新疆的边防部队对调,我想那里人员非常愿意到南海。不愿在海军干的人,可以去那里工作。南

沙群岛有几十个岛礁被周边一些国家抢占。南海是祖国的南大门,总不能敞着大门不管吧,我们大家如果都不来,外人肯定要来。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儿女,我们不来守这个大门又叫谁来守呢?”

1983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我到了山东半岛,考察北海舰队。

与50年代比,北海舰队的作战舰艇增加了几倍,初步形成了具有水面、水下、空中、岸防的多兵种合成作战力量,各种舰艇基地码头、飞机场站、岸防阵地、观察通信和保障体系已初具规模。总的情况比前面几次考察的要好。但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港湾、码头、航道、洞子,多是浅水港,容易被封锁,港口淤塞很厉害,使用不大方便,好几个地方都希望扩建。

我主张要选择重点搞建设,不再新建扩建小港口,否则战线越来越长。

当时,根据军委训练计划,海军将在1984年秋进行抗登陆演习。围绕这一任务,北海舰队进行了锚地训练。我发现训练中有走过场、跳训、漏训,训练质量不高的问题;有些科目进行了,实际标准却没达到;有的搞一次训练,准备一个月,训练10天,总结半个月。北海舰队有较强的舰艇修理能力,但修理效率低、时间长、价格贵。

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我又到了广东和福建,看到部队问题不少:福建地区通信不畅,打电话十分困难。战场建设也有问题,有的码头被淤泥湮了,有的航道也不行,我在那里住了两个晚上,坐船过去后回不来,得等到再次涨潮才能返回。我对陪同考察的福建基地领导说,福建是重要战略方向,要抓紧战场建设,重点建四个大点,其他点不要再搞了。我还指出,汕头是一个好地方,水深、江面宽,要好好规划一下,搞点

建设,保证舰艇的停靠。

经过一年多调研之后,我的感受是,30多年来,海军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部队的精神面貌也通过拨乱反正和恢复、整顿,各方面有了很大进步。但问题也的确不少:部队分散,指挥机构不够精干,重复建设多;舰艇部队受装备限制,活动范围小;航空兵通用的飞机多,海军专用的飞机少;司令部建设还是50年代的样子,改进不大;一些港口、洞库淤塞厉害;不少领导对教育训练摆到战略地位上来认识不足,部队训练不扎实,走过场;部队管理松弛,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未很好贯彻;干部不善带兵和管理;装备管理薄弱;舰艇修理的周期长;供应管理还是沿用老一套供应办法;政治思想工作薄弱,社会上的一些错误思想和丑恶现象也对部队有侵蚀,等等。

当时世界形势的发展对各国海军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显而易见,中国海军现状差距太大。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海军部队存在的问题必须整顿,必须改革,否则,无法完成保卫国家海洋权益的历史重任。

古语讲:慈不掌兵。海军的现状要动“手术”。

整顿与改革

海军的整顿首先是从海直机关开始的。

海军由于较长一个时期的思想混乱,造成了部队作风纪律的松散。刚回海军大院,首先入眼的,是秩序混乱,院容脏乱。大院中心地带是一片尘土飞扬的防震棚和简易饭店旅馆,人员杂乱,像个市场。机关的办公作风也差,着装不整,迟到早退,纪律松弛,三大条令和工作条例没有很好贯彻。这种情况,难以发挥领导机关的表率作用。

1982年10月5日,我主持了海军首长集体办公会议,决定对海直机关进行一次认真整顿。整顿内容以院容、军容、风纪、工作秩序为重点,由海司抓总,一抓到底。我强调说,加强作风纪律的培养是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重要内容,要求大家端正姿态,当作一件大事认真去抓。

与此同时,海军部队也进行了作风整顿。我明显感到,经过“文革”后,海军部队的作风纪律不如海军建设初期。除大连第一水面舰艇学校、上海基地机关和快艇十六支队等单位从外表看比较好外,多数部队作风松散,管理松懈。军容、舰容、港容、院容等很不像样子。因此决定,在冬春之交,按正规化的要求,在全海军范围内进行一次以军容风纪为重点的大整顿。1982年12月,海军发出《关于整顿军容军纪问题的通知》。1983年1月9日,海军召开整顿军容风纪电话会议,对整顿做了具体部署。

经过三个月的军容风纪大整顿,海军部队军容风纪、组织纪律、行政管理和装备管理上都有进步,但进展不快,不平衡,不扎实。领导软弱涣散、作风纪律松懈、基层薄弱的状况还未好转。

随后,在1983年7月召开的海军电话会议、8月召开的海军作战会议和10月召开的海军常委扩大会议上,我一再强调,纪律作风整顿能否搞好,关键在领导。它是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强弱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重要内容。要求当作大事认真去抓,坚决整顿。没有明显转变的单位,要限期抓出成效。

在此期间,全军组织了仓库联合调查组,对海军的仓库也

进行了全面调查。1983年7月26日,我主持办公会议,听取海后的汇报,看了海军仓库调查的情况录像。一听一看,觉得问题不少。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这次仓库调查,军委首长表扬了空军仓库管得好,批评海军仓库管得差。一奖一罚,值得深思。仓库问题,反映出我们海军的领导作风问题。我决定把录像带发到基地和管仓库的单位,让大家对照检查。不要等军委开会,马上开始抓整顿。

整顿从7月至年底,重点抓了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业务整顿、安全整顿、军容和库容整顿。同时还进行了财务、营房大检查,进行了医院和工厂的整顿。通过这些整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和加强了部队正规化建设。

经过近两年整顿,海军领导机关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在海军起到了表率作用。后来,在驻京各大军事单位的例行军容风纪检查中,海军也从“落后”进入了前列,1984年和1985年,总参军务部和北京卫戍区分别到海军大院召开现场会,推广海军的作法和经验。

但整顿工作发展不平衡,部队仍有不少问题。

1984年5月,北海舰队某支队一艘潜艇出海训练时发生了碰撞事故,再一次暴露了部队平时战备训练不落实,规章制度废弛,组织纪律松懈,基层工作存在薄弱环节等方面的问题。

为了吸取教训,6月27日至30日,召开了海军师以上军政干部会议。会上,我讲了五条教训:一、贯彻条令条例、规章制度不严格;二、技术基础训练不牢固;三、组织指挥不精密;四、装备管理不善,有些维修质量不过关;五、基层政治思想工作薄弱。从领导上检查,存在着事业心责任心不强、工作不扎实、缺乏统筹安排、基层工作忙乱、对“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

坏估计不足等问题。

军委首长到会讲话,从总体上肯定了海军的进步,同时指出这件事暴露出工作不扎实问题。

为此,我们派出工作组会同北海舰队对潜艇某支队的管理教育、军事训练、装备保养、政治工作等,用点验的方法逐艇逐项检查,摸清了部队的主要情况,找到了问题和薄弱环节,提出了解决办法。

随后决定,用三个月时间在全海军进行一次全面的点验性检查整顿。各级领导机关派出工作组,深入部队、院校,检查指导,对查出的各种问题逐个研究解决。

通过点验整顿,提高了部队贯彻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的自觉性,作风纪律有明显好转,全年行政责任事故比上年减少36.8%。

两年多时间里,进行了三次大的整顿。为了巩固和发展已有成果,在1984年底海军党委五届六次全会上,我讲了要继续进行整顿的意见,强调治军一定要严,工作一定要扎实。我们在海军1985年的工作要点中提出还要坚持整顿。整顿的时间、重点、要求、方法步骤,从各单位的实际情况出发,不搞“一刀切”;

海军、舰队、海航机关,结合精简整编,以落实任务分工和岗位责任制、提高工作效率为重点;

支队以下部队和院校,结合新兵新生入伍、入校或其他时机,以贯彻条令条例、加强组织纪律为重点;

仓库、工厂和医院,结合大检查和已查出的问题,以提高效益和工作效率为重点进行整顿。

在抓整顿的同时,还认真抓了海军的改革。

80年代前几年,中国大兴改革之风。我在到沿海地区海

军部队调研时,看到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变化,使我越来越清醒地看到,只有改革,才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而对于当时的海军,改革则显得尤为迫切。

海军建军之初,许多方面是按苏联海军模式建立起来的。后来的实践表明,这种模仿在早期是必要的,对中国海军建设也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但苏联模式也有些东西不符合我国国情,束缚了我们的手脚,妨碍了海军建设的发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海军受“左”的影响很深,对事情很难有冷静客观的分析,也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譬如,海军建军之初,有的人甚至不承认建设海军与搞陆军有不同的规律和特点,认为自己带过陆军,打过大仗,是常胜将军,一切都是好的。这种并不求实的思想,在“文革”中表现更厉害。跳不出老框框、老套套,海军一些“老大难”问题,也因此十年二十年得不到解决。

时代在前进。中国正在发生变化。海军建设要上去,必须改革。

1983年2月17日,正是农历元宵节。这一天,我在南海舰队机关科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着重强调了海军改革问题。

重点是,首先解决海军建设和改革的指导思想问题,以此规划海军长远建设。进而,结合多年的学习和实践以及经过一年多的调查研究,讲了改革的方方面面,即:不断加强和改革思想政治工作,摒弃“左”的模式,在继承我军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创新;改革现有编制、体制,按照军委规定的海军人员总定额,坚决把多余人员减下来,改革机构,该合并的合并,该撤销的撤销,该加强的加强,努力建立适应现代战争的精干顶用的体制、编制;切实把教育训练摆到战

略位置,不断增强领导干部的责任心、使命感。以军事训练为中心,严格按照训练大纲组织科目训练,针对作战对象,改革训练内容和训练方法,本着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的原则,组织紧急出航和长途奔袭演练,组织远航训练和各舰种、兵种的合成训练,以适应未来战争的要求;改革战场建设不合理的状况,以抓大、中军港建设为主,停建所有未建成的小码头和洞库,重点建设好几个大型港口,同时有计划地改造一些港口,使其能停泊大、中型舰艇,对驻泊点航道、码头水浅的问题进行挽救改造;加强正规化建设,重新修订舰艇条令和海军作战条令(最早我参加编写的),严格按照三大共同条令管理部队,彻底改变军容、舰容、院容的脏、乱、差状况;在装备管理上,深入搞好爱护装备教育,严格执行维修保养制度,加强业务学习,努力提高部队管理、使用、维护装备的能力;改变以往舰艇修理分别由司令部、后勤部几个部门管理的混乱状况,统一由一个部门管理,以提高效率,缩短修理周期,更好地为部队作战训练服务;改革后勤保障工作,合并管理机构,撤销大队、支队后勤部门,统一由舰队、基地后勤部管理等。

1983年,我们开始实施以上改革措施。首先抓了体制改革精简整编。

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是我担任海军司令员期间进行的牵动全局的重大改革。共两次。一次在1983年,另一次在1985年。特别是1985年的精简整编,邓小平代表我国政府庄严宣布:中国决定裁减军队员额100万。这是当时世界最大的裁军行动,在世界产生了巨大反响。在这两次大的体制编制改革中,我们认真贯彻邓小平关于走有中国特色精兵之路的重大战略决策,严密组织,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工作,圆满完成了精简整编任务。

我们首先从解决思想认识问题着手,使各级干部深刻理解小平同志说的“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军队必须进一步消肿”,“虚胖子是打不了仗的”等思想,并联系海军实际情况,认清海军确实存在数量庞大、摊子太散太多、机构臃肿、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明确体制改革精简整编就是把海军编得更科学、更合理,减少数量,提高质量,改善装备,提高战斗力。

这两次精简压缩定额,重点是精简军以上机关、直属分队,力度最大的是撤掉舰队后勤部。这是我们反复研究论证后的决定。主要是把舰队搞精干,使之成为领导指挥机构,集中精力搞好各兵种部队的作战指挥、合成训练和政治思想工作,避免物资筹措供应上的大转圈。随之改变基地的职能,基地主要管后勤和技术保障,并承担基地范围的近岸防御的组织指挥。这样,从指挥体制到后勤保障和各级修理体制都减少了层次。

对部队的改革,主要是裁减岸上的炮兵部队、工程部队和保障机构,使兵力构成比例更趋合理。

军委总部领导同志肯定了海军的体制改革精简整编。1985年8月22日,海军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时,军委、总部领导同志到会讲话。杨尚昆说:这次海军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是海军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变动;海军的工作,这几年是不错的,邓主席有评价,军委的同志也这样一致认为。

在进行体制改革精简整编的同时,狠抓了基层建设。在新形势下,部队受各种思想的影响较大,基层干部缺乏带兵经验,相当一部分不安心部队工作,许多单位制度废弛,管理松散。特别是海军连续出现的几次恶性事故,暴露了组织领导和基层工作上存在的严重问题。我觉得要开创海军工作新局

面,提高部队战斗力,不抓基层改革是不行的。因此,我们把基层建设作为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1983年11月,海军召开了基层政治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一改过去政工会只有政工干部参加的作法,而是军事、政治、后勤领导干部全部参加,共同研究全面加强基层建设问题。1984年,海军党委和机关在整党过程中,把转变机关领导作风、加强基层建设作为整改的重要内容。同年底,海军党委召开五届六次全会,我在会议结束时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治军一定要严,工作一定要扎实,要大力加强基层建设。我提出1985年基层工作的要求是:抓落实,打基础,保安全。

为了加强和改进基层工作,1986年1月,海军党委常委专门召开了扩大会议,提出用三年时间,从根本上改变基层薄弱状况。把基层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进行综合治理。制定了《海军全面加强基层建设三年规划》,提出了在继承解放军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创新的指导思想,苦干三年改变基层薄弱状况的奋斗目标,拟订了加强基层建设的八条要求和主要措施。主要措施是:坚持党委统一领导下,军政领导和各级机关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坚持领导机关而向基层,为基层服务,抓重点,在关键性环节上下功夫;实行科学的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益;加强检查督促,狠抓落实。我在这次会议总结中提出,要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扎扎实实地抓好基层,要求广大干部战士团结一心、坚韧不拔地奋斗。

《规划》下发后,海军师以上单位都制定了三年规划和年度计划,团以下单位也有长计划、短安排。海军基层建设走上了有明确目标、有计划发展的轨道。

1987年5月,我到旅顺基地检查,看到部队突出了抓基层这个重点,各级机关指导基层建设,一项一项抓落实。我在

基地团以上干部大会上讲话,在肯定成绩的同时,要求他们不能粗心大意,要把工作做得更好。

12月,海军召开了基层建设经验交流会,介绍了40多份典型材料。李耀文政委和我都在会上讲了话,肯定海军基层建设出现的好形势,综合会议介绍的经验,要求大家认真学习,结合本单位实际,狠抓落实。加强与改进基层工作是难解的一道题,取得这样的成绩很不容易。

1988年1月,在海军党委六届四次全会总结时,我回顾了几年来海军的改革情况。几年中,我们在体制编制、教育训练、装备科研、装备修理、后勤保障、政治工作以及基层建设等七个方面,进行了大约六七十项大小改革。精简了机构,减少了层次,方便了领导指挥。院校教育以“三个面向”为指针,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等向现代化迈进一大步,提高了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取得了一批科研成果。部队的基础训练、战术训练和各兵种合成训练,得到了加强,提高了整体作战能力。装备研制强调了系统论证,实行了合同制、招标和目标管理,提高了决策水平、经济效益和建设质量;装备修理实行了集中统管、综合修理,节省了修理经费,缩短了修理周期。后勤工作实行了三级供应体制,提高了综合保障能力。政治工作在继承我军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改进制度和办法,更好地发挥了“服务”和“保证”作用。基层建设实行《三年规划》,走上有计划、有步骤发展的轨道。

这些改革有三个特点:首先,贯彻执行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第二,改革是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步骤稳妥,措施得力,效益也很好;第三,改革充分注意从海军特点和从实际情况出发,加强了宏观指导,明确了海军战略,制订了近、中、远期规划,提出了有重点按比例均衡发展的建

设方针,确定了“十五年向前跨一大步”的发展目标。

提出“海军战略”

1985年底,我第一次正式提出了中国的“海军战略”问题。

这时,我已经任海军司令员三年多了,对海军建设和发展有了许多思考。刚上任后的一年多里,我跑了许多部队,深入调查研究,听到和看到的情况令人深思。我尤其注意到,由于过去战略指导思想宣传教育不够,在部队训练、兵力编成、人才培养以及武器装备、战场建设等方面出现不少问题,造成许多不应有的损失。

这些问题,可以看成是经验不足,是中国海军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但把它放到全球的军事环境里对比看,我们的海军发展缺少一个完整的“海军战略”——这一战略,应该有长远眼光和广阔视野,能在较长时期内对海军建设与作战实施科学的宏观指导。

对此,我组织人员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观世界军事史可以看到,过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海军在海上或濒海地区的作战行动,多为陆上作战的从属部分,这个时期没有形成海军战略这一概念。但随着海上战争的发展,海军逐步发展成为一个能够在海洋上独立遂行军事任务的军种,海战不再完全从属于陆战场,海军战略应运而生。一些西方军事人物,撰写了不少关于海军战略的专著。1890年,美国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更有代表性。书中提出了系统的海权思想和海军战略理论:国家的繁荣和富强维系于海洋,海权对国家历史的进程发挥着巨大作用;海权的遂行既包括平时,也包括战

时,前者是指国家通过控制海洋发展对外贸易和商业海运,后者则指运用武力控制海上交通线,以达到战争目的等等。这些海军战略理论,对英、美和其他国家海军产生过重大影响,不仅维护了这些国家的海洋权益,而且在对外扩张,实行海上霸权方面,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有过数百年的“禁海”历史,这些新出现的海洋战略理论,也被拒之门外,对中国没有产生多大影响。中日甲午战争前,清朝海军实力还居世界前列,可是,由于封建统治保守腐败而且缺乏海军战略的理论指导,作战思想落后,海战屡遭失败。这也正好从反面说明了海军战略的重要性。

早在1983年8月,新班子上任不到一年的时候,就召开过一次海军作战会议。在这之前,全军曾先后召开过两次重要会议,明确了战略方针和各军兵种在未来战争初期担负的主要作战任务,在作战准备的一系列重大方针、原则问题上,有了明确的方向。第一次会议时,几位老师也曾提出:战略方针的确立和战略方针的具体化,是军队的头等大事;战略方针的具体化,要一个战区一个战区来研究,正确解决战略、战役、战术之间的关系。可上任不久我发现,1978年以来的四年中,海军很少开作战会议,也没有研究贯彻小平同志对海军工作指示的落实措施。我很意外。军队的存在,就是要准备打仗的。我反复学习小平同志对海军建设、作战的指示精神,抓紧时间,考察了许多部队,对海军今后的作战问题,作了一些深入的调查思考,形成了“海军战略”的粗略雏形。

在这次会议上,我对海军未来作战问题,谈了几点意见。

我提出首先要认清形势,加强战备。从世界总的形势看,新的世界大战还不会马上打起来,但是国际形势仍然动荡不

安,整个世界充满矛盾和斗争,旧的动荡热点没有解决,新的动荡点又在孕育中,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局部战争持续不断。我们要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抓紧战备,随时准备应付突然情况。当时有人认为,国防经费减少了,仗打不起来了,战备工作可以慢慢来。我批驳了这一错误观点。此外,就要不要提海军作战方针、海上作战应坚持哪些作战原则、海军作战海域范围如何制定、海上作战有哪些形式等问题,我也谈了自己的看法。

关于海军作战方针,当时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中央军委已经明确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战略思想,这是统管战争全局和全国各战场的,适用于每个战区,海军也不例外,不宜另提海军作战方针。另一种认为,海上作战有它的独立性、特殊性,应该有适用于海军的作战方针。

我倾向后一种意见,要求继续深入研究这个问题。

两个多月后,海军举办了高级干部军事研究班。研究班上,我作了题为《关于海军贯彻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几个问题》的讲话,再次着重谈到海军作战方针问题,并概括为:“积极防御,近海作战。”

在贯彻这一方针中,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要统一对“近海”概念的理解。以往,海军把距我海岸 200 海里以内的海域作为“近海”。我强调要按小平同志的指示来统一认识“近海”的概念。“近海”是我国的黄海、东海、南海、南沙群岛及台湾、冲绳岛链内外海域,以及太平洋北部的海域,“近海”之外是“中远海”。

1984年7月,我在海军院校教育改革座谈会上,进一步提出要根据作战对象、国家军事战略和海军作战任务,吸收外军军事理论中有用的东西,发展中国海军的战略战术,并要求海军学院对美国、苏联的海军战略理论加以研究评析。

此后在我脑海中，“海军战略”的雏形越来越清晰。

这时，我又看到了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讲到，我国不但要有“大陆观”，还要有强烈的“海洋观”；海军是不是战略军种，该是明确的时候了。我很同意这一意见，而且非常赞赏研究报告中的一段话：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早发明指南针的、有如此漫长的海岸线和悠久航海历史的天赋海洋大国，它的海军当然应该是‘战略军种’。不能认为只有帝国主义为了争霸、称霸才需要使其海军成为‘战略军种’，社会主义中国不称霸，因而也就没有需要有一支足以执行战略任务的海军。恰恰相反，寻求友谊，促进文化和贸易交流，我们尤其需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我们已经丧失了许多时间，现在是着手认真落实这一夙愿的时候了。”

1985年，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要研究制定长期建设规划和发展战略，我军从临战状态转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为适应这一转变，迫切需要加强对海军建设的宏观指导。此时，海军的精简整顿和各项改革，已取得了初步成绩；军事学术研究，对当代、近代中国和外国海军发展历史的研究也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建军思想。在这种形势下，我认为提出“海军战略”的条件成熟了，建议海军党委抓紧研究“海军战略”。

1985年底，我第一次正式提出了“近海防御”的“海军战略”。当时，海军举行了首长机关单方一级研究性图上演习，经过八天的理论和实际推演，探讨了未来战争中海军作战的新观点、新方法；对如何筹划整个海上战场海军兵力的作战行动和海军如何转入战时体制等问题作了详细研究。

12月20日，在图上演习总结会上，我谈了关于“海军战略”的想法，讲了三个问题：一、为什么要制定“海军战略”？

二、如何认识“海军战略”？三、我国“海军战略”的内容是什么？再次阐述了邓主席对海军作战和建设问题的重要指示，指出，海军还没有将其明确为海军战略思想，并以此指导海军的建设与发展。要建设海军、保卫海防和国家海洋权益，必须以毛泽东、邓小平关于发展海军的思想为指导，确立一个正确的海军战略。

1986年1月25日，在海军党委扩大会上，我再次提出要确立“海军战略”，这是适应我军战略转变中海军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并将其概括为“近海防御”。

事实上，海军同其他军兵种一样，其发展不仅依赖于经济实力，同时还需要一套完整的战略思想和理论作指导。作为一个战略军种，海军应该有自己的战略。军委制定的战略方针是陆海空三军作战和建设总要求，海军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但海军作为一个独立军种，其作战任务、条件、环境和作战模式、战役战术手段等，都有其自身特点，只有根据现代海战特点和未来海上作战的需要，明确海上作战的一系列指导原则和重大问题，制定“海军战略”，并以此筹划和指导海军作战与建设，才能更好地实现“积极防御”的总体战略。

海洋战略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捍卫领海主权，维护国家海洋权益，迫切要求海军制定一整套与国家海洋战略需要相适应的海军战略。海洋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斗争中的地位日趋重要，围绕海洋权益的斗争越来越尖锐复杂。根据新的国际海洋法，我国可以划定300万平方公里左右的管辖海域，这些海域和大陆架，构成了我国海洋国土，蕴藏着丰富的海上资源，尤其黄海、东海和南海，更是我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资源宝库和安全屏障。在我国当面海区，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在海洋资源开发、专属经济区的划界、大陆架的走向和部分岛屿特别是南海诸岛归属

和开发等方面,与周边国家存在很多争端和分歧。在这种形势下,为维护海洋国土的根本利益不受侵犯,抓紧制定出我国的“海军战略”十分重要而又紧迫。

“海军战略”主要内容有:

第一,我国的“海军战略”是“近海防御”,属于区域防御型战略。当代世界各国“海军战略”的基本类型,可以概括为远洋进攻型、区域防御(或区域进攻)型以及沿岸防御型。美、苏海军遂行的是远洋进攻战略;英、法、德、意、日等国家海军,基本上采取区域防御型战略。“近海防御”不是沿岸防御,属于区域防御类型。

第二,我国“海军战略”的性质是防御性的。这是由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所决定的,是海军贯彻我军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决定的,就是将来海军现代化了,“海军战略”的防御性质也不会改变。

第三,海军的作战海区,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主要将是第一岛链和沿该岛链的外沿海区,以及岛链以内的黄海、东海、南海海区。这一海区,既包括国际海洋法公约确定的归我国管辖的全部海域,也包括南海诸岛等我国固有领土。和原来的“近岸防御”相比,这种作战海区概念的扩大,有利于战时我在主要方向上组织海上防御作战。随着我国经济力量和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增强,海军力量进一步壮大,我们的作战海区,将逐步扩大到太平洋北部至“第二岛链”,在“积极防御”的战役战术上,将采取敌进我进的指导思想,即敌人向我沿海区进攻,我也向敌后发起进攻。

第四,我国“海军战略”的目的,是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及海洋权益,应付海上局部战争,遏止和防御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来自海上的侵略,维护亚太地区和平。

第五,海军的战略任务,可以区分为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两个方面的任务。和平时期的战略任务主要是:一、实现和维护包括台湾在内的国家统一,保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二、为国家的外交政策服务;三、作为一支海上威慑力量,遏止敌人可能来自海上的侵略;四、应付可能发生的海上局部战争;五、支援和参加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战争时期的任务是:一、独立或协同陆、空军作战,有效抵御敌人来自海洋方向的进攻;二、保护己方海上交通运输线;三、在统帅部的统一指挥下,参加战略核反击作战。

“近海防御”海军战略的提出,对海军未来海上作战能力要求更高了。为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我认为海军必须达到以下作战能力:第一,能在近海主要作战方向上一一定的时期内夺取并保持制海权;第二,能在必要的时间里,有效地控制与中国海区相连的重要海上通道;第三,能在与中国海区相邻的海区进行作战;第四,具有较强的核反击能力。当然,我也清楚地意识到,我们目前的作战能力与之相比,还有差距。但我们必须为此作出不懈努力,尽快缩小和消除这种差距。

为了进一步阐明制定“海军战略”的重要性及其内容,1986年4月29日,我应邀在国防大学做了题为《海军战略与未来海上作战》的学术报告。报告中,对“海军战略”的形成与发展、提出我国“海军战略”的基本依据、“海军战略”的内容、海军作战能力和海军建设的要求及海军兵力的战略使用等,做了比较系统的阐述。这次报告,引起国防大学领导和有关军事理论研究人员的关注,影响较大。5月24日,我又以此为题,在南京海军指挥学院讲了一课。

根据“近海防御”海军战略,我又组织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对海军的发展战略展开研究。

同年11月,海军组织了一次由军内外有关部门领导和专家学者参加的“海军发展战略研讨会”,大家一致认为,我国海军应当有自己的战略,现在明确提出“海军战略”,不仅有重要理论意义,对今后海军建设和发展,也有重要的实际指导意义。大家同时认为,在现在条件下,我们既有必要也有可能产生出具有我国特色的人民海军理论。这样,海军建设才会有统一的观点和行动准则,海军建设决策才会有理论依据。

1987年2月13日,我和李耀文政委签发了海军党委给中央军委的《关于明确海军战略问题》的报告。3月21日,又签发了给总参谋部的《关于海军战略的简要说明》的报告。

4月1日,根据总参首长指示,总参作战部召集总参二部、三部、军训部、装备部以及科工委、军科院、国防大学、军委规划办和海军等九个单位,专题研讨了海军党委向中央军委呈报的《关于明确海军战略问题》的报告。与会同志一致支持海军党委提出的“海军战略”,认为是适时的和极为重要的,它不仅对海军今后的作战和建设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同时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全军军事理论的研究是一个很好的促进。发言中,也有些同志对海军的奋斗目标、作战方针、作战海区等的表述,提出了探讨性的意见。

中国“海军战略”的提出引起了国外的广泛关注。90年代初,一些外国军事文献多次评论中国“海军战略”,并说我是“中国的马汉”。对此我并不认同。马汉提出“海权论”和以海权论为中心的海军战略理论,是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向海外扩张的需要,而我研究提出的我国“海军战略”,与其目的明显不同,我们不是为了扩张,而是为了有效防御来自海上的可能的侵略,维护国家合法的海洋权益。

第十七章 战略军种

海军军官摇篮

作为战略军种,从海军当时的情况看,各方面建设都需要大力加强,但我认为,关键还是人才建设。

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海军,不仅要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而且要有一批精通海战理论和战略战术、能熟练指挥和使用现代武器装备的各类人才,两者有机结合,才能构成强大战斗力。

在海军,人和武器装备的结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海军的舰艇和飞机到海上训练执勤,往往远离海岸和后勤基地,海情、空情多变,还经常涉及外事,海军官兵必须有很高的军政素质。因此,必须首先努力办好海军院校。“建军先建校”,“治军先治校”,这也正是中国海军建设的基本经验。

“文革”中,海军院校遭到了极大破坏。十几年的建校工作成绩被全盘否定,院校大部分被撤销,幸存的也都撤迁,大批教学人员被处理,大量图书资料、教学设备被烧毁或散

失。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后,恢复了原有院校,经过努力,院校建设也取得了明显效果。但由于教育一度中断,海军人才奇缺,数量和质量都不能满足需要;部队中,百分之八九十的干部没有经过院校训练;院校教员以及营房、教学设备严重不足,多数院校没有实现满员招生,等等,院校建设存在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

针对这种局面,我明确指出:加强人才培养,是开创海军新局面的决定性环节,必须把加强院校教育提高到战略地位,今后八年内,在保持干部的满员和配套、提高军政素质的同时,还要为后十年的发展准备一定数量的干部。

几个月后的1983年2月,中央军委召开了第十二次全军院校会议,强调要真正把院校教育提到战略地位,提出了“四个舍得”：“舍得拿出最强的干部去办院校;舍得选送优秀干部、战士进院校;舍得拿先进的技术装备给院校;舍得花钱努力提高教学质量。这一精神和我们的想法不谋而合。3月9日,在海军党委常委会上,我再次强调,要认真贯彻全军院校会议精神,切实把院校教育摆到战略地位上来,这是海军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针。会议讨论通过了《贯彻第十二次全军院校会议精神加强海军院校建设的决定》。

11月底,我们在北京召开了海军第十次院校会议,进一步统一院校教育战略位置的认识,提出了贯彻这一指导方针的措施:一是海军干部要经过院校培养才能提拔和晋升,各院校要起到集体干部部的作用,训练干部、选拔干部、推荐干部。二是认真落实“四个舍得”,把教育训练摆到战略位置这一重要指导思想落到实处。三是坚持以教学为中心,严密组织,严格管理,严格要求,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1986年3月,召开了第十一次海军院校会议,确立了院

校建设在海军建设中的领先地位。我强调,要把院校建设作为新时期建军的重要工作来抓;多拿出一些钱,调配一些武器装备和器材,支持和加强院校建设。

那几年,海军党委下了很大决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院校建设,尽可能地为院校解决实际问题。譬如:通过领导班子调整,使院校领导班子在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和专业结构上得到了明显改善;精简整编中,从部队定额中拨出一些名额给院校,解决教员队伍青黄不接的困难;增加院校的基建投资,解决院校营房紧张影响招生的问题;陆续配发武器装备给院校;拨专款为院校建设图书馆,并拿出专款给院校作为图书资料经费补贴;建造了“郑和”号航海训练舰,改善了学员海上实习条件;校址布局作了一些调整,“文革”中迁至内地的航空学院和电子工程学院由内地迁至沿海地区;航空工程学院迁回烟台等等。

加强院校建设,就要创立名牌学校。我在任海军司令员期间,走遍了海军各院校,所到之处,都强调这一思想。第十一次海军院校会议上,我正式提出创立名牌学校,要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一支好的教员队伍;一个好的校风。办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院校。

创立名牌学校的根本目的,是培养优秀人才。我将现代海军军官应具备的素质归纳为五条:要有崇高理想和为海洋事业献身的精神,爱舰、爱岛、爱海洋,有高度的事业心、责任感、荣誉感;要有勇敢无畏、坚韧不拔的海军军人气质和科学的求实之心,不避艰险,不怕艰苦,勇于探索,开拓前进;要有较丰富的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海上实践经验,精通一两门专业,博知多种专业,专博结合;要有自觉的组织纪律性,既要一切行动听指挥,按条令和规章制度办事,又要机动灵活、有应

变能力,在任何情况下都能通观全局,按上级意图办事;要有适应海洋训练、生活、战斗的坚强体魄。

海军需要各种人才,职责不同,用人的要求和标准也有所不同。为了跟上时代发展,我强调必须重视复合型人才的培养,譬如,我主张把舰艇部门长改为通科培养;把飞行员和岸防部队初级指挥员的培训,提高到大学本科规格;把航空机务干部提高到大专规格,不分机型机种通科培养。我还主张发展研究生教育,1987年我提出在广州海军舰艇学院开办飞行员舰长班,从年轻优秀飞行员中选拔,培养成为大型水面舰艇舰长。

育才是为了用才。以往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现象,不少人才学非所用,边培养边流失。为解决这一问题,我提出,一要科学规划人才培养,做到编配有据,进出有序。二要加强对干部的考察了解,汰庸擢贤。三要改进人才管理,实现人才管理和使用的制度化。我们实行了干部先训后提、合格考试、合理年龄结构、任期制等制度。对关键岗位上的优秀人才,作了一些特殊规定,保留了一批舰艇长和业务长,对海军建设起了良好作用。

经过几年努力,海军部队的人才状况发生了可喜变化,部队干部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达到70%以上,有些部队如潜艇部队达到90%以上。海军院校教育的长足进步,得到了总部领导机关肯定,《红旗》杂志对我进行专访,邀我撰写了《建设强人的现代化海军关键在人才》一文,在1986年第2期发表。

值得一提的是,我在1987年决定开办的飞行员舰长班,学员们经过广州舰艇学院的系统培训和部队的实际锻炼,已全部走上驱逐舰和护卫舰舰长岗位。1998年,中宣部、总政治部突出宣传了海军优秀飞行员舰长柏耀平的典型事迹,在

社会上引起广泛反响。这种舰长既能飞行又能指挥操纵舰艇,是现代战争所需要的高水平复合型人才。他们的顺利成长,我由衷欣慰。

1983年国庆前夕,小平同志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三个面向”,指明了新时期教育发展的战略方向,既高度概括,又切中时弊。我意识到,“三个面向”对海军院校的教育改革,也有极大的指导作用。

海军是装备技术复杂的军种,知识和技术密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进入70年代以来,由于现代科技的发展,海军装备日益向导弹化、电子化、核能化、自动化方向发展,海军知识和技术密集的特点越来越突出。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海军还谈不上先进,但各个系统、各种类型的现代装备都有了一些,而且随着国内科技的发展,海军的武器装备将会不断改进更新。院校教育必须适应这一发展趋势。

当时,有些人眼界思路还没打开,局限于立足现有老旧装备,满足于已掌握的知识技能,看不清现代海军的发展方向,缺乏开拓进取的热情。这些陈旧的思想观念必须改变,必须更新。在1983年的第十次海军院校会议上,我明确提出,要以小平同志的“三个面向”为指导思想,进行教学改革。

院校的教育改革,应该有战略眼光,人才的培养,必须走在装备发展的前面。当时,海军院校存在不少问题,如专业设置不合理,划分过细;有些专业学制短,规格低,培养的干部基础薄弱,知识而窄,适应性不强。这与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海军干部的要求存在很大差距。我们决定改革专业设置,以此带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革。当然,专业设置的改革,涉及面广,制约因素多,需要充分调研,科学论证,慎重

决策。我们决定分两步走：第一步，对已经看清楚的问题，进行局部改革，如高级电子专科学校的通信排长与技师合训，按大专培养；航空机务学校的机械、军械、特设和无线电专业，按大专培养，不分机型机种，实施通科培训；飞行员按大学本科培训；舰艇部队各类业务长，按大学本科、研究生规格培训等。第二步，编制专业目录，扩大改革范围。

1984年7月21日，海军召开了院校教学改革座谈会。我在会上提出七点意见：首先，要冲破陈旧的传统观念束缚，逐步实现向现代教育转变；人才培养不仅要考虑海军目前建设需要，更要着眼于90年代以至21世纪前期，为海军发展做好充分准备。第二，要破除那种只喜欢用“土生土长”的干部、轻视“学生官”的旧传统观念，扩大从地方高中毕业生中招收学员的比例，改变海军干部队伍的知识结构。第三，纠正学习和研究军事理论中“单打一”的片面倾向，既要注重毛泽东军事思想和邓小平关于军队国防建设理论的学习研究，也要重视外国先进军事理论的学习研究。第四，去掉陈旧过时的教学内容，增加现代战争和新科技知识。第五，解决教员队伍专业知识老化问题，帮助他们搞好知识更新。第六，摒弃落后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不断提高教学的现代化程度。第七，改革长期以来以经验管理为主的状况，努力学会用现代科学方法管理海军院校。

当时，军内尚未提出以小平同志的“三个面向”思想指导教育改革，我的这些意见引起总部和新华社关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分别在1984年7月和8月作了摘要报道，总参《军训通讯》也在当年第11期详细摘发了我的讲话内容。

1986年2月，在第十三次全军院校会议上，总部明确了以“三个面向”作为全军院校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这使我更

坚定了海军院校改革的方向。3月,我在海军第十一次院校会议上要求,要按照中央军委关于《全军院校的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和《军队院校教育改革的决定》,搞好海军院校的教育改革。

这次海军院校体制改革取得不小突破:海军第二炮兵学院,调整改建为海军航空工程学院。海军第二炮兵学院过去是单一的海军炮兵院校,后来增加了导弹专业,现在进一步增加了原在空军工程学院代训的海军航空工程各专业,甚至包括海军飞行员基础方面的训练。因为飞机和导弹同属飞行器,在基本原理、基础技术方面有许多一致的地方,从发展看,导弹和海军航空兵在海军具有重要地位,需要大力发展,现在把两者结合起来,使海军航空工程学院变成高级综合技术大学,提高了办学水平和办学效益。此外,海军两所航空机务学校,合并为海军航空技术专科学校;在海军第二航空机务学校原址蚌埠,组建了海军士官学校;还在九所海军军官学校中增设了士官班。

由于指导思想明确,观念更新,措施得当,海军院校的教育改革取得了明显成绩:建立了新的培训体制,指挥军官由原来的三级培训,发展为四级培训,即初级(技术)指挥军官、兵种战术指挥军官、合同战术指挥军官和战役指挥军官培训。专业技术干部在原来按中专、大学本科两类培训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中专、大专、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等多层次培训体制。建立了士官教育机构,解决了士官与专业士兵培养训练的问题。开办了函授教育,一些学历不高的在职干部,得到了系统学习和提高的机会。建立了新专业,调整了专业设置,将原培训军官的134个专业,调整合并为88个。舰艇部门长实行通科培训,部分专业实行指挥与技术合训,拓

宽了专业面,增强了适应性。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也得到改善,电化教学有了较大发展,幻灯、录像、闭路电视、语言听力室、电子计算机、训练模拟器已较普遍应用于教学。

1988年,总参在海军工程学院召开全军专业技术院校教学改革会议。海军工程学院和海军航空工程学院,分别在会上做了题为“遵循军事高等工程教育规律,努力办有特色高水平的院校”和“培养复合型人才”的经验介绍。

当时,海军院校建设还有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教师队伍的重建。过去,海军曾经有一支好的教师队伍。海军院校建校初期,采取从原海军人员中选调,从地方大学聘请,从参军的青年知识分子和部队选调培养等措施,比较快地建起了一支教师队伍,并逐步发展壮大。很可惜,由于“文革”的破坏,大批教员被处理了,一些很有造诣的专家教授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受到隔离审查。粉碎“四人帮”后,院校重建,通过种种办法,使教员的数量恢复到了1965年的规模。但是,重振教师队伍仍然面临两个问题:一是知识分子政策落实得不好,有“左”的偏见。二是教员队伍质量不高,存在理论基础薄弱、知识陈旧老化、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尤其“文革”中补充的新教员,文化基础较差,教员中没有正式院校学历的占教员队伍的四分之一,特别是那些新建和重建的院校,教员既缺又弱的问题更为严重。

为扭转这一局面,我们首先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入手,加强教员队伍建设。强调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尊师重教”。

1985年,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上,确定了每年9月10日为“教师节”。为在海军倡导“尊师重教”的好风气,我们隆重庆祝了首届“教师节”,在北京召开了院校优秀教

员代表座谈会,表彰了26个教研室、170名教员。11月,海军党委又制定了《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几项具体措施》,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并提出奖励有突出贡献的知识分子、妥善解决教师和科技干部待遇等一系列具体措施,较好地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同时,我们还注意从长远布局,从当前抓起,采取多种措施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要求各院校三五年内,承担大学本科和大专班次的教员,要具有研究生和大学本科毕业水平,中专教员要具有大专以上水平,每个教研室要有二至三名学科带头人。还制定下发了《海军院校教员管理工作暂行规定》,对教员的选调、培养、提高和教员的管理等作出具体要求,各院校也都制定了培养教员的规划。1986年3月,召开了第十一次海军院校会议,我再次强调,教员队伍要精干,不能以数量代替质量。会议讨论制定了教员队伍建设的五年规划,对教员的年龄结构、学历结构和职称结构都提出了优化的具体目标。

1986年,开始实行专业技术职务任命制。利用这个机会,我们对教员队伍进行了调整。调整后,海军院校教师队伍知识老化、青黄不接等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海军院校教师队伍建设成效显著,在军内外形成了较好声誉。1988年,国家教委组织代表团,检查了七个有代表性的军队院校,其中包括海军工程学院和广州舰艇学院。代表团对海军工程学院的评价是:“无论从教授的水平 and 梯次结构上,建立起办最高层次的培训体系,水平都是不错的,值得地方院校学习。”后来,在总部举办的全军院校长集训班上,海军工程学院介绍了《从长远布局,从当前抓起,建立一支有特色高水平的教员队伍》的经验。此外,美、英、日、德、法、苏联等

40个国家100多个军事和教育代表团,也先后来海军院校进行学术交流和参观访问,对海军工程学院、大连舰艇学院、潜艇学院、海军指挥学院等院校的师资水平、教学水平和科研水平,都给予了较高评价。海军院校建设取得的成绩和进步,确实令人欣慰。

科 研 基 地

搞好海军现代化建设,必须高度重视科学研究,要让科研走在前面。

回到海军后,我在海军科学研究上,重点抓了两方面工作:一是组建了专门的科研机构海军装备论证研究中心和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一是发挥海军院校在学科专业、师资力量和教学科研设施等方面的优势,把海军院校建成重要的科研基地。

装备的建设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是装备的论证工作。以往对这项工作重视不够,我就任海军司令员后,决心改变这一局面,加强装备论证研究队伍建设。

1983年精简整编和体制改革,海军许多单位撤销、降级和降格,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组建了海军装备论证研究中心。

为什么下这么大决心把这个单位搞起来?1983年7月9日,在海军装备论证中心工作会议上,我讲:道理很清楚,这个机构,在海军现代化建设上是必需的,我们搞得有点晚了。七院1969年归海军管,1970年成立了论证部。那时候有些人对这个问题认识还不清楚,不仅海军有人不赞成,上面也有人不赞成,结果过了不久,论证部就归六机部管,任务方向被改变了,现在,我们只好再组建起来。

海军装备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武器装备系统的发展来说,论证研究是第一道工序,也是很关键的一道工序。现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先进技术要尽快运用到海军建设上来,有一系列工作要做。没有专门机构,没有专门的技术干部队伍进行研究,拿出有充分根据的最佳方案,而是只凭随意性的想法拍板定案,会造成巨大浪费,酿出大错。实际上,30多年来,我们走了很多弯路,吃了很大苦头,现在才认识到一定要讲科学,要用科学方法办事。

1985年,在海军装备技术工作会议上,我要求论证研究中心要成为海军党委的高级咨询机构,能够在装备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上,提出科学的决策依据。

1986年,我和海军司、后、装的领导又专门听取建设论证研究中心的汇报,再次强调,论证研究中心主要提出使用要求,搞武器装备必须经过科学论证;要从实际可能和需要出发,使海军首长、机关的决策少失误、不失误;要成为咨询机构,为海军发展提出大的建议方案,供领导参考决策。我要求他们,要好好总结经验教训,要一个型号一个型号搞论证。要联系整个装备体系,高层次、大系统;要联系兵力结构,考虑海军整个武器装备结构。这是个系统工程。具体型号定下来后还有个达到什么性能,达到什么水平,都需要充分论证。论证后的装备,十年二十年以后也应是不落后的;如果造出来就落后,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论证工作必须全面考虑,战术技术指标的深度和广度要适当。我对在场的海军机关同志明确提出,论证研究中心的建设要搞上去,编制问题要解决,经费要根据新的情况进行调整。我还要张序三副司令员和海后、海装研究,合理利用科研费和工程费,尽快把论证研究中心建设起来。经过上下共同努力,海军装备论证研究中心的主科

研楼和有关研究所、研究室先后建成了。

几年来,海军装备论证研究中心为海军装备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到1986年,先后完成了第二代18类装备发展系列,以及一些战斗舰艇、海军专用飞机、武器、电子系统等装备的论证研究任务,使海军新一代装备发展建立在战术、技术、经济可行性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同时开展和完成了一些现役装备改进的研究设计工程项目。论证研究工作的局面已初步打开,进而向高层次、大系统、综合性的论证研究发展。

1983年,是海军新老交替的一个重要时期。针对相当一部分老领导、老专家陆续退出工作岗位的情况,由我提议,经总参批准,海军党委决定成立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政治工作研究和科学技术研究三个委员会。其委员和工作人员在离退休人员中聘任,个别在职领导兼任,都不占编制。我兼任海军军事学术研究委员会主任。三个委员会均有院校、部队和机关在职和离退休的同志参加,每年开一次会,平时搞调查研究,向海军提供调研报告和政策性建议,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

1985年7月,经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了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任务是开展军事学术研究,组织指导全海军军事学术研究工作,并兼管海军军事学术研究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1986年11月,海军召开军事学术年会,开幕和结束时,我都到会讲了话,着重强调军事学术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当时,海军正在搞规划和计划,存在与战略目标、战略任务如何结合的问题。如果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明确,搞规划和实施计划就能有的放矢,理论与实际才能有机结合,从作战方面看,战略目标、作战方向、作战对象不解决,作战问题本身不好解决。所以,要积极研究军事学术,认真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我还强调,军事理论研究,要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和向前发展,一定要同研究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国防问题结合起来发展军事理论。还要善于学习和钻研海洋问题,过去我们的知识较少,现在需要在这方面开展研究工作。

“七五”期间,海军军事学术研究取得了较好成绩,承担了中央军委关于《全军1990年前军事学术研究计划纲要》中赋予的重点课题的科研任务,大部分已完成。此外,海军机关及各单位还针对海军作战、训练及建设等方面的实际问题和需要,积极开展了军事学术研究,完成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首长和机关的科学化决策,为海军的作战与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咨询建议。

海军军事学术研究工作,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坚持正确的研究方向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实行开放型研究,保证了课题研究工作的健康开展;二是各级领导重视,亲自参加和主持课题研究工作,使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有了较大发展;三是充分发挥专业和业余研究力量的作用,不断加强研究队伍;四是从实际出发,实行科学管理,促进了课题研究的顺利进行。

我还重视发挥海军院校的科研作用,多次指出:海军院校要既搞教学,又搞科研;既是人才培养的基地,又是科学研究的基地。要把教学和科研都搞好,科研促进教学质量提高,教学又向科研提出要求。

根据院校训练任务和科研条件的不同情况,对院校的科研要求有所区别。教学基础、科研条件比较好的院校,在搞好教学的条件下,要积极开展科研工作。培养层次较低、科研力量较薄弱的院校,要尽可能开展科研工作,以提高教学水平。

在指导院校科研工作上,我要求各院校,要根据各自条

件、专业特点和优势,确定研究方向,并确定了研究方向的基本原则:一是发挥各院校的优势,与教学相结合;二是服务于海军现代化建设,与部队需要相结合;三是掌握科技发展的前沿动态,与新学科专业建设相结合;四是采用新技术,与实现教学训练手段现代化相结合。

检查院校工作时,我也注意从科研上有针对性地提出具体要求。1983年5月我到潜艇学院调研,要求他们把解决潜艇部队的战术问题放在首位,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要研究如何以劣势装备打击优势装备的敌人;研究潜艇如何对付水面舰艇、如何防空、如何反潜,要能生存,能作战,而且能战胜敌人。

同年12月,我到了海军学院,要求他们加强军事学术研究,提高军事理论水平,提高海军战略、战役、战术思想,在更高水平的基点上来统一军事思想,统一学术原则,统一海军建设的一些制度。

1984年8月,在听取大连水面舰艇学院研究成功的“水面舰艇对空防御”课题汇报表演后,我肯定他们用军事运筹学和系统工程理论研究舰艇作战问题的方向正确,并支持海军装备技术部的建议,充分利用该院的模拟训练中心,以此为基础,在该院建立一个二级软件开发中心,研究开发新型水面舰艇作战应用软件。这个软件开发中心成立后,把训练与科研紧密结合,积极开展攻关,承担并相继完成新一代舰艇指控系统的战术软件研制,作出了显著成绩,他们的其他多项成果,也填补了国内空白。

1985年3月,在海军工程学院,我要求他们发挥教员队伍水平较高的优势,继续搞好科研工作,并题词:“把海工办成教学科研基地,为海军现代化建设多出成果,多出人才。”海工

的科研项目由少到多,科研规模由小到大,形成了有特色、有优势的十几个研究方向,取得了几百项科研成果,为海军高新技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也解决了大量部队急需解决的难题。

1987年2月,在海军航空工程学院视察时,我要求他们研究各种导弹的进一步改进和发展,如第二代武器怎么搞,研究适合海军特点和海军特别需要的飞机,如海上巡逻机、反潜机、海军救护机、中远程轰炸机等。

根据总参部署,继陆军、空军组织激光模拟对抗演习之后,海军于1987年8月,组织了海上电子激光模拟对抗演习。这在海军是史无前例的。为了突破难关,我们组织海军院校、科研单位、部队和工厂的技术力量,开展了各种电子激光模拟器的科研攻关。经过日夜奋战,取得了可喜成果。参加演习的模拟器性能优良,受到军委、总部首长和海军部队的好评。从中我进一步认识到,院校确实是科研的一个重要方面军。

由于方针正确,组织落实,措施有力,这一时期海军院校科研工作有了长足进步,取得了显著成效。主要表现:

在军事学术方面,海军战略、战役、战术理论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特别是在我提出“近海防御”的海军战略后,海军学院对此进行了广泛的研讨,不仅对海军建设提供了指导和依据,而且充实了教学内容。

在战术研究中,运用军事运筹学系统工程理论研究作战问题,取得了多项成果。

在科学技术方面,研究改进武器装备性能取得许多突出成果,有的获国家发明三等奖;有的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有的获全军科技进步一等奖。

海军院校科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全军院校和全海军获得国家奖的总数中,海军院校占有相当大比重。海军院

校通过科学研究,推动了新学科建设,更新了教学内容,提高了教材质量,培养和锻炼了一批教学、科研的学科带头人,形成了高素质的一支科研队伍。

海军的科研建设,除上面讲的两方面重点外,还有一个试验基地需要说一下。海军研制出的各种武器都要在这个基地进行试验。可以说这是海军科研基地的一块“试验田”。这个基地是50年代建立的。1987年2月,我到试验基地调研。在党委常委会上,我肯定了基地建设成绩,肯定了他们为海军装备建设做出的贡献。当时他们根据海军要求,搞了一个《关于海军试验基地试验体制改革的决定》。我告诉他们,一定要从实际出发,走自己发展的道路,按科学规律办事,更好地发挥试验的效益,发挥人与设备的综合试验能力,提高试验水平和试验质量。我说,试验是基地的主要任务,试验不仅检验武器的性能,还要考虑武器的作战效果。研究部门设计,工厂制造,基地进行试验,通过试验来改进,达到作战要求。

我到试验基地调研时,他们已做了多项试验,打了几百发导弹和上千条鱼雷。搞了大型的、中型的、小型的试验。所试验的武器质量大多数是好的,军队和地方各方面反映也很好。

军港驻泊

舰艇驻泊体系建设,实际上是战场建设问题,关系作战全局,是构成海军作战和生存能力的重要因素。海军在这方面存在不少问题。

当时,海军的舰艇基地、包括军港及舰艇停泊点、补给点,大都是六七十年代建设起来的。那时强调“山、散、洞”,布局分散,且大都是只能驻泊小型舰艇的港口。这种布局,大家称

之为“羊拉屎”。在上任一年多时间的部队调研中,我对这种“羊拉屎”现状已充分了解。在这些港点中,大部分都存在港池航道淤积、供水供电困难等问题,而且,一些地方还在挖洞子,朝无底洞里扔钱。一些大的军港也由于多年没搞建设,加之管理不善,港内拥挤混乱,各种保障条件没有得到改善。

我强烈意识到,海军要搞现代化,特别是海军作战方针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军港设施建设方针也必须改变;再不能到处布点,要收缩摊子,把经费集中在一些大的、关键性项目和补缺配套上来。

可是,部队的思路当时还没跟上来。1982年10月,海军后勤部汇报工程建设规划时,仍打算在旅顺基地再建一个地下指挥所,还安排了一些洞库工程。我当即否决了这个意见,对他们讲:工程建设要根据海军特点来安排,海军打仗是在海上,作战指挥主要也在海上,岸上搞个把指挥所就行了,没必要搞那么多坑道指挥所。洞库也是这样,要搞一点,但不能都进洞,要重新规划。尤其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应该把钱用在作战、训练和生活急需的配套项目和见效快的项目上来,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当时,海军的一些工程几乎每个都留着尾巴,码头、停泊点、机场的设施,油、水、电、气等好多问题没有解决。我主张大的新建工程往后推,集中资金,先搞舰艇基地的配套。根据实地调查的情况,要求后勤部先解决几处的淡水问题,以保障部队进驻,否则,不光部队吃水得不到保证,舰艇也会因为没有淡水冲洗而加速腐蚀,影响作战。

这期间,我开始考虑海军舰艇驻泊的配系问题。以前到处开花的搞法肯定不行,但已经建好的东西又不能全部丢掉,考虑的结果只能在一些大的军港基础上,连同附近某些小港

和停泊点、补给点,搞几个大的停泊体系。年底,我同后勤部长谈了上述意见,要求今后的工程建设,主要围绕几个大的停泊体系搞配套,解决缺水、缺油、缺电和舰艇停泊拥挤的问题,其他工程停下来,有些洞子该封的封,把现在必需的训练、生活保障设施配套搞好。

1984年4月,我提出了舰艇驻泊体系建设总体思路:贯彻“保障战备、兼顾生活、注重质量、厉行节约”的方针,按照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突出重点、量力而行、保证战备急需、兼顾部队发展的原则,使驻泊体系建设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我提出,根据海军担负的作战任务和我国海区的自然地理特点,抓好有关工程建设。争取在本世纪末,建立起完善的适应现代战争要求的海军作战指挥、兵力驻屯和后勤保障三大体系。

这一时期,张连忠副司令员分管海军后勤工作。按照我的想法,他多次研究舰艇驻泊体系的调整,确定重点建设几个大的军港体系。一些小的港口,有的维持现状,有的逐步放弃。舰艇驻泊基地过于分散的问题开始扭转。

与舰艇驻泊保障相关的,还有军港的管理问题。以往,军港实行由所驻部队分别自行管理的办法,一个港驻几个部队,就划成几片,编制几套管理机构。这种作法,各自为政,弊端太大:组织机构重叠,各搞一套,港区无法统一规划建设,港内设施不便调剂使用,港口秩序和港容港貌不好维护,军港的整体功能和综合保障能力大打折扣,很不科学。

我到过一些国家访问,没有哪个国家的海军像我们这样管理军港,就是我国的地方港口也不是这样管法。

1985年6月底,海军后勤部召开后勤和装备修理体制改革座谈会。会议结束前,后勤部李春明部长征求我的意见。我要求他再强调两个问题:一是部队生活供应问题;二是加强

军港管理工作。我说,军港建设我们有一定成绩,但问题不少,许多地方不配套,今后工程建设要注意把这些配套搞起来。再就是现有军港设施的管理,如码头维护、供水站、发电站、软水站、锅炉房、活动场所、环境保护以及港内生活秩序维护等,都是为舰艇部队服务的保障设施,分成几家管不行,今后要实行统管。舰船修理由一家管,供应由一家管,军港管理由一家管,各家共同把舰艇部队的事情办好,保证海上战斗力的建设。

1986年初,旅顺基地对旅顺港进行了统管的试点。

这个港是个老港,分为东、西两个港。当时,所驻部队的行政和保障,分别由各部队自行管理。由于管理分散,不仅造成人力物力资源浪费,港容港貌、港口秩序也很差。这次试点,基地领导下决心治理,实行联合统一管理,进行港容整顿,治理脏、乱、差。

半年过后,统管试点取得了明显成效:各项管理显著加强,港容和港口秩序大为改观,水电超支大幅度下降。这年9月,海后军港管理部将旅顺港统管情况写了调查报告,我看后比较满意,批示将这个材料转发到各舰队、基地,要求各单位根据旅顺基地的经验,结合本单位情况认真进行整顿,同时要求旅顺基地进一步抓好港口统管工作,使其完善。此后,海后组织工程、军港管理部门,对军港统管的问题进一步做了调查研究。

1987年上半年,海军党委常委三次开会研究军港问题。同年9月,又召开了军港统管会议,统一思想,明确统管的目的、内容和方法。会前,主持会议的张连忠副司令员征求我意见,我请他强调:军港集中统管问题,一要有坚定不移的决心;二要加快速度,要一个港口一个港口地研究落实,不能犹豫不

决。

这次会后,军港统管工作陆续全面展开。经总参批准,海军调整了军港管理体制编制,制定下发了《海军军港管理条例》,增加了对大、中型军港的专项维修经费。经过几年各级共同努力,海军军港建设呈现出新的面貌。

海军后勤保障体制,也是需要认真改革的问题。

刚任海军司令员时,根据中央军委部署,海军进行过一次精简整编,但对后勤保障体制变动不大。海军后勤保障,长期实行“四级”体制,即海军一级,舰队一级,基地和舰航一级,部队一级。各级都设有后勤机构,都是一级保障实体,后勤供应保障,按级组织实施。随着海军建设的发展,未来海上作战对后勤机动、快速和综合保障能力要求越来越高,现行的后勤体制层次太多,手续复杂,反应迟缓,难以适应现代作战要求,也容易分散人财资源,不利于海军建设。

海军后勤供应到底应采用什么样的体制?怎样改革才能适应今后作战需要?上任后,我经常思考这个问题。1983年1月,在海军后勤工作会议上,我讲了一些初步想法。

1984年7月,海军后勤部长座谈会上,我提出了简化海军和舰队两级的后勤职能,加强基地后勤;海军和舰队只负责组织计划,供应由基地管。这样一来,海军和舰队尤其是舰队后勤,可以搞得很精干。我要求集思广益,充分讨论,先搞个方案。

下半年,经过反复论证,形成一个初步方案。

按照这个方案,舰队将改为以训练和作战为主,后勤保障则放到基地。这么一来,舰队机关可以精干机构,成为平时抓训练、战时能指挥打仗的实体。

在有舰队领导参加的海军党委全会上,对这个设想进行

了讨论研究。认为这样改革比较彻底,有利于海军和基地两级的后勤工作,基本能达到作战指挥与后勤保障相一致的目的。

1985年8月,军委批准了海军体制改革精简整编实施方案。8月28日,我和政委李耀文签署命令,颁发了《海军后勤保障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海军后勤体制改革正式实施。

在这次全军体制改革和精简整编中,海军后勤变化很大,办成了多少年来想办而没办到的事。特别是舰队后勤部撤销,大量的工作要基地去做,基地的同志是欢迎的。当然,舰队可能不赞成。这可以理解,他们不赞成,不光有个传统习惯问题,也有工作上的实际困难。但必须从长远考虑,体制上不合理,造成过多层次,既浪费,也影响效率,这无论是平时还是战时都是不合适的,必须改变。我多次强调,要有个新的概念:基地主要是为舰艇海上活动做人力、财力、物力准备,基地就是舰艇部队的根据地,是“舰艇之家”,今后基地司令、政委要把重点放到后勤保障上来。

这次体制改革之后,海军后勤的保障体制,由原来的四级改为三级,效率高了,关系顺了。

当然,这个体制不能说绝对就好,没有一点问题。我到过美国、英国、法国访问,各国虽然情况不同,但他们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就是机构精干。减少层次,是体制上的一个发展趋势。我们结合过去的经验教训,吸收了国外好的经验做法,确定了这项改革。实施后没有发现大的问题。

当时,海军体制改革能不能顺利实施,关键的问题,在于基地的工作能不能做好。1985年12月,在海后召开的后勤工作会议上,我要求基地党委和基地司令员、政委、后勤部长,要集中力量完善改革,具体研究和解决存在的问题。基地的

工作做好了,就维护了海军的体制改革。假如不认真抓,领导不把工作做在前面,碰到问题部队就会叫喊,就容易葬送改革。开始肯定会碰到各种困难和问题,但有困难就要想办法克服,不能动摇决心,不能定回头路。

海军后勤在新的体制下,几年来较好地完成了部队供应保障任务,特别是在部队战备、训练、演习、出访等重大任务保障中,没有发现大的问题。平时部队的供应保障、后勤各项工作,也进行得比较正常。海军新的后勤体制就这样坚持下来了。

不能当“光杆司令”

海军的舰船以大海为活动舞台。每艘舰船都是多种装备、设备和武器的组合,技术性强,使用完好率要求高,发展建设不容易,维修难度也很大。这项工作做不好,舰船就是摆设,海上战斗力就是空话,海军司令员也会成为“光杆司令”。因此,当今一些发达国家的海军领导人眼里,军事装备建设中的维修工作被视为日常军事工作的重要一环,给予高度重视。

担任海军司令员不久,有件事给我极大震动。

当时,海军装备技术部汇报工作,谈到了南海舰队一艘猎潜艇的维修。1980年,这艘猎潜艇进工厂中修。按规定,周期应该是一年,这艘艇却修了三年多,先后三次进厂出厂,其战术技术性能不仅没有恢复,甚至连勉强航行巡逻都成问题。事情发生后,海军有关部门抽调人员,与南海舰队一起组成工作组,前后三个多月,写出3万多字的调查材料,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到最后,南海舰队一位副司令员出来说话,要给有关部门、人员纪律处分,事情才草草收场。

这件事让人心里发沉。和平时期还可以有点时间扯皮，一旦遇上战争，怎么得了！我决心认真解决这个长期困扰海军的问题。

实际上，早在基地和舰队任职时，对舰船的维修困难，我就有过深刻体验。当时，许多旧杂舰船，来源不一：有的从敌人那里缴获；有的从国外购买。这些舰船机械陈旧，零配件缺乏，技术状况很差。建国初期，我国自己也制造了一些舰船，但工艺粗糙，机械容易损坏，使用率很低，加上维修管理跟不上，难以保证训练、执勤和战斗任务，舰船指挥员、基地和舰队领导经常为此头痛，苦于手中没有过硬装备。

可以说，海军舰艇部队的装备维修，一直存在“安排难、修理难、扯皮多、失修多”的老大难问题。造成这种局面有多种原因，如维修经费短缺，修理能力不足，修理设备不配套，管理体制不合理等等，而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管理体制的问题。

当时的状况，修理一艘普通舰船，需要求拜的“庙门”，少则三四家，多则七八家。船体和电机设备由一家管，枪炮、鱼雷及其军械设备由另一家管，航保、通信、雷达、声呐、导弹及其发射系统，也都是如此；各有各的上级主管，各有各的修理计划，各有各的修理进度，各有各的修理要求，各有各的修理原则，免不了互相扯皮。船体和机电修好了，枪炮没修好，船体、枪炮修好了，航保、通信设备没有修好，等等。本来3个月可以修好的舰船，可能拖上一年；一年可以修好的，要扯皮两三年才行。

这种修理体制，修理力量难以合理发挥效能，修理经费也不能集中调剂使用。修理过程中，人为的扯皮和推诿事件层出不穷，修理一艘舰船，协调会“常开不断”，舰队和基地领导成了“协调司令”，往往还解决不了问题，许多事情一直要捅到

海军各大部的业务部门才能解决。甚至到了海军,还会出现海军各业务部门的互相推诿扯皮,意见难以统一,尤其在一些涉及各部门利益的具体问题上,协调更难,舰船修理质量难以保证。

这着实苦了部队。舰艇部队指战员气愤地说:问题的根子,就在“分散管理这个不合理的体制上”,不彻底解决,海军没出路。当时,全国改革浪潮汹涌,海军各部队和修理部门要求改革的呼声甚高。海军舰艇维修的实际状况和部队的呼声,让我痛下决心,坚决改革海军装备修理体制。

1982年,有过一次调整,装备维修工作划归海军后勤部领导和管理。这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采取的暂时措施,我当时也并不认为这是好办法。1983年海军后勤工作会议上,我重点讲了舰船装备维修工作。我说:“过去舰船装备维修分散管理,分散领导,存在很多问题,修理周期长,质量也保证不了”;“一艘潜艇过去用三个月、半年就修理好了,现在却需要一年半、两年。驱逐舰也是修两年、三年,这是不行的!”现在军委批了,舰船和武器维修“归到后勤系统,隶属关系、领导关系改变一下,便于集中统一领导”,但这只是暂时办法,“装备修理的独立性比较大,集中在一家管,势在必行”。我强调:现在的变化,只是将舰船的船体、机电设备和武器装备的修理,集中到后勤部门一家管。通讯、电子及航海保证、防险救生装备修理,仍留在原来的部门,没有实施统一集中管理。

1983年初,为统一机关各部门思想,搞好改革前的准备,海军党委委托海军一位副参谋长,组织司令部、后勤部和装备技术部有关业务部门座谈,研究解决海军舰船装备修理的集中统一管理和领导问题。这位副参谋长请了海司、海后、海装等几个业务部门的同志,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本来是想研

究贯彻海军党委决定,提出装备修理体制改革的具体方案,可却产生很大争论。通讯、军械和航保部门的代表,对改变装备修理体制很有异议。有的说:“海军建设几十年了,各种装备管理和修理,从总部到海军到舰艇部队,已有了固定的渠道,海军一家改了,也就断掉了经费、物资供应。”有的认为:“科学技术发展到了今天,装备的管理和维修应过细分工,不可能也不应该集中管理,否则就是不尊重科学”,“把海军舰船装备的修理集中一家管,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是“笑话”,是“天方夜谭”。更有甚者,说改革装备修理体制“是海军装备管理的历史大倒退”,抵触情绪很大。结果,研究贯彻方案的会议变成了“吵架会”,没有得出结论。海军领导层对此也意见不一,延缓了装备修理体制改革的进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海军装备维修体制经历过六七次变化,修理工作也有进步,但“领导多头,管理分散,效能不高”的弊病并没有彻底改变。维修一艘舰船,人为地分到六七十个部门负责,出了问题,部队要分别找几家求神拜佛,效率极低。现代科技已经迅猛发展,新的科研成果和高科技不断应用,舰船的武器装备现代化程度也逐步提高,自然就把舰载各种设备和武器装备融为了一个“有机整体”。这一现实,对海军以往的装备维修观念和管理模式提出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只有尽快改革,实施“整体修船”,才能够使装备始终处于良好的技术战术状态,才能够保持战斗力。海军上下尤其是舰艇部队广大官兵,更是强烈要求实现改革。1984年,海军装备维修体制还要不要改革?怎么改革?到了关键时刻。这时改革海军装备维修管理体制的时机已经比较成熟。我暗下决心,要在海军司令员任职期内把这件事办成。

当然,办成这件事情也有实际困难。

首先,全军还没有主管装备发展、管理和维修的总装备部门,而是分别由总参、总后和国防科工委负责,再到各军区、军兵种与之相对应的部门管理。现在,海军独树一帜,把装备维修集中到一个部门管理,必须要向总部说清楚,得到理解和支持。

其二,时逢大裁军,全军要减 100 万,机关也要精简缩编。这种情况下,作为精简重点的海军领导机关,要反其道而行之,在司、政、后、装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个修理部门,至少时机不对。

其三,海军各业务部门,包括海军党委内部,思想并不统一,不赞成的大有人在。

但我相信事在人为。当时我已下决心,即使军委不同意在海军成立一个专门负责装备修理的大部,但只要同意成立一个专职部门,哪怕是一个二级部,我也要将其纳入海军党委直接领导下,统管装备修理工作。

为稳妥起见,实施前,我先要求海军司令部、后勤部和装备技术部,分别组织力量调研,拿出方案,海军党委也多次听取各部门汇报,进行研究比较。一段时间后,改革方案算是有了一个眉目。随后,责成海司军务部牵头,以海军后勤部舰船修理工厂管理部为主,海司通信部、航保部派人参加,组成海军装备体制改革小组,专门进行改革方案的制定,提交海军党委和常委会议研究,取得共识。

与此同时,我要求海军有关业务部门,及时向总参谋部和总后勤部相关业务部门汇报,取得支持。1984 年底至 1985 年初,先向总参军务部汇报海军装备修理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坦陈改革装备修理体制的利弊,得到了他们的理解支持。制定方案过程中,有的业务部门提出:通讯装备经费和物资由

总参通信部统控,直接调拨,如果只有海军把通讯装备维修划归到维修部门一家负责,上下不对口不好办。为此,我带着海司军务部和通信部的同志,直接找总参通信部的领导说明情况,取得了支持。

通过一系列工作,基本做好了海军上下内外的的工作,为改革铺平了道路。从1984年5月到1985年6月,一年多时间内,开了十几次党委常委会议和首长办公会,制定了大小方案十来个,在广泛征求舰队、基地和有关部门意见后,确定了两个方案:一、“陆上、海上装备和武器修理全部统管”;二、“以海划线,海上装备维修一家管,陆上装备维修管理维持现状不变”。两个方案都上报了总参谋部和中央军委。

1985年7月9日,中央军委下达通知,同意海军组建海军装备修理部,统一管理海军的装备修理部门,实施综合修理。遵循划区、就近、综合和适当跨区修理原则,依据现有修理力量和修理设施,组建装备修理区,每个区内按“厂厂、厂所”配套,将有关装备修理厂、修理所与修船厂相配套。

这一设想的基本思路,好比是设在修理区内的修理工厂,相当于装备修理的“后方医院”;修理所相当于装备修理的“门诊部”;同时在配套区内,再增设一个相当于装备修理“巡回医疗队”的机动修理队。按照这一设想,构成了一个比较严密的修理网,可以保证各类型舰船装备修理的需要;而且,装备一旦有了问题,只要找装备修理部一家即可,这样既有利于指挥调度,也方便了部队。

为保证装备修理质量,在修理工厂比较集中的旅顺、青岛、上海、广州、湛江等地区,成立了装备修理监修室,在每个修理区内,组建了修理质量控制室(因受当时体制编制上的一些限制,暂编在机动修理队内),特种装备(按海军的习惯,系

指通信、航保、防救、抗干扰装备等)修理比较集中地区,如上海地区,组建不在编的联调和修理中心。

中央军委下达的海军各级机构设置编制表,除联调和修理中心外,基本按“以海划线,海上装备集中统一管理,进行综合修理”的方案,下达了组建装备修理部门的命令。根据中央军委的整编命令,海军、基地两级的装备修理部和编队、水警区、独立驻防大队的装备修理科、股,从1985年9月至1986年相继组建。至此,海军装备维修体制第一阶段改革基本完成。尔后,又开始了装备维修方法、制度等方面的改革。

这次体制改革,方向对头,内容和范围也基本符合海军实际,上上下下反映比较好,说明改革是成功的,有比较强的生命力。当然,这次改革也有不完善的地方,实行一段时间后,还需要视情作进一步调整。

海军现代装备体系

是不是一支现代化海军,有一个非常简明的物质标准,就是看你是否具有现代化武器装备。

我在下部队调研中看到,我们的舰艇、潜艇和航空兵等部队的武器装备,有新的发展,但坦率讲,和现代战争的需要相比,仍然差距很大。作为海军司令员,我责无旁贷,必须花大力气,尽快提高海军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让我欣慰的是,在海军装备技术和国防工业科研有关的部门和单位,包括研究所、试验基地、工厂和军事代表室有不少人才,他们有巨大潜力,只要指导思想明确,组织领导得力,就能发挥极大作用。

数十年来,海军的武器装备经历了转让制造、仿制改进和自行研制等几个阶段。海军装备从无到有,从单一品种到多

品种,从简单技术到比较复杂的技术,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和水平。海军的装备建设,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值得记取的教训。如装备的技术水平不高,平台和武器、设备系统发展不平衡,追求吨位,搞大计划,只注重武器装备的订购、储备,对发展新装备论证不够等等。这些问题,1975年我在海司工作期间曾上呈过详细“汇报”,得到过小平同志的赞同,但当时的海军主要领导没有采纳,我也调出了海军。

现在,我有责任也有一定条件来改变这一局面了。

1982至1983年间,利用各种机会,我反复提醒大家,海军是个装备技术复杂的军种,全面实现海军装备现代化有一个过程,首先必须在正确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制定一个统筹全局的规划。

在装备发展方面,根据中央军委提出的“缩短战线、突出重点、狠抓科研、加速更新”的方针,和海军提出的“积极防御、近海作战”的海军作战方针,我在1975年“汇报”中的建议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装备建设的指导思想,要变“数量建军”为“质量建军”,实现由“近岸防御”到“近海防御”的转变,发展与近海作战相适应的中、大型舰艇,不再大量建造小型舰艇,从而确定了海军建设奋斗目标和装备发展的方针和步骤。

1984年1月11日,在海军装备技术工作会议上,我再次强调,海军装备现代化建设,要从第一代向第二代过渡,这个过渡要充分考虑近海作战。以潜艇和飞机为主力,战斗舰艇作战半径要加大,主战装备在战役战术上要形成体系。导弹、鱼雷等武器系统要一弹(雷)多用、通用,形成系列,与电子系统配套。我强调,要始终把潜艇放在重要位置,常规潜艇要改进,要发展;核潜艇要加以完善,作为执行战略任务的力量。要发展海军特种飞机,包括岸基歼击轰炸机、巡逻预警机和舰

载直升机。先解决空中加油技术,以加大海军航空兵作战半径,配合海上轻型兵力作战。对水面舰艇,要求护卫舰和驱逐舰在齐装配套的基础上改进武器,提高技术水平。同时,不能忽视扫猎雷、布雷、登陆舰艇及辅助船舶的相应配套发展。

为贯彻海军装备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1984年5月海军党委整党中,我和李耀文同志明确提出,要根据国内已有的先进技术和储备,两三年内,对海军现有舰艇装备进行加装,以适应当前战备急需。我们把它作为海军党委整党措施要求的一部分。这些要求,先后都在现役舰艇改装或新造舰艇上实现了,海军装备现代化也由此前进了一步。

1985年,中央军委提出,军队建设指导思想要实行战略性转变,要进一步改革军队的体制编制。为贯彻这一精神,海军在5月中旬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我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把贯彻上级战略决策与海军建设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通过体制改革和精简整编,逐步把海军建设成为一支现代化的人民海军。针对海军装备质量差,老、旧、杂,辅助舰和一般飞机占的比例高等问题,我提出海军装备调整整顿原则:清理和淘汰性能质量较差的舰艇、飞机及其他装备,减少数量,提高质量,调整比例,均衡发展。

为适应全军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要求,海军党委通盘考虑了“七五”、“八五”、“九五”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和经费,实行“15年向前跨一大步”的发展战略,采取有重点按比例均衡发展的方针。从1985年开始,组织编拟了《海军2000年前发展设想和“七五”建设规划》、《2000年的海军》和《海军2000年前装备发展规划》。《装备发展规划》是个比较实际的东西,是具体贯彻落实海军2000年前发展设想的。这几个文件的制定过程中,我不断和大家研究,大体形成了较系

统的海军装备建设的几条指导原则。要考虑现代作战能力和精干、顶用的要求,直接发展 90 年代中后期和下世纪作战使用的新一代武器装备,不搞或少搞过渡装备;要有重点按比例地均衡发展;要逐步形成我们自己的武器装备体系和系列;要以自力更生为主,引进为辅,着眼提高自己的开发能力和水平;要拉开装备层次,新旧并存,梯次更新;要争取军民结合,平战结合。

我还提出,在和平时期,对装备建设要从长远考虑,抓一些带根本性的主要装备研制;设想用 15 至 20 年左右的时间,搞航空母舰和战略导弹核潜艇的预研,为 21 世纪海军装备发展预作准备。

1986 年 12 月,海军召开了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主题就是“适应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为提高海军现代战斗能力而奋斗”。这次海军党代会上,研究了海军 2000 年前建设规划。1987 年 1 月,第四届海军装备技术工作会议上,我提出要加强装备发展战略研究,也就是把装备技术的发展战略,与海军战略研究结合起来;服从海军战略的要求,充分考虑作战海域和环境条件,以适应未来战争需要。

我认为,从形势看,将来常规武器肯定会进一步现代化。今后的常规战争,不会是过去的概念,也不是现在的概念,而是更新更高技术的概念。所以,我们在加强战略研究和作战方针研究的同时,也要加强装备技术的研究,使两者紧密结合,更好地服务于战争目的。要抓好高层次、大综合、全系统的研究工作,向更高阶段发展,使装备建设更主动,少走弯路。

1987 年 2 月 2 日,海军党委审定了已反复研究两年多的《海军 2000 年前发展设想和“七五”建设规划》和《海军 2000

年前装备发展规划》。这是我在海军领导岗位上抓的一件大事,也是海军联系实际,立足当前,面向未来的关于海军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和理论相结合的产物,更是海军党委集体领导、集体决策的结晶。我对这个《规划》下了很大功夫,不仅从指导思想原则和方针上定下框架,而且逐段逐句的文字都做过研究。直到目前,这个《规划》对海军现代化建设仍然起着指导作用。

海军《规划》中的新型舰艇、飞机、武器系统等,大都获得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支持批准,纳入了国家和全军的建设规划,在80年代先后启动。

对于水面舰艇的发展,我的思路是一贯的,就是以驱逐舰、护卫舰为骨干基础,形成三大系列。第一类是驱逐舰,排水量从3000吨发展到五六千吨以上;第二类是护卫舰,排水量二三千吨;第三类是兼顾近海巡逻、导弹攻击或反潜的约500吨至千吨左右的导弹护卫舰。过去,造了较多的导弹艇、鱼雷艇、巡逻艇、炮艇,吨位小、火力差,只能近岸作战,不适应未来作战和平时执行警戒任务,不能多造。

对新型驱逐舰,1983年定为第二代导弹驱逐舰,1984年中央军委批准立项研究。经过充分设计论证后,从开工制造,到下水试航,用了近十年时间,首舰“哈尔滨号”和2号舰“青岛号”先后造成,并交付部队使用。这两艘驱逐舰先后于1996年出访朝鲜和俄罗斯,1997年出访美洲四国和东南亚三国,1998年又出访了大洋洲的澳、新两国和菲律宾。几次出访都取得了圆满成功,在世界面前展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实力。

1983年,上报第二代导弹驱逐舰研制要求时,我预见其可能需要相当长周期,因此要求海军保持对第一代驱逐舰的

改进,同时充分利用第二代舰研制的各种阶段性技术成果。这一改进和改装,使第一代驱逐舰技术水平和作战能力有较大提高,达到了齐装配套,保证了部队战备执勤和训练演习。

在第二代导弹驱逐舰研制建设的重大决策中,我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1984年10月,国防科工委主持召开该舰方案论证审查汇报会。会前有人不赞成这个项目的战术技术要求。我的态度很明确,这个方案中定的范围和项目,对我国海军武器装备是一个大的发展。目前能认识到的、可能做到的和可以实现的,全都有了;不论是总体、动力,还是武器系统所定的项目,都没有明显问题,基本可行,不应该再变。当然,这个方案不能说已经很完善,但如果要变,应该经过建造和试验后再变,那将是第三代的问题。

会上,还有两个问题争论较大。

一个是携带什么型号的舰载直升机问题,一个是舰载防空导弹系统问题。经过争论,最后我支持选用仿制的“直9”为舰载反潜型直升机的意见,建议用“海响尾蛇”近程舰空导弹系统,先填补舰空导弹系统的空白,有条件再发展中高空舰空导弹系统。

我的意见和建议,得到多数人的赞同及航空、航天工业部的支持,国防科工委和总参谋部也表示同意。

第二代导弹驱逐舰的动力系统,确认从国外引进柴油机和燃气轮机联合动力装置,使我国舰艇动力系统技术跨进一大步。当时有人建议,不要再造蒸汽动力的驱逐舰了,应该全部燃气轮机化。我不同意这种意见。为此,专门到大连造船厂研讨了这个问题。最后,还是决定应该保持大功率蒸汽动力生产线。这样,驱逐舰的建造,由于有了两条腿的动力安排,没有受到影响。

驱逐舰研制过程中,我一直坚持在自力更生基础上,积极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促进我国科研工作和自主开发能力的提高。

审查第二代导弹驱逐舰方案时,我赞同动力系统和个别武器、电子系统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这不仅仅是为造一条导弹驱逐舰,而是为我国海军武器装备开辟新的路子。买些装备装上去,是样机,用来发展我们的科学技术;大批量装备部队,生产要自己搞,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发展提高。我说,不要一看花这么多钱,就影响我们的决心。我们总体设计水平还很低,要花点学费,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把它与自己研究的基础技术结合起来,比我们一步一步摸索快得多。

我在海军工作期间,海军装备技术部先后从国外引进了几项关键的武器、电子及特种动力系统,使海军潜艇及特种飞机的战术技术水平有较大提高。国内有关海军装备科研部门的科技人员,也通过和海军一起出国监造验收,开阔了眼界,更新了观念,并且通过学习消化实物及产品资料,在我国军舰上安装调试、试验、使用,明显提高了自行研究设计水平,为自行开发研制新装备增添了后劲。

在积极推进引进技术的同时,我们也保持了应有的警惕,不完全依赖外国,更不能依赖一个国家。

按照同样的思路,我们还抓了护卫舰“小步快跑”式的改进提高、新一代导弹护卫艇的研制和常规潜艇“两条腿前进”式的改进和新研核潜艇的发展以及海军特种飞机的研制等。到了90年代,新一代海军现代装备体系初步形成。

核潜艇出航

在海军装备体系中,核潜艇是重中之重。

毛泽东主席说过:“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这话是50年代说的。当时,苏联突然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毛泽东主席的这句话,表达了中国人的豪迈气概和决心。

我国研制核潜艇,最早是聂帅创议,并在1958年获中央批准。1961年开始,我就参加和领导了核潜艇工程的研究发展工作。此后30多年,不论调到哪里,不论担任什么职务,我始终都参与了核潜艇工程;它的每一次成功和挫折,我都亲历其间。

刚介入核潜艇工程,我就清楚地认识到,这是一项国家战略性工程,它不仅仅是海军的战略武器,更是国家的威慑力量,是我国综合国力的体现。毛泽东、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更是非常关注。

就任海军司令员后,我自然格外注重核潜艇发展的实际工作。1982至1988年间,我组织了核潜艇的各项试验和训练,并且考虑了第二代核潜艇的研制问题。

1982年进行的常规动力潜艇水下发射潜地导弹试验,是我就任海军司令员不久进行的。试验由海军和国防科委共同组织。试验前,新华社代表我国政府,于10月1日提前向全世界发出公告。为了确保这次试验顺利进行,我和李耀文政委到基地、潜艇部队和有关保障、操作、测试岗位认真检查,要求部队做到万无一失。1982年10月12日,是正式发射的日子。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总参谋长杨得志和张爱萍、钱学森等人来到发射指挥中心,我参加了从出航准备到发射成功

的全过程。当发射成功的消息传来时,我非常激动。这是中国海军首次从水下发射潜地导弹,试验非常圆满。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向参加研制和发射试验的有关人员发出公开贺电,引起了全国和全世界震动。

核潜艇长航训练是我比较关注的问题。早在1974年第一艘鱼雷核潜艇就交付海军了,但由于多种原因,一直泊靠在船厂或港口里。1981年,我以副总长的身份去检查,感到这样不行。虽然还有些遗留问题,但艇已经交付了,就要让部队自己管理,自己训练,组织航行。在我的要求下,北海舰队和核潜艇基地加强了这方面的训练。经过认真准备,1981年11月至12月,北海舰队曲振牟副司令员指挥核潜艇进行了首次超过一个月的长航训练。我就任海军司令员后,继续关注这个问题。1983年10月至11月,又进行了第二次更长时间的长航。1984年第二艘鱼雷核潜艇交付。1985年11月至1986年2月,该艇在潜艇基地副司令员杨玺指挥下,完成了数十昼夜的最大自持力试验。远航试验证明,中国自行研究设计制造的核潜艇和我们培养的第一代核潜艇指战员,是顶用的,是真正的水下蛟龙。

1984年起,海军又相继进行了导弹核潜艇水下发射模型弹试验;深潜、全速和大深度发射鱼雷试验;水下发射潜地导弹遥测弹试验等,都取得了圆满成功。这一系列试验,标志着中国完全掌握了导弹核潜艇水下发射技术,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导弹核潜艇的国家。

1989年12月14日,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我参加了海军和国防工业科研部门召开的潜地导弹武器系统定型会议。我本来没打算讲话,当见到许多为导弹核潜艇努力奋斗一辈子的老同志,却情不自禁讲了起来。

我说：“毛主席说过，‘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下的决心，现在终于实现了！潜地导弹系统的研制是一个巨大的复杂工程，回想当初，条件很差，完全是白手起家，靠的是党的领导，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大力协同。去年海上试验成功，现在要定型了，确实为祖国、为中国共产党争了一口气！我们的核潜艇、潜地核导弹都是成功的，在国际上产生了强烈反响。邓小平同志讲过，如果我们没有原子弹、导弹、卫星，就没有今天的国际地位，也不可能形成国际大三角关系。所以发展战略核武器，对国家战略意义是很大的。大家是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应当向所有参加研制工作的专家、广大科技人员、工人、解放军指战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讲话中，我还回顾了核潜艇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希望有关人员不负重望，再接再厉，取得更大成绩。我的一番由衷之言，引起了强烈共鸣，会场掌声不断，十分活跃。

我考虑，核潜艇、核武器、核动力堆的发展，既要有近期目标，又要有长远发展计划。1987至1988年间，几艘核潜艇试验训练取得不少经验后，我就强调，一方面要下功夫抓核安全，抓现役艇形成战斗力；另一方面，要考虑核潜艇发展研制和生产不断线。我认为，发展核潜艇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研制战略导弹核潜艇，一个是研制攻击型核潜艇。这两种型号核潜艇都要研制，特别是攻击型核潜艇。随着科技的发展，敌人反潜力量增强，原来用常规潜艇就可以完成的任务，现在困难了，必须研制攻击型核潜艇。

1990年，最后一艘鱼雷核潜艇下水。我向江泽民主席报告后，他决定亲自去视察。视察时，江主席果断表示：“核潜艇不能断线。”

1992年5月29日，我把海军核潜艇部队建设情况报告

转呈江主席,特别强调要持续保持科研发展和认真做好安全工作。江主席作了重要批示。据此,我们在发展核潜艇同时,借鉴国外经验,结合实际,从规章制度、技术管理到督促检查等方面,建立了一套严密的行之有效的核安全机制。

1994年,根据江主席指示,中央军委、中央专委决定开始新一代核潜艇的研制工作。看到核潜艇事业后继有人,后继有艇,我也就放心了。

中国“航母”

航空母舰的应用,是20世纪舰艇发展的伟大成就。我国对航母作过可行性研究,我也为此做了一些工作。

早在1970年,我还在造船工业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时,就根据上级指示,组织过航空母舰的专题论证,并上报过工程的方案。后来到总参谋部工作,在1980年5月访问美国时,主人安排我们一行参观了“小鹰”号航空母舰。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和科技人员首次踏上航空母舰。上舰后,其规模气势和现代作战能力,给我留下了极深印象。

可以说,正是航空母舰的出现,把海战的模式从平面推向了立体,实现了真正的超视距战斗。自它问世以来的80多年间,几经波折,最终发展成为今天这种舰机结合、攻守兼备、机动灵活、坚固难损和高技术密集的多球形攻防体系。今天,它不仅是一个强有力的战术武器单元,是海上作战体系的核心,也是一个能抛核弹的战略威慑力量。在世人眼里,它被视为综合国力的象征。它的存在与发展,也是各国军事战略家关注的焦点之一。

以往,我只是从“外围”观察和思考航母问题。1982年,

我当了海军司令员,航空母舰在我心头的份量,自然大不相同了。我国是一个濒海大国,有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随着海洋开发事业和海上斗争形势发展,我们面临的海上威胁和过去大不相同,要对付具有远战能力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和舰载航空兵。面对这种情况,中国海军的实力显得有些捉襟见肘。我们的海防边疆辽阔,却只有中小型舰艇和短程岸基航空兵,一旦海上发生战事,有时只能望洋兴叹。发展航空母舰,则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

可是很遗憾,当时国家经济力量不行。1984年初,在第一届海军装备技术工作会议上我讲过:海军想造航母也有不短时间的了,现在国力不行,看来要等一段时间。

两年后,听海装领导汇报工作时,我又一次提到:航母总是要造的,到2000年航母总要考虑;发展航母,可以先不提上型号,而先搞预研。我说,苏联搞了30年。开始,在造航母上也有不同意见,苏共中央不下决心干,但是苏联人民要航母,不久他们还是干起来了。现在看来,防御也需要航母。我的这些想法,海装领导很快向海军装备论证研究中心做了传达,并一同开始了组织论证工作。

1986年8月,听海装和论证研究中心领导汇报工作,我向他们交代了开展航母论证的任务。我说:“航母怎样造法,是海军全面建设的事;是直升机航母、护航航母分步造,还是直接造护航航母,要好好论证一下。”

11月,我主持召开海军发展战略研讨会,邀请了军内外领导和著名专家。不少同志从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及收复南沙、台湾回归等战略任务的需求出发,建议海军发展航母。这和我想法不谋而合。

1987年1月,召开海军装备技术工作会议,请国防科工

委、总参装备部的有关领导到会。会上我又提到,要把航空母舰搞得能适应未来战争需要,要很好地研究和论证。现在,各国都在注意发展航空母舰,无论是攻击型的或垂直短距起降的,都是为了解决防空和海上攻击问题,都在注意发展。美国、苏联都在大搞,其他国家如法国、意大利、英国这些比较发达的国家都在搞;日本因为是战败国,宪法不允许搞,但搞起来也容易,过去就很有基础,现在技术、生产能力都很强,说搞很快就能搞起来。我们搞难处多一些,财力、技术都有一定困难,但从长远考虑,还是需要的。十年内不搞,十年之后再搞,也还会有困难。因此,我要求要早论证,早点把这个问题研究透。

我们搞航空母舰,目的不是为了和美国、苏联比赛,主要是用于解决对台斗争需要、解决南沙群岛争端和维护海洋权益等方面的任务,平时还可以用于扩大维护世界和平的政治影响。显然,海军有了航空母舰,海军的质量就将发生大变化,海军的作战能力也将有较大提高,有利于提高军威、国威。所以,我要求研究人员,应当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去进行研究论证。

1987年3月31日,我向总部机关汇报了关于海军装备规划中的两大问题:一是航母,一是核潜艇。这两个问题,涉及到海军核心力量的建设,是关键性问题。这两项装备搞出来,从长远看,对国防建设是有利的;这两项装备不仅为了战时,平时也是威慑力量。

这次汇报中,我向总部同志详细分析了两大问题的需要和可能:

关于航母问题,当时,我们对海上机动编队只考虑到驱逐舰、护卫舰和潜艇;但进一步研讨后发现,这个编队如果没有

空中掩护,无法到岸基飞机作战半径以外作战。后来在研究台海斗争时,我们又发现,使用岸基飞机非常浪费,因为留空时间短,所需飞机和机场就要很多。我们还分析,不发展航母,海军还是需要发展驱逐舰和护卫舰,靠它们组成海上机动编队。如果发展了航母,这些舰艇既是护卫航母编队的舰只,也是在海面机动作战的舰只。在现代条件下进行海战,没有航空兵的掩护,无论如何是不行的。如果发展了航母,并不需要增加飞机的总数量,只是飞机的性能有所不同,飞机的价格高一些,但也不会高很多。因此,发展航母编队,是一个如何调整装备经费使用方向的问题,不需要大量增加装备费。更重要的是,有了航母,海上机动作战编队的作战效能会大大提高。至于技术上能不能自力制造航空母舰和舰载飞机,经与航空、船舶等有关工业部门领导、专家研究,他们认为,条件基本具备;当然,有些特殊装置需要认真对待,也是可以解决的。

我接着说,我们设想,对航母的发展,“七五”开始论证,“八五”搞研究,对平台和飞机的关键课题进行预研,2000年视情况上型号。这样安排,第一,从经费上看,在当前和分摊在今后每年中,并不需要花太多钱;第二,从技术上看,发展它是有各方面好处的,可以带动国家和国防需要的有关技术的发展;第三,预研过程中,可以对航母的战备价值及存在的问题摸得更透,有利于作出最后的科学决策。

这次汇报,在总参谋部和国防科工委机关产生了一定影响。后来,国防科工委组织科研单位和海军装备系统开展了有相当深度的论证研究工作。

航母论证过程中,我多次听汇报,强调要充分对比论证使用航母、舰载机与使用陆基航空师、加油机、岸基飞机的作战效费比。后来我到中央军委工作,继续关注航母问题,要求国

防科工委和总参装备部,在航母的发展上要把预研费、研制费、装备费结合起来,统筹安排;要和既定的舰船、飞机、武器、电子装备发展规划结合,而不是都挂在航母大项目里专门安排,搞大规划,使上级无法研究。我明确交代,列计划必须由中央军委讨论。

那时,我先后批准海军和工业部门的专家,去法国、美国、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家考察过航空母舰。国防工业部门,也从俄罗斯聘请了航空母舰设计专家来华讲学,还引进了部分设计技术资料;航母上关键配套的预研,有了一定进展。总参谋部和国防科工委,也都反复组织对考察、引进、预研的分析、论证、评估,这些工作,使军内外很多领导和专家加深了对航空母舰和舰载机大系统工程的认识。

航母是国家综合国力的象征,也是海军能遂行海上多兵种联合作战的核心。建造航母,是国人一直关心的事。我国要实现国防现代化,要建立完善的武器装备体系,不能不考虑发展航母的问题。但航母的发展不只是一个海军的问题,而是事关国家战略和国防政策的大问题,一定要从综合国力和整个国家的海洋战略全局出发,准确定位,慎重决策。

今天,我已经退出工作岗位。欣慰的是,对于我国的航空母舰发展,我尽了一些谋划的责任。

第十八章 走向近海

海上阅兵式

军队的首要任务是随时准备打仗,因此,应该把部队的军事训练摆到战略位置。

我用这种标准考察了许多部队,发现问题较多。应该说,海军的领导同志在海军的建设上做了很多工作,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对军事训练的各种错误做法,做了大量整顿和恢复工作。但从全海军范围来看,依然存在不少问题。比如,领导没有集中精力抓军事训练;基层干部在位率低;训练的时间、内容和质量得不到保证,工作忙乱;安全形势不好。我清楚意识到,新班子在把教育训练真正摆到战略位置的问题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恰逢其时,军委和总部在1982年10月,提出组织演习的任务。

演习准备在1984年进行,是一次全军高级干部参加的抗登陆战役集训和实兵演习。演习主要探讨现代战役的组织实

施,提高全军高级干部组织指挥合同战役的能力,是一次近似实战的训练,也是对我军近年来陆、海、空三军军事训练和各项工作的一次全面检验。

演习计划四个课题,海军占了三个半,而且海军参加兵力多,演习地域广,课题难度大。这对提高海军部队军政素质、锻炼各级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是一次极好的训练机会。我决心利用好这次机会,把海军的军事训练推向新水平。

1982年10月,我们比往常提前印发了《海军1983年军事训练指示》,强调这次演习任务是海军的一件大事,要把它作为中心工作来抓。演习由北海舰队组织,东海舰队派部分兵力参加。要求参演部队精心组织,严格训练,严格要求,确保安全;海军机关要加强领导,督促检查;各院校要积极配合,大力支持。

1983年,军事训练围绕演习任务,各级主要领导同志亲自抓,开训早。5月下旬至6月上旬,我到青岛、烟台地区调研,看到部队训练成绩上升,心里很高兴。

调研中,也发现训练有走过场和跳训、漏训现象。对此,在驻青岛海军师以上干部会议上,我提出了军事训练中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第一,要抓好基础训练。为了保证和提高一类舰艇的水平,要从抓二类舰艇训练入手;要求二类舰艇一定保持齐装满员,舰长和主要部门、战位要配齐配好;从单兵训练抓起,在搞好单兵、战位和部门训练基础上,搞好全舰的协同;战术和技术训练,要严格按条令条例的要求进行。我要求大家,学习中国女排精神,高标准,严要求,苦练基本功。

第二,要抓好干部训练。干部除了学好基本技术课以外,还要学习军事思想、作战原则、战术思想、作战技术指挥等,形

成学习热潮；要建立干部技术档案，训练考核成绩要记入档案。另外，我提出了一个影响到部队战斗力的问题：一方面有些舰长，年龄较大，按规定要退出岗位，但是其他各方面很好，这些人另行安排工作很困难，有的只好转业，实是浪费人才。而另一方面，部队又缺大量称职的舰艇长，培养舰艇长周期很长，这使得舰艇训练不能正常进行，影响在航率和战斗力。因此，我决定留下一批技术和思想好的舰艇长，作为教练舰长，并提高他们的待遇。这样安排，保留了一批骨干人才，各舰队舰艇长不在位或调走有缺额时，就可以有人及时替代，保证舰艇的作战能力不下降。

第三，要把战术课题试验引向深入。旅顺基地和第一水面舰艇学校，组织了猎潜艇对潜搜索方法的改革，取得了成果。部队在战术训练中的问题和重大革新项目，可以通过院校进行分析鉴定，推动训练改革的发展。要加强对试验的指导，及时总结经验，形成条例，经海军审定后作为部队训练的章程。

第四，要抓紧训练设施的建设。支队、独立大队的码头，都要搞一套教练室，以保证舰艇港岸训练，提高训练质量。

第五，要加强训练的组织领导，切实把训练工作摆到战略位置上来。分管训练的领导要集中精力抓，各级党委要统筹安排，减少领导干部的上层活动，保证干部在位。年初一开训，有的基地就发了报，说大批干部不在位。经调查原因，各种各样、各级各类的训练班同时办，布置任务的会议同时开，这是领导工作方法问题。要保证部队开训时全体人员在位，这个问题要统筹安排，合理解决。

对上一阶段的军事训练情况，我让机关发了一个通报，表扬先进，批评落后，对存在的问题，要求及时纠正。

8月26日至9月18日,海军在烟台地区组织实兵合练。总部和济南军区的领导以及地方政府领导观看了演习。我和聂奎聚副司令员,带领海军机关工作组观看并指导了实兵合练。经过24天的紧张合练,顺利完成了预定的训练任务。

9月17日,我们组织了壮观的海上阅兵式。

蓝色大海上,舰艇的战斗编队犁出道道白浪,驰向远方,显得很有气势。站在指挥舰上,我有很多感慨。让我高兴的是,通过这次演习任务,部队抓了基础训练和干部训练,加之前一阶段两次正规化训练和整顿,部队的军政素质有了增强,提高了现代条件下海上作战能力;而且,海军官兵表现出的旺盛士气,也令人鼓舞。作为海军司令员,从个人的角度讲,有一瞬间我感到了自豪:我在检阅自己指挥的部队。但想到作为海军司令员的责任,却无法得意。我很清楚,只有能在大洋上纵横驰骋所向披靡的舰队,才算是真正强大的海军。与之相比,我们还有很大差距。尤其是现代海军,必须是高技术装备和高素质的人的有机组合,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不久,海军出了一件大事故。

1984年5月,一艘潜艇发生事故,暴露了海军部队存在的一些问题。其根本原因,是没有把教育训练摆在战略位置,扎扎实实打牢基础。

关于把教育训练摆到战略位置,总部提出过三条标准:第一,党委必须坚持以教育训练为中心,有主次地统筹安排各项工作,军政一把手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抓教育训练上。第二,训练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和训练保障,要像保证打仗那样,保证教育训练任务的完成。第三,要严格按照训练大纲和有关规定,确保训练时间、内容、质量和参训人员落实,经得起检查,经得

起考核。在6月召开的海军师以上军政干部会议上,结合剖析事故原因,我讲了贯彻落实总部提出的把教育训练摆到战略位置的标准问题。我强调,必须像战争年代接受战斗任务那样,千方百计抓训练,军政领导和司、政、后、装要齐心协力,绝不能由一个抓训练的首长唱“独角戏”。对支队、水警区以下部队要实行定质量、定进度、定时间、包任务指标的“三定一包”责任制。

我着重指出,对基础训练,要引起高度重视。坚决贯彻“巩固提高,稳步前进,质量第一,安全第一”的训练方针,正确处理进度与质量、训练与安全的辩证关系。基础训练要反复抓,反复练,既要教得精,又要练得熟。刘伯承元帅说过:“与其有百发一中的枪百支,倒不如有一发一中的枪一支。”

军政干部会议后,部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教育和点验式整顿。整顿中,各单位总结了本单位军事训练和安全工作的经验教训,学习了兄弟单位的好经验,制定出适合本单位的措施,把基础训练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如北海舰队,在古镇口舰艇中心教练室的基础上,组织了舰艇训练中心;还抽调了有经验的教练舰艇长、业务长和专业人员为骨干,对二类舰艇实施集中训练。有的快艇部队,组织了新艇长训练中队。实践证明,采取这些措施,提高了基础科目的训练质量,舰艇部队基础训练开始了良性循环,部队战斗力得到明显提高。

以后,海军逐步开展了机动作战训练、远航训练和诸兵种的合同训练;这些训练,都是在打牢基础的前提下进行的。

1988年1月29日,在离开海军前参加的海军党委六届四次全会上,我又交代:军事训练一定要打牢基础。要严格按照大纲要求进行训练,对掌握的武器装备,要弄通理论,操作熟练,运用自如,充分发挥武器装备的最大效能;要加强复杂

条件下的训练,努力提高紧急应变、正确处置情况的能力;特别要抓好新兵训练,从思想作风到组织纪律,从军人仪表到专业技术,都要打下良好基础。要在打牢基础的前提下,进行诸兵种的合同训练,锻炼提高各级指挥员的谋略水平和战术技术水平。

正规化训练

组织部队训练时,我深深感到,部队的军事训练方法很有问题,需要改革。

国外海军的舰艇部队,每年训练时间大多在200天左右;国外飞行员训练时间,一般在250小时以上。相比之下,我们的训练时间要少得多。有的支队和水警区,每年的出海训练时间,甚至连指标都完不成。由于训练时间少、质量低、周期长,不能很快形成战斗力。

我认为,要把训练搞上去,就要针对作战对象搞训练。要深入研究敌情,根据敌人的装备和作战样式、作战手段,调整我们的训练内容和训练方法,使之适应未来战争的要求。在这方面,当时我们的步子太小。

1983年初,我在提出海军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时,也提出要按现代海战的要求,从实际出发,全面系统积极稳妥地改革军事训练。当年,海军下发了《关于海军军事训练改革的若干问题》文件,提出了分级分类训练、改革训练内容、改革训练方法、改革训练保障等项改革措施。要求各舰队和海航搞好军事训练改革,把军事训练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1984年6月,我主持召开了军事训练改革座谈会。会上,大家形成共识:训练改革要深入进行,最重要的是破除障

碍,解放思想,关键在清“左”。过去受“左”的影响,不讲规章制度,训练指导随意性大,不系统,不正规。一些领导干部习惯于旧的一套,思想不解放,谨小慎微,遇到问题“绕着走”,缺乏改革的气魄和胆量,有畏难情绪,甚至有抵触情绪。只有清除“左”的影响,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搞好训练改革。

这次座谈会上,我提出了对训练改革的一些原则设想,即:“三个突出,两个实现,两个缩短,两个提高”。“三个突出”是,要在抓好基层指挥干部训练的同时,突出首长机关训练;在抓好基础训练的同时,突出合同作战训练;在抓好训练体制、训练方法、训练保障改革的同时,突出训练内容的改革。“两个实现”是,要逐步实现干部、战士以及部队训练程序的科学化;逐步实现训练指导文书的规范化。“两个缩短”是,要缩短训练与实战的差距,缩短训练周期。“两个提高”是,要提高训练质量;提高“五种作战能力”(协同作战能力、快速反应能力、电子对抗能力、后勤保障能力和野战生存能力)。这个设想仅是初步的,目的是统一训练改革方向,明确奋斗目标,使部队逐步建立起科学的训练程序,使官兵训练层次分明、周期短、效率高、质量好,使训练尽快走向正规化。

在这次会议的推动下,海军的训练改革变得活跃,出现可喜局面。主要表现在:统一了海军作战指导思想,明确了“积极防御、近海作战”的作战方针和“近岸坚守防御的阵地战、海上运动战、海上破袭游击战”的作战形式;明确了训练是为了作战,确定了作战方针和作战形式,使训练改革有了清楚的依据和方向。部队全面实行了分类训练,一类舰艇、甲类飞行团增多。训练内容上,开展了潜艇鱼雷隐蔽攻击、飞机超低空攻击等新战法研练。实行了军事干部合格考核,增编了教练舰

长和业务长,注意了技术骨干的培养和保留。模拟训练器材的研制取得了初步成果。

在这种形势下,1985年10月,海军召开了训练改革经验交流会。会上,讨论了《海军部队训练改革设想》、《水面舰艇训练大纲改革意见》等四个文件初稿。

海军的军事训练改革,总的指导思想是,适应我军建设指导思想上的战略性转变,把军事训练的根本立足点,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应急训练”,转变到和平时期科学的正规化训练上来;依靠系统完整的正规军政教育训练,提高部队军政素质和现代条件下的海上作战能力,做好应付局部冲突和突发事件合同作战的准备。训练改革的总目标中央军委曾有过明确指示,即“建设成一支机构精干、指挥灵便、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反应快速、效率很高、战斗力很强的精兵”。

随着海军的军事训练转入正规化轨道,训练改革逐步深入,取得了明显成效。主要表现在:

一、训练体制改革有了新的进展。舰艇部队全面实行分类训练,不同训练水平的舰艇,分为一、二、三类。全面实行分类训练后,完成科目全训的舰艇逐年增多,舰艇部队基础训练开始了良性循环,提高了合同训练的起点。

与此同时,各舰队都探索了先训后补的路子,先后建立了“舰艇训练中心”,抽调有经验的教练舰艇长、业务长和专业人员为骨干,对二类舰艇实施集中训练。不仅缩短了训练周期,而且提高了单舰艇基础科目的训练质量。

二、训练内容改革有了明显进展。海军机关和各部队大力开展了军事学术研究,学习和研究外军训练、作战的先进经验,积极进行训练大纲的改革,摒弃陈旧落后的训练内容,增

加实战中顶用的内容。训练中,紧紧围绕提高“五种作战能力”,开展了各种新战术课题的研究和演练。

三、训练方法和手段改革有了长足进展。主要是运用电子计算机等先进技术手段,加强训练信息反馈和有效控制。从1987年起,海军与各舰队直至师级训练部门,逐步建立起微机网络,实现训练信息的远程传输。训练改革中,我们还特别注重了训练模拟器材的研制和应用。1984年至1987年,共研制出20多种模拟训练器材。此外,还开展了军事电化教学,陆续给部队下发了一批录相设备和军事教育资料录相片,收到了近似使用实兵演练的效果,减少了武器装备的磨损,节约了大量经费。

四、不断改进干部考核管理、使用制度。一是实施合格考试制度。规定从院校毕业的学员上舰后,必须先经一年见习期,考试合格后才能正式任命;对完成单舰艇、中队全部科目的舰艇长、部门长实施合格考试,颁发合格证书。二是在舰艇支队、大队增编了教练舰艇长和业务长。适当放宽了任职年限,相应提高了一级待遇,对舰艇训练起到了骨干作用。三是实行舰艇补助金制度。经军委批准,海军舰艇人员按训练水平享受岗位技术等级补助金,把考试与干部的晋升、使用和物质利益结合起来,从制度上改变了过去“干好干坏一个样”的状况,大大调动了练兵积极性。

海军训练改革的过程,是一个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过程,是上下共同努力的结果。取得这些成绩很不容易。我离开海军时,海军共编印下发各种条令条例大纲教材等近400种,为军事训练的发展,奠定了基本法规。

有些训练改革项目实际效果与原来的设想不尽相同,推广难度较大。对这类改革,我的态度是总结经验,停止试点。

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都不会一帆风顺。军队是准备打仗的群体,需要有直面死亡的勇气,自然也应该有实事求是、直面矛盾和挫折的勇气。让人高兴的是,改革的绝大多数项目,是成功的,获得了预期效果。

远航合成编队

中国海军的作战指导思想、方针原则和作战方式,曾经争议过多年。这是个战略性的大问题。一支部队必须首先明确在什么地方作战?在什么条件下作战?采取什么样的作战方针和作战方式?否则,部队的训练和建设将无的放矢。

在部队调研时,我看到:部队的基础训练薄弱,各级首长和司令部门的训练差,合同训练和远航训练还处在研究和试点阶段,舰艇部队大都是在“家门口”练兵,局限在“摸、爬、滚、打”和“苦练二百米硬功夫”的低层次中循环。

这种状态必须改变。我明确提出:“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

1983年,我组织召开了海军作战会议。会上,对海军的作战指导思想和作战方式等问题,统一了认识。

我要求部队认真研究现代条件下的海上作战问题。要根据作战任务、作战对象和海区特点,研究如何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战法;着重进行近海合同作战训练,特别要研练近岸坚守防御的阵地战、海上运动战和海上破袭游击战相结合的问题;要提高部队“五种作战能力”。同时,明确提出一类舰艇、飞行战斗团、岸防战斗营(连)的训练内容和目标。

远航训练,是我关注的一个问题。有人讲,大洋是“海军军官的课堂”,远航是“海军军官的真正学校”。世界各国海军

都重视远航训练,在各种场合,我多次强调远航训练和合同训练问题,要“从难、从严、从实、从硬”训练,逐步加强远航训练。

1983年,海军组织了人民海军航海史上首次远航实习。由时任海军副参谋长张序三率领,从湛江启航,经西沙、南沙,出巴士海峡进入西太平洋。舰船在海上历时30昼夜,航程近7000海里。回来后,参加远航训练的官兵和学员都很有感触,觉得远航对海军人员政治、心理和专业技能,是一次非常好的全面考核。

我要求部队,今后只要条件允许,海军都应该组织远航,要逐步简化组织方法,提高各种保障手段,一声令下,随时可以远航执勤;要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军以上机关的参谋随舰出海锻炼。我希望我们的军舰能像外国军舰一样,训练得能跑它几千海里不出问题。我还要求,争取近一两年开始,组织驱逐舰、护卫舰出国访问、考察,锻炼部队,扩大中国海军的影响。

合同训练,是提高海上作战能力的重要一环。我要求部队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对未来战争“三结合”的海上作战形式的具体化研练,即采取近岸坚守防御的阵地战、海上运动战和海上破袭游击战三种作战形式的结合,从海空协同训练入手,逐步抓好作战值班部队和一类舰艇、甲种飞行团的合同作战训练,使训练与作战有机地联系起来,尽早形成“拳头”;下大力抓好首长机关训练,多组织一些检验性、对抗性演习,并尽量采取利用电子计算机等先进技术装备,提高快速反应能力和协同作战的组织指挥。我还提出,支队、水警区、航空师和团,今后主要抓技术战术基础科目训练;舰队重点抓诸兵种合同训练、远航训练和首长机关训练。每次远航,都要注重合同战术训练或带动沿途兵力的对抗训练,不断提高远航训练效

能。

1984年,由于上下的共同努力,海军的训练工作进步幅度比较大,举办了多种集训和实兵演练、演习,还组织参加了我国首次赴南太平洋、南极洲的远航实习和科学考察,在海军航海史上增添了新的一页。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组织的分类训练。这是一个带有突破性的创造,它推动了部队训练水平的提高。通过这种训练,解决了过去年年在低级阶段循环训练的问题,海军一类舰艇和甲种飞行团数量增多。1984年以来,一类舰艇达到并基本保持了在航舰艇数量的二分之一,对提高部队训练的起点,加强远航训练和合同训练创造了条件。这样一来,一类舰艇和甲种飞行团进入高级阶段,就可以通过远航训练、合同训练和演习,研练新战法,探索提高海上作战能力的新路子。

1985年10月,在海军训练改革经验交流会上,我肯定了上述成绩和经验。要求部队今后要着重抓好统一指导,开展中高级干部的战役、战术集训,新战法和新训练方法的研究,争取有大的突破。

我们首先加强了中、高级干部的战役战术集训,使干部训练向高层次发展。海军颁发了《海军师以上首长机关训练大纲》,编写了《首长机关训练条例》、《首长机关训练教材》和《首长机关合同训练大纲》,为战役战术训练提供了依据。集训时,先学习理论,包括学习我军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方针,以及外国的先进军事科学经验,结合海军作战任务,研究未来战争的作战方针、作战指导原则、作战样式和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等问题。接着是进行图上演习,我们要求军、师级部队,每年都要组织首长机关带通信工具的图上演习。

1985年12月,海军举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图上演习,即

海军首长机关单方一级研究性演习,我指挥了这次演习。

演习在实际的指挥场所进行,演的是真人真事,收获很大。演习锻炼了首长机关统筹整个海战场的组织指挥能力,提高了谋略水平,探讨了未来战争海上作战的新理论、新战法,预测了未来海战场的形势,探讨了海军兵力的建设。“近海防御”的海军战略,就是我在这次演习的总结会上提出的。总参领导亲临现场观看后,称赞这种训练方法好。以后,海军军以上部队,每年都举行首长机关战役战术集训。

在开展新战法研究和组织实施海军诸兵种协同训练中,在开展超低空突击舰船及舰机战术对抗的基础上,重点加强了舰机协同的远航战术合练,为加强海上机动作战兵力的建设,探索了新路子,积累了新经验。

这一年,潜艇远航侦察训练,也取得了显著成绩。进行了核潜艇水下最大自给力考核试验,检验了装备,锻炼了部队,为核潜艇部队战备训练积累了经验。我们还组织了适应性远航,圆满完成了两艘舰船出访南亚三国。人民海军组建36年以来,这是首次派舰出国访问,在对外交往史上写下了崭新一页。

为了检验几年来的训练质量,1987年4月,我向南海舰队司令员陈明山下达任务,要求做好舰船去南沙海域巡逻的战备工作。我指出:这是一次重要任务,一是行使主权;二是显示我们的海上力量;三是结合战备,检验这几年的训练质量;既是战备,也是一次远航训练。要求部队一丝不苟,认真准备,万无一失,确保安全。这次远航训练,熟悉海区和了解情况,是其中的重要任务之一。南沙是我国领土,我们今后要经常去。一旦发生冲突,要按军委总部规定,做到有理、有利、有节的反击,绝对不能示弱,绝对不能吃亏。

5月16日至6月6日,海军组成大型舰艇联合编队,首次到南沙海域巡逻,顺利完成了预定任务。与此同时,东海舰队也组成一支多舰种的远航合成编队,在西太平洋成功地进行了编队科目训练。

至此,各舰队根据使命任务要求,都进行了多兵种的合同训练,并且发展到远海进行。通过这些合同作战训练,海军的舰艇协同能力、在海洋上的生存能力以及有关首长机关的谋略水平,都有了较大提高。

1987年,海军诸兵种协同训练,由于利用了新的科技手段,又有了新的发展。

我们利用激光、电子技术等,研制了海上战术对抗训练模拟器材,使用于保交、破交、战役图上演习、对空防御训练和海上对抗性实兵演习。8月,北海舰队在黄海举行了演习。这次演习,利用激光电子模拟器,在海上进行战术对抗实兵演习,其电子模拟系统的精确化,填补了我军空白;激光模拟器突破了总部要求的发射距离,创造了激光模拟器用于我军海上实兵训练的先例。

这次演习,打开了现代化训练的路子,对部队、机关参谋和各级指挥员,都有很大促进和提高;对海军今后的教育训练,对武器装备的发展,也有很多启示。实践表明,由于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武器装备不断更新,造价也越来越昂贵,利用实战武器进行训练是很不经济的;有了模拟训练设备和声光显示,则能收到近似实战的效果,减少了武器装备的磨损,大大节省了人力和经费。激光电子模拟器的使用结果还表明,在兵力战斗能力计算、标图、战斗情况处置和战果评判等方面,提高了快速反应能力。特别是激光模拟器加上声光显示,能直观形象地显示攻击效果,解决了以往在合同训练中对抗

双方攻击效果难评判的问题。如今,训练近似实战,兵练活了。

这次从模拟器材的方案研究论证到海上实兵演习,我都亲自参加了。演习结束,我看望了参演部队,充分肯定了研制演习器材的院校、部队、工厂和研究所的成绩,并要求他们把已经有的模拟器材推广到部队,加快海军军事训练发展,使海军部队的训练手段更加现代化。

1988年1月29日,海军党委召开了六届四次全会,我讲了话。这是我担任海军司令员期间的最后一次讲话。

我说:“从整个国际形势看,大仗一时可能打不起来,但局部情况特别是我国周边情况,还很复杂。因此,我们必须下决心,按照‘精干、合成、平战结合’的原则,把部队建设好。首先要全面提高官兵素质,在打牢基础训练的前提下,进行诸兵种的合同训练、快速反应训练、机动作战训练以及带有战术背景的图上和实兵对抗演习,锻炼提高各级指挥员的谋略水平和战术技术水平。”

最后,我再一次强调了海军的远航和合同训练问题。我说:“最近两年,各舰队以一类舰艇、甲类飞行团为骨干组成的联合机动编队,走出近岸海区,到广阔的近海去练战术、练协同,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实践证明,这是加强诸兵种战术合同训练、提高海上整体作战能力的一种好形式”。“今后,要进一步强化合成观念,增强合成意识,针对未来海战需要,采取锚泊、移地驻训和出岛链远航等多种形式,提高快速反应能力和协同作战水平。”

从近岸伸向大洋

在我就任海军司令员期间,海军参与了一系列国家重大任务。如水下发射运载火箭试验、发射通信卫星、南极考察等,这些任务,都完成得十分圆满。

上任不久,我就参加指挥了水下发射运载火箭试验。

在战略核武器系统中,陆基洲际导弹、战略轰炸机和潜射导弹,被人们视为“三位一体”。与陆上和空中的战略核武器相比,从水下发射运载火箭,有其明显优点。因为它是以潜艇为发射平台,在大洋深处,机动范围广,隐蔽性好,生存力强,因而更有威慑力。世界上,当时只有美、苏、英、法四国拥有这一能力。

早在1967年,中国就开始研制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并被列为国防尖端技术的重点任务,研制步伐很快。这项工作,也是我在国防科委、总参谋部和海军部队工作期间一直抓的事情。现在,这项工作进展到了全系统武器发射试验的最后阶段,而且我的角色也变了,是作为海军司令员亲自参与这件事情,心情格外激动。

1982年3月,中央军委把运载火箭水下发射试验的任务交给了海军和国防科工委共同组织实施。如果试验顺利成功,则标志着我国战略导弹技术有了新的突破,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水下发射战略导弹能力的国家。显然,这对于增强我国国防力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支持世界人民的反霸斗争,都具有重大意义。

运载火箭水下发射试验的任务,是以海军为主组织实施的。根据分工,海军主要负责导弹测试和发射,担任首区(发

射区)测量,加强末区(溅落区)落点测量和护航警戒、航海保证、防险救生等任务。为了保障试验顺利进行,我们事先组织了潜水训练、测量演练、防救训练、直升机着船训练和援潜护航等演练;同时,技术阵地、发射潜艇、测控通信系统、气象和后勤保障等各个方面,也都进行了周密准备。

我到海军就职时,试验准备工作正进入关键阶段。我听取汇报后,根据前一阶段的准备工作情况,要求紧急动员起来,切实做好最后阶段的准备,确保试验圆满成功。为此,海军和国防科工委于9月召开联合会议,总结试验准备工作,要求全体参试人员:坚守岗位,尽职尽责;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认真操纵,准确无误;加强团结,亲密协作;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确保试验稳妥可靠,万无一失。总之,要求大家紧急动员起来,切实把党中央、中央军委及国防科工委和海军常委指示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变为具体的行动。

1982年10月1日,新华社授权发布禁航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82年10月7日至10月26日,向北纬 $28^{\circ}13'$ 、东经 $123^{\circ}53'$ 为中心,半径35海里圆形海域范围内的公海上发射运载火箭。为了过往船只和飞机的安全,中国政府要求有关国家政府,通知本国的船舶飞机,在当时时间每日9点至17点,不要进入上述海域或海域上空。”

10月7日15时14分,按计划发射了第一枚运载火箭。火箭发射正常,但点火后不久,导弹失控翻转,在空中自毁。

第一次试验失败了。

我立即组织全体参试人员,开动脑筋,查找失败原因。上级很体谅,中央军委首长指示,让“首区”的参试人员特别是科技人员适当休息,不要搞得过分疲劳,也不要有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所有问题都要注意到。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徐向

前指示：“既是试验，就有成功和失败两种可能。要像我国女排夺冠军那样，胜不骄，败不馁。大家不要泄气，更不要埋怨，主要是总结经验，更好地进行技术检验，找出问题所在，以利再战。我们一定会获得成功，‘失败是成功之母’，大家再努力吧！”

庆幸的是，科技人员很快就找出了事故原因。著名的中国火箭专家、潜地导弹总设计师黄纬禄判断正确，决心对头，对准备发射的第二枚火箭采取了相应的改进措施。部队也迅速作好了第二次发射的准备。

10月12日，进行第二枚火箭发射。

当日15时零1秒，艇长石宗礼下达“发射”口令，导弹部门长陈耀忠按下了发射按钮。

这是一个让人屏住呼吸的时刻。数秒钟后，附近的观察艇看到，导弹从高大的水柱中腾涌而出，冉冉上升，然后划出一道弧线，按预定轨道，向南飞向预定海区。弹头落点，距瞄准中心偏差极小，命中良好。

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海军和试验基地的领导同志，紧紧握住了黄纬禄总设计师的手。我的心里，也涌起一种难以形容的喜悦。

10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发来电报，向参加运载火箭研制和发射试验的全体人员表示祝贺和慰问。

10月22日下午，军委领导在大连召开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国防科工委的领导，海军有我和李耀文政委、还有海军装备技术部和海军试验基地以及第二试验区的领导等。

军委领导指出：水下发射试验，比陆上战略武器试验要复杂得多。装潜艇的导弹不能大，要小巧玲珑，就像钟与表一样的性质，越小越精，要求就越高；所以我们把海上战略导弹叫

做“玲珑一代”。军委领导说,原来考虑,导弹出水有故障后可能会砸潜艇,因此争论了多年。试不试呢,最后下决心还是要试。这次试验取得了经验。

座谈会上许多同志发了言,强调军委首长指导思想正确,这是决定性的;同时,总结了试验的经验,表扬了黄总师分析判断正确。

我和李耀文政委也发了言。我对试验成功表示祝贺,并说,战略武器试验方面,在陆上搞过多次了,科工委有经验,我们海军没有经验;海军试验基地要老老实实向科工委的试验基地学习,拜他们为老师;也要老老实实向科研和工业部门学习,拜他们为老师。拜好两个老师,我们海上试验基地一定会建设好。我还要求海军试验基地的领导同志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把部队整顿一下。第二试验区是新建的,总的看是好的,但在组织纪律性方面还有不少问题应当认真抓一下。

10月22日和25日,国防科工委和海军在首区和末区分别举行了祝捷大会。末区还举行了隆重的海上阅兵。军委副秘书长张爱萍出席了祝捷大会并讲了话。

之后,海军参试部队分别召开了庆功会,表彰在完成任务中做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中国首次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试验成功,在国际上震动很大。

美国《海军学会会报》评论:“当中国宣布她从潜艇上发射弹道导弹试验成功时,事情已变得十分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为世界第五个拥有一支以海洋为基地具有威慑力量的核大国……中国拥有一支海上威慑力量,不仅使苏联而且也使美国的战略力量估计变得复杂化。”

随着现代科技进步,在国家建设中,海军承担了更多新的

责任和任务。譬如参加通信卫星系统试验。

在现代通信的发展中,卫星通信是一个重要里程碑。它的优点非常明显:通信距离远,容量大,质量高;不仅适用于民用通信,而且有极大的军事价值。正因为如此,当时的美、苏等国,都投入大量资金,建立了卫星通信系统。我国的第一期卫星通信工程,是周恩来总理生前布置的重点科研项目。海军也早在1975年,就参与了卫星系统工程的部分论证工作。

1983年,中国完成了通信卫星的研制,计划发射实验通信卫星。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从国内发射场到南太平洋卫星入轨位置的6000多公里航区,需要在海上建立若干个跟踪测量站;这种站分别建立在三艘装备各种精密仪器的远洋测量船上,负责海上飞行阶段的弹道测量和遥测任务。

海军承担了两项任务:一项任务是,建立关岛附近海域跟踪测量站。卫星发射及跟踪测量时间的统一精度,是以毫秒和微秒计算,因此,测量船不仅要根据发射任务的需要,按时准确地进入跟踪测量点,而且要确保各种精密仪器高度稳定正常工作,稍有疏忽,就将影响全局,任务相当艰巨。另一项重要任务是,在卫星进入预定轨道后,核潜艇卫星通信系统要进行卫星信道通信试验。

跟踪卫星测量任务,由海军派船负责完成。海军派出了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一艘万吨级远洋救生船,将舷号临时改为“远望3号”。从1983年9月起,在7个月的时间里,“远望3号”先后三进太平洋,进行海区情况调查、遥测、通信联调和跟踪卫星发射。

1984年3月29日凌晨2时,“远望3号”顺利到达待机点。4月8日,我国第一次将实验通信卫星成功地发射升空。“远望3号”准时进入测量准备状态,从发现目标到目标消逝,

跟踪测量时间超过了指挥部要求的一倍多,准确测量出了目标飞越本船上空的相关数据。

4月16日,通信卫星进入预定轨道。海军核潜艇卫星通信系统,第一个成功地开通了卫星信道通信试验线路。4月20日晚,我陪同军委总部首长来到卫星地面站,参观了海军的卫星通信系统现场试验。我欣喜地看到,核潜艇利用卫星转报的瞬间快速通信试验取得成功,使我国对潜通信达到一个新水平。

同时,我国第一次将试验通信卫星送上太空,通信、广播和电视传输等试验顺利完成,也标志着我国航天技术及信息通信技术有了新的飞跃。4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向参与研制和试验的全体同志致电敬贺;国防科工委和海军给“远望3号”记了集体二等功。

1986年2月1日,我国又成功地发射了实用通信广播卫星。这个实用通信广播卫星,可以覆盖全国领土,在电视、广播传输方面,效果明显优于试验通信卫星和当时我国租用的国际通信卫星。这些成果标志着我国已全面掌握运载火箭研制和发射、测控技术,卫星通信由试验进入实用阶段,航天技术和电子技术取得了新的进展。

这次实用通信广播卫星发射中,海军的“远望3号”成功地完成了遥测保障任务。国防科工委和海军决定,再次给“远望3号”记集体二等功。

作为一个海洋大国,中国政府应该拥有对南极事务的发言权。首次南极考察,海军承担了义不容辞的责任。

南极濒临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面积约1400万平方公里,约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9.4%,丰富的矿藏和渔产资源,神秘的土地,吸引了不少国家的科学家前来探索。至

1984年底,已有18个国家先后在南极建立了科学考察站。

1980年以来,中国先后派出了几十名科技人员,参加了友好国家的南极考察队,赴南大洋和南极考察。1983年5月,五届人大常委第27次会议上,通过了我国加入《南极条约》的决定。但遗憾的是,由于我国没有独立组织过对南极的考察,因此仅为缔约国,而不是协商国,对南极事务没有表决权。这一现状,与中国的地位很不相称。

1983年底,国家海洋局局长罗钰如和我会商,希望海军支持对南极的考察。我知道,进行南极考察和在南极建站,是我国成为《南极条约》协商国的必要条件,这在国际上会有重大影响。而且,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也批转过国家海洋局、海军《关于加强相互联系和合作的若干规定》。因此,对海洋局的要求,我表示积极支持,同意海军参加首次南极考察。1984年初,罗钰如同志在阿根廷政府的友好帮助下,考察了赴南极建站问题。回京后,我们又进一步研究了共同组队进行首次南极考察问题。

1984年6月12日,国家海洋局、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国家科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和外交部,联合向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上报了《关于我国首次组织编队进行南大洋和南极洲考察的请示》。经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由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国家海洋局、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联合组成首次赴南极考察编队,准备在南极建立中国第一个科学考察站,进行多学科综合考察。

7月13日,我主持海军首长集体办公会议,决定派“J121”船参加南极考察,海军航空兵派一架直升机;部队、院校、机关选一部分人随船出海实习。

最后,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北海舰队的“J121”船、海

航的一架直升机和国家海洋局的“向阳红 10 号”船,共同组队,进行首次南极考察。

我指示北海舰队和海航:8月15日前,“J121”船应完成直升机着舰训练和船上加装航空系统的出航前检验工作;8月15日进厂进行设备加、改装;10月底出厂;11月份进行出航前最后准备。此次南极之行,准备工作繁重,时间紧迫,特别是各种设备的加装、改装工作十分艰巨,我要求各单位,务必加强对此项任务的组织领导,积极主动按分工做好各项准备,保证完成任务。

10月15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为首次南极考察题词:“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做出贡献”,进一步指明了中国首次赴南极考察和建站的目的。

海军参加这次任务的官兵共 308 人,编队总指挥为国家海洋局副局长陈德鸿,海军旅顺基地参谋长赵国臣担任编队副总指挥兼海军指挥组指挥。

11月20日上午,考察编队驶往锚地加油。22日6时,从锚地启航,由日本奄美大列岛的宝岛水道进入西太平洋,经关岛、马绍尔群岛,12月1日8时,经过赤道进入南半球。4日,跨过国际日期变更线进入西半球,再经社会群岛、合恩角,于19日14时,抵达了阿根廷乌斯怀亚港。在该港顺访和补给后,23日23时离港,通过德雷克海峡,于26日安全抵达了南极乔治岛民防湾。共航行32天11167海里。

南极洲每年分为寒暖两季。11月至次年3月,是暖季;极点附近,暖季为连续白昼。考察编队抓住暖季短暂好天气,突击卸运建站物资,军民共同建站。在建站过程中,海军官兵团结一致,英勇拼搏,用船上四艘救生小艇和直升机,采取“蚂蚁啃骨头”的办法,把500多吨物资运上岛。在抢建“长城”站

码头和房屋的施工中,组织四个突击队,和考察队员一起,日夜轮番突击。有时穿着单衣,挥汗大干;有时身着防水服,跳进齐腰深的海水里坚持工作。仅用45天,就建起了一座简易码头、两栋考察用房和四栋辅助房,架设了四座通信铁塔,还修建了气象站。考察队完成了南极民防湾水文、底质和气象考察,搜集整理了乔治岛海域水文气象数据700多个;潜水长刘宝珠进行了57米深潜作业,在硬泥海底走动了五分钟,弄清了锚地底质。实习队在参加建站同时,利用不能上岛的恶劣天气,进行课堂教学。无论是航行途中,还是在南极建站期间,海军指挥所与“J121”船始终保持直接而顺畅的通信联络,通信距离最大达到1.86万公里,创造了我军无线电通信距离的最新纪录。

1985年1月20日15时35分,我在海军司令部通信值班室,利用短波设备,与“J121”船指挥员赵国臣通了话。我向船员表示慰问,要求他们战胜艰险,坚决完成建站任务,为国争光,为海军争光。春节前,海军司令部、政治部还联合组织了在京部分家属与南极亲人直接通话。

考察编队经过62个昼夜突击,2月15日10时,南极长城站正式建成。2月20日22时举行了长城站落成典礼,国家南极委员会主任武衡、海军副司令员杨国宇率领慰问团,乘智利飞机抵达乔治岛参加了典礼。位于乔治岛的阿根廷、智利、苏联、波兰等国考察站负责人应邀参加。南极长城站前,竖起了三米高的大铁锚,上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308名官兵首次赴南极纪念。”

2月26日晨,考察编队从乔治岛民防湾起锚返航。途中,顺访了智利的彭塔阿雷纳斯港,然后,穿西风带,渡太平洋,于4月10日上午安全返回上海港。这次航程,前后历时

142天,往返2.3万海里,圆满地完成了航渡、建站、实习及顺访等任务。

4月19日,我和李耀文政委听取了南极考察的情况汇报,接见了有功人员代表并合影留念。这次南极考察,航行距离之远、时间之长,在我人民海军航海史上均为首次。通过这次远航,锻炼了部队执行远航任务的能力,初步掌握了大洋航行和防风暴的规律,积累了东南太平洋和南极海域地理、水文、气象等有关资料。考察编队在南极的62天里,遇到八至九级大风21次,十级以上大风13次,雪37天,雨24天,雾25天(有时一天内既有雪又有雨或雾)。

这次考察远航,还实际检验了动力和通信等装备,积累了装备使用、后勤补给等方面的经验。在往返航途中顺访了阿根廷和智利港口,增进了中阿、中智两国人民和军队之间的友谊,扩大了中国人民海军的影响。

总之,考察编队圆满地完成了远航和建站任务,为祖国争了光,为军队赢得了荣誉。为表彰他们的英勇事迹,海军党委作出了《关于向海军参加南极考察的指战员学习的决定》。1985年5月6日下午,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召开了首次南极考察庆功授奖大会。5月9日,海直机关举行了南极考察报告会。会上,我高度评价了参加南极考察的官兵英勇奋斗、团结协作和为国争光的革命精神,要求海军部队,发扬南极考察精神,加速海军建设。

1985年10月7日,《南极条约》协商国在布鲁塞尔召开特别会议,与会国一致同意,接纳中国为该条约的协商成员国。从此,中国在南极问题上有了表决权。

出 访 六 国

在我就任海军司令员时,小平同志已经带领中国人民摒弃了“闭关锁国”政策,实行改革开放。中国以一种灵活务实的崭新形象,重新出现在国际舞台。国际交往日益频繁,中外军队的交流也逐渐增多。这段时间,我先后接待过十几个东西方国家的海军代表团和海军舰船来华访问。为进一步发展友好交往,增进互相了解,扩大互利合作,受上级指派和被邀请,我从1983年开始,三年间,率海军代表团先后访问了巴基斯坦、孟加拉国、英国、南斯拉夫、法国、美国等六个国家。

巴基斯坦是我国的友好邻邦,两国关系密切。1983年11月11日,我率领代表团一行七人,抵达了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

伊斯兰堡是一座新建城市,位于巴基斯坦北部波特瓦尔高原。我们受到东道主的热情接待。12日上午,巴基斯坦海军参谋长塔·卡·汗中将主持了欢迎仪式,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晚上,巴方又为欢迎代表团举行了丰盛宴会。会谈中我特别指出,巴基斯坦是我任中国海军司令员之后出访的第一个国家,同时我也是塔·卡·汗将军荣任海军参谋长后,被邀请和接待的第一个外国海军司令员。访问期间,我还拜会了国防部长塔尔善尔、空军参谋长沙朱姆等陆、海、空高级将领。齐亚·哈克总统接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并亲自授予我一枚“卓越勋章”。

巴基斯坦海军有1.5万人,作战兵力统由舰队司令部管辖。卡拉奇位于南部阿拉伯海海岸,是全国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也是最大港口和唯一的海军基地,舰队司令部、基地司

令部、海军院校和训练机构、造船厂等均设在这里。

在卡拉奇,我们观看了巴基斯坦海军舰队的演习,参观了军事院校、海军基地、海军航空兵中心、瓦赫兵工厂、卡拉姆飞机大修厂和卡拉奇船厂。巴称自己的海军为小海军,装备来自外国。但参观了他们的舰队、院校和船厂,颇受启发。我们乘上旗舰“巴布尔”号驱逐舰,出海观看了巴海军舰队演习。来自法国的潜艇、英美的驱逐舰和英法的特种飞机,在航率都比较高,装备也管理得好,使用寿命长。这些都引起我的兴趣和思考。

在我看来,最能显示其训练水平的表演有两项:一是云雀式直升机着舰;一是海上航行中补给。后者是把一根粗缆索用发射枪抛到与补给舰并行的驱逐舰上,两头系紧,通过两舰间的缆索转移人员和物资。按当天的海情,难度较大,可都顺利完成了,说明巴基斯坦海军官兵训练有素。这种素质,与巴海军院校教育与部队军事训练分不开。靠一套完整的教育训练体制来保证,使人才的使用和培训紧密结合起来。他们的军官实行任期制,在海军各兵种间广泛交流。他们特别注意不使军官长期离开海上,以保持在海上的工作能力。

巴基斯坦海军对军官的培养,大体是英国模式。海军新学员先到海军学院进行基础教育,学习两年,包括半年海上实习,然后分作战、工程和电器、后勤和秘书三类,分别在海军学院、海军工程学院、后勤秘书学校继续培训二至三年。士兵是从受过10年教育的青年中招募,集中在喜马拉雅训练中心训练,每年招两期,每期训半年。为保留部队基层技术骨干,从士兵中挑选10%至15%的人员,培养为士官,合同期为14年,期满后还可以订为期五年的合同一至两次。士官每服役五年,受一次训练;士官待遇也很高,服役时间也长。装备的

管理使用,靠的就是这一支技术骨干队伍。

1983年11月20日,我们圆满地结束了访问,离开巴基斯坦,抵达了孟加拉国首都达卡。

孟加拉国1975年同我国建交,两国关系很好。我们受到了孟加拉国海军参谋长阿里·汗的热情接待。我拜会了总统乔杜里和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兼武装部队总司令艾尔沙德、国防秘书隆迪克、空军参谋长苏尔坦、陆军参谋局长努尔丁、政府部长乔杜里等高级官员,参加了庆祝武装部队日活动,还参观了国防参谋学院。

孟海军集中于东南部城市吉大港。阿里·汗将军陪同我们到吉大港参观海军基地和海军训练中心,乘驱逐舰观看了海上演习。

这次访问巴、孟两国,增进了友好合作关系,我们也从中学习了他们海上航行补给、舰艇管理和教育训练等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达到了预期目的。

1984年11月2日至22日,我又率领海军代表团,路经西德,访问了英国和南斯拉夫。

出访英国,是应英国海军参谋长菲尔德豪斯上将的邀请。当时,中英两国在香港问题上已发表了联合声明,有必要保持两军的友好交往。英国海军具有丰富的建军经验和较先进的装备,乘此机会,也可加深了解和学习。

代表团途经西德时,受到西德海军的热情接待。11月2日抵达当晚,西德国防部派直升机去法兰克福接我代表团到了波恩。第二天是休息日,但仍由海军监察长(相当于海军司令)贝特格中将在国防部与我会见,并安排我团全体成员同他及副监察长兼参谋长维勒斯霍夫少将和负责作战计划、后勤和技术工作的三名上校一起见面。贝特格中将亲自介绍了西

德海军的情况。4日晚,西德海军监察长夫妇宴请代表团,国防部政务次官派军事秘书出席作陪。西德军方这次接待规格很高。过去,我国与西德军方只有一些军事体育代表队往来;这次实际上是西德接待的我军第一个军事代表团,表明他们希望加强两军之间的友好关系与交往。

11月5日,我们代表团抵达英国首都伦敦。

英海军参谋长菲尔德豪斯上将亲自到机场迎接。英方对我团的接待礼遇周到,态度热情友好。到达后,安排我检阅了英海军仪仗队。菲尔德豪斯上将还两次在家中宴请我代表团。他表示: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是十分明智的行动,希望中英两国长期友好合作,这不仅符合两国利益,也符合东西方绝大多数国家的利益。

武装力量国务大臣斯坦利先生,也会见了我们代表团。负责武装力量的议会政务次官特雷夫加恩勋爵,会同海军委员会主要成员,为我代表团访英举行了晚宴。

英海军总兵力7万多人,规模不算太大,但是装备现代化程度高;相应的指挥设施、人员培训、驻屯工程、装备维修、技术勤务保障、后勤供应等,都完整配套,能形成顶用的战斗力。这次,英方还第一次安排中国海军将领参观了克莱德核潜艇基地、“勇敢”号攻击核潜艇、诺思伍德的英国舰队司令部地下作战指挥室(同时也是北约东大西洋指挥中心)、德文港的攻击型核潜艇修理与更换核燃料中心,以及“无畏”号航空母舰等。这些装备与设施都具有世界先进水平。

印象比较深的是参观克莱德潜艇基地。该基地是英战略核潜艇、攻击核潜艇及常规动力潜艇大队的母港。基地司令员为准将,拥有3500名现役军人,其中大半在艇上工作,有4000名左右文职人员做岸勤保障工作。码头长600米左右,

指挥楼、训练设施(核导弹、核动力、操纵、作战指控都有模拟训练器)、修理所、浮船坞、仓库等一应俱全。油库和军械配置在基地以外的附近地区。基地可保障驻泊潜艇的人员训练和技术器材,使潜艇随时进入备战状态,并为潜艇及基地各类人员及其家属提供生活保障。

在该基地,我们参观了“勇敢”号攻击核潜艇。这是英国第二艘核潜艇,也是首艘采用英自行研制设备的核潜艇。这种潜艇,一般只需要19周时间,就可做好技术状态的维修检查及艇员的训练考核,完成出航与作战准备。系泊在码头的“北极星”导弹核潜艇主人没有带我们参观,只作了介绍,该艇所有军官或高级士官,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工程师,每艘艇都有“两班人马”。潜艇大队部很精干,只配18名军官,负责抓训练和技术保障,不负责作战指挥。

参观该基地后,我得到一个启示:海军的现代化建设,既要有先进的技术装备,又要有配套完整的基地建设,才能形成强大的战斗力。联想我国的核潜艇及其配套的保障条件、安全措施,当天晚上我几乎一夜未成寐。第二天吃早饭时,我向随访的海军装备部长郑明交代,回去后一定要把核安全机制建立起来。我国自己的核潜艇一定为国争光,不能给国家添乱。

访问中,我仔细考察了英国海军领导指挥体制。

英国海军指挥层次,海军参谋长和海军参谋部、人事部、舰队支援部、海军装备总监部为第一级。舰队司令部、本土司令部及海航司令部并列为第二级,舰司主管海上作战,本司与航司负责训练与勤务保障。三个海军军区(基地)及各分舰队司令部列为第三级。战时,作战部队直接受舰队司令部指挥;平时,在港驻泊或在修舰艇的部队,受海军军区管理。仓库、供应

单位、修船厂、院校、兵站等,统归所在海军军区管理,但经费、物资、业务工作等,则是按业务分工,直接由第一级领导。

据我了解,英海军组织体制有几个特点:一、战时指挥层次为三级;二、海上指挥与岸勤工作分开;三、海军参谋部、舰队司令部两级着重抓作战训练、战役战术演习和海上执勤;四、人事工作从选配、升调、培训、福利、保健统一由海军人事部负责;五、装备修理、物资供应由舰队支援部负责业务领导和财务保障,其基层单位的军事、行政管理全由本土司令部和海军军区负责。他们指挥层次少、海上指挥与后勤保障分别由舰队司令部和海军军区负责等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英国海军非常重视训练和院校建设。马岛战争后,英海军将领认为,“现代战争一半靠武器,一半靠掌握武器的人,掌握武器的人更重要一些”。他们的院校培训体制,大体分为三级,和我海军相类似。但是,他们人员的职务经常变动,一般在一个岗位上任期二至四年。职务变动前,要经过与将担负职务相应的专科进修学校或专题进修学程的训练。英海军在其院校中广设这种专科进修班,一般学制不长,采取因人施教。

我还注意到,英海军把官兵的培养训练与使用紧密结合,使培训和选拔人员成为一个科学的循环过程。英舰士兵退出现役,要提前12个月申报批准,12个月后,老兵一走马上可以补人一名相同专业的士兵。这种安排解决了院校与部队、单个与整体训练相衔接的问题,舰艇海上合同训练的起点高。我们也正在探索这方面的经验,这是一项大工程,必须综合治理,统筹解决。另外,不少专科进修班,既担负培训军官、也担负培训士官和士兵的任务,充分利用各院校已有的教学设备和专业教员。

在训练方面,英海军部队也是有步骤有分工的。舰艇上,不论军官还是士官、士兵的单人技术训练,主要靠岸基学校解决。所有经建造或改装出厂后的舰艇,都必须在训练基地进行单舰训练;在航的舰艇,每年都要返回该基地,进行“海上复训”三至四周。通过上述训练,使全舰人员成为一个协调一致的整体,并按舰队司令部统一的标准进行检查考核后,编入战斗序列。编入战斗序列舰艇的训练,主要是参加海上演习。训练和作战结合起来管,从海军参谋部、舰队司令部到各分舰队司令部,都设有专门分管训练的首长和机构。

会谈中,菲尔德豪斯上将从马岛海战的经验出发,强调了海军装备发展要抓好航空兵、水面舰艇和潜艇的协调。他说,没有核潜艇和舰载“鹞式”飞机,打不赢马岛战争;核潜艇和常规潜艇都要加强,使对方的潜艇、舰艇受威胁。他特别强调海军自己要有航空兵,以保证水面舰艇和潜艇的活动。他介绍说,“鹞式”战斗机在马岛海战中起了关键作用,抗击了来袭的飞机。原来设计主要是截击轰炸机和侦察机,后改进了机载雷达,使之可以进行空中格斗。他认为,水面舰艇要有多层次防空体系,除预警飞机与战斗机外,舰上应配有远、中、近程导弹;近程防御用小口径舰炮系统及电子战系统,能对付多目标,具有快速反应能力。

英国海军舰队司令部位于伦敦北郊。据舰队司令部参谋长韦伯斯特少将介绍,该司令部既是英海军及协同海上舰艇作战的英空军的指挥部,也是与北约协同的海、空军指挥部。在总作战指挥室,我们看到了可显示所辖战区战役态势的大屏幕;在潜艇、舰艇、空军与航空兵各兵种作战值班室,设有电话与计算机终端。参观后,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布局很合理,计算机先进,现代化设施完备,利于首长和司令部工作。

访问期间,英方还专门安排了后勤和装备方面的参观与座谈。在英国国防部销售署安排下,参观了新服役的孔雀级首艇“斯塔林”号巡逻艇和巴尔斯特劳德(潜望镜)、马可尼(水雷、鱼雷)等十多个公司,促进了双方友好合作。特别是参观“斯塔林”号巡逻艇,受启发很大。该型艇是英国派驻香港的海军主力舰艇,1981年专此订购的,我们访问时刚完工。艇上有先进的光电探测与武器系统,简洁流畅的外形设计,宽紧搭配得当的总体布局,实用可靠的动力推进系统,舒适周到的居住条件,给人一种舒畅的感觉。我当即想到,香港回归时,驻港海军舰艇装备一定要在战术技术性能水平上超过英国这一型巡逻艇。后来,我国新研制的导弹护卫艇,经过海军进行招标择优,成为完全国产化的战术技术性能与生活居住条件兼优的新一代战艇,终于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被派驻香港,是驻港舰艇大队的主力。

总的感觉,英国海军人数不多,组织精干,部队素质好,装备技术现代化水平较高,各级指挥所都实现了现代化、自动化。我觉得,这些参观对我们海军搞训练、办院校、推行现代化建设很有启发。

“马岛之战”中,英国为什么取胜?这是出访前我脑海里的一个问题。通过这次访问,我找到了答案。

结束了英国的访问后,我们代表团紧接着又访问了南斯拉夫。

这次访问,我们是应南斯拉夫副总参谋长莱蒂察海军中将军的邀请。访问期间,莱蒂察中将军亲率海军各方面领导到机场迎送,并两次与我会谈。对于中国海军代表团的这次正式访问,南斯拉夫视为“两军关系全面发展的重要标志”,上下都很重视,非常热情友好。我会见了南斯拉夫军队的总长、副总

长、沿海军区司令、海军部长、海军技术部长等领导人。

南斯拉夫的海军规模较小,其兵力全部配置在亚得里亚海沿海地区,直接受总参谋部指挥。我们参观了他们的主要装备和三个海军研究所、包括四所院校的海军院校训练中心,以及两个造船厂。让我感动的是,参观海军水文地理研究所时,正是星期日,他们却安排全所人员照常上班,并热情向我们介绍有关情况。

南斯拉夫处在东西方的中间地带,政治环境微妙。这种局面,既给他们带来许多特殊压力,也带来一些外交的弹性。这种弹性尤其反映在军队的武器装备上。他们既购买苏联的导弹、潜用鱼雷、海军直升机等,又购买美国的空投鱼雷,瑞典的火控系统、舰炮、电子设备,西德的高速柴油机、潜艇电池、声纳,英国的燃气轮机、潜望镜等,同时,靠自己的能力,也自行设计制造潜艇和快艇。

莱蒂察中将陪同我们参观了一个武器装备展览馆,并亲自介绍海军装备情况。有意思的是,他们把现役装备的样品及模型,全都集中陈列在这个展览馆里,既供内部教育,也供外国代表团参观,争取出口。

这次对英国和南斯拉夫的出访,历时 21 天。代表团结合我海军建设中的实际问题,有的放矢,勤问多记,很有收获。回国后,整理了近 5 万字的情况报告。12 月 1 日,由李耀文政委主持会议,我用了六个小时,向海直二级部以上干部介绍了出访情况,以期借鉴外军先进经验,推动我海军现代化建设。

1985 年 11 月,我又率海军代表团,应邀访问了法国和美国。

应法国海军参谋长莱恩哈特上将的邀请,我们于 11 月 2

日抵达法国。

在西方大国中,法国是第一个同新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同我们开展军事友好往来的国家。1978年以来,法国有三批四艘军舰、1000多名海军官兵访华。无论是舰船批次,还是舰员人数,在来访的外国海军中均属首位。1985年7月,在莱恩哈特海军上将亲自关心下,法国海军派出了优秀的海军军官梅雷尔中校来华,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军事学术讲学,效果不错。我们海军也多次派出技术考察、友好访问团、组,参观法国武器装备展览和进行访问。

我代表团到达后,法国军方非常重视。莱恩哈特上将在海军参谋部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鸣礼炮19响,并向代表团介绍了法国海军的情况及发展规划。在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法海军总监(五星上将)、国防部长办公室主任、外交国务副秘书长、航空总局董事长(退役上将)等高级将领和访问过中国的官员出席作陪,气氛十分友好。他还亲自陪同我代表团参观了一天,并与我就双边关系和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法国防部长基莱斯也会见了我们,并亲自邀请我作为第一个外国海军司令,参观法国海军的弹道导弹核潜艇。

参观法国海军长岛导弹核潜艇基地那天,海军潜艇部队司令、海上战略部队司令科阿塔内阿少将,专程从巴黎飞抵长岛欢迎我们,并亲自介绍了核潜艇部队的情况。我们参观的是当年4月1日服役的法海军第六艘导弹核潜艇“刚毅”号。原来法国方面只安排我一个人带译员参观,后来,按我方意见,同意增加我海军副参谋长徐振忠、核潜艇基地司令员朱意达一同参观。在导弹核潜艇上,我们看了鱼雷、导弹、中央指挥、仪表、生活和常规动力等舱室,他们介绍了潜艇动力、导航、探测及武器系统的情况,并一一回答了我们提出的问题。

代表团还访问了法国海军的布勒斯特第二海军军区(兼大西洋舰队)和土伦第三海军军区(兼地中海舰队)以及洛里昂海军军分区,参观了法海军军官学校、训练中心、军需供应中心、反潜护卫舰、常规潜艇和超级军旗式战斗机、超美洲虎型、反潜型海豚直升机以及“幻影 2000”、“幻影 4000”等性能先进的飞机,观看了“三伙伴”型猎雷舰海上猎雷和 100 毫米炮精度射击表演。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法海军各级组织机构精干,指挥灵便,工作效率高。法海军总人数为 6.8 万人,其中军官只有 4200 人,其余人中,士官约占 50%。法海军由海军参谋长统辖,下设一名常务副参谋长和四名副参谋长,分别负责作战、计划、装备和后勤。编成战略海军司令部(导弹核潜艇)、大西洋和地中海两个舰队、常规潜艇司令部、海上巡逻机司令部。指挥层次从参谋部到航空母舰、巡洋舰,中间只有舰队司令部一级,护卫舰以下舰艇,再经过分舰队一级。法海军第二军区司令科比埃中将,在介绍其组织机构设置时谈到,机关不能庞大,机关人数太多,就不是为了工作运转,而会形成各个部门互相服务的局面。科比埃中将还兼任大西洋战区司令、大西洋舰队司令,负责战区作战指挥、领土防御和海洋事务。职务多,任务重,却只有一套办事机构,共 120 人,其中 45 名军官,70 名士官,五名士兵。他们的基层部队编制也很精干,如 4500 吨的“蒙卡尔姆”型反潜护卫舰,编制人数共 230 名,其中军官 18 名、士官 116 名、士兵 96 名(两架舰载直升机的 15 名机组人员也包括在内)。

在人员培训方面,严格、正规,培养军官的计划性很强。海校学员的来源,一是从地方高中毕业生中考取 500 名,先进预科学校学习两年,再从中选拔 70 名正式入海校培养。二是

从已服役七至八年的士官中考试选拔 30 名,直接进海校培养。海校学制两年,实行海军基础通科培训。海军军官都要经过正规学校培养,随职务的提升和变动,经常进行短期培训。

法海军发展武器装备的指导思想,是基于估计 50 年内不会发生世界大战,国防力量维持现有水平,保卫法国安全和维护法在海外利益为前提。同时,法还认为现代技术发展很快,现有装备 20 年后就会落后,所以不主张大量生产现有装备,而是着眼于研究新式现代化装备,有计划有步骤地更新换代。访问期间,我会见了法国防部武器装备部、航空总局和汤姆逊、马特拉、纳富科等公司的领导人,他们详细介绍了生产的武器装备情况,表示愿意发展与中国的合作。

经过 10 天很有成效的访问,1985 年 11 月 12 日,我们离开巴黎,乘机飞往美国。

我们是应美国海军部长莱曼、作战部长沃特金斯上将和陆战队司令凯利上将的邀请而来的。11 月 12 日下午 2 时,飞抵纽约肯尼迪机场,然后改乘美海军专机离开纽约,下午 4 时抵华盛顿。美海军作战部长沃特金斯上将和夫人,亲临安德鲁斯空军机场欢迎。代表团下榻在华盛顿海军军区大院贵宾馆。当晚,韩叙大使在中国大使馆设便宴招待了我们。

13 日,沃特金斯主持了隆重的欢迎仪式,鸣礼炮 19 响,并陪同代表团到五角大楼活动了一天。在五角大楼,我会见了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克劳上将,会见了美助理国防部长阿米塔奇,并与沃特金斯举行了会谈。在海军指挥中心,他们介绍了有关情况。海军作战部各部门负责人分别与我代表团成员会见,还设晚宴招待代表团一行。

第二天,美方安排我们参观海军研究实验室。该室是第

一次对中国军人开放。随后,到了陆战队司令部,与凯利上将会见。凯利上将和全部助手出席了这次会见,他们介绍了陆战队情况,并设午宴欢迎我们。下午,乘直升机去安纳玻利斯海军学院参观,受到校长拉森少将的热情接待。在华盛顿,美国海军领导人热情友好,让人感受到对我代表团来访和中美两国海军友好关系的重视。

15日,乘专机离开华盛顿,去墨西哥湾的基斯勒空军基地,沃特金斯上将到机场送行。抵达基斯勒基地后,我们参观了英格尔斯造船厂和正在建造的美国最现代化的“CG-47”级导弹巡洋舰。该舰的使命是参与航空母舰战斗群和水面舰艇战斗群行动,装有能满足超视距反舰和对岸攻击的“战斧”巡航导弹,还有可监视较大空域、控测跟踪多个目标的“宙斯盾”系统。次日,又乘专机抵基韦斯特。莱曼夫妇结束国外访问回到基韦斯特后,即赶到机场迎接我代表团,并在该地与我会谈;随后,陪同我参观了导弹水翼艇、航行表演和游艇比赛,并主持了欢迎宴会。

17日是星期日,主人为我们安排了一次轻松的活动:游览迪斯尼游乐场。上午9时,乘专机离开基韦斯特去奥兰多,韩叙大使随机同行。在迪斯尼游乐场,我第一次领略高科技对游乐活动的创造性,既丰富多彩,又新颖刺激,代表团成员玩得都很尽兴。

第二天上午,在奥兰多参观了海军训练中心和勤务学校。下午,乘专机抵达圣地亚哥。太平洋舰队航空兵部队司令塞维斯中将、水面舰艇部队戴维斯中将、圣地亚哥基地司令波兰得准将到机场欢迎。

在圣地亚哥基地,用两天时间,访问了北岛航空站、海军站、反潜作战训练中心、米拉马海军航空站、帕莫拉通用动力

公司,参观了反潜直升机,“DDG-994”导弹驱逐舰,“FFG-37”导弹护卫舰,“F-14”、“F-18”战斗机,“E-2C”预警机和“密集阵”生产线。

11月20日晚,乘专机离开美国大陆,抵达夏威夷。在这里,我会见了美太平洋总部司令黑斯上将、太平洋舰队司令莱恩斯上将和第三舰队司令兰维尔中将。他们分别设宴欢迎我们,并安排我们参观了珍珠港、“印第安纳波利斯”号核潜艇、“亚利桑纳”号战列舰纪念馆、第一陆战两栖旅和轻武器射击表演等。这次访问,会见美军方高级将领和参观项目数量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

在夏威夷,越过太平洋向西远眺,中国大陆已经遥遥在望了。11月23日,我们乘坐“PA831”航班,经东京返回北京。

在这几次访问中,我们贯彻军委指示精神,积极沟通我国对外方针政策,多做友好工作,会见了部分老朋友,也结识了一些新朋友,增进了相互了解和友谊。同时,开阔了视野,学习了国外海军建设的经验,对我海军现代化建设大有裨益。尤其美国海军经过几十年建设,已形成了与其大国地位相称的现代化海军,但仍在锐意进取,不断创新。由此我深深感到,中国要建立一支强大的具有现代战斗能力的海军,还需要博采众长,狠下功夫。

中美舰队相遇太平洋

1985年11月,中国海军组织了首次军舰编队出访外国的活动。

早在1983年,巴基斯坦海军“塔立克”号驱逐舰访问了上海。当时,巴方多次邀请我国派军舰回访。我也认为,在充分

准备的前提下,适时组织军舰出访,不仅完全可能,而且在现代国际交往中很有必要。既可以加强与友好国家往来,增进了解和友谊,扩大影响,还可以开阔眼界,锻炼部队远航的组织指挥能力,检验装备性能。1984年10月29日,海军向中央军委请示,准备在1985年第四季度,组织海军舰船出访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孟加拉三国,很快得到批准。

在总参谋部批准的出访具体方案中确定:此次出访为友好访问,编队名称为“海军友好访问编队”,出访舰船为一艘导弹驱逐舰和一艘综合补给船,共512名官兵,包括随舰实习的舰艇长、航海长和海军院校学员、海直机关人员。编队指挥员为东海舰队司令员聂奎聚,编队参谋长为东海舰队副参谋长李俊才。出访时间拟于1985年11月16日启航,历时62天,总航程约1.24万海里。

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孟加拉三国,均属第三世界国家,中国人民海军与上述三国军队也早有友好交往。早在60年代和70年代,人民海军的有关院校和训练单位,曾为三国海军培训过海军指挥和技术军官。这次人民海军的首次专程出访又选择了上述三国,这说明中国十分重视与他们发展友好关系。当他们得知中国军舰出访三国意图后,立即表示欢迎,并热情相邀。

尽管我们有一些远航经验,但组织军舰编队出访,毕竟是人民海军组建以来的第一次,直接关系到国威军威。海军的请示报告得到中央军委和国务院批准后,我立即指示东海舰队着手进行各项准备。主要工作有:成立出访编队指挥所和编队临时党委,设指挥、外事、后勤保障三个组;出访舰船进行修理、增装和改装;制定航行计划及进行航海、通信等保障设备、仪器的安装调试;航海、通信等各类专业人员的集训,包括

熟悉国际信号、统一机要文书及海上补给训练；人员定编及形势、政策、纪律教育；拟定外事活动计划等，同时筹措礼品和纪念品。针对被访问国的习惯，还专门训练了做清真菜的炊事员，采购了多种清真食品；调集物资、体格检查和预防接种；组织军乐队、仪仗队并普遍进行军容礼仪训练；以安全为中心开展“预想”活动；组织适应性远航训练等等。我和李耀文政委及张序三副司令员，直接检查了各项准备工作。

1985年11月16日，“海军友好访问编队”离开上海；20日抵达湛江；23日从湛江起航，27日抵达马六甲海峡；29日16时，进入了浩瀚的印度洋。这是人民海军第一次进入印度洋。为了纪念这一时刻，编队进行了庄严的海上阅兵。

12月8日晨，编队顺利驶抵巴基斯坦卡拉奇。在离卡拉奇还有20海里时，巴基斯坦派出两艘驱逐舰和两艘猎潜艇前来迎接。两国海军编队会合后，在巴海军编队护航下，中国海军编队在21响礼炮和军乐声中，徐徐驶进了卡拉奇港，受到巴海军基地司令等人的热烈欢迎。

在卡拉奇，进行了五天访问。中国海军官兵参观了巴基斯坦海军学院、海军工程学院、水兵训练中心和游览地，受到巴军民的热情欢迎。在首都伊斯兰堡，巴基斯坦海军代理参谋长马立克中将接见聂奎聚时说：“中国海军把巴基斯坦作为首次出访的第一个国家，这就是巴中友谊的最好证明。”

12月13日，编队离开卡拉奇，驶向斯里兰卡的首都和第一大港科伦坡。

18日至21日，中国海军官兵在斯里兰卡方面的热情接待下，游览了中部古都康提；观看了斯里兰卡海军文艺演出；双方还进行了篮球、乒乓球友谊赛。

在中国编队招待斯里兰卡各界知名人士时，中国人民的

老朋友、前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也应邀出席。中国海军编队人员还参观了佩拉德利亚热带植物园。1957年,周恩来总理访问斯里兰卡时,在园中亲手栽下了一棵紫葳树,1977年邓颖超访问时,为这棵树浇了水。如今,这棵树长得枝叶婆娑,生机盎然,斯里兰卡人民把它看作是中斯友谊的见证。

从12月26日起,中国海军编队用四天时间,访问了孟加拉国最大的海港、第二大城市吉大港,受到了孟加拉海军舰队、基地司令和官兵的热情欢迎。

孟加拉国总统兼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艾尔沙德,在首都达卡接见了编队指挥员聂奎聚,称中国海军这次访问,“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性事件”。

12月30日,“中国海军友好编队”圆满结束访问,满载南亚三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启程返航,并于1986年1月19日顺利返回上海。

这次访问,增进了友谊,扩大了人民海军在国际上的影响。

巴基斯坦海军官兵说:“中国是巴基斯坦忠实的朋友。在巴基斯坦最困难的时候,中国支持了我们,巴基斯坦为有中国这个伟大的朋友感到骄傲。”

在中国驻斯大使举行的宴会上,斯里兰卡国防部常务秘书阿提加勒上将说:“早在15世纪,贵国的郑和就率领船队到达斯里兰卡,播下了中斯两国人民友谊的种子。”斯里兰卡海军司令西尔瓦少将说:“中国海军建立36年后才首次出国访问。我们盼的时间太长了。以后希望你们接踵而来,成为一个惯例。”

孟加拉《每日生活报》发表评论:“中国一贯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进行真诚合作,以便消除那些地区的贫困,使他们能

够得到迅速发展。”

访问期间,中国编队军舰第一次向国外各界人士和华侨开放,请他们登舰参观。一些老华侨看到祖国自己建造的军舰后,激动得老泪纵横。编队官兵在与三国人民的广泛接触中,深切感受到三国人民对我国真挚友好的感情,感受到海外侨胞的赤子之心,并对南亚三国的海军建设获得深刻印象,增长了见识。

这次访问,途经五个海区,穿越了七个海峡,往返1.2万多海里,共进行各种外事活动208项。通过远航,锻炼了部队,检验了现有装备,积累了经验,有效地提高了干部组织指挥能力。编队离开湛江进入南海时,曾遇到25号台风,他们果断修正航线,成功地避开了台风中心。返航进入南中国海时,又遇到大风浪,经三天艰难航行,终于冲过巨大涌浪区,摆脱了险境。驱逐舰主机连续工作最长的一次达300小时,在我水面战斗舰艇的航行史上是第一次。这次远航,还进行了多种形式的补给,并第一次取得了七八级海情下两次海上纵向加油的成功。远航中,还首次搜集了马六甲海峡和印度洋的水文、气象等资料,成功地在印度洋海区与祖国进行了通讯联络。实践再次证明,国产装备具备了出远海闯大洋的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返回途中,出访编队在南中国海公海海域,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海上编队相遇。

这是一次偶然相遇,但这也是一个很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在郑和时代,中国曾有过辉煌的航海史,但随后的数百年间,却自缚手脚,实行闭关锁国的“禁海”政策,使中华民族远离了大海。正因为如此,近代史上,我们才有了一次次惨痛的来自大海方向的打击和屈辱。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开放视野,敞开胸怀,扑进了大海的怀抱,人民海军也由小到大,由弱到

强,逐步成长壮大。虽然,和现代强国的海军相比,人民海军还有不少差距。但我们的舰队终于驶离海岸,走向近海,来到了大洋。

在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相遇中,我出访编队与美海上编队进行了友好交往活动。

两个编队相遇后,双方编队领导人互致了问候。聂奎聚在与对方舰艇司令韦伯斯特少将通话中说:继1984年美海军莱曼部长访华,去年11月,中国海军刘华清司令员也出访美国。这次,我们两国海军编队,又有机会进行海上友好会见,这将有助于我们两国海军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并将载人两国海军友好交往的史册。韦伯斯特少将说,他对今天所见到的中国海军军事素质尤为赞赏,并且希望这次中美海军的海上友好交往,仅仅是个开端。

随后,双方成纵队,在海上同向而行,双方官兵列队互相致意。在他们身后,两条平行的白色航迹,翻腾着美丽的浪花。

这次中国海军编队出访,也引起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合众国际社的评论很有代表性,他们认为,这次访问行动,是“中国决心把它的以海岸巡逻为主的舰队扩建成‘深水’远洋舰队”。

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是海洋大国。因此,中国海军,自然要具备相应的战略眼光和战斗能力,充分保护自己合法的海洋权益。

第十九章 到军委工作

七十受命

按照中国人的说法,人活七十古来稀。

1987年10月,我已经71岁。我们这些从战争年代过来的人,能跨越古稀之年,值得庆幸。漫长岁月里,许多年纪相仿的战友,有的在枪林弹雨中倒下,有的被疾病拖垮,我不仅熬了过来,而且身体状况不错。不过我很清楚,长江后浪推前浪,为了海军事业的发展,作为海军司令员,该交出“接力棒”了。我作好了退休的心理准备。

命运却给我作出另外的安排。

1987年11月18日上午,我被召唤到小平同志家里开会。

这是一次小型会议,除小平同志外,还有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紫阳、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候。半个多月前,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三届一中全会。小平同志以革命家的气魄辞去中央政治局常

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等职务,但是,党和人民对小平同志十分爱戴和信赖,虽然同意了他的辞呈,仍然一致选举他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因此,这次小型会议,小平同志是以军委主席的身份主持的。

小平同志第一句话,就是指着洪学智和我,问赵紫阳和杨尚昆两位副主席:“他们两个人的命令下了没有?”

杨副主席回答:“下了,都已经签了。”

“老师们看了没有?”

“正在几个老师那里传阅。”

接着杨副主席对我和洪学智说:“军委决定,调你们两个来,担任军委副秘书长。”

听到这个消息,我大为意外。

这时,小平同志指着我对大家说:“调他来,就是抓现代化,抓装备。”

小平同志接着说,新一届军委班子,将由有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副秘书长、军委委员以及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总后勤部长、国防部长组成。“军委的工作,紫阳要多做,多认识点干部,首先是军以上的干部。以后军委一般的决策,赵、杨商量,紫阳决定。”

两位副主席马上表示:大事还是邓主席定。杨副主席说:“小平不下,军队稳定。”

小平同志笑笑:“十三大选举的结果好。”

接着杨副主席汇报了部队学习十三大文件的情况和一些大军区、军兵种的干部调整方案。谈到了军队准备实行军衔制度的问题。杨副主席说,这涉及到很多老干部,问题很大。

小平同志态度坚定:“这个问题不能拖,步子快点,要用制度来解决,有骂娘的让他骂去。军队减100万,军费控制,是

我定的。现在机关太大,要减,从三总部做起,三总部机关构成不合理,要选些军长来当部长,有些人知识少、素质差,要调整。”

小平同志特别强调:“从现在着手,两年内找一批年轻的干部接班。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四十多岁。黑格少将四十几岁当欧洲司令。论资排辈要打破。要选十来个对象培养,要快,要讲阶梯,军队不能在老人堆里打圈子,军队要年轻。”

小平同志严肃地对我说:“调你到军委来工作,就是考虑到军队要搞现代化,现在全军熟悉科研装备的就你了。调你来就是抓装备,抓现代化!”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种高层会议,简短,务实,加之小平同志那种高屋建瓴举重若轻的领导风采,给我留下极深印象。坦率讲,我是七十出头的人,历阅过人间万象,也指挥过千军万马,但每次见到小平同志,都会从心底产生一种难以言喻的敬畏之感。我在作好退休准备的时候,却突然被委以重任,不由得百感交集。我很清楚,在一个平稳发展的国度里,像我们这种年纪的人,不应该继续占据高位,但中国的情况特殊。改革开放不久,社会变化急剧,经济和政治体制都需要在摸索中不断调整,社会也需要稳定。在这种情况下,老同志的威望和经验能起到其他人无法替代的作用。我同样清楚的是,小平同志对人民军队充满无限厚爱。他在考虑军队的接班人和长远建设。今后的工作方向已经明确,我别无选择,唯有埋头苦干,鞠躬尽瘁。

11月21日,党中央作出决定:“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兼任军委秘书长;洪学智、刘华清任军委副秘书长。”

同日,军委邓小平主席签署命令:“任命济南军区政委迟

浩田为总参谋长；任命北京军区政委杨白冰为总政治部主任；任命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副政委赵南起为总后勤部长。”

军委催我报到。海军新司令员还没确定，我只好先搬到“三座门”办公，两边跑。

11月30日下午，杨尚昆副主席召集了新一届军委班子第一次会议，安排军委工作。参加会议的除我之外，有洪学智、秦基伟、迟浩田、杨白冰、赵南起和军委办公厅主任刘凯。

杨副主席讲了几层意思：

一、军委组成人员调整后，军委领导工作分两个层次：一是军委主席、副主席；一是军委秘书长、副秘书长。根据小平同志指示，军委工作由紫阳同志主持，重大问题要请示小平同志。军委秘书长、副秘书长人数少，不分工。军委日常工作由他和洪学智、我三个人研究处理，对各总部、各军兵种起领导作用。两位副秘书长也可以主持开会，研究工作，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起协调三总部的作用。

二、军委当前的主要工作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三大精神，深化和加快军队的各项改革。对军队的改革现在有两种观点：一是强调特性，一是强调共性。有的说“牺牲我一个，幸福十亿人”的奉献精神是共产主义要求，不是初级阶段的要求，说明存在一些糊涂认识。一定要认真学习十三大文件，提高理论水平，在理论问题上立场坚定。军队同样要深化改革，但要注意军队的特点。改革要有利于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而不能降低标准。要研究三总部有哪些需要改革的，全军有哪些需要改革的。小平同志几次讲，三总部的人太多，头重脚轻，要精简。总部下设的二级部，大军区也不一定都要有。下一步，对实行军衔制度、给老干部授勋、实行文职干部制度、住房制度改革、部队院校编制、科技装备管理体制等问

题,军委、总部要抓紧研究,提出方案。军委支持总部大胆放手工作。

三、军委办公厅要多做调查研究工作,对重大问题给军委出点子、当参谋,起咨询作用。

12月31日上午,新一届军委领导班子中,除赵紫阳副主席外,全体一起去小平同志家里拜年。小平同志已经83岁,但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和我们一一握手。

我们在客厅落座后,小平同志笑着说:“今天就是见个面,没有什么话要谈。”接着问杨副主席:“今后军委由紫阳同志主要负责,告诉大家了没有?”

杨副主席说:“都传达了。”

小平同志说:“紫阳同志对军队有个了解过程,军队他不太熟。应该把军以上干部都认识认识。”

由于是拜年,不需要讨论什么问题,谈话进行得很轻松。后来,小平同志突然谈到了总政的一个话剧,他说:“最近,听说有个写淮海战役的话剧,你们知道不知道?刚才我看到外电说,那个剧里讲淮海战役历史,说毛主席在指导上有错误,说我第三次给毛主席打电报,他才改变态度。意思是贬低毛主席,好像宣传我。这不符合事实。毛主席在三大战役的指导上,都是非常高明的,包括淮海战役,基本方针都是他定的。这个剧本这样写是歪曲历史了。在整个战役中,毛主席对我们所有的建议没有批驳过。对二野来说,上党、平汉两个战役是成功的、很了不起的两个全歼战役。那时我们参战的只有3万多人,连个完整的旅都没有,是临时集合起来的。对方不仅装备强,人也比我们多。这两个全歼战役,促成了‘双十协定’。毛主席离开延安前告诉我们,狠狠地打,仗打得越好,他越好办。”

小平同志兴致勃勃地回忆起二野部队打的仗。他说：“那时毛主席对前线是赞扬的，是信任的。所以这个戏反映得不确实。三大战役包括淮海战役，毛主席有个总体部署，有个电报。这样写不行，不符合历史，而且一定会有很坏的反响。1947年，毛主席下决心统一南方作战，成立总前委。总前委有五个人，我们的领导方法是，陈毅同志住在二野，渡江作战时我到三野与陈毅同志一起指挥。渡江作战的计划，完全是我们前线制定的，发了一个电报，毛主席就同意了。所有这些都是毛主席的决策，而且是非常正确的决策。当然，那个时候我们干得也不错。”

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小平同志站起身，主动提出和每个同志单独合影留念，大家非常高兴。

在这之后，我又专门去看望了徐帅、聂帅和程子华、余秋里等几位直接领导过我的老首长，向他们请教。

1988年1月14日，军委公布命令，免去我的海军司令员一职，由副司令员张连忠继任。1月29日，我参加了海军党委六届四次全会，和张连忠司令员进行了工作交接。宣读完中央军委命令后，我讲了一番话。这是即席讲话，没有稿子，但都是心里话：

“我在这里工作七个年头，大概五年半时间。在这五年多的工作中间，我个人感到工作很愉快，在上下左右同志的帮助下，也做了一些工作。海军这几年总的形势是好的。海军党委领导班子在过去历届海军党委、领导同志工作的基础上，使海军工作有所发展，有所进步。这是同我们所有同志的努力，特别是海军党委常委全体同志齐心协力，各舰队党委、领导和基地党委、领导所做的大量工作分不开的。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过去的几年也发生过严重的问题，事故也是突出的。对我

在任这五年多的时间里发生的问题,我本人总感到是个很大的压力。就我自己来说,工作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海军发生了一些严重问题,军委首长、总部首长,一方面在政治上对我们严格要求,一方面又对我们不断鼓励,使我们大家始终信心百倍地把工作做好。从我个人来说,这几年还是有很多长进的,向我们党委的同志,向舰队的同志,向下面的同志学到不少东西,增加了不少知识,我感到有进步,有收获,和大家一起工作很满意。这几年,上下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处理得很好。党委本身,机关各个部门,同舰队、基地的绝大多数同志之间,工作相互支持,大家心情愉快。这方面我感到很高兴。除了刚才说的工作上的失误以外,个人本身还有这样那样的一些缺点,在过去的工作中,在一些个别问题上处理得不够好,大家对我有意见请多批评。从这段情况来看,上面满意,我们常委之间满意,下面也满意,总的情况是好的,海军建设向前推进了。”

最后我强调说:“这几年海军建设有些成绩,很多是采纳了常委和各机关部门的意见,有些是采纳了舰队领导的意见,我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成绩不能算在我个人身上,这都是大家的。”我还讲到:“这几年,我向李耀文政委学到不少的东西。李政委政治上很强,思想水平很高,善于团结干部。我过去同很多政治委员搭班子工作过,但是我觉得我所遇到的政治委员中,李政委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比较强。海军有这样一个好政委,今后会把海军领导得更好。”

我知道,像我这样的年龄离开海军,不可能再有机会回来工作了。从陆军到海军,前前后后 20 年,而且三进三出。我热爱海军事业,急切盼望中国海军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强大起来。为了实现毛泽东主席、邓小平主席提出的海军建设目

标,我无愧地贡献了我所能做到的一切。

我离开海军,又换上了绿军装。

从海军来到军委工作,难免生疏。这时军委的工作格局和我当年任副总参谋长时又不同了。过去,副秘书长人数较多,一位副秘书长具体兼管一个总部和一个方面的工作。这种格局下,常因兼职面难以摆脱某些事务性工作。现在设立了专职副秘书长,其职责是向军委领导的决策提供及时准确的参考信息,以便使其有更多时间和精力认真研究全局性和战略性的大问题。

小平同志曾讲过一句令我印象深刻的话:“对那些老大难问题,老人们在,好解决一些。”我体会到小平同志对我们这些老同志的殷切期望,也深感到自己身负的重任。

为了行使好我们的职责,洪学智和我商量,决定从调查研究人手,尽快熟悉掌握情况。工作方法上,采取集体办公的办法:由我和洪学智两人,再加上军委办公厅刘凯主任和李际均、程建宁副主任。工作内容,主要是研究审批三总部及各大军区、军兵种报送来的大量文电,商议中央军委应该抓的工作并协调三总部之间的各种事情。

此后,我们分别听取了空军、第二炮兵、国防科工委、军事科学院等单位的工作汇报,又召集了几次座谈会,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我也找不少同志进行了个别交谈。总的印象是,部队建设发展的势头很好,广大官兵的积极性很高。但一些多年来在编制体制、干部制度、基层建设等方面遗留的问题暴露得越来越明显,必须进行改革,官兵也呼吁改革。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军队改革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效。巩固和发展改革成果,加速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势在必行。刚刚结束不久的党的十三大也要求我们,要以改革

来统揽全局。对我来讲,角色的变换,扩大了视野,对军队的全局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过去有句老话,叫“在商言商”。如果套用一下,也可以说“在军言军”。商人要讲利润,军人同样如此。军人的“利润”就是国家安全。任海军司令员期间,在保卫海防、维护国家海洋利益的能力上,我就有很强的紧迫感,现在到了军委,了解更多情况后,我的紧迫感更强了。我觉得,军队必须尽快改革,而且改革任务十分繁重和艰巨。

南沙自古属中华

到军委工作后,很快遇到了南沙问题的研究处理。

我在海军工作多年,对南沙一直非常关注。南沙群岛是我国南海诸岛中位置最南,分布范围最广,包括岛礁最多的一组群岛。它西濒越南,东近菲律宾,南望马来西亚和文莱。南沙海域是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重要通道,是我国经由南海与各国往来的交通要冲,是祖国南部安全的重要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南沙群岛的气候属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雨量充沛。岛上海鸟群集。海底栖生物丰富,水产种类繁多,是我国最大的热带鱼场。海域蕴藏着大量的矿藏资源,有石油和天然气、铁、铜、锰、磷等,其中尤以油气资源丰富著称。南沙自古就是中国领土,这一点,不仅我们有许多铁的证据,世界很多国家的地图也可以证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民党政府曾接管南沙群岛,将其划入广东辖区,并在太平岛上成立了“南沙群岛管理处”。可以说,南沙群岛的主权本无争议,但由于其重要军事和经济价值,早已为一些邻近国家所垂涎。自70年代以来,他们不断侵占我国南沙岛礁。我刚到军委工作时,这片美丽富饶的群岛中,除了我们占领的永暑礁、华阳礁

和国民党军队驻守的太平岛外,其余露出水面的岛礁几乎均被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侵占。他们的目的很明显,就是经济利益,特别是想争夺海底的石油资源。尽管我国外交部一再发表严正声明,表示强烈抗议,但侵占行为有增无减。尤其是越南,还在紧锣密鼓作准备,企图继续对一些不具备居住条件的岛礁进行侵占。

这是一个令人愤慨和痛心的局面。

1988年2月12日晚,赵紫阳副主席找我谈话,用很长时间谈到了南沙斗争问题。我向他汇报了南沙群岛的现状。

关于保卫南沙,我说,这主要是海军的任务。近些年,海军曾多次派出舰艇、飞机前往南沙巡逻、训练。今年上半年,还要应联合国的要求,完成永暑礁建设海洋观测站的任务。从军事斗争角度来看,我海军兵力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较大优势。不利条件是,我们远离基地,防空、补给和守护岛礁都不容易。不过,这些困难是完全能克服的。我的结论性意见是:为了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无论从当前还是长远形势看,都需要快速发展海军和空军装备。

我还谈到了在西沙修机场的事。邓小平主席在1974年就讲过,西沙机场以后一定要搞,那里位置重要,可以前伸到南沙,控制南沙。我说,现在机遇来了,关键是拍板和落实。

对我的介绍,赵紫阳副主席听得很认真,并问了许多问题。

他的意见很具体也很坚决:要表明南沙的领海主权是我们的。要在南沙加强我们的军事存在。要加强巡逻,以显示我们的国威、军威。

最后他说:“对这个方向斗争,要加强什么力量和建设,你们尽快研究写个报告给我。”

回来后,我嘱咐军委办公厅,把赵副主席的两次谈话要点整理出来,由我向总参、总后和海军等单位有关领导传达,研究方案部署,作好相应准备工作。

为了有理、有利和有节地斗争,我再次研究了南沙历史。

早在秦汉以前,南海群岛已见诸我国史籍。到了汉代,称南海为“涨海”。后汉《异物志》称:“涨海崎头,水浅而多磁石。”唐朝贞观元年(公元627年)设置崖州都督府开始,南海诸岛正式划归我国疆域,确立了主权。到了宋代,又用“千里长沙”和“万里石床”的称呼把西沙和南沙分为两个不同的岛群。明初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以及现代科学考察发现的遗址和人类遗物,也用不可争辩的事实说明,自唐宋以来,中国人民就在那里劳作生活,我国历届政府也对此地进行了行政管辖。

19世纪初期,西方帝国主义开始重新瓜分世界,越南变成了法国殖民地。法国殖民者贪婪的目光开始盯住了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整个南海诸岛,但找不到理由。日本帝国主义曾组织探险队,巡游南沙,设立公司开采磷矿,也为时不长。对法、日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我们不仅从没承认过,而且与之进行了坚决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和日本政府放弃了实行殖民政策时的对我国南沙群岛的领土要求,在他们的政府或代表政府观点的著作中,均承认西沙和南沙群岛是中国领土。1946年国民党政府派高级官员接收了南沙群岛。1947年又对东沙、西沙、中沙、南沙四个岛群及各岛、礁、沙、滩重新命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更是坚定地宣布,南沙群岛“向为中国领土”。此后至今,针对外国对南沙群岛主权的侵犯,中国政府一直申明中国对南沙群岛拥有不可侵犯和无可争辩的主权。

长期以来,中国和越南之间根本不存在领土之争。直到法国撤离越南后的1956年8月,南越西贡当局才开始派兵侵犯中国南沙群岛,十几年间侵占了十几个岛礁。1974年1月西沙海战之后,南越军队被我彻底赶出了西沙群岛,但其野心未改,紧锣密鼓地加紧了对我南沙群岛的疯狂占领。1975年越南统一后,越南当局公然背离历史,一反过去一直承认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属于中国领土的立场,非法侵占了中国南沙群岛中的一些岛屿,并两次发表白皮书,捏造种种借口,对中国的西沙和南沙群岛提出领土要求。

1970年7月和1977年10月,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也先后派兵侵占我南沙岛礁。目前,我国南沙群岛中的绝大部分岛礁已落入他国之手。甚至许多难以落脚的适淹礁,也由于其潜在资源的诱惑,成为各国继续争夺的对象。

1979年和1982年,越南当局曾两次抛出白皮书,试图利用一些所谓历史古籍,证明16世纪后期到18世纪末期,南方阮氏王朝曾派人到“长沙进行贵重海产开采,搜集资料和调查”。这如果不是他们对历史知识的无知,就是故意篡改。事实是,越南“历史古籍”中的“长沙”,其位置是越南沿海的一些岛屿和沙洲,根本不是中国的南沙群岛。何况,中国最晚是在公元1世纪前就已经发现了南沙群岛,比越南当局的“依据”要早1500年之多。白皮书中,越南当局还引用了一些19世纪后法国统治越南时的资料。这更是笑话。谁都清楚的事实是,法国入侵越南之前,南沙群岛早已是中国领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接收了南沙群岛,法国并没有提出异议。而在1933年,法国出兵占领南沙群岛中的南威、太平等九个岛洲时,中国政府向其提出了严重抗议。事后法国政府也承认,这是“法国在印度支那遥远部分的殖民地的扩张”。

南沙的历史雄辩证明,南沙群岛是中国领土。越南政府也曾表示承认和赞同。美国国际专家也认为,“中国拥有领土主权最强有力的证据在于一个事实,那就是越南政府至少在两个场合,公开承认了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

但越南当局出尔反尔。他们乘中国进行“文化大革命”,国内政局动荡之机,抓紧蚕食和鲸吞中国的南沙群岛。

越南当局之举的症结是利益的驱动。南沙群岛的巨大经济价值和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难免使一些人头脑发昏,变得贪婪。谁控制了南沙,谁就能获得巨大的经济和军事利益。

多年前,我在当海军副参谋长时,就曾意识到南沙问题的严重性,也为此向有关领导坦陈过意见。当时国内忙于“文革”,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及时解决。后来我当了海军司令员,有了一定主动权,便派出了海军舰艇编队,有意识地到南沙海域远航训练,显示国威军威。但问题由来已久,积重难返。

现在高层领导已经关注此事,事情出现了真正转机,我感到格外振奋。

事关国家主权和利益的大是大非,我抓紧布置任务,总参、总后和海军的领导都十分重视,他们夜以继日分析情况,拟制方案。

几次研究会上,我对他们讲,从近期看,越南侵占我南沙岛礁,肆无忌惮地在我南沙打井采油,欺人太甚,斗争不可避免。这场斗争是捍卫我国主权,维护国家权益的正义斗争,是越南当局主动挑起的,我们必须扼制越南当局的侵略野心,显示中国在南沙的军事存在,最终为解决南沙问题创造尽可能多的有利条件。从长远看,南沙斗争一定要放在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南沙斗争的实质,是我国领土主权被他国侵犯,海上领土被分割,海洋资源被掠夺,它是直接关系我们的国家地位、

民族尊严的原则问题。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我人民解放军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在我看来,南沙斗争将是复杂的,打不打仗都会有激烈斗争,而且有时是多种形式交错的斗争,外交、政治、军事、经济手段并用或择其一二。南沙斗争也可能是长期的,很难通过一次斗争就能彻底解决问题,多方而的复杂因素,会膨胀侵占国的占有欲望。侵占与反侵占、掠夺与反掠夺的斗争,将会长时间存在。南沙斗争也很艰巨,这一斗争会带来诸多困难。但这些困难不难解决。我还清楚地意识到,尤其是而对越南当局,流血牺牲的事情可能很难避免。

问题的另一面是,对海军部队来讲,南沙斗争是很好的锻炼和提高的机遇。我要求他们,南沙斗争要长远规划,分步实施,步调一致,协同合作。特别要严格斗争原则,开展外交斗争,揭露侵略者的行径,表明中国的一贯立场。

我和洪学智副秘书长、迟浩田总参谋长、总后张彬副部长、海军张连忠司令员和李耀文政委等反复研究了多次,把一切可能发生的困难都作了预想,一切应该采取的措施都进行了周密筹划,最后形成了一份建议,以总参谋长名义,报呈赵紫阳和杨尚昆两位副主席。

1988年2月26日下午,我又当面向赵紫阳副主席作了汇报。他原则同意,并嘱咐报告邓小平主席。

2月29日,邓小平主席阅后批示:“同意。”

根据赵紫阳副主席的意见,我们又一次研究调整了建议内容。3月10日,迟浩田总参谋长代表军委向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作了汇报,并得到了批准。

也就在2月至3月这段时间里,南沙群岛果然又出了问题。

当时,我们正在南沙群岛的永暑礁建立一座有人驻守的海洋观测站。建这个海洋观测站是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的要求,并于1987年经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的。建站的具体工作由海军负责,国家海洋局和交通部协助。海军在短时间完成了工程勘察、设计等工作,施工的全部材料,也都在大陆筹集。1988年2月2日,施工船编队的九艘船从湛江起航,7日晨抵永暑礁施工现场。为防止意外,海军派出了三至四艘护卫舰担任周围海域的巡逻警戒。

2月18日15时40分,中国海军五名官兵登上南沙华阳礁,插上了中国国旗,看守该礁。

同日16时10分,越军九人也登上华阳礁,并插上了越南国旗。

针对这一挑衅,我登岛的海军官兵和海上游弋的驱逐舰,立即对越军喊话,发信号,令其立即离开。21时41分,越舰船和登礁人员全部撤离。

这一次,没有形成流血冲突;可是谁都能感觉到,这一带海域,战斗将一触即发。

2月25日,我海军官兵登占了南薰礁。

3月13日,在南沙海域巡逻的3艘护卫舰,派出6名海军官兵,携带轻武器,登上赤瓜礁,进行勘察作业和插旗。

3月14日6时25分,越南海军一艘“505”号登陆舰和“604”、“605”号军用运输船,突然窜至赤瓜礁海域,并派出42名武装人员,携带轻机枪和冲锋枪强行登礁。

短兵相接。双方官兵手持武器,站在海水中对峙。

我海军官兵反复向越军喊话,声明这里是中国领土,令其离开。但越军非但不听劝阻,反而首先用冲锋枪向我人员射击。越海军“604”号运输船上,多挺轻机枪也一齐向我守礁人

员和舰上人员射击,当即打伤我士兵一名。

我海军官兵被迫自卫还击,击毙敌登礁人员 20 余人、俘虏九人,击沉越海军运输船一艘,重创两艘。战斗只进行了 28 分钟便告结束,我伤两人。对于其后越军的救护行动,我海上巡逻编队采取了人道主义立场,允其救护,没有置理。

3 月 15 日,我海军官兵占领了东门礁;3 月 25 日,又占领清碧礁。至此,我们在六个礁上进驻了部队,打破了我南沙没有立足之地的局面。

赤瓜礁战斗后,国际多数媒体作了客观报道。周边国家和苏、美两个大国,也都从各自利益角度表现出谨慎和超脱的态度,希望和平解决争端。越南当局态度明显变软,外交上公开乞求“双方保证不使用武力”。

中国有句老话: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以往,越南当局一直把中国的克制当作软弱,肆无忌惮地侵占中国领土。现在,中国海军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只能呆在家门口守护近岸。赤瓜礁小小一仗,显示了中国海军的力量。在我心里,那种隐隐约约受制于人、受辱于人的感觉没有了,多少年来堵在心头的一口气也顺了。

100 多年来,中华民族受尽了外国人的欺侮,现在彻底翻身了。中国已经拥有自己制造的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核潜艇,中国的海军、空军实力也有长足的发展,经济、科学、文化诸方面的飞跃,使中华民族有信心有能力还击一切敢于人侵的来犯者。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那种任人宰割的年代永远一去不复返了。对那些持横蛮态度者,我们决不能置之不理。

赤瓜礁一仗,使每一个中国人都为之欢欣鼓舞。

我也一样,内心有说不出的痛快。但作为一名军人,我考

虑更多的还是如何长久地在南沙显示我们的存在,真正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越南输了理,口服心不服,以后什么事可能都会发生。南沙要说没事,可能会十年八年风平浪静;要说紧急,可能明天就会发生战事。我和海军的领导同志单独谈了几次,原则是:加强训练,密切协同,掌握敌情、海情、气象,时时刻刻心中有数。我们决不打第一枪,但只要它先打,我们就歼灭它。

与此同时,有个问题一直让我感到焦虑,就是我们的飞机“腿短”。显然,越南军队对我威胁最大的,不是舰艇,不是蛙人,而是飞机。大陆距南沙 1000 多公里,我们的作战飞机长途奔袭到了那里,油就剩下不多了,形不成真正的战斗力,而越南比我们近得多。同等技术性能的飞机一齐出动,越军飞机在作战距离上就占了优势,他们航程近,不但可以增加滞空时间,还可以加大载弹量。真有战事,我们的飞机鞭长莫及,保证不了海空优势,保证不了战斗的胜利,无法向全国人民交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赤瓜礁战斗之前我就找过航空工业部的同志,研究加油机研制的可能性。

这段时间,海外的新闻媒介也多次对中国海军的现状加以评述,认为中国海军空中力量的薄弱,会直接危及海上巡逻编队的安危。这是事实。根据当时的情况分析,越南随时有可能对我进行报复,在突发事件面前,最快的应急措施就是出动航空兵。海军航空兵的现状实在不容乐观,作战半径短,导航设备差,机动能力大受限制。

要改变这一现状,就得发展航空装备和在西沙修建机场。但这都不是一朝一夕能一蹴而就的。尽管如此,早行动比晚行动好。我认为必须把这件事提到议事日程上,多方进行论证,早日定下决心。我向杨尚昆副主席汇报了自己的想法。

他非常赞成,也早有这方面的考虑。

3月29日下午,我召集航空工业部、海军、空军、国防科工委、总参装备部多家领导,以及飞机研制厂家的专家、技术人员,就怎么使我军的航空装备适应南沙斗争的需要进行了专题研究。

大家认为,解决我军飞机在南沙海空巡逻护航作战的问题,虽然技术上有些难关,但完全有能力攻克。专家们设想了一个花钱少、见效快、自力更生就可解决的应急方案;另外,起步加油机工程。

我同意专家们的意见,这是切合我军当前实际、解决我军歼击机去南沙作战的最实际有效的办法。特别是加油机工程,过去议过多次,一直没搞成,现在不能再拖了,不论花多少钱,花多少时间,哪怕挤下别的项目,这个工程也要上。它不仅可以加强南沙斗争,而且可以解决空军和海军航空兵机动作战问题,战略意义极大。

几天后,我把会议研究的情况和个人想法,向杨尚昆副主席和军委常务会议作了汇报,大家一致同意。

之后,我又开了几次协调会。应急方案出来了。经过几个月试飞,证明可行,我心中有了底。

加油机工程,从1989年1月开始启动,1994年11月,全部通过设计定型审查。这项工程的研制成功,结束了国产飞机不能进行空中加油的历史,标志着我国已经掌握空中加油技术,填补了我国航空技术的空白,打破了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为我军航空兵远程作战提供了技术基础。这是我军航空兵装备的一个小小跃进。

修建西沙机场的事,邓小平主席十多年前就提出来了,只是没有落实,现在到了有条件有能力而且务必落实的时候了。

从军委到总部、到海军、到国务院有关部门,大家的意见都是一致的。党中央、国务院很快同意军委在西沙建机场的建议。

我同海军的同志几次研究后,拟出一个初步方案:在西沙永兴岛,建一个平时可以担负运输任务、战时可以执行战斗任务的机场。

永兴岛北距海南 200 多公里,南距永暑礁 800 公里,西距越南 400 多公里,位置适中。它的建成,使我海空作战能力可能向南推进几百公里,对防护西沙和支援南沙作战,无论从政治上、军事上,还是从经济上讲,都有大陆机场无法比拟的重要意义。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建设西沙机场,我们采取了就地取材的办法。工程师作过计算,一个机场共需要沙石 200 万吨,如果从海南送到西沙,每吨约需 70 元;若炸礁填海,就近挖取沙石,每吨只需十来元。为节省建设投资,减少大陆的运输量,缩短施工周期,我们决定就地取材,并在建设机场的同时,利用炸礁取石之际,扩大港湾面积,改善巡逻舰艇的停泊补给条件。一举两得。

1988 年 8 月,南沙永暑礁海洋观测站胜利建成。各种自动化海洋观测仪器投入运转,源源不断地向国内外发送出大量气象水文资料。1991 年 5 月,西沙机场也建成通航。海军航空兵部队立即进驻,担负起了保卫西沙和南沙的战斗任务。

可以说,永暑礁海洋观测站和西沙机场是我一直关切的两件大事。这些年来,我记不清和海军领导谈过多少次工程进度、工程质量;记不清打过多少电话,询问气象的影响、施工人员的生活;也记不清看过多少盘现场施工的录相片。现在,这两件大事落实了,我心愿已了,如释重负。

我感到最值得赞颂的,还是那些战斗在第一线的可敬可

爱的指战员。战争年代是这样,和平年代也是这样。

那些建设永暑礁海洋观测站的海军官兵,头顶骄阳,脚踏风浪。他们晒干了汗水,晒脱了皮肤,在风浪中勘测,风浪中施工,硬是在一块沉睡的水下礁盘上,建起一座人工岛屿,奇迹般地为祖国增加了8000多平方米的土地。

那些驻守在南沙高脚屋中的海军官兵,抬头是天,低头是海,人像悬在半空中。他们是一群年轻的生命,但是,他们远离大陆,白天兵看兵,晚上数星星,缺水,缺菜,缺娱乐,格外寂寞和艰苦。为了国家利益,他们以礁为家,把自己宝贵的青春年华,无私地奉献给南沙,像钢钉一样,牢牢地坚守在祖国的南海水域。还有那些在南沙巡逻的舰艇水兵,那些在南海巡航的飞行员,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但是,日日夜夜与南海为伴。为了祖国的安危,他们将一切置之度外。他们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潮起潮落,日月如梭,一切都在时间中发生变化。近年来,我们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有了很大改善,尤其是中越关系的正常化,使得两国能够冷静地坐在一起,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历史争端。当然,我国政府所坚持的,还是过去的一贯主张:“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应该在承认中国主权的前提下,共同开发。”

遥望南沙群岛,那里碧波帆影,风光如画,现在似乎风平浪静了。但是,人类社会的脾气比大海更难以揣摸,作为军人,尤其要时刻提防风浪骤起,睡觉时也应该睁大眼睛。

调研军队改革

调研军队的改革问题,是我到军委后做的一件重要工作。

1988年3月21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了一次非常重要的座谈会。会议内容只有一个:讨论中央军委提出的《关于加快和深化军队改革的工作纲要》。参加会议的有军委领导,三总部领导和各大单位的军政一把手。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快十年了。军队改革工作也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绩。这一点,在头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和当年的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都给予了高度评价。军队改革成绩的具体表现是: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战略性转变;军队的整编取得重大成就,裁员100万的任务已经完成;军队革命化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有了新的进步,防卫作战能力有新的提高;国防装备有了较大改善;国防科技和工业部门认真执行军民结合的方针,取得了显著成果。这些改革成就有目共睹。

在我看来,这些改革成就中最重要一点是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的战略性转变。

从60年代初开始,我国就一直处于立足“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各项工作都围绕准备打仗这个中心,宣传教育也强调战争威胁迫在眉睫,国家大笔经费用于国防建设,生产储备了大量战备物资。与邻国相近的城市不敢建设,担心在战争中毁于一旦;无数工厂内迁,转入山洞,大批人力、物力、资金丢进了山沟;人们的思想也十分保守短视,似乎总有一种大敌当前的感觉,人为地隔绝了与外界的友好往来。结果,经济没有搞上去,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也十分缓慢。

小平同志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中国的国情军情,冷静准确地判断国际战略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拘历史观点的局限,先后作出了新的世界大战可以避免,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并据此作出了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

想实行战略性转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国防等一系列重大决策。从此,不仅整个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也产生了质的飞跃。

我常常想,假如没有小平同志的高瞻远瞩和大无畏气魄,及时扭转中国航向,我们现在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还在时时刻刻准备打仗,整个国家不知道要损失多少时间,耗费多少钱财;中华民族还会处在科学技术落后、生产力低下的状态,十多亿中国人只能在贫困线上挣扎。当然,历史肯定不会一直这么发展,但宝贵的时机浪费了,错过了。所幸的是,历史选择了小平同志,让他作为新时期中华民族的领导核心,及时扭转了乾坤。

尤其是党的十三大之后,小平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振兴经济的一系列思想,经受了历史检验,得到了群众的衷心拥护,一股更加强劲的改革之风遍吹中华大地。人们从身边发生的变化中,感受到政策的效果,体会到改革的实惠,从而进一步解放了思想,激活了无穷的潜力。

整个国家都在继续深化改革。军队的改革,虽然取得了重要成果,但也面临着需要加快步伐和继续深化的问题。因此,中央军委及时提出了《关于加快和深化军队改革的工作纲要》草案。

在1988年3月21日的军委座谈会上,军队高层领导围绕《纲要》草案,讨论了整整一天。

意见都很坦率,有的热切中肯,有的十分尖锐。“总部不带头,臃肿是解决不了的,关键是先砍自己”,“现在最重要的是行动,看准一个,就出台一个”,“军队改革是高度集中,龙头怎么摆,龙身龙尾跟着来,关键在统率部门”,“改革不是跟哪个人过不去,不是对哪个人的否定”。讨论中,大家都意识到

了深化改革的紧迫性,认为军事战略、编制体制、干部制度、军事训练等等,都亟待改革;另外,也谈到了地方改革和军队改革的关系、区别等许多问题。

座谈会上,赵紫阳和杨尚昆两位副主席都讲了话。

总的精神是,军队改革是军队现代化的重大问题,改革也是全军广大指战员的呼声。不经大的改革,矛盾会更多。虽然难度大,但不改不行。军队更应该解放思想。首先是在座的领导同志要解放思想,统一认识,实事求是。不解放思想,还是照老框框办事,很多事情就办不通。要论证设计一个好的改革方案。过去的改革往往是就某一问题来改,改了一方面,另一方面又照顾不够或者不全面,以至于有些改革互相抵触,前后矛盾。现在,必须有一个纲,有一个方向。军队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既有宏观规划,又有微观的具体实施办法。改革方案还要几上几下,反复论证,集中全军智慧。

座谈会后,我和洪学智的主要工作就是调研论证改革方案,时而一起研究讨论,时面分开听取汇报。

为了加深对情况的了解,4月下旬至5月上旬,我去了二炮、空军、国防科工委以及成都军区等单位,广泛接触了从大军区到团一级的干部,以及离体的老同志,开了多次座谈会。在成都军区,我还专门把辖区的集团军、省军区、军区空军、昆明陆军学院等10个单位的领导干部请来座谈,就中央军委《纲要》中提出的问题,广泛听取意见。

调研过程中,大家畅所欲言,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见,我对此作了归纳:

首先,对体制编制意见最多。

机关编制,虽经几次简编,但越减机关人越多。大家认为,总部、大军区、集团军直到师这四层机关,工作职能、任务、

领导制度、工作方法基本一样,上下一般粗,工作重复交叉,互相内耗,不仅使基层工作忙乱,还影响工作的落实。四层机构每年都分别布置工作,下达任务,召集会议,派工作组,开总结会,写总结报告;各级业务部门也都分别布置任务、开会。这是会议多、文件多、工作组多的根本原因。大家认为,这四层指挥机构能弱化两层最好。

集团军的机关干部提出,现行的司、政、后体制中,许多业务工作交叉重复。如人事干部管理、教育训练、财务、交通运输等许多工作,实际上由一个部门自管就行。现在是几个部门分管,互相牵扯,各业务部门忙,下层工作乱。政治教育、军训工作、行政管理,在基层建设中也产生很多人为矛盾,甚至出现一台汽车三家管,一匹军马由司令部、后勤部的五个业务部门分管的怪现象,严重影响办事效率,给部队带来诸多不便。

部队对后勤供应体制的意见也较多。例如总后武汉指挥部所属重庆第三基地,由川东管到川西峨嵋山脚下,而驻重庆部队的物资,却是由川西向川东供应,造成物资倒流,损失浪费大,部队不方便。

省军区系统的人武部,自交地方后也带来不少新的矛盾。部队新兵训练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比较多。

第二,生产经营难搞,副作用大。

位于沙漠之中的两个国防科研基地,用了30年时间,在一片“天上无飞鸟,地上没有草,风吹沙石跑”的戈壁滩上,建成了现代化的尖端武器综合性试验场。现在,要保持现有的科研队伍,维护保养已有的仪器设施,困难不少,靠自我发展很艰难。成都军区的一些部队因没有土地,不能进行农副业生产,斤半加四两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好。

有些部队,靠少量干部战士,带领大批民工开矿、办工厂,虽然有收益,但是小打小闹,局面不大。真正要将生产经营搞好,还要认真研究。现在各部队各有一些生产收益,用以给部队补助,解决各种困难是必要的,但都分散使用,浪费不少。部队拿公家的设施和装备搞生产经营,收的钱,却基本不用在设施装备的维修上,设施装备搞坏了又要公家拿钱修理。这种不搞核算、不计成本的干法不行。要立制度,有人管。

生产经营收益,在一定基础上需要集中起来使用,除解决部队的补助外,还要改善部队的装备,进行其他建设。为此,需要尽快制定全军生产经营管理法和各种制度、收益使用分配原则,不然难免造成大的浪费,又使许多人员犯错误。

照理讲,再穷不能穷军队。但中国国情特殊,因此,当时对军队搞生产经营,从积极方面考虑多一些,对其明显弊端,不像现在看得这么清楚。

第二,干部的后顾之忧影响军心。

各级都反映,军委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官服役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干部暂行条例》的颁布实施,大家都拥护,但现在的干部工作,最难解决的是转业安置问题。不少干部现在不是想评什么军衔,也不是想提级多拿点钱,而是在想第二次就业时的后路。干部转业后,本人就业、住房、孩子上学、家属工作等一系列问题,都困难重重,难以解决。飞行员更难安置。为了解决转业干部的某些实际困难,公家和个人都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甚至要靠请客送礼,走后门。这一实际状况,使大批干部产生“还是早走好”的思想,扩大了波动面。一线边防、守备部门干部不安心的比例更大,而且不只是基层干部。这个问题需尽早立法,制定干部转业安置法,稳定人心。

还有,1985年取消连队副职后,加剧了连队干部不在位率。特别是一线边防、守备部队,由于部队高度分散,加上干部出差、开会、学习、探家等,有时连队只有一两个排级干部在位,甚至只有志愿兵代管,严重影响部队正常训练和战备值勤。

干部的培养、使用和管理,也缺乏科学性。一会儿重文凭,一会儿重年龄,一会儿重实绩。院校培养与使用脱节,毕业就转业的现象时有发生。

第四,担心装备建设赶不上现代战争要求。

大家普遍担心我军装备与国外军队的差距,怎样打赢现代化战争,战法还不多,基层部队希望更新装备。实际情况是,一方面,我军经费短缺、研制费少、订购费少、修理费也少,对新研制定型的一些先进装备,只能少量订购。另一方面,装备工作的分类多头管理,相互掣肘,使本来就有限的经费又内耗掉一些。武器装备造价大幅度上涨,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若有战事,部队将面临装备滞后的被动局面。

我离开总参五六年了,这些年不大接触陆军情况,这次调研,用一个多月时间广泛接触各级干部,面对面交换意见,了解到许多在上面了解不到的情况,听到了许多有质量的意见。在这些见面中,我也坦诚地讲了一些看法。

我的态度很明确,不是来做报告做指示的,而是来当小学生,听取大家意见,一起讨论的。很显然,各地区的特点情况不一样,各级干部看问题的角度也不一样,听取大家意见,便于我开阔视野,更好地综合分析问题。大家敢讲,有见解,说明这些年干部素质在提高、在进步。眼下部队工作比较艰苦,条件差、任务重、新情况新问题多。但广大官兵能吃苦耐劳,能够完成各种任务,应该慰问鼓励。

面对各级干部,我多次说明,党中央和国务院非常关心军队建设,支持军队改革。目前,地方改革开放的成效,涉及到了部队广大官兵。军队本身需要改革,一些弊端到了不改不行,再难也要改革的地步。现在大家盼望改革的心情很急,觉得慢了,可以理解。军委已经全面部署,系统论证,我们下来搞调查研究,就是为了改革能更加卓有成效。一旦方案成熟,立即有计划分步骤地具体实施。

作为军队,必须时刻保持应有的战斗力。因此,走到哪里我都强调,部队的工作千头万绪,领导应该狠抓职能性任务:战备不能松,训练不能松,政治思想工作不能松,管理不能松,牢牢地把握基层,多为部队服务。当然,部队现在困难很大,国家暂时还保证不了部队完全吃“皇粮”。中央给了一些政策,部队主要是通过搞农副业,达到斤半加四两。生产经营不能像过去那样一哄而上,除了办企业,主要搞技术开发,挣的钱用于补充不足和发展装备。生产经营要管好,要勤俭建军,富了也要勤俭。

关于生产经营的危害,我在当年也讲过,要防止大吃大喝,违法乱纪。但在那个年代,确实没有别的渠道给部队增加一些经费。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物价上涨指数计算,1987年比1984年物价累计上涨22.7%。1987年国防费和1984年国防费相比,名义上增加了几十个亿,实际上减少了几十亿元。无奈之下的这种权宜之计,却使得一些干部贪污挥霍、腐化堕落,在糖衣炮弹面前打了败仗。有些还是受党教育多年的高级干部,想起来十分痛心。

在重庆期间,我还考察了航空和兵器系统六个军工厂为国庆40周年生产的阅兵装备,质量都达到了指标要求。

回到北京,我整理了一份材料,综合部队对《纲要》的各种

意见,送给了负责《纲要》起草修订的军队改革办公室,同时报告了杨尚昆副主席。

这段时间,军委和三总部的其他一些领导,也都分头下到各大单位征求意见,带回了广大官兵的反馈意见。工作中,大家既有一股热衷改革的高昂情绪,又有脚踏实地一丝不苟的精神。这使我想起了过去战争年代,打仗时,制订作战方案总是反复斟酌,统筹考虑,全军一盘棋。现在的改革,事关人民解放军的前途命运,同样需要周密地总体论证,科学决策,配套改革,决不能零打碎敲。

可以不夸张地讲,我们的军队,是全世界待遇最低的军队,是最能承受艰难困苦 of 军队。但另一方面,我们的军队,又是思想觉悟最高的军队,虽然装备技术比较差,却是60年来打仗最多的军队。

现在,全军上下都在谈论改革、关心改革、期待改革。他们对三总部和军委的决策寄予无限希望。他们在过去的改革中得到过实惠,改革继续深化的今天,他们的切身利益将会受到或好或坏的调整。比如地方的人事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等,都会对官兵心理产生直接影响和冲击。这是部队现实,不作正确回答,不作相应改革,就无法调动广大官兵积极性。军队本身在编制体制、干部制度、后勤供应、装备管理、教育训练、基层建设等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也直接影响部队战斗力的提高,改革势在必行。但要冲破几十年“左”的“框框”和“禁区”的束缚,摸索一套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军队的经验,不是件容易的事。军队的改革还要在四化建设的大局下进行,要在经费紧张、装备落后等许多困难中前进。我认为,加快和深化军队改革,一要坚决,二要求实,三要听指挥。

经过几上几下修改,《关于加快和深化军队改革的工作纲要》,于6月17日正式颁发。

《纲要》指出,当前,国际形势趋于缓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美苏等国都在竞相调整国家战略和推行改革,为争夺21世纪的战略优势作准备。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要求军队的建设和改革必须与之相适应。就军队本身来说,历史积累的问题很多,面临的困难不少。解决现代战争的客观需要同我现代化水平还比较低的矛盾,要经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军队既要“忍耐”,更要积极进取,有所作为。当前,要从改革入手,解决军队存在的紧迫问题。

邓小平同志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军队改革已经迈出比较坚实的步子,特别是实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裁军百万,是关乎全局的重大改革,对军队建设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全军对改革的期望和热情很高,军队改革已经取得多方面的成效。

军队改革的总任务,就是要建设适应国际战略环境、适应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防建设需要、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军事体制和运行机制,把我军建设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当前和今后两三年内,深化军队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明确新时期建军指导思想,确立新时期军事战略,初步建立起新体制框架,克服弊端,完善制度,调动全军人员的积极性,基本理顺军队建设各方面的关系。至本世纪末,要进一步深化各项配套改革,健全法规制度,发展科技,改善装备,使我军的现代作战能力显著增强,并为下世纪的继续发展奠定基础。

军队改革的基本方针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进一步解放思想,从国情军情的实际出发,服从国家大局,积极面慎重地

把军队改革推向前进。

《纲要》还对军队改革作了具体部署,明确了主要内容:确立新时期军事战略;进一步改革体制编制;改善党委领导制度;改革教育训练;改革干部工作和人事制度;改革和加强科技装备建设;改革后勤工作;改革和发展生产经营;改革基层建设工作;加强军队的法制建设;改革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此后,一项项新的改革措施在部队全面铺开。

论证装备体制

到了80年代后期,国防科技装备管理体制的问题已经非常突出。

在我看来,解决的最好办法就是成立装备总管部门,对全军武器装备实行集中统一管理。这一设想,赵紫阳和杨尚昆两位副主席都赞成。

1988年6月2日,军委常务会议确定成立“国防科技装备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由我任组长,国防科工委主任、总参装备部部长和总后军械部部长等三人为成员。6月7日,军委颁发通知,明确了领导小组的主要任务:统一组织国防科技装备体制改革的研究论证,尽快提出装备统管的具体方案。通知规定,在没有明确装备统管之前,各科技装备部门仍按现行职责和分工进行工作;矛盾突出、分歧尖锐的问题,可由科技装备体制改革领导小组进行协调。

同一天,我主持召开了国防科技装备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会议明确:由总参谋部、总后勤部和国防科工委的一些同志组成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由总参装备部曹刚川副部长负责。

会上,就论证研究工作如何进行和两个月内拿出方案的问题,我讲了四点意见:

一、下决心办好这件事,千困难万困难也要办。军队现代化,装备是大问题。多少年来体制不顺,矛盾重重,阻碍了装备建设。现在思想要统一,老观念要克服,大矛盾解决了就是成果。

二、要站在全国全军改革的高度,从全军和全局范围思考问题,研究问题,抛开本部门局部利益,虚心听取各方面意见,尽可能想周全。

三、武器装备应实行全寿命管理。从科研、生产、使用、维修、仓储等多方面找规律,找矛盾,理出头绪。

四、马上开始工作。抓紧时间,每周议两次,广泛搜集国内外资料作参考,同时不能脱离我国我军实际情况。

此后两个月内,我连续主持召开14次领导小组会议。讨论中,大家的意见相当激烈。对现行体制,有的同志形容是“一筐螃蟹,相互抓着,相互掣肘”。这种现状内耗很大,都认为应该改,而且应该尽快改。可是一到具体问题又难办了,各单位都有一些想法。

讨论来讨论去,仍然感到矛盾难解决。

比如,装备全寿命管理,将科研费、订购费、维修费捆在一起用,谁都同意这个想法。但又都希望捆在自己这里;捆在别人那里,积极性就捆没了。又比如,成立装备总管部门,是个利大于弊的好方案;但要治病,又谁都怕动大手术,因为这要涉及到许多单位和干部。再比如,装备从生到死、从无到有的管理,怎么管法?是按军品项目划分?还是按军兵种项目管?管理机构内部,都是一条龙的垂直关系,这种方法有弱点;但如果平行交叉,更没法干。也就是说,成立装备总管部门,并

不等于什么问题都解決好了。总之,问题矛盾不少。

多次讨论中,我都强调了几个主要观点:

首先,我们搞了几十年装备工作,取得很大成绩,也存在不少问题,如自成体系,分散多头,相互扯皮,管理落后,内耗大,效益低。这些问题再加上经费紧缺等困难,直接影响我军装备建设的现代化进程。装备体制的改革,不仅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更主要的,是为将来装备的发展和高技术的发展打下基础。

其次,装备体制改革,既是业务机构改革,又是政治改革;既是军事改革,又是军事经济改革,牵扯方方面面。这不是哪个人的事,而是国家和军队的大事。要改,就要充分论证,条件是很有利的。

第三,装备管理是个大工程,从论证、科研、生产、试验,到验收、入列、使用、报废,从生到死几十年时间。过去,因管理体制造成的问题很多很复杂,现在要理顺;要按装备发展的客观规律,找到内部和外部联系。集中统管,是总目标。该集中的,一定要集中管好,还要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要将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解决得尽可能合理,大矛盾变成小矛盾,小矛盾变成没矛盾。

第四,集中统管,就是全寿命全系统的管理。和平时期,科技要上去。没有科研就没有新产品,部队就没有新装备。关键是看准方向,把握时机,搞好武器发展的战略决策,包括武器本身和型号。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打什么仗需要什么武器,两条都不能偏废。一定要把准方向,一干几十年,走错了就是大弯路。装备生产主要是讲质量,上水平。大量的工作靠国务院管理,军方也得控制,定型时按标准验收。装备的使用管理,是部队应当重视的大问题。科研、生产和使用管理

有很大联系。从科研论证到生产、订货和使用管理,哪头不好都不行,不能只抓一头不顾另一头。

第五,装备总管部门机构要设置合理,分工科学,领导便利,效率高。工作上抓宏观,抓决策,抓大事。战略问题决定了,战术问题的解决才好着手。

第六,装备体制改革,要适应国家和军队的改革,也要促进其他方面(如编制)的改革,相互保证。要充分注意稳定。改革的方案要有生命力,不能今天讲了,明天就执行不下去了。

经过反复调研,听取各方面意见,又进行多次论证和会议研究,我们终于搞出了加强武器装备集中统管的建议和方案。

1988年8月11日下午,杨尚昆副主席主持召开军委常务会,听取国防科技装备体制改革方案汇报。洪学智副秘书长和我、总参谋长迟浩田、总后勤部长赵南起、副总参谋长何其宗、军委办公厅副主任李际均,以及装备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成员及办公室人员参加了会议。

会议首先由我汇报。

我讲了听取意见的情况,列举了现行体制方面的问题,讲了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提出了改革的两个方案:一是集中领导,统一管理;一是集中领导,分散管理。

我整整讲了一个半小时,最后强调:“两个方案,各有利弊。要搞就选择第一方案。”

汇报结束,杨尚昆副主席说讨论一下,可以敞开思想。

随后与会者发表了各自意见。

有的倾向第一方案,大集中。有的提出,两个方案都不理想,但没有好办法。有的提出:能不能在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上分两步。

会上,装备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的同志也发了言。

听了这些意见后,杨尚昆副主席说:“矛盾、思路都提出来了,大家再研究一下,看还有什么办法。这个问题太大,有没有改良的办法,我不定这个问题。”

听了这些发言,我十分意外。两个月的论证工作,好像画了一个圆,又回到原地。改革之难,让我又一次有了深刻体会。

10月19日,杨尚昆副主席找我和丁衡高主任谈工作。他说:“今后国防科技工业装备建设工作,由华清同志统一领导。关于国防科技工业装备领导体制问题,由华清同志牵头,还要继续研究。”

在这之后,改革方案的研究工作,由各总部提出。

11月25日,我最后一次听总参装备部曹刚川、李安东两位副部长汇报装备体制改革方案。这时军委没有新的精神,这件事只好就此了结。

各管各,成了最终方案。

我有些不甘心。当时信念很坚定。装备体制改革,这是大势所趋。

12月12日,我参加了国防科技体制改革座谈会和国防科技预研管理改革座谈会。我有感而发:

“改革是件很复杂的工作,目前,新体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老体制还在运行。新老体制相互交叉,所以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国防科研、生产,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怎样才能改革好,理顺它,确实是个艰巨任务。”

“国防科技工业正处在困难阶段,而且还要持续相当一段时间。无论困难有多大,大家要有信心,从改革找出路,使我们的武器装备上一个新的台阶。我们这样的大国,要靠军队

来保卫安全,而军队没有现代化的装备,怎么行?所以一定要保持好军工骨干队伍,为下一步发展做好准备;一旦国家经济力量发展了,国防科研、生产也会有较大的发展。”

1992年,我主持军委常务工作,又一次研究全军武器装备建设管理体制。

这时,情况有了变化,新时期的军事战略方针已经确立,武器装备管理上的矛盾越来越不适应新时期军队建设的需要,尤其是高技术装备越来越要增强。军委领导统一认识后,下了很大决心,颁发了局部调整全军武器装备工作分工问题的规定。

这一步虽然迈得不大,但很艰难!

再次授衔

军衔是军人的职责、资历和荣誉的综合体现,是军队建设中一种行之有效的特殊体制。找遍全世界,找不到没有军衔的军队,中国军队也没有理由要例外。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衔是在1955年。实行10年后被“文化大革命”中断。重新授衔一直是广大官兵的呼声。1988年,为了军队的正规化建设和发展,又重新开始授衔。但授衔中断多年,问题积累很多,尤其是军队干部老化问题,最是头痛,难以解决。重新授衔的工作因此变得非常困难。

是小平同志下的决心:“这是个得罪人的事情。我来得罪吧,不把这个矛盾交给新的军委主席。”

中国军队的命运,取决于是否有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军队是要打仗的,这一特殊性质,决定了军队干部特别是战斗部队干部必须年轻。军以下部队的干部比较年轻了,

但军以上、兵团级直至高层领导方面的老化问题,远没得到解决。小平同志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他说:“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是交不了账的。这就是说,我们这些在部队生活了几十年的人,对部队是不好交代的。这是第一件大事。”

1988年4月12日,作为中央军委主席,小平同志向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提交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授予军队离休干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功勋荣誉章的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草案)》和确认1955至1965年期间授予的军官军衔的议案。

4月27日,小平同志又签发命令,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干部暂行条例》颁发全军执行。文职干部暂行条例,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的有关规定制定的。

7月1日,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批准和通过了小平同志提交的《规定》、《条例(草案)》和议案。

7月20日上午,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文职干部大会。军委和三总部领导,一起会见了驻京部队文职干部代表,向我军第一批文职干部热烈祝贺。从此,中国军队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支10万多人的文职干部队伍。

当天下午,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军队离休干部授勋仪式。

邓小平签署命令,授予萧劲光等830名同志“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授予汪荣华等3704名同志“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授予贺进恒等47914名同志“独立功勋荣誉章”;授予邓兆祥等31519名同志“胜利功勋荣誉章”。

我参加了授勋仪式。这些接受勋章的老同志们,曾经南

征北战,出生入死,为共和国创下了丰功伟业。人民军队的光荣和他们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没有他们就没有人民军队,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人民大众的安居乐业。共和国应该给他们以崇高荣誉。一枚枚闪光的勋章佩戴在这些老同志胸前,全场掌声雷动。

此后,受邓小平主席委托,洪学智副秘书长和我一起,去聂荣臻元帅、徐向前元帅、萧劲光大将和王震上将的住处,代表中央军委,向他们授勋。聂帅已经80多岁,身体不好,但头脑清醒,他激动地把勋章捧在胸前,久久向我们示意。徐帅很兴奋,马上就佩戴上勋章,要和我们一起照相。那场面至今难以忘怀。

9月14日,中央军委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隆重的上将军官授衔仪式。

授衔仪式由国家主席、军委副主席杨尚昆主持。他宣读了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的授予上将军官军衔的命令。被授予上将军衔的是: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洪学智、刘华清,国防部长秦基伟,总参谋长迟浩田,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总后勤部长赵南起,副总参谋长徐信,军委纪委书记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林祥,军委纪委第二书记尤太忠,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王诚汉,国防大学校长张震、政治委员李德生,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刘振华,南京军区司令员向守志,成都军区政治委员万海峰,海军政治委员李耀文,空军司令员王海,共17人。

接着,颁发了邓小平主席签发的命令状。

小平同志亲切会见了我们。那天,他穿着深灰色中山装,脸上挂着微笑,精神饱满,和我们每个人都握了手:“祝贺你们,祝贺你们!”

我心潮澎湃。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衔,是在1955

年,当时我还没结束在苏联的学习,但回国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的授衔仪式,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30多年后的今天,又一次参加授衔,而且被授予上将军衔,不由得感慨万千。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大别山区的放牛娃,从战士成长为上将,这是党和人民培养教育的结果。当时,记者问我有什么感想,我说:“对于个人,这是很高荣誉。只有把荣誉化作动力,把军队改革搞得更好,更加努力工作,才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厚爱。”

受邓小平主席委托,此后一段时间,我参加了国防科工委、空军、军委办公厅和济南军区的中将、少将及专业技术少将的授衔仪式。

在这些授衔仪式上,我强调说明:实行新的军衔制度,是加快和深化军队整体改革的重要步骤,是在新形势下进一步理顺军队指挥关系,完善军官管理制度,加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重要措施。当我们佩戴上军衔肩章的时候,应当想到,这不仅是国家和人民的关怀,而且包含着国家和人民的殷切期望。希望大家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政治上思想上坚定不移地同党中央保持一致。要时刻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计个人名利,振奋精神,忘我工作,自觉献身国防事业。

至此,《军官服役条例》、《文职干部暂行条例》和《军官军衔条例》,全部通过法律程序并予以实施,我军干部工作走上了法制化、制度化的轨道。

发 展 装 备

1988年,我军的武器装备失修局面严重。突出表现在:修理费用紧张,装备失修很多。这种局面必须扭转。

为贯彻军委领导“保重点”的指示,当年2月9日,洪学智副秘书长和我,召集海军、空军、总参装备部、总后军械部、车船部的领导进行了一次专题研讨。

历史上,我军武器装备经历过几次大的失修,也经过多次大的整修运动,在一个时期内得到了好转。近几年,因装备修理费极为短缺,全军武器装备失修情况日趋严重。显然,如果不采取强有力措施,失修状况还会发展,将给部队的作战、执勤、训练造成极大影响。

具体分析看,造成装备严重失修,首要原因是修理经费紧缺。近年来,新装备购置费几倍地增加,但修理费不仅未增,还由于物价上涨等原因而下降了。第二个原因是管理不善。有的部队因没有车炮库等设施,许多武器装备长期露天存放,日晒雨淋,自然损坏严重;有的单位使用装备搞生产经营赚钱,只用不修;有的单位则挪用装备修理费,购置物品、盖房子等,使部分能修的装备也修不了。第三,有的武器装备编制数量过大,加大了修理费用。第四,相当一部分武器装备已到使用年限,没能及时退役,加大了需要修理的武器装备基数。第五,一些现代化装备不仅造价昂贵,而且修理费用也很高。

装备失修严重是当前全军装备工作面临的突出问题。长此下去,将会造成难以扭转的被动局面。大家认为,针对修理经费缺口大的实际情况,必须采取“区分档次,保证重点”的果断措施,加强维修管理措施,把军事效益和经济效益统一起来,使有限的修理经费在装备领域内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保证全军各部队在役装备处于良好状态。为此,全军的武器装备应区分为“必修”、“缓修封存”和“淘汰报废”三个档次。即,对性能较先进、在使用期内修理之后能形成战斗力的重要装备,以及担负应付突发事件和边防海防空防斗争的陆、海、空、

二炮等军兵种主战部队的装备,下决心集中经费,维护保养和修理,使其保持良好状态;对质量较好的装备,缓修封存一批;凡性能落后、技术状况差、无修理价值的,下决心淘汰报废。加强武器装备的管理工作。

这次会后,洪学智和我把研究情况形成书面意见,向杨尚昆副主席作了汇报。军委常务会讨论了一次,对武器装备维修重视起来。

1988年5月下旬,杨尚昆副主席交代,让我准备个方案,想办法加快空军装备发展的步伐。

领受任务后,我多次召集空军、国防科工委、总参装备部的同志,研究发展规划和具体实施方案。我们的初步设想是,用三到五年时间,发展空军装备,保证国家防空安全。对此,大家意见一致,但是对飞机是由国内生产,还是国外购买,大家分歧比较大。赞成国外购买的认为,从现状看,我们必须尽快拿到可靠顶用的飞机;而国内生产,不仅周期长,又得拖几年,且质量不高,投钱效果不好。另一种意见认为,买外国飞机花钱太多,买回来还有维护保养一大堆问题,受制于人;尤其重要的,是对国内工业影响太大。

关键还是国家穷,拿不出钱;军委能挤出来的经费也很有限。

研究了几次,各说各的。

我个人意见,还是下决心抓国内生产为主。国家没有钱,买十架八架飞机不起作用。抓国内生产,是想把航空技术促上去,重点投资几个项目。我也同意与国外加强技术合作,提高我们歼击机的战斗能力。空军飞机发展的重点是加油机、预警机、新型歼击机、歼8-II飞机。国内军内几个部门的思想不统一,这很正常,但我们不能老是论个不休,光是想向上

边伸手要钱。现在,时间、经费和技术都是制约因素。求实的态度是,把事情想周全,看清楚,认真规划,办几件关键的事,否则什么事也办不成。还有技术问题,也不是我们拍拍脑袋就可以解决的。军队的同志总想一下子拿到最先进的武器装备,这一点可以理解,但我们的技术基础和科研力量就那么大,把战术技术指标定得过高,往往限制了我们自己。

杨副主席几次听我汇报空军装备发展规划设想,对许多问题给予了具体指示。他特别严肃地讲到,我军航空装备很不适应形势需要,大家注意,不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搞垮了。我感到压力很大,担子很重,紧迫感增强,决定有计划地迅速展开调查研究。

由于工作多,我便陆续抽出时间,调研了空军地空导弹自动化指挥系统、警戒雷达系统、航空侦察情报系统、“强 5”飞机以及陆军航空兵引进的直升机等状况。

经过调研,对航空装备的发展情况有了更多了解。建国以来,我国的航空工业取得了喜人成就,但也有许多令人遗憾的地方。我们这么大国家,运输干线飞机全靠进口;目前还没有高水平的涡扇发动机;新歼击机的研制几上几下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有多方面原因,但目标不明确,没有持之以恒的精神,是重要一条。不光航空工业,其他国防科研生产也是如此。看准目标,充分论证,定下来后就不能轻易改变。否则,浪费了资金,浪费了人力、物力,浪费了时间。我们已经浪费不起了。

另一个新的情况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军工战线的任务不会像过去那样饱满,一型飞机生产上百架上千架的壮观情景,不会再出现了。部队需要性能先进、维护简便、价格便宜的飞机,且数量不会太多,只需要保证一些拳头部队,使他们

有较大机动作战能力和威慑力量就足够了。这是新时期我军装备建设的一个特点。科研将成为重头戏。

稍微让人欣慰的是,我们的航空战线以至全国的国防工业战线,有一支很好很能干的科研队伍和职工队伍,有几十年建设起来的物质基础,有政治思想工作的优势,只要目标明确,大家同心协力,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过去搞“两弹一星”是这样,现在搞其他军工产品也将能这样。关键在于领导,在于坚定的信心。

1989年1月24日,我到某飞机制造公司,参加新型歼击轰炸机“飞豹”和“运-7”改进型的首飞试验。三年前,我来过这个公司,当时,“飞豹”只是木模机,零部件刚投料,技术设计正在深入之中。上“飞豹”项目,是我在总参工作时定的。现在,首飞上天,又正是人民解放军特别是海军航空兵最需要的时候,而且从作战半径、攻击威力、突防能力等方面衡量,都比目前我军装备的轰炸机要优越。我很高兴。

听了工厂和研究所的汇报,感到他们的经验很可贵,我归纳了三条:

一是有明确的攻关目标,自力更生奋斗到底。“飞豹”从提出研制、立项到展开工作,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自力更生,想方设法,终于实现了首飞。“飞豹”的研制,一开始就得到邓主席的支持,领导决心果断,层层落实,厂、所领导立了大功。据我所知,在企业中,向职工发行上千万元债券进行国防工业科研,这样的例子不多。反映出领导站得高,看得远。

二是相互合作,大力协同。现代化的飞机研制工作,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现在,各行各业都面临经济紧缩、调整的问题,都强调经济效益,因此相互间的协作比过去显得更加重要。厂、所在明确总指挥、总设计师、总会计师、总质量师、

型号办公室职责的前提下,采取通盘部署、横向协调、检查督促、统一指挥的措施,按照技术、经济、进度三个目标,管理研制工程,方法十分科学。飞机上的各项成品和各种新材料,由许多主要厂家研制。说是大家的光荣,一点不假。

三是真正军品优先。公司和所属厂、所,把握住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机遇,出口飞机和为国外加工零部件,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信誉。1978年前,在其他企业一拥而上转产洗衣机、电风扇时,公司所属厂、所拿出几千万资金,进行技术改造,因而保住了人才,提高了水平,取得了比其他厂家更有竞争能力的优势。

这几条经验,来自实践,具有普遍意义。

为新歼击机的研制问题,我去了四川,约请有关专家领导开了两天座谈会。会上,大家把技术问题都摆上了桌面。

我对听到的情况很纳闷。我发现,我们走了一条外国人很难相信的设计路子:发动机和飞机同时设计,而且方案很复杂,先用引进的发动机造出样机试飞,然后换用国产型号的发动机试飞。

我想,如果从国外买不到合适的发动机怎么办?如果自己的发动机设计制造不出来怎么办?一旦出现波折,经费在哪里?什么时候才能装备部队?

我感觉专家的心中并没有多少底。但是已经上马,他们自然希望继续搞下去。

这时,研制工作已经展开,技术人员也做了大量工作,但面临的经费和技术两大难题不能不考虑。有的同志担心我召集的座谈会,会不会改变研制方案。

方案确实不理想,但已经骑上虎背,只能往前跑了。

我明确表示:“新歼击机的研制方案不变,下决心搞下去,

坚定不移。把所有能拿到手的新技术都掌握运用上,让新歼击机先飞上天,这就是胜利。当然,在技术方面不可预测的因素太多,确有风险。有点风险不敢干了,那就什么也干不成。经费问题由几家抬,各单位都积极想办法。有了钱还要用好,要向管理要效益。”

会后大家松了口气,打消了可能下马的顾虑。研制工作按照网络计划,继续朝前走。

此后,我深入到空军、国防科工委、航空航天工业部等所属的十多个基层单位进行调研。还召集会议,专题研究了预警机、“歼8-II”飞机改装、航天新型号、载人上天飞船等问题。大量调研工作,给我认真上了一课。

空军的装备发展情况基本清楚了,我想对部队的装备管理使用情况再做一些了解。

对我军的装备建设问题,1988年底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后,我曾进行了认真思考。

从国家大局来看,小平同志为我们规划了分三步走的蓝图。第一步到1990年,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翻两番,实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世纪中叶,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其根本点是振兴中华。我想,国家和民族的振兴,离不开生存、安全和发展三件事,就是一要吃饱穿暖,二要有安全保障,然后继续发展。历史经验表明,落后就要挨打。因此,我们在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决不能忘记国防建设。

国防建设是个渐进积累的过程,不能放它一二十年,等有钱时再来突击;许多研制工作周期很长,不抓紧时间把一些重点项目搞上去,差距会越来越大。现在,世界大战打不起来,我们应该在争取到的和平时间内,积极发展武器装备,刻不容缓,以使国防实力有较大发展。

面对台湾的斗争,我们不能不考虑实力,不能睡大觉,在装备发展上必须有预先准备,否则,“台独”势力会越来越变得猖獗。当然,发展武器装备,还有经济基础、技术条件、思想认识、组织指挥等一系列的问题。现在许多情况都发生变化,工作方法也不能像五六十年代那样,军工体制垂直领导,中央一句话,一杆子插到底,令行禁止。经费投入也不像过去那样充裕,先干后结账。社会风气也不像过去那样朴实,讲价钱的多了,抓实事的少了。

实际现状是,我军装备经费短缺,老装备淘汰速度慢,加大了修理费用。新装备要有新的管理办法,具体怎么办底数不大。

为了检查装备管理情况,3月2日至3日,我和总参装备部贺鹏飞部长、北京军区李来柱副司令员,来到某集团军,检查了五个团队。他们是陆军现代化装备最集中的部队,装备品种多、数量多,性能先进。我们没有事先通知,突然到达。检查后的印象不错。这么多装备,管好并不容易,军、师几级干部都想了不少办法,做了大量工作。

但是也存在问题,较大的有三个:

一是训练还没有真正摆上战略位置。部队没有训练场地。油料限制、摩托小时限制、场地限制,许多装备只好封存起来。技术干部、技术兵的训练强度低,装备都放在基层封存,放都放坏了。

二是装备管理重视不够。部队装备是一笔巨大财富,是国家和军队的固定资产,是战斗力,搞不好就削弱了战斗力。但是,有些干部并不重视装备管理工作。目前,建设和训练现代化军队,基本要依靠现有装备,将来打仗,还要靠这些装备;因此必须把现有装备管好用好。面管理问题,恰恰是我们的

一个薄弱环节。管理工作学问很多,管得好与不好,效果大不一样。现在钱少,是个实际问题,钱少再管不好更是问题。有些浪费是无形的。这么多装备,这么点维修费,只有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才会出效益。

三是部队的实际困难多。如某型自行榴炮底盘不通用,给部队使用维修带来许多麻烦。一件装备几家管的现象让部队叫苦不迭。现代化的装备长期没有库房,风吹雨淋,实在叫人心疼。还有如有编制没装备、有装备不列编的问题,部队很难办。

这些问题,都或多或少地影响部队战斗力的提高。回到北京,我便立即找了总参、总后的同志,商量解决编制体制、训练场地的具体办法。

求实地讲,我国的国防科技工业,有过黄金时代,本应该向更高层次冲刺,却由于种种原因萎缩了。从装备方面看,相比美苏,要落后若干年,且差距还在加大。我认为,造成的眼下局面,经费不足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体制不顺、决策偏颇、管理多头,形不成统一领导。

国防科工委的同志提出,能不能建议国务院、中央军委成立个统筹军品民品生产的领导小组,由姚依林副总理和我分别任组长、副组长,几个军工部、财政部、国家计委的领导任委员。

我的意见是,请李鹏总理、姚依林副总理、杨尚昆副主席都参加。我想先给李鹏总理汇报,听听他的意见。我总觉得,国防工业的现状不能如此继续下去了。

可是,这段时间发生了“八九政治风波”,许多工作被迫中断。

8月4日下午,我和丁衡高主任去李鹏总理办公室,汇报

了当前武器装备研制现状、存在问题和加快武器装备发展的建议。

李总理听得很认真,记下了问题。他表示,要着重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解决经费问题。发展国防科技工业,没有钱不行,要从财政体制的改革上来解决。像过去周总理、聂帅领导那样,集中力量,突出重点,办成几件事。这就需要不仅是中央,而且地方也都树立国防观念,认识国防科技工业的重要性。二是解决改革开放与自力更生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执行改革开放的方针,在与先进国家进行技术交流、技术引进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国防科技工业毕竟是个敏感的领域,西方有的国家,亡我之心不死,总想对我们搞和平演变,一有风吹草动,他们总是先从这个领域开刀。因此,我们不会回到过去那种封闭状态,在国防尖端这个领域,我们要注意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但更多地要强调自力更生。还有一个体制问题,也就是组织管理问题。首先是怎样加强国务院、中央军委对国防科技工业的宏观管理和宏观调控能力,充分发挥它的作用,既要增强后劲,保持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势头,又要更好地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

李鹏总理的意见给我们增添了信心。之后,国防科技工业重又得到重视。

9月2日,我陪同李鹏总理,接见了新一代航天型号研制工作会议的代表。

6日,我陪同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到航空航天工业部第一院总装车间,听取一院、二院、三院院长关于新一代航天型号研制情况的汇报,观看部分型号产品及新型战车表演。我还将录像带专门送给邓小平主席参阅。此后不久,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品出口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国务

委员邹家华和我共同负责,我负责日常工作。

27日,我陪同江泽民主席、李鹏总理、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乔石、姚依林、李瑞环和杨尚昆副主席、王震副主席等领导同志,参观全军新装备展览。这是新一届的中央领导班子第一次集体出席军队活动,对全军装备工作是极大的激励和支持。

10月8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国务院、中央军委专门委员会,主任李鹏、副主任为姚依林和我。

“八九政治风波”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带头制裁中国。我国和美国政府间签定的军事合作项目协议,一夜之间被撕得粉碎。军委常务会上,杨尚昆副主席提醒我们,中美苏大三角关系正在变化,要顺应形势,原则上可以发展中苏军事技术交往关系。这时传来信息,苏方对我方提出的在高技术、航空等领域进行合作,表示完全同意。

我意识到,对于加快我军装备现代化建设,这是一个应该认真抓住的机会。8月初,我召集国防科工委、空军、总参装备部、航空航天部、电子部的领导同志研究组织代表团,去苏联摸摸情况。从以往掌握的情况看,苏联的国防工业技术水平比我们高一大块。许多高技术,我们自力更生也能搞出来,但时间要很长;苏联有现成的,我们可以想办法引进,消化后提高自己。大家一致同意,先派代表团去打开路于,重点是航空领域。

12月,航空航天部姜燮生副部长率专家代表团考察了苏联的航空工业。他们认为,苏联国防工业基础雄厚,科技水平高,研制生产的军用、民用飞机性能与欧美的飞机基本相等,都达到了80年代先进水平。有些是我们需要的,尤其重要的是,苏联对我态度积极,友好开放。应抓住时机,从苏联获取

所需先进技术。

听了专家们汇报后,我认为要争取时间,便在12月26日给杨尚昆副主席写信,建议在加快我们自己研制的同时,还要借助苏联技术,尽快搞出新型军用飞机。我国发展航空工业的基点放在自力更生上是肯定的,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的。同时,哪里有可供我们借鉴的技术,就要充分吸收利用,以加快我前进速度。希望中央早作决策,迅速组织军用飞机考察团,以政府的名义派出,考察苏联军用航空科技与生产情况,研究我们如何引进苏联的技术。

杨尚昆副主席看了我的信后,表示同意。29日批转给李鹏总理。31日,李鹏总理批示“同意”,并作了具体指示。

两位领导同志的批示,我立即传达给了外交部、总参谋部、国防科工委。自此,中苏军事技术合作拉开了帷幕。

第二十章 动荡的世界

新的任命

1989年11月6日至9日,作为中顾委委员,我列席了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会议进入人事酝酿阶段时,涉及到我的工作安排,让我很意外。

中顾委的同志都住在空军大雅宝招待所。那天,会上印发了军委主席邓小平9月4日上午与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杨尚昆、万里同志的谈话要点材料。这份“要点”中谈到:小平同志主动提出,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提名江泽民任军委主席,杨尚昆兼副主席,刘华清任副主席,杨白冰为秘书长。

我吃惊了:小平同志提名我当军委副主席!

我感到自己能力难以胜任。于是,给小平同志办公室打电话,请他们向邓主席报告:“还是选别人好。”

邓办的同志告诉我:“邓主席已经定了,不会改变。”

我不再坚持了。从小平同志讲话的“要点”中可以看出,他

想得很远,考虑的是中国的安全,中国的未来。他说:“党要管军队,因为军队始终是党的”。“军队是党的军队,当然也是国家的军队”。“我们军队要成为一个听党的话的军队。我们的传统是军队不能搞集团,不能搞小圈子,不能权力集中在几个人身上,军队任何时候都要听中央的话,听党的话,选人也是选听党的话的人。军队不能打自己的旗帜,所以,既然变动军委主席,也要考虑军委组成人员和工作机构问题,连同我的问题一同解决比较好。我提议江泽民当军委主席。江泽民同志过去与军队联系少一些,但也不是没有联系,他当主席比较顺”。

对军委今后的工作,小平同志作了细致谋划:“主席要有助手,就是副主席、秘书长。有两三个助手,他这个主席就好当了,有事可以找人办,否则什么事情都要主席出面那受不了。军队工作也是很多的呀!尚昆这届不退,现在一下变动太多不好,稳定军队是很重要的。刘华清当副主席,杨白冰当秘书长。刘华清身体好,知识面比较宽,解放后一直搞国防工业、搞科技装备,在苏联还学了几年。他懂科学,搞卫星、导弹都参加过,是荣臻同志的主要助手。选这么个人当军委副主席恐怕比只看资格好。我们军队中老干部四方面军的占大多数,这个副主席要是四方面军的。刘华清是四方面军的,某种程度上说是比较年轻力壮一点的,身体好,是能听党的话的。当然,听党的话的人多得很,但是他几个条件都具备。我比较倾向这次加一个副主席,搞一个新秘书长,作为泽民同志的主要助手。”

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了根据邓小平主席提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议定的中央军委人事安排。

对于新一届中央军委的其他人事安排,我衷心拥护。但

全会决定我担任新的军委领导职务,我从没想到过。这个职务责任重大。坦率讲,我觉得无论从能力、经验、阅历等方面来看,都感到压力大。但事已至此,我只有真诚感谢党和同志们的极大信任,下决心加强学习,依靠全军广大官兵,尽职尽责,努力工作,不负重托。

11月10日至12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了扩大会议。这是江泽民当选军委主席后召开的第一次军委扩大会议,江主席、杨副主席、我和杨秘书长都讲了话。

江主席首先高度评价了邓主席主持军委工作十年,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他说,这十年是军队在改革中不断前进、战斗力有了很大增强、面貌发生重大变化的十年,是我军发展史上一个崭新的阶段。我军建设十年来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和进步,都是小平同志正确领导的结果,都凝聚着他的智慧和心血。他把马克思主义和我军的实际相结合,提出了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方针原则,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现在,小平同志虽然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了,但他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思想和理论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对今后军队建设有着长远的指导作用,我们要认真学习与贯彻。

江主席说,我国革命和建设几十年的历史证明,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人民解放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是社会主义祖国的钢铁长城。他号召全党和各级政府都要增强国防观念,积极支持和关心军队建设。

对军队今后的建设,江主席要求,要继承发扬过去的优良传统,奋发图强,扎实工作,沿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拓的道路继续前进,把军队的建设和改革搞得更好。

杨尚昆副主席讲话后,我讲了话。

我在讲话中谈到：“邓主席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者，是我们人民解放军的最高统帅，是举世公认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是深受全国人民和全军指战员爱戴的领袖。邓主席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丰富了马列主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军在邓主席的领导下，各方面建设也取得了显著成就。邓主席提出的建军思想和一系列方针原则，是引导我军胜利前进的旗帜。

“我们人民解放军是具有光荣传统的人民子弟兵，是经历过长期战争和各种困难考验的钢铁长城。人民解放军最听党的话，最富有献身精神，最守纪律，成为共和国的坚强柱石。正如邓主席所说的，‘我们这个军队好啊’。我们有自红军时期创立起来的许多优良传统，直到今天还在发扬光大；我们有许多运筹帷幄、把毕生精力献给军队事业的元帅和将军们；我们有几百万面对死亡毫不含糊的优秀官兵；我们有党的英明领导；历史将会继续证明，我们人民解放军是经得起任何大风大浪考验的，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

“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在国际上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在国内需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稳定是第一位的。军队的稳定又直接关系到国家政局的稳定。实践证明，长期稳定军队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是非常必要的。军队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国际上的大气候和国内的小气候都会波及军队。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妄图使中国‘和平演变’，滑进资本主义的泥潭，达到他们‘不战而胜’的目的。国内外的敌对分子相互勾结，正企图破坏、分裂军队。对此，我们务必提高警惕。军队是掌握枪杆子的武装

集团,为了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必须高度集中统一,高度稳定,高度团结。”

会议闭幕的当天,小平同志来到京西宾馆,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全体代表和工作人员,李鹏、万里、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王震等同志也来了。邓主席十分高兴地和大家合影留念。

小平同志高风亮节,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在身体健康的时候果断辞去军委主席职务,这并非凡人所能。他的这一举动,更增添了我对他的留恋和崇敬之情。

会后,江主席找我、杨秘书长和军委办公厅刘凯主任谈今后工作。

他明确了军委的日常工作分工,强调军队的事情要讲效率,不能延误时机,重大问题要提交中央常委会讨论,并让我主持军委常务会议。

我很清楚,自己作为军委最高领导人的助手,应当尽职尽责,多抓落实。有问题时,先向杨副主席请示,重大问题及时请示报告江主席。

军委扩大会议后到年底的一段时间,事务性工作特别多。我参加了全军政治工作和全军后勤工作等几个大的会议,讲过几次话。这些讲话中,一个中心思想,就是想告诉大家,一定要脚踏实地,少说空话,埋头苦干,在中央军委领导下,把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推向前进,用实际行动回答党和人民的信任。

1990年4月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选举江泽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4月4日,根据江主席提名,七届人大三次会议决定杨尚昆和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至此,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为:

主席:江泽民;

副主席:杨尚昆、刘华清;

委员:杨白冰、秦基伟、迟浩田、赵南起。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

军队“八五”计划

1990年,进入了本世纪最后十年。元旦过后,中央和国务院组织力量开始研究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与此相对应,作为国家总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军队也需要作出“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

3月17日,军委常务会议决定,成立军队建设“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领导小组。我担任组长,总参迟浩田总长和总后赵南起部长为副组长。成员有总参副总长何其宗、总政副主任于永波、总后副部长张彬、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怀国模、军事科学院院长蒋顺学、军委办公厅副主任李际均。

军队的“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需要对国内外形势和周边环境有准确的分析判断,还需要明确2000年前军队建设的发展目标、军队经费物资需求测算、军队装备发展设想、国防工程和基本建设规模等问题。

主持这一规划的制定,我深感责任重大。

接受任务后,我头脑里出现一系列问题:如何恰当地估计军事斗争的任务?如何正确地确定发展重点?如何把近期目标和中远期目标有机地衔接起来?如何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同时又发展自身?如何协调方方面面的需求,既防止

指标过高盲目跃进,又防止指标偏低无所作为?这都不是小问题。我所面对的是一件直接关系到军队长远发展和国家安全的根本性大事。

这时正值东西方冷战即将结束的前夜,东欧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出现政治动荡。虽然我没想到苏联第二年就会解体,世界政治格局将重新划分,却明显感觉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势。我们国家可能面临更加复杂的国际局面,“八五”期间一直到本世纪末,中国军队建设必须有所作为。

任务艰巨,担子不轻。我抱定决心,坚决对军委负责,对军队今后的发展负责,不管钱多钱少,都要想办法把部队建设搞好。

3月22日,我主持召开了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明确了计划和规划的基本依据、工作步骤、完成时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从总参作战部、装备部、军务部、军训部、总政干部部、总后司令部、财务部、科工委综合计划部、军委办公厅等单位,抽调一批素质较高的干部组成精干工作班子。

对于规划的制订工作,江主席和杨副主席指示非常明确。江主席提出:“要考虑加强国防建设的需要,也要考虑国家财力的可能”;杨副主席提出:“要把建设和改革结合起来”。这给规划制订工作指明了方向。

我们研究的第一个大问题,是如何判断国家安全环境。

对于国际形势的分析判断必须十分准确。只有形势看准了,才能心中有数,知道到底该养多少兵。当时的分析是,国际形势总趋势继续由紧张趋向缓和,由对抗转向对话,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世界面临的两大主题。但由于东欧的政治动荡,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局面已经发生变化,原来那种中苏美大三角的格局有了新的调整,加之西欧和日本的崛起,

世界格局中的多极化趋势明显加强。一些局部地区也出现了新的紧张、动荡和分化。总之,整个世界形势正经历战后以来的一次深刻变化,今后五到十年,将是国际形势发展和战略格局演变的重要转折时期。

我担心两个问题。

一是台湾问题。台湾当局在美国帮助下拼命发展武器装备,看不出和平统一的诚意。我军始终没有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要打台湾,需要花费很大代价。一旦台湾真的要搞“台独”,我们绝对不会允许,最终只能以战争解决。我衷心希望不会出现这种局面,但作为军队,必须提前考虑到最坏结局。

另一个担心是,随着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国际军事领域中的新发展,对我军建设的影响会越来越大。美苏等国正在积极调整军事战略,并对武装力量进行结构性调整。一方面较大规模地裁减军队数量,收缩本土和海外军事基地,淘汰陈旧武器装备;另一方面,又在加速武器装备更新,增加高科技投入,完善快速反应体制,加快质量建设的步伐。我国周边的一些国家也都在大力加强军队建设,军费投入呈上升势头。在国际军事力量竞争中,重视质量建设已成为军队发展的共同选择,高技术的局部战争将是今后的重要战争样式。

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情况下,如何保障我国安全、搞好军队建设,这是一项重大的系统工程。古人有两句话令人深思,“国虽大,好战必亡”。如果军备过大,征战不止,势必增加国家负担,拖经济建设后腿,对国家和军队长远发展不利。这可以从许多国家的兴衰史上找到例证。“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民族安危不可麻痹大意,何况天下并不太平。军队建设必须规模适度,以必要的实力地位争取和保障和平。我国是一个大国,安全环境很复杂,军队建设要正确处理数量和质量的关系。

系；需要有一定的数量，也不能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我们研究的第二个大问题，是军队建设中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七五”期间，我军建设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为“八五”期间的继续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部队也依然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有的还相当严重：

一是摊子过大，结构不合理。

过去按照“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需要，军队铺了很大的摊子，包括各种机构、设施及布局等。部队精简后也没完全减下来，建制单位多，架子大，部署散，成为军队建设的沉重包袱。部队中，机关、院校及保障单位的人员，远远超过作战部队的员额。官兵比例也偏大，居世界主要国家之首。指挥层次多，效能不高。

二是武器装备建设严重滞后。

我军主装装备数量居世界前列，但因投资不足，加上军品价格大幅度上涨，新研制出的武器装备无法大量装备部队，补不抵退。我国空军现有部分主要作战飞机性能落后。海军水面战斗舰艇中小型舰艇较多。现代作战需要的一些重要装备，如武装直升机、空中加油机、战略预警系统、航空母舰等，目前还是空白。对未来军事技术发展影响最大的微电子技术和信息处理技术，仍是主要薄弱环节。常规武器与周边某些国家比也不占优势。更为突出的是，武器装备目前又进入了更新期。由于新装备补充不上，大量旧装备超期服役，维修费用不足和器材价格上涨，再加上对维修工作不够重视、体制不顺、管理不善等原因，导致装备失修日趋严重。尽管军委、总部采取过一些紧急措施，问题并没能得到根本解决。

三是国防科研和军工生产面临很大困难。

“七五”期间,国防科研投资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呈连续下降趋势。军工企业的设备大部分是五六十年代制造的,多年来未进行技术改造,生产高新技术武器比较困难。军品生产能力虽已大大压缩,但每年的装备订货量仍然不多,一些骨干军工企业生产任务减少,国防科技和工业生产的综合水平难以提高。

四是各项经费短缺,欠账较多。

工程建设经费保障水平和实际需要差距很大。军用机场超寿命使用、码头失修的现象严重,尤其是部队训练,受经费、弹药、油料等限制,加之征地和赔偿费急剧上涨,部队实装实弹演练大幅度减少。空军飞行部队和海军舰艇部队也因费用保障不足不得不减少训练时间。大量的钱财用于养人和保摊子。

五是部队管理中存在不少问题。

有些单位恶性事故和重大案件时有发生。训练和管理仍然是我军建设的薄弱环节。有的战备值班部队一年训练的时间很少;有的部队多年来不搞实弹演习和野营拉练;有的部队战备制度形同虚设。

只有正视问题,才能解决问题。我军目前的建设水平与我国的大国地位、军事斗争的需要以及世界军事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相比,还不相适应。军队建设任重道远。当然,分析研究中我也看到,现在的国际国内环境对我军建设非常有利,挑战和机遇并存。我们只要上下一条心,既不妄自菲薄,又不盲目乐观,就能战胜各种困难。

规划研究中的第三个大问题,是军费投入的可能性。

这是最为头痛的问题,也是反复来回不定的问题。当时,根据军队建设现状和将来可能担负的军事斗争任务,以制止军队建设滑坡、维持正常运转和主要方面略有改善发展为目

标,总后勤部的有关同志提出了“八五”期间“基本军费需要量”、“基本需求案”和“最低需求案”。我和总后勤部的同志一起,多次向国务院领导和国家计委、财政部的领导反映,现代化军队的建设投资,已经完全不同于过去。高水平高质量的武器装备系统,不仅研制周期长、投资强度大,而且维护保障复杂、耗费多。在全部军费构成中,装备发展费应当大大超过生活维持费。

我请专家计算过,要彻底改变我军武器装备现状,全面提高质量,没有两倍、三倍于今的经费是不可能的。无论海军、空军、二炮还是陆军机械化部队,要改变现状,花的都不会是小钱。我还认为,我们的军官、士兵待遇低,与地方的反差很大,基层干部有很多实际困难解决不了。我们理解国家的难处,按照中央安排,“八五”头一年或更长一点时间,仍以治理整顿为主,国家财政有较大赤字,很难大幅度增加军费。我们一直是争取中方案,立足低方案,强调再忍耐,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

党中央会议曾明确,今后十年,必须进一步推进国防现代化建设。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适当增加国防费用,有重点地加强新武器的研制,提高军队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因此,我几次找江泽民主席、李鹏总理和姚依林副总理,反映军队的困难。作为军队的一名高级领导干部,我必须实事求是地反映真情,给党中央决策提供可信、准确的依据。

我们研究的第四个大问题,是军队建设的指导原则。

首要的是确定了“八五”期间我军建设的基本目标:进一步提高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水平,着重增强打赢局部战争和应付突发事件的实战能力,建设一支组织精干、战斗力很强的军队,有效地履行宪法赋予我军的对外反侵略、

对内反颠覆的神圣职责。

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我把军队改革和建设的指导原则概括为六个必须:

必须继续贯彻稳定部队的方针。90年代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维护国家和社会的长期稳定,是搞好一切建设事业的基础,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军队的稳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只要我军坚如磐石,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就不怕国内外敌对势力兴风作浪。稳定并不是维护现状,更不是安于落后。在有利于稳定的前提下,要进一步深化军队改革,兴利除弊,推动部队建设。

必须重视军队的质量建设。我国是一个大国,安全环境又比较复杂,应当保持一支适当规模的军队。但要正确处理数量与质量的关系,重视从质量上加强我军建设。这是我们研究论证今后军队发展得出的一条最重要的结论。一个国家要维持庞大的军队,必须投入巨额经费,没有强大经济实力是无法承担的;连美苏这些国家也存在着经费不足的难题。就我军现阶段建设情况看,由于军费十分紧缺,保持数量与提高质量不可兼得,而加强质量建设则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几十年来,我军在党的绝对领导下,有特有的政治优势,有科学的军事理论,有几十年建军的优良传统。必须从我军的实际情况出发,扬长避短,决不盲目与外军攀比。质量建设的标志是战斗力的提高。在现代战争中,军队的质量优势对胜败的影响增大。加强我军的质量建设刻不容缓。

必须下决心收缩摊子。“兵贵精不在多”,军队摊子过大,使我们没有办法集中财力加强部队战斗力建设。减人与收缩摊子相比,收缩摊子更重要。

必须突出建设重点。军队的各项建设不能“齐头并进”。

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八五”期间在部队建设上主要加强重要方向重点部队的建设,特别是充实部队,精简机关,把部队编得精干、充实、整齐,真正做到满员、齐装、配套,一个师顶一个师用。重点加强海、空军和二炮建设,提高海空作战与核威慑能力。

必须加强集中统一。分散主义是当前部队建设中的一种十分有害的倾向。其主要表现是:自成系统,“分兵把口”,各自为政;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各行其是;财力分散,效益较低;经济利益的多元化倾向有所滋长。军队必须强调高度集中统一和组织纪律性,强调局部服从全局,强调治军要严,从领导机关严起。

必须坚持勤俭建军的方针。军队供需矛盾将是长期的,必须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军队越发展,越要提倡艰苦创业的精神。要像战争年代毛主席要求“节省每一个铜板用于战争和革命事业”那样,时时处处厉行节约,抑制过高的消费要求,克服浪费现象,抓好领导干部和机关的廉政建设。

我们研究的第五个大问题,是军队改革的具体内容。

这个问题,议得最多,议的时间最长。各大单位都表示,应该改革,支持改革,可一旦问题落到实处,就难办了。

比如“减人收摊子”,谁都拥护。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时,党中央就曾提出“精兵简政”。毛泽东主席当时要求全党全军,“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现在的情况有相似之处,只有下决心舍弃一部分,才能保障重点。适当压缩军队规模,不会有大的风险。问题是,一旦具体到撤销哪个单位,麻烦就来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很难协调统一。

又比如,全军 100 多所学校,存在着结构不合理、专业设置重复、领导管理多头、工作效率低等弊端。院校调整问题,反复研究过多次,可是,部门所有制的影响根深蒂固,调整计划无法统一,方案迟迟不能出台。

无论如何,军队的体制编制问题不能再拖了。一点不想动,继续维持摊子,是根本不行的,一定要重新调整。现在不动,今后十年,肯定还得调整,而且难度会更大。

因此,对进一步改善部队编组、改革后勤供应体制、理顺后备力量建设关系、加强武器装备建设、强化军事科学研究、提高管理水平、抓好教育训练、干部管理等问题,我们逐一作了研究。

尤其对生产经营工作,提出了加快归口管理的要求。我曾讲过:“在国家经济比较困难的情况下,‘皇粮’一时不够,需要有组织地、适度地搞一些生产经营,以弥补军费不足。同时,应该清醒地看到,这是不得已的办法。像现在有些单位只管赚钱、不顾后果的做法,必然会腐蚀干部,败坏风气。因此,必须对生产经营进行整顿,逐步实行集中归口管理,建立生产收益与军费统管统用制度。对这个问题,现在抓还来得及。如果我们犹犹豫豫,下不了决心,今后就会犯大错误。”

“八五”规划工作,前后进行了 10 个月。整个工作班子兢兢业业,不断征求意见,不断修改,一遍遍完善方案。讨论研究中,民主气氛很浓。

通过大家的辛苦努力,我们按计划完成工作,形成了《中央军委关子“八五”期间军队建设计划纲要(草案)》。

对这一《纲要(草案)》,江主席和杨副主席两次主持会议进行研究。

1991 年 1 月,又提交军委扩大会议讨论。会上,我就《纲

要(草案)》的主要内容作了说明。来自各大单位的军政一把手都参加了会议。大家发表了一些不同意见。有的觉得,各种机构设施建设起来不容易,舍不得收缩;有的怕影响部队稳定;还有的质疑,认为论证决策正确与否,要到“八五”后期才能真正看出效果来,等等。

我意识到,实现军委的决心,关键在高级干部。高级干部思想不统一,实际工作就很难行得通。

在很多场合,我反复向大家宣传军委意图,告诉大家:调整体制编制,是为了适应新的情况,解决现存的矛盾,符合军队建设客观规律。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恰恰是为了保证部队更长远、更深层次和更大范围的稳定和发展。可以设想,如果现存矛盾不解决,拖下去,只会越积越重,势必被迫进行更剧烈的调整变动,付出更大的代价。当然,调整改革会引起思想波动,涉及一些单位的利益变动,触及一些同志的个人利益。我们一方面要教育部队树立全局观念,服从大局需要;另一方面,必须强调组织纪律性。我强调说,军委在决策前应该充分研究论证,尽可能地听取各方面意见。一经决定,任何单位、任何个人都必须无条件地贯彻执行。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不允许有丝毫的含糊。从严治军,从高级领导机关严起,从高级干部严起。我相信广大官兵是有觉悟的,部队是听指挥的。通过细致的组织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可以消除消极因素。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军委关于“八五”期间军队建设计划纲要》。此后,《纲要》有计划分步骤地开始实施。

1991年底,又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对许多重大问题,高级干部统一了思想认识。1992年4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八五”期间军队体制编制调整精简总体方案》和《全军院校体制编制调整方案》。1992年9月,中央军委又召

开了全军院校工作会议、全军编制工作会议。军队改革在一步步深化。

经过努力,改革方案尽管实施了,但有些措施因各单位领导班子变动较大而没能贯彻落实。有些应该改革也可以改的,因为种种制约没有改成。

我很清楚,为了改革,难免要做一些得罪人的事。但为了国家和军队的整体利益,我坚持改革不动摇。

中苏军事技术合作

进入90年代,世界政治和军事格局变化剧烈。依据国际形势变化,我们开展了与苏联的军事技术合作。

1990年3月,中央军委批准国防科工委副主任谢光率团访问苏联。临行前我交代他们:要多了解苏联的情况,探讨与苏联开展军事技术合作的可能性。几十年来,苏联大规模发展国防科技工业,在许多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有许多高新技术值得我们引进和借鉴。要针对国内情况,有计划有重点地去看。人家不会像50年代那样对我们援助了,要将他们的高新技术、高新军工产品引进,是要付出代价的。

访苏代表团回国后,向军委作了汇报。军委常务会议上,研究了与苏联搞军事技术项目合作问题。

有人不赞成引进苏联军事技术,主张还是自力更生。有的说,为了加快国内研制速度,避免摸索时间过长,少走弯路,还是引进一点。

我的意见很明确:“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是正确的,但现在基础还不行,应引进有关的先进技术。”

最后决定:把先进技术拿到手,不是完全仿制,而是创新。

4月下旬,李鹏总理访问苏联,表示中方对航天航空方面深层次的合作感兴趣,并建议成立混合小组具体讨论。苏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表示同意,并明确苏方小组组长为部长会议副主席兼部长会议军事工业问题国家委员会主席别洛乌索夫,组员为外经部长、航空工业部长、通用机械部长等。李总理表示,中方也将很快成立混合小组。

李总理回国后,向江主席、杨副主席作了汇报,并明确中方小组组长由我担任,具体组成人员由我确定。李总理将这一情况告诉我后,我提出,中方小组成员由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航空航天工业部部长林宗棠等组成,并接受苏方邀请,5月份中方小组访问苏联。

为慎重起见,根据军委常务会议精神,我在5月3日召集丁衡高、林宗棠和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李岚清,以及军队各总部有关同志,专门研究丁与苏联开展军事技术合作的问题。

会议明确了中苏军事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中方人员组成、访苏代表团的组成、主要任务、与苏合作方式、经费来源等问题。根据中苏合作的历史和国际惯例,往往购买技术时都会与购买装备挂钩。会议特别研究了向苏方提出购买最先进战斗机的问题,当前的最佳选择是“苏-27”或“米格-29”飞机。

5月5日,我写了一封信,向江主席、李总理、杨副主席请示几个问题:一、中苏军事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的中方人员,由刘华清、丁衡高、林宗棠、李岚清四人参加,统一负责对苏国防科技及军工领域合作的一切事项;二、立即组成代表团,5月底或6月初访问苏联;三、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在国防科学、技术和工业领域合作的协议》,以法律文件形式促进双方的合作;四、商谈

购买“苏-27”飞机及相关技术等；五、技术上探讨多种合作方式，支付方法易货为主；六、经费来源。

信发出后，他们很快批示同意。

经外交部正式向苏方通报并得到苏联驻华大使馆答复同意后，我们开始了访问苏联的准备。

5月31日，我启程离京。随行的有航空航天工业部部长林宗棠、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李岚清；丁衡高主任有病，临时委派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沈荣骏为代表；还有一些工作人员。

这次访问，是中苏军队高层领导中断30多年后的第一次交往。苏方十分重视，安排我会见了苏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中央书记处书记扎伊科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元帅等。我们交谈的内容，多是国家政策、中苏友好等问题。雷日科夫说：苏联坚定地奉行向前看的方针。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感情是经过时间考验的。他用很长时间，讲了苏联在军事技术方面的先进。提出，50年代，苏联曾经援助中国建立国防工业，现在应该以更现代的形式恢复这种合作。扎伊科夫和亚佐夫在会见时也讲了话，都十分热情友好。

我也表示，中国党的干部、人民、军人对苏联怀有同样深厚的感情，世代友好对两国人民有百利而无一害。我还介绍了中国的改革情况，特别强调了社会稳定、政治稳定、军队稳定、经济发展、党的领导的重要性。

我很清楚，这次访问的重点，应该在中苏军事技术合作方面有所突破。

我和苏方主人、苏部长会议副主席兼部长会议军事工业问题国家委员会主席别洛乌索夫进行了多次坦率的会谈。尽管有些问题反复争执，但最后还是找到了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

这次访问中,我们举行了中苏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苏方派出了出乎意料的强大阵容:军事工业问题国家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及副主席、航空工业部部长、通用机械工业部部长、国家计委第一副主席、外经贸部副部长、外交部副部长和武装力量副总参谋长等。

会谈后,我与别洛乌索夫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军事技术合作的协定》和《中苏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纪要》。

访问期间,我重点考察了苏联的航空航天工业。苏联安排我们观看了“苏-27”、“米格-29”歼击机和“米格-28”、“米格-35”战斗直升机飞行表演,参观了流体动力、发动机等三个研究机构,一个设计局,“米格-29”飞机及发动机制造厂等四个工厂,航空飞行控制中心、宇航培训中心、发射场以及空、海军基地等单位。

32年后重访苏联,感触很深。求实地讲,经过数十年努力,苏联在航空航天技术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成为能自行研制门类齐全的各种飞机、导弹和航天系统的工业大国,是世界上唯一能在航空航天产品和技术方面与美国全面竞争的国家。苏军的军用航空技术和装备也很先进,主要表现在:机种齐全、装备配套,能遂行各种作战任务;各类飞机的作战性能均可与美国的同类飞机抗衡;拥有雄厚而完整的科研、设计、生产和实验体系。

我特别留意“苏-27”和“米格-29”两种歼击机。从飞行表演看,两机的飞行性能非常出色。尤其“苏-27”更为突出,其作战半径约1400公里,大角度飞行已超过西方同类飞机,它的“眼镜蛇”特技更显出其优越性能。

访问中,我也接触到一点苏联的社会情况。我在市中心街散步,小股人群集会几乎天天可见。陪同我们的官员说:“斯大林时期是个人崇拜,赫鲁晓夫时期是唯意志论,勃列日涅夫时期是停滞不前,现在是全面消灭社会主义成果。”许多百姓牢骚满腹,公开抱怨改革没有带来任何实际成果,反而造成生活水平下降。苏联陪同人员对我们说,中国的改革从经济入手,是正确的。

我感到,苏联人民尤其是经历过中苏友好年代的人,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感情。苏联领导人也十分珍视与我国恢复起来的友好关系,重视并且愿意发展与中国在各个领域包括军事技术领域的合作。

结束访问前,别洛乌索夫又一次和我进行小范围会谈。他告诉我,苏联政府已原则同意向我出售“苏-27”飞机,准备下半年召开第二次混委会。

苏联政府对这件事答复得这样快,我很高兴。

6月14日我回到北京。在向军委常务会议汇报访苏情况中,我提出了几条建议:

一、对苏加强军事技术合作,总的原则应该是积极稳妥,要防止“一哄而上”和“过热”的现象,处理好与东西方国家的合作关系。必须坚持自力更生为主,重点引进先进技术,明确有限目标的方针。要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工作,先从航空航天领域的合作入手,逐步扩大到兵器、电子、船舶等领域。

二、抓紧做好内部和对外的组织协调工作。由于对苏军事技术合作主要采取军民品易货方式,涉及的部门多,范围广,协调工作量大,需要加强集中领导,统一对外。本着技贸结合、软硬件结合和军民品结合的原则,建议由一个统一的机

构归口管理和协调各方面的工作。民品易货首先在国防工业和军队内部组织货源,不足部分由经贸部负责在大贸中加以解决。

三、认真落实中苏双方所签《协定》和《纪要》中的各项工作。着手筹备在北京举行第二次混委会会议,并尽快派团赴苏考察“苏-27”飞机。

同时,我还提出了加强外交工作和经费方面的建议。

6月23日,我和沈荣骏、林宗棠、李岚清等去向李鹏总理、姚依林副总理汇报。他们问得很细。

6月30日,军委召开常务会议,再次研究进口苏联战斗机问题。杨副主席正在住院,会上传达了他的书面意见:“同意从苏联进口一些飞机,以应当前急需,但不要多买,要买还是买‘苏-27’,它的发动机比较好。”会议决定,原则同意进口苏联战斗机。

7月2日,我到中南海勤政殿,向江泽民主席汇报访苏情况。

江主席仔细询问了苏联空军的装备性能,以及国内飞机的研制和经费等情况。他说:“尚昆同志的意见是好的。讲的原则,我都同意。”

7月4日,我召集会议,布置对苏军事合作工作:一是立即组团访苏,全面考察“苏-27”飞机的战术技术性能,讨论有关商务问题。二是筹备第二次混委会议,并对代表团交代了注意考察技术的问题。

经杨副主席、李鹏总理批准,由我负责对两国政府已签定的军技合作项目进行落实,并以我的名义,正式邀请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别洛乌索夫率团于10月中旬访问中国,告知他,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确定购买一

定数量的“苏-27”战斗机的意向,期待着他们的正式答复。

8月23日至9月13日,总参装备部长率团赴苏,对“苏-27”飞机再次进行了技术考察,基本摸清了飞机的技术状态和作战使用特点以及苏方向我提供飞机的商务条件。回国后,向军委常务会汇报了访苏考察情况。

邀请别洛乌索夫访华的信息很快得到了回音。10月25日中午,别洛乌索夫率领苏联政府代表团一行19人到达北京。

下午,我们便在钓鱼台举行第二次中苏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会议。根据情况,混委会中方成员作了相应增补,由原来的四人增至11人。除我之外,有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副总参谋长何其宗、航空航天部部长林宗棠、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李岚清、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甘子玉、外交部副部长田增佩、机械电子部副部长曾培炎、军贸办公室主任曹刚川、总参装备部部长贺鹏飞、国防科工委外事局局长邓佑生。苏方成员中,除了别洛乌索夫外,有部长会议国家军事工业问题委员会副主席马察克、航空工业部部长瑟斯措夫、通用机械部部长希什金、国家计委第一副主席斯梅斯洛夫、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格里申、外交部副部长罗高寿、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兼干部部长斯米尔诺夫、国防部装备部副部长丰季科夫、部长会议国家军事工业问题委员会局长哈尔琴科、责任秘书梅德韦杰夫。

会谈中,我首先重申了中国政府对发展中苏友好关系的立场,向苏方通报了中国当前的政治经济形势,着重就中苏军技合作的有关问题向别洛乌索夫表明了态度。希望双方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积极开展军事技术方面的合作与交流。

别洛乌索夫说,苏联政府作出向中国提供“苏-27”飞机

的决定是相当不容易的。关于向中国提供飞机技术及开展军事技术合作与交流的问题,可由双方对口部门进一步商谈。

以后几天,会议责成双方专业人员继续谈判。

10月27日上午,李鹏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别洛乌索夫率领的苏联政府代表团,我参加了会见。

李总理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对代表团来访表示欢迎。他说:“我相信,通过这次访问,中苏两国一定会进一步加强包括军工领域在内的经济技术合作。”李总理在向客人们介绍我国改革开放12年来的实践时指出,社会主义各国情况不同,各国人民都应该根据本国的国情进行改革和建设,选择本国的发展道路。

别洛乌索夫介绍了目前苏联的国内情况。他说,苏方对加强同中国的经济技术合作是有诚意的。巩固和发展苏中关系,不仅有利于苏中两国人民,而且有利于世界和平。苏联领导人同意向中国出售“苏-27”飞机,是为了体现对中国的感情。

10月30日,别洛乌索夫在外地参观回京,晚上,李鹏总理又会见了她。

别洛乌索夫对这次访问受到的热情接待表示满意。应别洛乌索夫要求,李总理、我与别洛乌索夫、索洛维约夫就购买“苏-27”飞机问题,再次进行了商谈,双方意见达成一致。

11月1日上午,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我与别洛乌索夫进行了结束性会谈。双方顺利签署了《中苏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纪要》。

双方对第二次混委会都表示满意。我高兴地宣布:“第二次混委会圆满成功。中苏军事技术合作,比在莫斯科第一次会议时有了更宽泛的领域、更高的层次,发展的前景非常好。

希望今后的合作能够更扎实、更富有成效。”

中午，我送别洛乌索夫去机场。途中，他滔滔不绝，十分激动。他说：“回去后，马上向雷日科夫、戈尔巴乔夫汇报。”他希望中苏高层之间的交往更加密切。

我相信，别洛乌索夫的话是发自内心，绝非外交辞令。

对别洛乌索夫的访华活动，西方媒介立即作出反应。英国路透社报道中，称这次访问，是两个共产党大国迅速恢复军事合作的进一步迹象。有的西方外交官认为，中国购买苏制飞机，将对台湾海峡两岸空中力量的对比产生重大影响。

台湾当局也确实有所震动。台湾“立法院”就此事向台“国防部”提出质询，要求作出评估。台“国防部长”陈履安在立法院表示，中共从苏进口“苏-27”飞机一事值得关注。

台湾《联合报》报道：“在苏联高级政府代表团访问北京后，中共有意购买苏制‘苏-27’超音速战斗拦截机和航空电子仪器。这进一步显示，中苏两大共产主义强国正在迅速恢复军事合作，同时预示着将对台湾海峡的空中均势产生严重冲击。”

关于第二次混委会的情况，我向军委常务会做了说明。同时，用文字向江主席、杨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各同志做了汇报。

遗憾的是，随后由于苏联政局的动荡，商务谈判拖了下来。我有些担心和着急。

12月4日上午，在钓鱼台宾馆，我会见了苏联驻华大使索洛维约夫。他转交了别洛乌索夫给我的一封亲笔信。主要内容是：苏联外经部副部长戈里申海军上将，拟率团于12月中旬来华，继续进行“苏-27”飞机政府间协议的谈判。

我松了口气，随即给别洛乌索夫回信，一是表示谢意，二

是敦促谈判早些进行,合同尽快签订。

戈里申海军上将按计划来了。

我方和他们进行了封闭式的谈判,吵吵争争,进进退退,一波三折。最后,双方还是缩小差距,达成了协议。12月28日,苏联向中国提供若干架“苏-27”飞机的合同在北京国贸大厦签订。我出席了签字仪式。香槟酒“嘭”地一声打开,人人都满满一杯。我和每一位苏联朋友碰杯,又和每一位中国同志碰杯,大家都非常高兴。

中国有句老话,万事开头难。这话一点不假。我们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才有了今天的成果。

面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

刚进入1989年,东欧和苏联就动荡不安,出现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这些变化很快便演化成一场名副其实的政治大地震。震波冲毁“华约”,震撼“北约”,完全改变了二战以来的世界政治格局。

东欧的政治地震,最早从波兰开始。它恰如多米诺骨牌,第一块倒下,便开始连锁反应,顷刻之间,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全都结束了。

中国地处亚洲大陆,也强烈地感觉到了这股政治风暴的冲击。庆幸的是,中国共产党以其高度的政治智慧,稳住了阵脚,稳定了国内局势,也以改革开放的实际成果,安抚了民心。

地跨欧亚大陆的苏联则不然。这个在世界上最早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局势动荡,变化剧烈,惊心动魄。1991年12月1日,乌克兰举行了全民公决,乌克兰脱离苏联而独立。此后有关共和国签订了“别洛韦日协议”和“阿拉木图宣言”。随

着独立国家联合体的成立,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现实已不存在。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代表们通过了成立独联体和苏联停止存在的宣言。至此,具有60年历史的一个超级大国画上句号,“苏联”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对于东欧和苏联的局势变化,中国领导人一直高度关注,尤其对我们的近邻苏联。1990年1月31日,江泽民主席找我和杨白冰秘书长交代:要特别注意研究苏联动向,提出各种情况下的应变对策。

我和杨秘书长立即召集有关部门人员,作了相应安排。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开始与苏联进行军事技术合作的事情。

到1990年底,我们和苏方终于达成协议,可是苏联政局的急剧动荡变化,使刚刚开始的中苏军事技术合作变得脆弱,签订的合同也随时有变成一纸空文的可能。

值得欣慰的是,苏联方面并没有打算放弃这件事情。1991年7月6日,苏联政府新任命的混委会苏方主席、政府副总理马斯柳科夫给我回了信。信中说,他们同意8月在莫斯科召开第三次混委会。

我立即给马斯柳科夫回信,向他表示祝贺,并同意开会的时间及内容。

1991年8月19日,我计划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苏,召开第三次中苏军事技术合作混委会。

事情突然发生变化。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通报莫斯科发生重大事件。我立即和外交部长钱其琛通了电话。经请示李鹏总理,代表团行程取消。

果然,苏联政府机关来了个大换班,只有少部分政府官员

继续留任。

我寝食难安。党中央下这样大的决心，军队挤出这么多的经费进口飞机，真的要是泡了汤，怎么对得起党的重托和三军将士的期望。可对于苏联的变化我们无能为力。我督促相关人员，让他们密切关注苏联的变化。

对于苏联的巨人变化，中国共产党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及时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的24字方针。

8月2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在京西宾馆召开驻京单位领导干部会议。会上，杨尚昆副主席分析了“8·19”事件的情况、性质和看法，对部队提出了要求。我也讲了几点个人意见：

“首先，要把我们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思想政治工作搞好。把党的工作做好，把党的基层组织搞好，把党的思想工作搞好，这是中央的重要部署，军队更要抓好这个问题。

“第二，要把经济搞上去，中央采取了许多措施。现在有困难，特别是今年发生了大的灾害，带来困难不少。但是，整个形势是好的，我们过去改革十年，建立了雄厚的基础，经济基础是很好的。

“第三，要加强军队自身的建设。首先还是要强调高度的集中统一，高度的组织纪律性。苏联发生‘8·19’事件，说明苏联军队这几年已经很不纯了，思想乱了，组织上变化了，干部也变了。在戈尔巴乔夫自由化、民主化思想的影响下，党的领导作用削弱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也削弱了，这样的军队非发生问题不可。这些年，邓主席、江主席、杨副主席都多次强调我军要保持高度的集中统一，保持绝对的纯洁。邓主席提出军队要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这几条我们

要绝对做到,一定要服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第四,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抓党委、抓班子、抓基层、抓经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最关键的还是抓好干部。提高干部的思想觉悟,增强干部的党性,强化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坚定干部的社会主义立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我们一直强调的加强训练、加强管理是一致的。不能说强调了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把训练放松了;也不能说强调了抓训练工作,就把思想政治工作、管理工作放松了。这三个方面是我们军队建设的经常性工作,从上至下,都得时时刻刻抓紧,哪一个方面都不能偏废。可以说,训练水平低,管理水平低,政治上的目的和要求就达不到。同样,没有思想政治工作的启发教育,没有高度的思想觉悟,训练搞不好,管理也会出事故。

“第五,要抓好军队的作风整顿。我们过去提倡的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优良作风,被一些同志丢掉了。要从三总部、从高级领导机关做起,确实做模范、做表率。现在各级机关下去的工作组,有的是需要的,有的就是下去跑一趟完了。有的连队一年接待100多个工作组,汇报的问题都是按照一个稿子去念,听的人就那么听;这次听了,下次听的还是那些东西,真正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领导作风、工作作风上的许多问题很值得我们下决心整顿。机关大,人浮于事,就是减不下来,菩萨多了都要做点事情,和尚多了都要念经,底下就是灾难。总之,要把军队建设得更好、更纯洁、更有战斗力。”

最后,我强调了干部考核工作。“对各级干部要进行多方面的观察,要从历史、从实践过程中全面地考核了解。切实保证把我们的事业真正交给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党的可靠人

手里。这个事情不是简单的一句话能做到的,而是要做大量的细致的工作,要求各级认真考核任用干部,一定要看准。现在很多年轻干部要干到2000年,有的同志可能干的时间还更长。下一步用的人怎么选得准、看得准、用得合适,确实确实关系到保证我们军队政治上高度纯洁的一个大问题。我们现在开始就要把团以上干部看准、选好,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个人看得不准,在次要职位上问题不大,但在主要位置上发生了问题,那是很危险的。”

当然,尽管我们有很大的心理准备,但苏联解体真正发生后,还是给人以巨大心理冲击。

人们在想,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东欧是跟苏联学的,中国也是跟苏联学的。现在苏联变了,东欧也不行了,到底为什么?中国的前途命运,到底会怎么样?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过,“我们处于一种名叫和平的战争之中”。他所讲的,就是西方可以凭借科技和经济优势,采取“和平演变”的办法,对社会主义“不战而胜”。

中国国内,也确实有一些敌对分子,对东欧的变化欢呼叫好。他们忙于地下活动,总想挑起动荡,把中国变为西方资产阶级的附庸。这样的人,虽然只是极少数,但不可轻视。也有一时思想模糊,看不准和缺乏信心的同志,要进行教育。对军队来说,保持军队的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保持军队的纯洁性,树立坚定的信念,尤为重要。因此,我在很多场合讲了信念问题。

我说,社会主义信念是我们革命事业的精神支柱。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需要保持坚定的政治信念。苏联、东欧剧变后,不少同志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十分关心。坚定干部战士的社会主义信念,牢固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

观,切实打牢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基础,就显得更加重要。苏联、东欧剧变,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失败,而是这些国家内部出了问题,根本原因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出了问题,他们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放弃了党的领导,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结果葬送了本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在我军几十年的斗争历程中,无论是红军长征还是抗日战争,无论是解放战争还是抗美援朝,尽管条件艰苦,环境险恶,干部战士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之后,都有一个崇高的信念,就是坚信共产党的领导,坚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反动派;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心,就是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最后胜利。正是凭着这种理想和信念,我们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们应当充分看到国家的光明前途,看到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并用这些不断激发我们的奋斗精神和献身精神。

我反复告诉同志们,中国与苏联、东欧的情况有着根本的区别。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历史选择。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状况紧密结合,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各种复杂问题,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只要我们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把经济搞上去,并且始终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中国就有希望,社会主义的大旗就倒不了。

我曾在苏联留学四年,和不少苏联朋友打过交道。我了解苏联的历史,也了解苏联人民,细细分析“8·19”事件的历史教训,我归纳了五条:一是中央领导偏离了马列主义;二是党

的组织涣散了；三是军队自由化、非党化、非政治化恶果严重；四是领导层腐败；五是经济形势恶化。总之，我认为，不是列宁主义错了，也不是社会主义错了，而是苏联领导人领错了路，干错了事。

苏联、东欧剧变的教训告诉我们：培养干部是关系到保证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的关键环节。特别是军队的各级干部的选拔和培养，关系到枪杆子掌握在谁手里，能否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的大问题。西方资产阶级的一些预言家们认为，中国的和平演变在这一代人身上希望不大，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下几代人身上。创业难，守业更难。和平演变的斗争说到底是在争夺接班人的斗争。再过五年十年后，一些年轻的军师团干部就要被选拔到更高的领导岗位。我们这支军队能否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忠实捍卫者，能否把我军的优良传统一代代传下去，关键在各级领导干部。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是直接关系到我党、我国和我军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问题。只有通过卓有成效、坚强有力的政治工作，通过实际斗争的锻炼和考验，培养一大批党性强、能力强、遵守纪律、作风正派、有革命事业心的中青年干部，才能保证不管如何更新换代，人民军队都永远听从党的指挥，永远是捍卫社会主义祖国的柱石，才能使西方敌对势力的幻想和图谋彻底破产！

世界在动荡变化，中国也将处在新的世界格局中。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更加注意国家安全，加强军队建设。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了。中苏的军事技术合作名义上告一段落。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原苏联的大部分遗产，也承担了一切条约债务方面的全部责任。让我高兴的是，我们和前苏联的军事技术合作，也由俄罗斯全盘接手了。

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开始和俄罗斯接触,也和独联体的其他国家交往合作。先后派出了几个高级代表团,访问了俄罗斯、乌克兰,加强双边联系,建立感情。

对于这种接触联系,国内也有一些不同声音。

我认为,俄罗斯有很多人对中国怀有深厚感情。俄罗斯的科学技术也有许多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长处。现在俄罗斯经济上有困难,我们应该相互帮助。当然美国人会干涉阻止,我们唯有抓紧时间,办一件事成一件事,讲究效率和效益。改革开放为我们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创造了机遇。花点钱,买点技术,可以缩短时间,节省经费。引进技术与自力更生,不是水火不容。与其费九牛二虎之力搞出落后的东西,不如找捷径,引进先进技术,提高自己。

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使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成熟,更加坚定,更加理智,更加富有战斗力。我想,从军事角度来看,俄罗斯的军事力量还在,但体制不顺,实力削弱,已经无法与美国对抗,也无力打世界大战。世界的斗争格局将出现多元化。

在新的世界格局里,由于共同的国家利益,我国与俄罗斯等国,也会更加珍视和平与友谊,建立起新的战略伙伴关系。

海湾警钟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突然大举入侵科威特,世人震惊。

当天凌晨两点,伊拉克动用了10万部队、350辆坦克,在大批飞机掩护和一支海军陆战队配合下,越过边界,迅速包围了埃米尔王宫等科威特首脑机关,当日占领科威特全境。

这一惊人战事,立即被无线电波传到世界各地。当时我

正在召集“八五”计划的研讨会,得知这一消息,我要求总参情报部、军事科学院和有关单位,注意掌握海湾动向,搜集情况,立即展开对这场战争的各方面研究。

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美国最先作出反应。仅仅两天之后,美国便拟定了“沙漠盾牌”计划,宣称“为保卫美国在海湾的根本利益,美国应刻不容缓的采取军事行动,向沙特和海湾地区派兵”。8月7日,美国总统布什批准了“沙漠盾牌”行动计划。美国陆、海、空军立即行动,向海湾地区集结,进入战斗状态。

与此同时,美国加紧外交活动。联合国先后通过了12项决议,要求伊拉克于1991年1月15日之前撤军,否则将采取一切行动。苏联和联合国出面,斡旋于伊、美之间。

伊拉克棋错一着,宣布科威特为伊拉克的第19个省。置100多个国家的反对面不顾,死死咬住必须把科威特问题与阿以冲突联系起来解决。这一要求极不现实,正好授柄于美国。在这种形势下,陆续有39个国家向海湾地区派遣了地面部队、飞机、军舰或运输机和医疗队。还有些国家参与了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或者派兵去保卫伊斯兰教圣城。

美国一直想“走出越南的阴影”,这次得到了机会。美国的政策和目标已经很明确:歼灭伊拉克军事力量。

战争无法避免了。1991年1月17日凌晨3点,美国对伊拉克发起战略突袭,海湾战争全面爆发。

多国部队利用夜暗、隐身技术、电子战、集中优势兵力和火力的战术,达到了战术突袭目的,开战10天便夺取了制空权。伊拉克的反应十分有限。2月24日,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发起地面进攻。26日,伊拉克提出停火。28日,美国宣布停止军事行动。

这是人类进入信息化时代后的第一次高科技战争。高技术兵器发挥了重大效能。多国部队在军事力量上占压倒优势。力量对比悬殊,战争很快就结束了。伊拉克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遭受重大打击,直接经济损失 2000 亿美元。多国部队仅损失坦克 20 辆、飞机 40 余架,耗资 600 多亿美元,远远低于历史上历次战争的损耗率。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针对海湾战争,江泽民主席、杨尚昆副主席和李鹏总理多次强调要掌握海湾战争动态,研究其经验教训。根据这些指示精神,解放军三总部、国防科工委、各军兵种、各军区以及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等单位,系统地多层次地进行了研讨,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

我多次组织和参加了海湾战争研讨会,有目的地研究了一些大的问题。

海湾战争所显示出的现代战争特点,对我军建设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我们需要有危机意识,要有紧迫感,要研究学习国外的先进军事思想、战术技术和武器装备,进一步完善自我;更重要的,是要看远一些,现在就采取一些措施,以应付十年、二十年后可能发生的事情,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

很多同志提出,从海湾战争看,电子装备建设是我军作战的薄弱环节,急需加强。这是事实。我决定请一些专家开个电子装备座谈会,专门议一议。我向江主席作了汇报。江主席表示,他也要参加。果然,两天会议从始至终他都参加了,专家们很受鼓舞。

会上,江主席发表了重要讲话:“从海湾战争来看,我们既要尊重科学,重视武器,但也要看到我们同伊拉克不是一回事。我们是讲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万一打起来,我们既有正规军,还有民兵,谁进来就把他置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

中,中国人是不信邪的。”他说:“在电子技术方面,现在我们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我们要看到这个问题,既不要盲目乐观,也不要因为看到有差距就悲观失望,总是要想一个办法对付它。我们总的方针,还是要靠自力更生。”

我在会上也发了言:“海湾战争打响后,使我们更加警惕了。许多关心国防建设的人,具体说是关心武器装备建设的同志,提出了很多建议。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关心之下,开了两天的会,我觉得很有价值。第一,我们自己的情况基本上说清楚了;问题在哪里,基本上找准了。第二,对未来电子技术发展的趋势,大致理出了头绪。只要顺藤摸瓜,不断跟踪研究,就不会落人之后,我们完全可以有目的地发展我们的技术和装备。第三,对作战使用要求,从原则、方向上都提出来了。以后就是要根据这些原则的要求去落实具体装备型号的性能要求。”

我说:“海湾战争后,有人担心在未来战争中,初期敌方也会把我所有的电子装备压制住,我们没有办法抗击,没有办法作战,好像瞎子、聋子、哑巴。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我曾多次讲过,究竟哪里有敌人不知道,来了什么敌人不知道,来了多少敌人不知道,你怎么下决心?派什么部队,怎么去反击敌人?那就没法指挥作战了。因此,电子装备即使不能全部,也要部分保证看得见、听得着、联得上,能有效地组织指挥反击敌人,起码要达到这个要求,如果能全面一点就更好。”

关子今后的几条建议,我着重强调了要坚持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我们不会去侵犯别人,而是准备在敌人侵略我们时,保卫我国的陆地、海洋、空中的主权和权益,也就是说,总体上是防御性的,电子装备主要也是防御性的。当然,防御不

是消极防御,而是积极防御;防御本身就应该是攻防结合。

海湾战争期间,我天天看战况报告,研究战事,预测战争结局。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过去,我们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现在,我们是在学校、在训练场、在别人实施的战争中学习战争。联系我们的国情军情,海湾战争给了我许多启示。在以后许多不同场合,我都结合海湾战争的情况,反复强调加强国防建设和科技强军的紧迫性。在国防科工委的一次会议上,我讲道:

“从战史研究的角度看,不久前结束的海湾战争,是一场陆、海、空、天、电多方位、多手段的现代化常规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投入新式武器种类最多、技术水平最高的一次战争,它对世界各国国防军备和武器装备的发展将产生深刻影响。战争中运用的新式武器,集中了先进电子战技术、隐身技术、精确制导技术及夜视技术等。高科技在实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实现了战役战术的突然性,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作战方式,使通信、控制、指挥和信息这些‘软系统’发挥了战斗力。这表明,在现代条件下,军事技术尤其是高新技术,越来越成为战争中的制胜因素,新旧武器的效力差正成倍地拉大。我们要正视这一现实,绝不能安于现状,盲目乐观。我们不是‘唯武器论’者,我们历来认为,任何先进的武器都不能最终决定战争的命运。武器是战争中的重要因素,对战争胜负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然而,具有高度觉悟和勇敢牺牲精神的人,一旦有了先进武器,就会如虎添翼。没有先进的武器装备,付出的代价就会增大,赢得战争的时间就会拖长。由此可见,今后我军建设应高度重视高新技术装备的发展,要走质量建军的路子,‘科技强军’必将是我们长期的发展战略。”

在全军后勤科技奖励大会上,我也讲:

“海湾危机后,我们就一直注意研究美伊双方的后勤工作。劳师远征本是兵家大忌,而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却利用政治、经济、外交斗争等多种手段,采取一系列的重大措施,弥补了自己的短处。我曾向一些搞后勤工作的同志推荐一部反映多国部队后勤保障的录相片,从片子里可以看出,现代战争的后勤保障已和我们过去经历的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不一样了。但我们有自己的传统经验,不必按他国的办,可对其先进的供应方法进行研究。

“在干旱的沙漠地区作战,供水、供油、供食及弹药供应和武器装备修理、医疗等保障工作,是极其困难的。但美军采取了许多措施,效果不错。他们为部队装备了先进的野战供水装置,具有在化学战条件下的供水能力;还采用最新研制的单兵净水片,供紧急情况下净水使用。在供油方面,建立了多燃料补给站和运油车队;一些油料是靠直升飞机悬挂巨型软式油箱,运到前进部队的正前方。美军采购的作战快餐口粮,有十多个品种,并使用了新研制的无火焰加热器,可在行军状态中加热口粮。他们还为陆军部队配发了新式的重量轻、穿着凉爽的沙漠迷彩作战服和沙漠作战鞋。所有士兵都装备了防化和防毒面具。为解决沙漠地区的野战维修问题,美军投入了先进的维修设备和技术力量,根据地理天候条件,及时改进了装备维修保养措施。同时,还迅速建立了由医院船、舰队医院、野战医院和最新装备的现代化的‘可部署医疗系统’组成的机动医疗保障体系。

“相比之下,伊拉克军队在多国部队空中打击和国际经济封锁制裁的情况下,后勤供应就很困难。

“我们研究海湾战争的经验教训,决不能照搬照抄外国的

一套。美国人也认为,海湾战争既有别于朝鲜战争,也有别于越南战争。我们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军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后勤保障体制,发展后勤技术装备,完善法规制度,提高保障效能。”

在军事科学院,我对从事战争研究的人员也谈到了海湾问题:

“我们强调海湾战争的研究,要有针对性,目的是要回答和解决我国国防建设、军队建设和未来作战遇到的新问题,以保证决策正确无误。军队的‘八五’计划,军委已经讨论通过。现在,需要结合研究海湾战争,进一步研究如何把我军建设搞好。你们组织一些专家,把各有关方面的力量组织起来,对海湾战争的军事理论、战略指导、部队编成、兵力部署、战术运用、组织指挥、军兵种使用、后勤保障、技术装备等方面的问题,一个一个地深入研究。研究别人的经验教训是一个方面,关键是要研究我们怎么办,为军委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国家的重点是经济建设,国防投资很有限,但国防建设要加强,如何加强呢,要拿出办法。要研究我们的长处如何发挥,短处如何克服,今后的仗怎么打;情况发展变化了,如何打夜战近战,如何机动,如何防空,如何争取局部战略战术上的绝对优势,等等。要提出哪些是对我们有用的,哪些是对我们无用的,这些都要有结论。”

海湾战争中,世界各国的新闻媒体,对美国的宣传占绝对优势。当时,电视画面、报纸、收音机中,都是渲染美国强大。在我国,也有人认为美国不可一世,我们的人民战争过时了。我多次在会上强调:“这是极端错误的。”

我仔细研究了美国的情况:

从大格局上看,是冷战结束后的独特格局帮了美国的忙。

正是由于苏联的战略收缩和自顾不暇,美国才猖狂已极。

从实力上看,是高新技术帮了美国的忙。虽然伊拉克百万大军,比多国部队多十几万人,但部署在科威特的最多 50 万人,又是劣势。多国部队在飞机、卫星、战舰、坦克等方面,占绝对优势。多国部队有近百种新式武器装备在战争中首次使用,高新技术改变了战争的时空概念,提高了部队的作战效能。

从战略战术上看,是伊拉克帮了美国的忙。海湾战争中,美国进行的地面战争仅 100 小时,主要靠空中优势,进行大面积空袭取胜。地面战是在无抵抗下进行的。伊拉克是自己把自己搞乱了。在战争的关键时候撤兵,说要撤又不撤,撤退的时候又组织不好,军心涣散,士气锐减。此外,伊拉克战争准备不充分,装备落后,训练差,几十个师摆在一个狭窄的地幅内,部署失当。战争开始的时候挺硬,后来就顶不住了。

我认为,美国整伊拉克可以,整中国不行。美国打朝鲜、越南的时候,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和帮助,朝鲜、越南要取胜是困难的。我们是他们的大后方,几乎是要什么给什么。这次海湾战争,伊拉克完全孤立,被封锁制裁。由于他们是侵略别人,失道寡助,必然失败。美国人怕持久作战,时间拖的越长就越被动。美国怕死人,人死多了就紧张,甚至影响他们的战略决策。我们对付美国人的办法是很多的。

海湾战争,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一场特殊战争。这场战争的模式,不能视为今后一切战争仅有的模式。我们不能墨守陈规,对高新技术的飞速发展运用视而不见,更不能盲目乐观、不作充分的准备。

正确的选择应该是:走我们自己的路,质量建军,富国强兵。

兵不可一日不练

军队建设大政方针已经明确。中央军委先后颁发了《军队基层建设纲要》、《军事训练条例》、《武器装备管理工作条例》和新的《内务条令》、《纪律条令》、《队列条令》、《政治工作条例》，批转了总参谋部军事工作会议纪要。这些条令、条例和纪要构成了一整套我军新时期建军的方针原则。领导干部的职责，就是通过扎实细致的工作，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促使军委的大政方针在基层扎根、开花、结果。

1990年7月，我带人到坦克某师考察。看了坦克射击、火箭布雷作业、坦克过障碍物驾驶、单坦克效应射击表演，参观了全师装甲类、工兵类、运输类和炮兵类等装备车辆。随后，下到该师三团和炮兵团，观看坦克回场保养、车场日，并和部分基层干部座谈。

这个坦克师是全军组建最早的装甲部队，积累了许多机械化部队建设经验。但这次看到的情况不尽如人意，部队装备配套和管理上都存在问题。

我很严肃地提出，我们的装备水平是不高，但再好的装备管理不好也是不行的。国家花那么多钱搞部队的武器装备，现在把这个家当交给你们了，你们就一定要管理好。老装备要注意维修、保养，保持战斗力，新装备也要加强管理。大家都希望换新装备，但我们财力还不够，新老装备都要使用，要逐步更替。

我肯定了大家想练兵的热情，同时，对新装备保养和训练也提出了意见。我说：“新装备来了就封起来，这不行。新装备要用，躺在那里不是个办法。这就好像把老虎的手脚捆住，

放在笼子里。我们有些装备不是用坏了,而是放坏了,这样下去不行。对一些装备的性能,要通过反复地、长期地使用来检验,打起仗来心里才有底。”我告诫大家,“大仗可能十年、二十年打不起来,但是兵一天也不能少练。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国际上有很高声望,是雄师,是猛虎。要加强训练,使部队特别是特种兵部队都成为精兵强将,始终保持很强的战斗力,真正做到无往不胜。”

1990年11月,我到驻辽南的某集团军考察。先后到了两个师,其中有个师是红军时期二十五军的老部队,我有一种老兵回连的亲切感。

我看了一个炮兵团和一个步兵团后,连队精神面貌和工作秩序给我印象不错,炮、车、库管理情况也不错。回想起来,在红军时期,两个师合起来才几千人,不及现在一个师。从这点上看,我们军队真的是壮大了,现代化了。可是我清楚,时代变了,部队的任务不同了,面对的对手也更强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些新的现实。

考察中,了解的情况确实让我乐观不起来。某师的干部坦率陈言,反映了一些实际问题。主要是部队缺装多,不配套,干部培训渠道不顺,车、炮、库也少。总之,这个机械化师组建几年了,没有真正形成战斗力。

显然不应该,不正常。我清楚责任不在师一级领导,但我提醒他们:“你们是机械化师,机械化部队有了装备,如何形成整体的战斗力?要增强机械化意识,训练、技术、保障、管理、思想政治工作不到位不行。必须有个系统的工作,缺了哪一项都不行,否则是一堆废铁,没用,不如拿棍子。现在的问题是技术工作没有跟上去,没有形成一套整体的东西,理论不够、技术不够、训练不够,其他工作也不够。机械化是个好事,

一个师的装备经费就十多个亿,贵重装备就是要管好。不训练好、不维修好、不管理好是个很大的浪费,师长、团长都有责任。这是人民的血汗!”

为充分了解情况,我和某师领导、师机关的部分科长及部分连长、指导员座谈。我要求大家坦率反映情况。我说得很诚恳:“平时我们机关下来人也不少,写了一些报告。报告写好的情况多,针对下面的实际问题写的少,往往看不到更真实的情况。作风、纪律、部队上下关系都可以讲一讲,没关系。向总部提意见、向军区提意见都可以。总之,部队建设有什么问题,平时上面听不到的,看不见的,请大家畅所欲言,随便谈,好不好。”

我的开场白给大家卸了包袱,干部发言踊跃。有的反映:基层要解决的问题和困难很多,营房陈旧,盖营房还要师团拿一点钱。经费不够用,政工费、修理费、工杂费、水电费,费费超支。有的说:部队编制大,装备少,库房缺,车况差。有的提议:提拔连排干部,还是学校培训和优秀班长选升两条腿走路好。有的反映:现在家门口干部越来越多,影响部队建设,等等。

有位干部谈到了练兵问题。他说:训练工作一直讲得比较多,可有些干部战士认为,仗反正打不起来,老练什么。

这种认识当然不对。我说:“和平时期虽然部队多少年不打仗,但兵总是要练的,当兵是要天天准备打仗的。现在你们高度机械化、技术化,很多东西都很复杂。机械化如何理解它,掌握起来?要拳不离手,曲不离口,一天不练也不行。复杂的机械,还有电子技术,不训练是不行的。你们要练开动,一个连、一个营、一个团都要拉出来跑一跑,一年最少动它几次,每次走几十公里。过去因为缺少摩托小时,不能动,要改

变这种观念,摩托小时可以增加。要动,要走。你们集团军试点已经有几年了,应该很好研究,一切都是为了将来能够打好仗。”

几天考察中,看到一些情况,也听到一些情况。离开之前,我和集团军的领导交换了意见,提醒他们:“要认真研究机械化部队怎么建设,怎么训练,怎么管理,怎么保障,怎么供应。机械化部队是陆军部队,又不同于一般的陆军步兵,我们部队几十年的光荣传统,在新形势下有了很大的发展变化,将来还会有更大的发展,更大的变化。武器装备和技术还要不断地提高,干部战士要有更高的水平来掌握现代化。建设一支具有高度战斗力的现代机械化部队,任务是艰巨的,工作也是很艰苦的。关键是怎样增强机械化部队的意识,要在理念上、思想上进一步提高认识。通过强化训练,强化管理,把人和技术紧密结合好,以保证开得动,打得准,联得上,合得成。”

还有个问题我想讲,但由于当时种种客观情况,我忍住了,没有讲。该集团军试点几年了,竟没有搞过一次营以上的战术合练;集团军的军、师、团干部,普遍对部队携装行动心中无数!

这是很荒唐的现状。

头年去北京军区某集团军考察,我也发现类似问题。这两个集团军都已经试点几年了,由于装备、训练、编制、保障等多方面的原因,这两支全军最现代化的部队战斗力很弱。投放了这么多钱,花了这么多时间,还没形成综合战斗力,真令人心急。

我再三叮嘱集团军领导:“基层的工作,你们做好;上面的工作,我去呼吁。”

之后,我又到另一个集团军考察,跑了一个师、一个炮兵

旅和一些基层连队。“部队不怕管,怕松不怕严。”这是该集团军一个师综合治理的带兵经验,我当时就给以肯定。

这次考察了解了许多情况,结合全军各部队实际,我产生了一些思考。总的想法是,这几年训练工作有进步,有发展,但是,强度不够,深度也不够。标准低一点还说得过去,严格一些就不过硬了。

回到北京,我给江主席、杨尚昆副主席写了一份《赴部队考察工作情况报告》。《报告》中,对两个集团军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对问题也直言不讳。我写道:“当前部队工作中有的关系没有完全理顺,不少问题亟待解决,特别是机械化部队建设尤为突出”。“这支机械化部队还没有形成应有的战斗力”。

我具体写了六个方面的问题。指出:“这些问题的存在,既有上面的原因,也有部队自身工作的原因,现在已经到了必须解决和有条件解决的时机了。”

为此我提了四点建议:

一、高度重视机械化部队的建设和使用。拟由总参、总政、总后、国防科工委等有关部门组织人员,总结机械化集团军建设的经验,以便改进提高。两个机械化集团军应是军委随时能指挥调用的主要机动作战力量,平时多训练多动,遇有情况时多用。这样才能使花几十亿投资建设起来的现代化部队发挥最大效益,否则太可惜。我认为,美军在历次局部战争和突发事件中,突出使用空降师、空中突击师的经验,值得我们研究。

二、制订“八五”规划时,对两个机械化集团军在科研、装备保养、官兵训练等方面给予倾斜,舍得花钱。我们应当从总部机关做起,增强机械化意识,尊重机械化部队建设的客观规

律,充分照顾机械化部队的综合性、系统性。

三、实事求是地修改调整编制,使各种编成更趋于合理化。对于一时补不上的装备不补了,收缩摊子,编制数量过大的削减一些,落后陈旧的装备坚决淘汰掉。建立统一的维修体制,避免重复建设和浪费。

四、强化基础与合成训练,强化干部训练。军、师受财力制约,无力建设大型训练场,是否可由军区根据全区情况,建设一个综合性的训练场,供机械化部队和其他部队轮流使用。

12月上旬,杨副主席召集军委常务会议。会上,我汇报了考察沈阳军区部队工作的情况。我说,陆军的现代化表现在机械化,已不是过去的小米加步枪,技术很高深,合成很复杂;现在管理不对口,下面有些乱。我反映了部队的意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前面谈到的四点建议。大家一致同意我的看法,杨副主席当场确定:由我和迟浩田总长研究处理。

随后的动作很快。迟浩田总长召集了总参办公会议,专题研究加强两个机械化集团军建设问题;又组成了由三总部、军事科学院牵头的这两个集团军建设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另外,还请五所院校和两个军区,对机械化部队的体制编制进行研究论证。

1991年1月初开始,领导小组对两个机械化集团军的建设进行反复检验,发现在战备建设、军事训练、装备、技术保障、通信、后勤、机关工作作风等十来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并提出了解决办法。在此基础上,初步形成了两个集团军及所属机械化步兵师、坦克师编制调整修改方案和加强两个集团军建设的若干问题两个文件。

接着,三总部、军科等有关单位抽调人员组成工作组,带着这两份文件分别到两个集团军调查研究,倾听军、师、团、

营、连各级主官意见,并组织了两个团、一个营的实兵实装检验,进一步论证新方案的可行性。

北京、沈阳军区对此高度重视,把机械化集团军建设列入了党委重要议事日程。司令员、政委亲自抓,现场办公,在人、财、物等方面给予优先保障,积极为部队解决问题。部队官兵也在思想深处受到触动,热情高,干劲足,行动积极。

4月中旬,何其宗副总长代表领导小组向我和杨秘书长、迟总长作了汇报。我们三个都认为,领导小组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对两个集团军的情况摸得比较透,提出了问题,分析了原因,而且有对策,符合军委江主席、杨副主席的指示和军事工作会议精神。大家对一些具体问题提了点修改意见,决定报杨副主席批准后,把军区和集团军的同志找来,开个小会,统一认识;文件发下去后,集中力量抓好落实。

5月7日,三总部召开了会议,传达军委领导指示,部署两个机械化集团军建设的若干问题。

这是我军历史上少见的为两个集团军召开的专业会议。很不凑巧,当时我得了胃肠炎,住进三〇一医院。想着自己负责的工作不能亲临,心里着急,几次恳求医生,希望出去半天听听会。考虑我的病情,医生没有同意。会议结束,北京军区王成斌司令员和沈阳军区刘精松司令员来到医院,我下不了床,只好躺着,听他们讲部队的情况。

我对两位司令员讲了几条意见,重点谈了机械化部队的训练和战斗力问题。我说:“现在全军部队建设形势很好,但也有薄弱环节。这里边很重要的原因是基础没有打牢,工作不扎实,甚至有弄虚作假的现象。营、连、排、班是部队的基础,你们都当过营连干部,基础工作做不好,功夫不过硬,上边指挥再好,到时候也会打乱仗,就像10层大楼基础不牢,一下

子就会垮掉一样。所以,班、排、连、营一定要抓紧,打好基础,抓政治建设,抓训练,抓管理。部队要练兵,许多基础科目要天天练。梅兰芳唱京戏,年纪大了,还天天练功。要把功夫下在战术技术等基础功夫上,扎扎实实地打牢基础。基础不牢,等子自己骗自己。”我强调说:“机械化部队训练搞不好,就难以发挥作用。从总体上讲,我们的战略是积极防御的。坚守防御作战到了一定时候就要机动作战。机械就靠动。我军素有‘飞毛腿’、‘铁脚板’之称。机械化部队不会机动,等子人不会走路。机动、行军也要练。别看行军很简单,组织好却很复杂,不常练,到时候就出问题。当然,步兵有步兵的训练方法,机械化部队有机械化部队的训练方法。毛主席说过,拉练这种训练方法好,不拉练,部队就会变成‘老爷兵’。新装备到部队后要多动多练,从中发现问题。放在那里不动,不仅发现不了问题,而且还会把装备放坏。”

我要求他们:“机械化部队的建设一定要搞好,要认真摸索,从训练、管理、保障、政治思想工作等方面总结出一套建设经验,真正建设成一支开得动、打得准、合得成的过硬机械化部队。”最后,请他们转达我向两个集团军各级领导干部的问候。

此后,这两个集团军建设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在过去基础上提高很快。近几年,部队又陆续换装了十多种新型主战装备。由于上下认识一致,思路清晰,有一支素质较高的干部骨干队伍和较完善的技术保障体系,部队战斗力明显提高,今非昔比了。

1991年4月中旬,南京军区在某集团军隆重集会,纪念郭兴福教学法创立30周年,我和总参谋长迟浩田等人出席了会议。

30年前的那场大练兵热潮,在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重重一笔。当年,郭兴福刻苦钻研,勇于创新,同战士们一起摸爬滚打,创造了一整套练兵方法。他把政治思想工作渗透到训练全过程的各个环节,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融为一体,把严格要求与耐心教育结合起来,充分调动了战士的练兵积极性。后来,经过叶剑英副主席、罗瑞卿总长的高度概括归纳,形成了闻名全军的郭兴福教学法。当年毛主席听说部队用郭兴福教学法把兵练得思想红、作风硬、技术精、战术活,个个像小老虎时,非常高兴。

30年过去了,我们又来到郭兴福生前所在的二连。这个连继承和发展了我军传统的练兵方法,以军事素质良好著称。听说干部潜心研究郭兴福教学法,又根据近几年新的训练条例、训练大纲,形成了一套为战士易于接受的练兵方法。在二连,你可以拿着花名册“沙场点兵”,战士应考自如。班长们当场为我们进行了教学示范表演,一招一式,显示出霹雳般的战斗作风和过硬的作战技能,非一朝一夕的功夫所能达到。望着这些满身泥水的战士,我紧握他们的手,为他们骄傲。

这次纪念活动的主题,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继承发展郭兴福教学法。与会的部队领导交流了经验,并做了理论研讨。

我在讲话中强调:“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武器装备日益现代化,尤其是新的科学技术在武器装备领域的广泛应用,要求所有参战人员不仅具有坚定的信念、顽强的作风,还必须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精湛的军事技术和先进的军事思想及作战手段。为此,我们要特别注重依据新的高科技装备及未来作战的需要学习郭兴福教学法,使郭兴福教学法在群众性练兵活动中有所创新,有所发展,以促进训练落实,

提高训练质量。今后一个时期,我军装备将有所改善,但不可能全部改善和一下子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立足于现有装备提高部队战斗能力的主要措施,还是强化训练。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无不强调军队的训练。训练是实现人和武器结合的最重要的环节,是提高军队素质的基本途径。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固然是军队建设的物质基础,但一支军队缺乏训练,装备再精良也打不了胜仗。决定性的因素,还是训练有素的官兵。”

会后到另一个集团军考察。这是解放战争时期第一野战军保留下来的唯一的一个军。这支部队打过许多硬仗、恶仗和胜仗,在历次革命战争中是立了大功的。我不想走马观花,决定抽查部队的军事训练情况。

先到了坦克师炮团。我临时出题,要求他们搞个拉动演练。

那天,这个团有两个连队在外施工没法参加,除开探家、住院、出差、留守外,出动了全团人数的一半;车辆也出动了一半。演练状态不能令人满意。在干部座谈会上我了解到,造成这种状况,除了各级干部组织指挥经验不足、处置临时情况显得紧张外,还有经费不足、缺乏训练场地、每年给的训练油料少、摩托小时少等具体原因。

我没有批评,但告诫他们:“用低标准来测验,什么时候都会感觉不错。低标准带不出部队。满招损,谦受益。各级领导不仅要看到成绩,还要找准缺点,克服缺点,不断进步。军事训练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大家要深钻。不打仗了,兵还得练,越是三九三伏越要练,这是我军根本职能所决定的。”

接着,来到一个步兵团,我要求组织一次全团的紧急出动演练。

第二天我起得很早,在南京军区史玉孝政委陪同下,站在公路边,观察部队状态和情绪。头天晚上,部队下达了预先号令,按照作战程序展开工作。这天早7时,全团集合,步兵连队全部背上背包,扛着武器弹药,炊事员挑着炊事用具,雄赳赳地出发了。按照预定计划,演练8点半顺利结束,师团进行了总结。这次演练,好的方面是,官兵情绪高涨,方案齐全,出动率高,点验每个连的二班,个人物资携带基本齐全。存在的问题是,各级干部指挥程序不够熟练,显得有些忙乱,物资装具捆绑携带不大符合要求,个别战士体能差。

对这个团的演练,我总体上比较满意,要求师团干部:这样的应急行动演练,一个团一年至少要搞两次,才能使部队真正受到锻炼。

在我看来,部队学会走路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我军作战的一个传统优势就是打运动战。一个师、一个团、一个营要能连续走几天几夜,走几百公里、上千公里,不掉一人一车一炮,部队完整准时到达作战地域,保持强大战斗力,这是不容易的,要靠苦练硬功夫。当年我们第二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除了正确的战略战术外,就是靠走得快,在敌人之前抢占了大别山区,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权。现在对行军训练重视不够,这是个大问题。

有的同志认为,现在机械化部队不会走路,是因为摩托小时少,没有油料、零件;有了它就会走,过山过水很容易。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现在一些机械化部队驾驶员、炮手、技术员配备不齐,缺额多,训练水平差,开不动也开不好车辆。实际上,单车、单炮小分队的基础训练如果搞不好,不仅影响战术分队的战斗力,而且直接影响到大兵团诸兵种的合成作战。机械化大兵团行动并非易事。如山地、平原、丘陵、沙漠、

丛林、水网地区路线的选择、过河架桥等问题如何解决好,都需要从低层到高层反复计算、反复训练,战时才能协调一致。平时不苦练就形不成战斗力。我现在担心部队在一个地方住久了,队伍拉出来七零八落。尤其是机械化部队,如果不会行军走路,问题就更严重,不仅没有战斗力,而且是个大累赘,还不如步兵。美国人在海湾打仗,实际上也是远距离机动作战。我们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一方面是坚守一些战略要地和战术要点、交通要道,但到一定时候就要进行反击,歼灭敌人。因此必须善于机动。不能机动作战,就谈不上积极防御作战。就是阵地防御,也离不开有的部队通过机动方式运动歼敌。

在“硬骨头六连”,观看了连队的队列、射击、百米障碍、五公里越野等军事项目表演。1978年我到过这个连队,觉得很好,这次感到又有了新的进步。我问他们的经验是什么,连队干部说:关键是思想作风过硬,干部过硬,训练过硬。我赞扬连队干部的身先士卒精神,抓好训练,干部就是要到训练场和战士一起摸爬滚打。战争年代,刘伯承元帅为人师表是出名的,虽然他一只眼睛早年负伤失明了,但他在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时,还亲自操练射击和投弹,表演给大家看。

为了考察部队的整体训练质量,在训练场,我又提出让其他连队也走走队列。临时点了四连,要求他们进行分列式课目。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总的说不错,但用高标准衡量还有差距。如队形不够整齐,干部的队列动作不够标准等。我对他们讲:“部队训练要从基础抓起,有一些要反复训练,特别是要抓好营以下分队的基础战术技术训练。如果基础不好,搞师、团合练看起来轰轰烈烈,但实际效果不会好。打牢基础后,再进行高层次的合成训练就容易了。师、团的合成训练也很重要,训练场地有条件的,应一年搞一次。”

这次考察,我到了两个军级单位、五个师、10个团、15个连队,广泛和基层干部战士面对面接触,了解到不少情况和问题。刺杀训练问题,就是在这次考察中注意到的。在训练场,我发现战士的步枪不带刺刀;一问,才知道部队几年不搞刺杀训练了。

我认为不对。我说:“刺杀训练不可以放弃,今后即使高技术条件下作战,短兵相接的战斗还会有的,不能不搞刺杀训练。我主张还要搞夜战、近战训练。不管夜视器材怎么发展,它总是有限度的,不可能完全克服一定距离范围以外夜暗环境和各种障碍物的隐蔽性,夜间的自然有利条件还应充分利用。所以,夜战、近战的训练还应强化,这是我军的特长。”

几个月后,我又到一个集团军考察。参谋人员反映,这个部队训练抓得很好,特别是步兵增加了刺杀训练,进一步加强了夜训和野营训练。我看了一个团的刺杀表演,战士们个个生龙活虎,杀声震天,精神状态气壮山河,振奋人心。我很高兴,对在场的干部说:“刺杀训练好几年不搞了。我提倡还是要搞,但是不能把它放在第一位。今后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单兵格斗也不会少,因此刺杀不可不搞,也不能像过去那样花时间太多,影响其他课目、影响军事训练的全面发展。”我强调说:“打仗就要准备短兵相接,白刃格斗,这是任何时候都要有准备的,要有这个精神,要有这个本领,要振作军人的精神状态。”

练兵,不光是军事练兵,也要政治练兵。在这个集团军的一个师考察,我检查了师、团领导和部分机关人员的政治、军事学习笔记,告诫大家:政治学习很重要。要提高政治素质,就要打牢理论基础。

考察中,我多次和部队领导谈到政治练兵的重要意义。

我认为,全面加强军队建设,首先是加强政治建设。从全军情况看,这几年的政治思想建设形势很好,各级干部在政治上是可靠的,是完全可以依赖的。加强政治建设,最重要的是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增强党指挥枪的观念,始终保持部队的政治稳定。从我军成长壮大的历史看,我们所以能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就是靠党的坚强领导,靠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靠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靠全体官兵坚定的政治信念。党性强,觉悟高,部队才能拖不垮,打不烂,打不散,打胜仗。

加强政治练兵,就要抓好经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干部一定要同战士打成一片,知道战士在想什么,干什么,使思想工作更有针对性。实际上,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有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

1992年初,在广州军区领导的陪同下,我考察了某集团军。这个军的许多部队驻在特区和开放地区,靠近港澳,环境复杂。一方面,香港、台湾的间谍对部队渗透影响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军人与地方人员的生活水平形成强烈反差。该集团军根据所处环境和部队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采取了一些特殊办法,抓紧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抓理论学习和思想教育,抓党支部建设和支部的领导作用,抓各级领导干部的自身建设,使部队稳定,事故案件很少,经受住了考验。正像军的领导同志说的,如果不抓好思想政治工作,部队在这里就站不住脚。

我赞同他们的说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制定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当然,春天来了,百花齐放,也难免滋生杂草。住在改革开放前沿的部队,既要利用改革开放的有利条件,推动部队建设,又要注意克服

不利因素的影响,使部队保持健康的肌体,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把部队建设好,更好地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经济建设,保卫改革开放,努力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使命。

部队的战备训练和综合战斗力的提高是我一直认真关注的问题。1992年6月,我到了空军某师和第二炮兵一个基地。一个是空军的英雄部队,一个日夜担负着战备值班任务。我在思考,现代战争有许多新的变化,新的要求,应该把空军、海军和二炮部队的建设摆在更为突出的地位。结合我军的实际情况,对相关作战部队,应该优先发展,优先保障,形成拳头和威慑力量。

总之,军队要随时准备打仗。即使处在和平时期,短时间内大仗可能打不起来,但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警惕,每时每刻都要作好战斗准备。仗可能十年不打,兵不可一日不练。作为军队,这是最重要的一条。

第二十一章 为了和平

新的工作思路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我们党继往开来的一次重要会议,我作为正式代表和解放军代表团团长出席了大会。

这次大会的重要成果之一是把邓小平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写进党章。小平同志说过,他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他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怎么评价都过不过分。

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召开了十四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以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为政治局常委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同时,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军委主席,刘华清、张震为副主席,迟浩田、张万年、于永波、傅全有为军委委员。

我被选进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是没想到的事情。组织上做出这种安排,是对我几十年工作成绩的肯定,是对我政治上

的信任,也是给我极大的荣誉。我必须依靠自己的全部经验与阅历,尽心尽力参与好工作。

1992年10月20日,我第一次参加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江总书记明确由我负责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10月6日,小平同志曾给中央政治局写过一封信,谈到了对中央军委人事安排的意见:“今后主要由刘华清、张震两位同志在江泽民同志领导下主管军委的日常工作。据我了解,刘华清、张震同志最熟悉军队。将来挑选接班人的工作,需要熟悉军队的人来承担责任。”“要在全军范围内选拔一批40岁到50岁的人,放到一定的岗位上进行培养。”小平同志特别交代,“军队要保持团结一致,保持老红军的本色,这点十分重要。”信中,小平同志对新一届军委领导班子有个具体方案。中央政治局完全同意小平同志的意见。

新一届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如下:军委主席江泽民,副主席刘华清、张震,总参谋长张万年,总政治部主任于永波,总后勤部部长傅全有。迟浩田暂时没有任命。1993年3月,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任命他为国防部长。

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军委副主席,我必须坚决贯彻中央决策,全力实现江主席意图,在军队和国防建设上有成效地多干实事。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我深感责任重大。我的工作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危,我不敢丝毫掉以轻心。对下一步军队建设问题,根据小平同志、江主席的一系列指示,结合部队实际和在工作中碰到的具体问题,我反复思考,逐步形成了明确思路。在第一次主持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几条工作意见:

第一,加强思想政治建设。这既是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也是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保证。几十

年来,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我军都高度重视对部队进行革命理论和党的路线教育,使全军对党的领导、党的事业始终保持坚定的信念,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和政治风浪考验面前,都能自觉听党的话,跟党走。改革开放事业是一场新的革命。在这一艰难而重大的历史进程中,我军要在政治上、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党委的集体领导,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要选拔和培养大批年轻的优秀干部,确保党的事业后继有人。要使我军的思想政治建设与党的十四大作出的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相适应。

第二,真正把教育训练摆到战略地位,突出“四个必须坚持”:必须坚持我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的思想,必须坚持军事训练的中心位置,必须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训练部队,必须坚持以教学为中心,大力抓好院校建设。

第三,强化部队管理。主要有三条:一靠教育,二靠条令,三靠纪律。管理中,还要特别重视发扬我军尊干爱兵的优良传统。

第四,加强武器装备建设。既要立足现有装备,研究应付现代条件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战法,又要发挥我国国防工业优势,抓紧时间,尽最大可能发展新装备。对此,要采取强有力措施:一是突出重点。我军装备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全面改善,必须突出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二是把握有利时机,积极引进国外先进装备和技术。三是重视武器装备的配套建设。四是进一步做好装备管理工作。

第五,完成好重大任务。可以预想的就有几大项:一、抓好驻港部队建设,保证在任何情况下(包括和平交接和非和平手段接管),使我国政府按时对香港行使主权。二、遏制“台

独”，加强威慑力量建设。三、防止边疆民族分裂分子闹事。四、继续完成精简调整的各项任务，理顺关系，优化结构，走精兵之路，质量建军。五、抓好应急机动部队和两个机械化集团军的建设。

第六，努力提高后勤保障能力。在军费总量不足的情况下，处理好“保生活”与“保装备”的关系。在保证生活的前提下，保障重点装备的购置与维修，保障重要方向和重点部队建设。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逐步建立军民兼容的后勤保障体制。

第七，改进领导作风和方法。要克服形式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从解决问题出发，从提高部队战斗力出发。要运用科学的工作方法，按科学规律办事，不图形式，注意实效，扎扎实实促进部队建设。

第八，狠抓党风廉政建设。坚决执行党的纪律，对违法乱纪的人和事，坚决查处，一查到底，决不姑息迁就。

主持军委工作的几年，在江主席直接领导下，我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一起抓了几件事情。

1993年初，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讨论研究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确定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军委作出了《关于发扬优良传统加强廉政建设的决定》。突出了抓领导班子建设。一是干部调整交流，改善领导班子结构。按照小平同志的要求，防止用人上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倾向。二是抓党风和廉政建设。团以上领导和机关普遍进行自纠自查，对一些大案要案加紧处理。

1994年，全军改革整顿生产经营，在“皇粮”不够的现实条件下，仍然决定作战部队不搞生产经营。在个别部队发生

恶性案件后,又突出抓基层,加强部队的管理教育,并且在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中开展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及转变工作方法的教育。

1995年,军委颁发了《关于贯彻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加强军队党的建设的决定》;相继又颁发了《军队基层建设纲要》、《政治工作条例》等。狠抓了二炮、海军、南京战区等部队的军事演习,对部队全面训练进行了实际考核。当年的军委扩大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军队建设计划纲要和组织编制建设计划。

1996年,军委批转了总政治部《关于加强军队高中级干部教育管理的意见》,从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和军队长远建设的角度,培养选拔教育干部。军队建设计划纲要开始实施:武警领导管理体制的改变和陆军部分乙种师移交武警部队,地方县级单位的人武部收归军队,进一步理顺了编制体制关系。军委颁发了《关于贯彻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加强军队精神文明建设的意见》。

1997年,军委突出抓了驻港部队进驻香港前的军事准备和实施工作。从可能发生最复杂的情况出发,两手准备都十分充分,保证了香港顺利回归祖国。

我感到欣慰的是,在这几年中,军队的基层工作、军事训练、装备建设、后勤改革、军事外交、立法等工作,都取得了可喜的发展。这是在党中央、江主席领导下所有军委领导同志努力的结果。正如江主席评价的那样:“五年来,这届军委做了大量的富有成效的工作,军队全面建设有了很大进步。”

回想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这几年,我花精力最多、下功夫最大的还是干部工作、军事斗争准备和发展装备三个方面。

干部工作,选人用人,关系到党和军队事业的兴衰成败,

十分重要。小平同志说过，“选拔干部，选拔人才，只要选得好，选得准，我们的事业就大有希望。”1992年10月6日，小平同志特别指示我，“这几年的任务，最主要的就是选拔接班人。”我们按照小平同志的嘱托，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坚决纠正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等不正之风，为提高干部素质，做了大量工作。

选拔、评议干部，是军委常务会议的主要议题。下基层时，考核识别干部也是重要任务之一。每年的军委扩大会议我都要讲干部问题。军队建设的关键在干部。解决干部问题的关键在公道正派地选人用人。用什么人的问题，是重要的政策导向，用人不公，让那些德才不好、作风不正、跑官要官的人得了好处，就会严重挫伤官兵的积极性。关键岗位上用错一个人，往往会使一个单位的建设遭受很大损失。战争年代，大家对这一点看得比较清楚，干部用好了，就可以带好部队，多打胜仗。不胜任的干部，很快就被淘汰了。和平时期不像战争年代容易识别干部，用错人的恶果，也不像战争年代那样很快地直接表现出来。所以要全面、深入、细致地考核干部，多听各方面的意见，特别要注意群众的公论，绝不能偏听偏信，不能个人说了算，更不能搞亲疏远近。

干部工作非常复杂，往往集各种矛盾于一身，旧矛盾解决了，新矛盾又会产生。虽然我们注意纠正不良倾向，使一大批优秀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但在选人用人上使用不当的情况也时有发生，群众也有一些意见。经调查分析发现，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在用人问题上，某些单位有个人说了算的现象；有的领导干部，甚至超越组织程序插手干部任用。二是跑官要官的坏风气没有完全制止住，在个别单位，这种风气甚至还在发展。有些人开始形成一种片面观念：提升

职务,要靠上面有人说话。一个干部提升了,也总说成是某某领导提拔的。

针对这些情况,在1994年召开的军委扩大会上,我明确提出:“纠正用人问题上的不正之风,要在加强教育的同时,研究如何进一步健全和完善选人用人制度。和平建设时期,识别干部不像战争年代那么容易,但也有明确标准。最重要的,是在实践中考察干部,看党性和政治品质,看工作实绩,看作风。哪个干部怎么样,群众最清楚,必须把群众公认作为一条硬杠杠;群众通不过的干部,坚决不能提拔使用。从实践经验上,上级党委尊重下级党委的意见,干部部门尊重其他部门的意见,领导尊重群众的意见,个人不干预组织决定,这是避免任用干部失误的几个重要环节。”

对于广大官兵深恶痛绝的跑官要官问题,我讲得十分严肃:“干部的职务如何安排,是党组织考虑的事情,哪有个人跑官要官的道理!如果我们的干部提升,靠跑靠要,风气坏了,军队还有什么希望!出现这种现象,根子在有人封官许愿,给官送官,领导干部不公道正派。如果党委很坚强,领导风气很正,谁还敢这么干!要下决心刹住这股歪风,凡是通过拉关系、送礼跑来的官,一经发现,就要坚决拿下来。”我也指出:“还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有的人在一个岗位上没有工作几年,或者工作久一点,就想着升官,没得到提拔就说用人不公,这种风气也要坚决纠正。”我要求有关部门,要不断明确完善选用干部的方针、政策、规章制度,并监督检查部队的贯彻执行情况。

用干部还有一个教育、管理和监督的问题。有些干部选拔上来时还是比较优秀的,但随着职务变化,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加上教育和管理薄弱,监督不力,以致发生问题,甚至走

上犯罪道路,受到党纪国法的处置,令人痛心。

每到部队,我都要求领导干部要增强政治坚定性,解决自身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抵御各种错误思想和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要求各级党委对高、中级干部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我还倡导领导干部,有了时间应多看书学习,提高理论素养,提高驾驭现代战争的知识水平、谋略水平和组织指挥能力。

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完成了《关于加强军以上领导班子建设的三年规划》,对三总部和各大单位领导班子,陆续进行了调整,改善了班子结构,提高了整体素质。从全军范围看,部队干部日趋年轻化,大批德才优秀的干部相继提升使用,干部工作越来越制度化、正规化。用人不公的反映也越来越少。

90年代初,国际战略格局已经发展变化,我军也需要适时调整战略方针。总参谋部提出了一个方案,在杨尚昆副主席主持的军委常务会上也研究讨论过,形成了共识。不过,杨副主席从保密角度考虑,新的战略方针内容只传达到大军区主要领导,一直未在全军公开。

1993年初,在江主席主持下,军委明确了新时期“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并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进行部署,统一思想。

6月,军委召开作战会议,调整了各战略方向的作战任务,进一步明确了军事斗争准备和未来作战的基本原则,研究具体落实问题。这次会上,江主席发表了重要讲话。我就自己学习理解的体会,也讲了一段话,主要观点是:

“军队高级干部,要认真学习和领会党中央的战略意图和外交方针,要善于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分析问题。军队要在大局下行动,军事斗争一定要服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政

策,从国家的总体利益出发,慎重行事。高级干部对国家兴亡要有责任感和紧迫感,要注意研究国际形势,努力增加战略意识,提高决策能力和谋略水平。

“我国的社会性质和外交政策,决定了我们的军事战略方针必须坚持战略防御的立场。邓主席早在70年代就强调,‘我们的战略始终是防御的,20年后也是防御,就是将来现代化了,也还是战略防御。’这就是在战略上要坚持自卫的立场,坚持后发制人的原则,不首先挑起事端,不要把矛盾引发到自己身上。尤其是在西方极力散布‘中国威胁论’的情况下,我们坚持战略上防御,更有利于配合国家的政治、外交斗争,保持战略上的主动。过去,我们强调战略防御,主要是保存军力,待机破敌,为战略反攻创造条件。现在,我们强调战略上防御,在战略指导上突出了三点:一是威慑。根据国家战略的需要,在突发情况面前,我们要通过必要的力量显示出威慑手段,与政治、外交斗争巧妙结合,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遏制战争的爆发。即使遇有战争,也能够从容应付,快速反应,果断处置,夺取胜利。二是慎战。我们国家经济建设基础还薄弱,要继续加速建设,大仗除非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才打,能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的,尽量不诉诸武力,防止某些矛盾激化对我经济建设大局造成冲击。现在有些问题,如果单纯从国家领土主权来考虑,马上就该用兵;但动起手来,从战略上看,不利于国家发展。因此,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轻易使用武力。三是自卫。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严守自卫的立场,做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当然,无论是威慑,慎战,还是自卫,都必须做好军事斗争准备,都需要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作后盾,这点丝毫不能动摇。

“在坚持战略防御的前提下,还要积极运用和发展战役战

斗上攻势作战的思想。过去,我们为应付敌人的大规模入侵,强调坚守防御多。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从近几场局部战争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能不能争取主动,关键在于有没有积极的进攻意识和能不能组织强有力的攻势作战。从海湾战争伊拉克失败的教训中可以看出,高技术条件下作战,装备劣势的一方单纯依靠防御只能是消极防守,失去战争的主动权。要夺取主动,就必须依靠积极的攻势作战。如果伊拉克能抓住美军劳师远征、立足未稳等有利战机,集中力量实施攻势突击,战争可能会出现另一种局面。建国后我军几次自卫反击作战的实践证明,离开了战役战斗上积极的攻势作战,就不能实现战略防御的总目的。即使是反空袭,加强防护,也仅仅是一个方面;要削弱和破坏敌人的袭击,关键还是组织强有力的反击,不然很难摆脱被动。”

我认为,“我军军事斗争,需要把握几个原则:一是注重质量建设;二是突出重点;三是加强综合配套;四是积极稳妥地进行调整改革;五是坚持长期建设、分步实施;六是实行军民兼容,平战结合。在战备建设方面,应该加强对情况的掌握和研究,制订完善的作战预案,有重点地发展先进武器装备,改革军事训练,提高后勤应急综合保障能力,深化军事科学研究,在这几个方面着力落实,以求新的突破。”

这次会议后,我军建设的指导思想更为明确。各军区和各军兵种,也都根据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修订了作战预案,加强了主要方向和重点地区的战场建设。根据形势需要和党中央的决心,陆、海、空三军在东南沿海方向成功地进行了几次军事演习,打击了“台独”势力的嚣张气焰。加强了南海和沿海海域的战备执勤,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

贯彻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提高我军现代条件下的作战

能力,涉及军队建设的方方面面。其中突出的问题,是部队的军事训练。

一个时期以来,我们有些同志对抓军事训练不重视、不热心,或者是讲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有些同志不是把心思用在练兵打仗上,而是老在那里考虑个人问题,甚至产生离队思想。特别是看了几个军区组织部队拉练后,反映出的问题让人担心。从组织指挥到装备、通信、后勤保障、技术保障等方面,问题都比较突出。这种状况必须坚决克服和纠正。

在我主持军委常务工作后的第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我强调了这个问题:

“近几年,全军的训练工作有进步、有发展,但问题还不少。一些领导没有用主要精力抓训练,部分官兵战备观念不强,训战结合不紧,训练质量不高。从根本上说,就是教育训练还没有真正摆到战略地位。我军的训练内容、方法与现代战争的要求不相适应,必须进行改革,使战法和训法都有新的突破。就拿城市攻防作战来说,这种作战形式在未来战争中将会增多,应当重视这方面的研究和训练。”我严肃指出:“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训练问题要引起全军的高度重视。各级都要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真正把教育训练摆到战略地位。”

军委其他领导同志都赞成我的意见,研究确定了一系列措施。比如,对军事训练改革有个总体部署;有计划地组织一些有影响的训练活动;加大训练经费的投入;清理整顿生产经营等等。其目的,就是要把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增强部队战斗力。

1993年9月,总参谋部在广东湛江地区举办四种训练纲目集训。

我抽空到了集训现场,听了讲课和经验交流,观看了登

陆、空降、城市和山地作战实兵演习，召集军、师、旅、团干部开了座谈会。总的感到，这次集训和演习搞得很成功，体现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在训练工作中的贯彻落实，体现了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作战特点。组织这次试点和集训，是年初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正式提出来的，是贯彻落实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重大举措。总参谋长张万年、副总长徐惠滋、李景、吴铨叙、熊光楷和广州军区司令员李希林、政委史玉孝都参加了集训。

演习部队集结后，出于政治和外交的考虑，军委决定，适当缩小参演兵力的规模，但还是坚决搞下去，并让有关部队的军事主官都来参加，充分显示了军委的决心。

登陆、空降、城市和山地作战，这四个课题，可以说都是老课题。登陆作战，解放海南岛、一江山岛时就实施过。城市作战，解放战争后期进行得最多。山地作战，我们是农村包围城市，经验就更丰富了。平时，无论是院校教学，还是部队训练，都有这方面的内容。但时代不同了，战法也不一样了。这次集训和演习，就体现了老课题，新内涵。归纳起来有“三新”：一是作战背景新，着眼现实军事斗争需要，把四种作战样式统一在一个大的背景下；二是作战对象新，针对对我国安全构成现实和潜在威胁的主要因素，瞄准对手，立足最复杂的情况，进行高难度、高强度的演练；三是作战条件新，设想敌我双方使用的都是最新的技术装备手段，在特定的战场环境中，进行高技术条件下的作战对抗。总之，通过这次集训演练，使我们对打赢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对在战区方向完成预定作战任务，心里更有底了。

事后座谈讨论，大家发言踊跃。

有的说，几个课题的演练规模虽然不是很大，但都是多军

种,多兵种,多种武器装备,多种技术器材,层次之高,难度之大,组织协同之复杂,是多年来少有的。特别是一些新的兵种部队,像陆军航空兵、海军陆战旅、电子对抗部队、特种作战部队,也都参加了演习。各个军兵种围绕共同的作战任务,练指挥、练协同、练战法,是一次名符其实的三军联合作战演习。

有的说,这次试点和集训,进一步证明拉出来训练是个好办法。在演习准备阶段,从军区首长机关到基层连队,从司令员到战士,从陆军到海军、空军,都拉到野外驻训。总参的几位领导同志也多次到现场具体指导。这样训练好处很多,首先是战备、训练气氛浓,上上下下精力集中。其次是对部队锻炼大,在近似实战的条件下摔打磨练,每天汗流浹背,高强度、大难度训练,能够学到许多在营房里学不到的本领。再就是密切了官兵关系和军政、军民关系,干部在战士心目中的威信、部队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威望都提高了。

还有的说,参加演习的广大指战员在酷暑高温、野外驻训的条件下,严格训练,表现了高度的吃苦耐劳精神。特别是几万人的部队,动用这么多陆上、海上和空中作战的装备,在长达几个月的野营训练中,遭受多次台风袭击,搞了多次实弹、实爆演练,没有发生重大事故,很不容易。部队开得动、打得准、联得上、合得成,士气旺盛,作风顽强。可以说这次试点和演习,既是一次从难从严的军事训练,又是一次生动实际的思想教育。

听了大家的反映,我很高兴。一个想法得到了落实,而且方向正确,路子对头,针对性强,效果很好,给我们各个战区贯彻落实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加快和深化训练改革,提供了经验。

总参的领导和三总部、军区机关的同志也很高兴。张万

年总长、李景副总长在总结大会上讲了话。他们要我也讲讲。

我评价了演习成果,然后重点讲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训练好部队。强调了新一届军委领导班子组成之后,对训练工作高度重视,提出了很多新的想法和要求。部队的练兵积极性也很高,势头很好,全军要珍惜和发展这一大好形势。最后,我提了四条措施:

“一是一把手要集中精力抓训练。我们的军长、师长、团长,第一位的任务就是随时准备带兵打仗,在练兵中学好打仗,不抓训练就是失职。要煞住生产经营与军事训练争人员、争时间、争装备的歪风,确保领导干部的主要精力放在军事训练这个中心上,决不容许为了抓钱偏离或背离这个中心。

“二是要建立和完善训练的激励机制。要把训练实绩与干部的选拔使用挂钩,把抓不抓军事训练、会不会指挥管理现代化部队,作为考核干部的一条重要标准。决不能让埋头抓训练的干部吃亏,决不能让埋头抓训练的部队越训越穷。一定要在制度和政策上体现这一精神。

“三是要正确处理严格训练与科学练兵的关系。一定要牢固树立练为战的思想,一切从实战需要出发,从难从严训练,敢于在恶劣环境、生疏地形和复杂气象条件下,锻炼和摔打部队,下苦功夫,练真本领。不能因为发生了事故而否定一切。当然,要严得合理,难得可行,不能不讲科学地蛮干。

“四是要抓好经常性的管理和经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保证军事训练落实。要坚持训管结合,教养一致,培养部队良好的作风和严明的纪律。要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情况、新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训练中的思想政治工作。落实军事训练的中心位置,就是要从高级领率机关,首先是三总部机关做起。”

这四条措施,正本清源,对狠抓训练改革的同志是一种肯定和鼓励。实施后受到部队欢迎。此后,部队训练改革的大气候逐步形成,官兵爱军习武的热情升温,掀起了全军性的练兵新热潮。同1964年的大练兵相比,这次练兵热潮有新的特点:一是以深化训练改革为基本标志;二是以适应高技术条件下作战需要为根本目标;三是以解决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等高层次问题为主要内容。可以说,这次新的练兵热潮是深化训练改革的热潮,是研究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热潮,是加强诸军兵种协同训练的热潮。

1994年6月,全军夜间训练改革现场会在河南、山东两地召开。我和总长张万年、副总长李景等同志到了演习现场。

我们听了有关情况汇报,看了一些材料,观看了器材展示和实兵演练。现场会内容丰富,层次较高,针对性强。在大单位领导同志参加的座谈会上,大家反映,开阔了视野,学到了经验,增强了信心。

夜战是我军特长、优势和传统作战方式,现在情况不同了,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我们的对手有了较先进的夜视器材,我军的传统优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外访问时,我参观过不少外军使用的高性能夜视器材。如微光夜视镜,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远方的景物也可以尽收眼底。热成像屏幕可将隐藏在掩体下的人、武器装备和部队撤离的痕迹清晰显现。严酷的现实告诉我们,按照过去利用夜暗隐蔽行军、隐蔽企图、出其不意袭击敌人的传统方法,已受到严重挑战。解决高技术条件下夜间仗怎么打、兵怎么练的问题,是摆在全军面前的一项带有全局性的紧迫任务。

总参谋部进行了夜训改革,由过去注意小分队夜训,发展到抓整师整团夜训;由过去各军兵种单独组织夜训,发展到诸

军兵种联合搞夜训；由过去主要研练地面近距离夜战，发展到突出研练多维空间夜战；由过去单纯使用手中武器搞夜训，发展到有针对性地改革创新夜战、夜训装备器材。

我参加了两个晚上的师团规模陆空实兵实弹战术演习。新战法和新装备将来能不能顶用，还要经过实践检验。大家把问题提出来，而且研究得比较深，虽然难度很大，但有了一个很好基础。我想，只要深入持久、积极稳妥地抓下去，就一定能把我军高技术条件下的整体夜战能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从军委明确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开始，我一直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部队，怎样才能实现由应付一般条件下的战争到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转变？

具体讲，就是部队怎样强化训练，怎样提高战斗力。而核心问题是要解决如何立足现有装备，打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这是一篇大文章，也是一个全新课题。很显然，我们过去熟悉的那一套已不能适应未来作战需要了，必须发展新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

我认为，对高技术战争，一般的了解不行，一般的研究不行，必须下真功夫、苦功夫，埋头钻进去。

首先，要加强对高科技知识的学习。如果干部不懂自动化指挥，不懂激光、红外、电子对抗，不懂军兵种知识，就无法指挥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合同作战。其次，要加强对近期几场局部战争特别是海湾战争的研究。过去，我们有研究战例的传统。通过对交战各方的作战思想和高技术兵器的具体运用，进行细致分析，对战争的起因、进程、结局有一个完整的了解，找到引起作战方法变化的关键和规律。美军自二战结束以来，平均七八年就推出一种新的作战理论。条令几乎是一

年一小改,几年一大改。我们则封闭了许多年,对外界的了解太少。

新形势逼迫我们必须在作战理论和实践上要有突破性转变。比如,从过去对付一个主要敌人的全面入侵转到应付多个对手的多种形式斗争上来;从以坚守防御为主的内陆持久作战转到以机动作战为主的近海、沿边速决交战上来;从预设战场、长期准备的大规模作战行动,转到临机部署、快速反应的有限作战行动上来;从以陆战为主的协同作战,转到海战空战比重增大的三军联合作战上来。我们必须实现从应付一般条件下的战争到打赢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的重大转变。这种转变,越快越好。

我和总部及部队的同志交换了意见,鼓励大家,要坚持不懈,通过训练改革,建立我军新一代训练大纲、教学计划、教材和标准体系,完善从基础训练到三军联合演习的一整套组织训练的形式、方法和手段,解决高技术条件下练什么和怎么练的问题。要通过两三年的努力,在训练指导、内容、方法、保障、管理等方面走出一条适合不同部队情况、适应不同作战任务要求的比较成熟的训练路子。

1995年9月,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根据江主席的提议,军委领导成员进行一次调整。

这次调整中,增补张万年、迟浩田为军委副主席,增补王克、王瑞林为军委委员。傅全有调任总参谋长,王克担任总后勤部部长。

军委增补领导成员后,江主席对工作分工做了进一步明确。我和张震同志仍协助他工作;军委常务会议,他不出席时仍由我主持;我和张震同志继续分管原来的工作;万年同志分管军事工作;浩田同志继续担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并继续

分管外事工作；全有同志、永波同志、王克同志分别主持总参、总政、总后的工作；瑞林同志继续担任总政副主任，参加军委集体领导工作。

深入基层

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事情很忙。但我深知，军队的基础在连队、在士兵。军队是一盘棋，作为高层领导，要想把棋走活，就必须对基层情况有充分了解。许多工作，我们在上面讲了，但下面究竟执行得如何？部队工作现状怎样？不下去调查研究，很难心中有数。这时我到军委工作已经五年，虽年事已高，还是按老习惯，只要能抽身，每年总要跑一些部队，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1992年12月初，我来到广州军区某集团军。这是一支从游击队成长起来的光荣部队，打过不少硬仗恶仗。特别是在解放战争中立了大功，涌现出“塔山英雄团”、“塔山守备英雄团”、“白台山英雄团”。一个集团军中有这么多英雄团队，全军屈指可数。他们多年驻守中越边境，经受了战争与和平建设的考验。

我到了炮兵旅，看了两个营、一个连队。部队的基本情况还好，生活秩序井然，官兵思想稳定，训练成绩不错。由于多年准备打仗，部队驻地环境很艰苦，通讯落后，营区建设欠缺很多，像大礼堂、游泳池都没有。在集团军机关，我要求有关领导重视和帮助部队解决实际困难，并传达了小平同志最近关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加强团结、发扬传统、保持老红军本色、军队要听党的话的指示，重点讲了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问題。

我说：“毛主席、邓主席历来强调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不能削弱。那个时候忽视了、削弱了，就要出问题。我们军队要听党的话，服从党的领导，贯彻党中央一系列方针政策。当前党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搞上去，军队要服从这个大局。只有经济实力强了，人民生活改善了，国家富强了，军队才能更强大。要继续抓好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学习邓主席南巡谈话，解决官兵的思想认识问题，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要加强党的建设，包括党委班子建设、党支部建设，使各级党组织起核心堡垒作用。作为党的领导，是集体领导，集体领导就靠民主集中制来维护。只要党委班子团结，生活民主，大家心情舒畅，工作也就顺了。要坚持民主集中制，把大家的智慧集中起来，形成统一的思想。有了统一的思想，才能变成统一的行动。个人说了算，搞家长制，危害很大，对个人也没有什么好处。”

“用人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听听上下左右的意见，然后坚持党委集体讨论。这样用干部，就不会出问题。少数几个人研究干部，不听下面的意见、左右的意见，只听个别人的，必然脱离实际。不按党的原则办事，仅凭个人好恶，甚至送礼拉关系的人就提升使用，这不是我们党的传统。军队一定要保持团结，一定要坚持党管干部、德才兼备、任人唯贤、五湖四海、能上能下的干部政策。”

1993年4月20日，我来到海军驱逐舰某支队考察，与驱逐舰、护卫舰长们进行了座谈。对于现行装备问题，大家发言踊跃，提了不少意见。我问：“对打赢未来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你们怎么看？”会场鸦雀无声。

我说：“对于军委提出的打赢一场现代条件下特别是高技

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一般地表示赞同是不够的,要扑下身子,扎扎实实地进行长期的准备。什么是高新技术战争?如果以海湾战争来衡量,我们现有的装备差距还很大,要把近期准备和长远建设结合起来加以考虑。军委、总部是从战略上全面筹划,尽快改变我军武器装备落后的状况。作为部队来说,一旦爆发战争,还是要立足现有装备战胜敌人,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我们国家综合国力不强,科学技术也不发达,一下子还做不到用大批高新技术武器装备部队。丢掉现有的装备,去讲高新技术的战争,那是空的,越讲越糊涂,越讲越没有信心。光和敌人比武器、比装备,是不行的。我们有自己的优势,有自己的穷办法、土办法。”

我说,长征时敌军前堵后追,我们就用先疲后打法,消耗疲惫敌人。我也讲了二次大战美海军巧妙用兵,击沉日本几艘航母的战例;讲了武器装备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忽视这点会付出沉重代价。但我强调,战争的胜负,最终还是取决于人的因素。历史上,我军用劣势装备战胜了敌人。现在条件好多了,我们更要继续发扬战争年代不畏强敌、不怕流血牺牲的光荣传统,熟练掌握和运用现有武器装备,注重运用谋略,摸索出一套以现有装备对付敌人高新技术武器的新战法。同时,立足长远,研究将来条件改善了,装备更新了怎么个打法。

第二天我到了舟山要塞区。这是一支在战争年代打了很多仗的老部队,在这里驻守了几十年。随着和平形势的发展,部队不断调整,级别越来越低,兵员越来越少。部队领导有些想法。

我要求他们要从全局看问题:“现在形势不是特别紧急,少养些兵,对大局有利,对国家经济建设有利。多一个兵就少一个社会劳动力,国家就多一个负担;少一些兵就少一些消

耗,地方上就增加一些劳动力。和平时期少养兵的重要意义是十分明显的,所以提出质量建军。要少养兵、养精兵。当然,质量建军不仅仅是减几个人的问题,不是说人少了质量就高。质量建军,首先是要提高政治思想觉悟,使广大指战员始终忠于党,忠于祖国。这个思想大家要树立牢固。质量建军,当然要把军队编组好,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质量建军还包括要把训练搞好,武器装备要精良,后勤体制现代化。我们国家这么大,边、海防线那么长,需要一定数量的军队站岗、放哨。但一步一哨,人海战术不是办法。在相当长时间内没有大的战争的情况下,抓紧时机,少养一些兵,搞得精一些,更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更有利于国防建设。”我告诫他们:“应该看到,虽然部队调整精简了,老部队的光荣传统还在,守岛建岛的光荣历史还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掉。人多是这样,人少也是这样,要提倡以岛为家,以苦为荣,爱岛守岛。”

“军地反差大”,许多部队都有这种反映。几天后,在南京军区学习“南京路上好八连”座谈会上,针对这个问题,我讲了一番意见: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不讲国家利益、社会贡献,不讲艰苦奋斗,而是只讲个人利益,大手大脚、奢糜之风盛行,那么,这样的国家和民族是没有前途的。能不能艰苦奋斗,是一个人、一个军队、一个民族有没有志气、有没有力量、有没有希望的标志。我们强调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不是否认个人利益。但是,个人利益的实现,要以国家利益为前提;美好幸福的生活,要靠艰苦奋斗去创造。好八连的同志说得好:‘国家是自己的,自己是国家的,我们要想一切办法,让国家对自己的负担更小,使自己对国家的贡献更大。’他们自觉地把个人命运同整个党的、国家的、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

把舍己为人,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为国家和人民多分担一点困难,当作最大的光荣和幸福;把损人利己,贪图享受,看作是一种耻辱。古往今来,勤劳俭朴总是先进的光荣的,奢侈浪费总是落后的可耻的。”

我说:“‘军地反差大’,是现在部队反映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反差从来就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绝对平均是不可能的。关键看和谁比,怎样比。要比,我们应该和全国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比。不能动不动就和少数个体户、百万富翁比。我国总体生活水平还比较低,特别是有少数地区连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为什么不多想想他们呢?再说,国家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富裕了,这是好事,应该高兴才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共产党人流血牺牲,艰苦奋斗,不就是为了人民生活幸福,安居乐业吗。我们应该感到无比自豪,感到自己责任重大。当兵,天经地义就是要为人民服务,就是要讲奉献。这个大道理一定要讲,不愿听也要讲。该吃苦就要吃苦,该牺牲就得牺牲,否则要共产党员干什么。领导干部不能都跟着议论‘反差’问题,老讲这个‘反差’那个‘反差’,军心就会涣散,就打不了仗。总之,军队必须强调艰苦奋斗,为人民服务。”

8月上旬,我来到长春,考察了某集团军、空某军、吉林省军区和农牧大学等单位。总的看,几个单位的工作都做得很好。其共同特点是能从实际出发,把军委、总部的指示精神与本单位工作结合起来,抓好贯彻落实,在各方面都取得很大进步。我一直比较关注的是部队军事训练情况。结合这次考察,在几个单位的师以上干部会上,我又突出强调了军事训练问题。

我说:“从国家来说,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一步解放

和发展生产力。作为部队来说,一切工作就是要以军事训练为中心,不断提高战斗力。我们做部队工作的同志对这一点,认识要非常明确,行动要非常坚决。”

谈到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我的态度很明确:“一是要重视它;二是不迷信它。”我说:“大量高技术兵器的运用,确实使未来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不研究它,不知道它的特点和规律,一旦有了事情我们就会吃亏。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决定战争胜负的还是人。任何一种武器,总是会找到对付它的办法,武器再先进,也不能改变这个规律。否则,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我军能够以劣势装备打败强大的优势装备的敌人,就不好解释,不可理解了。”

“这些年,我们练技术、练战术、练合同作战,就是在探讨研究。对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不要把它神秘化。当然,我们同时要加强对高科技的学习,增长知识和才干。从目前我军训练的情况看,训练的方法还是老规矩、老办法多,需要改进。总之,部队训练的难度和强度要加大;在技术、战术方面,训练要严,动作要准,练得要熟。”

“加大训练难度和强度,不是搞层层加码。要求过高,不适当了,就会走到反面。但要求要严,标准要高,这是必须的。高标准严要求,就是按照条令规章、按训练大纲和训练制度来办。军队战斗力的提高,要靠训练。官兵政治素质的提高,也要靠教育、靠训练。”

1994年2月,我到了“鼓浪屿好八连”。多年来,该连同“南京路上好八连”、“硬骨头六连”一样,是部队建设的一面旗帜。该连很注重管理教育,官兵关系好,军民关系好。他们狠抓基层管理的做法使我很感兴趣。

9月,我到了山西。考察了两个集团军、省军区、空某军

和武警部队,观看了部队的训练、操演、营房、工事,还多次深入连队和战士宿舍,与指战员座谈讨论,倾听他们的意见。这次考察的重点之一,就是研究新时期军队管理工作。

部队的管理,是军队建设中一项经常性、基础性的工作,是巩固和提高战斗力的重要保证。多年来,管理工作是军队建设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比较突出的是:一、松散顽症没有根治,严重违纪和重大事故案件时有发生;二、依法治军观念淡薄,工作中随意性大,不正规的东西还比较多;三、少数单位打骂体罚战士的问题屡禁不止;四、军地、军民纠纷增多,严重影响了部队的内外团结等等。这些问题,事关我军的性质和宗旨,对部队建设影响很大。因此,在新的时期,如何加强和改进军队管理工作,便成了一项十分重要和紧迫的事情。

通过考察,我认识到:在新的时期,要加强和改进部队管理,干部是关键。干部必须端正对士兵的根本态度,爱兵才有资格带兵,才能把兵带好。

座谈中,我对基层干部说:“我们要以父母心、兄长情关心士兵,爱护士兵,真心实意地为士兵服务,对士兵成长进步负责。特别是对新兵和后进士兵,更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导之以行;切不可简单粗暴,更不能打骂体罚。爱护士兵,首先要尊重士兵,尊重他们的人格,这是至关重要的。”我告诫他们:“干部要严格自律,为战士做好样子。在战争年代,我军干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成为战士的一面旗帜。今天,各级干部仍然应该身体力行,自觉地和战士实行‘五同’,生活上打成一片,思想上想到一起,工作上干在一块。”

加强和改进部队管理,应该加强纪律建设,贯彻条令条例,依法从严治军。

在这方面,我对部队领导谈了四条意见:“一是要抓纪律建设。坚决克服主观主义、分散主义,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一切行动听指挥,确保军令政令畅通,坚决纠正各种违犯纪律的现象。二是抓条令条例落实。所有官兵都要熟悉职责,按条令条例规范言行,坚决纠正有法不依的随意性,纠正违背条令条例的‘土政策’,建立正规的战备、训练、工作和生活秩序,实现装备管理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三是抓严格训练。训练和管理是相辅相成的,怕出事故而降低训练难度是不对的。特别是机械化部队,要经常动一动,越不动就越动不了,就越容易出事故。要把抓训练和抓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四是抓日常养成。管理工作,贵在养成,也难在养成。好作风要从一点一滴抓起,要手把手地教战士,持之以恒,养成习惯。”

为了研讨特区部队建设和管理问题,1995年2月,我专程到海南、深圳,召开领导同志座谈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先后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等地建立了经济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特区经济发展很快,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对部队官兵也产生很大影响,激发了指战员开拓创新、积极进取的革命精神,给部队建设注入了生机和活力,军政军民关系进一步密切。总的看,积极影响是主导方面,但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一些官兵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的影响,淡忘了我军性质、宗旨和任务,“一切向钱看”的思想有所滋长;社会环境复杂,驻地周围“灯红酒绿”,低级的思想文化对部队的侵蚀增大,一些人经受不住考验;干部战士与外界的接触增多,不少退伍战士或家乡亲友来驻地打工经商,分散了官兵的精力,干扰了正常工作,还诱发了一些

军民纠纷；而且，近些年兵员成份也发生了变化，独生子女、个体户、小老板等增多，还有少数有劣迹的人也混进了部队。针对这些新特点，特区部队在党的建设、思想教育、部队管理、作风纪律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对策和措施，有传统办法，也有新办法，创造了一些好经验。但是，无论机关还是部队同志，都感到工作难度增加了，兵难带了，部队难管了。

座谈会上，为了让大家畅所欲言，我讲得很坦率。我说：“从全军情况看，军队建设的主流始终是好的，各部队坚决贯彻军委的各项决策和指示，经受了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各方面建设取得了新的进步，但也要看到，近年来部队出了一些问题，特别是恶性案件和重大事故时有发生，对军队的形象影响极坏，暴露了部队建设中的薄弱环节，很值得反思。”我要求大家，认真解剖一些典型事例，汲取教训，改进工作。在座的都是领导干部，大家敞开了思想，对部队的实际情况谈得很深入，问题的分析也比较透彻。

也就在这次座谈会上，谈到了部队管理应该实行“开放式”还是“封闭式”的问题。有的干部认为，在目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部队似乎应该面向社会，搞开放式管理。究竟应该怎么管理，这是时代发展给部队建设提出的新课题。

我不同意“开放式”管理，在座谈会上谈了自己的看法：

“在军营里，一切都要按军规军纪办事，部队要像部队的样子。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主张部队要进行封闭式管理。国外所有军队都是封闭式管理，军营不能随意进出。军营要有一种威严的气氛，官兵不能随便‘溜号’，外面的人也不能随便进来。先把人管住，再进行教育，这个思路是对的。现在有的部队营区成了‘大杂院’，应当认真进行清理，净化营区。特别是对那些专门在营区周围门外墙边设办的饭店和摊点，要与

地方有关部门联系,彻底清理,不让它干扰军队;同时要教育官兵不去这些地方。”考虑到特区的特殊环境,我建议作一些规定,“比如不准战士同驻地经商的、打工的来往;不得参与打工、经商;不准到营区外下酒馆、饭店、卡拉OK厅等等。尤其是到驻地打工经商的亲友、老乡,对官兵影响很大,下决心割断这种联系,不准他们与部队的人员来往,干部战士也绝不能帮助他们‘办事’,当‘联系人’、‘保护伞’。在作出规定之前,要把道理讲清楚,使大家自觉遵守,并严格请销假制度。”

当然,我所讲的“封闭式”管理,不是把官兵与社会隔绝,不是把战士管成木头人,而是通过严格管理,使战士更好地提高军政素质,磨练意志,培养成才。也可以通过参观访问、请地方同志作报告等形式,使官兵了解社会、了解国家的发展,开阔视野,丰富头脑。也就是说,应该把“封闭式”管理和让部队官兵了解社情结合好。

在海南和深圳的座谈会上,我讲了两次话,对大家提到的一些问题,讲了一些个人意见。回来后整理成一个稿子,江主席看后认为“讲得很好”,批示转发全军。

我所要求的“封闭式”管理的实质,就是遵循军队建设的特殊规律,从严治军,按照条令条例管理部队。当然,对于实行“封闭式”管理,开始有些干部的看法并不一致。有的片面认为,这样做仅仅是为了防止战士和老百姓接触。实践几年后,大家感到:人能管住了,官兵的心能收回来了,事故少了,部队战斗素质也提高了。这时大家才自然而然地认识到,部队还是应当“封闭式”管理。

1995年7月,我到驻守北疆的某集团军考察。这个军在战争年代,有敢打硬仗打恶仗的优良作风。全军模范干部苏宁生前就在该军某团。我专门到了苏宁所在团考察。结合苏

宁这个典型,我重点讲了干部以身作则问题。我说,苏宁的特点就是以身作则。讲什么就干什么,叫部队干什么,自己首先去干,不叫部队干的,自己首先不干。他把官兵一致、上下一致的作风变成了自己的行动。我指出,有的干部成天忙,忙到最后出了问题,原因就在于指导思想不对头,忙于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弄虚作假,不讲实际。我结合全军发生的几起严重案件,强调要端正工作指导思想。我说,沉痛的教训告诉我们,绝不能再搞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主观主义那一套,必须端正工作指导思想,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把上级指示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实事求是,转变作风,注意工作方法,扎扎实实地全面建设部队。

9月中旬,我来到空降兵某军考察。两年前,在空军一次干部会上,我曾对加强空降兵建设提过要求。这次调研后,心中更有数了。

空降兵是一次大战后出现的新兵种。二战前夕,许多国家纷纷建立了空降兵部队,并在二战中大规模地使用,有过不少成功战例。战后的多次局部战争中,空降兵也都扮演了重要角色。空降兵具有使用突然、快速机动的特点,可以实施立体的全方位作战,迅速改变战场的敌我力量对比,并在敌后进行多种类型的作战行动。因此,冷战结束后,空降兵仍然受到各主要国家重视。例如美国的第十八空降军,就是美国实施全球军事部署和海外作战的一张王牌。俄罗斯空降兵辖有六个空降师、一个摩步师、五个空降旅等部队,兵力约7万人,是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精锐部队。

在我国,来自外部的威胁,既有潜在的又有现实的,威胁的性质也很不相同。我们不能到处摆兵,处处设防。为了保持战略防御的稳定,我们在战略布势上纵深梯次部署,有重点

地设防,并保持强大的战略预备力量,以应付不同方向的威胁。特殊情况下,为应付国内一些突发事件,需要有一支能够迅速控制事态的应急力量。空降兵部队由于自身特点,需要随时准备担负这些特殊使命。

我对部队干部讲,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军队,都把空降兵部队武装成精锐之师,在这个部队中服役的官兵都感到很自豪。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军空降兵部队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军委对这支部队寄予厚望。我说:“领导干部不仅要了解空降兵部队的地位、作用和使命,而且要向广大基层官兵进行教育,并把这种认识变成全体指战员的自觉行动。”我强调:“由于空降部队的特殊使命和重要地位,部队建设应当提出特殊的要求。中等标准不行,低标准更不行,必须高标准,必须第一流。在关键时刻、关键场合,这支部队要拉得上、打得赢,真正过硬,真正顶用。这样才能做为军委的拳头部队来使用。”

我总觉得,空降兵部队建设已经40多年,但我们仍未认识它的客观规律。要减少盲目性,走出新路子,就必须从国情军情的实际出发,研究新情况、新特点,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发展我军的空降作战理论,为部队作战、训练、编制、保障等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

我表示,对部队提出的空降兵的作用、编制体制、装备构成、训练体系、后勤技术保障以及干部交流等方面的建议,将责成总部机关和空军认真研究,拿出解决办法。回到北京,我把调研情况通报给总参和空军领导。下面反映的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写进了“九五”期间军队建设计划。

下部队考察,我不喜欢带很多的人,前呼后拥,既给基层增加麻烦,也不便于了解情况。轻装简从,行动方便。当然,

年纪越来越大了,精力不如以前。尽管如此,到部队后,我还是尽可能安排时间,下连队直接和指战员见见面。

1996年4月,我来到云南边防调查研究。这一次,我计划多到连队看一看。12日上午,在某团营区巡视时,我走进八连三班宿舍。战士们正在学习,我和战士聊了一会儿,问班长连队伙食怎么样?班长回答:“每顿三菜一汤,每周一次小会餐。现在我们蔬菜自给能达到百分之五十,如果搞好养猪种菜,伙食会更好。”我临时决定去炊事班看看。炊事班正在准备午餐,案板上放着中午准备吃的土豆、青椒、猪肉。问了几样蔬菜肉类的价格,又问司务长,吃超没有?司务长说:“不超,还略有节余。”我让他给我算个账听听。司务长不慌不忙,从战士的伙食标准、主副食价格、农副业生产补贴,讲到全连每月的消费总量、每人每天的平均数,讲得清楚明白,也很实在。

几天后,我来到昆明陆军学院,看望了藏族班。这是根据我的提议办的一个特殊班。小学员们非常兴奋,按照藏族传统习惯,好几个学员给我献上洁白的哈达。进了教室,一张张红扑扑的脸庞围在四周,我问他们:会不会汉语?是否回过拉萨?有个学员用很清楚的汉语告诉我:“回过一次,拉萨变化非常大。”有的学员有抽烟喝酒的嗜好,入学后,基本都自觉戒了,每月可以存下几十元津贴。我很高兴,对他们说:“为什么要在陆军学院开设藏族班,就是要让大家提高文化知识水平,更多地懂得政治上的道理,掌握基本的军事技能。西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将来肩负起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历史重担。”我交代学校领导,要从各方面照顾好这些藏族同胞,让他们吃上糌粑,喝上酥油茶。瞅着这些健康成长的小学员,心里很高兴。很快就过去一个多小时,工作人员几

次催促,才结束了这次座谈。

4月14日,到了丽江地震灾区。这次地震给老百姓造成极大损失,恢复和重建工作困难不少。一位卫生学校校长对我说,他们学校有800多名师生,教室和宿舍在地震中全毁了;感谢子弟兵,夜以继日地帮助他们修建了简易教室和宿舍。瞅着在简易教室里念书的孩子们,我心里很不平静,拿出一万元个人积蓄,捐给了“军民抗震希望小学”。我赞扬了军分区和武警支队官兵,要求他们和灾区群众同甘共苦,继续在重建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保卫边疆,建设边疆。

随后几天,我到了姐告分站、银井分站和畹町边防检查站,看望常年驻守在边防第一线的武警官兵。云南边防的社情相当严峻,地理环境也十分复杂,毒品、枪支、走私、闯关偷运案件相当严重,边防武警官兵的责任重大。我鼓励他们,守好国门,守好边防,严守职责,为祖国站岗放哨。

跑了一些基层部队,联系几年的调研情况,我感到基层工作还是薄弱。基层是部队战斗力的基础,我军的性质、宗旨、本质和传统,都要从基层体现,抓基层犹如盖楼打地基,疏忽不得。在驻昆明部队师以上干部大会上,我专门讲了抓基层的问题。

我说:“各级领导干部和机关要树立为基层服务的思想,深入基层掌握实情,千方百计为基层解决实际困难。各级领导要经常问一问自己,是不是真正了解基层、了解班排、了解战士?文件发了,会开了,课也讲了,底下听懂没有,照不照着做,做到了没有?”我要求各级领导,“一定要深入下去真正蹲在一个连队,仔细解剖一个连队,不要只是带着机关的同志东跑西跑,工作组像‘流水’,指导工作像‘泼水’,甚至连水都来不及喝就走了。”

我特别强调,抓基层工作要实事求是和反对形式主义:“领导干部要带头讲实话,报实情,办实事。襟怀坦白,对党忠诚老实,是共产党员的基本品质。全军这么多部队,一点问题不出是很难的,关键是怎样对待部队建设中的问题。出了问题,绝不能捂着盖着,更不能弄虚作假。基层出了问题,要多从领导和机关自身方面找原因,不要总是指责下面。把问题摆出来,找准原因,才能正确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改进工作。树立典型,不要人为拔高,既要看到好的方面,也要指出不足。看待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要防止表面化、模式化、绝对化。后进能够变先进,先进也可能变后进。决不能为保先进,缺点不指出,问题不揭露,矛盾不解决。总之,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务实,反对形式主义,在全军上下形成好的风气。”

当年5月,我考察了江西省军区、东海舰队等部队。在江西省军区,我重点谈了人武部收归军队建制后,怎样加强建设的问题。我说,在新形势下,人武部工作的重点,一个是战备,一个是维护社会治安,一个是组织民兵预备役人员支援国家经济建设,还有一个重要工作是保证征兵的质量。我要求省军区的同志,要抓好民兵队伍建设,发挥他们的作用,注意处理好民兵训练教育和减轻群众负担的问题,要深入基层,了解情况,扎扎实实做好工作。在东海舰队,我考察了潜艇的训练管理和装备维护保养情况,我说,海军是高技术装备密集的军种,训练必须十分严格,一丝一毫都不能马虎。要按照条令条例,精心管理维护保养好装备,使之保持和发挥出战斗力的最大效能。

6月中旬,我来到石家庄,召集陆军学院、装甲兵指挥学院、陆军参谋学院、空军四航校、石家庄高等医校等几所院校的领导干部,座谈军队院校建设问题。

40年代末,我在二野军大、西南军大工作,50年代从陆军调到海军大连海校办学,对院校的工作比较熟悉。我主张建军先建校,治军先治校。这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强调的问题,也是国际上的普遍经验。

建设现代化的军队,离不开干部,离不开人才,因此一定要把学校办好。这方面我们有教训,办学校总是翻来覆去,一会儿多了,一会儿少了;一会儿重要,一会儿又不重要了。耽误了时间,浪费了财力。

总体上讲,现在院校的规模还是大了。单位多,分散财力、物力和人才,效果不很明显。当然,不管怎样调整精简,院校要保持一定规模,培养的学员要保持一定数量。过去是这样,今后更是这样。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了,武器装备发展了,军队的组训形式发生了变化,对组织训练提出了许多新的更高的要求。有了新装备还不够,更重要的,还是要靠高素质的指挥员、技术人员和战斗员,才能形成强大的战斗力。因此,搞好院校建设越发显得重要。

座谈会很热烈,院长、政委们争着发言,直言不讳。有的讲,打高技术战争还停留在口头上、会议上、讲座上,观念还没有转过来,还用旧的教材训练学员,内容还有50年代、60年代的。有的讲,教员队伍的深造解决不了,地方可以出国,部队没有机会。有的讲,经费器材保障不够,靠学校搞生产经营来点儿钱,又怕干部被染坏。有的讲,学校教员职级照套部队等级,不符合院校规律。有的建议,总部领导、军区领导应兼任重要院校的一把手。很多同志希望,院校不要来回倒。

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和建议,我讲了几点意见:“全军院校形势是好的,教学总体水平有提高。目前院校建设存在的一些问题,靠学校自身很难解决好。有些问题,军委、总部还

要进一步研究,逐步解决。学校要办好,一靠领导班子,二靠教员队伍,三靠好教材和必要的设施。这几方面,我们有的院校还不行,基础不强,不能适应未来要求,要逐步发展提高。办学校首先要把校长、政委选好。用最好的干部办学校,这个思想不能变。

“培养高素质的合格人才是学校的主要任务。学员要高素质,对高新技术和未来战争的军事理论知识、战略战术都要掌握。当排长、飞行员、舰艇长都需要很高的知识和技术。陆军、空军这么多新技术,要加强学习。海军也是如此。比如当驱逐舰舰长,那么复杂的军舰,既要操纵它,还要组织战斗;既要抵御空中目标,还要对付水下目标。这就需要有很好的理论基础、技术水平和战役战术思想。

“现代战争对人才的素质要求很高。校长、政委和教员,要比学员高一个层次。本身素质低,不可能培养出高层次人才。这关系到今后的教学改革怎么搞,涉及教学器材、教材和教员的培养等一系列工作。有些编制不合理,今后可以改。比如师级院校,有些突出的教员,可以和校长、政委一个级别;有几个军级教授也可以。总之,有突出贡献、有水平的教员,待遇可以高一点。人留不住,都走了,就办不好学校。这个问题过去强调不够,不利于保留人才。学校与部队干部要适当交流,不交流就会脱离部队实际。团长、师长可以到院校当教员,也许一下子上台有困难,有个过程就适应了。

“关于新武器装备给学校的问题,有条件就应该给。当然,有些新装备数量有限,不可能都给。有一条可以办到,就是把新教材、技术资料给学校。有些新的装备器材,只要有可能就先发到学校。这个问题要想通一点,对院校要舍得投入。把新装备投入院校,院校根据新装备的发展趋势编教材,教学

员,教干部,再结合新的武器研究战法,战术就发展了。

“从严治校是根本。学校一定要比部队管得更好,要求更高。部队要严格,院校更要严格。从严治校,本身就是培养学员的办法。要有个好的校风,养成好的风气和作风,才能使学员又红又专。办学方向,还是要坚持毛主席说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尤其要重视抓好学校的思想政治建设。我军的宗旨、性质都是为了人民,为了社会主义事业,培养的干部一定要有很高的政治觉悟,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高度的责任感,这是根本的方向问题。”

1997年4月,我来到驻陕西的陆军某师。这是抗战时期,我所在的六分区所辖的部队。回到老部队,心情格外兴奋。大家一定要我讲话,我说:“会议开了,决定作了,关键是抓落实了,没多少活可讲了,就讲讲质量建军问题吧。”

质量建军就是强调部队要少而精,军队的政治素质、军事素质、思想水平、军事战术技术水平都讲高质量。现代化战争,已经发展到使用高技术、新技术作战。出现了新的战争形态、新的战争模式、新的武器装备、新的战术思想,还有很多新的东西。新技术革命引起军事革命。我们军队建设的目标是要跟踪时代发展,大力发展高科技武器装备,把国防科技水平提高一个档次。我提出,我们的经费有限,一下子还不能有大批新武器、新技术装备部队,还要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地抓好部队建设,现代战争更需要高素质的人才。人的素质提高了,武器装备现代化了,军队建设质量就高了。

5月28日,中国海军出访美洲的舰艇编队,圆满完成对美国、墨西哥、秘鲁和智利的友好访问,返回祖国。这不仅是军队和海军的一件大事,对我个人也有特殊意义。我和总部

及广州军区和海军有关领导赶往湛江军港,迎接编队凯旋。

上午8时,码头上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国务院有关部委领导和几个国家的驻华使节也来了。欢迎的人群打着横幅,敲锣打鼓,孩子们手持鲜花,兴高采烈。在海军司令员石云生和出访舰艇编队指挥员王永国陪同下,我乘车检阅了出访归来的舰艇编队。虽然经历了太平洋的风涛洗礼,“哈尔滨”和“珠海”号导弹驱逐舰及“南昌”号综合补给船已经拭去风尘,整洁一新,舰艇挂满旗,水兵们军容严整。

出访舰艇编队是从2月20日自湛江港起航,先后访问了美国夏威夷、圣迭戈,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秘鲁的卡亚俄,智利的瓦尔帕莱索等四国五港,历时98天,跨越东西、南北半球,总航程2.4万多海里,相当于沿赤道绕地球一圈还多。实现了海军编队首次横渡太平洋、首次抵达美国本土和南美大陆的历史性突破,创了人民海军对外交往史上出访规模最大、时间最长、航程最远、访问国家和城市最多的纪录。

欢迎仪式上,我宣读了中央军委的贺电。贺电认为,这次出访美洲舰艇编队同前不久出访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的舰艇编队,带去了中国人民和军队对美洲四国、东南亚三国人民和军队的友好情谊,增进了相互了解,发展了彼此之间的友谊。贺电对这次编队出访,求实地给予了高度评价:“你们不负重托,不辱使命,以严整的军容、严明的纪律、良好的素质,展示了我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形象,扩大了我国我军的影响,对维护与促进世界和平作出贡献,在人民海军史上写下了新的篇章。”

此时此刻,作为一名老海军,我心情不一般。“哈尔滨”号导弹驱逐舰,是我当海军司令员时提出建造的,如今,它已经远渡重洋,不由得令人浮想联翩。造这艘舰艇,当时阻力很

大,有人反对造这艘舰、也反对造其他中大型舰艇。十多年前,在国防科工委开的一次会议上,我专门发了一次言,提出一定要建中大型舰艇。我说,海军建设不能老是只造快艇、炮艇。小炮艇百把吨,出去一天一夜不行,几个小时都不行,根本不能在海上抛锚、停泊,战斗力大受影响。我坚决主张不能长期这么搞,这样下去,祖国海疆不会有坚强有效的防御。这条舰已经开始造了,不同的声音还有。当时,我们引进了几个国家的设备器材,有人想不通,说这个舰是“八国联军”,“有损国威”,是“卖国”。我不同意这种认识,因为适当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符合国际技术交流的现代潮流。实际上,并非我们一家在按这个路子搞。美国科技发达,他们建造的飞机、军舰,也有不少是靠其他国家给他配套。这里有个经济效益和时间效益问题。

现在看得清楚,“哈尔滨”号的建造是成功的。它的建造,主要靠自力更生;有些我们一时达不到的技术设备和装备,吸收了外国的先进东西。这个思路没错。今天,它远航太平洋归来,更雄辩地证明,15年前的决策,不仅正确,而且及时。

海军舰艇编队访问美洲四国,的确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回顾历史,中国曾数百年禁海,虽然曾有过水师、水军,但都是江河的、内河的、湖泊的,郑和船队下西洋的传统没有继承下来。鸦片战争以后,清朝政府在洋务运动中买了一些外国军舰,建设了现代海军,甲午海战却惨遭失败和损失。国民党海军也不强大。只有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毛主席、周总理、邓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心下,人民海军才从小到大,由弱渐强,为今天的局面打下良好的基础。应该说,这次访问成功,很好地表现了我们的国家实力,反映了国防工业的发展进步,也展示了人民海军的教育训练成果。总之,是一

次综合性的检验和证明,令人振奋和欣慰。

回想起来,在军委工作期间,由于坚持了下基层调查研究,不仅了解基层情况,对指导全局起了作用,而且对转变作风,密切官兵关系,都有很大促进。我这名从基层走过来的老兵,对部队的感情更深了。

科技强军战略

在军委工作期间,军队的装备发展,一直是悬在我心里的重大问题。

1992年12月9日,我从广西出差回来,看到江主席12月3日晚写给我和张震副主席的信。

信中,江主席谈了对国际形势的看法,要求我们按照小平同志的指示,注意观察研究,充分估计国际斗争的复杂性。对我军武器装备发展,提出要有符合我们实际情况的杀手锏。随信还附上一份小平同志的谈话要点。小平同志的谈话时间是11月28日,没有注明和谁谈的,中心思想是抓住机遇,发展武器装备。

江主席的信和小平同志的谈话要点,我反复看了几遍。

新中国成立40多年来,在国防科技事业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我们可以如数家珍地列出几十项、几百项,这一点,任何人都抹杀不了。但作为领导干部,必须头脑清醒。若把中国放在世界大环境中去比较去衡量,就会发现,我军装备性能同先进国家相比还有明显差距。特别是在高新技术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的今天,现代战争的形态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海湾战争表明,拥有高新技术优势的一方将掌握战场主动权。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在调整军事战略,更加重

视提高军队质量,实施新的国防科研和装备发展计划,争夺高新技术装备优势。我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也纷纷想方设法获取高技术装备。李登辉之所以表现相当猖狂,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台湾大量购买了美国、法国的许多先进装备。正像小平同志讲的,“切不要轻视目前的国际局势。国际局势还是很动荡的。”

多年从事武器装备建设工作,我深知科学技术对于提高我军战斗力的非凡作用,深知周边环境的压力,也深知国家财力和技术的底数。多次下部队,看到部队练兵热情很高,从军长到士兵,一起苦练,而所用装备老旧,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军队现代化的核心,是武器装备现代化。打牢基础,奋力发展的重担,历史地压在了我们肩上。领导人决策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和军队的兴衰存亡。

江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必须把国防科技发展和部队装备建设放在突出地位。他还召集国防战线的科学家进行座谈。中央政治局也专门开会。国务院加大了经费投入。我由衷欣慰,装备发展的春天到来了。

以后几年,我在许多重大场合,大讲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果断作出发展“两弹一星”及核潜艇等重大决策,奠定了我国国防科技工业的坚实基础。大讲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号召全军中高级干部,充分认识科学技术在我军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增强加快我军质量建设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树立向科学技术要质量、要效益、要战斗力的观念。一再强调,党中央对国防科技发展和部队装备建设非常重视,采取了许多重大措施,特别是进一步加强了对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的集中统一领导,增加了对国防科研和基建技改的

投入,同时拿出了相当多经费,用于技术和装备的引进,为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我提出,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我们有可能避免新的世界大战,争取到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要抓住机遇,加强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的发展。应当看到,今后一旦发生战争,就可能是大量使用高新技术装备的战争,我们要为此进行长期的准备工作。准备工作包括很多方面,其中最要紧的,是加强我军的质量建设,提高人的素质,加速发展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使我军的现代化水平迈上一个新台阶。不发展先进技术和装备,国家安全就会受到威胁,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从目前国际形势看,各国发展军备的速度并没有减慢。美国、俄罗斯等国家是如此,日本、印度等亚洲国家也是如此。

要使我们的国防力量强大起来,就必须依靠发展高新技术,用最先进、最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武装军队。

我们也得从实际出发。强调用最先进的武器装备部队,并不等于说今后所有的单位都搞高新技术,国家目前没有这个财力。过去,“歼6”飞机只需十几万一架,现在新歼击机上亿左右一架,国家承受不了。未来战争虽然以高新技术为主,但常规技术仍然少不了,常规武器仍然要发挥应有的作用,只要加强技术改造,也可以增加战斗力。还是要坚持过去说过的那句话:大米要吃,馒头要吃,窝头也要吃。高新武器和尖端武器必须同常规武器结合起来,高、中、低合理搭配。对于国家科技和武器装备具体项目怎么发展,我反复和科学家们商量,和部队的同志一起探索,心中有了一些想法。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定出科学的计划,一步一步抓紧落实。

1994年,军委确定拟制“九五”建设规划。对军队“九五”

期间的装备建设,我谈了自己的构想,意见大多被采纳了。

我的基本想法是:发展国防科技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战略问题,关系到我国的富强和安危。必须贯彻科技强军的战略,大力发展国防科学技术,提高武器装备现代化水平,提高我军高技术条件下的作战能力。有关具体项目内容,我也根据空军、海军、陆军的实际情况,排了排队,要求这些装备在“九五”期间形成作战能力。

我要求国防科技工作者,既要跟踪世界水平,着眼长远发展,技术上具有前瞻性;又要根据我军作战任务和作战对象,接受军事需求的牵引,服务于未来武器发展的需要,做到先进性与针对性统一。特别是找准严重制约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的“瓶颈”技术和薄弱环节,力争在新材料、新工艺、新型电子元器件、导弹技术、动力系统等领域有重大突破,提高信息获取与处理、制导与控制、对抗与防护、指挥控制与通信、推进与动力等国防科学技术能力,为下一代武器装备,提供一批接近国际先进水平的实用技术成果。

可以说,我军的国防科研和武器装备建设已经走出低谷,某些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缩小。当时,国防科研的多数重点项目,已进入总装和定型试验阶段。国防科技工业部门进行了百余项常规兵器试验,加强了关键技术攻关、预先研究和项目试验室建设工作,增强了发展后劲。为保障战略重点方向、应急机动作战部队和驻香港部队建设的需要,一批新装备补充到了基层。

1993年4月下旬,我和总政治部主任于永波、总后勤部政委刘安元等考察了正在建造中的第二代导弹驱逐舰。

第二代导弹驱逐舰是军委确定的“八五”计划重点工程之一,是海军更新换代的重大装备,也是我担任海军司令员时倡

导研制的。与第一代相比,在机动性、防空、反潜、作战指挥与控制等方面都有较大的提高,达到了国际 80 年代先进水平。

由于首舰刚刚进行了一个月的海上常规航行试验,正在进行武备系统联调试验,舰上显得比较零乱,到处是油污。我们仔细观看了飞机库、武备系统、机舱集控室和作战指挥室等部位。厂里的同志边走边介绍了全舰作战系统的构成和该舰的综合性能。

1995 年 5 月 8 日,我参加了第二代导弹驱逐舰首舰交船仪式。

我对造船厂的领导说:“今天是工厂喜庆的日子,首舰交船是厂里的大喜事,也是海军官兵、当地人民的大喜事。”我说,“首舰的建造,从立项到今天交船,时间不算长,却造出这样先进水平的舰艇,证明中国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和国防科技工业各级领导者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以及技术设计、施工工艺水平都是很高的。我国在建造现代化高技术舰船方面起步较晚,今天能造出这样的舰船,是很值得高兴的。这说明我国的科技水平在造船技术方面进入了一个较高的层次,是值得我们庆贺的。不仅仅是海军有了现代化的军舰,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国家有了如此高的舰船建造水平和整体科学技术水平。这是我们国家兴旺发达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50 年代初,毛主席就提出,要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邓小平同志在 70 年代也提出,要建设具有现代作战能力的海军。今天我们正在实现毛主席、邓主席的要求,而且在不断地朝着他们指引的方向大步前进。”

次日,我乘舰出海。伫立舰桥,祖国的大海一望无垠;海风拂面,军舰破浪向前。过去是令祖国屈辱的海洋,今天是令人民扬威的海洋。我突然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

1996年8月19日,我又听取了导弹驱逐舰的下一步研制方案汇报,要求新一代的驱逐舰要尽快形成自己的配套系统。

对于空军装备建设,我特别关心的是2000年以后的各种飞机。

1993年8月,我到东北某飞机制造公司检查飞机研制情况。1994年5月,我到了西南某飞机制造公司检查新歼击机的研制;10月,陪同李鹏总理又到东北,解决干线飞机问题。1995年7月和1996年5月,我分别到几家飞机制造公司考察武装直升机研制情况。1997年4月,我到部队检查两种新飞机的试飞进度;6月,又到西南某飞机公司,参加“飞豹”生产动员大会。在北京,我还多次召集专门研究飞机科研生产的会议,目的就是督促航空工业战线,早点拿出好飞机。

说来容易做起来难。

在飞机研制过程中,有许多经验教训应该总结。比如,我们对科学技术认识有盲区,影响了领导决策的准确性;光有决心和保证不行,必须有科学的态度,等等。

我对航空工业战线的同志们讲:“航空工业是国防科技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系到国家安全、体现综合国力的高科技产业。世界主要军事大国,都把航空工业作为带动经济发展的高技术支柱产业优先发展。正是由于这种特殊地位和作用,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自领导和创建了我国的航空工业。没有航空工业的腾飞,没有一支优秀的科技队伍,就没有我们现代化的空军,也就没有我们的海军航空兵和陆军航空兵。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尽管航空战线取得了不少成绩,但离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和要求仍有差距,我们提供的主战装备还满

足不了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要求,一些关键技术和研制手段还制约着新型航空武器装备的发展。我们要抓紧赶上,但不是所有东西都能马上赶上,关键的赶上去就行。我们部队目前装备的飞机,同周边国家和地区装备的飞机比还有差距,如不采取有效措施,我们与发达国家甚至周边国家的差距将有进一步拉大的危险。”

我说:“当前,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航空武器装备非常重视,把它放在重要位置,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八五’期间,江主席、李鹏总理以及其他政治局常委同志,多次视察了航空工业有关厂所,研究航空武器装备发展问题,特别是加大了科研、生产和技术改造投入的力度。为了进一步缩短与国外的差距,实现航空工业腾飞,中央下了很大决心,宁可在别的地方忍耐一点,牺牲一点,也要多投入一些经费,加强航空工业的建设。当前,航空工业面临着大发展的难得机遇,具备了大发展的良好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工作没有做好,还拿不出像样的装备来,就无法向党和人民交代。”

对空军装备建设情况,我书面向江主席、李总理、朱副总理作过汇报。

汇报中,我谈到了研制成果、主要经验,讲了存在的问题,也讲到解决的办法。同时对航空工业战线的广大干部、科技人员和工人們的齐心协力、刻苦攻关、几乎没有节假日的献身精神,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

航空战线的同志们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1998年3月,首架“飞豹”战机试飞成功,当年在珠海参加了航展。

对高性能计算机的研制,我也一直比较关注。

1996年,我在一次计算机鉴定会上,看见朱光亚、甘子玉、朱丽兰、刘剑峰、胡启恒等许多专家都来了。我说:“计算

机的‘神’，今天都在这里集中了，我们不要再迷信洋人了！”我告诉大家，江主席得知计算机运算速度有新的突破后，非常高兴，特别交代我转达他的祝贺和问候。这是对科技战线广大官兵的巨大鼓舞和鞭策。

在鉴定会现场，我讲了两件事：

一是鼓励科技工作者们。强调没有强大的科技实力，就没有我国的现代化，就没有我军的现代化。大力发展国防科研，对加强我军现代化建设，全面提高部队战斗力，具有重大深远的意义。世界计算机发展异常迅猛，一步跟不上就会掉队。我们已经具备了向速度更高、功能更强的巨型计算机进军的多方面条件，争分夺秒，加速攻关，完全可以奏效。

二是促进计算机的产业化。1991年我和宋健主任就提到，有那么好的计算机，应该向全国各个部门、各个系统推广应用，实现产业化，但是一直推不动。原因就在我们一些同志信洋神，不信中国的神，好像中国的神不灵，一心一意买外国的。多少年过去了，还是如此。我说，再别去买外国的计算机了，要开动脑筋，不要迷信洋人，中国的神是很灵的。我们有的东西，可以向外国买，不买不行。我们拥有的东西，要推广使用，使用就是很大的支持，这是支持我们的国家，支持我们的人民，支持我们的民族。我和国家计委、科委、国防科工委的领导同志和专家们探讨了一些具体办法，大家非常拥护和赞成。

高科技的关键之一是电子技术。未来作战，首先是以电子战为开端的。指挥也好，情报侦察也好，发挥武器作用进行攻防也好，都离不开电子技术。没有电子技术，就好比人失去了眼睛、耳朵。很多人讲，今后的战争是电子战。我认为这样讲是恰当的，抓高技术，抓新技术，必须抓电子技术。当然电

电子技术的发展和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研究出来的电子装备要能够有效地对抗敌人的电子进攻,或对敌人实施有效的电子干扰。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指挥系统,都包含着电子技术,方方面面都不能轻视,不能马虎,必须精益求精。

为了解决电子技术落后的问题,几年内,我跑了很多研究所。我看到,攻克电子技术的难关绝非易事,从元器件到工艺,到设计,到质量,我们都有许多可以提高的地方,特别是怎样最快地把研究成果用在武器装备技术上,转化为战斗力。多年来就有这样的现象,“展览一大片,部队看不见”。50年代和60年代搞过很多展览会,可是,展览完了,什么都没有。因此,基础元器件产品怎样推动整机的发展、整机如何不断提高性能、从而提高我们的武器装备水平和综合作战能力,这是个系统工程,也是规划电子技术发展必须考察的“龙头”问题。

对于发展电子技术,我主张中央统管,集中财力物力,突击高精尖的产品。对重大项目,要舍得花钱,打歼灭战。民用产品则推向市场竞争。

国防通信设备大量使用外国的机器将来是有危险的。还是要走自己努力加引进的道路。新产品新技术要运用,再好的东西,不去使用,就成了死东西。加大出口,紧跟世界先进技术,既划得来,又符合国际技术发展规律。我几次开会,协调电子综合信息系统研制的问题,想把这个事关军队指挥现代化的大系统尽快研制出来,提高我军高级机关的指挥效能。

在军工战线,最困难的要数兵器工业。如炮弹和炸药,平时需要很少,一旦仗打起来,不仅要得多,也要得急。对越自卫还击作战那年,由于仓库存量有限,前方一打响,几天就把库存的大口径炮弹打光了,其他口径的炮弹也打得差不多了。当时,邓主席要我紧急抓这件事情,可是临时抓也来不及,因

为生产能力就是那么大,工厂拼命生产半个月一个月,前方几天就打完。现在不打仗了,生产线都闲下来了。根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决定,生产能力已经大大压缩,国防费有限,每年的实际订货很少,生产能力还是大量过剩。兵器工业的厂子多在偏远的三线地区,缺乏信息,缺乏资金,转产比较困难。

我到过一些困难的兵器厂。有的厂几个月发不出工资,工人照样按时上班,一分钟不耽误。有的厂教育工人:一心为国防,不变心,不动心。实在感人。兵工战线创建最早,已走过60多年战斗历程。

他们的困难,我不能熟视无睹。我始终认为,兵器工业在极端困难之中,保住了军品生产能力,保住了科技力量,保持了全行业的稳定,难能可贵。此间,时为兵器工业的领导人张俊九等一班人做了很多工作,尽心尽力。我一方面积极鼓励他们抓技术,大力更新技术,提高装备水平,抓管理,严把产品质量关,把质量放在第一位;抓军转民工作,使可创造财富的科研、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利用,提高经济效益,留住人才。另一方面,积极总结和推广军转民的典型经验,主动向中央反映兵器工业存在的困难。

1994年5月,我到重庆考察了几个兵器厂,重点检查了步机枪小口径枪族、自行榴弹炮等装备的研制生产及军转民情况。

重庆的国防工业,有兵器、舰船、电子、航天等四大门类,数十个工厂、研究所,职工十余万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庆的军工认真贯彻“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16字方针,解放思想,大规模引进外资、引进技术,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有些工厂已基本实现了保军转民的战略转变,民品生产已成为国防工业的主体。同时,军民结合也使

国防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建设、嘉陵、长安、江陵等四大企业集团,军转民已形成规模经济。

听了他们的介绍和参观,归纳他们的经验:一是认真贯彻了16字方针,决心大,动手早,产品对路;二是积极引进技术、引进外资,有很高的高技术含量,技术台阶跨度大;三是规模化、集约化生产,批量大,经济效益显著;四是准确把握市场信息,及时调整产品结构和档次,适应市场变化;五是良好的经济效益、饱满的工作量,稳定了队伍,稳定了人心,形成了良性循环,促进了各方面的发展,特别是社会稳定,保证了军品的科研生产。

5月26日,我向江主席、李鹏总理并中央军委和军委各领导同志写了一份报告,专门汇报“重庆地区兵器工业及其军转民情况”。

汇报中,我反映了兵器工业取得的成绩和经验,分析了常规陆军装备的整体水平的基本情况,认真谈了军工战线存在的困难。我向中央陈言:“虽然目前军工行业保军转民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军工企业多数属于大、中型企业,普遍存在流动资金不足、社会负担沉重、机制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等问题,又大多地处三线地区,竞争能力弱。近几年来,全行业民品产值的增长平均都在20%以上,但经济效益不很理想,尤其是今年,出现了航空、航天、核工业、兵器和船舶全面亏损的局面。当前急需补充部分流动资金,从长远看,还是要大力调整过剩的军品生产能力,大力扶持军转民工作,深化改革,促进转变机制。”当然,我完全赞成国务院正在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也完全赞成朱镕基副总理和我谈到的关于军品价格体制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我只希望问题快一些得到解决。“否则长此下去,必将影响国家的稳定,也将严重影响

军品科研生产的正常进行。”

江主席对上述报告非常重视。5月29日,他批了很长一段话:“国防工业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由于军工任务的缩减,困难较大。今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事,军品准确价格也要符合价值规律,不能再沿用老办法。由此而产生的军费问题,要统筹规划,逐步加以解决。”

江主席的指示,很快传达到国防科工委、国务院办公厅等有关部门。国务院几次开会研究,对军品价格、装备订货预付款、军品生产技改等问题,提出了解决原则和牵头承办的部门,一些重大政策问题,逐步得以解决。

这些年,中央决定积极开展对外军事技术合作。实践证明,这个决策是正确的,加快了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的发展。我们引进了一批武器装备的关键技术,少量购买了部队急需的先进装备,加快了许多重点项目的研制进度。

但在这个问题上,认识却一直没有很好统一。有人还是坚持过去意见,认为拿钱去买技术买部分装备,不如把钱用来发展自己的技术。这种认识愿望是好的,可是没有从全局来看问题。

实际情况是,靠我们现有的基础,要达到世界现代武器装备的水平很不容易。不仅投资不够,时间也会很长。我们现在花点钱,是为了抓住机遇,节约时间。对外国先进技术,只要对我国确实有用,自己在短时间内又解决不了,就要想办法引进。我们应该用辩证的、发展的观点看待引进工作。过去是国外对我们搞封锁,许多项目只得自己干;现在有好的国际条件,应当抓住机遇,尽快赶上国际先进水平。

购买少量先进装备,作为样品,好处是明显的。基本前提是,有条件时一定要使它形成一定战斗力。尤其在紧急需要

时,更应该适当花钱,提高我们的作战能力。引进“苏-27”飞机等就是从应急使用和发展两方面综合考虑的。关于陆军的武器装备,有的可以多买几件,作为样品的,可以重新修复,编成小部队,形成战斗力。如果买回来的东西少了,拆开不修复不能用,或引进的样品放在博物馆里,就是浪费和损失。还有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往往引进装备与引进技术是紧密挂钩的。装备进来了,技术也带进来了,既可以仿制,也可以启发我们科研的新思路,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是光卖技术不卖装备的。在经费的筹措方面,我国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因为受经费体制约束,引进装备和技术的钱,是来自不同渠道。几家出钱,互相分摊,相对讲就不那么紧张了。

当然,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不可能把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放在买和靠别人的办法上。

外国可能会卖给我们比较先进的飞机、大炮、坦克等武器装备,也可能卖一些对我们来说是尚未突破的关键技术,但真正属于世界最领先的高新技术人家是绝不会轻易提供的。所以,国防科研还得靠我们自己去攻关。自力更生始终是我们国防科研工作的基本点,这一条什么时候都不能动摇。

我提倡抓住机遇,积极引进。引进装备时,也充分考虑了我们应该要什么样的技术;技术带回来以后,如何同国内科研相结合;对生产上应采取什么措施等。引进只是手段,引进的基本目的是为了提提高国内的科技发展和工业生产水平,引进、消化、吸收、创新,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现在回过头来可以看得很清楚:倘若没有技术引进,许多项目我们还会长时间地摸索。搞也能搞出来,但不知要花多少时间,多少金钱,而且很有可能搞出来后又显得落后了。

显然,为了省点过路费,有便捷的高速公路不走,一定要

在拥塞的辅道上爬行,这不是明智的选择。

载人航天工程与核威慑

1992年9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正式决定:要在本世纪末或下世纪初把中国的载人飞船送上天,并明确由我负责此项工作。

在国家财政比较紧张的情况下,中央决定载人航天工程上马,是反复斟酌深思熟虑后的重大决策。这一工程的启动,将使我国成为继俄、美之后第三个能够独立开展载人航天活动的国家。

对这项工程,我的态度一向坚决。早在1988年,就支持航空航天部林宗棠部长提出的这项建议。小平同志对这件事十分关心,多次询问工程进展情况,指示我们一定要把这件事抓好,增加威慑力量。

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国都在调整政策,利用和平环境大力发展经济。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也转入到综合国力的较量。这一较量,从本质上讲,就是科技的较量。航天技术是竞争的主要方面。

今天的中国不仅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而且在政治上有很高地位,在国际上有巨大影响。中国有了两弹,有了很多先进的常规武器。特别是航天工业一直在发展。建成了具有相当规模、专业齐全、完整配套的航天研究、设计、试验、研制、生产、发射和测控体系;研制成功了战略导弹、多种防空、海防和地地战术导弹武器系统;长征运载火箭形成了系列,具备了发射多种轨道卫星的能力;我国自行研制并发射了40多颗人造卫星;航天遥感、卫星通信、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空间科学试验等方面的应用,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一

句话,中国已经是一只身体强健的“醒狮”。

我也意识到,像载人航天这样如此复杂浩大的攻坚工程,肯定会遇到很多困难。主要是技术和经费问题。但我充满信心。我们的航天队伍是一支经验丰富,基础很好,能打硬仗的队伍。过去搞“两弹一星”有很好的经验,现在又有中央和全国有关部门作坚强后盾,只要共同努力,就没有攻不克的难关。我跟航天战线的同志们讲过:马克思说,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的需要,为全人类服务。航天事业是造福全人类的事业,能有机会把自己美好的年华献给壮丽的航天事业,写出一部熠熠生辉的创业史,还有什么比这个更为荣耀和可以引以自豪的呢!

航天工业总公司经理刘纪原以及一些航天专家多次向我汇报工程进展情况。这是一项振奋人心的工程,一开始各项工作就抓得很细很实。方案论证阶段的重大问题基本一一解决。主要系统的方案也得以明确。

1992年10月,我来到西北戈壁滩,确定载人航天发射场的位置。

奠基仪式上,我握住钢锹,铲起了发射场奠基的第一锹黄土。我感到荣幸和自豪,用力将黄土甩向那块结实的奠基石。中华民族曾有过无比辉煌的历史,但也有过被讥为“东亚病夫”的屈辱。现在,我们又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将从这里自豪地跨出迈向太空的脚步。几年后,这里将耸立起百米高的“垂直总装、垂直测试、垂直运输”的发射系统,肩负着载人航天和导弹、卫星发射的重大任务。

1994年10月28日,我和专家们一起来到北京郊区,为空间研制试验中心奠基。这也是国家重点工程,不久的将来,这里将建起一座初具规模的现代化航天城。果然,1998年11

月,我再次来时,这里已经完全变样。笔直的马路、高大的厂房、林立的试验室,显示出航天城的现代气派。踏进厂房,看到了正在试验中的飞船,更是令人振奋。六年的时间,熬费无数人的心血,完成了飞船和火箭的方案设计,各类大型试验在顺利进行。

专家们说,当年党中央对载人航天工程的决策非常正确。除载人航天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外,对培养一支高水平的航天队伍,保持我国航天发展势头创造物质条件,带动多学科、多门类的知识和技术进步,提高系统工程管理水平等所做出的贡献,也是巨大的、直接的。

我说:“还不到喝庆功酒的时候,打上天了,我一定来庆贺!”

禁止核试验谈判,也是这几年我的一项重要工作。

我到军委主持工作后,江主席提议由我担任禁核试谈判领导小组组长,负责国内外禁核试和化学武器的谈判及对策。

这个领导小组主要有国家计委、外交部、国防科工委、军贸办的领导同志参加。外交部的沙祖康大使,负责在前方和美、俄、法等几个大国谈判。花了几年时间,最后争取到的成果是,各方同意在1996年9月禁核试五国签约。

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了这个时间方案。从外交斗争上看,我们已经争取了一定时间,为我国发展核武器创造了有利条件。我一直参与主持研究新时期我国核武器装备建设规划。我的主张很明确:这种武器不能随使用,但一定要有。少搞点数量,解决质量,解决可靠性。

海湾战争后,有种假象弥漫世界:核武器的作用不如从前了,甚至没什么用了。

这一看法不符合实际。美国政府始终认为,“安全可靠的

核威慑,仍然是美国安全政策的基石。”他们一直在坚持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威慑政策,并把这种威慑范围由过去对付苏联,扩大到对付世界范围内的敌对国家和潜在对手。法国总统希拉克称,“必须优先考虑法国拥有一支可靠的核力量,核威慑是欧洲安全的一部分。”俄罗斯也不放弃核威慑战略。过去几年里,美国和俄罗斯在大幅度削减核武器,其根本原因是他们搞得差不多了,已不再需要常规的裂变核爆炸试验,其核武库的安全及可靠性计划也不需继续此类试验。他们从经济、军事和技术角度出发,削减的是本应退役、老化及早期设计不合理的核武器。美国已在考虑发展第四代核武器。而印度、巴基斯坦在继续发展核武器,对禁核试条约持坚决不签约态度。

面对西方核大国的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就是坚定不移地发展精干有效的、具有威慑力量的核武器。

几年前,我和有关专家已经酝酿这件事。条约要签,谈判继续进行。美国人表面大搞禁核试条约签约,而它在国内一天也没有停止试验。我们必须有对策。我和朱光亚、丁衡高、钱绍钧等同志多次研究过这个问题。中央专委也对此形成了明确的决议。

中国曾声明,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正是由于我们有了核武器,超级大国才会对中国另眼看待,不敢轻举妄动。发展核武器技术与保持我国自卫核威慑力量的有效性,实际上关系到国家安危,我们对中华民族要负重大责任。核武器是销毁不了的,也禁不了。尽管不能随便使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没有这个武器不行。虽不能多,但要有一定规模,太少了也不行。只要霸权主义存在一天,只要这个地球上核武器还没有彻底、全部销毁,我们就要为核武

器事业发展做工作。

回过头看,30多年来,我国突破了原子弹、氢弹的制造能力,核武器技术发展了一代又一代,形成了我国有限有效的自卫核威慑力量,打破了帝国主义的核垄断、核讹诈,为确立我国的国际地位,维护国家安全,促进世界和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邓小平同志有一句话概括得很精辟:“如果60年代以来,我们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拿中国和美国几乎相等水平的核武器相比,美国进行了1149次试验,前苏联进行了1100次,法国也进行了210次,都远远超过中国。就投资来说,1995年美国公布,其50年来在发展核武器上耗资4万亿美元,我们比他们少得多。1991年到1995年,美国三个武器实验室获得的投资,折合人民币为2800亿。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效费比和成功率,在世界上是最高的。

1997年1月14日至18日,国防科工委在北京召开核试验总结会。我参加了会议,向从事核武器事业的广大科技人员、干部、工人和解放军官兵表示了崇高敬意。这种敬意发自内心。我们只花很少的钱,取得这么大的成果,而技术水平与外国相比,不差多少。这证明中国人聪明能干,也会干。

我在会上说:“核武器事业发展,培养了一支坚强的队伍,这支队伍是由千千万万科学家、技术人员、工人、部队官兵等组成的,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吃苦的队伍。这支队伍,常年风餐露宿在戈壁荒滩、大山沟之中,献了青春献子孙,为了发展我国的核武器事业,几代人连续奋斗,默默无闻地奉

献,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地位。这支队伍,创造了伟大的‘九院精神’与‘马兰精神’,即‘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奋发图强,勇攀高峰;团结协作,集体攻关;科学求实,开拓创新,不计名利,献身事业’和‘艰苦奋斗、无私奉献’。这支队伍技术好,觉悟高,已经形成了好作风,好传统。这是非常宝贵的,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这支队伍,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这种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具体体现。

“30多年来,我们在发展核武器事业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从大的方面:党中央的重视与英明决策,是核武器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以革命精神和广博知识武装起来的队伍,是核武器事业成功的决定因素;制定正确的战略思想,是核武器事业成功的重要前提;集中统一领导和全国大协作,是核武器事业成功的基本因素;质量与可靠性,是核武器事业成功的生命线;科学求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自力更生与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相结合,是核武器事业成功的制胜法宝。其中最主要的,一是靠党中央的重视与正确决策;二是靠英勇奋斗、无私奉献、实事求是的革命精神;三是靠集中统一领导和全国各行各业的协作与支持。我们虽然试验次数不多,但武器的可靠性很好,我们要继续深入总结经验,这对今后是非常必要的。实践证明,中国人民有能力有志气,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在世界高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我鼓励大家:“我国战略核武器的发展,距我国的大国地位,以及我军军事战略的需要,还有很大差距。面对国际核裁军的形势,有一个如何抢时间,尽快完成新武器研制并装备部队的重要问题。我们不信邪,不能听任西方摆布,加速发展的决心不能丝毫动摇。”我说:“同志们肩负的历史责任不是减轻了,而是更重了。你们吃这个饭的人,恐怕要几辈子吃下去,

这是比较苦的,为了祖国和人民,再苦也要干下去!”

当然,国防科研工作并非一帆风顺,特别是试验过程中,意想不到的事故也发生过。

1994年4月,“风云2号”卫星在发射前就出了严重事故。

当时,我正在三〇一医院住院。听到报告,十分不安。

国防科工委丁衡高主任到医院汇报了事故情况和初步分析的原因及下一步工作安排。这次事故影响太大,我要求他们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要以理服人,着眼于教育,对错误和矛盾一定要揭露,不能不痛不痒,要严肃纪律。我提出,科工委机关和试验部队,都要从思想、作风、纪律上进行整顿。不光是航天系统,还有航空、兵器、船舶、核工业等系统,都应进行整顿,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航天工业总公司的领导来看我,我对他讲:“周总理制定了科研试验要‘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方针,这16字方针必须坚持。每次试验,大事小事、上下左右,所有参试部门、单位和全体人员,都要严格按照16字方针办,在全公司进行一次全面整顿。要很好地坚持和发扬过去的好传统、好经验、好作风,这些不能变,变就要出问题。要重新学习过去好的方针、政策、规定和办法,要认真贯彻落实。是不是搞市场经济就不要纪律和规章制度了?不要是不行的。对不执行规定的要检查纠正,到现场一条一条、一项一项检查,不合格、不对的就是不放过,要讲科学,不要讲面子。”我说:“教训一定要深刻接受,严肃纪律是必要的。但不能搞惩罚主义。总结经验教训不是把大家搞得没信心了,而是要振奋大家的战斗精神,加强团结,增强信心。”

一次严重事故,对各军工部门的领导和科技人员来讲是

一次极大震动。国防科工委和六个军工部门,按照我的要求进行了一次“思想、作风、纪律”大整顿。从整顿的情况来看,不仅航天存在质量和安全问题,其他部门也存在质量和安全问题。大家认为,通过这次事故,对整个军工的质量和进行一次检查 and 整顿,完全必要。

7月11日、12日,我召集国家计委、总参谋部、国防科工委和各军工部门的领导同志开会,研究了质量整顿、能力调整和科研、生产情况及当前调整改革需要解决的政策等问题。

大家认为,通过这次整顿,有几条经验教训值得记取:一是必须始终把质量放在第一位。产品质量一直是军工最敏感、最重要的问题。过去军工在工作中出问题,首先反映在质量上,历次整顿都是以质量为中心。这几年出现的质量问题,反映出一些单位质量观念淡薄,保证质量工作不落实。需要加强质量意识。二是要认真贯彻周总理提出的科研试验必须坚持的16字方针。这几年,在质量和安全方面发生的问题和存在的隐患,从管理上检查,就是没有认真按照周总理提出的方针办事,要进一步宣传、落实这个方针。三是要坚持按科学规律办事,严格试验程序。要重视试验程序,改进测试手段和办法,提高科学化管理水平。四是取得成功时要注意总结不足和问题,出了事故要检查整顿,很好吸取经验教训。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高度警觉。五是要提高军工队伍素质。

这次整顿对扼制事故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事隔三年,1997年6月5日,“风云2号”卫星将再次发射。我专程赶到发射现场,检查准备工作情况。

前几年,卫星发射出过问题,我讲了很多话,有批评有鼓励。说实在的,大家都不想发生事故。本来经费就少,一出事

故,各种浪费极多,缺口更大了。更重要的是,时间耽误了,用金子都找不回来。

国防科工委和航天总公司领导,汇报了星箭准备情况和天气预报。看得出,大家已经从事故的阴影中走了出来,精神抖擞,充满信心。我观看了发射阵地和库房,鼓励大家在发射前再检查一下,把需要解决的问题解决好。我说:“航天发射事关重大,一定要做到严肃再严肃,谨慎再谨慎,过细再过细,认真再认真,确保万无一失。”

因为天气原因,发射推迟。

6月10日晚8时零1分,倒计时结束,“长征三号”火箭正式点火。无边夜色里,火箭像一颗美丽的夜明珠,托起第二代气象应用卫星“风云2号”,很快进入太空。23分钟后,报告星箭分离,卫星准确入轨。

进驻香港

1997年7月1日零时,香港回归,举国欢腾。

男儿有泪不轻弹。我戎马一生,极少流泪。可这一刻,从电视里看到五星红旗在香港土地上冉冉升起,我禁不住热泪盈眶。

香港回归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她凝聚着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杨尚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心血,也凝聚着以江泽民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不懈努力。

对于香港,毛泽东主席从战略全局考虑,提出许多重要指示。至于香港的回归在什么时机,用什么方式还未定。

邓小平主席最早提出“一国两制”概念是在1982年1月

11日。当时是为了考虑台湾统一问题而提出的。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委员长发表解决台湾问题的九条方针政策,曾提出过近似的想法:“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

台湾问题似乎还无定期,香港问题却迫在眉睫了。可是,中英谈判很不顺利。

邓小平主席表现出高度的政治智慧,提出:“解决香港问题,用‘一国两制’的办法来解决。”这一构想,突破了僵局,双方都有一种“柳暗花明”之感。后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也盛赞这一构想是“非常伟大的天才创造”。

对于及时收回香港,邓主席态度坚决。他说:如果不收回香港,“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我们等待了33年,再加上15年,就是48年。我们是在人民充分信赖的基础上才能如此长期等待的。如果15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就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

邓主席还说:“我讲过,中国有权在香港驻军。我说除了在香港驻军外,中国还有什么体现对香港行使主权呢!”

正因为如此,90年代初,人民解放军就开始了进驻香港的准备工作。

1989年1月,杨尚昆副主席指示我召集会议,研究香港驻军问题。当时,英国人态度强硬,谈判时在我驻军问题上设置障碍。他们一开始就提出:市区不要驻军。表面理由是怕影响香港经济,怕香港人信心不足,担心我军纪律不好。在香

港驻军问题上,是全部收回英军在香港的营地,还是部分收回,成为当时的斗争焦点。实质还是主权问题。英国人还想把香港变成一个虽不直接统治,却能继续施加影响的“领地”。

这当然不行。

那天,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总后勤部部长赵南起、副总参谋长徐惠滋、军委办公厅副主任李际均和总参作战部的同志参加了会议。大家的态度都很明确。

有的讲:“如果我们放弃驻军香港,实质上是屈服英国人。”有的说:“我们要力争,不能当软骨头。你英国人驻军就没有影响吗?部队我们自己会管,英国人别再管我们的事。”还有的说:“主权都收回来了,为什么不能驻军。英国人没道理。”

大家意见一致,我最后说:“一、主权问题不能让步,邓主席讲了几次,非常明确,非常强硬,不能软;二、坚持高方案,坚持全部接收;三、相信人民解放军比英军更好。这点信心是有的。”

以后我又召集了几次会议研究驻军问题。当时,由总参谋部领导和总参作战部负责香港驻军准备工作,他们制定了一个大体计划:1992年订出方案;1993年开训;1994年至1996年组建训练完毕;1997年进驻香港。

1990年6月,杨副主席交代:“要考虑香港驻多少部队,我想陆、海、空三军都有一个小分队,有一个特种指挥部,一个将官带队。要准备好,连服装都要比现役部队好点儿,有精神。”

邓主席一直密切关注着解决香港问题的每一步进程。1992年10月21日、22日,接连两天,邓主席都谈到香港回归问题。

他说：“有一个问题，现在该决策了，就是香港问题。离1997年收回香港，只有五年不到的时间，要有好多的准备工作。这方面的脑筋动了没有？具体的工作怎么做？香港问题，就是一句话：一点都软不得。有关香港的情况我都了解，就是想看一下方案。”

我给邓主席呈报了《关于香港总督〈施政报告〉及我们拟采取对策的会议纪要》。他看过后，表示不满意：“软了。态度可以斯文，但语言一定要明确。”他说：“我以前对撒切尔就说过，如果谈不成，我们就要考虑在另外的时间和用另外的方式来解决。当然就不是和平过渡了。”他强调：“有准备才能应付可能发生的情况。”

1992年10月26日，新一届军委班子组成后，我召开的第一次会议就是传达学习邓主席关于香港问题的谈话。会上认真讨论了邓主席的指示。回顾这几年的工作，我们做了很多准备，但总的思路，是和平过渡，和平接管，没有做更复杂的考虑，没有另起炉灶的准备。

大家统一了认识：下一步要做的，一是加快和平进驻的工作；二是做好应付突发情况的准备。方案的制定要考虑到各种复杂情况的发生。要用杀鸡用牛刀的办法，不能拖拖延延，要一锤砸死。要搞出几个方案，请邓主席、江主席批准。放在那里，有备无患。

11月2日，我在第一次军委常务会议上传达了邓主席的指示和大家研究的意见。邓主席的思路很英明：干什么事都要有两手准备，两手硬，两手抓。只有这样，才能有备无患，始终把握事件发展的进程。

对于驻港部队，中央军委一直摆在重要议事日程。军委和总部的同志都花了大量精力给予关注，做了大量有效的工

作,使这支新建部队健康全面成长。

驻港部队组建之后,连续三年我都作过视察。

1995年2月,我来到驻港部队考察,注意到这里的营区建设在全军是一流的。官兵的精神面貌也很高昂,士气旺盛。我更需要了解的是官兵的真实思想状况。

考察中了解的一些问题引起我高度重视。回京后,我给江主席、张震副主席写了一封信,谈了我认为值得特别重视的几个深层次问题,提出了“端正工作指导思想”、“抓好干部队伍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实行正规化管理”、“增强部队凝聚力”等方面的意见。

我还特别强调了驻港部队征兵的问题。我说:“像驻港部队这样执行特殊使命的部队,征兵时应执行特殊政策。否则,征兵一关把不住,后患无穷。”

江主席批示:“华清同志讲得很好,同意转发。所提驻港新兵素质问题,我看是一个要十分重视的问题,要采取一点特别的措施,否则后患无穷。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只有两年多了,迫在眉睫,可否请于永波同志具体贯彻落实。”

此后,驻港部队新兵列入了特招行列。

这年年底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我对驻港部队建设提出要求:“要坚持高质量高标准,政治、军事、作风、纪律、保障等各个方面,都要过得硬。我军进驻香港,是我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重要标志,举世瞩目,政治影响很大。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经历了100多年的殖民统治,社会环境十分复杂。我们的部队进去以后如何教育,如何管理,如何在这种环境中有效地履行职责,要很好地研究。香港驻军的有关法律,要争取早日出台。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1997年转眼就要到了,明年一部分先遣人员就要进去,为了确保部队如期顺利进驻

香港,要把情况想得复杂一些,各项准备工作做得充分一些,丝毫马虎不得、疏忽不得。”

1996年春节期间我在广州。广州军区的领导同志来看望,我叮嘱他们:“现在,距1997年7月1日不到500天了。你们要按照中央的方针、政策,以只争朝夕的精神,高标准、高质量地做好进驻香港的准备工作,保证国家顺利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驻港部队这几年建设抓得不错,最近‘亮相’,各方面反映很好,展现了人民解放军的本质特色,各方面都感到非常满意。工作一定不能放松,要按建设第一流部队的标准,抓好驻港部队建设。”

1月28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全世界发布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派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部队,经过精心准备,现已组建完毕。

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对这支部队都是高度重视的。江泽民主席曾亲临视察,军委和总部领导同志一贯非常关心,从组建到建设,研究了多次,成立了专门领导小组,对部队提出的问题都能及时研究,只要合理,全都给予解决。国务院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广州军区对这支部队更是抓得很紧。几年的建设,部队面貌焕然一新。

11月11日,我再次来到驻港部队。我看了军事表演。看得出,三年来驻港部队确实取得了明显成绩。

从1995年始,部队实行了封闭式管理。这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办法。在这之前,驻港部队暴露出一些问题,突出的是有的单位管不住人,不假外出、乱交往等现象屡禁不止;有的连长组织操课,嘴里喊口令,身上BP机响了。这种状态怎么能管住战士。通过采取封闭式管理这一重大举措,标准高了,要求严了,出事少了,进步很大。我对官兵们说:“强调封闭式

管理,就是要把人管住管好;部队管理必须严格,而且要持之以恒。”

11月12日,驻港部队领导向我汇报部队建设的全面情况。我一看他们拿出了稿子,就说:“不要念稿子了。套话天天讲没有用。”我让他们随便讲,我随时插话,随时询问。这样一来,都放松了,距离也一下子缩小了。

在这之后,我几次主持军委常务会议,讨论部队进驻方案和有关规定,直至津贴费等问题。这些都得到了江主席的批准。部队进入高标准、高质量的进驻前的最后准备阶段。

1997年6月26日,以江泽民主席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即将赴港进行香港政权交接仪式。我在北京参加了欢送会后,就匆匆赶到了深圳。

这是我第三次来到驻港部队。这一次,他们真正到了登台亮相的关键时刻了。我最后一次检查了驻港部队的准备工作,参加了欢送活动。总参谋长傅全有、总政治部副主任周子玉、总后勤部副部长沈滨义和广州军区司令员陶伯钧、政委史玉孝一齐来了。

我们来到妈祖码头。这里,一艘艘导弹艇昂首列阵,一队队水兵整齐威严。80年代初,我到英国访问,专门研究过英军驻香港的舰艇。出访回来后我就提出,要制造比他们更先进更具战斗力的导弹艇,将来驻防香港。今天,这一设想终于实现。

在同乐营区,我们来到步兵旅的战士中间。部队的精神面貌,从他们挺直的腰板和自信的眼神中看得出来。我想,用不着我说什么了。

驻港部队领导和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文国庆汇报了准备工作情况。

傅全有总长说,驻港部队已经具备了进驻能力,想得全、标准高、要求严、抓得实。与去年验收时比,又上了一个新台阶。他全面分析了驻港部队的现状,提出,把适应过程缩短一点,抓领导,抓教育,抓管理,搞好群众关系,遵纪守法。

我同意傅总长的意见。他是驻港部队领导小组组长,多次检查,多次考核,抓得很紧,卓有成效,最有发言权。我对部队说:“这次来看看,心里更踏实了。相信你们不会辜负党中央的嘱咐,不会辜负人民的嘱托,完成江主席提出的‘三个确保’。我对你们很有信心。”

6月30日上午,在深圳召开了欢送驻港部队大会。

老天爷开了个玩笑:清晨,大雨倾盆。8时30分后,雨过天晴。会场上彩旗招展,锣鼓喧天,气球像一群快活的孩子,满天飞舞。群众穿上了节日盛装,聚在身着戎装的驻港部队官兵周围。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讲,这都是盼望已久的时刻。

上午10时,欢送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始。

我和广州军区司令员陶伯钧共同检阅了驻港部队三军仪仗队。总参谋长傅全有宣读了江泽民主席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进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命令》。广州军区司令员陶伯钧、广东省省长卢瑞华、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驻港部队政委熊自仁讲了话。

随后,我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代表全军官兵,向即将进驻香港、担负起香港防务神圣使命的驻港部队全体官兵,表示热烈欢送。

我的讲话稿比较长,该讲的话不讲不行。在审查讲话稿时,我注意同江主席、李总理在香港的几次讲话精神保持一致。对于中国来讲,这是本世纪最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事件,是中华民族100多年来前赴后继英勇斗争的胜利成果,也是

每一个华夏子孙会噙泪又开颜的重要时刻。

雷鸣般的掌声中,100多名少先队员跑进会场向驻港部队代表献上一束束鲜花。人民群众为有这样的威武文明之师而自豪。

当晚9时,509名官兵组成的驻港部队先头部队,分乘39辆军车通过落马州口岸进入香港。连同此前分三批进入的196名先遣人员,共705人。在这之前,为了这705人提前进入香港,以便在7月1日零时庄严地升起中国国旗,避免防务真空,我们和英国政府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斗争结果,我们赢了。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7月1日零时,先头部队在进驻的添马舰、赤柱、昂船州、石岗等14处军营同时升起了五星红旗。红旗飘扬在香港上空,也飘扬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

与此同时,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的新翼大会堂,江泽民主席庄严宣告:

“根据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两国政府如期举行了香港交接仪式,宣告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

百年沧桑,百年屈辱,百年呼唤,百年拼搏,香港终于回归祖国。香港同胞,从此成为祖国这块土地上的真正主人。香港的发展进入一个崭新时代。

6月30日下午,我从深圳回到北京。这一夜,我没有入睡,一直坐在电视机前,收看看一个个激动人心的场面。

7月1日6时,驻香港部队陆、海、空三军,开始了气势宏大的和平进军。

东起深圳沙头角,西至蛇口妈湾,南至文锦渡、皇岗口岸,

在长达几十公里的弧形地带，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跨越了深圳河，跨越了大陆至香港的海域，跨越了同样的空域，雄赳赳，气昂昂，踏上了香港这片神圣的国土。

8时40分前，各梯队依次进入香港威尔斯亲王军营、赤柱军营等14个军营。陆、海、空三军安全到位，下午便转入了工作训练。

北京和全国各地，举行了多种多样的庆祝大会。在北京，我也参加了几次大的庆祝活动。

这一天，是中国人欢庆的日子。一个多世纪以来，神州大地经历了三任政府。清朝政府，被迫接受了三个不平等条约；国民党政府，放弃了战后接收香港的大好机会；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收回了香港，收回了中国的主权，也收回了中国人的尊严。

友好往来

作为高级领导人，我和外国朋友的交往自然不会少。在这些接触中，我提醒自己做好三件事情：一是广交朋友。只要双方有共同利益，就可以交谈，朋友多多益善。二是宣传中国。广泛地向外国朋友介绍中国现状、中国历史、中国政策。我的体会是，不管对方来自哪个国家，也不论意识形态如何，只要踏上中国土地，走一走，看一看，听一听，往往都会加深对中国的热情与友谊。三是友好合作。通过双方的相互了解，建立一种信任关系，学习借鉴外军建设的经验，取长补短。在互利互惠基础上开展军事技术合作。

几年来，我先后访问了俄罗斯、泰国、印度尼西亚、法国、意大利等国；接待了几十个国家的军事代表团。回想起来，很

有意义。

1994年1月6日至20日,我率团分别对泰国、印度尼西亚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之后又对新加坡进行了三天的过境访问。代表团主要成员有副总参谋长徐惠滋、广州军区副司令员陶伯钧等。

泰国、印尼和新加坡,是几个发展较快的国家。他们对中国也友好,但在西方的挑拨下,顾虑很多。我尽力多做工作,特别是批驳所谓“中国威胁论”。我和三国的国家及军队领导人进行了广泛接触,感到这些国家与我国有许多共同点:

这些国家都在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并有明确的发展战略。印尼总统苏哈托、副总统特里对我说,印尼正在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以提高综合国力,缩小贫富差别,争取用不太长的时间使人均收入达到700美元,再进一步发展到1000美元,争取从根本上改变印尼的落后面貌。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说,新加坡和中国都应力争在20至30年内成为工业国。如果实现这个目标,世界就会大变样,就算为亚洲做了件大好事。泰国国王和总理,也强调了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的重要性。

这些国家都强调需要有一个国内和国际长期稳定的和平环境。他们认为,政治形势和军队的稳定是保障国家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各国之间相互尊重主权、不干涉别国内政和互利合作,有利于各国经济发展,有利于建立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如果这一进程遭到内部动乱或外部发生战争的破坏,西方就可大松一口气,并可继续主宰世界。

这些国家都重视国防和军队建设。方针是减少数量,提高质量,特别是提高人才素质和武器装备现代化程度。泰国强调,泰军队建设要讲究精干和实效,强调国防和军队建设要

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印尼强调,只有经济发展了,国防才能得到加强。国防力量的增强又能保障国家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我看到这些国家军队建设各有特色。泰国正加强特种作战部队的建设,其武器装备和训练水平较高。印尼则大力发展国防工业。我们参观了一个飞机制造企业,他们通过全套引进西方技术、零部件及原材料,从组装飞机发展到自行设计生产飞机,不仅培训了技术人员,建立了自己的航空工业,而且安置了大量就业人员。

泰国、印尼和新加坡三国,对中国的建设成就都十分赞赏。我向他们介绍了中国的发展战略和外交国防政策。

我说,中国人口多,底子薄,要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还需要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艰苦努力。中国人穷够了,人心所向是甩掉贫穷落后的帽子。现在还有几千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因此中国需要长期和平的建设环境。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亚洲地区的一员,真心希望本地区稳定、和平、发展,不希望二次大战的悲剧重演。中国过去长期受别人欺负,与许多亚洲国家有相似的苦难经历,因此中国不会去干涉别国的内政,也不会侵略别的国家。中国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自己决不称霸,将来强大了也永远不称霸,决不在国外驻一兵一卒。中国历来主张,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应通过和平协商解决,而不诉诸武力。中国的国防政策是防御性的,军费很有限,我们300万军队,几十亿美元的经费,包括人员的吃住行、购置装备、各种活动费用,加强军队建设完全是为了保卫自己国家安全。西方所谓“中国威胁论”和“填补真空”的挑拨宣传,是为了制造亚洲国家之间的矛盾,鹤蚌相争,渔翁得利。我表达的立场观点得到这些国家的军队和政府领导人的理解与赞同。

从那以后,我和泰国的总司令瓦拉那上将、印尼的总司令丹绒上将交上了朋友。我请他们经常到中国看看。他们来了,看不看大不一样。瓦拉那来过好几次,对中国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很大变化。

访问加深了我国与泰国、印尼、新加坡三国的国家之间、军队之间的友谊。泰国总理川立派还亲自授予我一枚“一级骑士勋章”。

1996年9月8日至24日,我率团经瑞士停留后,访问了法国和意大利。

代表团主要成员有:副总参谋长曹刚川、国家科工委主任丁衡高、海军司令员张连忠、空军副司令员刘顺尧等。这是我国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次正式访问法、意,两国政府及军队领导人均认为,这是中国与两国近年来一系列高层交往的继续,对发展国家关系和军队关系有积极意义。

法国总统希拉克在总统府会见了。希拉克总统第一句话就是:“刘华清副主席的此次访问,是加强中法两国关系的一部分。”

我转达了江泽民主席和李鹏总理的问候,并代表他们欢迎希拉克在次年5月访问中国。会谈中,我扼要介绍了中国的情况和防御性国防政策,提出面向21世纪,中法两国应该建立全面合作的友好关系,两军关系也应该多层次多领域地向广度和深度发展。我坦率地谈到:“我认为我们与贵国的合作还有不利条件,欧洲各国对我国的制裁还没有取消,还是障碍。”

希拉克说,你的讲话使我深受感动,欧亚关系对于未来的世界是很重要的因素。在此情况下,法国应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发展各个领域的合作。法国在几个世纪前,便是第一个

认识到中国文化和文明的重要性的欧洲国家。他还说,我从未赞成过对中国制裁,问题在于,这一政策是15国决定的。他表示,法国将努力对其他欧洲国家开展工作,让他们重新考虑制裁的立场,以便从政治上消除对抗,彻底取消制裁。

希拉克对中法双方在全面禁核试条约方面的立场和合作表示祝贺。他特别讲到,法国主张多极化,不希望高科技由一国垄断,不希望世界被一极主宰。法国的军工企业有30万人,准备采取特殊有效的合并办法,砍掉近一半,把最高的技术、最好的人员最有效地集中起来,该并的并,该撤的撤,搞通用化,搞专业化,搞跨国集团,搞高新技术。总统亲自抓,一定要把法国的技术推上去,赶上美国。原定30分钟的会见增加到40分钟。

会见后我们得知,希拉克总统已经明确指示各有关部门,以开放的态度对待中法军事技术合作。开展这方面的合作,既可满足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也可为处于困境中的法国军工企业注入新的活力。

在会见法国外交部长德沙雷特时,就他们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我严厉指出,前政府的这一行为严重损害了中法关系。

我随即得知,尽管很艰难,希拉克政府仍作出了停止售台武器的决定。此后,在会见法国宇航、汤姆逊、达索等主要军工企业的总裁时,他们都明确表示,将执行总统的指示和政府上台军售新政策,以对中国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发展合作。

意大利是欧洲大国之一,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意两国相距遥远,但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悠久,绵延不断。意大利总统斯卡尔法罗在会见我时强调,意非常重

视与中国发展包括军事领域在内的各方面关系,政府、议会和普通百姓,都是这个态度。总理普罗迪说,意新一届政府把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合作作为一项重大政策,而且要积极推动欧盟国家同中国发展关系。国防部长安德烈亚塔认为,中意两国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发展两国全面关系,既有利于两国人民,也可为世界安全服务。他尖锐地指出,有些人对中国发展不放心,“中国威胁论”是他们在冷战后提出的危险论调。

我欣慰地发现,中国与法意两国虽然社会制度不同,文化传统不同,价值观念也不同,可是,我们有许多方面的共同语言,完全可以使我们相互尊重,共同发展。

访问法国、意大利,给了我又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

我先后参观了法国正在建造的“戴高乐号”新一代核动力航母、正在研制的“阵风”式新一代战斗机、阿丽亚娜火箭厂和卫星总装厂。参观了意大利的空军试飞基地、导弹部队和海军两栖登陆舰。我感到,西欧各国的军队和军工企业都在进一步调整改革。军队改革的方向是继续减少数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增加快速反应能力和远距离投放能力。军工企业改革的方向,是择优缩减规模,确保质量,走集约化、专业化之路,大力提高产品的竞争能力,扩大军品市场,并加强在西欧范围的军工合作。

访问中,我强烈意识到,我军与西欧军队在装备水平、军工技术等方面的明显差距。

法意两国在飞机和舰艇制造技术,尤其是电子装备,包括机载雷达、电子侦察、探测、定位、干扰等装备和技术,以及水声设备、夜视器材、直升机等方面,均有先进产品和高新技术。适当地、有选择地从西欧引进我军所需的一些先进装备和技术,不失为一条好的途径。会谈中,我试探性地提出了这一意

向。法意双方领导人和军工企业,都对此表现出积极态度。

回国后,我向中央报告了自己的想法,得到了认可。

1998年6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中国。“八九政治风波”以来延续了近十年的所谓制裁,也自生自灭了。可是,在此之前要打破美国的封锁,在大气候下要有所突破,决非易事。

“八九政治风波”以后,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活动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对待。当时,为了打破美国的“制裁”,我有意多接触一些美国朋友,广泛做工作。

1994年3月19日,我会见并宴请了美国海军部长莱曼。

我们过去曾多次接触,已是老朋友了。见面后,我介绍了中国近几年发展建设的情况,对人权、最惠国待遇、中美关系谈了一些看法。我说:“冷战结束,国际格局发生了变化,但世界并不安宁,而且许多问题反而越来越复杂。现在,不再是通过军事手段就可以解决国际争端的时代了。在处理国与国的关系问题上,要尊重别国的选择,不要干涉别国内政。处理中美关系要着眼未来。最惠国待遇问题不能与人权挂钩。如果美国取消对华最惠国待遇,对美国和其他国家、地区也很不利,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的损失也许会更大。”

莱曼似乎很有感触,他谈了自己的看法。

莱曼认为,发展中美关系十分重要,但要把政治和最惠国待遇问题分开。不管政治上有什么分歧,贸易应当照常进行,因为贸易对两国都是有利的。政治和军事也应分开,两国要采取积极措施,保持两军交往。美国政府中确有一些持极端看法的人,散布对中国不利的言论,给延长最惠国待遇带来不利影响。也应看到,中国在美国政府中还有许多朋友,他们都不同意克林顿政府把“人权”与最惠国待遇挂钩的做法,也会

施加他们的积极影响。

莱曼提出,为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中国方面也应该采取积极的措施。首先,可将美国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重要的国际问题上。美关心的重大问题之一,是朝鲜发展核武器。中国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应当使美方充分认识到,中国的作用远远超出双方在人权上的分歧。其次,中国应加强在美的宣传和公关工作。美国新闻界能起很大作用,台湾和日本等都有成功的先例,而且在院外活动方面也很有成效。中国在此方面应采取主动行动,宣传中国取得的成就和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积极开展公关工作,使美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国,这将有助于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第三,可通过具体的交往与合作,从侧面推动两国、两军关系的发展。一旦美中两国政治关系改善了,两军关系特别是两国海军的关系,就会立即得到加强。

我感谢莱曼对中美关系的关心和提出的积极建议。我们一起回忆我访问美国和他访问中国的日子。他说,回国后即去见国防部长佩里,要他尽快访华。

莱曼没有食言。当年10月,佩里真的来了。

1994年4月2日,我会见了来北京参加亚洲问题讨论会的美国太平洋总部司令海斯上将。我和他也是老朋友。

海斯说,中美两国保持牢固的友好关系,符合双方各自利益。现在,双方已经恢复了来往和对话,让人感到欣慰。他表示相信,通过来往和对话,两国关系是能够向着正确方向发展的。海斯简单介绍了此次讨论会的情况。他说,讨论会有助于增进对中国国情和政策的了解。但让他感到吃惊的是,有的西方学者对中国军费的增长以及军事力量的发展前景感到担忧,对中国四个现代化的先后次序以及发展战略存有疑虑。

我听出,这也是他的疑虑之一。

针对海斯的谈话,我告诉他,当前中国正集中一切财力进行经济建设,所以优先考虑农业、工业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问题;国防建设,则服从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中国军费很少,与美国等许多国家无法相比。1993年,军费为520亿元人民币,折合60亿美元。从表面上看,比去年有所增加,但主要是弥补物价上涨的部分,军费开支实际上并没有增加。中国的军费实际上只够养兵。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仍处于较低水平,不可能对别国构成威胁。我们不搞霸权主义,不搞军备竞赛,不搞对外侵略扩张。对于有争议的问题,如南沙问题,也希望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

在座的美国学者龙伯格说,美国认为,对亚太地区和平的最大威胁在于东北亚。除朝鲜问题外,该地区还有日俄关系和日本问题。美日防务安排的目的之一,就是防止日本重新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海斯说,美日之间分歧也不少,但两军关系并没受影响。希望美中两军关系亦能如此。我说,亚太地区稳定发展的总趋势还会发展下去,我们对亚太地区和平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希望中美能着眼这个长远目标进行合作。

海斯告诉我,他曾几次访问朝鲜,看到过大批部队在从事国家工程建设,看到过路边的损坏军车,却未见到部队的训练场面。因此,朝鲜军队的训练水平和装备状况可能不像西方估计的那么高。对于朝鲜的核问题,海斯认为,施加压力如果是为了搞垮朝鲜,这是不对的;如果是促使朝方恢复对话,则是可行的。他要求中国对朝鲜施加些压力。

我说,中朝关系很好,我们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些积极的工作。但必须认识到,朝鲜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而且民族自尊心很强,我们不能也不应该让朝鲜按别国所说的去做。

4月7日,我会见了美国前国防部长布朗。

我对他说,中国的人权问题是世界上解决得最好的国家之一。旧中国,多少人没有饭吃,新中国成立以后,首先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才能使12亿中国人吃饱饭。为什么要说中国人权不好呢?当然,我们并不满足,所以我们大力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把中国搞乱了,对中国不好,对美国也不好。几千万、几亿难民向中国四周逃荒,对世界各国都不好。美国政府靠人权问题压中国,中国人是压不倒的。

4月8日,我会见了美国前国防部长切尼。

我告诉他,中国希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就是建设和发展经济。中美两国有分歧,也有共同的东西,各有各国的国情,中国只能根据自己的情况,实事求是。我说,中国很稳定,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你到这里做生意,尽管放心。美国把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联系起来是个大错误。

5月26日,我又会见了美国前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

接二连三地会见美国这些军界要人,目的就是让他们了解真实的中国,通过他们,再去宣传中国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发展双边关系的真实情感,以及对国际重大问题的原则立场等等。这些观点,我们自己在各种场合理直气壮地讲,讲通几个外国人,再由他们去讲,可信性和实效性就比我们自己去讲好得多。

10月,美国国防部长佩里来华访问。这成为中美两军交往史上的一件大事。10月17日晚,我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并宴请了佩里一行。

我首先对佩里作为国防部长正式来访表示欢迎。回想起1980年与佩里的那次互访,我说,佩里部长为80年代和今天

的两国两军关系的改善,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两军领导人进行友好交谈,对于两军关系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相信佩里部长的此次访问,会使两国两军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佩里说,14年前,曾经与刘副主席为之努力而发展起来的两军关系,五年前突然停顿下来,现在应该是重新开始两军间的那种关系的时候了。这不仅仅是为了两国防务部门,也是为了两国的安全利益与世界和平。为了使这个目标获得成功,还需要克服一些困难,为发展两国关系作出努力。我与刘副主席现在担任的职务以及个人间的友好关系,都为我们达到共同目标提供了机会。但是,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又都限制在大的政治范畴里而,这就是两国总的关系。要使两军关系得到发展,还须更为有效地解决两国关系中存在的障碍性问题。一是人权问题,二是导弹问题。

我对佩里提出的问题,阐述了中国的立场。我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政治、经济、文化面貌大有改观,人民的政治地位、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广大人民充分享受着自由和民主。至于导弹问题,钱副总理访美时,话已经讲清楚了,问题也解决了。我们遵守导弹及其相关技术控制体系(MTCR)的准则和参数,履行承诺,请部长放心,中国说话是算数的。

佩里部长的访问很成功。他的访问也向世界表明,美国军方对中国的制裁完全解冻。他是美国政府中的中国朋友,对中国一直持友好态度,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能理智客观地予以评说。比如,世界吹起一股“中国威胁论”阴风时,他站出来说,虽然中国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但相信中国既不会威胁自己的周边国家,也不会威胁世界,因为中国无意去威胁别人,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他的理解和判断十分正确。

外事接待工作很重要,也很费时间。从礼仪上讲,一个代表团,不管大国还是小国派出的,总希望见的领导人多一些,以显示对自己的重视。我们出国也有这种心理。对来访者希望我能会见的,我总是尽可能出面会见。

此后,我先后会见了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陶庭练率领的越南高级军事代表团、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艾胡德·巴拉克中将、科威特国防大臣艾哈迈德·萨巴赫、意大利国防参谋长居多·文图罗尼、泰国总理差瓦利上将等。

在对外友好交往中,因为军事技术合作的事情,我去俄罗斯次数最多,见得最多的也是俄罗斯朋友。

在此之前,中苏已经商谈军事技术合作问题,进展比较顺利。可是,到1991年底,苏联解体,中苏军技合作中断。

我们曾多方设法与俄罗斯新政府联系,继续派出了一些团组赴俄考察,希望建立新的伙伴关系。海军、空军、陆军的同志都去了,工作没有断线。可是,俄罗斯的决策者一直未拍板。

我仔细分析了俄罗斯的情况,感到路并没有完全堵死,一切取决于我们的工作 and 耐心。我指示具体工作的同志,驻在莫斯科,天天约他们,催他们,想方设法创造机遇,打开高层交往的路子。

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磋商,俄罗斯政府同意组团来北京参加中俄军事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确定此项工作由副总理绍欣负责。

1992年11月21日,绍欣率团访华。绍欣是个年轻人,41岁,经济学博士、自然科学院教授、院士。尽管他书生气多些,年轻好胜,我还是和他交上了朋友。

中俄混委会是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绍欣先发言,尔后

我介绍了中国的情况,对近几年军技合作成果表示满意,希望向新的深度和广度迈进。我对绍欣说:“在北京,多走走,多看看,多提建议。改革开放的中国真诚地欢迎你们。”我们彼此之间,没有因为年龄差别大而拘谨,也没有因为商务问题争执不下而伤和气。人与人交往中,真情往往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一次中俄混委会后,我便开始组织落实工作,一些过去与苏联政府签订的合作内容,因为情况的变化无法执行了。我们自身也需要调整。

1993年初,我召集总参谋部和国防科工委,修订过去已经批准的合作内容,再重新拟订一个方案。

2月26日,我给江泽民主席和李鹏总理写了信,附上了这个方案。

我在信中强调,我军现有技术装备与世界水平有很大差距,“形势逼人,必须尽快地缩短这个差距。但是完全要立足国内研制赶上去,困难很大,而且越拖距离越大。”我说,目前俄方对我比较开放,许多重要武器装备及其技术都可转让。为了抓住时机,我让总参和科工委研究协调,形成了少量采购现役装备、引进相关技术、结合国内消化制造的配套方案。“这样做,不仅可以使部队在2000年前拿到部分先进装备,而且可以使国内的科研生产水平上一个新台阶。这样做,就可能使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受制于人,是省时省钱高效的最佳途径。”

党中央和国务院对此非常重视。4月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了汇报,批准了这个方案。

中俄政府间军技混委会开了六次。三次在北京,三次在莫斯科。俄方主席更换了四人,中方一些委员也因职务变化

而调整。只有我一个人从开始一直干到离职。

1993年6月23日至7月5日,我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中俄军事技术合作混委会第二次会议。这次会议解决了两个难度最大的问题,另外还取得一些积极成果。

访问期间,我还会见了俄政府总理切尔诺梅尔金,以及俄国防部第一副部长科科申、俄陆军总司令、海军总司令等高级将领,还有曾对中苏军技合作做出贡献的原中苏混委会苏方主席别洛乌索夫等。参观了俄军陆海空一些部队和军工厂。代表团所到之处,都受到当地政府和驻军的热情友好接待。

回到北京,我向军委常务会议汇报了访俄情况。江泽民主席参加了会议。他嘱咐我,“写个材料我看看,我懂了,其他人也就能懂了”。

7月31日,我给江主席呈送了访俄情况报告,除混委会讨论和解决的主要问题外,具体汇报了对俄合作项目中军用装备的评估。

江主席阅后批示常委传阅,中央政治局常委每个同志都圈阅了这份报告。

1994年6月,第三次混委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在某些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1995年冬,中俄两国工作班子在北京举行了最后一轮会谈,双方草签了政府间协议和总合同的大部分条款。俄方建议在12月10日前举行混委会第四次会议,签署会议纪要和政府间协议两个文件。他们要求中方认真考虑这一建议,并尽快答复。

我当机立断,决定去莫斯科一趟,把协议和总合同签下来。中央很快同意了我的意见,并由我组团赴俄。

12月的莫斯科,寒风凛冽,滴水成冰,但走出专机,映人眼帘的却是鲜花和微笑。俄政府第一副总理索斯科维茨、国

防部第一副部长科科申、外交部副部长潘诺夫、空军总司令杰伊涅金上将、军技政策委员会主席斯维齐尼科夫、副主席帕霍莫夫等前来机场迎接。

中国代表团也有相当规模,主要成员有:副总参谋长曹刚川、国家计委副主任郭树言、外交部副部长张德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怀国模、外经贸部副部长谷永江、航空工业总公司总经理朱育理、总参装备部部长贺平、国防科工委综合计划部部长陈达植、中国驻俄大使、武官等。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索斯科维茨副总理。过去给他写过好几封信,只是没有见过面。听说他是一个实干家。一见面,凭感觉彼此能够相互理解。

按照双方商定的日程,我于12月3日前往图拉州访问。参观了反坦克导弹和防空导弹设计局、生产多管火箭炮的斯普拉夫工厂、空降兵第一〇六师、图拉兵器展览馆。12月5日回到莫斯科。

12月6日上午,刚从以色列访问回来的俄罗斯国防部长格拉乔夫大将在国防部会见了我和曹刚川副总长、怀国模副主任等中国政府代表团中的军方成员。格向我介绍了参加会见的国防部第一部长科科申、总长科列斯尼科夫大将、海军总司令格罗莫夫上将、空军总司令杰伊涅金上将、总装备部长西特诺夫上将、国际军事合作总局局长哈尔琴科上将。这么多军方主要领导都在场,这种安排是前所未有的。

当天下午,中俄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中方代表团下榻的总统宾馆举行。我和索斯科维茨共同主持了会议。会谈达成共识,我和索斯科维茨分别代表各自政府,签署了《中俄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纪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

“苏-27”飞机项目合作及其结算办法的协议》。

至此，一直悬在心上的石头终于落地。

这次访问给我留下的印象十分深刻。“8·19”事件后，中央对俄罗斯采取了不结盟、不对抗、睦邻友好、互利合作的正确方针，使两国关系得到了全面发展。特别是经过江主席和李总理亲自做工作，这一方针政策不仅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赢得了信任，更重要的是在俄罗斯高层领导中对此已有明确认识。不论是我接触到的政界、军界官员，还是与我开展合作的生产厂家、技术部门，各界人士都对两国友好合作表示赞同和寄予厚望。他们说，不管将来谁上台主政，都不能改变俄中友好合作关系的大局。只要俄中两国团结起来，就不怕世界任何势力。其次，这次机会抓得好。从两份重要文件得以同时签署和俄政府、军队接待规格明显高于过去来看，俄罗斯发展对华关系，争取尽早签约，以便启动重大合作项目的意愿是真诚的。这再次证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选准时机、派团访俄的决策是非常适时的。这对于我提高研制起点，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加强我军武器装备建设，做好对台军事斗争准备工作，都具有十分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1996年4月，叶利钦总统访华。4月25日，我利用中午时间会见了随同叶利钦来访的索斯科维茨副总理。我们谈及对中俄军技合作的评价，谈了下一步新的合作问题。索斯科维茨副总理回去向叶利钦作了汇报。随后两天，叶利钦总统访问上海，向江主席表示，中国是俄的友好国家，他们愿意与中国进行军事技术合作。

11月10日下午，中俄政府间军技合作混委会第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俄罗斯第一副总理博利沙科夫率团参加。

在和博利沙科夫副总理小范围会谈时，我们诚恳地交换

了意见和看法。博利沙科夫说,他很赞同我就中俄军技合作的重要意义所阐述的观点,坚信中俄军技合作,对发展两国面向 21 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他表示,对合作中出现的问题,需把情况搞清楚,有耐心地找出解决问题的现实办法,并同意尽快开展新项目的谈判工作。会谈结束后,我和博利沙科夫正式签署了本次会议《纪要》。

1997 年 8 月 24 日至 9 月 3 日,我再次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俄罗斯。代表团主要成员有:副总参谋长钱树根、国防科工委主任曹刚川、国家计委副主任甘子玉、航空工业总公司总经理朱育理、外交部副部长张德广、财政部副部长刘积斌、外经贸部副部长石广生、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陈达植和总参装备部部长李安东等。此前,在北戴河开会时,我已经知道,党的十五大后我将退出工作岗位。因此我要加倍努力,把没做完的工作尽力完成。

我与俄副总理乌林松共同主持了中俄军技合作混委会第六次会议,并签署了《中俄政府间军技合作混委会第六次会议纪要》。

访问期间,代表团还参观了列宁光学仪器厂、恰普雷金航空研究所、俄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和共青城航空工业联合体等军工及科研单位。

这是我在职期间的最后一次出访。

访问结束,专机起飞了。舷窗外,是俄罗斯美丽的大地,一望无际,河流泛着银波,森林绿到天边。我长长松了口气:任务完成了。在即将进入中国国境时,我又瞅向窗外。国与国之间,真正明确的边界,是在地图上和人们的心里。窗外大地上,两国的边界是在绿色中互相交融的。我把这看作是大自然对人类无言的提示。我衷心祝愿,中俄两国人民的友谊,

像喜马拉雅山和乌拉尔山一样,永世长存;像长江和伏尔加河一样,源远流长。

难忘小平

1997年2月19日,小平同志在北京病逝。

在中国,继毛泽东主席之后,小平同志是世界公认的又一位伟人。他的去世,在外部世界产生巨大反响,许多国家领导人纷纷来电表示哀悼,给予高度评价。美国总统克林顿认为,邓小平“在过去20年是世界舞台上一位不凡的人物”。法国总统希拉克说,“在本世纪内能够像邓小平一样领导如此庞大的人类社团,经过这么深远而有决定性转变的实在罕有”。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发言人则称:“全世界都应该谨记,邓小平是中国现代化的总设计师,无可估量地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

小平同志去世前,已经住了较长时间医院。年初,他的病情明显加重,中央打招呼,要求中央领导同志不要离京。这时正是新年和春节之交,事情很多。我忙着工作,同时要求工作人员随时注意小平同志的病情通报。几天后,通报说小平同志病情稳定,不会马上有什么大事,大家有事可以去办了。2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全体同志前往三〇一医院看望小平同志,表达春节问候。2月14日,接到中央紧急通知:小平同志病危。

2月19日,是小平同志逝世的日子。

当天我出席了全国国防科技工业会议,在会上讲了话。几天来一直牵挂着小平同志病情,身心疲惫。这天晚上准备休息了,突然接到中央通知:召开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邓小

平同志逝世了！

虽然生老病死是自然法则，但听到小平去世的消息，我在思想感情上还是难以接受。当晚，政治局常委集体赶到三〇一医院，向小平同志遗体告别。

我是战争年代过来的人，一生见过无数死亡，送走过许多战友和领导。可是，小平同志的离去令我格外悲痛，有种难离难舍的感觉。这种情感，来自战争年代生死与共的同志情谊，来自半个多世纪他对我的爱护、教诲和信任，也来自我对他的政治智慧的钦佩和人格魅力的无比敬重。一连数日，心情都很沉重。

2月24日，我参加了在三〇一医院举行的小平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告别厅里，小平同志面容安详，静静躺在鲜花丛中。再也看不到他的睿智目光，听不到他的谆谆教诲了。根据安排，告别仪式后小平同志的遗体要去火化，这将是见他的最后一眼……我立正敬礼，泪眼模糊。恍惚间回到了59年前的洪洞县马牧村八路军总部，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小平同志。他刚被任命为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我领受了警卫护送他回师部的任务。当时我是一二九师司令部秘书主任，才22岁，经验不多，回程中路过新区，差点让小平同志连饭都吃不上，出了洋相。烧炭的汽车出毛病后，我惴惴不安，他却毫不在意，骑上我借来的马，谈笑风生，一路烟尘赶到了师部。当时我哪会想到，和小平同志的这次相遇，会对我的—生产生那样深远的影响。也更不会想到，此后数十年间，当年的邓政委会在中国的政治舞台如此活跃，对中华民族的振兴做出这样巨大的贡献。时间真快，眨眼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恋恋不舍看了小平同志最后一眼，默祷：老人家，您走好……

回到家里，浮想联翩。小平同志一生大起大落，波澜壮

阔,无比辉煌。作为一个生命个体,他是创造了人生奇迹的伟人。如果说他还有遗憾,也许是没能看到香港回归。他说过,香港回归时如果身体不好,坐轮椅也要去。但只差半年时间了……小平同志可以自慰的是,他在身后留下了丰厚的精神遗产。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人生是功德圆满的。毛泽东主席说过,人总是要死的,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小平同志死得重于泰山。

家中保存的相册里,有我和小平同志的一些合影。翻看照片,思绪活跃。小平同志是1978年重新复出的,当时已是74岁的高龄。对普通人来讲,74岁,这是含饴弄孙,颐养天年的年龄。对小平同志而言,却是又一次建功立业的好时光。其后的十多年里,他领导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总设计师的形象,领导中国人民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开放,大胆地制订了一系列特区经济政策,开放市场,引入外资,高瞻远瞩,为中国开拓了崭新而广阔的市场经济天地,也实质性地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在他的引导下,中国从自我封闭中重新融入世界政治舞台。一位年迈的老人,凭着过人的智慧和毅力,凭着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鞠躬尽瘁,创造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

有着如此辉煌的人生,小平同志可以安息了。

缅怀中我也为自己深感庆幸。和许多同志相比,我的幸运是较早接触了小平同志,并多次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这是一份长达近60年的革命情谊,也是一次次让我终生受益的教诲和指引。参加革命时,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凭着对事业的忠诚,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往前走。我没有奢望,只求能在有生之年为党和人民多做点事情。小平同志一直在关注我的成长。从海军司令员岗位离任前,我进了中

央顾问委员会。本以为此生事业到此告一段落,却出乎意料走进了军委机关,又一次在小平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以后,又继续被委以更多重任。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成长为军队高级将领,我的这一成长经历,在我们革命队伍中是带有普遍意义和典型性的。这是党的培养,也离不开小平同志对我的教诲和信任。

2月25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小平同志的追悼会。会场外,数万人民群众自发地拥来,用各种不同形式为小平同志致哀。会场主席台正中悬挂着小平同志巨幅遗像,骨灰盒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老同志们都来了,悲伤不已,有的当场晕倒。江泽民主席致悼词,给予小平同志崇高评价,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继承邓小平同志遗志,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回顾以往,中国革命的航船遇到过许多惊涛骇浪。可以说,正是在这艘航船最危险的时候,小平同志以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大无畏的革命胆略,及时调整了航向,领导中国人民走上改革开放之路,走上国强民富之路,使中国从晚清以来一直低落的国家形象,一变而成为一个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昂首挺立、举足轻重的国家。这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是小平同志对中华民族的巨大贡献。

凝望小平同志遗像,泪眼难干。追悼会后,国殇结束,五星红旗将重新升起,一切工作要回到正常轨道。作为一个跟随小平同志多年的老兵,我想到了自己今后的责任。

当天下午,中央军委召集邓小平治丧委员会成员中的军队在职干部和部分在京外的老同志开会,江泽民主席主持会议并讲话。我也在会上讲了话。我说,小平同志逝世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重大损失,大家都很悲痛。我们应该化悲痛为力量,以实际行动落实小平同志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

示。要保持稳定。保持部队的稳定,巩固国家的稳定,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创造稳定的环境。我们要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继承小平同志未完的事业。会议开得严肃而沉重。

为了更好地继承小平同志遗志,随后几个月里,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别在3月、5月、6月和8月连续四次开会,讨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十五大报告提纲和给政治局会议审议的送审稿。

我是做军队工作的。我告诫自己,一定要深刻领会小平同志在军事领域的一系列思想,认真贯彻,发扬光大,协助江泽民主席抓好军队工作。

众所周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小平同志既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总设计师,也是新时期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总设计师。以往工作中,贯彻落实小平同志的军事思想,也一直是工作的指针。

1989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高度评价了小平同志对我们党和国家建立的卓著功勋,要求全党认真学习小平同志的著作。

1991年初,全军军事科学研究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讨论通过全军八五期间军事科研工作规划。我和国防部长秦基伟、总长迟浩田等出席了会议。早在1978年,小平同志曾为军事科学院题词,“继承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发展我国军事科学”,指明了军事科学繁荣与发展的方向。这次会议上,我强调指出:我们不仅要继续加强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也要认真开展小平同志关于新时期国防建设、军队建设论述的研究。我是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名誉会长,组织和推动邓小平军事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活动,责无旁贷。

9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江泽民主席提出,向列宁、毛泽东同志学习,也要向邓小平同志学习。为此,我找负责党的宣传工作的郑必坚同志深谈了一次。我认为,对小平同志的思想,我们理解了一些,还不深不透不彻底。比如,对于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观点,人们没有任何疑义,但到了精简整编,又不愿动了,强调打起仗来怎么办,发生问题谁负责。这是一种守摊子的观念,思想深处还是按照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那一套建设国防和军队。所以,如何学习运用小平同志的思想,解决我军在新的历史时期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是摆在广大官兵面前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

当年底,我参加了“邓小平同志新时期国防建设军队建设理论研讨会”。我指出:小平同志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是我军的主要领导和创始人之一。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和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参与了创立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实践活动,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在60多年领导指挥军队的实践中,创立和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建军思想理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从新时期我国国防建设、军队建设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科学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创造性地回答了新形势下亟待解决的一些理论与实践问题,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提出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科学理论。实践证明,小平同志的军事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和平时军队建设的纲领,是我军各项工作的指南。

我指出,小平同志的军事理论,有丰富的内容和鲜明的时代特点:

坚定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小平同志军事理论最重要的特征。他最早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给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以公正评价,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他对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的论述,对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论述,对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论述,对军队坚持党的领导的论述,特别是关于干部队伍培养、建设的论述等等,都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直接继承和发展。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小平同志坚定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有巨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小平同志一再强调和坚持的思想路线。针对我国国情军情,他提出的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理论的一系列方针原则,都是坚持实事求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典范。他的军事理论,科学地反映了新时期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的客观规律,因而具有明显的实践性,深受广大官兵的拥护和欢迎。

善于从战略高度观察和判断问题,是小平同志重要的思想方法。无论国际国内风云如何变幻,他总是以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的眼光高瞻远瞩,一针见血地指出事物本质。他针对东欧、苏联剧变提出的战略方针,对把教育训练、科技和人才置于战略地位的论述,都表现出远见卓识的才华和善于抓住主要矛盾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

小平同志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充满彻底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的革命精神。他从不拘泥前人的过时结论和陈规旧范,而是面向实际,面向未来,以辩证的眼光观察问题,深思熟虑,做出新的论断。他对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的分析,他主张通过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一国两制、实现祖国统一,这一切无不具有划时代意义,充分显示出大无畏的理论勇气和杰出领导人果断决策的品质。我们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小平同志新时期国防建设、军队建设理论,就要努力掌握他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我强调指出,我们这么大的军队,需要有伟大的理论,邓小平理论就是伟大的理论,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地学习和运用呢。我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贯彻执行小平同志的理论。当时,小平同志思想理论体系的称谓,没有统一提法。有称思想的,也有称理论的,党的十五大明确为邓小平理论。

小平同志去世后,我曾一次次翻看照片,回忆他的音容笑貌。相册里,有一张1992年在深圳迎宾馆与小平同志的合影。这一年,是中国历史的又一转折关口。这年春天,小平同志南巡,发表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讲话。1月22日下午,他在深圳迎宾馆接见深圳市党政干部。我正好在广州战区考察部队工作,也参加了这次会见。当时小平同志已88岁高龄,仍然神采奕奕,思路敏捷。

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打破禁区,使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理论有了重大突破,成为又一次思想大解放的宣言书。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和巨大震动,加快改革的呼声遍及全国各地。中央马上把小平同志的讲话、包括后来在上海的讲话,综合成一个文件,向全党下发和传达,并召开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学习南巡讲话,部署进一步改革开放问题。随后,一系列新的改革措施纷纷出台。1992年成了中国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的改革年。

军队也在努力。当年4月,中央军委决定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学习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提高思想认识,研究部署军队

体制编制调整改革问题。

这是一次重要会议。为了贯彻落实小平同志思想,我作了充分准备。会上我说:“邓主席在规划整个国家改革开放事业的同时,还规划了军队改革的蓝图,提出了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总目标,提出了一整套有中国特色的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思想。这些思想囊括了军队建设的方方面面,其中主要有:

“新的世界大战有可能或者说在较长时期内打不起来。我们要下决心抓住有利时机,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军队建设的立足点,必须由过去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来。

“国防建设必须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军人要在这个大局下行动。经济搞上去了,国防和军队建设才有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国防建设不是消极地依附于经济建设,而是对经济建设具有促进作用和保证作用。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发扬我军优良传统。要把军队教育好,坚决维护党的基本路线和社会主义制度。我军要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枪杆子要永远掌握在忠实可靠的人手中。

“军队建设要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没有现代化科学技术,就没有现代化国防。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是军队和国防现代化的主要标志。一定要争取时间把武器装备搞上去。改善装备必须以国家经济和科技的不断发展为前提。要减少军队人员,把省下的钱用于更新装备。

“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位置。现代战争是诸军兵种协同作战,要加强合同作战训练。通过大力办好院校来培养

干部,提高干部素质。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军队要整顿,克服‘肿、散、骄、奢、惰’。军队要提高战斗力,提高工作效率,不‘消肿’不行。即使战争要爆发,我们也要‘消肿’。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编制就是法规。搞好军队的体制编制改革,可以带动解决军队的其他问题。

“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建军的原则。重视现代战争中的后勤保障,加强我军的后勤建设。

“未来反侵略战争是一场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我们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真正打起仗来,几百万军队也不够,要建设强大的后备力量。

“要进一步搞好军政、军民关系。军队不但要成为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还应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力量。”

我强调指出,“邓主席关于新时期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的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全军广大指战员所拥护并被实践证明完全正确的现代军事科学理论,是和平时期我军建设的行动指南。”

可以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是在小平同志的指引下,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战略性转变,在军事、政治、后勤、国防科技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军队建设出现了崭新局面,走上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军队的正确道路。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极大地鼓舞了我们深化改革的信心,加快了军队改革步伐。

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我要求全军,要进一步提高对小平同志军事理论指导地位的认识。小平同志说过,改革也是解

放生产力。对我们军队来说,改革就是提高战斗力。我们要更加牢固地树立起战斗力标准的科学观念,凡是有利于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就要坚定不移地干。只有这样,才能把军队建设得更加强大,从而更好地捍卫改革开放,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现在我们已跨进新的世纪,历史翻开了新篇章。五年前,小平同志的骨灰已经撒在祖国的东海和南海,融入浩瀚的太平洋。他的精神,将继续激励中国人民前无古人的改革开放事业。展望未来,中华民族必将以更加强健而自信的身影,耸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小平同志 90 华诞时,我曾挥毫写过四个大字:“功德无量”。这是我的由衷之言。

小平同志已经远去。

小平同志,我们永远怀念你。

一 生 无 悔

社会需要安定,生活需要和平。为了这个简单明白的道理,我穿了 68 年军装。

在我离职前最后三年,很凑巧,我赶上了三次极有意义的纪念活动,不仅都和我有关,也都和军装有关。

1995 年 9 月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纪念。

日本人和中国人同文同种,应该和睦相处。可是本世纪 30 年代初至 40 年代中期,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与日本侵

略者进行了气壮山河的斗争。前后八年,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终于赢得了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的胜利。在中国近代史上,这是中国人民反对外敌人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它洗雪了百余年来的民族耻辱,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转折点,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胜利来之不易,和平应当珍惜。可是有人并非如此。

当年8月30日,我会见香港《大公报》社长王国华和总编辑曾德成。他们希望,我作为一名亲历者,能回顾一下当年经历,并对亚洲未来形势作出展望。

我谈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亚洲国家,也遭受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蒙受了深重的灾难。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患难与共,并肩战斗,打败了共同的敌人。令人遗憾的是,日本社会包括政界,目前仍有人否认过去的侵略历史,妄图为日本法西斯开脱罪责。这极大地伤害了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对此必须予以高度关注和警惕。”

人类不需要战争。但为了持久的和平,我们不仅不能脱下军装,还得时刻握住武器,睁大眼睛。

1996年10月是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紀念。

岁月如梭。当年,即使是十多岁参加红军的娃娃,现在也快80了。据统计,全国健在的老红军还有3000多人,而仍在军队岗位上继续工作的只有我和张震副主席了。

发生在本世纪30年代的红军长征是震惊中外的伟大事件,是人类历史的伟大壮举。两年多时间里,工农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几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跨越了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克服了重重艰难险阻,纵横14省,转战数万里,终于相继到达陕甘地区会师,胜利完成了战略大转移。留在南方八省的红

军和游击队,在远离党中央的情况下,面对数十万国民党军连续不断的残酷“清剿”,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在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长征,保存了党在南方的力量和阵地。陕北红军在艰难条件下英勇斗争,与先期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并肩作战,巩固和扩大了陕甘苏区,为主力大会师准备了必要条件。长征播下的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成千上万红军将士的鲜血,换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当年,我参加的是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在四路长征队伍中,这是人数最少的一路。我们在远离党中央的情况下,孤军远征,艰苦转战万余里。长征途中还独立创建了鄂豫陕新的革命根据地,并率先到达陕北,为主力红军会师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可以说,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红二十五军写下了别具特色的光辉篇章。后来,我把红二十五军的长征精神概括为:

“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和对党的领导、革命事业坚定不移的信念;不惧强敌,英勇善战,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勇于牺牲,战胜困难,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高尚品德;艰苦奋斗,联系群众,勇于奉献的崇高思想;独立斗争,孤军北上,敢为先锋的求索精神。”

实际上,除了“孤军北上”这一条外,它也是整个长征精神的一种基本的概括。

红军长征的胜利,对革命事业的发展以及对新中国的建立有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不过,我认为它真正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活生生地展现了人的一种巨大精神力量。这种精神,正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自强不息传统的集中体现。可以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军队,只要有了这种精神,就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过去,靠这种精神,我们打出了一个新中国;今天,我们同

样应该依靠这种精神,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华民族是不屈不挠的民族。我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我们既然赢得了昨天,我们就一定能够赢得今天和明天。

1997年8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70周年纪念日。

作为一个参军68年的老兵,我是和这支军队一起成长的。人民军队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几乎都历历在目。7月31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庆祝建军70周年大会。中央政治局全体常委出席大会,江泽民主席讲了话。

我即将退出领导岗位,但有幸赶上了主持这次盛典。

第二天,《求是》杂志发表了我的署名文章《高举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伟大旗帜,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而奋斗》。文中,我回顾了我军的成长历史:

“70年来,我军以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以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经受住了血与火、生与死的严峻考验,历尽艰难,百炼成钢。70年来,我军始终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适应形势和任务的变化,不断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使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军队,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人民军队;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军宗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使我军成为一支深受人民群众爱戴和支持的军队;始终坚持战斗力标准,不断提高军政素质,积极改善武器装备,使一支建军初期主要靠大刀长矛和小米加步枪作战的军队,成为一支诸军兵种合成的,拥有导弹、核武器等现代技术装备的,具有现代防卫作战能力的军队;始终坚持从严治军,使一支由各根据地发展起来的最初以打游击战为主的军队,成为一支高度集中统一、作风优良、纪律严明的正规军队;始

终坚持把人民解放军办成一个大学校,培养、锻炼、造就了一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骨干,我军各级领导班子和整个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始终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部队,形成了一整套我军特有的优良传统,涌现出了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他们的光辉思想和英雄业绩,对振奋民族精神和凝聚军心起到了极大的鼓舞和推动作用。”

同一时刻,我很怀念毛泽东主席和邓小平主席。

我认为,我军的一切伟大成就和进步,都是在毛泽东军事思想和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指导下取得的。

毛泽东主席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应用于中国革命战争,应用于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国防事业,应用于我军建设的实践。解决了如何把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新型军队的问题;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行人民战争所必须坚持的战略战术问题;解决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保卫祖国、加强国防、建设现代化革命武装力量和发展现代化国防科学技术所必须遵循的指导思想问题。毛泽东主席总结和提出的关于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依靠人民建设现代国防的思想理论,以及蕴含其中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宝库。

邓小平主席我很熟悉。他直接领导我几十年,令我敬仰。

可以说,作为我军的创建者和重要领导人之一,邓小平主席为了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建立了无人可比的不朽功勋;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他也做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主席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也是军队和国防建设的总设计师和

人民解放军的统帅。

邓小平主席在领导我们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把马列主义军事理论和毛泽东军事思想创造性地应用于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实际,创立了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这一思想,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和平时期,我军建设亟待解决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提出了新时期军队建设的一整套方针和原则;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路子,使我军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我认为,在目前国际战略格局发生深刻变化背景下,我军要肩负起神圣使命,就必须坚决贯彻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积极探索军队建设特点和规律,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质量建军:第一,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第二,大力加强政治建设,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第三,搞好体制编制调整精简,进一步优化组织结构;第四,把教育训练摆到战略地位,提高部队在现代高技术条件下的作战本领;第五,加强国防科学技术武器装备研究发展,加强后勤建设,提高综合保障能力;第六,以纪律建设为核心内容,依法从严治军;第七,加强军事科学研究,创造新的军事理论;第八,加强军政军民团结,为军队建设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1997年9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2000多名代表,代表了5800多万党员。大会主要议题,是审议批准江泽民总书记作的十五大报告。这个报告,会前修改了九次;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也先后为此开过六次会。报告系统地回顾了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奋斗历史,回顾了邓小平南巡讲话以来的辉煌成就和新鲜经验,规划

了未来 50 年的宏伟蓝图,气势磅礴,振奋人心。

大会还讨论修改了《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了邓小平理论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确定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我很欣慰。在我看来,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能够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前途问题;也只有邓小平理论,能够凝聚五十多个民族和十多亿中国人的心。她是一个强大精神支柱。

9月18日,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9月19日,十五届一中全会,产生了以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为常委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大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决定张万年、迟浩田为军委副主席;傅全有、于永波、王克、王瑞林为军委委员。

十五大决定,让我从中央和军委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我早就年事已高,这一决定,我完全拥护。

1998年3月19日,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闭幕。此后,我交接工作,退出领导岗位,开始了新的生活。

回顾一生,革命近 70 个年头,仿佛弹指一挥间。掐指一数,如今已经八十有五。尽管现代医学发达,但也知道去日无多了。让我欣慰的是,回头望去,这一辈子虽危机四伏,一波三折,却总是有惊无险,遇难呈祥,而且活得理直气壮,无愧无悔:

作为公民,我为国家和民族尽心尽力,贡献了自己的全部才智;

作为军人,我一直在冲锋陷阵,没有让军装沾上污点;

作为下级,我完成了小平的重托,将来汇报,可以不用汗颜。

现在,我离开了高位,按湖北家乡话讲,我成了一个普通

的“老馆子”。瞅着军装,我在想,将来某一天,军装肯定会成为人类文化博物馆里的老古董。不过,这一天还很遥远。为了和平生活,今后还会有许多人像我一样,要穿一辈子军装。

(2001年2月完稿)